“盛世”危言

芦笛 著

目录

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 7

我党真敢打“大老虎”么？ 17

我看“中国之路” 20

浅谈中国的生态危机 31

胡温“集体接班”之际寄语 36

常识治国与口号治国 40

浅探“骂共成名现象” 44

勇作“专制制度的辩护士” 50

社会进步是怎样发生的？ 57

另类“草船借箭”——向国内异议人士进言 62

争作布衣“帝王师” 65

我看“宝马”杀人案 73

共军健康力量浮出水面？ 76

香港：不该收回的“失乐园” 81

再就香港问题说两句 87

中共当然能“养”好香港 90

纵有医国手，难回欲堕天——门外汉胡说中国经济症结何在 93

中国有法西斯化危险么？ 100

法西斯：共产主义的下一站 103

中共政府是什么样的“父亲”？——也谈全民和解 109

李外长的“国际土相” 113

难产的“国教” 116

“两个中国”的难题 121

与某网友谈中国的民主化和土改问题 126

从“民可使由之”说到现代愚民之道 128

司法独立：中共最低限度的政改——兼论胡温新政必然无所作为 132

逐步回到“解放”前就是改革的努力方向 136

言论自由之陷阱 141
“和平恶变”的倾向似难抑止 147
中国少的正是“刁民” 153
改革的最大难题是“泰山屠龙” 157
难盗草，补天缺——一个“拥共派”的烦恼 164
中共一时不会垮台 ——王力雄先生在等待什么之一 168
除了中共，人民别无选择——王力雄先生在等待什么之二 174
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机会——王力雄先生在等待什么之三 180
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几句外行话 185
胡温，早该这么干了 188
谁来指定第五代核心？——以“点菜律”预测中国未来 191
胡温，屠民并非治国之道 195
从加拿大华人惨死说到网人的民主痴梦 201
我知道的一个“成功者” 207
劝同志们千万莫拿美国跟中国比 209
大陆为何不能香港化？ 212
对汕尾惨案引起的海川风暴之再思考与自我批评 215
终于明白了杨小凯先生 221
一个反革命分子的个人烦恼——答老贾网友 225
“刁民”论 232
龙应台女士的“中国瓶子” 237
给小马哥传授点共产主义 A B C 241
“道德政治观”可以休矣——我看丁子霖教授与高智晟律师之争 245
评摩登帝师温铁军的安邦定国策 252
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 258
就中共“气数”问题答网友 284
是我党高明，还是歌颂者愚昧？ 291
“东亚病夫”正解 298
陈良宇·司法的被动性·强奸与诱奸 307
中国“双城记” 312

写在秋叶飘零之际 317
中国有必要引入社会主义运动 321
听国内网友谈国情 337
未来中国社会走向预测 351
十七大加深了无边的绝望 373
真实的黄祸——也谈中国对世界的污染 376
现代中共乃是史无前例的资本家的强走狗 385
可笑的“三个包子”理论 387
“逆向货币战争” 390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398
我看“潜规则”与“血酬律” 401
“霸道乐土”就是咱们的“太平盛世” 408
中国特色——一个庞大的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 419
古今官僚社会异同 424
中共治下无冤案——陈良宇案判决有感 427
小议“软实力” 430
瓮安事件引出的一点绝望感想 435
中国还有改良的可能么？ 439
“俯卧撑”、“自杀”与天津教案 444
杨佳成为草根英雄本身就是悲剧 448
崩溃即将到来？——读《大裂变来了》 452
也谈所谓“举国体制”的利弊 464
赵紫阳提出的难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469
中国还是有希望的——致国内网友 473
悲观乐观，见仁见智 496
中国的事，未便以西方常理度之 508
浅析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以及国人的性格优势 513
土改：为众多“知识分子”笃信至今的弱智神话 517
国人最没本事弄明白的几个基本概念 533

中国宪法不过是个劣等智力笑话——驳《〈零八宪章〉是在呼吁修宪还是制宪？》 540
《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545
难题在于“放下你的刀子” 551
明年可能是个骚乱年 556
当前的政改目标是化国家为“有规矩的土匪山寨” 562
再谈恶法强过无法 568
含泪请求胡温走出恐惧 573
含泪请求胡温约束部下，停止出乖露丑 582
西方已经丧失对国人的吸引力 589
国人眼下能指望的最佳制度 596
专制制度至今仍是中国的最适制度么？ 604
权贵资本主义的建构原理与持续运作前提 611
也谈我党政改的压力与动力 616
通钢事件发送的可怕信号：只有暴力才能迫使官府屈服 622
海外遥望家国剧变 627
关于未来中国走向的一点再思考 646
试论中国对文明世界的挑战 662
“低人权”到底是不是优势？ 672
从谷歌事件看文明世界日薄西山 677
东风压倒西风有无可能 682
只有中国能够救野蛮资本主义 694
含泪请求中国政府停止侮辱中国护照 701
“负责任的大国”政府缘何效法绑匪？ 705
我党的面子与冯正虎先生的撤退战略 708
刘晓波的悲剧 713
韩峰日记与雷锋日记 719
我看人民币升值 721
中国缺的正是“唱衰” 725
“洋共”与开明专制 732

中央必须对学阀们实行问责制 736

方舟子打假与王维洛打假 741

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

破题

我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第一次读到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关于“费厄泼赖”，依稀记得注解中说那是西方体育竞技的术语，即要光明正大地比赛的意思。这样的解释，自然是让人处在模模糊糊、似懂非懂的幽明两界之间。等到后来出了国，日日操蛮音胡语，某日忽然顿悟：哦，那原来是“fair play”的音译。

受此发现鼓舞，我又致力于攻克下一个难关，想考证出“恶毒妇”是怎么回事来。《肥皂》上有个洋学生以此话骂主角四铭，四铭不懂，回家逼令也上洋学堂的儿子去字典上的“坏话类”里去查。大概因为他家的英汉字典不全，忘了列出该类，不但儿子到最后没能查出，连作者到最后都没交代，成了悬案一桩。我冥思苦索月余不得其解，一日在饭桌上谈起，犬子却不费吹灰之力，一口道破：“该不是‘What a fool ！’（傻瓜！）吧？”

因这番周折，由不得就要怨林语堂老先生当初何不意译“费厄泼赖”，害得无知如我辈在暗中摸索数十年。可是又想，译作什么呢？“公平游戏”？读者不会就此将林老错当成幼儿教育专家吧？“公平交易”？“公平社会”？一个比一个更远离原意。说到底，咱们本来从没这种东西，“儒者之争，素在名实”，实之不存，名将焉附？“费厄泼赖”本是人家西方世界的立国原则。与其错译如此重大的概念，误导人民，不如像“恶毒妇”似的使四铭辈无头脑可摸，哪怕让读者理解成“撒泼耍赖”，大概也要比“革你的命，共你的产”强。

话虽如此，为不懂鬼话的同胞计，老芦还是根据本人在西方混世界的体会，勉力将其译成人话，道是“公平规则”，或曰“玩的就是公平”。此处务请看官注意：公平的不是结果，而是规则，而这似乎正是东西方“费厄”观的不同处。

两种“费厄”观

鬼话的“费厄”，似乎并不等于人话的“公平”，至少没有后者那种“均匀”、“平等”的强烈暗示。这或许就是咱们难以接受“公平审判”的原因之一。在咱们看来，杀人犯跟苦主还有什么平等可言？既然对罪犯和受害人要一视同仁，还审他干什么？审判本来就是谴责和报复的意思，如同咱们声讨日本战犯一样。难道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和“慰安妇”以及充作细菌战实验的活体“原木”一般平等？过去他们杀咱们不讲公平，现在咱们报复为什么要讲公平？对坏人讲公平，就是对好人犯罪。难道我们竟然要以这种“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语）来作为社会基础？这大概就是鲁迅那篇著名文章的中心意思。它反映了鲁迅那个“伟大的思想家”对西方文明极度缺乏认知，就连“费厄”到底是何意思，重要意义何在，他老夫子恐怕也没有真正理解。

遗憾的是没有多少人看穿这一点。林思云君在《中国人的三大劣根性》中说中国人没有公平心，我看了只觉大谬不然。谁说咱中国人没有公平心？世上有哪个别的民族比咱们还讲公平？从圣贤到绿林豪杰，从圣人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井田制、“不患寡而患不均”、“损有余以补不足”，到陈涉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王小波的“等贵贱，均贫富”，到太平天国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直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八级工资制……咱们大砍大杀两千年，为的不就是个公平？

可惜事与愿违，越是要公平就越是“走向反面”，使社会越发不公平。咱们苦苦追求公平的结果，是除了造出无数的社会弊病来外，更使得“公平心”变成了“嫉妒心”。“我穷不要紧，但你决不能比我富”，我穷你富你就有罪，就该杀该抢。这种“公平心”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空前普及，构成了启动下一轮大砍大杀的民间伦理基础。

为什么咱们千方百计地追求西施，到手的却总是无盐，而且一个比一个更让人魂飞天外呢？这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咱们的手段错了。先贤们实现公平的途径似乎只有两条，要么劝说统治者节用爱民，被统治者安贫乐道，要么轮起李逵的板斧排头砍将去，杀富济贫，开仓放粮，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

肉，如神仙般快活。从来就没有人想过要在“规则”上打主意。说来可怜，讲究人与人、人与家族社会的关系似乎是咱们圣贤之道的精髓，然而人性到底是什么东西，除了荀子那个例外，老祖宗们却连边都没摸着。

其实，上帝自己就不是公平的，因为人生来就不平等。由于天赋（包括智力、体力、意志、性格等等）的不同，人们在自然竞争中显出优劣就是必然的。就算是我们造出了一个大同世界，只要听任它自然发展下去，不上二十年就要富者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自私是一切物种的“原罪”，不平等是我们的天赋。无论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还是黑旋风那水泼不入的抡圆了的板斧，都无助于我们建立理想社会。相反，因为我们一直在逆天行事，于是就只能要么制造出个伪君子之邦，要么在砍下无数脑袋后却导演出了一场“比慢”的赛跑，其中飞毛腿们有本事跑得比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还慢。

西方夷鬼却首先承认和尊重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承认和尊重人的自私“原罪”，在这个基础上再设计个力求公正的游戏规则。这规则就是承认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应该享有同等机会，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就是“机会均等”的原则。对于飞毛腿们，他们不是或用板斧取其首级，或以钢刀穿了人家的琵琶骨再点了软麻穴，使之行若摇花摆柳，而是课以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再用这些收入去补贴跑得慢的人。换言之，人家是用和平的有规则的“劫富济贫”去代替咱们的大砍大杀。

当然，如果“劫”少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就要出社会问题；如果“劫”得猛了，又可能出现“比慢”现象。为此又设计出个两党制，一党是“劫”派的社会主义好汉，一党是“反劫”派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两党如同恒温箱里的加热和散热装置一般轮流工作，使得“劫度”大体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这种设计造出来的当然不是理想社会，然而因为人性本身就不是完美的，在我看来它算是人类所能想出来的最合理的名堂了。该设计的精髓，是它在理论上承认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同等权利、有相同的机会去追求幸福，但这种追求应严格遵照社会共同接受的同一规则去进行。因为规则只有一个，这就保障了社会成员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使其得以各尽所长地“费厄泼赖”，在公正的前提下尽情表演自己。

以此角度来看咱们的“初阶”，便立刻可以看出咱们今天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费厄泼赖”。社会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并不是经济繁荣的必然副产品，它们是缺乏公正的游戏规则制造出来的。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玩的就是犯规，于是速成致富的最佳途径永远是胡作非为、“劫贫致富”：有权者以权谋私，将国家资源、生产资料、银行贷款化作私产卷逃国外；无权者钻营贿赂，在国库的盛宴中分一杯羹；没路子的人卖假药、造假货、售瘟猪、倒死鸡；再等而下之的就行骗绑架、杀人越货无所不为。“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万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三等公民大盖帽，吃完被告吃原告…“的民谣，就是对这种八仙过海、各自骗财的病态社会的逼真描述。

更可怕的是这种病态是一种“正反馈”的恶性循环，不是靠杀贪官或“严打”可以解决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胡作非为带来的巨额利润对社会成员的感召力非人力可以抗拒。朱元璋“官法如炉”，将贪官剥皮实草，但明朝照样抵挡不住那汹涌而来的“历史潮流”，变成了历史上最烂的王朝。所以，咱们如果要治这祖传“国症”，便只有从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实行严格的法治，把“权”和“钱”彻底分开，党和政府逐渐地全面退出社会经济生活，并定出明确而公正的发财规则来，由独立的舆论界和司法系统代表全社会监督，让社会各阶层都一体凛遵。只有从官场到民间根据同一规则玩把戏，我们这个害了重病的社会才有治愈的希望。

实行社会经济上的“费厄泼赖”不仅为救国的最起码的措施，而且也是保权救党的唯一希望，因为它除了要求统治者放弃发横财的权力之外，并不要求他们放弃统治权。统治者们必须看到，下一次“社会革命”已经逼近，而我们的人民已饱受从“均贫富”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各种祖传“公平”观的薰陶。极度不公的社会现实已使无数的陈胜吴广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再不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实行西方的“费厄”，他们迟早要起来“剥夺剥夺者”，而全民族又得再一次血肉横飞，玉石俱焚。

罪恶的“打落水狗”论

西方的“费厄”规则不仅实行于社会经济生活中，而且实行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诸如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各种声音都有发表的机会，等等。大概其中最不能为国人理解接受的，就是所谓“公平审判”。记得当年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被枪决，美国舆论界大哗，认为革命党无权剥夺他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这种喧嚣，连老芦这个崇拜西方民主法治的铁杆汉奸都觉得是书呆子气十足，痛感老美应该去接受一下我党的再教育——万一老齐逃脱了，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事了，他可不会来跟你讲什么人权。所以，如果说日本战犯也有权接受公平审判，在法庭证明其有罪前应视为无罪，恐怕没有哪个中国老百姓会同意。

鲁迅著名的“打落水狗”论就是基于咱们这国民性提出来的。它的要点是：第一，社会成员由“狗”和“人”组成，人和狗之间自然谈不上什么平等，彼此之间也只可能是被打和被咬的关系，没有什么温情脉脉的友谊在。第二，即使将“狗”打落了水，也要“从而痛打之”，如果听任“狗”爬上岸来，即使他不趁机咬你一口，最低限度也要抖你一身水。

这“理论”其实不过是一堆毫无证据的假设，其中隐含着无数问题：首先，是谁给了鲁迅这种类似上帝的权利，把人类分成“人”和“狗”两个不同物种？其次，就算可以如此分类，这划分的标准是什么？第三，为什么“人”“狗”之间就不能共存共荣，非要打、咬个你死我活不可？第四，为什么“狗”就一定不会跟“人”费厄泼赖？就算“狗”不讲费厄，为什么“人”就非得跟着“狗”一道，也不讲费厄？第五，为什么“狗”被打落水后不会就此魂飞胆落，乖乖上岸投降，死心塌地地作忠实走狗，而一定只会寻机报复？最后，这“打落水狗”也者，究竟是要打多久，打到什么程度，是打死为止，还是绵绵无尽地打下去，一直打到世界末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鲁迅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对待如此重大理论却完全是儿戏从事。除了以文学比喻手法描写一番“抖你一身水”，他唯一的“证明”就是举了一个革命党王金发“光复”后被杀的个例，就此导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说革命党人在成功后一定要坚决镇压反革命，不能跟他们“咸与维新”，否则后患无穷。在莽莽苍苍的森林中，他两眼却只盯着这么一片树叶子，浑忘了我大清是和平逊位的，而且清帝逊位之后非但没有“抖你一身水”，反倒先是被民国政府食言而肥、无耻地赖了签字画押同意供给的岁币，

后又被冯玉祥践踏“优待条件”，赶出宫去。就连慈禧老佛爷的陵寝都被孙殿英炸开，凤首都被刺刀割下来，更不必说“反正”后各地那些束手待人屠杀、抢劫、迫害、歧视的“旗营”里的旗人们。不讲费厄的不是落水的大清，恰恰是那些革命乱党。他们不但不讲费厄，直是毫无脸皮的土匪。冯玉祥占了故宫后将无数珍宝席卷一空，然后召开“记者招待会”，让卫队把衣服解开给记者看，证明他们确实是没拿宣统爷一针一线。鲁爷实在是老眼昏花，如此腾笑千古的丑剧，他老人家居然会看不见，满瞳仁尽是他的王老乡和秋英雌。没准他还会认为冯土匪是给他们报仇雪恨，痛打老溥那只落水狗呢。

除了这个“证明”，文中其他勉强可以算是说理的地方，只有一个反问句：你费厄，他不跟你费厄，岂不是愚蠢透顶地自讨苦吃？然而这只是“先发制人”的策略教唆，与逻辑论证毫无关系。所以，咱们伟大思想家的天才理论，本质上跟“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斩草不除根，春来又发生”的古老智慧也没有什么差别，两者都是毫无依据的断言。

作为文人，鲁迅当然没有义务写一篇点水不漏的杂文，正如留下谚语的老祖宗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有残忍恶毒的人才是大丈夫一样。荒唐的是，因为毛泽东“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个千疮百孔、莫名其妙的“理论”却变成了咱们长达三十年的暴政的法理基础。

毛和鲁“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是偶然的。列宁主义认为，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先建立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用政权的暴力去无情镇压一切敢于反抗革命政权的人。只有先不费厄，最终才能费厄，这个悖论就是所谓的辩证法，也就是鲁迅的“打落水狗”论的“哲学基础”。鲁迅的个人贡献，是他把这种胡说八道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比喻生动通俗地表述出来，格外强调了打的合理、凶狠和残暴，将打者与被打者的道义反差放大为“人”和“狗”的强烈对比，使施暴者加倍地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手下歹毒，心中泰然。

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但第一次在推翻旧政权后立即就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进行了系统的大屠杀，仅仅是为了所谓“巩固政权”的需要就活活打死或处决上百万“反革命”、“恶霸”与地主，而且在剥夺了“地富反坏右”的财产后还把这些人开除“人籍”，几十年如一日地当成落水狗来

打。世上竟然会有咱们这种宝贝国家将“打狗”制度化，让它变成公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打到后来，没有谁还记得、或是想得起来问一声：“咱们为什么要打他们？”大家只觉得那是如同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自然的事实，乃是万世不磨的天经地义，只知道棍棒齐下、“狗”毛横飞时，那洋溢在心中的巨大快感是任何官能的娱乐都无法取代的。甚至就连“狗”们也给打得糊里糊涂，死心塌地地认定：“天生我材必挨打，今天打完明又来”。“打狗”不但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成了一种典礼仪式。如同日本人饮茶的“茶道”似的，它成了咱们做人的“人道”，既是咱们做人的内容，又是体现忠诚、尊严、气节与胆量的礼仪。

整个事情荒唐而又自然到这种程度，以致“落水狗”们最终被恩准上岸时，竟不敢相信世上还会有给他们“摘帽”这种荒谬的事，而工农则无不愤愤不平。等到邓小平死时，海内外无论是亲共的还是反共的报刊上，竟无一人想得起他这桩最大的德政，好像那三十年的漫长打狗岁月真是为了国家的进步、民族的福祉而度过的，而纠正全民族的“打狗癖”并不需要超人的胆略与魄力。光是有这么一段至今无人引以为耻的“打狗”丑史，敝民族就是世上最丑陋的民族！

然而丑陋还不止此。鲁迅“打狗”论的必然结论是：棍棒就是费厄，谁手中有它，谁就是人，谁不听棍子的，谁就得变成狗，要被打落水“又从而痛打之”，连苦苦求饶都不行。于是，“打狗”论就成了指导咱们那无数次政治运动、党内外权力斗争的总纲，在中华大地上制造了数不清的惨绝人寰的冤狱。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费厄规则，“人”和“狗”，“革命”和“反革命”，“人民内部”和“人民外部”这些概念就变成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场”，能够在瞬息间发生“辩证转化”。除了已落水的“狗”们，所有的人似乎都是“人民”，但却又没有一个人算得上“人民”，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剑，它到底会不会掉下来，什么时候掉下来，就是用文王神课也算不出来。昨为打狗人，今成被打狗。忽焉白云，忽焉苍狗，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哪怕贵为政治局常委、钦定接班人也无从把握这弹性无穷的橡皮棍子的辩证法。一个八亿人的国家，除了一个人之外竟没有谁有一星半点安全感，这种凄惨卑微的人生方式实在是找不到语言来描述。

然而我们不觉得凄惨。虽然岸上的每个人都觉得棍子的天威难测，随时随地会无情地落在头上身上，但“人”和“狗”的巨大反差仍然足以抵消不安全感，使我们倍感身居岸上的荣幸。为了避免落水，我们便以疯狂打“狗”来证明自己的“人性”，这“人性的证明”不仅造成满塘死狗狼籍，而且彻底完成了全民族从人到狗的道德转化。

可悲的是，堕落了的民族看不到自己的低下。“打狗”论已经化作咱们的民族魂，成了咱们待人接物的做人准则，“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乃是咱们不假思索的本能反射。只要是无力报复、打之无碍的人，只要是不合咱们心意、批了逆鳞的东西，不管是法轮功、是陈水扁还是网上持与自己相反观点的人，咱们都毫不犹豫地斥之为狗，毫不踌躇地痛打之。无知者不惶惑，无德者最坦然。

就连这都还不是“打狗”论造的最大的孽。全民信奉“拜棍教”后，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和平政治改革乃至政权交替的可能。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们是靠打“狗”上去的，手中的大棒上“狗”血淋漓。因为深知“落水”后就是万劫不复，活在这世上他们最怕的事就是丢了手中的棍棒后被打下水去。于是，百姓只要流露出对大棍的丝毫不满或不敬，立即就要遭到杀一儆百的血腥报复。对八九年人民的和平抗议的疯狂镇压以及近年来对法轮功的无情整肃都是证明。当局的过度反应曾使国外的观察家们大惑不解，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互动只有“咬”和“打”的方式。像我大清和平退出政治舞台的那种黄金时代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立志医治国民性的偏激文人写出来的一篇小小杂文，竟会为一种邪恶理论推波助澜，不但帮着制造了空前的民族灾难，而且诱发了一种再过百年也难痊愈的民族顽症恶症。老鲁泉下有知，不知是否会愧疚无地？

神圣的规则，高尚的手段

为了保证费厄泼赖的实施，重要的不仅是建立一系列公正的规则，使之形成稳定的社会共识，更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尊重它们。在这个意义上，规则本身已经不再是手段，而成了一种实体、一种神圣不可违反的原则。

当年盟军在欧战临近结束时，曾讨论过如何处理擒获的纳粹战犯。丘吉尔主张不加审判将其立即正法，而罗斯福坚持按法律程序办事。结果老罗占了上风，纳粹战犯们都接受了公平审判，由国际第一流律师为战犯们作辩护，在法庭认定有罪以后才伏法。本来，在盟军占领西欧后，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已大白于天下，在战争那种非常情况下，不经审判立即枪决罪魁，似乎也对得住历史了。然而正义的理性终于压倒了复仇的冲动，使盟军的正义事业由此彪炳千秋，更使未来的新纳粹们无从翻案。仅凭这一点，老罗也就足以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人物。

尊重规则的睿智其实是一种常识（英文是“common sense”，似乎并不等于中文的“常识”）：如果因为对方不费厄，你就以此为借口，跟着对方不费厄，或是比对方还不费厄，那么你就默认了规则是由胜利者或有力者决定的。这个口子一开，规则便成了“任人强奸的老婊子”（拿破仑语）。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再找费厄，便只能“索我于枯鱼之肆”了。

因此，规则必须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为权势所扭曲的毫无弹性的实体。不管短期立法怎么变，“多数决定”、“无罪推定”这些基本原则是永远不可能变更的。一旦改变了或扭曲了“无罪推定”的根本原则，每个人的基本人权便迟早要荡然无存，活在这种社会中便再也没有起码的安全感可言，就连手持“打狗棍”的有权有势者们，也免不得日夜生活在对被压迫者们血腥报复的恐惧中。正是为此，哪怕对日本战犯或是齐奥塞斯库那样的人，我们都不能破了例，改变或扭曲“无罪推定”的神圣原则。如果法庭实在不能证明他们有罪，我们也别无选择，只能看着他们大摇大摆地步出法庭。“宁可错放一千，决不枉杀一人。”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再也没有比处死一个无辜者更沉重的代价了。

然而聪明才智天下无双的大中华民族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会犯新的错误——哪怕前面是那个咱们已经跳进去一万次、烧得焦头烂额后好不容易才爬出来的火坑，咱们也要义无反顾地再次奋勇跳下去。全民在泥塘里打滚三十年，约八分之一国民饱尝那根打狗棒的味道，流的血泪堪称“红雨随心翻作浪”了。然而咱们还愣是对那根大棒情有独钟，总是幻想着有朝一日将它夺下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们那种社会人文环境对智力桎梏的严密，实在是到了无从冲破的地步。

国际共运留给后人的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追求崇高的事业一定要遵循费厄泼赖的神圣原则，通过干净的手段来进行，否则这种事业就一定会蜕变为对崇高的低级嘲弄。历史记载了那些“替天行道”的大侠们一个个变成屠民暴君的丑史，历史更写下了甘地几十年如一日，坚忍卓绝地以“非暴力”的崇高手段去争取社会公平的圣迹。我想，任何一个稍知近代史的中国人，都应该从这两个极端的例子里得到启迪。

2000年9月8日

我党真敢打“大老虎”么？

网友老非的两篇反腐宏文写得非常好，我也来插上一嘴，想具体措施不是我的长处，所以这里只能从战略上瞎侃一番。

首先我觉得要澄清的一个误识是，国人常有一种所谓“综合法世界观”，换言之就是“毕其功于一役”，总是在寻找某个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术武器，所谓“抓主要矛盾”。过去那魔术武器是共产革命，如今的是民主。在某些人看来，一旦实现民主，一切问题立即自动解决。而不建立民主制度，就什么问题都没法解决，腐败问题就更不用说了。去年在《大家》我和王军涛讨论，就发现他也有这种思维定势，以为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几个东西是联接在一起的，互为对方存在的前提，缺一不可。

其实，在我看来，这几个玩意儿完全可以拆开。不民主的国家/地区的人民完全可以享有政治自由之外的各种自由，如香港和改革前的台湾。不民主的国家更可以是高度法治的国家，如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后来民主改革前的四小龙。而不但不民主，就连公民自由都有限的国家如新加坡也是法治国家。而只要是真正的法治国家，腐败便难以存身。所以，反腐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中国是否实行民主制度，而是取决于我党有无决心把中国真正变成法治国家。

明眼人都能看出，反腐是否成功，将决定中国是否再次堕入新一轮社会革命的浩劫。避免这一浩劫的发生，应该是国内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这一点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害是一致的。正如老非所说，我辈并非三忠于四无限，却也愿意为此保权救党。连我辈都拥护党的领导，为什么党就愣是要去悬梁自尽呢？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最高层的执政者应该能看到彻底清除腐败造成的社会不公是避免鱼死网破的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把中国变成法治国家。

为此目的，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停止“党大还是法大”之争的千年笑话，在国民心目中彻底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让人大橡皮图章变得比党、政都要硬，起码要实行“三权分

立”，即将党、政、人大分开，无论是党是政都无权直接干预、操纵人大的运作，以法律代替政策治国。

二、以二十年为完成期限，党、政逐步退出国家经济生活，从根本上杜绝经济领域里的不平等竞争。微观措施是拍卖国有企业，宏观措施是国家逐步放弃对资源和市场的占有。

三、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完全独立、不受党、政、人大控制的反贪检察委员会和反贪法庭。

四、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政治局常委及其直系亲属的贪污特权，反贪机构无权过问，以换取他们坚定的反腐决心。

五、开放媒体对贪污的举报，言论检查官不得干预记者有关的调查和报道活动。

六、以拍卖国有企业和资源获得的基金实行对下岗工人的社会救济。

以上诸条，我上次回国曾向某开明高官献策。该同志大摇脑袋，说行不通，我问为什么，答曰："你以为豁免政治局常委就行了么？他们的嫡系呢？"我这才悟出：咱们的"新"社会，比起过去的"封建"社会倒退了不知多少年。过去是君权神授，皇帝的统治是靠"天命"，不需要下头有什么权力基础，也不需要捏紧枪杆子，他想杀谁就杀谁，谁也反抗不得，谁会想到起来造反，把皇帝搞倒了，另立一个？如今可不是那样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坐稳龙廷，下面不安插一大堆铁杆弟兄还成？谁会去傻到挥泪斩马谡、自断左右臂？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最起码的措施。不玩真格的，有什么希望去根除腐败？所以，不是我党没有认识到腐败亡党的现实危险，是人家动弹不得，不敢来真格的。我党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没有一个毛那样的铁腕强人，能不顾下面的反对强行推行某种政策；第二，因为权势的强弱只是相对的、不稳定的动态平衡结果，於是便谁也不敢站出来奋不顾身地为党谋利，无论位置是高是低，这么做就等於在政治上自杀。为己牟利可以，为全党日后的命运操心不行。因此，对个人来说，还是在海外营造销金窟比较现实，万一哪天真的垮杆了，立刻便鸿飞冥冥，成了"飞党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在中国建立理想社会的程序应该是先建成法治国家，与此同时开展类似国民党的"训政"，普及民权教育，在法治国家建

得差不多的时候，按经济自由－迁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政治自由（前三项自由都是“旧”社会人民拥有的）的程序将自由逐渐还给人民。等到最后一条完成之日，也就是民主社会水到渠成之时。

当然，这不过是乌托之邦、阿托之品一类的迷幻剂，只能让我辈过过嘴瘾，于现实政治毫无助益。解开那个死结的“办法”，看来还是只有咱们拿手的造反杀人，几千年如一日地循环下去，不舍昼夜。这遭和以前不同的，是咱们如今有了两弹一星，这内战一打起来就是灭种的份。唉，“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读书人能做的，也就是长叹罢了。

2001 年 2 月 26 日

我看“中国之路”

上网让我最感震骇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觉悟低下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许多在西方长期生活的知识分子，竟然对西方的民主法治毫无认知。特别是那些所谓“民运人士”，其“专业知识”水平竟然与百年前的章士钊辈判若云泥。这种彻底的“民主外行”却把民主当成了自己的专业，立志“外行领导内行”，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当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红色幽默。

更令人无可奈何的是，他们不但不懂西方文明，就连对中国的基本国情都缺乏认识，对中国今日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的实质两眼一抹黑，却大无畏地效法我党在上世纪20年代办《向导》，出版什么《中国之路》电子杂志，以盲人之身奋勇出来给人民带路。

这种笑话看多了，免不得让我动念给这些新时代的伟大舵手们写个识字课本出来，先传授点文明常识，再告诉他们如今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个样子，此文便是为此而作。

与民主有关的一些起码常识

世人所谓“民主”，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只是狭义上的，指的是一种政体，也就是统治机构的某种组织和运作方式。它并不是一般人误以为的“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代表各个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权力精英们共同管理国家。它的优点是提供了一种分割财富的和平手段，从而使社会问题在恶化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前就得到及时解决，实现了真正的长治久安。因此，真正实行了民主的国家，一定能避免中国式的周期性的社会大幅度倒退和民族自杀。所以，民主确实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对症良药。

下面想澄清一些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法治（再度强调：不是中共发明出来的独特的“法制”，而是rule of law ）的概念。我说过，实行民主的硬件前提之一是实行有效的法

治。真正的民主社会必然是真正的法治社会。所谓法治，就是政府通过立法而不是个人意志来统治。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无论社会地位有多高，都不得超越法律。法治国家不一定是民主国家，新加坡和原来的香港就是现代例子。但真正成熟的民主国家必须是法治国家。在真正的民主国家中，议员们根据自己代表的选民的意愿提出各种法案，得到多数同意的提案便成了法律，交给政府去执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国家的运作其实是把大多数人的意志强加给少数人。因此，国家必须有强制实行成为立法的多数人意志的权力，而社会成员也得有明确的守法意识，才会在立法不利于己时仍然不折不扣地自觉执行之。只有在能做到这两点的法治国家中，民主制度才能正常地运转，不至于流为孙大炮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那种千古笑话。

第二个要澄清的问题是，根治腐败的有效手段其实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法治。民主制度的设计主要着眼于防止政治家们滥用权力，因此规定政府和议会必须定期由民众选出，并在民众监督下运作。但它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犯罪的功能。因此，如果一个社会不是民主的，但却实行了有效的法治，那它也能是廉洁的社会，一战前的日本、德国，现代的新加坡、香港等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民主社会没有实行严格的法治，那么便不能根除腐败，例如印度、俄国和台湾。许多人错误地以为民主可以防治腐败，是因为他们只看到西方现代民主国家的廉洁，却忘了这些国家同时又是法治国家。

实行法治社会的前提，首先当然是国家必须有完善的基本立法和强大的执法机构，其次是统治者和民众双方都有明确的守法意识。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契约，任何一方不守约，则契约便形同虚设。从这点上看，中国在这方面算得上是最落后的野蛮国家，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都丝毫没有守法的起码概念。

第三个要澄清的问题是，民主制度并不保证社会成员在各方面的平等。民主社会成员当然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人人都享受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为自己争夺利益时，每个人都有和别人一样多的发言权。但社会成员在经济上并不平等。在分割社会财富时，不同阶级所得的份额并不一样。资本家所得永远要远远高出工农大众，而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一般高过体力劳动者。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民主社会并不一定是高福利社会，反之亦然。同为民主国家的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就有极大差别，印度就更不用说了。即使

在高福利民主国家中，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远远落在民主制度的确立之后。举英国为例，该国早在17世纪便开始实行民主，但照样经历了19世纪的欧洲血腥资本主义阶段（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出笼的历史背景）。只是在社会富裕到一定程度之后，该国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才在20世纪初开始一步步建立起来，并于工党50年代执政期间达到顶点。反过来，不民主的国家也可以是高福利国家，例如前苏联和现在的新加坡。

第四个要澄清的问题是，实行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导致社会富裕。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政体，不是社会生产方式。因此，民主制度并不和资本主义必然挂钩。欧洲那些社会党（考茨基的徒子徒孙们）长期执政的国家，其国民经济中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成分，而印度只是在近年来才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一般人误以为民主能致富，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在社会到达极大富裕前都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其实，光靠实行民主制度并不能使社会富裕，印度和前苏联集团就是明证。

这里必须指出，这个错觉是普遍的，不光是中国人有，前苏联集团国家的人民也曾有过。其实，致富的唯一途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凡是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哪怕政体不民主，照样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起飞，如二战前的德国日本，战后的四小龙，以及如今的中国大陆。而没有实行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尚未成功的民主国家，如印度和前苏联集团国家，迄今都没有成功致富。

此中道理其实很简单：迄今人类采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只有资本主义最符合人类的自私天性，最能将人类贪得无厌的物质追求化为创造社会财富的健康动力，从而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这就是打着一切招牌的社会主义都要使社会生产停滞不前、失去生机的基本原因。方今之世，除了北韩或许还有个古巴，不仅没有哪个原共党国家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连北欧和西欧的高福利国家也在大幅度修改原来的政策，拍卖国营企业，削减社会福利预算，以保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所有这些都说明，只有走资，才会发家富国。因此，网人提出的“民主致富”论、“法治致富”论，其实都不能成立。

这里要顺便强调一下：资本主义虽能致富，但它同时也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匀。资本主义的精神是追求高效益，而高效益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水火不相容。为了追求高效益带来的高利润，资本主义的天然倾向是关闭亏损企业，提高已有员工的个人生产率，从而制造失业大军。

因此，既有资本主义，就难免有失业大军。既有失业大军，就必然有部分社会成员的贫穷。于是这便构成了一种社会难题：要搞平均主义，无论是实行社会主义或高福利，则社会迟早要丧失奋进的动力，使经济陷入不死不活状况，全国困在穷愁中出不来。但如果实行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富裕了，却又要制造出一群失业工人来。哪怕是福利国家的政府也只能发放点维持基本生活的救济金，不可能使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达到就业人员的标准，否则便不但打击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也会鼓励在员职工纷纷自动失业。这就是北欧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式的平等，只在于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但毫不保障社会成员收入的平等。相反，它与后者是格格不入的，其运作机制本身就决定了并依赖于社会成员收入不平等。如果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去强求社会成员收入平等，则资本主义立刻垮台，社会也就丧失了生机。因此，似乎可以说，资本主义是致富的唯一之路，但它与“均富”不兼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永远有贫富之分的社会。民主政府可做的，不是社会主义式的削足适履，而是在不挫伤资本家投资热情的前提下，去适当地劫富济贫，用抢来的钱建立所谓的福利社会。但要这么做，必须等到社会发展到相当富裕时才有可能，而这正是欧洲那些福利国家走过的路。如果在社会总财力许可之先，就去建立毛共式的平均主义社会，则社会势必把应该用于发展经济的有限资金花在救济贫民上，从而使国家永远无法脱贫。

最后一个要澄清的有关民主的问题是，民主制度不是一个终极目标，民主社会不是一个一旦建立起来就十全十美的理想社会。它本身是在不断完善之中。英国是世上最早的民主国家，但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工党执政后，人权观念才得到了空前普及。在此之前，社会上不但有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而且各阶级之间堪称等级森严。举个小小的例子：铁达尼失事后，死者如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则能风光地躺在棺材里运回国去；而下层社会的死者就只能屈身于帆布袋之中。这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竟然延续到了死后！美国也同样如此，姑不说南北战争之前，南方黑人根本就享受不到起码人权，哪怕就是60年代前，美国的人权状况也远远赶不上欧洲。如果没有60年代由帕克思引发、由马丁·路

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也不会轻易废除。凡是稍知美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美国的人权状况在现代获得了多大改善。

许多大陆人受毛共洗脑，在潜意识中把民主社会当成“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乐园。这不但在理论上是可笑的，在实践中也很可能引出灾难。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实现民主，这种由精英们传给民众的过高期待值必然导致普遍的深刻幻灭，从而使社会再度大幅度后退。

讲完了与民主有关的常识，接着得讲讲有关专制的常识。所谓专制，就是社会上一小撮统治者以剥夺人民的权利而获得巨大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从公民丧失自由的程度来看，可将专制社会粗分为“威权社会”（authoritarian）和“极权社会”（totalitarian）。前者包括旧式的专制制度，例如传统的中国社会实行的帝制以及后来的国府统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只剥夺人民选择政府的政治权利，但不剥夺公民的其他权利。因此，在这种旧式的专制政体下，人民仍然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社会可以和平长入资本主义。

当威权社会实行了资本主义后，社会也能照样变富。此时有两种情形：如果该国是法治国家，则社会比较廉洁，一般不存在因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而引起的社会危机。如果该国不是法治国家，则当权者纷纷利用手中权力疯狂掠取社会财富，使经济起飞的成果大部分落在统治者的手中。这种国家必然是贫富两极分化极度严重、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腐败国家。

上面说的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在极权政体下发生。所谓极权政体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极致，是人类最邪恶的发明。它有两种非常相似的组织方式：法西斯国家和共党国家。后者比前者更恶劣。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空前膨胀的国家权力，政府剥夺了公民的一切自由。法西斯国家还容许资本家存在，而共党国家把人民一切自由经济活动都禁止了。因此，在共党极权国家，不但人民彻底丧失了政治上的一切权利与自由，而且彻底丧失了经济自由。因为政府垄断了一切自然资源并能强力动员全国人口资源，这种国家可能在建立之初出现畸形的高经济增长，但终归因国民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奴隶经济（或曰劳改经济），它迟早要陷入不死不活的停滞状态之中。所以，一个共党极权国家非经脱胎换骨的重大改造，就不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也就不可能致富。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极权国家虽然实行平均主义，但治下的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与自由，因此远比威权国家反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上说，极权国家

的大独裁者通常残民自逞，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日成父子等辈都将自己的统治建立在撑天白骨之上，是有史以来最残暴、最昏庸的独夫民贼。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极权国家是走不通的死路，只会导致国困民穷。威权国家虽然比不上民主国家，但政治上远比极权国家开明，人民享有的自由是后者无法比拟的。而且，只要实行资本主义，便可能实现经济起飞，使国民经济获得极大发展。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从极权国家变成威权国家，无论统治阶级在此过程中变得何等腐败，总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

今日中国：进步与堕落共存，希望与危机同在

如果读者接受上述常识，则立刻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统治者从毛共变到邓共直到江共，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飞跃，从一个反动的极权国家进到了威权国家的“初阶”。虽然这种介于极权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的过渡政体，无论比起满清的帝制还是比起国府统治来都远远不如，但比起万恶的毛共时代来已经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了。

促进这种社会转型的始作俑者，是先总设计师邓小平。当然，他本人或许并无进行这种社会转型的主观愿望。改革的最初动机，无非是为僵化了的国民经济注入点资本主义的活力。但这链式反应一经启动便无法遏止。要搞“受控资本主义核实验”，政府就得为人民适当松绑，把无理剥夺的部分权利（主要是经济自由）还给人民。但极权国家一旦丧失对国民的全面控制，就再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极权国家了。

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华大地上蓓蕾初绽时，便引起了权贵们的垂涎。他们疯狂地把手中的权力化作资本，将自身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这当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但另一方面却也把权贵们捆死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既然能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更及时的暴利，则由他们主导的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这最终结果，就是促使统治者最后下定将资本主义道路走到底的决心，于是最初提出的“改革开放”口号便被注入了新内容。如今所谓“改革”，就是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改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所谓“开放”，就是去请外国资本家来中国搞资本主义建设。

根据国内消息，政府最近提出要在三年内实行“两个转换”，即“资产转换”和“身份转换”。前者是指将国有资产卖给私人；后者是将国企职工的身份转换为民企职工。在具体执行上，这两者可合在一起进行，即由国家估算某企业固定资产后，再由该企业员工买下。国家按职工的工龄，以每年给一月工资的方式一次性发给遣散费，再由职工用这笔钱认股，把企业买下来。从此无论是企业还是职工都与国家脱了干系，生死各凭天命。据说连上钢五厂那样具有十几万员工的大厂都这么拍卖了。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家，恐怕都要承认这是赤裸裸的私有化，是疯狂地、不计社会后果地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确，这就是在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实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反动的奴隶社会变成类似19世纪欧洲的血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这飞跃的时间跨度是惊人的。

走资是一把两面刃。一方面，它极大地焕发出了中国人民被压抑数千年的自由创业精神，使他们创造出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血腥和肮脏，从而造成了无比深重的全面的社会危机，使中国又一次来到了暴力革命的前夜。

这社会转型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病态的恶变。极权国家在向威权国家和平演变时，权钱转化似乎是必然现象。由于统治者原来控制了国家的一切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在实行私有化时就必然将它们化作私产，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引起民怨沸腾。由于国家是人治而非法治，这种恶变便得不到有效抑止，演成了弥漫全社会的腐败，造成了空前的道德沦丧。

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变化，这些变化按说应该是社会从反常变为正常的标志。例如资本家的收入远远超出工农大众，而知识分子的收入也高于普通工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现象大家已经见惯不惊，因为社会生产剩余价值是按付出的资本加劳动量来加以分割的，而知识分子的复杂劳动应该折算为倍加的工农的简单劳动。但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大部分中国民众看来却是反常的。

最严重的问题，还是解散毛共建立起来的社会大济贫院引起来的。前面已经说过，资本主义的精神就是追求高效率带来的高利润，因此，一切私有企业都必然雇佣尽可能少的职工，去实现尽可能大的利润。毛共却反其道而行之，追求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物价稳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张春桥

语）。企业无论大小，一律办得无限臃肿，人浮于事，因人设事，弄到设备陈旧、效益奇低，完全成了靠国家用行政手段强行撑持、强行运转的赘生物。这种无生命力的人造脓肿，在一旦投入市场经济后，便立刻形成慢性出血的溃疡，最后迫使国家不得不动外科手术切除，以免大面积慢性出血最终导致国家财政破产。

从纯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完全是合理的改革。但从社会效果上来看，政府这么干却是自掘坟墓。将大批工人抛向街头，不但使他们骤然丧失谋生手段，而且无理剥夺了他们应享的社会福利诸如医疗劳保与退休金，简直就是官逼民反。

上述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再加上深重的社会意识形态危机，便构成了全面的社会危机。毛酋对民族造下的最大的孽，是他把几乎每个公民都再教育成了一个潜在的陈胜吴广，绝大多数人都习惯了并缅怀着毛共式平均主义，以为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见不得世上有贫富之分，贵贱之别。这种痞子式洗脑，改铸了从中共老一代革命家起，到工农大众，一直到国内外那些所谓“民主派”的灵魂，成了他们仇恨现政权远远超过毛共的深层文化原因。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的现状中，既孕育着社会继续进步的巨大希望，又处处可见危象。社会又一次来到了新一轮人民革命的前夜。

两条“中国之路”

尽管国家又一次来到了风雨飘摇的险恶关头，依我看，全民族仍然有可能转危为安，避免社会革命的大难浩劫。只要真有决心，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们仍可能促使统治者把国家建成一个比较廉洁的法治国家，在此基础上再走南韩和台湾的道路，和平长入民主国家。

如前所述，腐败大蠹，是那些将国有资产化为私产的权贵。但国有资产总是有限的，总会被瓜分完毕。当完成生产资料全面私有化后，政治贵族便转化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只要国家从现在开始立法，并严格执行，实行严格法治，规定党从一切经济领域里退出，国家在实现私有化后再不干预经济事务，就有可能防止官僚资产阶级变成经济贵族，而使他们退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相同的竞

争起点上去。如果实现了这个改革，则社会也就从恶性走资变成了健康走资，相当于人民用钱赎买了中共官员的政治权力。

从纯粹理论的角度上来说，这样做不但是可行的，也同时符合统治者和人民双方的利益。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实行法治并不是实行民主，并不要求他们放弃政治权力，只是要求他们放弃发浑财的特权罢了。这些人本来已经个个捞到脑满肠肥，放弃进一步发财，却能换来自身被暴力革命推翻，应该说是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的。

当然，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没有压力，统治者一般不会自动放弃特权。我想，今后国内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点忧患意识，从高工资营造出来的安乐梦中惊起，意识到迫在眉睫的革命危机，领导人民向政府进行理性的、有节制的斗争，争取国家逐步实现以反腐为中心的法治。只要解决了这个中心问题，则恶性走资便能逐渐转为良性走资。当社会因走资而实现经济全面起飞后，蓬勃发展的经济就能为失业大军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使目前私有化出现的阵痛逐渐消退。等到国家富裕到相当程度后，再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应走的健康的发展之路。舍此不由，却去贸然进行所谓“民主革命”，则一定是取祸之道。就算它不招来共党疯狂的无情镇压，使手无寸铁的人民像六四那样蒙受惨痛牺牲，也只会断送中国人民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后换来的巨大社会进步，把时钟倒拨回毛时代去。

“民主革命”志士们和国内具有革命倾向的工农大众思想水准也差不多，他们的共同误区是：

第一，这些人其实都是骨子里的毛主义分子，他们的理想社会，其实是一个所谓由工农“当家”、实现了所谓“社会公正”的平均主义社会。国内的工农大众和国外“民主派精英”在这上面的唯一差别，只在于对理想社会的称谓不同而已。前者公开缅怀毛时代，而后者把他们的革命理想诡称为“民主社会”。

第二，从这个根本误识出发，“民主派”精英们看不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脱贫致富，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却以为只要实行了民主便能“纲举目张”。像他们的老前辈毛共分子那样，他们将国家振兴的希望寄托于再来一次人民革命，好造出个人间乐园来。

第三，从这个根本误识出发，他们最痛恨的是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却看不到那不但是社会转型必须付出的虽然不合理、但却是无可奈何的代价，更看不到许多为他们所痛恨的所谓“社会不公”的现象，诸如资本家和雇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脑体力劳动者收入的差距加大、失业大军的出现、社会福利的丧失等，其实是实行私有化的必然阵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共有的残酷。哪怕在今日中国实现了民主，如果要坚持发展资本主义，那么这些现象仍然会存在并不断出现。如欧洲经验所提示的，要等到国家富裕到一定程度，政府才有能力来适当劫富济贫，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而不管谁来当家，今日中国都还无此财力。

由于以上原因，这些人发动的新一轮革命，就必然是“反走资”的反动事业。驱使人民投身革命的原始动机是对统治者的痛恨、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经济收入上的平等要求。因此，这种革命如果成功了，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杀富济贫，“剥夺剥夺者”，实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不仅中共官僚资产阶级会被剥夺，就连新生民族资产阶级都有可能受到株连。而且，为了迎合民意，实现革命理想，新政府必然会实行一系列平均主义的政策。光靠“打土豪”是根本不足以为人民提供富裕而平等的新生活的，于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新政府不是中断私有化甚至恢复国有企业，再度用国家财力去扶持理应淘汰的亏损企业，就是将微薄的财力全部投入社会福利事业中，去养活巨大的失业大军。而要这样做，不但使国家丧失了本应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而且必然使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从而使政体向毛时代回归。因此，这种革命将不仅断送中国走资二十多年取得的成果，而且从根本上取消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使国家再度退回到黑暗时代去。

结语

无论古今中外，“平等”从来是人类为之迷恋不已的美丽理想，然而“辩证”的是，对这美好理想的追求却不断为人民招致大难。古代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下驱动的农民暴乱不必说，毛时代的“消除三大差别”更是让全社会蒙受了几乎是无法消除的深痛巨创。不幸的是，如今的“民主派”精英们仍然错把“平均”当“民主”，看不见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实行民主，而是完成

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竟然想用所谓“民主革命”来腰斩目前正在进行的弊病丛生、但走向大致正常的社会转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斗士们其实比营私自肥的中共独裁者还反动。

也许，只有在中华民族终于具有点起码的政治学常识，认识到fair并非equal，不平等其实是人类的天赋，而“所有的人生而平等”那个动人的口号，哪怕在理想状态下，也不过是指机会而不是指结果之后，才会真正成熟起来。那时中国人也就能像西方人那样，在尊重不平等的现实下，设计出一个力求平等的健康社会来。

2002年4月28日

浅谈中国的生态危机

著名作家郑义先生最近光临本网站，贴出了近作《中国之毁灭》的部分章节，披露了国内目前严重的生态危机，激起了关于中国生态环境的大辩论。我对这个问题没什么研究，只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常识出发讲点感觉。

双方争论的文章我没仔细看，模糊印象是，一如国人中常有的争论一样，双方似乎偏离了问题的核心实质，不必要地泛政治化了。反郑派要去从那书中寻找老郑的政治动机，而拥郑派似乎以生态问题作为一个讨伐我党的有力武器。因此便在“中国是否会毁灭”上作无聊纠缠。如此争论下去，便一万年也只能是口水战。

在我看来，问题的实质，根本不是老郑是否危言耸听，他的“中国正在毁灭”的断言是否有足够科学依据，而是他那书中说的是不是事实，中国是否存在严重威胁后代子孙生存的生态危机。如果存在的话，那这种危机到底是社会制度决定的，还是变成发达国家必付的代价。人民和政府对此危机是否有足够重视，又采取了什么对策。这些对策是否有效，是否足够。如果不够，又是什么原因，能否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解决，等等。

遗憾的是，似乎讨论者们关心的并不是这一系列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而是把兴趣放在了党派政治上。反驳郑方最有水平的文字似乎是秦戈先生写的。那文章我粗略看了一遍，记得中心意思是这么几条，第一，郑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该书是对广大生态战士的诬蔑，一笔抹煞了他们的成绩。第二，郑书指出的问题，是发展国家必然经历的过程，无论什么社会制度都如此。第三，这些问题政府和人民并不是不知道，一直在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如我当时在跟帖中指出的，这里的第一条实际是我党 57 年反右的文字狱功夫，应为 21 世纪的文明学者自觉唾弃。任何旁听过西方议会辩论的人都知道，“危言耸听”正是反对党赖以安身立命的衣钵。在他们口里，凡是执政党干出来的事，没有一件不是祸国殃民的。他们最爱用的词就是 complacency（虚骄自满），而这似乎是最有力的指控，倒很少听见执政党用“危言耸听”来指责对

方的。所以，秦先生这种泛政治化的反批评我觉得很不合适。好在他本人也表示接受了我的批评。

关于第二条，秦先生似乎只提出了论点，没有作足够论证。诚然，他列举了许多别的国家的生态问题，但那似乎只证明了大家犯了一个共同错误，并不能证明那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生态问题当然和政治制度有关。这点从东欧和西欧的比较上最能看出来。例如东德虽然在旧共党国家集团里是最发达的，但东西德统一后，政府还是把东德的工厂统统关了，因为它们都是造成生态灾难的祸根，紧接着又斥巨资治理环境，弄得西德纳税人怨声载道，说统一得不偿失。据美国《时代周刊》的相关文章，德国官员说，大概要花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把东德对生态的破坏修复还原。东西德本是一个国家，除了社会制度不同外，种族和文化传统完全同一，形成了绝佳的对照实验组，两德的生态环境判若天渊，凸显了社会制度对生态保护的决定性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通病，就是追求盲目高增长，为此不惜破坏资源和生态。

在我看来，公有制是万恶之源。因为工厂是国家开的，国家就决不会关闭那些造成重大污染的工厂，因为由此造成的失业问题必将形成政府的包袱。由于没有民意监督，政府通常也舍不得花钱去搞只有投入毫无产出的环保工程。这就是中国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底，中国的社会危机实在太深重。政府生怕人民造反，有点钱宁愿用在下岗救济上，决不会去花在环保那种“不急之务”上。从老邓开始，政府的施政思路一直是用高经济成长来向人民买静求安。统治者心知肚明：什么时候这种高成长停止了，政府的大限也就到了。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生态问题绝对不会被国家领导人当成“中心工作”。一言以蔽之，中国政府很像一个短期承包土地的个体农民，关心的是如何在承包期内最大限度地刮取地力，干的尽是杀鸡取蛋的短期行为，而不是去深谋远虑地作远线投资。

当然，这个问题说起来也很复杂，不能说得太绝对。例如过去政府利用公有制能无限动员人力资源的优点，在西北修建了防护林带。公社解散后，这种挖骊山墓式的大规模动用无偿劳役兴建公共工程的事似乎不可能重演了。相反，要防止的是个体农民如何去偷伐林木。又如 80 年代政府首次批准农民经营小矿，于是急于发财的农民便使用铁器时代的原始工具，在祖国大地上遍掘老

鼠洞，毁灭了无数资源，破坏了生态。当然，后一例其实也是公有制造成的灾难：如果全国土地都是私有的，又何来那场破坏资源的人民战争？

但即使生态灾难是现行社会制度造成的，那又怎么样？总不能为此就去发动暴力革命，以自杀的痛快方式来治疗慢性病吧？而且，如果说连废除公有制这种重大社会制度改革都可以在我党统治下和平完成，谁又能断言在共党统治下就不能解决生态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努力探索和平改良的有效药方，最大限度地去完善并实施立法。而要这样作，首先就需要知道问题在哪里。在这个意义上，老郑的大作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只嫌说得不够，绝无什么“危言耸听”一说。

秦先生的第三个意思，即生态问题中共不是心中无数，而且也作了大量工作，我觉得也不能成立，起码是一种 complacency（虚骄自满）。 他提到的三峡大坝问题最能说明这一点。记得他说，许多外国专家带着许多问题去质问中国当局，令他们吃惊的是，这些问题中国专家们早就想到了，云云。可惜，他没说想到了又怎么样，是否拿出了相应的对策，使那些问题不再是问题。我曾经多次在《华夏文摘》和别的杂志上看到某专家反对修建大坝的文章。那位先生一看就知道是个超越党派意识形态、忧国忧民的志士，一有机会就写文章，大声疾呼建坝的害处。他的文章在我这个外行看来非常有说服力，非常符合 common sense。但我迄未看见官方或非官方有谁出来把他的主要观点批倒批臭。别的不说，据我不完全的了解，大坝造成的移民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抢救被大水淹没的文物更是基本没进行。

其实，哪怕在飞机上看，看到的景观都是触目惊心的。北中国正在沙漠化，而珠江三角州有望在本世纪中叶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在沉沦。为了向人民买静求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正在率领全国人民猛吃子孙饭，痛使后代钱，有本事把中国的天空都变成了不阴不晴的“第三态”。

我曾回国多次，每次都路过北京，每次机场都大雾弥漫。在天上看着下面是阴天，下去后才发现其实不是，还是能看见太阳的。只是天空因严重污染是灰的。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建“国”50 周年。据说那次当局为了粉饰太平，事先把城郊的工厂统统关了，还使用人工降雨，这才人为制造出了短暂的丽日蓝

天。和我同机的一位国内外贸人员惊叹说，他在北京坐飞机无数次，从来没看见远处还有山脉，那还是第一次看见“远山的呼唤”，可见能见度之低。

每次从灰蒙蒙的不阴不晴的祖国返回到异国的丽日蓝天之下，我的心都要无比沉重。真不能理解那些能有我这种作第一手比较机会的海外华人为何还要指责老郑危言耸听。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确存在着极大的生态危机，而现在并未引起政府和人民的足够重视，光是郑书居然会引起如此反常的反响就是对这一点的生动证明。如果西方出这种书，绝对不会有人去研究作者不可告人的罪恶动机，也不会有人去用所谓逻辑推理（其实是“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证明我们有足够的权利自满自足。说起来真可气，不管是什么事，在中国文化圈里就决不会是就事论事的学术问题，一定要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反对者认为那是对执政党的恶攻，而拥护者实际上也把它当成一种政治攻击手段。如果说日本人是经济动物，则党文化哺育长大的中国人则是低等政治动物。真没治了。

更何况网友无剑先生给出的无情数字摆在那里。老郑提出的“生存空间”问题确实存在。不过，无剑先生提议收回俄罗斯抢去的大片土地，将过剩人口移民到那儿的壮丽设想，在我看来太过于想入非非。中国有什么能耐去收复丧失了 100 多年的土地？武力连人家的小脚趾都不如。各国的民族性不同，俄国民族的国民性是疯狂扩张，不来吃你就是上上大吉，岂会容许你去收复失地？而中国的民族性从来是窝里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甭管是谁执政，有哪个政府有这胆子去启外衅？所以，恕我直言，无剑先生做的是白日梦，而老郑为老江“出卖”144 万平方土地痛心疾首似乎也大可不必：您见到国际上有哪个国家收复过丧失时间如此之长、幅员如此广大的失土？关于这个问题，我倒是觉得曹长青发表在《大纪元》报上的有关文章有点道理：收复是不可能的，不签约承认既成事实，唯一的好处就只是一种“我们原来很阔”的心理安慰，如同买股套牢的人仍未觉得破产一样。老江应该干而未干的，是应利用俄国内外交困之良机，通过抢占“不平等条约”的道义制高点来换取对方在商务之类上的让步。

不管怎样，无情的现实摆在那儿：中国的人口，马上就要逼近上限。而所谓“开拓生存空间”，已经被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上世纪的冒险证明是死路一条。中国现在的国力恐怕连纳粹德国当年都赶不上，民气、士气、国民智慧就

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咱们“炎黄子孙”属于草食动物类，没那能耐去抢人家的生存空间。在这点不服气、不认输不行。凡有点正常头脑的学者，最好还是别去诱导人民发那种春梦，把眼光收回来看看自己的脚下，努力想点办法来控制人口恶性爆炸，把家园治理成个像个人类居住的地方才是正经。如今的中国和西方比起来，宛如旧上海的华界和租界相比一样，前者乌烟瘴气，到处是污泥浊水、人畜粪便，后者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莫非这永恒的差别，也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不成？

2003 年 1 月 19 日

胡温“集体接班”之际寄语

中共十六大最近落幕，我觉得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必须说两句。

马悲鸣曾在《废除帝制八十周年祭》中首次指出共党统治的一大弊病：接班人危机。的确，自列宁死，这一直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政党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斯大林的竞争对手们（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宁等人），不是让内务人民委员部当作外国间谍毙了，就是让刺客的利斧劈开天灵盖（托洛茨基）。在斯大林治下，老布尔什特（bullshit）们不必说，哪怕是他本人提拔的新进也罢，谁只要稍微有点声望，立刻就要大祸临头，基洛夫、日丹诺夫都死得不明不白。就在死前，斯大林还在策划把他的死党心腹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辈一网打尽，为此先炮制出个庞大到无法操作的主席团（政治局）来，以冲淡两人的权力，后又策划了所谓“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将许多无辜的大夫打入天牢。幸亏他完全必要地、非常及时地死了，才没有兴起“基洛夫谋杀案”那样的大狱，造出新一轮三十年代那样的红色恐怖。

在这血腥传统上打入第一个楔子的是国际共运的第一个改革家赫鲁晓夫。他在击败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等人后，成功地把那“反党集团”开除出中央，但他对失败者们说：你们放心，这次再不会流血了，以前流的血已经够多了。这次我要给党树立个健康的全新榜样。就这样，“反党集团成员”们给下放到基层去当芝麻官，却保住了性命，而且家人没有受到株连。这一明智举动也救了赫本人。几年后，他被苏斯洛夫策划的政变推翻，也只是被迫“退休”，还能坐在别墅花园中的长椅上暗抛英雄泪（据小赫鲁晓夫回忆录）。

比起老大哥来，毛共那个流氓痞子集团有百倍过之而无一分不及。正如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指出的，毛泽东的特别恶毒之处，是他首先发明用暴民代替秘密警察来清洗政敌，从而把全国人民卷进了宫廷权力斗争中，在这过程里最大限度地败坏了国民道德，并给国计民生带来空前浩劫。

或许正因为这灾难的空前绝后，使邓小平这毛原来的心腹爱将在复出后改弦更张。他不但没有像毛那样层层清洗当初反对过他的人，宽大处理了华、汪、吴等竞争对手，而且提出了“集体接班”。诚然，他仍然是一个独裁者，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这不仅难免而且必要。如今咒骂他的人常常忘了：邓是元老中唯一的改革派，而且其改革意识超前于当时大多数人民。如果没有他的独裁，无论是华国锋还是老家伙们中随便哪一个当国，中国都决不会有今天的局面。邓的独裁当然伤害了激进改革者们如胡赵，但也压住了保守派的多次反扑。最主要的，还是他在中共内部首先实行了接班制度的改革，而由他推动的一系列政经改革改变了中国现状，才使得今天这种和平过渡权力有了实现的可能。

毋庸讳言，这种权力移交仍然是帝王式的私相授受天下。但国外论者们常犯的一个毛病，是用西方的现状跟中国比，因而觉得中国的现实非常不合理，却忘了改革只能是渐进平缓的，五十步总要强过百步，想一蹴而就，只能事与愿违。现在中共的改革幅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的苏共。老修最后只做到和平夺权，还没做到年满退休这一条。我记得勃列日涅夫死后，先后继任的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都已行将就木，上任没几天就咽了气，权杖这才落在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手中。如今江主席歌照唱、舞照跳就把位子传给大阿哥，这在国际共运史上还真是第一次。

这其实也不是江总的伟大。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独裁者们生命不息、权杖不放的原因早已由敬爱的林副统帅指出了：“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放权不但等于放钱，而且常常等于送命。因此，他们当然要干到至死方休。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得作到以下几点：第一，相当程度的权力分散，使得独裁者无法形成忠于他本人的一统天下，而反对独裁者恋栈不去的人不至于遭到血腥整肃；第二，建立具有相当效力的法律和制度，使得反对独裁者恋栈的人有充足的理由；第三，独裁者能平安引退，不至于因放弃权力而遭杀身大祸。

明眼人立刻就可以看出，如今的中国已经初步做到了这三条，因此，江就是不想退也不行，他根本就没有毛、邓曾经拥有过的私人武装（包括党政军在内），而改革开放已经极大地消解了中央的权威，导致地方势力的坐大，造成党内外现代意识的空前普及。在这种情况下，江不但不是毛那样的独裁者，甚至也不是邓那样的独裁者，充其量只能算个第一小提琴手。如果他坚持赖下

来，起码过去被他逼退的乔石派就要发难，很可能引起党的分裂。无论论实力、论声望、论胆略，他都没有那个能耐像毛、邓那样压住阵脚，搞不好甚至会身败名裂。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明智的选择是高姿态体面退休，以此换取青史留名，此所谓明哲保身是也。

这件事的表面意义，我想大多数客观公允的人都能看到。深层的意义则绝不止于单纯的废除干部终身制。这里最重要的一条，我想，是这一事件显示了和平演变的成功希望。人们常说：形势比人强。而中共已经和正在推行的改革，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造出了一种对民主化有利而对独裁制度不利的社会现实。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其实是自己的掘墓人，社会上每时每刻在发生的微小变化，都在"润物细无声"地冲蚀极权政体的社会基础，造出一种独裁者越来越难以左右的局面来。照这样演变下去，中国在一个世纪后，或许会有真正和国际文明接轨的那一天。

当然，希望里也孕育着严重的危机。如我在《我看"中国之路"》中指出的，中共目前的改革，其实质是走资，大体指向是合理的，不幸却非常不健康。这种恶性走资，已经并正在激化社会危机，引起广大工农不满。目前国家尚能太平无事，全靠党在六四后吸取教训，以重金收买了知识分子，使心怀怨恨的工农蛇无头不行。但经济成长到一定程度总会停滞不前，此时便是国家多事之时。因此，新一代中共领导班子的第一个历史使命，就是迅速建立完善法治，理顺生产关系，重手打击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使他们退回到与民族资产平等的竞争起点上去。与此同时还必须建立健全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险系统，解决贫困线下的工农的生活问题，逐步化恶性走资为良性走资，为一个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初步搭起框架。

新班子的第二个历史使命，是将中国基本转化为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法治国家。这不仅是反贪成功的唯一保证，而且是新中央不被军界强人颠覆的前提。在这方面，新班子应下大力气整顿军队制度，迅速实现军队的国家化，把党军改造为国军，严禁军人介入政治、妄言国事，并限制军人进入政治局，将那只具有古代军阀的深厚传统的大杂烩军队逐渐改造为文明世界那种单纯的职业作战队伍。

新班子的第三个历史使命，是彻底扔掉历史包袱，和一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决裂。他们必须看到，再打着共党的招牌，无论是在国际国内都有百害无一

利。在国际上，因为背负着那个名不副实的“共产恶魔”的名声，中国险些成了以共产主义为天敌的美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如果不是中东的回回们出来搞上这么一下，中国在老大哥易帜之后肯定要作了“邪恶轴心”。虽然幸亏回回们救了咱们的命，尽管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在国际反恐中的现实作用，但在普通美国人民心目中，中国还是那个类似前苏联的恶魔。这已经成了改善中美关系、乃至顺利解决台湾问题的严重障碍。时至今日，实在没有理由再维持这个毫无道理的人为障碍。从国内来说，再打着马列毛的破旗，不仅使走资永远名不正言不顺，只能以偷情的方式暗渡陈仓，不必要地束缚了政府的手脚，而且造成了人民的思想混乱，更使得形形色色的原教旨左派有了造反或捣乱的借口。如今人民已经普遍适应了社会转型的巨大变化，接受了资本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现实。如果将党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根本就不会引起任何骚动。

伟大领袖列宁同志教导我们：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展望今日中国，情况正是如此，只是还需加上一句，暗礁到处存在。盼新班子好自为之，完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领导人民建起中国第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来。

2002年11月16日

常识治国与口号治国

几年前，郑义先生在某部纪念毛的电视文献片中出场，慢条斯理地对着镜头说道："毛泽东是中国的千古罪人，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对此我当然完全同意，只是不知道老郑是否意识到，毛留在身后的最大的遗产，是让四十岁以上的大多数中、老帮菜成了小毛泽东，而这就是他对民族作的最大的孽。毛的尸臭至今洋溢在这个论坛上。要从人民头脑中彻底荡涤清除这罪恶污染，大概非一个世纪莫办。说起来，眼下这为名门正派的"清流"们深恶痛绝的"犬儒主义"，没准还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独门解药。

如朱学勤先生指出的，毛的理想国和柏拉图的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由哲学家出任国王。他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皇帝，居然要求八亿人民都去学所谓"哲学"，变成所谓"哲学家"、"批判家"。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皇帝，不断要求人民去"学习理论"（著名的"三项指示"的第一项），甚至为此在工厂设立了"工人业余理论小组"，让小芦很占了点便宜，利用上班时间躺在床上"攻读马列"。

这本来也是国际共运不成文的规矩：从马克思起，共党魁首必须由理论家出任。为此，斯大林和老毛都在击败政敌后恶补了一番理论。这个传统为中共继承并发扬光大之后，便形成了最荒谬不过的一种现象：一个最没有理性思维能力、历史上从未出过能与欧洲文化巨人比肩的思想家、迄今为止从未发明过任何具有世界影响的主义学说的民族，变成了如今世上最重视理论的民族，而且无论朝野都害上了"理论偏执狂"。不但毫无文化的政客老邓居然有了什么"邓小平理论"，而且连民运魁首胡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也竟然成了什么"理论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阐明了"伪善也是善"的光辉真理。整个事情荒唐到这个地步，以致老郑答我的帖时帮高寒说话，竟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深湛"当成了该同志的优秀品质之一！

我实在不明白：精通屠龙之技算是什么本领？我在《邪教的理想》中指出，所谓理想，必须具有现实可行性，否则就是梦想，跟八九岁的小芦立志变成孙大圣毫无二致。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毫无现实可行性的梦想。精通它那

些繁杂精深的理论，与精通“龙的解剖学”、“龙的生理学”、“龙的病理学”一模一样，于国于民于己究竟有什么好处？ （说明，这里的龙可不是自然界真的有过的恐龙，而是只存在于神话的中国龙。）

可悲的是，愚昧的中国人中，似乎没有多少人问自己这个问题，并由此再上升到一般性的疑问上去：治国是否需要理论？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政治家是否必须同时是理论家？是什么样的理论家？

可惜热爱理论的人偏偏想不起来问这些问题。正因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这种惊天动地的愚昧，才导致了我们这种“理论偏执狂”。犹记当年看两《春》，不断地见到理论家们哀叹“改革没有理论”，那隐含的意思无非是：改革没有理论指导是它的致命缺陷，因为世上没理论指导的事业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我头一次看见这说法惊诧莫名，到后来看多了，便气得只会骂 TNND：中国人没先进的性生理理论指导，照样制造出世上最大的民族来。莫非得弄个女性生殖系统的解剖挂图挂在家里，老娘们才生得出孩子来？

然而不光是愚昧的知识分子，就连人民也吃这套。犹记 80 年代邓公的“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出台，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中共统治下，人民还是第一次听到统治者坦承该怎么办自己也没数，得靠脚踏实地的实验，由此引起的震骇与失望是难以描述的。酷爱完美高深理论的结果，是民族丧失了接受常识的能力，使得他们一听到大实话、大白话就本能地反感抵制。在这种国情下，高寒那种前朝遗老、泡在党文化酱缸里长大的“泡菜”，居然成了时髦的“民运”领袖，便再不是愚人节笑话了。

正是因为这种国情，老百姓才不会去比较一下理论治国与常识治国的区别。其实不管是论战略战术，论填词作诗，论精通史籍，还是论穿凿马列“理论”，老邓与老毛相比，无异于魁父之丘比太行。可老邓的长处，正在于他不懂理论却有足够的常识。同老毛不同，他干的不是“削足适履”，而是“削履适足”。当现实和理论矛盾之时，他不是像老毛那样，用主观意志去强迫改变客观现实来迁就理论，而是篡改理论去迎合现实。

而这正是理论家从政的危险所在。这些人一般都很固执，坚信自己相信的教条是真理，一定要利用执政的机会去大规模实验他们的理论。毛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实验就是最好证明。如果毛像刘邓那样，只是平庸政客，则这种闹剧悲剧就绝对不会在中国上演。

这种教训其实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一样。二战时英国空军司令海利斯坚信，轰炸平民集中的大城市而不是军事目标，是制造恐怖气氛，从而使纳粹德国屈服的唯一办法。为此他坚持轰炸大城市，甚至把建筑的易燃性作为筛选城市的标准，悍然使用烧夷弹轰炸汉堡、德累斯顿、乌尔兹堡等大城市，使大量无辜平民死伤、无数古建筑、文化遗产化为灰烬。只是在盟军在诺曼地登陆后，他屈服于盟军最高指挥部的压力，才不得已一度把轰炸目标改为炼油厂和运输线路，短期内便使德军因为缺乏燃料而瘫痪。可尽管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错了，他还是坚持他的理论，因为这已经成了一种个人投资，必须坚持到底。为此他一有机会又恢复了轰炸城市的战略，悍然犯下了轰炸德累斯顿、乌尔兹堡那种毫无军事意义的民事目标的战争罪行。

由此看来，无论中外，迷信理论必然导致政治家、军事家们干出削足适履的疯事蠢事来，而理论家们因为具有迷信理论、削足适履的天然倾向，实在不适于从政。

这还不是理论家当政的全部毛病。如果高寒那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屠龙理论家”上台，因为现实世界里没有那种神话中的怪兽，就算他不像老毛那样去全心全意地开展“全民造龙工程”，也绝对没有那个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去“削履适足”，这样剩下来的便只有无所事事、尸位素餐一条路。可惜天下从来没有承认自己不行的政治家，于是他便只能步老共的后尘，实行“口号治国”，也就是“根据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向全国人民发布一些大而无当、毫无可行性的口号。这在他的眼中，似乎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全部职能和责任。

其实高寒自到本坛来，干的一直就是这种对口专业活。我还记得他某篇大作的标题：“紧急行动起来，强力制止江泽民称帝！”这种玩意，怎么看怎么像老共的正宗货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任何稍有常识的成年人都能看出这些口号的大而无当。高领袖发布的那个庄严号召，命令式语句中隐含的主语大概是全国人民吧。可请问人民有什么能耐去“制止江泽民称帝”，而且还是“强力”，不是弱力也不是一般的力？如果人民有此强大能力，那中国岂不是成了民主国家？那您还嚷嚷什么呢？您见过有哪个民主国家元首称帝，又见过哪个民主国家的人民领袖发布庄严命令去指挥人民？如果您那“强力制止”说的其实是暴力革命，那么，难道因为江泽

民“称帝”这么件事，人民就得揭竿而起，以血肉之躯，赤手空拳地去和坦克装甲车榴弹炮加农炮火箭炮火焰喷射器光气氯气芥子气神经毒气武装直升飞机轰炸机中子弹较量？

仅此一端，恐怕就能说明这些“民运领袖”是什么侏罗纪公园里逸出来的怪兽，和现今这文明世界是何等的格格不入。他们的思想水平，甚至连六十年代初就写出了《伟大的空话》的共党分子邓拓都不如。说这些前朝遗老比江共还反动，一点都不是厚诬之词。他们急需的不是什么理论素养，而是文明世界的起码常识；急需的不是教育人民、号召人民、指挥人民，而是赶快利用生活在西方的优越条件，补上西方公民必备常识的最起码的第一课。

当然，这些毛共理论家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就像王司令绝不会承认当初介入杀俘并下令枪毙“火线临敌投降”者是错误的一样。可悲的不是这些人择恶而固执，可悲的是愚昧的人民最吃这一套。人民看不上“摸着石头过河”，却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心醉神迷。在这种特殊国情下，没准中国又会放弃刚刚开始的与文明世界接轨的常识治国，回到口号治国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去。要避免这种悲剧发生，独立知识分子们必须视扫荡党文化为己任，子子孙孙打下去，打不尽前朝遗老决不下战场。

2002 年 12 月 28 日

浅探“骂共成名现象”

70 年代初的地下读书活动中，我最契重的读友老扁时时对我发表心得感悟。一次他说：“真理使人害怕，所以决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必须包上糖衣。”我深以为然，牢牢记住了他这一深刻观察，几十年后上网，曾多次引用了这一非名人说出来的名言。其实这话还不完全，需要补充是：“真话使人难受甚至憎恶，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说大实话。”

这其实就是中国为何成了优伶之邦、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政治家们都成了人民的大秀星，也是老芦成了众矢之的的原因。只是要老芦讲假话作秀，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早在几年前我就讲过，上网写文章一个大子都挣不到，挣个虚名还一辈子不敢承认。既然无名无利还图什么？图个讲出众人不敢讲的大实话带来的巨大快感！在那谎言之邦活了 30 多年，早就憋下了一肚子真话，现在是把它们从牢狱中放出来的时候了。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说大实话的害处。最有趣的是老枭，他自称可作国家主席，可连政治家的最粗浅的入门功夫都不懂，那便是说假话作秀。当“民运”烂仔造谣诬蔑他是其组织中的一员时，他在辟谣时居然坦承自己害怕坐牢，说是给关起来后便再没法喝酒泡妞。活得如此本色如此不作假，还有什么指望作国家主席？不过这正是我喜欢这家伙的原因。

更让一众“良心”们觉得大煞风景的是，不久前这小子居然写出篇什么《恭喜刘荻，贺喜刘荻》来，说刘本是毫无过人才智见识的无名之辈，共党这么一抓，倒把她炒作了名噪海内外的大英雄，对此不虞之誉，应该祝贺才是。

此文一出，“良心”们顿时大哗。这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不但老枭吃不住劲，连吾家野徒也让那些“道德炮火”吓坏了，出来诡辩说，老枭那文其实是开玩笑，“左派”们何以如此缺乏幽默感？

我可看不出那是什么插科打诨。相反，我觉得老枭是一如既往地讲大实话。老实说，他准确地说出了我的感觉。那无非是陈述一种事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幸灾乐祸。中共在 21 世纪还实行野蛮的以言治罪当然应该强烈谴责，但这

不等于刘荻就真是什么伟大的哲人。从客观效应上来看，中共的胡作非为当然给刘及其家人带来的巨大苦难，但也无可否认地提高了她的知名度。至少这坛子的绝大多数网民在案发前就从未听说过此人，是不是？

“良心”们连这样一句大实话都消受不了，只配演那无穷无尽、不嫌肉麻的现代样板戏，每句台词都无比正确，也无比虚伪。做人做到这个地步，您说该有多可悲？

更让人鄙弃恶心的是“良心”们的双重标准。

其实，“民运王”王希哲先生说过比这恶劣一万倍的话。记得他说，杨建利被抓其实是大好事。杨是双博士，什么都不缺，不缺娇妻，不缺地位，缺的就是坐共党的牢这“第三个学位”。现在共党把他抓了起来，就像战国时代触龙说的那样，是为他提供雄厚的政治资本。为了确保杨获得这“第三个学位”，“民运王”还煞费苦心、深谋远虑地披露杨是台湾国民党员、接受台湾经费的绝密，以便坐实杨的“间谍”罪名，不至于被当局无罪开释。

这才是真正的幸灾乐祸，而且更是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然而当马悲鸣和随便两位网友理所应当地抨击这种丧尽天良的罪恶行径时，“良心们”却统统倒在了“民运王”那一边。您说，除了信奉“仇共”这“最高和唯一的道德原则”之外，这些人到底有什么信仰？配谈什么“道德”和“良心”？！

这其实不是我这篇文章想说的事。我想探索的还是老枭指出的那个现象，亦即“骂共成名”、“共虐成名”的奇怪现象是怎样发生的。

这似乎是个普遍规律。我第一次看到“民运王”的网上表演时，惊奇得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谁都看得出来，此人明明是个市井豪杰，何以浪得虚名一至于此，以致在 70 年代名满神州，如春雷动地，似闪电裂空？

光明领袖高寒先生又何尝不如此？此人在网上的成名绝技，便是“分身术”与“粗口秀”，这便是我为何称他为“粗口分身英豪”。他用“高寒”的固定笔名道貌岸然地说教，为无知愚民指示“中国之路”，转过来却使用不计其数的粗鄙化名，蒙面向战友放黑枪，尽情和普通网友打相打，开口闭口“老子”，在在露出市井豪杰本色来。

这些算是旧豪杰，新秀又何尝不如此？余杰的玩意我也看过几篇。作者有点驾驭文字的功夫，文章不乏可读性，可惜无一语不是前人说过的陈词滥调，丝毫没有自己独到见地，更别说刺激读者思索，为他人打开视野了。那玩意其

实和亦舒、琼瑶的烂言情小说也差不多。看时也觉得热闹花哨，放下后脑袋中空空如也，根本想不起来作者说了些什么。可就是这么一个黄口孺子，因为受了共党拿捏，便也就立刻能名噪海内外，甚至能到老美的名校讲演，凭什么？

这些人的共同点，便是名不副实，而那虚名正是拜我党迫害之赐。例如余杰，如果只靠自身学养，不沾国内异常政治的光，则恐怕他再修炼 30 年也没那资格跨入名校作讲演。又如王、高二位市井豪杰，如果不是共党把他们关过一阵子，如今上网来凭自家本事写文章，又会引得起谁的注意？

豪杰们对此其实也心知肚明，因此一有机会，就要“痛说革命家史”，忆苦思甜，卖弄他们当年如何苦度炼狱，如何惨遭毒刑，让一众滥情“良心”们哭到晕死。也正是看到这玩意奇货可居，“民运王”王希哲先生才会提出“第三个学位”的伟大理论来，真心实意地祝贺他的同志战友终于打中了六合彩，“士一登牢门，便身价百倍”。

这种反常现象，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在我看来，首先，它说明我党搞的那一套在文明世界之中是如何不得人心。天怒人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以致凡是敢骂我党的人都一无例外地成了英雄，被我党迫害的人就更是超级英雄了。一个执政党在国际社会中混到这步田地还不知悔悟，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

其次，这现象反映了天翻地覆的社会进步。老芦从毛时代过来，深知毛共是使用“民间羞辱法”的大师。无论你原来声望有多高，学养有多深湛，一旦批了他们的逆鳞，他们都能在弹指间让你灰飞烟灭，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随便哪个下作痞子都能在你脸上尽情咳吐。国学大师们如陈寅恪、俞平伯等人遭受的屈辱，是中共作下的大孽，也是全民族永久的耻辱。

曾几何时，这一套再也不灵了。如今他们不但没本事搞臭异议人士，反而不遗余力地“搞香”他们，以纳税人的民脂民膏，为这些人颁发“第三个学位”，为他们铺下通往海外名校的红地毯。

可笑的是现代中共还悟不出这一点来。所以老芦要在此再次如网人“平正”先生抨击的那样，再作一次“帝皇师”（其实是“帝王师”），或如愤中曹长青所言，当一回“谏士”。

我说朝廷的各位爷们，您们这种蠢法，几乎能赶上处江湖之远的现代毛共分子、所谓“民运”人士们那惊天动地的愚昧了。“以言治罪”当然有神效，

可惜那是毛时代的旧黄历。彼时人人入了共党邪教，自然任您们指鹿为马，说什么就是什么。

可惜那教义早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彻底破产了，于今整个华人世界中，只有高寒先生一人还信奉那些屁话，就连您们自己也不相信，这才千方百计暗渡陈仓走资，是不是？连自己都不信的屁话要强迫人家信，世上哪有这种好事？所以这才会干出这种以纳税人的金钱给异议人士颁发“第三个学位”的蠢事来。

这么干，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对外公关形象的损失就不用提了。诸位爷们完全是自行描足那“万恶共匪”的邪恶形象。当年老毛根本不在乎国际形象如何，是因为彼时中国玩的是“自力更生”，现在可不是这么回事了。国内的安定全靠政府以经济持续发展“买静求安”，而这经济已经捆死在国际金融机制之上。所以，从长远计，诸位完全是为区区小事，就蓄意跟自己过不去。

从内政上来说就更是这样了。上文已说过，30 年前倒确实是“毛主席反对谁我们就打倒谁”。领袖巨手一挥，指着某个倒霉蛋大喝一声：“打倒！”我们就举起森林般的手臂，雷鸣也似地应和：“打倒！！！”可惜好景不再，上文已经说过，您们已经彻底丧失了那种搞臭人的神功。不明此理还要死抱住过去那套，就完全成了一种“对自己的脚背放枪”的笑话。

因为惩罚只能搞香对方，于是便不但彻底丧失了威慑力，反而还成了某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刺激，不但绝无可能起到过去那种杀鸡训猴的作用，反倒刺激了无数效法者。这其中当然有大批仁人志士为道义所激，被您们的无理镇压激起了逆反精神，不断奋起抗暴，但也会诱导高、王那样没教养、没文化、没智力、没专长、没心肝的市井好汉，让他们看出这其实是为缺乏才能的人提供了一条轻易出名的终南捷径。这综合效果便是人为制造英雄，再用“英雄”的名声去鼓励刺激效法者。这种“市场经济”居然能在中国出现，只说明了朝廷爷们那惊天动地的愚昧。

其实如果诸位稍微懂点心理学，就会知道“心理价值规律”：一件东西越难得，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就越高。言论自由本身其实根本就不会给统治者带来危机。中国人之所以把它当成宝贝，完全是政府剥夺了它刺激出来的。西方公民人人享受言论自由，可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懒得去使用之，对政治毫无兴趣。在社交场合使大众生厌的妙诀，便是谈政治。老芦去荷兰讲学那次，积习

发作，跟东道主在席间大谈了一通政治，次日某主人便病倒了，其余的人趁机笑话我，说是我谈政治做翻了他。

所以，那危险完全是诸位因为没教育、少见识而自行幻想出来的。如果放开言论管制，我担保顶多也就只会有年把的网上骚乱，这以后大多数人便会天性发作，自然而然地厌弃政治，而这正是海外华人走过的路。诸位不妨到海外网上走一遭，最热闹的不是政治论坛而是中性论坛，就连色情论坛的生意都比政坛强。

老芦初到海外时，拿骂我党的《两春》杂志当宝贝，真正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后来见多了也就腻了烦了。其他人又何尝不会如此？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骂那一套，跟当年学《毛主席语录》又有何两样？久而久之就连活佛都没了耐心。大众的好奇心，完全是朝廷用愚蠢的镇压刺激出来的。

说了这么些，也不知道诸位是否有那智力看得懂，不过好在诸位比“民运”人士们有点教育，大概比他们强点吧。我的意思是：在 21 世纪还实行中世纪野蛮的“以言治罪”，不但在道义上是反动的，而且在功利上只会损害贵党的利益。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应该迅速废除才是。

对国内异议人士，我的劝告是：抨击执政党当然是公民的神圣权利，不过应该作得比较策略。更重要的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单纯的骂手，而是西方那样的“忠诚的反对派”，亦即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去抨击共党危害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与此同时拿出自己建设性的方案来。这其中特别要注意避免毛共的“斗争哲学”，不要把共党当成只能消灭打倒的阶级敌人，批评他们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改弦更张，而不是羞辱对方。只有这样，朝野双方才能逐渐消除彼此的猜疑恐惧心理，实现良性互动，中国也才会顺利地完成和平演变。

在这方面，我觉得国内独立知识分子王力雄、朱学勤已经作出了最光辉的榜样，而国外杨小凯先生则是海外独知的楷模。我对这些先生都极为心仪，深愿追随其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的独知。

对“良心”们，我的劝告是：诸位最好真的有点良心，从刘、杜案中吸取惨痛教训，不要再作这种坑人良心秀了。我早就说了一万遍，共党不会让尔等的喧嚣吓倒，乖乖把人放出来，只会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蛮干到底。难道诸位虚活这么大，竟然就没听到过“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大俗话？

诸位跟着那些不怀好意、专靠人血馒头活命的“民运”领袖起哄，完全是为奸人所用，为难友雪上加霜。那些人其实是中国的社会渣滓，上网是来演戏的，气壮如牛，胆小如鼠，前途就在唆使他人作英雄当烈士之上。真要请他们集体回国闯关救人，立刻就吓成泥塑木雕，战战兢兢地大气不敢出。这种种丑态，诸位难道还没看在眼中？

2003年11月9日

勇作“专制制度的辩护士”

不久前网上讨论鲁迅的功过，发言者无一字搔在痒处，其实我早就说过，鲁迅和那干左翼文人作的大孽，是将整整几代人变成了革命愤青。老芦不才，长恨不生于彼世，施展唇枪舌剑，将那夥左仔打得风流云散。就算我的刻薄恶毒比不上那老东西，至少我不像他那样丝毫不懂西方文明吧？

这当然是事后诸葛亮的“后见之明”。倘若老芦生于彼世，最大的可能还是变成老东西的战友，助纣为虐，等到“解放”了再让共党关起来，在痛悔中度过余生。

这可能性几乎就是必然性，因为咱们这个民族从来是“良心”发达，智力退化，所以老芦若生彼世，未受共党荼毒，就一定会受那老东西蛊惑。也正因为如此，老东西那毫无建设意义的叫骂挖苦不但当时有巨大市场价值，而且至今流毒无穷，仍然在制造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愤青、愤中、愤老，成了制造动乱的永恒温床。

比起来，胡适公毫未吃过共苦，却有那远见卓识，为后人树立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两人走上不同道路，当然与天资有关，但我觉得光这一事实就足证西方文明的优越：胡适公如果不留美，没见过合理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恐怕也不会高明到哪儿去。

中国人的耻辱，乃是整整几代人有眼如盲，愣把只配插在墙头防盗的碎玻璃当夜明珠，把夜明珠当猪尿脬，踩在脚下任意糟蹋。更大的耻辱，还是大多数人至今仍无那智力认识胡的真正价值。许多“精英”白出了一场国，至今一开口，还是那愤青底子。

此中原因很简单：愤青们当年拥鲁辱胡，是因为前者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兰博式的“革命战士”，骂出来的每句恶言毒语都帮他们泄了胸中怨毒，让他们倍感那人吃人的旧社会的不合理。

相比之下，胡适公没一句话不让人丧气。什么叫“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而这种专制制度辩护士在

国难当头之际还教人钻故纸堆，千方百计地把人民的愤怒从统治者那儿引开去，以此来维护专制统治，压制人民革命，助纣为虐，简直是可恨之极。对这种普遍情绪，小说《青春之歌》已经写得很具体了。

这就是鲁迅成功的秘密：他的文字作用于国人的肾上腺，胡适的则不幸作用于大脑。

鲁文抨击的万恶的旧社会当然是事实，但他只煽动你鄙视它、憎恶它、仇恨它，却从来不教你怎么改变它，因为他只到过日本，自己就没有一份理想社会蓝图。对于究竟该怎样改变那不合理的社会，老东西其实比蒙童还无知。除了冷嘲热骂，一旦语及具体改造方案，他便只能嘟囔出大而无当的屁话来，诸如“不管是什么天球河图，金童玉女，祖传膏丹，秘制丸散，只要拦在前进的路上，统统踏倒它！”（非原话）至于踏倒它后又怎么办，到底前进到哪里去，是不是全民手拉手往深渊里跳，那可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反正“青年导师”的称号已经稳稳地骗到了手，而稿费也因肾上腺决定的市场需求达到了最高值。

鲁迅看到的，胡适照样看见了。与鲁老东西不同的是，他在美国受过正宗科班教育，深谙现代文明真谛。但他并不像鲁迅那样热衷于作青年导师，靠廉价煽情牟取高额稿费，却语重心长地指出了“闹中华”的“五鬼”，并荜路蓝褛、点点滴滴、亲力亲为地参与改造中国，甚至在大厦将倾时参与维持行将崩溃的专制制度。

一提到这“专制制度”，绝大多数国人立刻如遇洪水猛兽。这也难怪：对肾上腺之邦的国民们，您还能指望什么？出奇的是，所谓“民运”人士那些现代毛共分子在网上搞毛共文化专制那一套，居然也就没人看得出来。在营救刘荻的义工内坛中，“民运人士”高寒先生居然把亲共网友随便内定为阶级敌人，把和“公认的专制制度辩护士”划不清界限当成了另一网人安魂曲的一大罪状！

这种毛共语言居然出自这些“民运”、“人权”“精英”之口，实在是网上最大的红色幽默。真“为专制制度辩护”又如何？难道那就是该枪毙的罪行？当年盟国为何不枪毙那些为纳粹辩护的名律师们？

“专制制度的辩护士＝专制君主”、“日本军国主义的辩护律师＝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以都是咱们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这就是“民主精英”的水平。真佩服这些人出来丢人现世的勇气。

别人不敢老芦敢。我在这里说白了，老芦就是要效法先贤，“为专制制度辩护”！

凡有点文明知识的人都知道，世人所谓“专制制度”，不过是个含混之极的统称，根据政府对权力的垄断程度，可以粗分为极权（totalitarian）制度和威权（authoritarian ）制度两大部类。共党和纳粹实行的是极权制度，特点是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与自由，将国民严密组织起来，对其生活的一切方面实行点水不漏的监视控制；而国民党政府和传统专制社会类似，只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包括政治言论自由），更对国民的私生活放任自流。

现今的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已经恢复到了“解放”前的状况，中国人民现在恢复了大部份被毛共无理剥夺的自由诸如经济自由和迁移自由，只有政治自由还未得到恢复，但共党对人民的组织、监控网已经基本崩溃了，“盲流”的大量出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不幸的是，人性有贱的一方面。在暗无天日的毛共社会里，人民个个心满意足。一旦社会进化到“准威权社会”后，人民反倒怨声载道了。

这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第一，毛社会是严密的“罐头社会”，国民给完全封闭在真空中，自以为三分之二人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幸福地生活在九天之上。如今对外开放打开了国人的眼界，谁都知道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过着穷日子。第二，过去别说公开指责政府，连得罪了单位领导都有把牢底坐穿的危险。在那红色恐怖之下，谁不是吓得大气不敢出，只有没口子歌颂圣恩的份？如今统治者对人民的控制极大地弱化了，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因而变得胆大了。这一点在方励之身上表现得最突出。请问毛时代那位“中国的萨哈洛夫”是否出来扮演过“中国的良心”？

人民的不满当然是应该的，虽然现时的“准威权社会”比起过去来已经是天翻地覆的进步，但比起现代民主社会来，这种社会当然很不合理。随着中国逐渐步入现代工商社会，特权阶级把政治特权转化为财富的“跑马圈地”现象更使得民怨沸腾。为使国民经济从斯大林的指令经济的连环套中解出来，使经

济获得起码生机，国家只能废除极不合理的终身雇佣制，造成不可避免的失业现象，而这一切自然都要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

但关键在于，这些变化虽然充满了病态，但大方向却是正确的，是在与文明世界接轨的路上走。更重要的是，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控制的极大弱化，为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完全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咱们完全可以以渐进平和的方式将中国改造为一个民主自由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

这其实也就是半个世纪前中国面临的局面。可恨的是，鲁老东西以及那批左派烂仔们只看见国府的专制腐败，看不到它的发展方向与潜力。在他们看来，改造社会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革命。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便是："只有砸烂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

中国人至今迷信这天字第一号的蠢话疯话胡话，似乎只能证明敝民族心智不全。我在论述暴力革命的一系列文章中说过无数次：要推翻一个专制政府，成功的前提是组织一个比它更专制百倍的革命党。如此制造出来的"新"社会就必然比"旧"社会专制一万倍，而这就正好就是中共革命成功后发生的事，也正是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在那些国家的事。

这种"新世界"一旦缔造出来，便再也没有和平改革的希望。大家只有干瞪眼，坐等老一辈革命家死绝死光，继任的专制君主们因为缺乏第一代铁血强人的铁腕，政权机器更因大幅度腐败而弱化，社会改革才会又现曙光。眼下的中国就正进入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可权欲薰心的"民主"野心家们又在妖言惑众，鼓吹仇共造反，想让中国人民吃三道苦，受三茬罪（"中华民国"是第一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乃第二道）！

一言以蔽之：只有在高度弱化的专制社会中才有和平改革的希望，以暴力革命建立的"新"社会绝对只会彻底堵死一切松动的可能，造成社会的大幅度倒退。在两害相权之时，真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只能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捍卫面临革命威胁的专制制度，正如胡适、傅斯年诸先贤作过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轻率实行民主便必然是贾祸之道。前者，洪哲胜老先生在网上忆苦思甜，大诉先总统蒋公、经国先生在台湾实行所谓"白色恐怖"之

苦。我看他最需要的是在毛统治的大陆接受几年的再教育。如果有了那么一段经历，他现在大概连做梦都要感谢蒋恩公。

老蒋败给共匪，我看一条主观原因就是不够心狠手辣。凡是粗知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40 年代中共最拿手的把戏就是“民主”。其时郭沫若、沈钧儒、李公朴、闻一多那些“老而不死是为贼”动不动就和青年上街游行示威，“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争自由。国府明知其后有共匪操纵，可就是一筹莫展。只要对方是和平示威，国府就决不敢开枪镇压，顶多只能派流氓捣乱。饶是如此，还经常弄得舆论哗然，声名扫地，南京“校场口事件”，几个老而不死是为贼挨了打，政府立刻就备受舆论抨击。只有在台湾二二八事件那种武装暴乱中，国军才开枪镇压了。那本是任何一个主权政府在那种场合下都会采取的非常行动。即使如此，幕后操纵的共匪谢雪红等人照样逃之夭夭。

正因为这样，老蒋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才把这宋襄之仁收了起来。倘若他不搞“白色恐怖”，早就让共特渗透到超饱和了。到时里应外合，老洪别说指望去美国吃热狗，就连能否上大学，还得看他的家庭出身以及本人的马屁功练得如何。

如今的中国当然不是蒋公那样的传统君子统治。共党捍卫政权的决心，已经在六四大屠杀和镇压法轮功中充分显示了。在目击这些惨剧后，高寒先生还在网上胡说什么中共会因“内外施压而屈服”，就完全是出于职业需要欺骗公众。

其实早在一年前，我就点穿了“暴力革命家”们永远只可能是“口头革命派”的秘密。记得我说，第一，是人都知道，在一连训练有素的武警面前，一万暴民也不过是一堆肉。如今中共武力之强大，根本就不是什么“梭标亮堂堂，工农齐武装”可以对阵的。只有头脑极度昏乱的“民运”领袖如王希哲先生，才会以为他是拿破仑转世，深通三韬六略，说出什么“将来我带兵打中共”的昏话来。第二，如今的“民运”领袖比不得当年中共那些真正的志士，个个是气壮如牛、胆小如鼠的懦夫。因此，他们永远只会踞坐在高高的“首阳山”上大唱革命高调，绝无胆量真的回国身体力行。

说来可怜，这其实是人家的“粮道”——谋生方式。老芦是脑力劳动者，那些人则是“嘴力劳动者”。老芦用脑力换取洋人的科研拨款，人家用嘴力换

取洋人的政治捐款。社会分工虽然不同，但都是为洋人民服务，没有高下贵贱之分。

问题是这些人的煽惑，在国人的心目中造成了极大混乱。仇共宣传本身根本就不会给共党统治造成任何威胁，它的祸害在于蛊惑了国内知识分子。许多“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一面假惺惺地表示赞同和平演变，同意“体制内改革”，一面却又不遗余力地煽动对共党的仇恨，竟然意识不到、或假装意识不到，这完全是在拆和平演变的台。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共党是人类历史上最狠毒的暴力集团。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上台都完全是靠杀人如麻。因此，这些人最怕的就是有朝一日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敬爱的林副主席在当国 17 年后还危言耸听，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大头领们描绘“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的可怕图景，而这疯话竟然蛊惑了全党，导致文革出台，就最充分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追本溯源，六四惨剧之所以发生，说到底还是杀人魔王们内心那牢不可破的 paranoia。对他们来说，林副统帅的话永远成立：“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这“一切”当然包括脑袋在内。

既然咱们要靠和平演变改造中国，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消除朝野之间的深仇大恨，让双方从那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僵局中解脱出来。八九学运的最大失误，就是领袖们在共党“斗争哲学”的指引下，使用共党当年斗垮国府那套手段对付老共，这结果就必然是引起对方的猜忌和恐惧，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反扑过来，把人民淹没在血海之中。

于此便可看出仇共宣传的巨大危害。共党当然要把这些宣传看成是颠覆他们统治的企图，进而把这猜疑扩散到国内异议人士头上去（因此，所谓“民运人士”参与营救刘荻，完全是把人家往死里坑）。另一方面，它刺激了国内异议人士肾上腺素的大量分泌，使得他们为情绪左右，不必要地说出刺激共党的话来。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朝野双方都把对方看成势不两立、无法和平共处的仇敌，永远也不可能实现良性互动。

说到底，国内真正的民主志士，必须认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暴力革命绝无可能改造中国，只会带来社会的大幅度倒退。在现今条件下，暴力革命根本没有现实可能。而且，如今的中国社会矛盾无比深重，堪称国脉如丝。一旦乱起，民族地区势必分裂出去，民族之间的大屠杀以及汉

族内部的大屠杀，必将让前南斯拉夫和巴勒斯坦地区瞠乎其后，不乱上半到一个世纪，死上 7、8 亿人之后，骚乱绝不会停息。在这潜在的大难面前，不能不维护专制政府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真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应该勇于作“专制制度的辩护士”。

第二，只有和平演变才能救中国，而现今的政府无论怎样专制腐败，总还是提供了一个可供进一步改造的框架和基础。

第三，要实行和平演变，最关键的一条是消除朝野之间那种传统的势不两立心态，破除共党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在野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们应该主动作出民族和解的努力，消除仇共心理，认识到批评抨击共党的目的是在于促使对方进步，而不是羞辱对方，单纯地暴露其丑恶，以此煽动民众与政府的对抗甚至仇恨心理，学习扮演西方影子内阁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逐渐改造为西方那种“忠诚的反对派”。

要言之，如果中国的民间反对派永远是传统那种将统治者用暴力推倒，然后斩草除根的草寇，则中国政府便永远只会被“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噩梦缠绕。这个僵局不打破，则咱们连大清和平逊位那种好事都别想指望，更别说西方民主国家那种和平交接政权的文明局面了。

2003年11月12日

社会进步是怎样发生的?

刘荻案发，“民主”斗士们顿时犹如秃鹫见血，“鹫眼看世”，看见了沾满个人名利的人血馒头，肾上腺素大量分泌，泛滥流淌到网上来。力主持重的论者当然成了“共特”，起码也是“帮凶”，“不许他人为人民鼓与呼”。为了证明他们的行动有理，斗士们竟然不顾事实，硬说这么在网上穷嚷嚷就能迫使中共把人放出来。

最滑稽的是，高寒先生是共产革命家，主张用暴力革命砸烂刻下正忙着走资的现代中共政权，建立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共社会。既然主张暴力革命，当然是认定“改良的道路走不通”，中共决不会在暴力之外的任何手段下屈服。如今他却成了“革命乐观主义者”，红口白牙地说什么内外施压就能使中共屈服，还举了个谁谁被释放的例子出来作证明。

高先生是华人世界中唯一精通世上最高深的学问“辩证逻辑”的思维大师。这种“世上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当然不至于不懂逻辑学的“矛盾律”。我想，他热衷于痛打自己的嘴巴，还是私利使之然也，为了个人名利不惜扭曲自己的信仰，并不是智力真的出了问题，虽则那以唯一个例来证明一般性结论，既无对照，亦无统计处理一如既往地展示了科盲的垃圾大师风范。

最惊天动地的一例，还是随便网友和某人的对话，那人硬要说网上抗议就是有效。据他说，反动的户口制度终于垮台，就是网上抗议的结果！随便先生的回答更有趣，他说，你乾脆说中国是网上骂出来的得了。

这就是“民主精英”们的水平！老芦谨在此建议开展“网上骂共周”，大家一齐扯足嗓子痛骂共党一周，则共党肯定会给吓得乖乖下台。此法惠而不费，可以省去暴力革命必然需要的大批金钱（许多暴力革命家连造反需要巨额资金都不知道，这种智力笑话也只有中国人能闹出来），颇得传统中国所谓“魇胜”法术的真髓。

看过《红楼梦》的读者想来都记得，凤姐儿中了赵姨娘此招，顿时丧失神志，手持菜刀杀进大观园，见鸡杀鸡，见狗杀狗（小脚还能跑得飞快，追上鸡狗，真是难得阿），见了人，她就要杀人。这种功夫虽然奇特，还是远不如咱们这“网上骂共救国术”有效。

那位“民爷”说话了：你这不是以偏概全吗？那不过是一个个例，你凭什么一篙子打翻一船民主垃圾？

那好，为了证明您们不是智力垃圾，小的在此请教诸位民爷，有谁能说清反动的户口制度终于废除的原因？

老芦在网上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便是《重释“民主恩赐论”》。最令我对国人的智力绝望的是，正是该文让我蒙受了“民主”垃圾们最大剂量的侮辱。网上康生古迷竟在某论坛造谣诬蔑我，说我“求专制政府恩赐，替专制政府捉刀”！

那文章的中心论点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不可能通过人民斗争建立，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能通过统治者的让步来实现，而统治者的让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陆人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去赢得。”

民爷们不同意没关系——那本是您们的神圣人权，是不是？可在开口侮辱他人之前，为了证明您们不是智力垃圾，总得想出个替代解释来吧？

众所周知，79 年共党三中全会至今 20 多年的光景，神州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社会取得了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巨大社会进步。在毛社会中，人民的全部权力与自由都被剥夺了，一切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信息资源和生产资料都被共党垄断。如今人民重新获得了除政治权利自由之外的绝大多数权利与自由。这巨大的社会进步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我的解释已经在上面的引文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进步是统治者让步的结果，而这让步根本就不是大陆人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赢得的。诸位既然不同意，想必是要认定那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是不是？那么请诸位给小的说说：人民何时何地作了什么样的斗争，斗倒斗垮斗烂斗臭了万恶共匪，这才赢得了上述一系列重大的社会进步？

小的脑筋不灵，想来想去，除了“网上人民斗争”之外，实在想不出答案来，看来还是那位网友说得对，户口制度就是让咱们骂废了，看来开展“网上

骂共周”确有必要，刻不容缓，骂到江泽民不提梳子提菜刀，冲进中南海见鸡杀鸡，见狗杀狗（好在他只有油肚，尚是天足，不存在追不上鸡狗问题），见了小胡，就要杀小胡，中华民族振兴也就有了希望也。

其实，这答案我早就在两年前写的《重释“民主恩赐论”》中给出了：

> “另一种被动让步是统治者主动改革引发出来的副反应。改革是一种难以在事先精密设计的系统工程，一旦驱动后，常常引发为主事者意料之外的链式反应。邓小平曾坦承乡镇企业是始料未及的‘异军突起’，他当初在决定实行大包干时，根本就没想到此举会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然而正是这计划外产物初步突破了中共那种最反动的农奴制，不但减弱了我党对农民的控制，而且为将来逐渐消解反动的户口制度作了铺垫。类似地，对外开放的原初目的是引入外国的资金与技术，然而这却引起了各种资讯的大量涌入。它突破了社会原有的封闭格局，使人民初步获得了起码的知情权。这些都是统治者不愿看到却又无法彻底禁止的，不过要说它们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恐怕实在牵强。”

毛共之所以发明了反动的户口制度，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监视控制人民。从主观愿望来说，统治者绝对不愿意放弃这一牢笼人民的罗网。邓小平当初发动大包干，目的不过是为垂死的农村经济注入活力，并不是解除对农民的捆绑。

但此举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原来全村人刨食还半饥半饱，现在一小部份人刨食不但能养活全村人，还有大量余粮出售。这就引出一连串结果：第一，大量粮食在私人集市上出现，使得人民不必依靠国家定量供应便能生存，农村人口自由流动到外地去也不至于饿死；第二，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在家人承包土地后解决了家庭生计问题，必然会四处流动寻找就业机会；第三，农村富裕起来后，有足够资金去办乡镇企业，吸纳剩余劳力，由此产生的财富又进一步把剩余劳力吸引出来，形成一连串的“瀑布效应”。

这链式反应的最终结果，便是户口制度必然消亡。毛共户口制度之所以起作用，完全是靠“粮食统购统销”，由国家用粗线把每个公民的脖子扎起来，挂在出生之地的“喂养点”。您要是离开“喂养点”，立刻就得饿死。如今粮食大量在私人集市上出现，这一套当然就再不起作用了。只要有收入，随便哪

个“黑人”都可以在北京上海呆上几年而毫无挨饿之虞。因此，它在名义上的废除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从上面论述中立刻就可以看出：

第一，这种巨大的社会进步根本不是什么民爷们熟悉的“人民勇敢斗争”的结果。

第二，这其实只是改革开放引起来的无数连锁反应之一。经济改革会带来统治者预期之外的影响深远的继发反应，促进社会转型，这些变化事前难以预知，也不是统治者愿意看到的，但形格势禁，事态的变化根本就超出了他们的主观控制能力，于是只好事后追认既成事实。换言之，经济改革的效应并不限于搞活经济本身，照样会造成社会转型。可以说，世上没有单纯的经济改革，一切经济改革必然有着社会改革的客观后果。而这就是和平演变的希望所在。

第三，与前苏联相比，邓小平的改革路子其实走对了。假定在剩余粮食出现前便宣布废除户口制度，则这种政治改革什么意思都没有，反而会引起毫无意义的骚乱。大量农村劳动力必然因此涌向城市，而城市里又拿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这些人，反倒造成了无数矛盾与纠纷，让市政当局焦头烂额，人民怨声载道。因此，经济改革不但具有政治改革的效应，而且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

这说的只是“大包干最终颠覆反动的户口制度”，从宏观来说，整个国家又何尝不在处于类似的巨变之中？现在中共当局奋勇走资，一个现代工商社会已经初具雏形。新型的生产方式引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而人们的观念也就在这过程中潜移默化。

如所周知，现代文明国家都是契约社会，所谓“民主”、“法治”，说到底不过是一大堆社会契约而已。我早在《盲人摸象说民主》中解释过，民主之所以在中国难产，一个问题是传统中国人从来没有西方国家那种明确的权利意识和契约观念。而工商社会的运转核心恰好就在这“契约”观念上。随着咱们的工商社会发育成熟，权利意识和契约观念必然在国民心中逐步扎下深根。这种变化当然不是中共当局有意造成的，但大势所趋之下，他们根本就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更为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进步推波助澜。共党控制人民的强有力手段是“单位”。凡是毛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其实是网罗人民

的监控网。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兴起，把人民从这种监控网中解放出来。随着私有化的逐步完成，大量的国民将只生活在资本家而不是支部书记、党小组长的控制下。

对外开放造成的大量西方文化商品的涌入也带来了国人观念的巨大变革。如我在旧作指出的，近年国内出版的刊物，看了使人心花怒放。就连那种垃圾破案小说上都能看到那涌动的暗流。例如某嫌犯被抓起来后还知道跟公安说：这是我的隐私，你凭什么问这些？另一嫌犯居然知道指责公安滥用纳税人的钱。这些都说现代明文明观念已经如润物春雨，点点滴滴的渗入了人民心中。

许多人尽管口头同意和平演变，但根本就看不到该怎么个演变法，他们眼中只见共党死不放权、只知贪污腐败，看不见那正在 900 万平方土地上展开的壮丽画卷，于是便悲观失望，甚至因而同情那些“民运”垃圾，浑不知那些垃圾完全是一种反动势力，不但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毫无寸功，连执政的共党都不如，而且还贼心不死地想颠覆这一伟大的民族事业，让中国再度倒退回那暗无天日的毛共世界中去。

对中国的改革事业，咱们该起到推动而不是促退的作用，对此大部分人大概都不会反对，咱们的特殊问题在于毛共党文化造成的全民智障，使得许多人特别是所谓“民主精英”把你死我活的斗争看成了“推动”的唯一方式，这才是最可悲的。

2003 年 11 月 13 日

另类“草船借箭”

——向国内异议人士进言

前天在网上转，看到一份帖子，说中共上层开了个会，江派在会上籍两件事对小胡发难，一是对台关系问题，那意思似乎是胡的温和政策导致台独气焰嚣张；二是网络问题。李长春发言说，所谓网络民主是颠覆政权的阴谋活动。有的人装作称赞党内的某些领导同志，却攻击另一部份领导同志，必须加以镇压，杜导斌的网站就是这样的“毒瘤”，现在已经把他抓起来了，云云。

据说胡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虽然他和别的同志是这些网络言论的“受益人”，但完全同意对网上“坏人”的镇压。江泽民作了总结发言，说胡的检查是认真的，对台政策要强硬，要“以动制动”，云云。

这消息的可靠性当然无从落实，但从我对中共的理解来看，倒非常像是真的。

中共当国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无论国内国外的任何风波，都会化作党内权力斗争的借口，使得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份人被打下去。当年四人帮借中美关系打击周恩来和老共干就不说了，后来的 89 学运更是最突出的例子：党内保守派以“放纵自由化，分裂党”为罪名，将改革派几乎一网打尽。

这就是我在答老洪的帖子中说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其实台湾通过公投取得名义独立的风险不是很大，但民进党人不必要地刺激中共，其实是在帮党内强硬派和军内强人的忙。“草船借箭”不光是陈大总统的专利，共党内部的死硬派也特别擅长此道。台湾人傲对中共当然是他们的神圣权利，问题是这种作法其实是向共党死硬派赠送免费箭枝，为军界强人争预算当啦啦队，为国内“民族主义”宣传火上加油。

国际上又何尝不如此？英国人民对参加伊拉克冒险本来就是半心半意，国内争论很大，后来查出伊拉克并未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萨达姆也与奥尔奎塔没有什么关系，许多英国佬就更觉得师出无名了。布什总统访问英国前，当地

人民准备了大规模示威侍候之。不料奥尔奎塔却在土耳其首都炸了英国领事馆，领事和其他 3 名英国人给炸死了，国人闻讯悲愤万状，于是两布的船蓬上便插满了恐怖组织慷慨赠送的箭枝。美布凯旋而归，把访英当成了巨大的外交成就。其实如果没有奥尔奎塔在此关键时刻帮他说服英国公民，美布只会空手而归。

由此可见策略的重要。不讲策略，无异于成全对方的“草船借箭”，干出事与愿违的蠢事来。可惜任你讲得唇敝舌焦，许多“民主精英”就是死也不明白这一点。

我多次指出，伪民运的最主要特点，是秉承后期毛共的作派，把一切策略分歧视为“路线斗争”，把温和派斥为“走狗”、“奴才”、“共特”、“帮凶”，只许毫不妥协的斗争，绝不允许别人对他们的斗争策略的质疑或抗议。

就连洪哲胜先生，似乎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点这种“斗争哲学”。他在跟帖中说，芦笛的死穴，是不知道应该发动大陆人民起来制止中国共挑起两岸共同毁灭的武斗，却去劝台湾人忍让。

他这主张倒有点像高寒先生的“紧急行动起来，强力制止江泽民称帝”的庄严号召。漫说在中共那种半极权国家中，人民根本就没有任何发言权，更没有能力去制止中共动武，就连民意，其实都是由政府一手塑造的。区区个人想去说服人民，无异于精卫填海。

2000 年我以为中共真的要动武了，急得上网大声疾呼，写出了一系列反战文章，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我变成国人皆曰可杀的大汉奸。老实说一句，我连自家亲人（当然不包括我在国外的小家庭）都无法说服。在《谎言之邦》中我就说过，我这“汉奸”其实是自家人首先封的。上网前我回国，和一位长辈争辩起来，被他老人家戟指大骂：“汉奸！滚回你的美国去！”

任何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都能看出来，要改变一个极权或威权制度，唯一的指望是制度本身造成的社会发展停滞，导致统治者内部的改革派上台，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在客观上削弱对人民的控制，使得人民的斗争有了起码的可能。在这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人民不配合，提前起来闹事，使得全体统治阶级陷入失控的恐慌中，导致死硬派获得奥援，借力打力，先使用人民赠送的箭枝射杀改革派，再转过头来把人民打下去。

这就是八九年发生的悲剧实质。令人痛心的是，至今还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我这客观的看法。

就连老洪也似乎认为人民斗争是取得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他忘记了自己的经历作的反证。如果不是经国先生在生前解严解禁，又“非常及时地、完全必要地”死了，如果不是李登辉是“自己人”用来专门颠覆国民党的特洛伊木马，则我敢断言台湾人民到现在还在认定自己是大中华民国的国民，洪先生不但回不了国，而且也说服不了几个他的同胞。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非得政权不足以宣传革命。”

如果“民主精英”们看到这一点，就会谨言慎行，在事前反复考虑自己的某个行动后果是否会事与愿违，成全对方的“草船借箭”。遗憾的是，似乎没有一个“民运”领袖有此见识，拿手的还是毛共那套大轰大嗡，领袖一挥手则人民山呼海应的“大兵团作战”。这种作秀式的“争取民主”，结果就只能是坑人秀，连累国内异议人士。

话再说回杜案来。如果那消息是真的，则我看杜导斌先生出狱的希望实在渺茫，因为他不幸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既然李长春诬蔑他是阴谋分裂党的“毒瘤”，并隐射胡温是他的后台，则党内再也没人敢出来纠正这冤案，恐怕连温和派都要下毒手把他往死里整，以表示自己的清白。

我想，不管这消息是否可靠，国内异议人士都要吸取教训，注意策略，保护自己，以免不必要的牺牲。

我个人觉得，对国内政治的批评，要注意避免授人以柄，不要针对党内某个（些）人作褒贬，最好还是针对某项具体政策，重在指出其弊病，并提出自己建设性方案，学着扮演西方民主国家“影子内阁”的角色，充当民间的“政治设计院”，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把自己改造为“忠诚的反对派”。与此同时，要坚决拒绝参加国外“民运”人士发起的作秀活动。干那些事不但对推动中国的民主过程毫无助益，而且很可能受到那些害群之马的连累。

2003 年 11 月 22 日

争作布衣“帝王师”

前见曹长青先生文章，说故李慎之老和国内学者朱学勤先生是所谓“封建社会的辩士”。朱先生为此专门写了篇文字自辩，却没把道理讲透彻。后来我在网上写了几篇文章，被仇共义士们讥为想作“帝皇师”。有位先生更有意思，居然劝我“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这些讥笑，便是本文的写作由来。

传统“谏士”的可笑

两千年来，中国人只面临两种政治选择：“忠诚”——俯首贴耳作奴才；“反对”——扯旗造反当响马，居然连一种中间过渡状态都找不着。一个首倡“中庸之道”的国家的国民，两千年下来居然没能力摆脱象征着幼稚状态的极端境界，当真是咄咄怪事。

简言之，中国式的忠诚只有两种。一种就是易牙、蔡京、严嵩、林副统帅式的忠诚，也就是我在《马屁之邦》转引《天龙八部》上星宿派的“马屁功”、“法螺功”和“厚颜功”。皇上便放个屁，也要大声吸，无声呼，衷心赞美扑鼻异香。第二种忠诚便是著名异议人士刘宾雁先生的同名文章阐述过的忠诚，也就是从比干、屈原、伍员、海瑞直到百万右派的忠诚。

不用说，这两种忠诚都是奴才的忠诚。而“新”、“旧”社会在这问题上的唯一差别，只在于“旧”社会将第一种忠诚谴责为“奸”，只鼓励读书人尽第二种忠诚，力争作被昏庸主子冤枉砍了脑袋的奴才，而“新”社会专砍尽第二种忠诚的知识分子的脑袋，只允许人民作第一种奴才。以致刘先生欲尽第二种忠诚而不可得，要出来为第二种奴才的脑袋生存权大声疾呼，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弄到后来连他自己也只有亡命异国的份。

可悲的是，就连某些“民运”人士，期待的都是“第一种忠诚”，谁要不尽那种忠诚，便是“反对”他们，而这“反对”绝对就是像共党当年反对国党

一样，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能坚决镇压，否则后患无穷，“退一步就全完了”。这些人连今天的中共都不如。如今的中共还有向传统回归、接纳“第二种忠诚”的模样，而他们却不幸连那个境界都还没达到，至今还停留在毛共水平。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某些同志奋勇反对“扫荡伪民运”、把敢于反对他们的人当成新时代的右派分子整的劲头就足矣。

实行“第二种忠诚”也非常荒谬可笑。中国式的“文死谏”，前提是忠于君主，怕今上胡作非为，丢了祖宗百战得之的家业，为此长跪不起，叩首出血，苦口婆心地规劝帝王看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哪怕圣上龙颜大怒，掌嘴廷杖，九死一生之际还得呜呜苦谏不止，在推出午门的那一段短短的路上还得厉声惨呼，盼望圣上在最后一刻心回意转。这种中国式的“忠诚的反对派”，跟西方式的“忠诚”和“反对”风马牛不相及。

传说中的比干大概靠不住，如果从伍子胥算起，中国不知道有过多少这种深谋远虑、用心良苦的奴才给砍了脑袋，证明中国皇帝之昏庸端的是举世无双。而在这么多的人给砍了脑袋后，居然还会有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丝毫不改初衷，前仆后继、争先恐后地去争作这种奴才。据说这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作奴才耳。作奴才光荣，作给主子冤枉砍了脑袋的奴才更光荣”。这种奇景也同样是举世无双。

现代人要看出这种作法的荒唐毫不困难，或许，这就是“谏士”成了辱称的原因，难怪朱学勤先生会那么激动。

作传统响马的祸害

既然作传统谏士不足取，那当响马扯旗造反又如何？说来可悲，大多数“民运”人士走的就是这种传统的“从奴才到响马”之路。曹长青先生自己就是如此。他当初尽“第二种忠诚”，劝邓小平退休，犯了当局之忌，于是便走到另一个极端，跑到海外当“文字响马”。这其实代表了大多数“民运人士”的心路历程。

可惜这不过是逃杨归墨，亡桀得纣，当响马比作奴才还糟糕。响马式的“反对”，也就是“彼可取而代之”，杀人盈野，伏尸百万，用尽一切残酷手段把对方搞下台来，还要斩草除根，犁庭扫穴。待到我党执政后，旧有的背时

传统被发扬光大到极致，传统的“忠诚”与“反对”观当然也被推演到了极限地步。“忠诚”变成了“三忠于四无限”，而“反对”变成了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的“斗争哲学”。不但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对方及其子孙，还要著书立说，写进历史，不但把对方在当时批倒批臭，还要确保子孙万代都会代代咒骂对方，这才算将革命进行到了底。

这种国民思维定势后患无穷。“中国式的忠诚”之愚昧一望即知，似乎用不着再说，而“中国式的反对”其实更糟，可惜没有多少人有足够的见识看出这点来。

一个社会之所以有政治上的反对派，无非是利害冲突使然。这反对的目的，无非是痛恨社会不公，想为自己争回被人无理剥夺的好处，然而中国式的反对却根本达不到这个目的。陈胜吴广起来反对，反对到死了大半国人，除了刘邦那个不成器的二流子和手下的狐群狗党沾了大光外，其他人什么好处也没捞到，就连始作俑者自己也送了命。送命能算是什么地位和待遇的改善？死人不说，死里逃生的人又怎么样？该为人佣耕的照样佣耕，日子只有比原来更艰难：原来的良田成了荒野，工匠的死亡、牲口的损失害得大家只能退回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去从零开始。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大概都记得，董卓之乱后，长安给烧得不成模样，整个京城连几匹马都找不出来，连大臣们上朝都只能坐牛车去。

可笑的是因为共党把暴力革命鼓吹成了天下第一浪漫神圣的勾当，哄信了全国吃狼奶长大的一代又一代人，将大多数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智商降成了负值，以致这中国式反对之荒谬居然没几个人有本事看出来。

记得毛在内部讲话中，列举了历代朝代更迭之际的人口统计，以此和原子弹炸死的日本人数比较，最后结论是：“谁说原子弹厉害？关云长的大刀比原子弹厉害多了！”他给出的数字我记不得了，模糊印象是大约每次朝代更迭，全国人口起码要死去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

如今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之深重，为有史以来所仅见，更可怕的是咱们头上现在悬了一柄核内战的达摩克利剑。海外“民运”那些新时代的响马，完全是在从事祸国殃民的罪恶冒险。

作这种丧心病狂的新时代响马，究竟比“谏士”又高明到哪儿去？更何况这些响马高踞在安全的“首阳山”上，专业就是毫不负责地煽动国人去送命流

血，而身在国内的朱先生面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危险。这两种人道德境界的天壤之别，哪怕是盲人也能看出来。

传统“忠诚”观与“反对”观的谬误

中国式的忠诚观与反对观的最大祸害，还在于它们的“自锁”性质，把中国社会的发展锁死在一条死胡同里，使得无论统治者还是人民都统统成了“隧道眼”、“聚焦脑”，看不到、想不出另类互动方式。在统治者，人民就只能是忠诚的奴才，决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反对。传统“昏君”和“明君”的差别，只在于前者只喜欢第一种忠诚，而后者聪明到能压制住对第一种忠诚的天然爱好，硬着头皮接纳第二种忠诚罢了。然而哪怕就是唐太宗，也绝对不会容忍不忠于他个人而忠于国家人民的反对派。因此，任何偏离奴才轨道的反对一定要被统治者无情镇压。反过来，在人民这边也同样如此：不是作奴才，就只有上山当土匪，“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因此，在这种荒谬的社会中，普通人要改善自己的待遇，就只有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靠出众的拍马功夫爬上去，要么把对方干了自己爬上去，敬爱的林副统帅当年就曾为大家再生动不过地显示了这两条路的走法。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的忠诚就是卖身投靠，中国式的反对就是把对方干了，接管人家的地位、权势、财产以及美人，实现共产共妻的远大理想。至于忠诚也可以是不牺牲自己利益与尊严的忠诚，反对可以是与对方共存共荣的反对，两千年下来，这种想法，居然就在千百亿中国人脑子里连闪都不曾闪过一刹那！

在我看来，就是这种隧道眼与聚焦脑将中国锁死在死胡同里凡两千年。在这种思维定势的支配下，无论是旧式的农民“起义”领袖也好，是孙大炮也好，是毛共也好，或者是未来可能上台的“民运”领袖也好，不管他们上台前打的是什么替天行道（“天命”、“历史潮流”、“民主”等等）的旗帜，喊出的是什么“等富贵，均贫富”的动听口号，必然是“一阔脸就变”，绝对如此，决无例外。因为他们在野时有的就只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反对观，上台后绝对只会像被推翻的统治者那样，容不得民间有任何实质上的反对。

因此，世上再没有哪个国家有过中国这么多的农民“起义”与暴力革命，然而似乎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人那样周期性地自行开膛破肚：大家埋头苦

干，等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人口繁衍到一定水平，全社会就进入癫痫大发作，自相残杀，将人口干到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将千辛万苦积累下来的财富或烧或毁，让千里沃野变成“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的修罗场。等到撑天白骨把某个流氓送上大位，大家又开始披荆斩棘，辛辛苦苦地开荒播种，苦吃苦做，从头再建毁了的文明，直到下一轮癫痫大发作……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七八年再来一次”。

如果说世上有什么比这还蠢的事，我还真想不出来。而如今还有这么多的中国人看不出它的疯狂与愚蠢，还要把这种周期性自毁文明誉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捧作社会发展的“人间正道”。这种惊天动地的愚昧，实在是让人连足够解气的挖苦话都想不出来。

说来可悲，人口居世界第一的中国，至今仍然没几个人看出这惊天动地的愚昧，从传统思维定势中突围而出。13亿中国人仍然奉行那“奴才与响马”的“两分法”，拥共派是传统的奴才，而以“民运人士”为代表的仇共派则是传统的响马。这就是曹文出笼的千年时代背景，他唱的不过是几千年下来都没唱完的老调，了无新意可言。

争作布衣“帝王师”

响马们似乎和奴才们针锋相对，其实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上面已经说了，两者的共同误区，是看不出“反对可以是共存共荣的反对，而忠诚也可以是保持独立的忠诚”，而这正是西方民主社会赖以存在和运作的前提。

民主社会如此，专制社会也照样可以如此。哪怕就是传统社会中实行“第二种忠诚”的奴才们，其贡献也未可一笔抹煞。诚然，这些人确实是绝对忠于专制君主的奴才，但老杜早就总结了他们的政治理想，那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思路是用圣贤之道约束规范君王，由此达到既能维持君王统治，又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境界。说到底，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孟子的民本主义，动机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还是高尚的人文情怀。

以现代眼光来看，不靠权力的分散与制约，却指望统治者靠自我道德修养来达到这个目标，当然非常可笑。但问题是传统中国人从无足够智慧看出人性

恶的一面来，总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不知道以毒攻毒，利用人性恶的那一面去抑制权力造成的罪恶，于是这千年谬误便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让那些仁人志士还能有什么选择？哪怕遇到的是昏君，面临国破家亡之际，生方想法去维持摇摇欲坠的大厦，总比听任它垮下来压死众人好些吧？上文早已论证过，造反杀人根本不能改变这邪恶的社会制度，唯一的作用就是杀掉全国大部分人口，毁灭大部分财产，换来又一个主子的专制统治。

因此，无论是从主观动机还是从客观效果上看，传统社会的谏士们都比响马们更高尚、进步得多。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谏士们比响马们高明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看出了统治者虽然和人民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是休戚相关，祸福与共的。在许多情况下，统治者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当君王干出损害人民利益的烂事来时，他们便毅然出来苦谏，其实同时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与君王的长远利益。我实在看不出那有什么不应该的。

例如2000年台海危机，老芦下海大骂我党，写出了一系列反战文章。那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反对，但其实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苦谏”。除了那些实行“第一种忠诚”的“爱国者”们，谁都看得出来：如果中共打台湾，不仅要给台湾人民带来巨大战祸，而且很可能触发内部危机，导致中华帝国崩解。这结果是对谁都没好处：台湾变成瓦砾场，大陆变成修罗场，中共政权当然也要垮杆。出来反对中共这种倒行逆施，当然在客观上维持了中共统治，但请问那又有什么错？

反过来，按照现代响马们的逻辑，应该是“凡是有助于中共统治的事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有利于推翻中共的事我们就要提倡”。从这“非谏士”的逻辑出发，则“民运”人士应该惟恐天下不乱，坚决主张打台湾，那才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福祉的好事，是不是？

光从这个例子，便能看出许多“民主积极分子”们的思想方式是何等浅薄幼稚。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哪怕是针锋相对的政治势力，其间也有利益交叉之处。

例如眼下这两岸关系就是如此，无论对大陆、对台湾还是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都是对三方有利的事。因此，在现阶段，台独根本不会成为现实

危险，起码老美不答应，台湾人的腰杆就绝对硬不起来。陈水扁对此其实也心知肚明，他的一系列作秀，不过是党派政治的阴谋诡计而已。谴责这种阴谋诡计，目的是防止政治家出自私利毒化两岸气氛，煽起两岸仇恨，甚至“擦枪走火”。作这种“谏士”，不但符合大陆利益，也符合台民利益，甚至符合老美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要打破传统的“奴才—响马”的千年对立，特别是党文化“斗争哲学”造成的朝野之间你死我活的对立，通过和平演变把中国改造成一个民主的文明国家，其主观前提就是必须向国民灌输“忠诚的反对派”这一现代文明观念，让他们彻底摒弃“靠响马改造社会”的荒诞梦想。

我已经在《勇作“专制制度的辩护士”》中说过，在这个问题上，在野异议人士必须采取主动，化解朝廷的猜疑，实现朝野和解。只有这样，才能让朝野双方从“斗争哲学”布下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死套中逐步摆脱出来，使得中共当局逐渐放弃为李慎之老谴责的“以小民为敌国”的根本国策，为日后政权和平转手奠定情绪基础。在我看来，这是成功实现和平演变的唯一途径。

要作到这一点，民间异议人士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反对派，另一方面也该继承传统“谏士”们优秀的那一面。两者结合起来，便是作“布衣帝王师”。“民之祸福，长在我心”，忠于国家民族而不是忠于统治者，甘心终生作布衣，耻于卖身投靠，从这前提出发，去反对中共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在这反对中，要特别注意学习继承传统谏士的长处，重在指出某项政策为何不但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而且损害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更应该提出自己建设性的反建议。只有这样，这种反对才有可能为统治者听取，也才能起到真正造福人民的客观作用。

当然，我也知道，要实现这个思想转变难度极大，几乎是不可能的。“响马之邦”的永恒悲哀，就是只会出滥洒狗血、哗众取宠的肾上腺功能亢进之徒，少的是老成谋国之士。

更何况这“布衣帝王师”不是容易当的，不但得忍受那些仇共英雄们的讥笑，还得有见识，有眼光，有办法，有足够智力想出合理的建设性主张来。这里需要的不是廉价的肾上腺，而是国人最缺的紧俏货——足够的大脑灰白质保

障的理性思维。可惜以中国之大，于今似乎只有王力雄先生一个知识分子。因此，老芦此文，恐怕不过是又一非非之想而已。

2003年7月12日

我看“宝马”杀人案

对最近在网上哄传的国内宝马车杀人案，我最强烈的感觉是，中国社会矛盾之深重，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中共当局若再坐视不动，迟早要引出大乱子来。

此事首先凸显了党民矛盾、干群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长期以来，我党贪污腐败到了几乎无从收拾的地步。一小撮官僚窃据高位，形成特权阶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人也跟着作威作福，比《水浒》上的高衙内还混帐，社会上早已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不管政治倾向如何，凡尊重客观事实的人恐怕都得承认这个社会现实。

这就是苏秀文被当作高官儿媳的谣言一旦传出，立刻不迳而走的根本原因。尽管老芦是个思想成熟的老翁，要是我听到了这种传言，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信以为真，因为类似的事太多了。国内许多官员简直就毫无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为所欲为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犹记几年前我回国，一位老同学作了高级干部，坐的是进口好车不说，还挂上了特殊牌照。他带我出游，让我尝到了一生从未享受过的风光：一路上民警都乖乖敬礼，那车愿停哪儿都行，专门以标明“禁止停车”的地方作停车场，甚至可以在单行道上逆向行驶。有时遇到塞车，我那老友就说：“唉，应该叫个警车来开道，是我没考虑周全。”咱们不过是游山玩水，他居然会想出警车开道的主意来，我质疑时他还嫌我大惊小怪！

我也有幸坐过由警车开道的专车。那可是一路绿灯，凡是十字路口的警察早就从手机里听到了开道车的命令，早早地就改成绿灯放行。路过十字路口时，只见两边的车辆给堵成了长龙（国内交通特别拥挤），我只觉得坐立不安，默祷被堵下来的车辆里没有急救车。

更出奇的是，这位老友带我去游山玩水，那秘书就是咱们的摄影师，一路给咱们拍照。不管到那儿玩，吃饭时都去高档餐厅，我要付帐，他却不耐烦地摆摆手，说我又不是掏自己的钱，吃吃喝喝是干部的起码福利，我又不贪污，

吃点喝点算是最清廉的了，要是全国官员都像我，那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了！

高干享受的福利待遇绝不限于吃喝，内部保龄球馆、温水游泳池、屋顶花园……要什么有什么。那神仙日子，绝不是我辈海外酸丁可以梦见的。

这种下滥党风，就是在未经毛共“平均主义”洗脑教育的国家，也要在民间引起强烈反应，何况是在中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舆论的炒作——本来就钳制民口，百姓敢怒不敢言，现在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我党在理论上也反对的案例，当然要趁机大闹一通，以泄憋久了的恶气。

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司法系统骇人听闻的腐败。我另外一个老友是名律师，他告诉我的那些可怕的黑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此人其实口齿并不流利，我很奇怪他这名律师是怎么做上的。因为是从小撒尿拌泥长大的，不用客气，我就直接问了他这个问题，他笑笑说：“这又有什么奇怪的？我人头熟，会这个”，接着就用指头做了个点钞票的动作。据他说，哪怕是该判死刑者，只要交够钱，他也有那本事刀下留人。

这种全社会腐败已经到了公开腐烂的地步，根本再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人民纷纷指责法院营私舞弊，包庇高官或富人，丝毫不足奇，这是在那种病态社会中必然引出来的人民的强烈反弹。无论是党、政、军、法、警哪个系统，都烂到了简直无从收拾的地步。要是人民再没这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倾向，那反倒是咄咄怪事了。

遗憾的是，随便、马悲鸣诸网友见不及此，用美国那种成熟的法治国家与中国那种病态社会作生硬攀比，强调司法应该独立，不受舆论干扰。

这在理论上当然是对的，但如果要在中国讲这套，就一定只会包庇贪墨。本来我党的司法就从来不独立，从来是“党指挥法”，现在又加上了个“钱指挥法”，更是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再不让舆论“媚俗”，像毛共时代那样去媚上，这小民还有活路么？党风还有改善的希望么？司法还有脱离“党＋钱”指挥，接受民意和传媒监督，逐步变得透明起来的希望么？

当然，无论多荒唐的说道，都还是可以找到一星半点的道理。我担忧的是，地方当局真的会使用媚俗方式，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迎合一时民意，不顾事实和法律乱作处理，而不是从此中看出弥漫全社会的危机，吸取教训，釜底抽薪，治本而不是治标。

在此寄语北京政府，当局最好能从这案例中看出民心向背，看到全局性的严重问题，痛下决心整顿吏治，整顿司法系统，早日实行司法独立，只接受舆论监督，不受权钱指挥。厉行法治，整肃贪污，把中国先建成一个廉洁的开明专制国家，否则迟早要让愤怒的百姓推翻。

此案令人忧心忡忡的另一因素是可以隐约感到毛主义的幽灵。中国民间历来就有“均贫富”的传统，毛主义更是把这变成了国教。30 年的洗脑功夫可不是旦夕可以消除的。偏偏毛共社会又破除了一切传统道德，导致“先富起来的那部份人”全都为富不仁，有两个臭钱就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其素质不但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富豪，而且也远远低于“旧”社会的地主富农资本家。这种社会现实，简直就是为下一轮毛式革命作足铺垫。

凡是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都看得出来，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吏治空前腐败的社会危机，正是历代王朝末年必有景观。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中国是在三岔路口，一条是靠和平演变，把恶性走资化为良性走资，先建成廉洁的开明专制国家，再逐步进化到民主国家；一条是当局倚冰山如倚泰山，醉生梦死下去，最后因统治危机导致全国大乱，中国再度陷入毛式革命中，最终导致毛主义的全面复辟。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2004年1月10日

共军健康力量浮出水面？

何物刘亚洲，老芦孤陋寡闻，竟尔不知，昨见网友偷笑转贴过来的他评伊拉克战争一文，旋即又看见加人转来的他评金门大战文字，又把他谈伊战的文字仔细看了一遍，不禁感慨万千。

第一个感想便是，大陆毕竟幅员广大，人才辈出，智力优势永远在执政党一边。相比之下，所谓海外“民运”，端的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徒有几个声嘶力竭的草包戏子耳。时至今日，朝野政治力量对比业已完成了我在《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中指出的角色转换，也就是在朝的执政党从痞子变成了士绅，而在野的反对势力从士绅变成了痞子，一如当年的国共之争一般，国党代表有文化的士绅阶级，而共党代表无知痞子。

如果谁还不明白精英和痞子的区别，建议他去看看成都军区空军政委刘亚洲少将的文字，再去看看发愿“我将来带兵打中共”的王希哲先生的大作。两人大概是同龄人吧，但哪怕是盲人也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天壤之别来。刘视野广阔，具有世界战略眼光，非常熟悉外国军事理论、战史和各种军事体系的优缺点以及流变，说明此人精通业务，甚至可能精通外语，具有现代化军人的专业素质。而王先生唯一精通的大概就是《24 史》和《三国演义》上那些阴谋诡计（顶多再加上点《孙子兵法》），以及“天将降大任于我”的“潜龙”心态。

两人的区别，其实也就是当初国共两党的区别，是先进西洋文明和陈腐传统糟粕的冲突表现为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较量。

其实要区分谁代表先进非常容易：只需看他们的知识结构就行了。如刘少将那种具备现代西方军事知识的同志必然是先进的，起码这些人治国治军不会干出毛共痞子党干的那些烂事蠢事来，而谁像老毛那样，只懂 24 史、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谁就一定是具有祸国殃民的极大潜能的现代痞子。

用国人最喜爱的超简化公式来表达，那便是“西方文明知识＝先进，中国历史知识＝反动”。根据这个超简化公式，只要看谁在网上动辄引用《触龙说

赵太后》一类的烂事作为政策制定依据，谁就是老毛那种掌权后必然祸国殃民的超级痞子。

不意当年的痞子军，如今居然也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西式“儒将”，当真是“鸟枪换炮”，令人百感交集。

刘将军不是痞子是精英的突出表现，在于其头脑清醒与视野辽阔。观察议论伊拉克战事的人多矣，但我还真没见过有谁具有他那种一叶知秋、见微知著的能力，居然从中看出苏式军事体系的衰败与美国现代军事体系的勃兴，提出了“信息化打败机械化”的中肯总结，与英美现代军事学者的观察暗合。不久前英国国防部提出了军队改建计划，其努力方向就是效法美军，扬弃机械化时代大兵团作战思想，把部队改建为具有灵活反应能力和瞬时打击能力的高度机动的精悍武装力量。

根据五角大楼最近披露的材料，伊拉克之战确实是拉姆斯费尔德军事理论的胜利。在这次战争中，美军第一次采用把特殊部队与普通作战部队混编在一起的战法，实际上是把正规军当成了特种部队来使用，整个战略的基础就是从个别战斗员到最高指挥获得的所有信息在瞬间内完成全面整合，及时作出准确打击。就是这一套使美军几乎兵不血刃，不战而胜。

这战略说来其实非常简单：战场上的所有情况，都被云集在伊拉克上空的 60 多个卫星和专门盘旋在伊拉克领空的大型侦察机看得清清楚楚，哪怕是尘暴或夜色也挡不住他们的视线。大型军队调动只要一冒头就立即被消灭。在战术上，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让指挥员和战斗员都对周遭了如指掌，不但每个指挥员知道自己的部下在何处（这是既往常规战争的最大难题），就连个别的战斗员发现的敌情也能瞬时内传达到五角大楼去，从天上唤下霹雳来。事情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坐在万里之外的五角大楼官员面对屏幕，就如同本人坐在无人飞机上在战场上空盘旋一般，一旦发现敌情，他一按电钮，万里之外的无人飞机便立刻发射灵巧炸弹将其消灭，完全跟玩电子游戏一样！

如此打仗，岂有不彻底摧毁对方斗志之理？任何主观努力还未付诸实施，刚欲蠢动便遭雷击，这ＴＭＤ岂是凡人过招？简直是与安拉作战了，谁还有那胆子打下去？

当然，刘某也没把所有的事弄对。第一，他忘记了十几年的禁运极大减弱了伊军战斗力。据报导，伊拉克装备的老旧坦克在国际市场上只卖万把美元，

跟部轿车的价钱也差不多，而英美的坦克都在几百万美元以上。第二，他比较苏一阿、美一阿战争结果时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首先，苏联打阿富汗是代理战争，塔列班获得美国的全力支持。其次，苏阿之战是无神论者与穆民们之间的生死较量，对苏作战的是多个派系的联盟，而老美只打塔列班一个组织。第三，他以为信息化战争的出现，彻底淘汰了人民战争。

在最后一个问题上，老芦其实也犯了类似错误。记得当时我写的一篇时评，标题就叫《人民战争的末日？》。主要思路是人民战争主要是靠机动性与隐蔽性，但现代的高科技已经剥夺了这种可能，所以弱国再也无法靠这一手打败强国了。很明显，刘将军的思路也是类似的。

这当然大致不错。但正如侵伊战争表明的那样，高科技可以彻底摧毁对方的斗志确保战争胜利，迅速颠覆对方的政府，却无法帮助征服者统治敌国。在伊拉克人民心目中，占领军不但是外国人，而且是异教徒，这就决定了该国根本是无法征服的。你杀的平民百姓越多，在战略上败的也就越惨，最终将像越战那样，因为世界舆论抨击和本国人民的反战运动而灰溜溜撤出。

但这其实根本不是统治者们的关心所在。例如对于萨达姆本人来说，伊拉克是否抵抗下去，和他又有何相干？他最痛苦的还是本人权势的永久丧失。而这正是刘将军那文章最耐人寻味之处：他其实是委婉地告诉中国最高当局：和老美作对没有好下场，逆美者亡，顺美者昌。中国绝对不是人家的对手，还是趁早乖乖臣服为妙。

的确，任何一个具有普通理解力的读者，看了那篇文字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和美国相差几世纪，中美战争不爆发则已，一旦爆发必然是一边倒的屠杀，中共政权只会在短期内被迅速“斩首”，正如在伊拉克已经发生了的那样。

这就是刘文居然出现在网上的政治涵义，我看了该文，简直觉得一种身体上的震撼：莫非中共终于认识到了所谓“爱国主义”喧嚣只能搬起石头打统治者自己的脚?

在我看来，这里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最高当局蓄意默认刘文出笼，在网上广泛流传，以此向百姓“吹风”，让他们为即将到来的政策转向作好心理准备，正如 70 年年代初期当局通过《参考消息》选择性发布新闻，以微妙方式通

知人民仇美政策即将改变一般；要么共军内部出现了明智派，竭力呼吁众人睁开眼睛，不要被自己的宣传哄信了，一厢情愿地往火坑里跳。

老芦当然希望第一种可能是真的。其实当今大势，连盲人都看得出来，老美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是世界领袖，你承认它也是那样，不承认它也是那样，根本就不以你自己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根本就没有什么“攘外安内”的可能，唯一可做的，也就是鲁迅当年讥笑的那样，“不如迎外以安内”，也就是英语谚语说的：“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 ”

在我看来，这一点都没有什么丢脸的。论“民族尊严”，咱们这个只会被人家征服的民族恐怕无法跟英国人比吧？但就是这个宁死也不在纳粹面前屈服，发誓“我们将在海滩战斗，我们将在街上战斗……”的骡子民族，在二战后就及时判明风向，死死抱住老美的粗腿不放，让人家搞垮了庞大帝国也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地作堂兄弟的小喽罗，不惮“堕为美国第 51 州”之讥，专门扮演美国与欧洲之间的“马泊六”（典出《水浒》），施展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欧洲潘金莲们接受美国西门大爷的“强迫作爱”。

这还不光是英国一家这么做。环顾全球，有哪个抱老美粗腿的国家没发起来，又有哪个与老美作对的国家有什么好下场？难道中国当政者们真是蠢到连霹雳都无法击穿厚脑壳？

当然，人家也有说不出的苦。老美的粗腿，不是想抱人家就让你抱的，首先您得想法改善自己在普通美国人心中的形象，最关键的就是停止抓屎糊脸，把印堂上贴的“腹蛇”二字自行揭下来，废除“共产党”名称，改为“人民党”之类西方可以接受的名称，再将宪法里的“四个坚持”拿下来，停止迫害良心犯，少搞些人权丑闻出来。干这些事，第一不消纳税人花一分钱；第二不会造成政局动荡、社会失控；反倒有利于安定团结。我早就说过了，取消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根本就不会造成政局不稳，只会让大众丧失议政热情，结束“骂共成名”的反常现象。

可惜，大概在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共酋们有此胆识。所以，刘少将大概只会是在沙漠中呼喊。

刘文引起的第三个震撼，乃是共军内居然出现了反战派，而这声音也居然就出现在网上！

任何一个有正常理解力的同志，都看得出刘反思金门大战的文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人家已经把话说得不可能再明白了：如果今日打台湾，就是古宁头大捷的重演，全体台民将像当年的金门百姓一样，誓死反抗共军入侵。在极权政体下居然出了这么一个头脑清醒的战略思考者，令人不能不由衷感慨“江山代有才人出”，哪怕是那种腐恶政体，也压不住具有远见卓识的精英浮出海面。

这里的政治涵义再次耐人寻味。到底是最高当局微妙示意政策改变，还是内部政争表面化？

前段高寒推出什么“两独”屁话来，我照例没看，但后来见到锺国忍网友的文字，好歹明白了那是什么意思，大概也就是中共默认阿扁“一边一国各管各”的意思吧。倘如此，则“两独主义”不但不该反对，还应该坚决拥护才是。为了所谓“大一统”把两岸人民卷进无聊至极的战火中去，导致大陆政权崩溃，全民陷入无边血海，这种下流事，也只会有伪民运真毛共那些急于上台涂炭生灵的痞子提倡。

问题是，要中共接受“两独主义”根本就不可能。

理由我早说过无数次了：第一，中共的愚昧“爱国主义宣传”将死了自己的军。真要想实行“两独”，人民绝对不答应。专制国家的民意照样会起作用，只不过它变成了内部权力斗争的筹码而已。如果有谁不明白这点，请去看拙作《2093 年中国大事记》。

第二，“两独”必然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台湾会在大陆的分裂主义者们心目中成为效法榜样，而李登辉的“七个中国”板块论恐怕就会成为社会现实。中共再蠢也不至于看不出这点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刘某人恐怕又是在沙漠中大声疾呼，唉。

中国的事，实在难办，痞子太多，精英太少，白痴过剩，常人稀缺，便请玉皇大帝来治理这种下烂国家，恐怕也要焦头烂额。“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将永远是咱们的主旋律。

2004 年 4 月 21 日

香港：不该收回的“失乐园”

为防止阶级敌人钻空子，趁机污蔑老芦连弥尔敦的《失乐园》都没看过，正文开始之先解释一下，我这里只是借用，那“失乐园”其实是“失去的乐园”。

这两天大家都在谈论香港，网友要我也写篇东西。我对香港早就丧失了兴趣，那儿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一点都不知道，从何谈起？勉强要谈，只能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地胡说一通。

对香港丧失兴趣的原因已在答网友的跟帖里说过：那地方比不得台湾，早就成了死地，用鬼话来说便是 doomed，寿终正寝之时便是 1997 年，港人所谓“九七大限”是也。

大限还没到时，我“英国在住”。因为阿拉伯是中国宁，人家免不得跟我谈起香港的前途。老芦告诉对方，那地方算是完了，他们把香港交还给中国，大概犯下的罪行还超过当初把它抢过来。

英国鬼子乃是世上比较聪明的鬼子，老芦对之佩服已极（绝对是崇洋媚外的汉奸本色，唉）。人家决不会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天生要质疑，当下便问：真的么？难道共产党就那么蠢？难道他们就不想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一个繁荣的香港不是也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么？

我答道：着啊！（鬼话是“Exactly！”）中共比谁都盼望香港繁荣昌盛，所以一定会毁了它。

饶是对方聪明远胜于我，当下也钻进了闷葫芦——我党的“辩证法”，哪怕国人懂的也不多，何况是从未吃过我党苦头的鬼子？直到酒吧关门，我还是没能让对方弄明白。此文要说的，无非也就是多年前说过的那些话，也不知道国人能有几个明白的，等看反应吧。

我在《丑陋的大陆人》中反复指出过，咱们中国人最突出、最坑害自己的毛病，就是心理学所谓“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 生怕人家看不

起，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在要在别人眼里显得体面风光，这在我党那个痞子党表现得最突出，由此导致了坑害全国的所谓“民族自尊心”。

明白这一点，则立刻可以看出，香港是大英帝国抛给中国政府的最大心理包袱，从此我党食不甘味，夜不安席，心心念念要让它繁荣富强，免得向全世界（特别是台湾）证明几个难堪的事实：第一，中国人没有本事把自己国家建设得如同香港一样繁荣；第二，中国人没有本事管理人家已经建设好的地区，维持既有繁荣；第三，共产党，像炸弹，炸到哪里哪里烂。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哪儿的人民受苦难！

因为有了这无比沉重的精神负担，我党就一定不会信守诺言，一定会情不自禁地主动干预，决不会实行“无为而治”，根本不管香港如何发展。

这本是明摆着的：同一块地方，对英国人来说不过是一块小小的殖民地，并不象征什么“民族尊严”，哪怕香港财政全面破产，也并不证明英国人是劣等民族——大英在非洲的殖民地又有哪个不是乌烟瘴气？而对中共则完全不同，如果英国人把香港搞得一塌糊涂，则中共反倒还沾了“渴者易为饮，饥者易为餐”的光，偏偏那地方又让人家搞得花团锦簇，若接管后不锦上添花，都还显不出我党的本事来，何况是王小二过年？

这一主动干预，麻烦就来了。我党就如同金庸小说《侠客行》上那“狗杂种”石破天，练就了一双天下无敌的毒掌而不自知，能伤人于不知不觉之间。他们越热心为人民服务，人民就越遭殃，这我早就在《领袖的心事，民族的梦魇》中说过了：如果毛泽东是明武宗那样狂嫖滥赌、不问国事的昏君，则中国人民就有福了，恐怕如今国民经济翻了十几番，早就进入了发达国家之林。无奈人家是“英主”，非要不甘寂寞，一定要造福千秋万代，让子孙万代感激他那大救星，于是便领着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跑就拐进茅房掉进了粪坑去。

如今的当国者当然不再是毛那种毫无现代常识、错把茅房当天堂的痞子，但那几十年培养出来的思维定势岂是容易摆脱的？他们第一不相信无为而治的自由经济，第二不相信放任自流的民主。更准确地说是他们不敢相信，生怕中央不积极干预，香港不是政治上乱了，就是经济上垮了，而中央无微不至的关心，就是香港人命中注定无法摆脱的大难。

九七大限之前，我在老美的《新闻周刊》上看过一篇文章，说自由世界中，唯有香港没有失业问题，那原因是与所有的发达国家不同，当地政府从来不管人民的就业问题。这当然可以理解：毕竟是殖民地二等公民，政府有什么民意压力管你的难处？不料这却歪打正着，反倒造成了经济繁荣，随之而来的当然也就是失业消失。

那文章作者是自由资本主义（即古典资本主义）的鼓吹者，当然不可尽信。香港的经济繁荣，我看主要还是沾大陆封闭的光，使得那儿成了个转口贸易的桥头堡，其实根本就不是英国人有意经营的结果。但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中国人本是最能苦吃苦做的民族，之所以至今未发，无非是一直被政府死死压住而已。殖民政府不生事扰民，政府对人民的经济活动干扰到了最低限度，税收乃是最低的，国人的苦力优势自然会发挥出来，造成了香港的繁荣。

不幸的是，香港移交后，这优势就不复存在了，第一，大陆已经全面开放，鬼子们再不必使用香港作为唯一的“接吻点”，可以直接到北京、上海、广州甚至内地大城市去牟取合法暴利。第二，为逃避东南亚经济危机，利用大陆的廉价劳工降低生产成本，香港工厂在 90 年代大举内迁，虽然促成了大陆经济起飞，却造成本地产业空洞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失业。

说起来中共运气也真是糟得出奇：刚刚接管了香港，东南亚金融危机就爆发了。香港首当其冲。当时的《新闻周刊》惊呼：早就预料香港的外汇要枯竭，不料过了“死亡线”后许久，港币还就是傲立不倒，经济专家们琢磨了半天，才发现那原来是大陆的外汇暗中源源注入香港。记得那作者叹道：为了保住面子，中共连内囊都尽上来了。如此人为干预经济，虽可收一时之效，从长远来看却未见得对香港人民有好处，云云。

老芦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也不知道如此制造繁荣假象会有什么远期经济恶果，但心理学效应却是再笨也看得出来，那就是：中共从此将以“港民恩公”自居，行动间一定会流露出来，以后干涉起香港来定会理直气壮，肆无忌惮。

这其实是中共一贯的本性。我在《为什么要了解日本》中指出，“施恩望报”是人的本性，毛共时代的外交特点，就是莫名其妙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明赠暗送给“友邦”（哪怕是弱小到尼泊尔也罢）无数领土金钱，下意识里觉得吃了大亏，从此便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投桃报李，最后的结果便是翻脸成仇。此乃我党的独门功夫，名曰“花钱买仇人”。

香港又何尝不如此？在中央看来，我掏大钱救活了你们的经济，当然你们就该听我的话，谁出钱，谁点菜不是？更何况我是中央，你只能乖乖臣服。可普通港人又哪知道你暗贴进去的钱？人家只知道英国人治下日子那么好，偏你共党一来就又是经济危机又是禽流感，经济一年不如一年。你就算告诉人家自己贴进去的冤枉钱，人家只会更反感：如果不是当初我们的工厂内迁把你们从四面楚歌中救出来，你们能有今天这钱么？

其实我党在接管香港后，根本就不必管那儿的事，只须效法英国佬，让人家自生自灭好了。既然说好是自治，就不管人家怎么踢天弄井，搞好搞砸都赖不到你中央头上去。

可惜如上所述，中共绝不会撒手不管，因为“民族尊严”、“党国威信”、“中央政府权威”在焉。

政治上也是同样道理。本来，香港是中国最难得的地方，那儿的人民经历了百多年的英国先进统治，廉洁法治早就确立了，而且经济繁荣，中产阶级已成了社会中坚，应该说比台湾还具备实行民主的主客观条件。中国不实行民主则已，否则那个地方就是最理想的“实验田”。

我在旧作中转述过唐德刚老先生说的史实：当年有人向孙中山兜售社会主义，孙说，行阿，等咱们将来革命成功了，把崇明岛划给你，你上那儿去实验你的理想吧。这在我看来大概是孙一生说过的最明智的话，可惜不彻底。如果当初咱们不搞什么“中华民国”，先在沿海发达地带成立“政治特区”，试行民主，则中国也不至于沦落到如今这无药可医的地步。

从政治实验的角度上来说，香港真是块金不换的风水宝地：惯性思维使得人民在潜意识中常常忘了那其实是中国的一块土地，实行民主即使取得了伟大成功，也未见得会给共党统治带来毁灭性冲击。更何况共党把它装进了密封罐头，禁锢得比英国人统治时还严密，无论是人员还是信息的流动都受极严格控制，对大陆民意根本谈不上什么影响。而且，那地方幅员极小，即使民主实验搞砸了也无关大局，中央政府反倒可以用此来证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名正言顺地取消自治。

但中共就是抱残守缺，死不改悔，刻意要压制那儿的民主化。这么做的原因我看很多：

首先当然是中共不相信民主，坚信“民主＝动乱”，而上面已经说过，中共最大的心病就是怕香港政治上陷于动乱，经济上垮掉，在全世界面前丢了他们的宝脸。这当然也不是毫无道理，前南斯拉夫就是证明。问题是他们蠢到看不出来，那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地区根本就不能和香港这种先进地区相类比。何况香港那弹丸之地根本就没有最令人头痛的民族问题。

其次就是那病态的“民族自尊心”。英国人的最大失误，就是迟迟不实行民主化，直到最后一刻才匆忙上马。这在一贯疑神疑鬼的中共看来，当然只会是一种反港乱港的阴谋诡计。于是香港是否按英国方式民主化，便莫名其妙地变成一种和帝国主义较劲的“捍卫民族尊严斗争”，真乃典型的中国式脐带风！请问民主是谁发明的？难道是延安那些满脑袋高粱花子、大字不识的痞子们？不跟人家学正宗玩意，莫非实行痞子们的“人民民主”？！

最后一个原因，大概是生怕香港的民主化实引起无法控制的内陆连锁反应。这种担忧我已在上文驳斥过了，根本就不能成立。大陆和香港之间那牢不可破的“防火墙”，保证了香港的“民主瘟疫”很难向大陆扩散。

中共最愚蠢的是居然看不到，不容许香港实行真正自治其实是因小失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要立国，首先就得取信于列强。你信誓旦旦允诺人家“一国两制，50 年不变”，转眼就食言而肥，岂不是自行描足那背信弃义的“共产恶魔”形象？要化解西方对共党中国根深蒂固的猜疑和偏见，请问还有什么指望？

更何况工商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公民便会普遍萌生权利和契约意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民主化确实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更何况还有西方文明国家在那儿作参照物，时时刺激港人的艳羡心态。你一味粗暴压制，只会导致港人离心离德，怨恨万恶的党中央。不但制造动乱苗子，而且时时昭示台湾人一旦钻进共党的套子去会是什么好下场。

可惜中南海诸公绝对无此胆识看到这些，所以，香港就不能不是我在文首说的，永远被 doomed。

追本溯源，这大孽其实是万恶的英国鬼子造下的。爱国者们不知道，其实我党本来根本就不想收回香港。根据许家屯回忆录和英国政府双方一致的披露，80 年代港督麦里浩访问北京，准备谈 97 年新界满期问题。接待他的官员

多次向他示意，见到邓小平时决不要谈此问题，那意思就是中共的计划是在 97 年后仍然维持香港现状。

可惜老麦那白痴乃是契约社会长大的，不懂东方人的默契，更不懂双方心照不宣装糊涂的东方政治魔术，不当面锣、对面鼓地问个明白，他死不瞑目，于是便在见到邓小平时硬是把此事端了出来。这下好了，如果老邓不表态收回，则势必变成汉奸卖国贼，从此青史留名，斧头也砍不去。所以他立刻提出不但租界、就连割让了的香港岛也要收回，从此拉开了香港悲剧的序幕。

伤哉，那失去了的中国人难得的乐园！伤哉，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竟然比生活在本族人统治下更自由幸福的中国人！

2004年4月27日

再就香港问题说两句

三言两语评民主派策略

应某网友所请，勉为其难说两句，他说：

“‘长毛’梁国雄：战略（或叫战术）有二

‘保持压力’：

（1）我们要在今年之内，发动‘三大战役’，打好打胜这‘三大战役’， 一是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活动。过去每年有 4 到 5 万人参加，今年争取达到 7 到 8 万人。现在就要着手准备了。

……

‘澄清认识’：

这次人大释法，让港人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香港的民主是同大陆连在一起的。对于民主，在以前香港人以为，中国没有，香港可能会有；但现在香港人看清了，中国没有，香港绝对没有。’”

这长毛真是胡说。在共党统治下作斗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务必不能犯当局忌讳，更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让我党难堪。而此方略正好触犯了我党的两大心病：六四那碰不得的创口以及对香港“民主瘟疫”播散全国的恐慌，势必引起中共强烈反弹。

愚以为，香港人的前途恰在于不管大陆，“争取一省到数省的首先胜利”，让一部份人民先民主起来再说。这在共党统治下是唯一具有可行性的“最高纲领”。

其实我已经在前天的文章里说过了，中国民主化可以考虑采用局部试点的办法，设立政治特区，先在沿海发达地域实验，而香港就是个最理想的实验田，那儿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又是唯一实行廉洁法治的地区。而且，香港自治是中共通过国际条约承担了的，中共毕竟有所忌惮，不敢铁腕镇压。因此，香港是中国最有现实可能实现局部民主化的特区，只有白痴才会把自己捆死在大陆那枯木朽株之上，与内陆同归于尽。

我觉得，港人若去搞群众运动，街头抗争，中共根本不会理睬，一点Ｐ用都没有。有那功夫，还不如去游说中央高官，说动他们以香港为民主试点。当然这未必见效——谁会主动恩赐民主？不过比起来，它总比以可能波及大陆的群众运动吓唬中共安全。后者绝对只会有负作用——人家怕你何来？

中共早说过，“大陆的河水不去犯香港的井水，香港的井水也不要来犯大陆的河水”，话已经说得这么明白，无奈港人还是不知道大陆的让步底线在哪里，竟然得出什么“中国没有（民主），香港绝对没有”的荒谬结论来，那是不是说香港民运必须是大陆民运的一部份？这在中共眼里等于公开承认香港是大陆指控的“颠覆基地”，邀请人家来铁腕镇压，真是蠢不可言！

同理，司徒华也犯了类似错误，倒是杨森还比较稳妥些，把斗争矛头局限于董特首。

英国为何迟迟不在香港实行民主

据我所知，北美独立战争是对大英帝国的一个沉重打击，人家从此作了深刻反思，相应修改了殖民方针，那就是，等到殖民地发展到一定程度，便逐步实行自治，条件成熟时，便实行民主。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这么获得独立的，女王只是个名义国家元首而已，母国对殖民地毫无具体治理权。

但这政策其实只限于英国本国移民占主体的国家，如上文所举的诸国无不是白人为主体的国家。对不同种族的殖民地，大英殖民者其实采用的是双轨政策，在黄人、黑人为主的国家就不搞那一套。他们的解释是，这些殖民地的人民没有治理自己的能力，所以不能实行民主自治，要等学徒期满才能如加、澳、新那样逐渐获得独立。

这当然充满种族主义气味，不过好像也有点道理，例如大英从非洲撤走后，新独立的国家没有一个不乌烟瘴气的，百姓的日子过得比作亡国奴时更悲惨百倍。客观说来，我觉得大英这种双轨政策当然首先基于种族偏见，不过似乎也有一定事实依据。

因此，大英当然不会在香港搞民主，因为那就意味着香港将像加、澳、新那样逐步独立，那可不是白人兄弟分家而是丧失白人产业，当然谁会愿干？后来香港成了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人家就更舍不得了。这就是大英为何迟迟不在

那儿实行民主的缘故。王希哲那篇文章，其实什么都没弄明白，这也怪不得他：他没有足够的世界知识。

还有一个原因是，英国人根本没料到香港会这么快地交出去。我前天的文章忘记说，英国人原来估计租约延期不是问题。本来也不是问题，只要他们闷声大发财，则中共的原定计划是在九七之后维持原状，可惜港督麦里浩犯了大错，结果英国不但得归还租借的新界，连永久割让的九龙和香港岛都得归还，这在他们确实是始料未及。

即使如此，他们那阵也没想忙着搞民主化。但六四大屠杀却爆发了。六四在英国引起了特别强烈的震荡，香港人的示威大概是华人世界中规模最大的。当时英国下院为此爆发激辩，反对党指责撒切尔政府出卖了香港人，使港民从此有被屠杀的危险。

总之，英国人发现自己处在一种道德困境中，那就是把几百万港民交给了一个居然有本事屠杀本国公民的独裁政府，这从此成了英国政府的心病。请别忘记，西方殖民政府虽然是侵略者，人家可是有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的，不会像本坛某些网友那样公开主张在伊拉克实行三光政策。

此后英国政府便竭力弥补过去的失误。当然，他们不可能把几百万港民撤回英国（撒切尔就用这话堵死了反对党的嘴），不过好歹还是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例如增加了撤回英国的人员比例（诸如在殖民政府服务的汉奸，如果到了一定年限，便能获得英国护照，等等），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匆忙实行民主化。在英国鬼子看来，如果香港民主化了，港人的福祉也就多了一重保障，这看上去很天真，不过除此之外，他们还真想不出什么高招来了。

因为老芦“英国在住”多年，好歹还是知道点内情的。这就是我知道的英国为何先不搞民主，临到撤退前才匆忙上马的真实原因。可惜这却在深通阴暗心理分析国术（其实是党术）的中共眼里成了“搞乱香港”的阴谋诡计，而且还居然被拥共派当成法宝使用到今天，当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2004 年 4 月 30 日

中共当然能“养”好香港

适才在论坛里看到网友阿随说，事实证明，香港只有英国才能管好，完全是扯淡。那意思似乎是说，中国人同样有能力管好香港。

以阿随之聪明，竟然看不出来，光提出这种主张本身，就泄露出了痞子们对自家治国的能力是何等彻底缺乏自信。一个泱泱大国而且是古国的执政党的代言人竟然说出这种弱智话语来，怪不得他那贵亲戚爆牙痞子李肇星那种白痴也能做外交部长。

阿随，你本该说的是，我们把香港从英帝国主义者残酷的压迫剥削之下解放出来，从而挽救了它的毁灭，保障了它的繁荣昌盛，而不是什么我们能和英国人干得一样好！

中共当然能“管”（＝养）好香港。别说在今天，就是在物质匮乏的 60 年代，大寨都进入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还专门有高射炮营住在那里为他们打散雹子。中国这么大，只要从每个人头上刮一元人民币，也就足以把全体香港人民“养起来”了。

这正是中国以及香港的悲哀所在：倾全国之财力，去战战兢兢地扶持一个前殖民地，生怕万一砸了，在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这份吃力，连我这局外人看着都实在不忍心。

想当初，香港不过是英国的一个小小殖民地，而且是有色人种为主的殖民地，不像澳洲、新西兰、加拿大那样是白人为主，所以人家根本连管都懒得管，只提供法治框架，其余就让当地土著去折腾。在英国本土，政府还要操心公民福利，千方百计解决就业问题，而在香港，殖民主子根本就不管土著死活，既无福利政策，也无就业政策，对香港经济从来采用放任自流的方针，自己一点心思都不操，听任当地土著去自己折腾，就这么着还折腾出奇迹来。

轮到我党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国际金融界稍微刮点微风，中南海就得吃定惊散，生怕香港经济崩盘，把白鬼子建设出来的花团锦簇的繁荣世界给毁了，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没本事，为此不惜把全国家底都

贴进去，比当年补贴国有企业还累。90 年代东南亚经济危机，国际金融专家算定香港已经到了危险线，港币注定要贬值。不料过了那危险线许久，港币还坚挺不倒，让专家们大惑不解，最后才发现原来是中南海可着劲儿往那臭岛上倒钱。于是纷纷曰：如此人为“救市”，其实只能保住中国领袖的面子，对香港经济并无好处。

老芦不懂经济学，不知道专家们说的是否在理，只是觉得我党运气未免也太糟糕了些：刚刚把香港接收过来，就遇到了经济危机，以后又是禽流感，接着又是萨斯，最严重的问题还是香港企业纷纷内迁大陆，导致产业空洞化，以致出现了大英治下从未有过的失业现象。这结果就是，我党贴了无数钱，港民还是不满意，普遍怀念生活在米字旗下的时光。于是中共不惜重金人为养出来的一个“大陆人与狗不得入内”的 show case，或曰“党办现代租界”，除了买来各方的怨恨，凸显民族自卑情结之外，什么意思都没有，不能不让人为我党悲从中来。

就这德性，我党还指望去吞并台湾，再养上一个地方。可台湾那么大的 GDP，咱们养得起么？当真是天狗吃月亮，想的倒美。

其实，不是中国人不如鬼子，是我党那些痞子不如任何正常人。香港是中国人建设起来的，不是英国人建设起来的。英国人的功劳，正在于人家没有像共党那样，去不遗余力地“管理”（破坏的别名），而是实行无为而治，从而使中国人靠苦吃苦做发财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大陆原来之所以那么落后，正是因为共党认为没有他们的领导，则人民连怎么过日子都不懂，所以不管什么，都要加以无微不至地指导，从田地该翻多深直到头发应留多长，无一不加以严格管理，最后是把国家管得奄奄一息，这才不得不放手，而这正是中国出现经济起飞的基本原因。

赵丹同志临死前说，党管文艺太紧，文艺没希望。其实何止文艺如此？党无论管什么，什么都没希望。建“国”50 多年正反两面的经验反复证明：党管农业就要饿死几千万人，管工业就要国民经济崩溃，管教育只会出白卷英雄张铁生，管文艺就只有 8 个样板戏。请问建国 50 多年来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出了个可以和 20、30 年代那些巨星比肩的文学家、艺术家、学问家没有？就连拿诺贝尔奖的 4 个华裔，都不是我党办的学校教育出来的。聪明人都生在“解放”前或是外国，岂非咄咄怪事？

后毛时代的改革开放，就是党有限度地退出管理，不管在什么领域中，只要我党退出管理，那就立见功效。何时退出，何时见效；何处退出，何处见效；退的越多，效果越大；彻底退出，彻底见效。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铁的事实？解散了公社，农村立刻就能吃饱饭了。允许百姓自办企业，经济立刻就连上几个大台阶。我党就像毒日头，那毒焰退出一点，原来给烤得干枯得冒烟的土地，立刻获得了救命的阴凉。

总而言之，我党就如《侠客行》上那个狗杂种石破天一样，练就了一双伤人于不知不觉之间的毒掌。无论碰上什么，什么都立刻枯萎而死。我党不知道自己的威力有多大，却推而广之，在心底认定是全体中国人无能，比不上洋鬼子，这才会去干那种不惜重金养香港的“婢学夫人”的奴才勾当，还有阿随这种同志以耻为荣、“反败为胜”，出来吹捧奴性最佳表演，歔欷！

2006 年 2 月 7 日

纵有医国手，难回欲堕天

——门外汉胡说中国经济症结何在

这标题平仄显然不对了，请内行幸勿讥笑，反正不是写诗。

老芦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只有点贫下中农的朴素感性认识，还全是看电视道听途说来的。不过最近草庵居士和人之初等网友为此事发生辩论，我觉得涉及的是大家都关心的重大问题，所以不揣冒昧前来胡乱插嘴。我这可真是胡说，须知我谈这个话题和谈别的问题不一样，心里可真是一点数都没有，完全是为了求教高明而献丑。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凯恩斯主义”

草网的文章里都提到过这些概念，我觉得与我的朴素理解完全不一样，十分困惑，所以特地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看草网的意思，似乎“经济过热”是中国人发明出来的外行用语，没有英文来源。后来他又说，“经济过热”只是一种症状，并非病因，用它来描述经济形势，如同用“发热”来描述“肺炎”似的，非常不科学。

对此说法我无法理解。我已经在英文跟帖中指出，“经济过热”这词本是鬼子发明的，长期生活在西方的人都应该时时从电视里听到这类话，中文的相应词汇不过是直译而已，并不是我党生造出来的。它或许不是经济学的专门术语，但现在连专门的经济学家都使用这个词。我转贴了几个帖子，其一是某经济学杂志编辑使用该词的例子，另一个则是诺奖获得者使用该词汇，因此，似乎不能说这词只是外行用的。

当然，“经济过热”或许只是一种症状，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又何尝不是？那难道不是表象而是原因？就连“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这些词，其实说的也只是现象本身，并非什么“病因学”。

那么，到底什么是“经济过热”呢？据我的粗浅理解，似乎那是指投资活跃，规模太大，经济成长过快，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货膨胀，如果通胀不受抑制，接着就是“泡沫爆破”。这正如一个人超常发挥猛跑一气一样，如果超负荷太大，难免虚脱甚至倒地而死，实行所谓“硬着陆”（这也是外行俗话渗入经济学的又一例，如今这词连专业经济学家都在用）

反过来，所谓“经济过冷”，似乎是指投资稀少，生产停滞不前，经济萧条，常常伴随所谓“通货紧缩”，也就是物价下跌，东西卖不出去。

至于什么是“通货膨胀”，似乎大家不学也都知道，那就是物价普遍上涨。这原因已经在我转贴来的那个英文帖子里说明白了：当社会处于零失业（即全员雇佣）时，如果社会成员包括集团、政府和外商的需求量超出了社会生产的供应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支出大于收入，则物价必然上涨。

由此可见，通胀的出现，其实是因为求大于供，支出大过了收入，这在任何一个自由经济国家都会发生，并不是如草庵居士所说那样，只会发生在封闭经济里。实际上，从我到西方后这近 20 年的时间里，已经经历过起码 3 次明显的通胀，还不算不明显的缓慢通胀在内。反过来，毛时代的中国经济绝对封闭，但从来没有显性通胀，因为政府人为冻结物价，使需求和生产彻底脱节，因此只会有所谓“供应紧张”，但物价却是 30 年一贯制。

那么，为什么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过热”会导致“通胀”？这道理其实不难明白：如果投资非常活跃，生产规模急剧扩展，对原材料、能源等的需求必然剧增，如果市场供应不上，根据价值规律，这些东西的价格必然上涨，引起继发性的生产成本上升，一连串链式反应的结果，便导致物价普遍上涨。如果这势头不抑制下来，则物价暴涨必然导致消费者购买力下降，使市场需要下跌，投资者因为生产成本增加和市场锐减的双重打击，就会陷入破产，接之而来的便是萧条，这就是所谓“泡沫爆破”，也就是“硬着陆”，于是过热的经济便骤然冷却到奄奄一息的地步。

由此可见，所谓市场经济的最关键问题就完全是维持供求关系平衡的问题。理想状态是供求达到平衡，则此时经济既不热也不冷，堪称健康成长。如果求大于供，则经济呈发热状态，可能引起通胀；如果供大于求，则经济成了性冷淡之冷美人，呈萧条状态，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一般伴有通货紧缩。

这在嘴上说来简单，但要在实际中控制它简直是不可能的。西方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至今摸索出来的一点办法也就是靠国家银行来实行所谓宏观调控：经济出现过热征兆时，银行便提高利率，打击贷款投资热情，吸引游资化为储蓄，投资规模也就限制下来了。相反，若经济呈现过冷趋势，则银行便减低利率，鼓励大家投资。这套办法非常有限。所以经济学家才慨叹说，经济如同天气，根本就无法准确预报，也无法人为控制之。

如果明白这粗浅道理，则不难看出 Doooku 网友“宁热勿冷”的主张根本不成立。缺乏依托的高增长根本就是无法持续的，泡沫迟早要爆破，到时便一定会跌进经济危机，如 90 年代中国经历的那样。

慢说中国，西方也是这样，前两年ＩＴ行业红极一时，什么“dot com”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今安在哉？全爆破得一塌糊涂。 那还只是一个行业，如果是全国规模就更可怕了，日本爆破快 20 年了吧？到现在也没完全爬出来。

所以，国家银行要干的事，就是密切监测经济增长趋势，如果有过热迹象，就赶快刹车，减小投资规模，使经济恢复到供求平衡态，则这就称为“成功实行了软着陆”。难处是在于判别经济究竟是热还是不热，如果刹车太早，则不必要地打击经济成长；如果刹车太晚，则难免气泡爆破引出全面灾难，而这比天气变化还难测。据说人家作过实验：让风水先生和国际金融专家同测股市走向，专家们预测的还没风水先生准！

从上面的外行论述也可以看出，草庵居士先生开的方似乎也不成立。他似乎以为通货膨胀可以由政府行为主导产生，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当然，如果政府过份超支，也能加重甚至引发通胀，但一般来说，我觉得通胀是经济自然失衡的结果，并不是政府的有意行为。他的主张其实不是什么“通货膨胀政策”，而是“货币贬值”。这两者不见得是一回事。国家银行有时主动将本国货币贬值，那目的是刺激出口，间接抵制进口，并不一定在本国引起通货膨胀，更不能解决他指出的那些中国经济的顽症。

草先生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说法似乎就更不能成立了。据我所知，所谓“凯恩斯主义”由英国剑桥学者凯恩斯提出，是与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相对而言的，在 30 年代大萧条中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成国策大规模实验而取得成功。

凯氏的主张其实并不难懂：和主张自由资本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经济学家相反，他认为自由经济靠本身努力根本就无法脱出经济危机，必须由政府动用国家权力主动干预，也就是进行赤字预算，由国家拿出钱来兴办大规模工程，“拉动内需”，人为造成市场需求，提高人民购买力，促使百业复兴，以此来脱离萧条状态。

由此可见，凯恩斯主义的针对性很明确，其实是针对经济萧条而不是针对经济过热开的“国家干预”的处方。这一套朱熔基在 90 年代使用过，想以此结束当时的经济萧条。现在的问题不是萧条而是担忧是否过热，老凯这套根本就用不上。

另一问题是，如果中国经济现在真处于过热状态，本身就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危险，再由政府去人为制造通胀，岂不是雪上加霜，促使泡沫爆破？在这种情形下需要的是“软着陆”而不是使用通胀的手段去加速“硬着陆”。

所以，愚以为草先生的主张似乎都不能成立，类似中医所说的“治热症用热药”。

中国经济的不治之症

对这点草先生已经说了很多，当然都是事实，不过愚以为，他重点抨击的“跑马圈地”现象在上世纪 80 年代很严重，但现在似乎已成历史，最要命的问题不再是国家圈了地后，用低廉价格和优惠贷款卖给太子党们，再由那些人转手高价卖出牟取合法暴利，而是两个问题，一曰潜在的金融危机，二曰恶性私有化。合起来说便是“烂污国家资本主义”。

所谓金融危机，是指国库早就是空的了。据秦晖先生发表在《世纪中国》2002 年 9 月号上的文章披露：

> “民间学界比较乐观的说法是：财政赤字只是政府负债冰山上的山尖。如果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等隐性负债，则「中国国家综合负债率」至少在 70%以上，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亚洲许多国家以及欧盟（60%）和美国（60%）。而比较悲观的说法，如北师大锺伟计算说：国家财富总体上是资不抵债，负债总计约为 12.8 万亿元，相当于 GDP 的 140%，而「国富」的资产方总计约九万亿元。换言

> 之国有资产净值已经是负数——净负债 3.8 万亿元或曰负债率 36.2%。最近「国有股减持」风传一出股市就暴跌至几乎崩盘，就是国有资产在国民心理上的「负数效应」的体现。”

换句外行人都能懂的大白话来说，便是整个国家实际上已经财政破产，国家的全部资产变卖了也还不出政府欠下来的巨额债务！

这话我早就在小说《虎子的天空》里说过了：

> “比起正宗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发生在咱们那集羊头和狗肉于一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要难复苏得多，因为咱们有大批的国有企业。它们成了无数的医不好的慢性失血溃疡，谁也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如果国家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割了这些溃疡，社会马上就要大乱。如果看着不管，则国库里的血迟早要流干。其实国库早就是空的了。银行之所以还在装模作样地运转，完全是靠那巨大的私人储蓄量。大概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存户同时去提取所有的存款，全国金融立刻就要破产。”

这话其实没有说出真正的症结何在：那溃疡堵不住，还不光是考虑工人失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而是因为咱们的体制决定了无数寄生虫一定要把国民财富吸干为止。哪怕是上帝派夸娥氏的两个儿子下来，也没本事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无数大山搬走。

因为中国一直在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所以全世界都以为中国还是个国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其实根本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了。过去几年中，中国悄悄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成了“烂污寡头私有制”，

马克思有句名言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用这话来形容中国新生官僚资产阶级正是恰如其分，一点都不夸张。

从 90 年代末期起，中国以所谓“界定产权”的名义进行了大规模的恶性私有化，基本方式无比下流：企业将创立之初的原始资本当成国家的股份，把历年滚动积累增长的次生资本算成“企业集体资产”，被企业的几个寡头私分，这些人再以“优惠价”把大部份国股买下来，于是国有企业便如此被堂而皇之“合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

如此一来，自然国库里的钱便滚滚流入私囊，这种烂污国家“资不抵债”还有什么奇怪的？

更令人痛恨的是，这些私有化了的企业因为有所谓“国股”，照样被当成国家企业由国家供养，继续吊在国家脖子上吸血，成了银行贷款当仁不让的对象。贷款前既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需要担保，又不必为坏帐承担刑事责任，于是，国家的资产便进一步变成坏帐落进了私人手中。

国库的钱吸干了，寄生虫们的主意又打到百姓头上去，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它和西方股票市场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上市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真正的民营企业没份，根本无费厄泼赖可言；第二，股票从来不兴分红。买进股票来如果不抛出，便一万年也不会生出一分钱来，因此，股民们唯一的牟利希望就是毫无把握的“低进高出”的投机活动。这种下流玩法，其实是企业空手套白狼，不用花一分钱便圈了草民的血汗钱。如果股民投机失败，那就完全成了义务捐献。

上面所说的中国经济的弊病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如果让国内的经济学者来数落，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最令人绝望的是，这些毛病根本就无药可医，因为整个制度都烂透了，请问你不改变整个制度，如何来治标？姑不论草先生开的方子不对症，光是在“过热过冷”上作文章就绝对不是办法。须知中国经济和西方根本就不一样，前者是烂污型官僚资本主义，后者是受政府间接调控的自由资本主义（此处针对官僚资本主义而言，说的不是古典自由资本主义）。例如上述通货膨胀的前提在西方是“零失业”，但谁都知道中国一直存在着严重失业问题，但照样可以有严重的通货膨胀。

治本的唯一办法，我过去早说过多次了：请党和国家全面从经济生活中退出来，放开舆论对贪污腐败的揭露监督，厉行法治，成立绝对不受党和政府控制的反贪委员会，实现司法独立和金融独立。但在我党领导下，有可能做到这点么？恐怕最乐观的同志也不会做这个梦吧？

所以，中国过去 20 年的“经济奇迹”，其实是所谓“日落前的辉煌”。一切迹象都显示出王朝末年的情景：经济畸形繁荣，全民醉生梦死，当朝者倚冰山如倚泰山，贫富两极分化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地步，社会危机

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盘根错节，社会革命风雷隐隐，纵是玉皇大帝下凡也要摇头。

一言以蔽之，如果中共当局还不醒悟，大刀阔斧地整治自身，则中国迟早要走上两千年的轻车熟路，再一次堕入造反斫杀的阿鼻地狱。

2004年5月6日

中国有法西斯化危险么？

最近某先生似乎对中国法西斯化的阴暗前景忧心忡忡，还把美国的“中国老手”的文章贴了出来。 这种忧虑，其实我也曾有过，那是因为现阶段的中共政权组织方式和意识形态都与法西斯有类似之处：

一、两者都是极权体制（当然现在中共已经较毛共时代弱化了很多，基本处在半极权半威权的过渡阶段）。

二、两者都奉行民族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

就是因为这种忧虑，我才写出了《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了世界的龙头老大——公元 2093 年中国大事记》。但即使在那小说中，我也指出了中国和纳粹德国的根本区别：那便是，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从来是咱们的千年传统，法西斯主义在咱们的土壤里根本无法存活，勉强效颦的唯一结果，便是全民族切腹自杀。

熟悉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人都能看出上面列举的相似之处不过是表相的，现代中国和纳粹德国有着根本区别：

一、纳粹运动和国际共运一样，都是人民运动，是人民意志的充分表现，或曰“我们的民主”，跟西方的“他们的民主”完全不同（可悲的是，海外“民运”人士以及国内外大多数“民主派”对民主的理解，都是这种“我们的民主”，对此我准备写另文详述之），这种运动需要真正的狂热志士作为中坚力量。但今日中国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志士，有的只是漫山遍野的“犬儒”。所以，中国根本没有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可以说，是社会道德全面崩溃消解了中国再度出现狂热群众运动的可能。

二、同理，中国不可能产生纳粹领袖。诚然，中共现在也把民族主义当成官定意识形态，但纳粹领袖是真诚信仰他们的教义，认定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人种，必须向外扩张争取生存空间，而中共领袖则完全是用煽动仇外思潮的把戏来制造政权合法性，产生国民内聚力，两者的动机和着眼点根本就不同，前者的视线向外，后者的视线向内，前者想去抢夺别国的领土，而后者深知自

己面临的深渊，煽动民族主义思潮不过是为自保掉的花枪而已。他们不但没有“优秀种族”的错觉，而且对国际实力对比和国内的重重危机心知肚明，在外交上从来是色厉内荏，凶恶样子是做个人民看的，其实真正奉行的是现实主义，对老美只有吃亏让步的份。

三、因为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纳粹是外向的、富有侵略性的、向上的、积极的人民运动，而现代中共则是内向的、毫无进取精神的苟安政权，把这种垂死腐朽的政权看成是纳粹那种生机勃勃、向外扩展的积极性政权，恐怕是极大的智力笑话，只有老美的“中国通”才会闹出来。

持这种论调的人，我看除了把表象和本质混淆起来之外，还有概念不清的思维毛病。在他们看来，似乎实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家就一定是法西斯国家，这完全是扯淡。中国今日实行的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也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乃是权力和金钱相结合的官僚资本主义。这在第三世界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过去的南韩和缅甸），但与纳粹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后者实行的应该说是在强势政府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可以勉强名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实行的这种烂污制度，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威胁世界和平的强大实力，只不过是制造大面积溃烂的腐败温床，唯一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国家彻底烂掉而已。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不认为法西斯化是中国的现实危险。某先生的杞忧，似乎说明他对国内情况的了解还不如出尘西贝公子。两年半前西贝公子还是“爱国贼”的时候，上此坛来跟咱们打架，有人说中国要去侵略谁谁，公子冷笑曰：现在谁会干这种事？顶多捐点钱！让我笑不可仰，从心底喜欢上了这实话实说的小伙子。

但这么说并不全面，法西斯和现代中共的仍然有可怕的共同点，就是对人道主义的极度蔑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特别凶残。中国人民被我党的“斗争哲学”训练了足足半个多世纪，许多人变成了毫无道德顾忌的心狠手辣的恶棍。我党的“民族主义”宣传和中国的固有势利传统结合起来，就大批量生产出了种族主义者。一旦国家政权弱化到无从控制民众的地步，则这些人就会立刻便成土法西斯分子，将神州大地变成种族灭绝的修罗场。

因此，全面说来，只要中共政府存在一天，就一定会秉承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优良传统，不可能变成经典的法西斯政府，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但也不大可能效法前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把种族歧视当成国策。问题在于中央政

权一旦极度弱化或是垮台之时，全国各地恐怕就要冒出大大小小的米洛塞维奇来，专门屠杀异族本国同胞。这种现象当然不是经典法西斯主义，或可命名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吧。

这在我看来就是中国真正的危险，亦即急剧恶化的腐败让政权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崩溃，引发社会动乱，将全国再度沉入血海。既往的两千年历史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表明，统治者绝对没有这能力来逆转（或哪怕仅仅是抑制）这种玉石俱焚的自杀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化目前“和平恶变”为良性和平演变、避免革命惨祸的途径，是形成民间强大的忠诚的反对派，对此我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不幸的是，这个任务对于只懂“我们的民主”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智力官能。所以，那肿瘤是一定要溃破的，中国一定会再次堕入万丈深渊，在死了七八亿人之后，回到新石器时代，“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就是上帝早在女娲补天时就给咱们安排下的“中国之路”。

2004 年 5 月 17 日

法西斯：共产主义的下一站

记得林思云曾在旧作中惊叹国内犯罪手段之残忍，末了自然是归结于中国人特有的劣根性，最后再从生物学上找原因，在九哥的启发下，以不伦不类的“鸭雁理论”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把“以文学比喻代替逻辑论证”的背时传统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之所以犯这种错误，在我看来，还是思云太年轻，对传统社会缺乏了解，因而把我党造出来的孽统统归结于中国人固有的民族性，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固然有着遗害无穷的背时传统，对此老芦批判的已经够多了。但今天的中国人变成这个鬼样子，主要还是我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我在昨天的帖子中说了，我党当国半世纪，主要的历史贡献就是“破善立恶”，把全国人民成功地痞子化了，制造出无数心狠手辣的歹徒来。

我党能够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靠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集洋匪与土匪之大成，把两者最恶毒之处浑然一体地结合起来，由此制造出一种史无前例的邪教，一劳永逸地败坏了全国人民的心术，为未来中国铸下了一把无比锋利的达摩克利剑，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这巨大的阴影中讨生活。

这痞子教的洋来源很容易发现，如果谁和东欧出来的学者打过交道，应该能看出他们和西欧人的素质区别，那便是缺乏人道情怀以及由此导致的强烈种族主义气息。

记得电视上报道过一位哈萨克斯坦的孩子。这孩子本来是孪生子，可惜弟弟却长在了他肚子里。随着他长大，那弟弟也逐渐长大。他到十来岁时便完全成了个孕妇模样，只能去医院动手术，把那怪胎取了出来。那怪胎完全是个妖怪模样，手术室护士当场就晕了过去。

哈萨克斯坦还是个相当落后的国家，大夫们从未见过这种怪事，于是便把孩子的母亲叫了进去，让她看看自己造了什么大孽，让孩子怀上了这样的妖

怪。那母亲本是个无知农妇，一见之下魂飞胆裂，从此日夜生活在良心折磨之中，忏悔自己的罪孽祸延后代。

该国国民都是回回，自然还是搞男尊女卑那一套。既然太太出了这种“丑事”，那丈夫当然有权把她休了。于是那女的从此便过上了以泪洗面的日子，日夜担忧自己被丈夫遣弃。而这一切都是那些丧尽天良的大夫干出来的好事。

这事后来捅到了媒体上，引起了国际学术界注意。某位加拿大女专家知道了那女的不幸，便自费前往该地，仔细检查了那怪胎，给出了科学解释，然后特地跑到那家人家去，当着那丈夫和三亲六戚的面，以国际第一权威的身份郑重为那妻子平反，说这事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根本不是她的责任。不仅如此，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很小，她以后如果再怀孕，再发生此类事件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请她和她家的人放心。这下才算驱散了笼罩在全家之上的阴影，那家人感激涕零，以好酒烂肉大肆款待远方来的好心人。

最令我气愤的是，在电视上，那女权威问那主刀的女大夫，她为何要让那母亲看那妖怪。那女大夫竟然自豪地对着镜头说：“我们觉得，有必要让她知道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居然怀上了这种怪物，以后她才会尽到母亲责任，仔细照料她的孩子！”

这种事，在西方医院里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好几年前，太太去作过个小手术。医护人员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微不至的人道关怀，让我在感动之余都觉得不耐烦。那种手术，在国内医院不到一小时就打发了，也决不会作全麻。可在这里，太太身上却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标签，上面一一写明她的血型，何种药物过敏，普鲁卡因皮试结果，等等，等等。她被推进手术室的路上，经过了重重关卡。每到一个关卡，便有白衣天使拦住，无比温柔地询问姓名，验明正身无误，再一一翻看那些彩色标签，对着本子逐项校对无误之后，还要查问本人血型如何，是否青霉素过敏，直到一切正确，才放人过关。等到手术完毕推回病房，护士还详细对我解释大概多长时间会醒过来，可能有些什么反应，等等，等等。

当然这也不算稀罕，这儿的规矩，就是大夫或护士在作某种处理之先，哪怕就是只打一针也罢，也一定会为你详细解释他 / 她要干什么事，目的是什么，你会有什么感觉。

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太太身上那些五颜六色的标签，以及进入手术室前的重重盘查。当年在国内，我没少听到过张冠李戴的手术事故，例如把害阑尾炎的九岁女孩的卵巢切了，却把害卵巢肿瘤的妇人的阑尾割了，等等。

就是这些亲身经历，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把人当成人看待”，而这就是我到西方后的最大收获。

共产主义阵营却缺了这条。早在“苏东波”发生前的 6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便发现马克思主义少了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人道主义。这批评也被苏共接受了，记得其时苏联很嚷嚷了一阵“建设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许多动人的作品就是那时问世的。那些作品强调的是发掘人的内心境界，尊重人的价值，等等。

或许就是因为作家们的努力，苏联解体后才避免了南斯拉夫式的种族灭绝。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解体竟然能如此平安无事，让人不能不由衷羡慕。最令人羡慕的还是，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后，本来已经完全掌握了大局，可仅仅因为有三个大学生不幸被坦克压死或打死了，人家就吓得自动下台，请戈氏复出。这种事，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

其所以如此，是我党当国后，不遗余力地破除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操——人道主义。因为没有经历过西方式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人道主义传统历来很薄弱，但儒家和佛家的伦理道德毕竟还是有很多的替代内容，例如“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积阴德”等等就是。可这些精华部份却被我党全力破除了。

凡是过来人都记得，我党不遗余力诋毁的，就是“良心论”和“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在我党看来，世上只有战斗友谊和阶级仇恨，也就是利害关系，绝对没有超阶级的爱和超越阶级立场的良心和同情心。对“阶级敌人”残酷无情竟然被捧成了最高美德，是我党以“投名状方式”考验每个人的革命立场是否坚定的最主要指标。如果谁要是把“阶级敌人”当人看，轻则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重则是“丧失革命立场，变节投降”，连自己也要贴进去，据说那是“为剥削阶级殉葬”。

就是这种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大规模罪恶教唆，使许多国人化作了凶残的豺狼，内心只燃烧着永不熄灭的仇恨的熊熊火焰，因而连罪犯作案的手段都特别残忍，而且往往是毫无必要的残忍，简直就不是正常人类能理解的。例如窃

贼们潜入某家，带不走的东西非得统统破坏了才肯撤退，浑不顾“在现场呆的时间越长，被擒的可能性就越高”的常识。这种丧失理智的作法，似乎已经成了国内窃案的常规。

这说的当然是极端情况，可惜党教育的威力之大，已经渗透到了大部份人的骨髓里，以致无论政见如何，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们的共同特点，是根本就不知道人道主义为何物。

眼下就有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思云和小安子对回回的态度完全是针锋相对的。思云同情回回，他对 911 事件的态度人所共知，最近还在给我的答帖里坚持“革命自有后来人”。而小安子绝对是铁杆仇回分子，和老牌“民运”领袖余大郎、偷笑、吃草的老虎等网友一样，主张靠铁腕镇压，无情地压服（姑不说是杀光吧）回回们。

可有趣的是，这两人在对“神风特攻队”的崇拜却完全一致。凡是看过我批判“神风特攻队”文字的读者，大概都能看懂那写得再明白不过的中心思想。我不是反对为国家自发地英勇献身，我反对的是在陷入绝境后还不投降，不惜以全民毁灭的方式去维护“民族尊严”。

怕读者不明白这点，我还特地举出那位太太杀死自己的三个孩子后自杀，以此激励丈夫去作人肉炸弹的惨剧。更特地点了日本军人在战争后期号召“竹枪抗战”，甚至郑重其事地策划全民自杀（所谓“一亿玉碎”），并在南洋诸岛上导演出“全员玉碎”——将士切腹或吞枪自杀，妇孺投崖蹈海而死的惨祸来。如果不是天皇及时干预，阻止了这种大疯狂，说不定如今世上也就没有日本这个民族了。

请问思云、安子，对这种丧心病狂的惨祸，你们是否也要加以肯定？这些烂事，难道不是神风特攻队的逻辑延伸，难道不都是强制洗脑，以民族主义全面彻底压倒正常人性的结果？

对这种灭绝人性的病态“悲壮美”的崇拜，其实源于对人命的高度蔑视，而这正是我党教育的硕果。思云在答我的帖里说，打仗是不能讲人道主义的，否则就是宋襄之仁。这答话雄辩地证明该同志的毛著学得何等之好，用得何等之活。毛在其雄文里就曾谴责过“宋襄公式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既然如此，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细菌战等等，也就不是可以谴责的了，否则岂不是实行“宋襄公式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大概就是为此，思云才出来歌颂当代“神风特攻队”——那些劫持客机撞毁世贸大楼的匪徒们，而安子也才出来歌颂新时代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主张用铁腕镇压起来反抗侵略的回回们。

于此可以洞见，表面针锋相对的两派，其实不过是一丘之貉，都是党妈妈教育出来的好儿女。

我觉得好笑的是，既然思云要歌颂 911 事件，认为那是应该的，那还有什么道义立场去谴责老美在伊拉克滥杀平民？同理，既然小安子要拥护老美在伊拉克滥杀平民，那还有什么道义立场去谴责回回的恐怖活动？

正是这种对人命的彻底蔑视，正是我党在大家灵魂中注入的“人命轻于草芥，‘道义’重似泰山”的毒素，使得今日中国人个个成了丧心病狂的种族主义者。在这种大背景下，央视出了那种丧尽天良的有奖征答活动便毫不足奇。看着网友义愤填膺的抗议之时，我不禁要 cynically 想，倘若死的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回回呢？那么，义愤家们还会如此慷慨激昂么？

大概到本世纪末，大多数中国人也不会明白把对人命的珍惜与所谓“道义”等意识形态、阶级立场、种族区别脱钩，不会明白在政治或种族背景下出现的对人命的尊重，绝对不会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只会是实行双重标准的伪善。这其实就是老芦上网五年，先作“汉奸”，后变“满遗”，最后成了“回回”的社会原因。先知先觉总是孤独的。

正因为此，咱们的下一站就是法西斯。可惜咱们将来实行的法西斯主义决不会是德国发明的正宗，只会是南斯拉夫的盗版。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勃兴时，引起了中国艳羡，先总统蒋公曾立意效法。这毫无可耻之处，因为那时法西斯主义还没露出后来的狰狞面目来。相反，它当时为被列强欺负的弱国，作出了比俄国更光辉、更值得效法的示范。遗憾的是，老蒋没认识到民族性的差别。哪怕在意识形态同一的意大利和德国之间，法西斯主义的野蛮程度（也就是它的坚定性）也截然不同，其所以如此，乃是民族性区别所致。法西斯主义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盛行，原因再简单不过，中国乃是懦夫之邦，历来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根本就没有对外扩张的民气基础。

这当然不是说法西斯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我早说过了，它不会使中国变成威胁国际和平的野心国家，却会是咱们切腹自杀的好快刀。未来中国如果真成了法西斯国家，那也只会是内向型的，也就是米洛塞维奇之类的屠杀少

数民族同胞的种族主义。所以，咱们的土法西斯是专门对着自己人的，君不见无数的米洛塞维奇正活跃在网上？从决战、安魂曲、余大郎、飞云直到幼稚无知的冬冬，又有哪个不在使尽浑身解数，为煽动民族仇恨推波助澜，为明天的种族灭绝苦心酝酿？

皇天在上，我党还是别垮的好，省得那无数的民间米洛塞维奇变成了有权参与或影响国策制定的政客们。

2004 年 9 月 12 日

中共政府是什么样的“父亲”？

——也谈全民和解

前天轻易不写政论的九哥写了篇关于六四的文章，顿时彩声雷动，随网率先跟贴赞好，说是他反对激进改革，主张民族和解，云云。

我也反对激进改革，也主张全民和解。其实，我大概是网上最先提出这主张的同志，早在两年多前就写了《中国需要民族和解》，后来又写了《勇作“专制制度辩护士”》和《争作布衣“帝王师”》，反复提倡实现民族和解，朝野和解，并首次提出民间反对派应该采取主动，实行朝野和解、良性互动等一系列重要主张。

九哥这篇文章，我觉得有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他看到了传统的重要，认识到传统中国人对政府的态度和西方截然不同，是把“国”看成了“家”的放大，而政府则是全民的家长。能看到这点，知道尊重中国的国情民俗和传统，我觉得颇不简单。

中国人自晚清以来犯下一系列错误，就是没有英国思想家洛克在 17 世纪就有了的见识，不知道在改革社会制度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传统的作用，以为可以斩断传统，凭空从海外搬来一个空中楼阁，先是龟孙中山的“民国”，后是毛泽东的“苏维埃共和国”，导致中国陷入至今无法拔出的泥塘中。

我想，或许就是这尊中国政府为“家长”的说法打动了随网的心。兴许，他心目中的所谓“民族和解”，就是人民争作政府的孝子贤孙，任凭政府怎么作践都逆来顺受，甘之如饴，回归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优良传统上去。

但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是谁在人民心中播下了仇恨和不满的种子？谁该为民族分裂负责任？第二，怎样才能消除朝野之间的仇恨？实行民族和解？主动权到底是操在统治者还是人民手中？第三，即使以中国传统标准而论，现在的中国政府又算得上是什么称职的“家长”？用老祖宗的话来说，咱们现在需要的到底是“君君”，还是“臣臣”？

先说最后一个问题。众所不知，无庸置疑，传统中国人丝毫没有“权利”（rights） 这个观念，连相应的汉语名词都没有，不得不从英文里翻译过来，直到 21 世纪，许多中国人（起码是我见过的绝大多数网民吧）还缠夹不清，把它和毫不相干的“权力”（power） 混为一谈。从头到尾，整个儒家学说讲究的就是责任与服从，丝毫没有谈到过臣民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或许就是我党对“人权”特别反感，而大众也默认我党对它的否认的传统原因吧。

但为人常常忽略的另一面是，儒家并不光强调臣子的责任，同样强调君父的责任。我在《丑陋的大陆人》中早就指出过，一部《孟子》，讲的最多的还是“君君”，也就是提出了一系列君王应该尽到的责任。老孟还强调指出，如果尽不到这些责任，那就是独夫民贼，“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为寇雠”，哪怕是起来把暴君干了，那也不过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整个儒家学说讲究的其实就是这套，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皇帝的先得自己像个皇帝的样子，做父亲的先得尽到父亲的责任，如果“君不君”、“父不父”，则必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势必导致“臣不臣”、“子不子”。虽然古人不懂从理论上抽象出“因果关系”的概念来，但这里孰先孰后、孰因孰果还是说得清清楚楚的：你要不让臣子视你为寇雠，前提是自己不能把臣民视为草芥。

这道理其实是明摆着的：您要臣民奉你作大家长，fine，您先做个当爹的样子给咱们看看，这才谈得上“父慈子孝”，是不是？

这坛子里许多人都是当爹或是作娘的，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就连老芦这最不称职、最粗暴的爹，也绝对不会把孩子挣来的血汗钱悉数贪污了，自己拿去花天酒地、养二奶、嫖洋妓嫖到欧美去，更不会因为孩子稍微不满发两句牢骚，就说人家“反革命暴乱”，用坦克装甲车机关枪对付，杀得血流成河，至今还要骚扰迫害侮辱诬蔑难属，一面改口说是“风波”，一面还有那本事厚着脸皮说镇压是完全必要的！

世上有这种爹娘么？共党政府配以人民家长自居么？呸！

由此观之，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答案便不言自明：

第一个问题，谁该为民族分裂朝野对立负责任？

人民中间仇恨和不满的种子，不是什么“民运”或“反华势力”煽动起来的，而是共党五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夙兴夜寐、倒行逆施、胡作非为亲手播下的。

毛共执政三十年，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动用国家威权机器，非法剥夺了一部份人民的“人籍”和一切公民权包括最起码的生存权，当成所谓“阶级敌人”任意杀害、掠夺、羞辱、迫害、践踏、蹂躏，犯下的滔天罪行，甚至超过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更不用说犹太人毕竟还是异族，而咱们的“阶级敌人”可完全是同族。后毛政权贪污腐败，疯狂掠夺民脂民膏，甚至打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首次血腥镇压学生抗议示威。

须知士子在传统中国历来享有崇高地位，历代君王可以残暴镇压所谓“农民起义”，但从来不敢随便镇压抗议的士子，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率领的大规模抗议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六四之前，只有军阀段祺瑞打死过几个请愿学生。全国舆论为之沸腾，鲁迅甚至把 3 月 18 日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因此黯然下台，至死都后悔那致命的大错。犯法火烧赵家楼的五四运动不必说，30 年代学生在南京示威，冲击政府机构，打伤外交部长和教育部长，政府不但没有镇压，蒋公还多次接见学生代表，劝说他们散去。连杀人魔王毛泽东都不能不承认：“谁敢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但比起六四来，北洋军阀杀的区区两个人又何足道哉？！

所以，制造朝野对立、人民分裂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中共这个窃国弄权、残民自肥的伪劣假冒“家长”！

第二个问题：消除朝野对立，实现全民和解的主动权操在谁手里？

我虽然在旧作中呼吁民间反对派采取主动，化解朝廷的疑心，实行朝野良性互动，但根本问题还是在朝廷一方。谁才能提供实行全民和解的条件？当然是竭尽全力制造社会不公，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引起民怨沸腾的政府。老百姓能作什么事？难道只许朝廷胡作非为、横征暴敛，不许百姓抱怨，发上两句牢骚，就是“煽动犯上作乱，破坏民族和解”？要釜底抽薪，首先得统治者遵守自己定出来的法律，严惩那些贪赃枉法的狐群狗党，厉行法治，从根本上解决由滥用权力疯狂掠夺人民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

最起码的，是朝廷必须拿子民真正当人看。眼下就明摆着一个向民赎罪的机会：温家之宝已经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六四是“风波”，不是什么

“反革命暴乱”，等于间接承认当初李鹏政府宣布“反革命暴乱”是犯下了无耻欺骗公众、以虚假罪名放肆屠杀无辜民众的故意杀人重罪。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不为那些死于“风波”的受害者平反，至少要停止对那些难属的无穷无尽的迫害与骚扰？还有什么理由逮捕根据党章规定的正当渠道上书言事、为民请命的蒋彦永大夫？

当然，考虑到那下流政府的难堪处境，要指望他们学着作个真正的“家长”根本就毫不现实，他们能学着去掉点流氓气就是苍生之福了。其实要做到这点也不难，本人早就给流氓政府仙人指路过，指点了既能保住他们的宝脸，又能为死难民众有效平反的高招，那就是使用“右派改正”方式，悄悄地以“误伤的好人”的名义为死难同胞逐一平反，并立即停止对难属的骚扰和迫害，对他们 15 年来遭受的一切心理损失和物质损失作出充分的赔偿。

干这些事，本身就是实行朝野和解、化解民间仇恨与不满的最起码措施，不但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样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果连这些起码的事都做不到，那只能说明下流痞子党毫无实行朝野和解的诚意，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倚冰山如倚泰山，一心一意要贪污腐败、残民以逞地蛮干下去了。他们自绝于人民倒没关系，只可叹中国十几亿百姓必然要作他们的殉葬品，在下一轮大砍大杀中尸横遍野，让历史上所有朝代交替之际的大动乱大屠杀都瞠乎其后。

2004年6月20日

李外长的“国际土相”

最近敬爱的李外长在香港公开侮辱新闻记者，质问曰：“你的爷爷奶奶有向英国人要过民主么？！”

文明国家中还从没见过有哪个外交官出过如此令人骇然的洋相，干出如此狗屁倒灶的烂事来，说了如此涵义无穷的蠢话，当真可算古往今来腾笑万邦第一人。此举让我党的痞子本色暴露无遗，所以准确地说，这不是“国际洋相”，应该是“国际土相”才对。

凡是生活在西方的文明人都知道，政界最不敢得罪的就是新闻界的“无冕皇帝”们。当初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时，饱受新闻界的折磨，被媒体指控贪污，不得不上电视去仔细汇报经济收入，还承认收过选民赠送的一只小狗，说那就是他接受过的全部“贿赂”。他落选后，憋在心头的怒火便发作出来，冲动之下跑出门去对记者团说：“你们以后一定会想念我：没尼克松让你们糟蹋（kick around）了，你们怎么办呢？”在咱们看来，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嘲讽，可人家还从没见过如此粗暴的政客，全场震惊莫名。直到今天，尼克松的传记片还要放出那镜头来。

他从此跟新闻界结下了不可解的冤仇，多年后这宿怨便发作出来，让他吃尽了苦头。我常常想，如果水门事件是与记者团关系极好的罗斯福或肯尼迪干的，没准就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不会被揭发出来。罗斯福在任时，普通美国人竟然不知道他下肢瘫痪，而这完全托新闻界的福——记者们从未在照片和新闻电影上暴露过他这缺陷。

所以，没什么比李外长的这一壮举，更能说明中共政权有恃无恐、轻侮藐视代表民意的传媒界到了何等地步。这种粗暴的烂事，温文尔雅的英国绅士们是绝对不会干出来的。那些被李外长任意侮辱的家奴们，恐怕更要怀念异族主子了吧？同样作奴隶，在外国主子那儿还更能享受到人的尊严。

这还不光是个轻侮民意的态度问题，上文已经说过，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外交官说过如此涵义无穷、如此言简意赅的错话蠢话，那就跟抽丝剥茧似的，可以演绎出多层意思来。

敬爱的外长无非是说：你爷爷奶奶生活在英国人治下，同样没有民主，怎么那阵不敢去跟主子要？现在香港回归了，你怎么突然胆气十足了？

任何一个头脑明白的人都可以读出那潜台词来：

第一、李外长以高官之身，向全世界宣布中央政府其实是类似外国殖民当局式的主子。

第二、香港人过去和现在都是亡国奴，差别只在主子不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主子”。

第三、既然外国主子不给民主，中国主子当然也不会给，否则就是丧失民族气节。

第四、香港人民对外国主子要比对中国主子的态度好得多，竟然拥护服从大英，却专门跟中共过不去。

如果有哪位党卫军同志不同意我这理解，欢迎反驳，并指出误解或曲解之处，谢谢！

外交官本来该由最有口才、最机智善辩、具有丰富的国际政治事务知识的学者出任，如国府时代的胡适和蒋廷黻然。如今中共却推出这样一个语惊四座、腾笑万邦的好角色出来！到底堂堂大国还有没个起码的“非痞人材”？

据说李外长也是大学毕业生，怎么就会痞化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党的教育真是威力无穷，900 万方公里的土地上居然也就找不出一位配穿大礼服的绅士来！就连说话得体，举止稳重大方的同志都竟然成了珍稀物种。敬爱的江总当众梳头、抢带勋章、被华莱士盘问得张口结舌、窘态百出于前，朱总理、李外长粗暴呵斥香港记者于后，毛主席留下的痞子皮，我党到底何时才能彻底蜕出来？

我想，敬爱的党中央应该吸取这沉痛教训，下大力气改革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免得以后再出这种专门砸党国牌子的“职业外交家”。

记得某“民主党派”人士在文革前说，民主党派有学无术，共产党有术无学。他没说的是，我党办教育就是专门传授“有术无学”，革命接班人也专从有术无学的痞子里面挑。所谓“学生干部”，不管是学生会主席还是党团干

部，只懂一门国术——“拍马整人神功”。爬到那权力阶梯上的，自敬爱的胡主席以下，全都是此类宝贝，李外长不过是其中之一。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择劣录取”的负选择制度，未来中国只会出一代又一代的烂污痞子“国务家”和“外交家”。

2004年7月3日

难产的“国教”

昨见某网友献国策，说当局应该挂羊头卖狗肉，以所谓“新儒教”复兴中国，接着又见到另一位网友的帖子，提出中共应该淡化民族主义宣传，代之以儒家思想。

这些说法基本没太多道理。我昨天已经说了，以为东亚是靠新儒教起飞的，这是大陆人自己编造出来的神话，人家根本就不承认，而且也不是事实。例如香港和新加坡，靠的完全是英国人建立的法治系统。因为这些地方受过传统中国文明的影响，就硬要把它们的起飞说成是孔老二的胜利，我看完全是自作多情。

儒家思想我相当熟悉，迄今还没有找到它有利于现代化的内容。相反，它基本上是和社会进步唱反调的。正如费正清正确指出的，儒家只谈臣民服从的道德责任，从头到尾没有“权利”的概念。这种学说当然要为古往今来一切统治者欢迎。很难设想把权利观念加入儒家学说后，还能让它保持原来的框架。

而且，西方社会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人类不倦追求物质享受，由此导致了无数科学发现与发明。但儒家的中心政治追求，是以牺牲物质享受，压制物质追求去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这就是他们幻想的“治世”，为此政治理想，不惜搞“重农抑商”，人为压制一切科技发明，导致中国社会冻结了足足两千年。在如今这人欲横流的时代，您若还想让众人效法颜渊，睡在陋巷里“一箪食，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岂不是做梦？

这不是说儒家就没有一点合理成份。我过去说过多次，孟子是个好同志。他对君王提出的那一系列要求，应该写到宪法里去，作为未来中国统治者必须凛遵无违的古训。

其实儒家学说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深刻思想，完全是一堆武断的伦理条条，不但没有什么哲学内容，而且逻辑上混乱不堪，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属于伦理学。但他们却根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莫名其妙公式，

把伦理学放大成了政治学，把个体的道德责任当成了群体社会关系的实质，由此推出了所谓“德治”。

无奈的是中国人实在是太习惯这套道德治国的把戏了，因此，未来中国如果要保持传统的连续性，就不能断然抛弃这一条。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局现在嚷嚷什么“德治”，也不是毫无原因。

但问题是统治者搞这套，只是想使人民变成传统社会那种死心塌地的奴才，却方便地忘记了亚圣说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为寇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这些话才该写到宪法里去。正如我在《丑陋的大陆人》中指出的那样，一部《孟子》，讲的最多的还是“君君”，也就是统治者应该尽到的责任。您要讲“德治”可以，请忠实于亚圣，先从您本人做起，尽到统治者的道德责任，再来要求臣民效忠，行不行？

总而言之，所谓“德治”，其实是对统治者的要求而不是对人民的，用现代话语来表述便是“以德治国”。恐怕连白痴都能看出来，那“治国”是统治者的事，跟草民毫无相干。上面说了，儒家中心学说就是一系列道德要求，而孟子他老人家已经反复强调过，那首先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上梁不正，下梁就有充分的权利去歪（虽然他不知道使用“权利”这概念，但那意思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上梁根本就没有权力去惩罚下梁，否则就是“网民”。凡是熟悉国学的同志都该看出来，我这完全是忠实传述他老人家的精神，并无歪曲之处。

因此，要作道德表率的恐怕是中南海那夥人，而不是人民。而要做道德表率，对不起，请先把黑箱子打开，让诸位的收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民监督诸位的实际道德表现，做到曾子说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行不行阿？

所以，如果来真格的，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作伪君子，则我党根本就吃勿消。而如果不从统治者先做起，自己暴戾恣睢、纸醉金迷、骄奢淫逸、无恶不作，却装出圣人模样来，单向要求百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一饮一啄，莫非党赐”，指望着 21 世纪的人民还作上世纪 50、60 年代那种冤大头、阿木林，未免翻错了日历！

简言之，所谓“新儒家主义”如果是真货，光中国统治者那关就过不去。敬爱的江总嚷嚷“德治”，不过是以为大众和他一样，丝毫不懂国学，随他怎

么胡弄都行罢了。而如果不来真的，光是要求百姓绝对服从，死而无怨，请问中共有那脸提倡么？人家可是相信“伪善也是善”的，您要人家自己承认是桀、纣一类昏君，不管怎么作贱百姓，人民都只能服从，不能怒也不能言，连“道路以目”都不准，岂不是强人所难？

所以，这方子根本就不对症，有趣的是，他们连那方子里该有些什么药都没说出来。如此当医国手，倒跟只知道背“八珍汤”，不知道那方子含哪几味药一样。

尽管如此，我觉得这说法还是有点道理，何也？他们看出了中国这个民族与众不同，需要一个官定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而这在我看来就是东西方文明冲突造成的最大难题——自从西学冲毁了孔家店之后，咱们到现在也没找到个代用品。

凡是熟悉中国历史的同志都知道，中国和西方中世纪以前一样，有个事实上的国教，也就是孔教。当然它和纯粹宗教的差别很大，但其社会效应却颇有共通之处。也就是说，它的基本教义是全民信奉的共识，而它规定的行为规范为全民一体凛遵（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由此提供了社会的内聚力，导致了社会的稳定有序。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了，就是这玩意冻结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儒家也因此被费正清誉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保守理论体系”。

但这一套只适用于封闭系统，只能用于“安内”，却丝毫不能“攘外”。等到迎头碰上鬼子带来的先进文明之后，它反倒使国人陷入瘫痪状态。这点连晚清的恭亲王“鬼子六”都看出来了，记得他在反驳朝里的“清流”们时说，如果背诵圣贤之道可以退敌，则他一定背诵得比谁都响亮。

于是圣贤之道只好遵循“优胜劣败”的无情规律，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此后中国便进入没有官定意识形态的混乱状况，虽然老蒋试图用“三民主义”来取代，但孙大炮的杂烩实在没水平，无法箍住那散了的“桶板”。直到毛朝建立，这才恢复了全民信教的统一安定状态，可惜那信的却是祸国殃民的邪教之最邪者。

等到改革开放，这玩意就被中共统治者自己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凡是长了眼睛的同志都能看出来，今日中共和毛共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是一个毫无信仰的世俗权力集团，而后者是一个信仰坚定的邪教组织，对此我已经在《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中充分论证过了。

随着马列主义毛思想被扔进茅坑，中共又试图用“民族主义”来作为官定意识形态。但哪怕是从他们的切身利益来看，这也完全是饮鸩止渴，向自己的脚背放枪。其恶果我已经指出过多次了：

第一，它使得现代中国人纷纷变成种族主义者，激化了国内的民族矛盾；

第二，它煽起的仇恨不是按中共希望的流向流往美国，反倒大部份指向从来不对中国人权说三道四的日本头上去；

第三，对外开放是中共赖以苟延残喘的命脉，而仇外思潮则普遍引起西方文明国家的反感，塑造了完美的“择恶固执”的“共产恶魔”形象，毫无必要地造成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为了百姓过嘴瘾，导致国家丧失双边关系的实惠。这种蠢事，也只有中共才干得出来；

第四，它逼得政府丧失了外交中妥协周旋的余地，把中共自己逼到了“不统一台湾便成汉奸”的困境之中，它更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民意牌”，为野心勃勃的军界强人恶虎添翼，并在民间制造出无数的“义和团”，迟早要把仇恨的矛头指向“丧权辱国”的中共政府头上去。

所以，看来“民族主义”作为替代国教，迟早也要进入“历史垃圾堆”。中国人再度面临没有官定国家意识形态的困境。那“新儒家”的神话之不可行我早在上面说过了：一种思想要能成为国教，前提是大部份国民相信它。但在一个开放系统中，传统儒家那种愚民学说决不可能让全民信服。而如果按亚圣那套去改造它，则先从统治者那儿就通不过。

其实这困境我早就发现了，一直在想：政教合一早就在西方抛弃了，为什么咱们到了 21 世纪还需要一个官定统一意识形态来指导全民？记得我在旧作中给中央建议过，彻底放弃设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作法，改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像西方那样，对各种思想包括宗教兼收并蓄，政府严守本份，只管执政就行，不要擅权入侵它管不到的精神领域里去。

但难处在于，正如洛克说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都必须充分考虑到传统，否则不会成功。而在中国，政府从来不但是行政权威，还得兼作道德权威，国人从来需要相信一个由政府制定提倡的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这种事实国教，则人民必然皇皇如也，茫茫如也，焦急不安，神魂无主，根本也就不会尊重一个不同时是道德权威的世俗政府。这就是为何有许多同志提出候选国教的传统文化心理原因。您说这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才好？

2004年8月15日

“两个中国”的难题

这说的不是台湾问题，而是大陆自己的“心口疼”。所谓“两个中国”，指的是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

这话还是鬼子给我的启示。我看过本鬼子写的关于中国的书，那家伙曾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据他说，其实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农村。两者的关系其实是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农村之于城市，比殖民地还不如，不但是城市的掠夺对象，而且农民备受城里人鄙视和歧视，比印度人受英国殖民者的欺负还恶劣百倍。作者还说，一般外国旅游者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实，去中国只能看到城市中国，而占幅员和人口绝大部份的农村中国是什么样，他们连最起码的概念都没有。

我当时看见那话还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过后越想越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咱们欺负起乡下人来，绝对只会超过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主对黑奴。农民天生就是干贱活的命。90 年代末我回去了一趟，发现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全让农民给承包了。就连我原来在的那个厂子也如此。对此无比恶劣的同族歧视，竟然也就没谁觉得不正常。

这种状况当然是中共执政后造出来的人为景观，并非从老祖宗那儿传下来。说来也非常富有讽刺意味：我党靠农民痞子起家，可进了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实行户口制，从此剥夺了农民进城的神圣人权，堪称古往今来见所未见。

这还不算，此后农村完全成了提供工业化原始资本的唯一来源，让老毛这前农民子弟黑了心地爱怎么剥皮就怎么剥。亏他还好意思说什么“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大批斯大林的什么“剪刀差”，其实比起中国农民来，苏联老大哥真是在天堂里了。

老邓的仁政之一，便是给农民松绑。农民这才算是过上“解放”以来从没见过的好日子。可惜后来发展沿海经济，却又走上了“城市剥削农村，沿海剥削内地”的传统老路子，再度造出了 20、30 年代那种畸形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以农村经济的凋敝为代价换来了局部高光点的发达。

可笑的是我党还煽动“民族主义”仇外思潮，而竟然也就有那么多无知愤青傻傻地上当，全然不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都没达到现在这种吓死人的高峰。国内几乎没有哪个行当的市场没被鬼子坚决、彻底、全部、乾净地占领，连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牙膏，如今都由鬼子的公司生产。

我党爱国的方式确乎与众不同：当初袁大头被迫签订了《21 条》后，给全国官吏发了秘密文告，谆谆教诲大家牢记国耻，以求日后咸鱼翻身，骑在小日本头上。21 条的主要内容无非也就是个资本输入。历史的讽刺是，当初老袁被迫接受人家的资本输入，如今咱们是跟妓女拉客似的去苦苦哀求。如果说前者是“强迫作爱”，后者则是“投怀送抱”。可笑的是妓女反倒成了“民族英雄”，而被强奸的老袁反倒成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桩上的卖国贼！中国人的脑袋，确乎有点特别。

扯远了，还是来说农村吧。那天我看见某网友转贴来的“民工荒”，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人家是认真探讨中国的实际问题的。今天老狼转了一堆帖子来，也是谈实际问题的，我每份都仔细攻读了一番。其实这问题早就由秦晖先生发表在《世纪中国》的论文中说得非常清楚了。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经济转型，乃是“以权力集团化公为私、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为最突出标志的恶性私有化”。正因为此，郎教授这位“中国兰博”绝对只会翻船，只怕要让人家告到家破人亡。

我对这问题的态度，早在《我看“中国之路”》的旧作中说过了，是非常矛盾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因此，实行私有化、全面走资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我党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因为中国背上了那个共党极权包袱，这走资必然是恶性走资，以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为最突出的特徵。

而这就决定了咱们的改革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因为第一，真正的民企只会被官僚资本窒息而死。自由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余地；第二，权力疯狂转化为资本的结果，是在一个穷国中制造出了比美国贫富差距还要悬殊的社会不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咫尺荣枯异，惆怅难再述。”以此而能长治久安者，古往今来，未之见也！

要预防大规模的社会骚乱爆发，唯一的办法是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放开对言论的管制，实行舆论监督和施政的透明化，同时厉行法治，制止官僚阶

级对人民财产的大规模侵吞，并迫使已经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退到和民族资产阶级平等的同一竞争线上去。这也是早在几年前就说过的老话了。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我党看来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简直就完全丧失了自我完善的起码弹性。第二就是毛主义的流毒实在太深重，人民实在是习惯于“均贫富”的洗脑，“消除社会不公”的口号很可能被党内野心家们接过去当成打倒“走资派”的武器，再一次弄出“均贫富”的毛式革命来，使得刚刚走上资本主义康庄大道的中国再次跌进“烂污社会主义”的粪坑。

这两个难题，只怕是万能的姜子牙复生，也绝对想不出解药来。

此外还有那“两个中国”的严重问题。如上所述，中国的经济起飞，其实主要是城市中国的起飞，代价就是农村中国的相对贫困化。而这就是为何那个“民工荒”转帖让我非常感兴趣。

任何脑袋明白的人都知道，中国沿海地带的起飞，靠的不是什么“党的英明领导”，更不是什么专制制度，而是海外华人的大量投资加上农村提供的廉价劳力。这起飞得以实现，靠的主要是运气，一是东南亚经济危机迫使港澳把工厂内迁到大陆去谋求廉价劳力，降低成本，二是港澳台新等国已经进入从劳力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转型时期，所以趁机把这套本该淘汰的名堂转移到大陆去，来个“余热发电”。天时地利加在一起，才烘托出了党卫军们吹到天上去的“奇迹”。

可这奇迹的基础非常不稳固，中国的经济起飞，靠的主要是比欧洲 19 世纪还残忍的“血汗工厂”。其掠夺对象便是农村殖民地提供的大量超廉价劳力。这些人之所以愿意遭受那种惨无人道的剥削，完全是我党“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政策倾斜”。农业税高到使种田无利可图，当然城里的血汗工厂再水深火热，也不愁招到滚滚而来的新时代“包身工”。

胡温当政后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又动用那可怕的权力杠杆，把“政策倾斜”扳了回去，造成了人口的逆向流动，以致城里出现了“民工荒”。

这在我看来完全是好事。谁都知道，工业生产周期比农业短得多，创造利润当然就比农业来得快。这就是为何历届中共政府都要干那种“刮农村养城市”的伤天害理的事。这种短视政策的恶果，那个帖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农田抛荒，必然要制造出大量的潜在的“赤眉绿林”来，完全是为了将来的大爆炸铺垫乾柴和火药。

但这问题并不到此就算解决了。中国的农村如果不像西方那样城市化，则中国永远只会是个泥足巨人。可那帖子说得很清楚：中国农民数量实在太庞大，绝对不可能效法美国搞高科技、高效益的集约农业。某些食洋不化、只知猴子般效仿洋人的政府“智囊”主张“消灭农民”，却看不到你要是真把农民“消灭”了，则国民经济根本就没有能力容纳这些人，他们决不会就此变成白领或蓝领，只会变成无业游民，也就是未来的陈胜吴广。

那帖子的作者的主张也很明确：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毛的平均主义上去，用小块耕地把农民捆死在土地上，以此保证社会安定。当然，他主张的还是所谓“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并不是老毛那种使用国家权力无情剥夺农民迁移和择业自由的无耻手段。

但在我看来，这主意就算行得通，也绝对不是什么可持续发展。无法想象采用这种传统农耕方式能保证高产。在这种原始农业支撑下的“强国”只能是泥足巨人，迟早要被它自己的重量压垮——当粮食产量再也无法承受人口负担之日，也就是该巨人轰然倒地之时。更不必说如果全国绝大部份人口停留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始状况，民主化还能有什么希望。我早说过了，只有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的民主社会才是安全的民主社会。

许多人谈论过农村城镇化，想走鬼子的老路，用城市化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可惜这似乎也很不现实。中国的农业人口实在是太庞大了，要吸纳 10 多亿人口，只留下 1 亿以下的人口搞现代大农业，不知要造出多少城市来。就算把那些城市造出来了，可耕地也就所剩无几了。

所以，看来中国的“三农问题”和别的问题诸如民族问题、法治问题、台湾问题等一样，都是无解的。

要说无解，恐怕也不尽然。日本、台湾的人口密度并不比中国大陆小得多，人家又是怎么解决这“三农问题”的？可惜的是，咱们只知道把眼光投向美国，以为那就是人间唯一的奥林匹亚山，却从来不屑去研究一下国情与中国相似的民主国家走过的现代化之路。

其实我早说过了，就凭中国人口密度那么高这点，中国也不可能实行美国那样的经济自由。更值得注意的倒是日本、南韩和台湾，可惜到现在这话也没谁听进去。就连留日大贤们也似乎从来没系统介绍过一下日本的先进经验，唉。

四年半前，我写了《为什么要了解日本》。在其中我说，中国人是一个没有学习能力的民族，而要改变这一点，首先得去向日本人学习，把人家杰出的学习能力学来。做不到这点，则咱们永远只知道艳羡和赶时髦，只会跟孙大炮那猴子似的，以攀比最强国为“取法乎上”。

2004年8月29日

与某网友谈中国的民主化和土改问题

尊帖两份都已拜读，在第一个帖中，你认为近期内中国即有望实行民主，我的感觉如下：

第一，中国人民现在并不渴求民主，希望的是一个廉洁政权和公平的发财机会，而我党并不能满足这起码的要求，这似乎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搞不搞民主的问题，是共党有无决心和能力自我更新，实行开明专制的问题。要做到这一步，就意味着厉行法治，严惩贪污，逐步放开舆论管制，实行廉洁走资，完成健康的而不是恶性的私有化。

但我党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些，迄今为止，“胡温新政”已经证明自己是个比邓小平还左的政权，比老江还后退，严厉整肃网上异议人士就证明了这点。我估计在他们当国期间，除了搞点假惺惺的“亲民措施”，喊两声“均贫富”，做出点向毛时代回归的模样来之外，什么也做不出来。政治改革是没什么指望的。

但倒退回毛时代也绝对不可能，首先那些官僚资本家就不准许。

所以，你提出的近期内实行民主的问题，完全是远在天边的地平线，你越向它走，它离你便越远。

第二，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中国真能建立起能工作的民主社会来的话，那也只会更像日本的而不像美国的。原因很简单：拥挤社会不可能允许社会成员拥有美国人那样的自由。因此，咱们的最好前途，就是建成一个“实行民主，但无多少自由”的文明社会。

你提议实行土地私有化的第二份帖子我也看了，我觉得这工程（project）很有意义，坚决支持其他网友参与讨论。我本人对农村谈不上多少了解，只能为你们做啦啦队。这里只想提醒诸位一个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这就是咱们讨论中国问题必须牢记在心的基本原则。

“最坏处”是什么？就是中共突然因内讧或其他重大天灾人祸垮了，突然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使全国陷入混乱。

因此，考虑“土改”问题，在我看来首先要考虑两条：第一，如何通过土改减轻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动乱发生，或在动乱发生时，能减轻仇恨而降低仇杀、破坏的程度。第二，在日后动乱发生后，大多数农民能够拥有自己的生活资源，不至于突然因国家崩溃而两手空空。

其实两条说的是一件事：合理的土地改革，应该确保农民在国家垮台后仍然能维持基本生活，不至于因为生计无着而变成暴民。如能做到这点，则应该说是对中国的一个最大贡献。

2004 年 9 月 9 日

从“民可使由之”说到现代愚民之道

最近讨论这个问题，倒勾起了我青年时代的思绪。

《四书五经》我是在文革中偷偷看的。当时的感想是，那虽然绝对算不上思想家严密深邃、井然有序的智力架构，但确实是富于人生智慧的散碎格言集锦。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便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以及“民无恒产无恒心”。我至今觉得，这些都是陈述事实的大实话，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

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正解我已经说过了，那就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再表述，这儿的“可”作“可能”解，不是如我党欺骗宣传说的当作“应该”解。凭我对劳苦大众的理解，我觉得这完全是事实。无论我党如何号召“学习马列”，工农大众究竟有几个人能学会马列主义的最基本常识？能懂毛泽东“思想”那种下三滥货色就算不错的了。

作为工厂的“理论辅导员”，我深知向工人宣讲马列ＡＢＣ是何等痛苦。甭说什么《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家连“不须放屁”都会理解为“不许放屁”，任我解释那其实是“用不着放屁”也不行。记得我花了大概一个多钟头的时间，都没法解除对方的疑惑：“用不着放屁？那憋急了咋整？”我最后只好说：“那不是放屁，是放毒。”对方才恍然大悟：“啊，我说怎么不许放屁呢？原来是放毒！那当然不许了。”但为何“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是放毒，这可就绝对超出大众的理解力了。

所以，孔圣人其实是对的，不管什么社会，民就是不可能知之，只知盲目跟随精英。有“知之”能力的人，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孟子心目中的“劳心者”，而被社会环境剥夺了这种能力的人，就是他们所谓的“小人”和“劳力者”。而这就是一切洗脑愚民术的工作基础。

某人网友已经正确地总结了，祖传愚民有两道，一曰“消极愚民”，就是老子提倡的：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庄子也有类似主张，甚至发展到反智主义的地步，提倡“绝圣弃智，大盗乃止”。

两人的意思都很明确：让老百姓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机心，自然也就“朴鄙不争”了。这种一厢情愿的解决办法，在幼稚程度上倒跟马悲鸣那“杨正墨奇能永息干戈”有一拼。

另一种则是孔子提倡的“积极愚民”：“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以圣贤之道去为人民洗脑，通过“君子”们的言传身教，牢牢地把“上下尊卑”的观念灌注入百姓的脑海中，也就是王司令鼓吹过的“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从根本上阉割了百姓的反抗基因，“小人”都变成“易使”之辈，随你怎么糟践也死而无怨，社会自然也就达到安定团结了。

孔孟这套确实高明之极，全靠它才冻结了中国社会进步长达两千年之久。这种奇迹，根本就不是道家的消极愚民可以创造的。

这套到了我党手上，便发展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孔子所谓“君子”、孟子所谓“劳心者”，在现代就变成了“先锋队”。毛在《愚公移山》里早就指出，“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然后再靠这批人去“宣传民众、发动民众”，去用党教条为人民洗脑，再用仇恨把他们发动起来，为自己赴汤蹈火。

所以，从本质来说，我党并没有彻底背叛传统。相反，正因为他们搞的这套符合中国的背时国情民俗，试图引入先进外来文明的国民党才会不敌而败下阵去。

我党比传统君王的高明之处，乃是“汉家制度，王、霸道杂用之”，在推行愚民政策上，儒、道、法全使上了。

我在旧作中说过，孔孟之道取得空前成功的前提，是因为中国在地理上的隔离。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消极的佛教文明外，外来信息流入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没有必要搞道家主张的消极愚民，即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传统社会的稳定主要还是靠孔孟之道的积极洗脑实现的，统治者并未有意压制过人民接触外来信息。这一点在晚清表现得最突出，大量的西方新思想涌入国内，统治者从未压制过。官场的腐败更是毫不隐瞒，相反，一旦发现就痛加严惩并诏告全国，“使广大人民都知道”。

但这套在现代就不灵了，今天的中国有了西方世界作无情的参照系。为使积极洗脑有效，我党便不能不辅以道家提倡的消极愚民，即彻底剥夺人民的知情权，无论是对外来信息还是内部腐败秘闻都一律予以封锁，于此制造出了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为封闭社会。

现代无知青年只知道骂“封建社会”（中国其实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这我已经在旧作中说过，所以我一律用“传统社会”字样），却不知道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新”社会都比传统社会封闭一万倍。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光绪爷当年病重，上海《申报》竟然能随时刊登他的病情。相比之下，当初国外纷纷流传老邓病重，有记者问时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老邓究竟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里，竟然遭到该痞子的粗暴侮辱。这种国际丑闻，也只有在咱们那种“罐头黑社会”才会发生，而举国竟然无人以此为耻，李大使出丑反倒成了立功，因此步步高升。

除此之外，我党更效法秦始皇，使用严刑峻罚来恐吓民众，更直接肉体消灭异议人士。这在传统社会也是见所未见的。世人只知古代有文字狱，却不知道那一般是被罗织为谋反大罪才会锻炼成狱。如果单是发表言论，写下《问孔》《刺孟》的王充和《焚书》、《藏书》的李贽都没有送命。王充根本就没倒霉，李贽倒是给抓了起来，书也给禁了，但对他的处分决定不过是“押回原籍”而已，是他自己在狱中用剃刀自杀了的。以言论罪枪决遇罗克和张志新并割断后者的喉管，这还真是未之前闻。

因为我党集中国一切腐恶传统之大成，所以他们的政权的稳固程度也是空前的，甚至造出了文革那种充分证明政权稳定的奇迹来。彼时所有的党政机关都瘫痪了，军火遍于民间，但老百姓对伟大领袖的狂热忠诚程度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点。

可惜的是如传统社会一样，这种社会也缺乏生机。为了给这僵死的社会注入活力，老邓不得不打开国门，于是便从根本上取消了积极愚民的工作基础，官方意识形态如西汉古尸般迎风而化，彻底破产。我党今日最苦恼的，便是“愚民无术”，连可以“教化百姓”的教条都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除了饮鸩止渴、使用所谓“民族主义”为替代洗脑教材之外，便只能更加依赖封锁信息以及残暴镇压。但这根本不是解决办法。“民族主义”宣传除了煽起其实只会伤害党国的仇外心理之外，并不能转移百

姓对内政的不满，而消极愚民和严刑峻罚早在秦始皇手上就大规模使用过了，秦二世而亡的事实证明了那根本就是无效的。

因此，为我党借箸代筹，我还真为他们想不出个如何维持政权欺骗性的高招。现在 13 亿中国人里，除了流亡海外的郭罗基、高寒等背时货外，连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人都找不到。马克思要打倒的资本家如今竟然可以入共产党，中国百姓就算是再愚昧，也不会笨到连这种最下等的羊头狗肉都看不穿的地步。

所以，如今的中国完全是靠强力箍住的桶子，百姓对政府是消极服从而不是积极拥护。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桶箍断裂，全国立刻就要分崩离析，碎成七八十片。

这里面最令人担忧的，还是我党封锁信息造成的百姓愚昧。

因为限制人民自由接触西方资讯，只有少数自由知识分子能冲破封锁，但他们在获得良知之后又无法合法宣传，向百姓播散，于是便造成了“君子能学道，小人不能”的两元分离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西方的先进思想能流入，顶多也只能起到孔子说的“君子学道则爱人”的有限作用，却无法作到“小人学道则易使”。于是广大工农拥有的还是毛给他们铸就的暴民灵魂，渴望“均贫富”、深信“造反有理”，至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人道主义等好东西则从来无缘接近。这种劣等愚民政策，完全是统治阶级的自杀行为，等于为将来中国大动乱作足铺垫酝酿功夫。

为统治者计，最明智的办法，还是我早在刘荻案发生时便作出的建议：“开关延敌”——放开对国外思想、资讯的封锁，解除对舆论的管制。这并不会如统治者们担心的那样，引入滔天洪水，反倒有助于消除动乱苗子。本来如今的国门已经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了，真要封锁也封不住。如此不良不娼，到底算什么事儿？

2004年9月18日

司法独立：中共最低限度的政改

——兼论胡温新政必然无所作为

最近在网上断续看见，敬爱的江总似乎大势已去，胡温掌权已成定局。

这自然要让许多同志的肾上腺忙活一阵子，我倒觉得很无谓，因为对所谓“胡温新政”根本就没什么信心。

我早在青年时代便将我党的烂污制度和传统帝制作了系统比较，发现前者比后者在每个单项上都有极大退步。这其间的一条我已经在评点马悲鸣先生的《废除帝制80周年祭》中说了，那便是党的领袖跟帝王不同，没有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威，只能靠培植死党，形成势力，因此便造成了无穷流弊。

孔孟之道赋予了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臣民只能无条件服从。因此，哪怕是养在深宫、在朝廷中毫无人脉的太子，只要不是昏君，当国以后也绝无被架空之虞。旧朝权臣无论如何炙手可热，新君想拿下便能拿下，根本用不着暂时隐忍不发，先去惨淡经营，设法控制军队，再在朝臣和疆吏中厚植私人势力。如果他真的想肃贪，便连人皮都能剥。如果他想搞改革，则无论如何激烈也不会激起地方公开反抗，顶多只会招来守旧群臣的苦谏罢了。唯一的例外是削藩。汉景帝、明建文帝、康熙削藩都引起了叛乱。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清初三藩之乱利用民族矛盾作借口之外，反叛者也只敢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并不敢直接反抗皇帝。

正因为此，历史上的改革家们才把说服皇帝当成了推行改革的唯一途径。记得小学历史教科书总结戊戌变法失败教训，说什么“改革派不切实际地把改革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这只说明提出者根本不懂传统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从孔子开始就是这样：有抱负的士人要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绝对只有通过君王。你不想改革则已，想改革就只有走这独木桥。康梁的错误是不该介入帝后之争，害得改革变成了宫廷权斗的牺牲品。

中共烂污社会可不是这样。党的领袖根本就没有天生的权威（也就是合法性）。党内权力分配跟山大王毫无区别，也就是弱肉强食，谁的拳头最大，谁

就能成寨主，跟《天龙八部》上的“星宿派”的规矩也差不多。盗帮们抢夺起位子来还特别凶残。敬爱的刘主席和林副主席原来都是钦定接班人，可转眼间，一个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一个成了“反党集团头子”，统统不得好死。那种戏剧性突变，连《好了歌》的作者都无法想象。

由此便导致了“领袖权威逐代递减”的规律。第一代领袖是创业英主，整个天下都是他率领众兄弟抢过来的家当，其权威是绝对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他爱收拾谁就收拾谁，爱怎么“毁党造党”就怎么“毁党造党”，哪怕把大部分群臣放逐到“五七干校”去也没谁敢抱怨。

第二代领袖则是开国元勋，在军界、党务、国务院各系统都有袍泽，虽然论权威是全党全军全国公认的领袖，论实力雄厚在党内军内也拔头筹，但毕竟没有了老毛那种以一人之力即能翻江倒海的神通。与其说是独夫，莫如说是寡头独裁（oligarchy）的“第一小提琴手”。

第三代领袖则全是靠上峰提拔上去的，根本不是自己打出来的天下，不管是论资历、论才干、论实力都不足以服众。他老人家那龙廷能坐到今天，已经让我跌破了眼镜。

第四代领袖就更不用说了。小胡同志不过是“解放”后国家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一天革命都没干过，跟老芦也差不多，随便哪个离休干部的资格都比他老。在这种情况下，他究竟哪来的权威去压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然只有靠“组织路线”，也就是广植私人势力。

但这么一来就成了个“强枝弱干”的局面，决定了中央领袖根本不敢去得罪地方诸侯，免得自剪枝叶，危及自身，而地方诸侯因为中央有求于己，自然也就有恃无恐，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了。

由此必然导致中央权威的削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我党想拯救自己，就必须推动政治改革，如要有效实行政改，则中央必须有足够的权威，才能雷厉风行、令行禁止、自上而下地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而一个软弱的君主，即使有心，也无那胆子去推行会遇到严重阻力的改革；即使有心有胆推行，也根本就无法让诸侯凛遵无违，弄不好还要激起政变。所以，真正的改革的推动者，必须起码具备老邓那样的权威和实力。

因此，看来那“权威逐代递减律”决定了胡温只可能是庸主，什么大事都干不出来。

那么，什么是中共为了保权救党必须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呢？

现在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恶性走资形成了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导致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为下一轮大砍大杀作足了铺垫。如果这种趋势再不迅速扭转，则国家财富迟早要被官僚资产阶级吸光，人民相对绝对贫困化，导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待到我党因为腐败和“权威逐代递减律”的作用彻底弱化，形成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状态，这些社会矛盾就会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把中华大地再度浸入无边的血海之中。

要解决这严重的社会问题，党就必须痛下决心厉行改革，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在经济上实行廉洁走资，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厉行法治。要真正实行法治，最起码的必要条件是让司法系统从党国之中独立出来。党从司法系统中全面撤出，让司法系统有权以法监督党国要员甚至整个执政党。只有作到这点，才有谈法治的可能。而没有严格的法治，“反腐倡廉”永远只会是空话一句。

可笑的是，如此一目了然的事，中国的弱智“知识分子”们就是看不出来。无论老芦如何说破嘴皮，许多国人就是死也不明白“民主和法治”其实是可以拆开的，而且法治可以先于民主实行。眼下网上不就有人在满怀信心地谈论在胡温领导下“和平长入民主”么？我这个悲观的思想落伍者并不敢指望那么多，胡温能做到最低限度的政改就让我喜出望外了，而那希望实在渺茫。

这理由很简单：牵一发动全身。我党多年统治作了大孽，民间积怨如山。你要真实行司法独立，彻底割断党政和司法系统的联系，让后者变成民国时代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系统，那人民势必要背着干粮，在法院门口排成长龙，餐风饮露地去告状。光六四一案就够我党喝一壶的：假想最高检察院下令实行独立司法调查，查清案件真相，派出调查组到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查看绝密档案，并在民间调查死亡人数和具体死亡过程，我党吃得消么？

所以，光司法系统独立这一条，我党就绝对不会同意。连这条都不同意，还有什么可能实行民主化？中国的弱智“知识分子”就算再无知，也该知道“三权分立”吧？

而不实行司法独立，我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就永远只会是个荒唐笑话。

话说回来，即使不实行司法独立，我看也不见得是多大的损失——咱们这个国家实在是太烂太烂了，即使玉皇大帝他老人家下凡也得摇头。

假想司法系统真个独立了，那又便如何？只怕立刻就要变成全国最大的独立贪污王国，专业就是“吃完被告吃原告”。各省的“反贪局”不就是靠这玩意创收么？在我党控制下，好歹还有个约束，当真独立了，只怕是更加肆无忌惮。

想到这里，不由觉得好笑：要让独立的司法系统保持廉洁，看来还得成立个独立的“司法监察系统”，可那系统如果没有监察，肯定也只会藏垢纳污，于是就得成立独立的“司法监察监察系统”，然后又是“司法监察监察监察系统”……老公公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小姑娘，小姑娘拉着小花狗，小花狗拉着小花猫，小花猫拉着大萝卜……不知伊于胡底。

国外怎么就没有这些烂事？到底咱们是哪儿出了毛病，怎么会这么多事儿呢？请香港和新加坡来的同志给大家介绍介绍，那儿是怎样反腐的？为何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及香港的“廉政公署”之类机构不需要额外的监察？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胡温面临的问题如山，而又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这种种主客观条件，决定了胡温时代必然是无所作为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这就是我的预测，但愿不过是杞人忧天。

2004年9月19日

逐步回到“解放”前就是改革的努力方向

我昨天写了两个帖子，第一个是建议中共放开言论管制的。某人跟帖，在题目中说这么干就会天下大乱。网友问他该怎么办，他说只有坐待中共恩赐民主。我要求的不过是中共恩赐言论自由，据说这就会引起天下大乱，那一旦恩赐民主，岂不是更不得了么？连这种笑话都会闹出来，还配在网上发言？

拙作《重释“民主恩赐”论》的中心思想本来非常简单，可惜众目睽睽，全盯死在那“恩赐”上了，竟然无谁能看出那说得再明白不过的意思。

再说一遍吧：

中共乃是历史上对人民控制最严密的极权政体，用毛共“斗争哲学”去反对它以争取社会进步只会招致惨痛牺牲，诱使中共更加反动，本来想改革都不敢了。而且，即使用暴力把中共推翻了，局面只会更糟，导致毛式反动统治再度出现。因此，必须放弃用毛共的“斗争哲学”去反对中共的错误作法。

但这并不是说中共就会主动恩赐民主，咱们什么也不用做，静等明主恩赐得了。在姐妹篇《不是英雄是恶人》、《争作布衣“帝王师”》中，我提出了形成“忠诚的反对派”的主张，并建议民众斗争应该是争取具体权益、解决具体问题的“经济斗争”，如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然，其诉求必须是具体可行的实际问题，不是大而无当的空洞政治口号，而且应该在统治者的让步上限之内，以此形成民间的健康压力，促使统治阶级逐渐放弃非法权力，从而导致社会取得点滴进步。

但这并不能解决当前最迫切、最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恶性走资导致的极度社会不公，这不是什么个别贪官污吏的问题，而是整整一个阶级疯狂掠夺社会财富的恶性疾病。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统治者自己痛下决心作大手术根治。

那根治之策我也提出来了，就是两条，第一，“开关延敌”，放开舆论管制，实行传媒独立。第二，实行司法独立，党国从司法系统中全面彻底撤出，

让法律凌驾一切，监督管束一切党国要员以及共党本身。这就是真正的“法治”，rule of law。

顺便说一句，中文的“法治”似乎根本无法传达 rule of law 的涵义。所谓“实行法治”或“以法治国”，给人的感觉总是君王或执政党用法律去管束人民而不是自己，如同古代“法家”似的。

其实英文“法治”的意思，乃是法律才是具有最高权威的统治者，朝野一律凛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哪怕是太上老君也得乖乖臣服。“党大还是法大”之类的笑话，只会在咱们那个弱智之邦中闹出来。

但这两条看来都做不到。新闻界独立按说应该是最容易、最无后患的措施，但连在民间都引起如此强烈反对，岂还能在党内通过？它之所以引起反对，完全是中共长期散布的“恐乱症”使百姓丧失了判断力。其实一个政权并不容易垮台，哪有实行新闻自由便能颠覆以百万大军和各种高科技武器支撑的极权政体的怪事？

“恐乱症”其实是祖传国症。儒家把维持社会安定团结当成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政治理想，为此压制了自由工商业、技术发明乃至国民的尚武精神，使传统中国不但无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成了没有科学的国家，而且堕落为懦夫之邦，在历次外战中不堪一击，什么丑态都出过。

到了老毛手上，这套反动措施就发挥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他老人家心虚胆怯到竟然连农民的“鸡屁股银行”都容不得，为此反复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去“割资本主义尾巴”！敢问中国两千年历史上可曾有过这种笑话？

外国和中国的事实证明了这些无理压制完全是杞忧。别说农民养鸡养猪的小事了，现在咱们有了科学、有了初阶资本主义、有了强大的国防军，请问社会动乱了没有阿？反动的户口制取消前，拥护者不也口口声声说那会引起动乱么？现在怎么样了阿？那动乱在哪里？

因此，舆论界从党国中独立出来，在客观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没有多大可能引起社会动乱。过去管制舆论，好歹还有点“道理”——怕引起国民“思想混乱”，使主动洗脑失效。现在洗脑反正是不灵了，再没谁听信你那些鬼话，你管不管都没什么区别，继续压制舆论自由，反倒不利于揭发暴露贪污腐败。到底还有什么理由不放开？

但司法独立就完全不同了，我已经在有关帖子里指出：中共决策集团的形成方式，决定了中央权威逐代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胡温有心，形格势禁，也没有那实力强行压倒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完成这重大的政治改革。而这改革乃是中国变成文明国家的最低必要条件。做不到这点，再说什么“亲民”、“民主”，统统是大而无当的空话屁话骗人话。

谁都应该能看出来，我这不过是陈述一个事实，并没有什么主观褒贬的意思。你要是不同意也行啊，或证明胡温有意图也有能力实行司法独立，或证明不实行司法独立也能实行民主化或至少能根治腐败问题，这才是文明人的理性辩论，是不是？

你要歌颂明君不打紧，那是您的天赋人权。老芦不是“民运”人士，不会就此骂“共奴”，更不会把你看成是必须无情镇压的阶级敌人。相反，我也巴不得和您共唱“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Ｎ大，我们放声来歌唱”，只是您恐怕先得证明那明君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作明君才成。光骂“阴暗心理”（顺便说一句，对于政治家，人民就是得使用“阴暗心理”，这我早在《必须把政治家视为另类》中说过了，这就是西方民主的真谛）、“贱骨头”，似乎只能证明那“明君”之“明”须用辱骂来陪衬，本身就免不得一种阴暗下贱的气息，是不是阿？

某网友还写了个答帖，看题目似乎是主张实行“新权威主义”，把司法和新闻权收归中央，让我大惑不解：这两项权力不是从来都牢牢控制在我党手中么，哪有什么收不收的？

我昨天说，改革必须靠具有强大实力和权威的中央去推行。此话其实涉及到了共党社会和平演变的最大难题，亦即“为了分权必先集权”的悖论，也就是高寒最热爱的“辩证法”。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民主社会的构建原则是分权，而专制社会的构建原则是集权。专制制度中最恶者，就是共党和纳粹式的极权制度。在这种最反动的社会中无任何独立领域存在，所有的部门都牢牢地控制在党手中。

看过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翦伯赞一章的读者都应能看出，“新”社会比“旧”社会倒退了有多远：在共党接管之前，中国的学术界从来是独立的。无论是满清、是民国，统治者从来不会、也无权去管人家怎么做学问。可等共党来了，却连这点独立性都不容许了，把名教授们打下去，弄些学

痞来实行学术专政，还一蟹不如一蟹，最后连老翦那种为大师耻笑的半票友都成了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

就是这“一元化”坑惨了中国，扼杀了国家的生机。万恶的“旧”社会可不是这样的，早在民初司法就独立了，所以才有区区上海地方检察厅给国务院总理发传票的事。那还不是个例，当年鲁迅以个人身份和北洋教育部打官司，竟然告倒了教育部，顺利官复原职。这种好事，如今幸福地生活在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中的亿万“公民”们敢指望么？

国民党的党国相对于民初来说是个倒退。即使如此，舆论界和司法界基本还是独立的，并没有被国民党一手操纵。我记得 40 年代有人写文章痛骂先总统蒋公，马屁精们想搞个“诽谤国家元首案”，援引刑法的诽谤罪投诉，法院却拒绝受理。这种好事，如今幸福地生活在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中的亿万“公民”们敢指望么？

因此，说到底，所谓“改革”就是“改错”，也就是“开历史倒车”。从 1949 年起，中国这辆破车不幸被伟大舵把开进了死胡同。老邓发动的改革，其实就是把那车倒回去。可惜实在是行迷太远，积重难返，倒了 20 多年，至今还没有倒到当初开进来的那个岔路口。

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战略方向，换言之，所谓改革，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但愿能回到‘解放’前”，先让政治制度和经济所有制恢复到“解放”前的状态，也就是在政治上恢复民国时代的司法独立、舆论独立，在经济上恢复私有制。这些工作完成以后，才谈得上学习西方搞民主。否则所有的资源、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全都给牢牢地抓在我党手上，人家就是请你去执政，你也没那本事捏弄，是不是？

再说明白些：“改革”就是“独立运动”，原来被我党控制的一切领域一切部门都必须获得独立：军队、警察、国安、司法、立法、经济、文化、传媒、学术界等等都必须从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和党彻底断绝关系。这些其实就是“民主化”具体内容，也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先决条件。避开这些实际问题不谈，光知道空口嚷嚷“民主”“民主”，只能证明国人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那惊天动地的愚昧。

因为积重难返，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在我看来，上述“独立运动”能用半到一世纪的时间完成就算不错的了。这就是我为何说“开明专制是咱们能争取到的最好前途”。

但实行“开明专制”就必然要引出那个悖论来，也就是“为了分权放权，放各领域独立，必须有个具有高度权威和强大实力的中央政府”。

这道理是明摆的：你要党官僚从各领域退出，势必要触犯那些人的既得利益，更别说司法独立会引起一连串副反应，危及大批党官员的生存了。这种改革遇到的阻力将是空前的，恐怕只有老毛才有那本事强压下去。但如果谁有老毛那种空前的权力，他又怎么会愿意推动最终导致自己丧失权力的改革？

因此，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我党是唯一能给中国带来社会进步的政治势力，一切社会改革必须经过我党的推行或起码是默认才能实现，但因为社会进步将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我党已经构成了实现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悲剧在于，去除这个障碍只会重复毛式革命的错误，让中国在死了七八亿人后再度跌回黑暗时代去。

这就是“中国问题无解”的原因何在。记得在电影《列宁在 1918》中，列宁自以为聪明地说：“一个傻子想出来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这话用来描述革命那种烂事倒再准确不过：一代人干革命弄出来的灾难，十代人殚精竭虑也难以消除。

当然，或许前途也不一定那么悲观。共党拒绝或无能实行最起码的政治改革，允许司法界独立，这结果就只能是一天天烂下去，再加上我说过的那个“革命权威与时俱退”的递减律，最终总有一天，党机器要彻底烂掉崩解，各地处于事实割据状态。届时少数民族地区独立是必然的，那儿的汉族遭受大屠杀也是必然的，不过内地省份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未见得会悉数罹难，或许会出现几个省的“东南互保”也未可知。

这或许才是咱们可以指望的最佳前途吧？悲夫！

2004年9月19日

言论自由之陷阱

前见老狼上贴，认为刻下在中国行使言论自由必须由论者自律，并以独立的司法确保这种自律性，否则只会妨碍改革。花田八路网友回了个帖，南京老右便请教他如何界定“基本的言论自由”，接着又发表大作，认为中国人民现阶段确实享受到了基本言论自由。

这些谈论，似乎表明若干国人对言论自由是什么都还不甚了了。老右那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咱们使用某个概念，最先要做的事就是界定它。这里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就正于方家。

什么是“言论自由”？

按老右的理解，似乎言论自由就是私下骂我党的自由。因为国人可以私下骂我党，所以，咱们确实享受了“基本的言论自由”。

如此说来，大陆早在 60 年代末期就实行了基本的言论自由了。小芦乃觉醒最早的一代人，早在林彪事件发生前两三年就和个别人躲在阴暗角落里热情奔放地歌颂伟大领袖。几十年后我上网写的许多文章，其实不过是那些颂词的记录。如果当年我把那些话在公开场合说出，则下场一定比张志新还惨。

这就是咱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言论自由”。它的“中国特色”，是只能在私下场合行使。弄错地方就是性命交关的事。如今这特色是淡了许多了，但批评党国的话绝对不会见诸于任何一种传媒。这算是什么“实行了基本的言论自由”？

所以，言论自由最起码的一条，就是“公开合法性”，也就是说，政治反对派有使用公共媒体传播自己政治主张的合法权利。咱们有这条么？

什么是“基本的言论自由”呢？愚以为，那根本不是什么辱骂党国的权利。如果国民只能行使这个权利，那实行这种言论自由无非是把国内传媒也变成某些海外中文论坛那种大众排泄场所而已。

在我看来，“基本的言论自由”，就是庶民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政务有知情权，以及在公开媒体上进行辩论、批评和抗议的合法权利。如果改革要健康进行下去，我看少了这条绝对不行。

举几个例子吧。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党靠打“民族主义”这张牌来唤起民众对党国的认同与效忠，足足打了 20 多年。如今已经应了本人几年前的警告，彻底地将死了自己的军，把自己逼到了“不打台湾无以谢天下”的死角里，自行剥夺了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偏偏又出了个陈阿扁，看透了中共色厉内荏，专打“独立牌”作秀，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以制造两岸紧张来转移民众对内政的注意。弄到后来竟然出现了这种可笑局面：不是中共而是民进党人成了大陆“民族主义”喧嚣的最大受益人！

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局面，还是因为大陆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我早在四年半前写的《涔涔忧国泪，耿耿美芹心》中指出：老百姓总是务实的，如果老芦的反战文章能在大陆公众媒体上广为传播，人民具有就基本国策公开辩论的权利，则官方靠洗脑人为制造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怀立刻就会烟消云散。只要他们想到自己的独生子女会送命，想到战争带来的无穷灾难，原来支持打台湾的人不旋踵就会改变主意，政府也就用不着煞费苦心地突出自己布下的那个围城，从军人政变的阴影中逃出来。而海峡那边因为挨打的威胁淡化了，民众也就会把注意力从外交转移到内政上来，陈某也就无所施其伎了。

又如我上次说的那个官僚资产阶级大规模掠夺民脂民膏，旦夕之间变成巨富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造成贫富悬殊、威胁党国生存的最大隐患。如果人民在政策出台前有知晓的权利和公开批评质疑的权利，则企业法人代表以区区百多万就能买下价值近亿的国有资产的丑事又岂会普遍发生？

再如英子楼下文章指出，陕西某地民变，官方报导和海外报导完全不同。于是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便各取所需，大肆鼓噪，不但无助于问题解决，反倒加深了朝野对立，恶化了事态的发展。

从这些例子来看，改革要想进行下去，必须实行基本的言论自由，第一条就是民众有知情权，有权知道真相，其次就是公民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就大小国事在传媒上自由发表各种政治见解、主张、建议、质疑、咨询、诘难、批评、辩驳和抗议。

这些都是基本言论自由的内涵，也就是“开明专制”的操作内容。如果把基本言论自由理解为简单的“骂党权”，那就只会弄出庸俗政治来。

行使言论自由会导致政权被颠覆么？

也会也不会。

我党上台前，充分利用了国府治下人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成功地在“国统区”开辟了“合法斗争”的第二战场，使得国民政府“陷于全民的包围中”（按：此乃毛选四卷上的话）。在他们手上，言论自由变成了颠覆政权的强大工具。因此，他们当国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这或许也就是胡主席“西方民主在中国行不通”的英明指示的历史来源吧。

可惜，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一个癞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错的。如果它说：‘天的一部份有个井大’，那就对了。”胡主席的英明指示，不幸是在那井里发出来的。他小人家忘记了或是不知道，今日中国跟昔日完全不同。如果说国府垮台是因为它迫于美国压力，实行宪政的话，那么，今日的中共并不会简单重复国民党的悲剧。

当初中国问题如山，首先是国内有一支为组织严密、意志如钢的共党领导的强大叛乱武装；其次是八年抗战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国民经济全面破产，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贪污腐化的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最后是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极度愚昧，容易让“民主”、“自由”、“解放”的动听口号迷得灵魂出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然得以售其奸。言论自由不过是他们利用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工具而已。如果苏联没有参战，东北没有沦共，则国民言论再自由也未见得就能改变力量对比。

但这些历史条件都是偶然出现的，在今日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如今无论是在海内还是海外，根本就没有可以挑战我党的政治力量，有的只是几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民运”小丑。上次我在建议政府“开关延敌”的帖子里就说，如果政府放异议人士回国，则老芦愿意陪他们在任何场合包括上电视公开辩论，自信凭三寸不烂之舌，也要杀得那夥人片甲无存。我还在《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的系列雄文中说，如果中国明天实行民主，则老芦要干的

第一件事就是回国上电视台发表演说，呼吁大众宁可把票投给共党贪污犯，也决不要选那些海外归来的革命家。

其实我根本也不用这么做。光看“民运”人士们在海外折腾这么多年，越混越惨，沦落到得只能靠“弱势集团”的可怜相来骗取廉价同情，就足以说明普遍民智水平已经远非当年可比了。跳蚤顶不起被子来，在国内实行言论自由并不能让这些人呼风唤雨，推涛作浪，只会让大众看清这些人的真正嘴脸。谓余不信，看看他们上网宣传的结果就够了。他们在网上跳梁的结果，无一不是让自己脸上涂的那层金粉掉了下来，露出了无比丑陋的痞子相。

更重要的是，过往 20 多年来，我党执意罗致了国内精英阶层，把他们化成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政权的坚强柱石，不是什么党外力量可以轻易推翻的。实行言论自由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局面。

至于老狼说的实行言论自由会导致不负责任的政治谣言大肆流传，不必要地损害党国要员的威信，妨碍改革大业的推行，我看这基本是过虑。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小道消息流行，是大道消息不发达的结果。”的确如此。如果提高施政透明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让独立媒体自由采访报导政界要人，由独立司法系统保障公民包括政客们的名誉权，则谣言必然止于对犯法后果的恐惧，根本也就不需要什么道德自律。

实行言论自由的陷阱

如上所述，实行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让普通公民享有充分知情权，这就需要施政透明化，而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的最重要主张。

据西方专家分析，戈氏之所以把这当成新政的最主要的一条，源于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

如老狼正确地观察到的，改革的最大阻力和威胁，来自于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什么党外的政治势力，构成了对中央领导的实质性威胁。我在旧作中指出，共党领袖的权威，来自于其对“打江山”的贡献，因而不可避免地呈现“权威逐代递减律”。老毛是创业英主，所以具有绝对权威。老邓是开国元勋之一，权威就减了一级，老江只干过几天革命，权威就极大减

弱了，至于小胡则连一天革命都没干过，其权威完全来自于邓伯伯的“指定”。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足以抗衡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

戈氏当时的处境与此非常相似。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正是老狼说的那些。首先，他鉴于赫鲁晓夫是被秘密的宫廷政变搞下来这条，着意实行施政的透明化。在他想来，民众获得对政务党务的知情权后，政敌们也就没法当众搞阴谋串连，把他干掉了。其次，他抓了法治，开始了民主选举，想用选举产生的合法性来弥补“由老一代革命家指定的合法性”的不足。

正如历史证明的，这两条确实起了作用。后来左派确实发动了政变，把他抓了起来，但他是依法当选的苏联总统，政变者们始终无法跨过这道坎去，最终只好放了他，自己认输投降。他的覆灭是苏联解体造成的。苏联既然解散，则他那总统也就没法再做了。

由此看来，胡温新政如果真想有建树，必须逐渐放开言论管制，实行施政透明化，并逐步允许司法独立，把改革造成的中央和地方诸侯的矛盾转移到司法系统去解决。这么作可以赢得民心，弥补合法性的不足，以此对付可能出现的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挑战。

问题是这么做风险很大，势必在实行前就会引起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这道理显而易见：一旦停止黑箱操作，则大大小小各级官员的猫溺立刻曝光，到头来只怕全部官员都得锒铛入狱。困兽犹斗，人家岂会束手待毙而不奋起一搏，拼个鱼死网破？

所以，实行言论自由确实有可能颠覆新政，不过这颠覆力来自于党内而不是党外。中国不可能简单地重复苏联的道路，最根本的原因是，前苏联从来就没有中国的万分之一的烂。人家的党官基本都是廉洁的。当初左派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出于捍卫自身利益，而是觉得戈氏搞的那一套削弱了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

看来胡温并不糊涂，早就认清了这祸福利害所在。最近雷厉风行推行的化公为私的“制改”，我看就是收买地方官员的一大重要举措。通过把官僚改造为特权资产阶级，胡温当然能换取这些人的忠诚与支持，从而为自家奠定坚实的权力基础。当初老江就是靠大量提拔少壮军官建立权力基础的。这在今日中国，似乎就是弥补“权威逐代递减律”的唯一操作杠杆。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如今中国，唯一能带来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就是我党，唯一能扼杀这进步的也是我党。这无法解决的悖论，就是过往一个世纪的不断革命给后人带来的受用不尽的福荫。

2004 年 10 月 10 日

“和平恶变”的倾向似难抑止

最近“民运人士”余大郎一听到“鸣驺入谷， 鹤书赴陇”，立刻便“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促装下邑，浪拽上京”，去神京干谒了一番，回来后慨叹“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此生再与神器无缘，只能终老林下而伤感了一番。

这当然是他的个人悲哀，我无从置喙，不过他那半文不白、似通非通的归国杂感却很有内容，很有看头，它证实了我长期的忧虑：如今正在中国发生的“和平恶变”的倾向看来是难以抑止了。

所谓“和平演变”，英文是 peaceful evolution， 准确的翻译似乎应该是“和平进化”，但这是杜勒斯提出来，由我党御用学者翻译的，当然就不能原意译出了。不管怎么翻译，和平演变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在。

问题在于，中国刻下进行的“和平演变”，其实不过是“和平恶变”而已，它固然也会导致社会进化，但更积累了深重的社会危机。

正面变化是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能否认的。改革开放 20 多年，勤劳但不勇敢的中华民族的自由创业精神，在得到有限得可怜的解放后，便创造了足以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上了一个大台阶。我每次回去都要不胜欣慰地发现，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地缩短。90 年代初我回去时，亲人们还挤在肮脏的斗室里。本世纪初回去时，大家都已搬进了百多平米的公寓楼，装修得跟豪华俗气的旅馆似的。前两年和家里通电话，听说大家都买了私车。这种变化，在 80 年代就连做梦也想不到。

如果社会富裕不算进步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我只能认为仇共人士们至今还坚信“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信念，只是把它改成了“宁长民主草，不长专制苗”的摩登说法，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政治上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我在《社会进步是怎样发生的》一文中指出，由于私有化，政府不得不放松了对人民的严密控制，今天中国人民的自

由空间已经扩展到了毛时代做梦也不敢想的地步。更不用说如果毛时代有人在海外论坛上发表批评中共的文字会引来何等严重的后果：不但自己要被处决，就连家属都要受尽折磨。与此相比，刘荻女士终于无罪开释，正是这种巨大的社会进步的反映。

但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储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完全是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挖掘坟墓。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极度悬殊而且日益加深。改革开放后由全民共同创造出来的财富，大部分流进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私囊之中。如今整个党国已经成了一部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腐烂机器。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描述沙皇俄国的话来说便是：“是的，那是一堵墙，不过那是一堵朽墙，一推就会倒的。”

这话当然不准确，那墙是推不倒的，只会自己垮下来，而垮下来还要砸死大批无辜人民，这就是真正令人担忧所在。

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党国领导根本就没有危机感，更没有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的决心。正如冬烘“政治家”余大郎先生观察到的，他们没有实行民主化的压力。如果说，80 年代后期因为社会意识形态危机，党国领袖还感受到迫使他们推行政治改革的社会压力，那么，经过这 10 多年的惨淡经营，新生代领袖觉得已经度过了生死存亡的险关，天下底定，大事无足虑，可以心安理得地醉生梦死下去了。

领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然也有根据。记得 90 年代初，我在海外反共刊物上看到太子党们给中央上的安邦定国策。据说那是陈云的公子陈元手下的智囊团出的高招，是针对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共产主义在全球破产、我党面临严峻考验而提出来应变措施，主旨就是放弃马列教条，把国教改为“民族主义”，再将知识分子精英统统罗致入统治集团中，把他们化为既得利益者，同时把我党建成赫鲁晓夫首倡的“全民党”，将党的队伍发展到一亿人，使占相当比例的国民都能或多或少分到一杯羹，从而扩大支持我党的基本队伍。

尽管那披露的材料无从证实，但我党在过往 10 多年的施政措施，却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的，而且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他们放弃了毛蹂躏践踏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采取传统社会的作法，用高工资收买了知识分子。我家那些“高知”的私车就是靠高工资、高奖金买来的。那种好事，在国外根本就没

听说过：如果你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便能获得一万元人民币的重奖！

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原来的“党有制”变成了“官僚私有制”，用全民的共同财富收买了整个经理集团，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构成了专制制度的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国民因为享受到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变得对政治冷漠了，根本不再是 80 年代末期人人奢谈“民主”的那个局面。前段看西方电视采访了北京的几个大学生，那些新生代一致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一个重大理由就是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觉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民主只能带来灾难，云云。

因此，小胡声称“西方民主不适用于中国”，应该说确有某种民意基础，这也是我党上下对政治改革丧失兴趣的原因之一：社会既然稳定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镇压机器也因高科技的出现变得更加强大，百姓也不再要求民主，他们吃饱了撑的，去自动搞民主放弃权力？

诚然，我党现在搞的这一套，对巩固政权的作用是无从否认的。其实斯大林早就在他的中学作文里提出过此类主张。他认为，维持社会安定团结的秘诀无非是两手，一手建立一个与现体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另一手是用秘密警察无情镇压任何胆敢心存不满的人。改革开放 20 多年，我党搞的无非就是这一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问题是这两手只能换取一时苟安，并不能解决黄炎培在延安提出的“腐败周期律”问题。我党施政的实践，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名言作了生动证明。

共党式极权国家比一般非共专制国家更糟糕、更反动的一点是：非共专制国家一般只控制政治资源和权力，并不控制经济资源，也无法直接掠夺私人财产，而共党极权国家却控制国家的一切资源与权力，将全国财富和资源变成了党产，这样，绝对的权力集中在后毛走资时代就必然转化为财富集中，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恶性资本主义。很明显，不消除这种病态权力集中，则全国上下“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全面腐烂就绝对无法遏止。

小胡同志似乎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可惜他不过是思维早就在 50 年代定型的积极分子，又经历了“吸尘器”式的层层负筛选，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和胆识看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他虽然也高喊反腐，也奢谈“民主”，可惜他理解的“民主”不过是在延安窑洞里看出来的一角蓝天，无非是明君式的“嘉纳忠言”而已，与权力分散毫不相干。也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过是延安时代那种艰苦奋斗、与民共甘苦的清廉社会而已。他心目中的效法对象，有如说是邓小平，莫如说是毛泽东。要指望这种糊涂同志来医治这国症，当真是发错了梦。

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普遍政治弱智。例如冬烘政治票友余大郎就在跑官中发现，那些少壮党官无不同意，一党专政下不可能消除腐败，要彻底根除腐败，只能靠民主。光从这点上就能看出中国人的普遍政治觉悟有多低。

其实现阶段中国确实不宜骤然实行民主，对这一点我早就做过反复多次地详尽论述过了，但不实行民主并不等于完全不能进行政治改革，更不等于无法根除和遏制腐败。

谁说一党专政就不能根除腐败？新加坡李光耀的人民党一党专制了几十年，人家腐败也未？过去国民党在台湾也搞一党专制，人家腐败了么？蒋经国遗孀方良穷到活不下去，这种事在民主国家都少见。而且，谁说民主就能根除腐败？民主的台湾似乎比过去的专制台湾还更腐败些，陈水扁的太太大发横财难道就不是证明？如果他不当大总统，会有那好事么？傻子才会信！

所以，如果小胡同志不是只知攻读伟大领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之类垃圾，而在万儿之暇拜读学习一下老芦的名篇《我看“中国之路”》，他就会领悟，中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实行民主，而是实行起码的社会公正亦即费厄泼赖，从而实现相对意义上（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的平等和均富，为此必须遏制官僚资产阶级，扶植民间中小企业，并厉行肃贪，根除腐败。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实行真正的法治，党国从司法系统中全面退出，实行司法独立，只有这才是防止腐败周期律发作的釜底抽薪之策。

可惜小胡的养成环境，决定了他绝对没有那能力明白这世上最简单的道理，其实也怪不得他。就算是生活在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又有几个真拎得清这些问题？“民运”垃圾不必说（他们乃是世上最不懂民主而最爱贩卖“民主”的怪物），就是一般知识分子也是一盆浆糊，单看看楼下围绕着“法治”和“法制”的争论就可见一斑了。

所谓“法治”，说的是 rule of law，而所谓“法制”，乃是我党发明的含混概念。记得 90 年代初我在ＣＮＤ 上看见某个鬼子惊呼，中共竟然用 rule by law 偷换了 rule of law。那文章是英文，我琢磨了半天才悟出来其实他说的是用“法制”偷换了“法治”。

这一招着实高明。“法制”给人的感觉，要么是统治者以法律去制服百姓，自己却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如同古代法家的主张然，要么是“法律制度”的意思，如英文 legal system。无论你作何理解，反正我党都立于不败之地。即使理解为司法制度，那“提倡法制”的意思也成了“建立健全司法体系和制度”，并不是法律高于一切，大家都只能服从它的统治，在这点上我党应该和平民毫无二致。

正是这人为的混乱使得亲共派统统变成“提倡法制”的积极分子。因为在他们看来，守法只是小民的事，与统治者毫不相干。所以，不管是在围绕六四还是刘荻案发生的网上争论中，这些人都要毫不例外地出来要受害人“认罪服法”，却从来不敢面对守法首先是统治者责任的问题，承认首先应该追究的是统治者有无玩法违法情事。可笑的是，就连仇共派也看不出对手这致命的死穴来，只会嚷嚷“恶法不是法”的胡话，更加坐实了他们的响马身份。

而且，亲共“法律专家”们居然践踏“无罪推定”的神圣原则（这原则连我党现在都接受了），不管青红皂白逼人家“认罪服法”，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放肆践踏。更何况刘荻被无罪开释后，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事应该是追究那些违法捕人的烂公安的法律责任，以维护法律尊严，可此时不但亲共派“法律专家”噤若寒蝉，就连仇共派也想不起这一出来！

就是因为这由两派共同代表着的全民愚昧，决定了党国领袖绝对没有那个智力认识到，在“全面实行民主”和“继续择恶固执”之间，其实还有中间道路可走，却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看成了类似逻辑电路式的“零”（放弃有限改革）和“1”（全面实行西方民主）两态式的简单把戏。要这些颟顸废物实行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以便让新闻界和司法界首先从党天下中独立出来，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生理能力。

问题还在于即使他们终于明白了我上面说的那些简单道理，党国一手制造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也剥夺了领袖的选择余地。这一点我已经在旧作中充分论

证过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成了个庞大的飞轮，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巨大惰性，却也使得转向极度困难。

因此，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中国还将继续和平恶变下去，最终堕入那个两千年循环过无数次的旋涡：统治集团极度腐化，社会贫富极度悬殊，使得社会危机极度恶化，在遇到重大天灾人祸时便不可避免地触发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使中国再一次淹没在血泊中。

这不是危言耸听。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永远固若金汤的专制制度。虽然现代科技进步使得暴力革命已经过时，但这不等于统治集团内部不会因分赃不匀导致火拼，而某个党内野心家打出毛的旗帜来领导愚民进行新长征，让大家再度回到延安的黑窑洞里去，变成 21 世纪的山顶洞人。

2004年10月18日

中国少的正是“刁民”

昨天燕南人网友贴出《赵紫阳一怒斩刁民》，讲述了紫阳倒台前在河南某地的屠民史，当场彩声雷动，随网等竟然赞之以“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尽管早就熟悉随网的“凡是官府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官府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一贯作派，我还是觉得他这次押错了宝。那倒不是说我只在老赵身上看见“霹雳”，没见“菩萨”。随网这套颠倒黑白、不顾一切美化中共当局的把戏我早就见惯不惊了——连眼下这腐败烂世都有本事吹为什么“唐虞盛世”，这世上还有什么话此子说不出来?

让我担心的是，他这次竟然将如此崇高之褒语加之于为我党严密软禁的头号政治犯，似乎大有“站错队”之嫌。众所周知，无庸置疑，老赵一直是所谓“民运”人士的同情对象，被那些人当成了打击我党的政治斗争武器。前段还有人嚷嚷为他平反。我决不相信随网是赵派人马，但瓜李之嫌还是不能不防，免得马屁拍在马脚上，惹下不必要的祸事来，侬说对不拉?

令我欣慰的是，有的网友当场就对“刁民”作了质疑，此后其他网友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可见无论如何，西方价值观还是点点滴滴渗透进了咱们的心田，而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因为那些发言，而且燕南人先生已经同意那其实是老赵欠下的血债，并非什么“菩萨心肠”，所以那事我觉得就再没必要说了。此文想说的，还是什么是“刁民”。

在我看来，西方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家个个是“刁民”。如果中国想变成人家那样的文明国家，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得想方设法让大夥儿变成“刁民”。

“刁民”这个词绝对是土特产，英文中没有对应词，这道理很简单：人家这儿无民不刁，可以说“人民＝刁民”，所以自然用不着特地造个词来区分之。此事虽小，却能看出两种文明的着眼点与发生点完全不同。现代西方文明是人民的文明，知识分子是在百姓中审视事物，而中国盛行的从来是“官府文

化”，从来没有什么“民间知识分子”一说。知识分子们无论在朝在野，统统站在官老爷的立场上居高临下地俯视众生，这“刁民”一词的出现就最能说明这一点。有趣的是，到了 21 世纪，这仍然是随便、大汉子等网友看问题的立场。

那么，到底什么是刁民呢？很明显，此词的出笼，其实是“青天大老爷”们抒发某种挫折感。只要你做了“父母官”，人民就是子女，你爱怎么虐待都行。百依百顺听任虐待的便是“良民”，有胆敢怀疑你的英明伟大者就成了“刁民”。这就是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至今仍然在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随、大等人的所谓“反民粹主义”，不过是这种陈腐意识形态换个新包装而已。

在这种心态下，大多数国民别无选择，只能处在两种状态：要么俯首贴耳作任老爷作践的顺民，要么给逼到走投无路之时便总爆发出来，揭竿而起作暴民，“中间状态是没有的”。

但毕竟还是有极少数人既不作甘心顺民，又不愿意作暴民，而是去作令官府头大的刁民。这些人的自身权利认识天生比较强烈，又有足够胆识挺身而出，使用合法手段捍卫自己的权益，官老爷们遇到这种克星，当真不胜头痛：既无法像捏弄顺民们那样，随意捏扁搓圆，为所欲为，任情宰割，又无法吓唬住人家——人家毕竟深通“王法”，行事处处注意不留把柄，真成了老爷们万事如意之余的唯一美中不足。

当然，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弄到后来，大老爷自然要使出“雷霆手段”来，如张都监坑害武松那样，罗织入罪，胡乱捏造个罪名杀了。此时自有“官用文人”出来歌颂他的“菩萨心肠”，道是“发展是硬道理，民命是软道理或无道理”，人命和官老爷们的腰包比起来，自然是屁都不值。

因此，如果给“刁民”作个逻辑定义，那便是：“人民中自身权利意识比较发达，具有足够的胆识捍卫自己的神圣权利，又能在现有法律制度下有效地使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权力的非法侵夺，使得权势者无法为所欲为的先进分子。”

不难看出，中国社会最少的就是这种人，最常见的还是俯首帖耳任人宰割的顺民。如果这种人占了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则那社会便称为“盛世”。由此

产生了一个经验规律：但凡有人出来歌颂“唐虞盛世”时，则那社会必然是官府为所欲为、横行霸道、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乌烟瘴气的世道。

因为大众都是顺民，不到活不下去时决不会铤而走险，于是便惯着官府横行无忌，等到烂穿了帮，人民实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了，这才大规模揭竿而起，由顺民突兀地转化为暴民，这结果一无例外是玉石俱焚，无论是官是民一体遭殃。

这就是我为何在《和平恶变的倾向似难抑止》中说中共没有政改压力。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民统统是顺民，对官府的胡作非为不敢怒也不敢言，于是当然也就没有内部压力来震慑官府横行，于是这国家便不可避免地一天天烂下去，直到迎来“无民不暴”的又一骚乱时期。

打破这种两千年的恶性循环唯一途径，在我看来，还是人民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我早在旧作中多次指出：民主社会建立的软前提，是人民具有强烈的自身权利意识，并熟悉如何使用法律手段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如果不完成这心理转变，则要在中国实行民主只会是痴人说梦。

可笑的是，过往一个世纪中，竟然没哪个中国政治家或“理论家”看到这一点。大众竟然以为民主社会可以由革命政权从上到下地建立起来。这些人愚昧到看不出来，革命只能改换政权，并不能改变人民的传统心态。正如辛亥丑剧揭示的那样，顺民／暴民无论生活在帝制还是总统制之下，依然是顺民／暴民，换个招牌并不会让他们就此脱胎换骨。

当然，要这么做也有许多问题。中共政权乃是建立在官府文化上的，其制定法令的着眼点，自然是千方百计地限制百姓的合法权利，保护罪恶官府。在这种“官法如炉，只烧草民”的烂污制度下要想“戴着脚镣跳舞”，勇作“刁民”，殊不易易。但无论怎样难，咱们总得从现有基础上开始吧？

另一个问题是一定要分清“刁民”和“暴民”的界限。须知“凡守法者就不是暴民”的公式并不成立。谁也不能否认 89 学运是和平抗议，但并非刁民运动，其实还是“和平的暴民运动”，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政治斗争而非经济斗争，根本就没有提出什么保护自己权益的明确诉求。这种斗争只会引来中共疯狂镇压，导致社会后退，什么意思都没有。

所以，要做刁民，不但必须严格依法行事，而且必须有明确的、具体的、有限的权益诉求，其目的只能是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决不能是意在展示实力吓唬羞辱当局的政治运动，如 89 学运和后来的ＦＬＧ示威那样。

一言以蔽之：刁民运动必须是个别的而不是全国规模的，是具体的而不是大而无当的。如果神州大地上人人都成了勇于依法捍卫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刁民，则建立民主社会的主观条件也就具备了。

2004 年 11 月 6 日

改革的最大难题是“泰山屠龙”

前见某位国内网友质疑我的《逐步回到“解放”前就是改革的根本方向》、《和平恶变的倾向似难抑止》诸文，说我书生气十足，中共政权就是由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支撑的。现在我却建议实行舆论独立和司法独立，去限制特权阶级的胡作非为，岂非痴人说梦？如果我在国内提出这主张，只怕立马就要从“转世鲁迅”变成“转世商鞅”，云云。

毕竟是国内网友，深知内情，明白窍要所在，实情确实是那么回事。

别说老芦这小草民了，就连朱镕基那种大人物也无多少安全感可言。我曾在美国《时代》杂志上看到歌颂他的文章，说他因为以铁腕推行改革，弄得天怒人怨，连祖坟都让地方官员用高效炸药炸上了西天。他本人也深知危险，把孩子统统送出国去，家里只剩黄脸婆，茕茕孑立，夫妻相吊，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和芦公芦婆也无多大区别，云云。

可惜那位网友没有明白我的中心意思何在。其实我那几篇文章，说的正是他的意思，都是改革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降伏特权阶级那条多头凶龙。不过，他的质疑让我发现未能把这层意思讲透彻，所以再作此文发挥一番。

现代专制制度的内在难题

许多支持现代专制制度的同志忘记了它和旧式专制制度有个本质差别，而正是这差别决定了现代专制制度缺乏自稳性，决不会如帝制那样长治久安，历数百年才会烂透倾覆。

可笑的是，“民主”斗士们和拥共派表面势不两立，却照样看不出这点来，只有本事抢占道义制高点，“畅谈革命斥贼党”，将“正义”变成打神鞭，以“良心”的发达来弥补智力的萎缩。仅此一端，便足证国人平均智力水平那骇人听闻的低下。

粗知中国历史的人都该知道孔孟之道在维系帝王统治中起到了何等关键的作用，它完全构成了帝制的精神支柱。该“理论”认为，帝王乃是“天子”，

如耶稣一般，乃是上天选择来替自己治理百姓的代理人。而且这“天命”是通过性交传递下去的。谁要成了“天子”，他的后代也就自动成了“天子”。除非他作恶累累，害得民不聊生，上天不得不另择授命对象外，这种奇特的天命传递方式一般都得到上苍的认可。

这套“理论”赋予了帝王的子孙们无从置疑的天然权威。传统社会的帝王父子之间其实是互相猜忌的。为防皇子逼宫，老皇严禁他们过问朝政，更禁止其与朝臣交结。于是老皇驾崩后，新皇面临的群臣就完全是一夥陌生人。

但哪怕就在这种情况下，新皇也绝对不会被架空，照样具有不容置疑的生死予夺的巨大权力。那基本原因是心理上而不是物质上的（mental, not physical），大司马大司空们无论如何权倾朝野，也绝对不敢有“彼可取而代之”的一闪念。历史上新皇和权臣斗法，从无后者取胜的先例。光这事实就证明了孔孟设计出来的“心理统治”的威力究竟有多大了。

身在“操营”的加奴说话了：“主子，那曹操怎么说？”奴才问得好，主子上面说的乃是“太平时节”，不包括乱世的特例。在那种时刻权臣有了借力处，自不必再把靠肉体关系获得天命的帝王放在眼里。操爷自己就说过，如果没有他弄权，天下不知会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种混乱局面，决定了操爷的存在本身就是维护安定团结的基本因素。把他除去了，献帝爷只会死得更快。而这局面根本就不存在于“治世”中。明神宗罢工几十年也没人篡位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与此相比，立刻就可以看出现代专制制度的根本缺陷何在：独裁者没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威。共产主义理论的发明人远没有孔孟聪明，竟然忘记了设计出类似的天然合法性，以确保新式专制制度能“八弘一宇，万世一系”地稳定传下去。于是新任的独裁者便比过去的新皇难做得多，他的地位绝对不是不可挑战的。凡是权臣都可以响亮地对自己说：“彼可取而代之！”

斯大林有名言道：“没有人是不可以取代的。”这成了他滥杀党国要员和百姓的指导思想。这名言的实践竟然弄到这恐怖地步：他限期下令科学家们造出原子弹来，同时准备了替补的第二、第三梯队。第一线的科学家们恐慌万状，深知到期还造不出来便要统统被杀，由第二梯队补上，于是拼命干革命，以惊人的效率如期造出了原子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这话却适用于我党

自胡温以下的每个同志。的确，如果我是我党干部，还真看不出来为何小胡就是不可取代的。

当然，苏联老大哥在倒地前也想了点弥补办法，那便是将“君权天授”改为“党权天授”——因为我党代表了“历史潮流”（亦即“天命”的时髦说法），所以自动具有统治人民的资格。可惜那说的是党权而不是君权，有助于压服党外挑战，但无助于压制内讧。

正因为缺乏心理统治理论的支持，现代专制制度的权威便不能不从 mental 转为 physical ，靠物质力量去压倒反对派、震慑潜在的挑战者。具体办法便是厚植党羽，造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庞大私人队伍。对全党还是对领袖来说都是如此。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庞大的特权阶级太子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效忠给我好处的主子的“有奶便是娘主义”。

这么一来，便使得现代专制制度远远劣于旧式帝制，造出了传统社会从未有过的特权阶级。传统社会当然有贪官污吏，但与“新”社会相比有两个本质不同：

第一，传统社会的贪官污吏是个别发生的，并不作为一个庞大的特权阶级，构成支持政权的核心力量。

第二，皇帝本人的利益被贪官污吏侵害，两者其实是对立的。如果皇帝不是糊涂昏君，一般都切齿痛恨贪官，要收拾这些人也有足够能力，残暴如朱元璋者竟然以剥皮的酷刑来惩治贪官，并将剥下来的人皮填进稻草，当成前任的油画肖像悬挂在官府大堂上，以此吓阻继任者就是极端证明。而共党社会的高层独裁者和特权阶级之间是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前者根本不敢、也没有能力去整肃后者。

这就是中共社会何以腐烂得如此迅速，而又无法得到根治的根本原因所在。

“泰山屠龙”一直是最高层统治者的最大难题

早在文革后期，我便看出了它的实质其实是毛与特权阶级党官僚斗法，并不是什么郑义、刘国凯、王希哲诸先生鼓吹的“人民革命”。不仅如此，我还算定了尽管老毛气焰薰天，最终还是要不敌败下阵去。后来的实情果然如此。

当初为毛火中取栗的造反派一个个身陷囹圄，而“保皇党”人纷纷加官进爵，难怪郑、刘、王诸人要忿忿到今天。

这种冲突其实是那背时制度决定的。正因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特权阶级太子党，国家便由特权阶级各个分子的布朗运动形成的合力推动着运行，哪怕空前绝后的大独夫老毛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控制。国家正在走的方向并不见得符合他的心愿，于是这便构成了现代君王和朝臣以及诸侯们之间的不尽冲突。越是想大有作为的君主，这冲突也就越激烈。那道理老狼已经说过了：登到权力最高峰的人，一般已经超脱了物质追求，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幻想——青史留名。很明显，如果下面的人个个“羊狠狼贪”（抄袭自《聊斋志异》），则君王能留下什么名声便大成问题。

对全民族来说不幸的是，老毛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民救星”幻觉，而他发现手下的党官僚已经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社会，完全不是他心目中的太平天国。因此他不惜以空前的魄力“毁党造党”，“而今迈步从头越”，重建他那病态乌托邦。

他使用的手段一如既往，“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靠直接诉诸暴民，煽动起他们的阶级仇来，以暴力直接推翻各级党委领导，甚至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红卫兵带到 8 届 11 中全会会场中去，形成直接的威吓力量。

但这多头凶龙实在是太厉害了，就连老毛那种混世魔王都奈何不得。虽然他一度把凶龙压了下去，林彪事件一出，凶龙便从五行山下初步挣扎出来，等毛一死便立刻“飞龙在天”，控制了全局。

继任的老邓面临同样的难题。和老毛一样，他也想改造中国，但他没有老毛的病态浪漫幻想，却有脚踏实地的 common sense， 知道中国已经成了何等的野蛮落后国家，而庞大的党官僚却顽固拒绝改变现状。因此，如果说老毛和党官僚斗法是毫无意义的狗咬狗，那么邓和他们的斗法则有相当大的正面意义。

难处在于毛共本质是反动的，顽固地阻碍一切进步努力。邓遇到的阻力远远超过毛当初面临的，但他还没老毛一半的权威。他解决这难题的方式是和平赎买，将离休制度首先引入我党那黑帮会（谁听说过青红帮有退休制度？），又弄了个“顾问委员会”，把那夥“老而不死是为贼”悉数弄了进去，把胡赵

等少壮派提上来，自己垂帘听政，以此架空老贼们，排除了他们的干扰破坏。通过这一系列巧妙运作，中国才绝处逢生，“上了一个大台阶”。

可惜特权阶级也有对策，那便是把自己的子女推上去作代表。两派合力“培养接班人”的结果，便是制造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特权阶级。这再与疯狂走资结合在一起，便造出了如今世上绝无仅有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了胡温面临的最大难题。

当然，这难题是否存在，还要看那君王的野心如何。上面已经说了，只有雄心勃勃想干番事业的君主，才会与特权阶级发生冲突。胡温乃是我党负筛选出来的庸人，未见得有这种心思，再说，即使他们有此志，力量对比也极度不利于他们。两人的权威远不如老邓的百分之一，比毛就更不用说了，而经过我党几十年的哺育，特权阶级已经长成了空前强大的怪兽。对他们个人而言，最明智的选择，还是无所事事地苟安下去，以“中国的勃列日涅夫”的称号进入史册。

从何处借力？

假定胡温真有决心改革，起码是决心根治腐败，那么，两人当从何处借力，才能降伏这多头凶龙？须知就连毛那权力无限的创业君主，都还得靠唤起暴民来搬那座大山，何况权威不及他万分之一的胡温？而且，与老邓不同，如今的官僚资产阶级已再不可能赎买，只能以强力压下去。所以，胡温必须找到个基本队伍，大夥儿一道出力，才能将凶龙镇在泰山下。

老狼的大作实际已经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转嫁矛盾，以法治体系来支持被贪官污吏侵害的受害人，如同他在网站内用陪审团来代替他裁决网友与斑竹的冲突一般。如此一来，即使贪官污吏们入了狱，也恨不到胡温头上去。

有趣的是，老狼此策正好暴露了问题的难度。他小人家似乎忘记了人家当初是怎么突然发难的。那讨狼檄我还依稀记得，其中最主要的罪名就是“不支持斑竹工作”。可见提议成立陪审团、以此限制斑竹的权力正是导致后来逼宫的祸种。

因此，如果胡温真的尝试以独立的司法系统取代党机构仲裁官民利害冲突，则本网站的历史一定会重演：相应的司法制度还没建立起来，中央委员们便会召集紧急会议，由某个超级 13 点出头，宣布“事实证明，国家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中央对地方的支持，地方权威越高，则国家越有前途”。那时两人的命运只怕还不如老狼。老狼顶多被人抢光（包括债务，of course），而胡温恐怕是身首异处的问题。

所以，如果胡温无所作为，那也怪不得人家。《红楼梦》上早说了，“大有大的难处。”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哪！怪只怪列宁斯大林设计出这种烂污体系来，传到后来党魁不可避免地要成为黎元洪，不得不在党会议上大声疾呼“要加强党（＝我）的执政能力”。

问题是，如果再不降伏这多头凶龙，则大乱迟早要发生。任何长脑袋的人都看得出来，现在国内已经是到了民怨沸腾的爆发临界点。用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的话来说便是：“中国各地都布满了干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燎原大火的点燃就只等国际国内重大突发事件。一方面，党民关系紧张到了爆发点，另一方面，党魁的权力却空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还想作太平天子，端的是燕巢幕上。

上次万州事件爆发，有人说那是国民固有的憎官情结、憎富情结使然，其实不然。那事件乃是当事人自吹是“公务员”触发的，可见百姓憎恨当官的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凡是毛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憎官情结”，只有“热爱拥护领导情结”。这情结的彻底翻转，说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遗余力地毁灭了自己当初那个美好形象，把自己变成了人民公敌，“已经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引自《毛选》第四卷》）。如果再不痛下决心，则大乱迟早不可免。

为今之计，我想还是只有师毛故智，靠直接诉诸百姓来压服那多头凶龙。当然不是用毛的非法手段，而是采用戈尔巴乔夫的战略，直接上电视台向百姓说明，腐败已经成了危急党国存亡的大害，本元首准备以霹雳手段根治这国症，不惜为此作转世商鞅，同时宣布各地的反贪局从党领导中独立出去，一切传媒不得禁止压制刊登对官场腐败内幕的揭露。

如此一来，则公开挑明了政变危险，以悲剧英雄形象换取公众的同情和关注，则党官们反而不易下手了。在此之后再逐渐放开对传媒和司法系统的控

制，使这些部门从党系统中独立出去，再不能与地方党官狼狈为奸，则中国庶几有救。

这当然是行大险之举，用我那不成气的马师弟崇拜的不通苏东坡的P话来说，便是“能发不能收，必然延祸自身”。百姓乃是世上最靠不住、最无实力的权力资源。用芦策去换取民众支持，其实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实力，唯一的作用是抢占了道义制高点，能对贪官污吏们起到点精神上的威慑作用，让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轻易下手而已。但这种作法究竟有无作用，只有天晓得。

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良策可以收伏我党哺育出来的那个福伦肯思坦，老芦搔破头皮，还真想不出法子来。我可以肯定的就是：

第一，胡温时代是我党自救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机。错过了这个时期，再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因循苟且下去，最终必然导致我党垮台，全民再遭血光之灾。

第二，胡温乃是50年代思想即已定型的智力道德残废，是我党层层负筛选出来的最高积极分子马屁精，第一本能便是苟安求生，因此绝对没有足够胆识看到深重的民族危机，更无气魄去“看试手，补天缺”，挽狂澜于既倒。最大的“改革措施”就是试图回到延安时代去。

第三，因此，看来中共腐烂彻骨、最终垮杆，再次导致全民大灾难已成定局。这就是决定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你承认它是那样，不承认它也是那样。

第四，老芦必因此文散布悲观主义和恐慌情绪而被网民一致声讨，作为专报坏消息的花刺子模国信使推出午门斩首。

全矣。

2004年11月7日

难盗草，补天缺

——一个“拥共派”的烦恼

许多网人对我使用“拥共派”、“倒共派”的称号特别反感，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对网人政见的一种方便分类，并不是我党擅长的组织上的“划线站队”。我早就说过多次了，网上只有网友没有敌人，拥共或反共不过是政见分歧，并非什么生死斗争。

不仅如此，我虽然是独知，其实既是反共派，又是拥共派。和那些“表观拥（反）共派”不一样，我的“反”和“拥”都是理性决策，和朴素的阶级感情没什么相干，因而是真正的、卓有成效的“反”与“拥”，决不会像“表观反（拥）派”那样，以佞臣手段专干“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勾当，危害他们拥护的政治派别的长远利益。

本人的反共立场早就说得明明白白了：我是最坚定的理性反共志士，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毛共党文化，反对的不一定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执政党，而是推行这套下流政治的人。我一贯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性的反共。本人“扫荡”伪民运就是这种理性反共的最杰出表现。

本人的拥共立场也同样早就说的明明白白了：从全民利益着眼，我坚决反对一切用暴力推翻我党统治的意图和尝试，因为那只会再一次把全民推入血海，腰斩大有希望的和平改革，让中国人民在死去太半之后，再次沦于又一个毛泽东的铁腕统治下，再度将时钟拨回去一世纪以上。

不仅如此，我还特别害怕我党突然垮了，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全国大乱，在我党血腥统治半世纪内积累下来的无比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由此总爆发，使神州大地变成空前绝后的杀人场。

所以，我不但反对试图推翻我党统治的“民运”垃圾，而且千方百计动脑筋帮我党维护统治，以防那堵朽墙因为腐烂太甚，轰然一声垮下来，压死无数无辜生灵。我早说过无数次了，主张暴力革命推翻我党的“民运”不过是疥癣

小疾，我党根本不是什么暴力革命可以推翻的，只有共产党本身才是自己的掘墓人。我党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它自己。

总而言之，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别的，乃是如何效法白娘子“盗仙草”，从西方偷点灵芝草来，熬成参汤，为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我党吊那口气。

这一招毫不新鲜，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主席和逃兵邓小平总书记早就在大饥荒中使用过了。后来先总设计师又在 70 年代晚期故伎重演了一番。我在自传《黑崽子》中指出，咱们的社会主义每逢搞不下去时就得靠资本主义来救命，这种事邓公一生干了两次。

如今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可那吼声全是缠夹不清的噪音。除了老芦，这网上似乎就没谁喊出：“盗仙草！盗仙草！否则许官人的命是再也救不活了！”

请去楼下看看吧，大家孜孜不倦干的，似乎就是或歌颂专制，或赞美民主，全 TMD 坐而论道，废话终日，言不及义，连“隔靴搔痒”四字都当不起。

诸位怎么就会看不出来：现在的问题乃是迅速遏制腐败，平息沸腾的民怨，并维护专制政府权威，防止他们内部狗咬狗乱起来，祸延全民，哪顾得上探讨那些不着边际的事？

您说这中国人特别是“表观拥共派”咋就那么笨？我早就说过几百次了，民主最大的用处，就是能确保长治久安，根治中国周期动乱的大血崩。不信看看英国和美国那种民主国家。英国自 17 世纪以来从无内战，美国立国两百年也就只有过一次内战。咱们中国呢？自鸦片战争以来打了多少次内战，死了多少人？

其所以如此，我也在旧作中讲得无比清楚了：传统中国的专制制度，只有在一个封闭系统里才能是高稳定的。除非你有老毛的本事，把整个中国密封在罐头中，才能有效地对全民洗脑，实行“心治”，从根本上阉割了人民的反抗基因。那才能实现真正的心理上的安定团结。但现在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有了西方作参照物，便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任意愚弄百姓了。外部环境的存在，决定了现代专制社会必然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为何西方冲击最终导致清王朝垮台并引发历时一世纪的革命动乱。

不仅如此，我还指出，现代专制制度的最大缺陷，乃是“权威逐代递减律”，新的独裁者根本不具备旧式帝王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威。哪怕您像金氏父子那样把国门封死，撤除收音机短波，只许有闭路电视，那也无法确保第三代、第四代独裁者的权威，照样不能防止内部政变。因为这个现代缺陷，专制制度便成了一种高度缺乏内部稳定性的制度，迟早要在内讧中垮台。

说到底，现代专制制度的致命缺陷，是缺乏人民认可的合法性，无法让人民心服口服地接受统治，也无法让具有野心的同志们死心塌地地拥护中央，只能靠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当继任的独裁者因权威逐代弱化，失去施压能力之时，大乱就必然会爆发。

这些致命缺陷，不是您大唱“社会主义好”就能根除的。如果这能起作用，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是越来越好”的欢呼并没有防止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的歇斯底里呼喊也没防止后来党中央通过决议全面否定它。如此叫喊，唯一的客观作用便是麻痹党中央，让他们对可能出现的大患视而不见，在异常事件突发时猝不及防，糊里糊涂地便在睡梦中掉了脑袋。

前两天坛子里流传北韩闹政变。我看那消息即使靠不住，小金胖子也命不久长。那乃是“权威逐代递减律”决定的。上面已经充分论证过了。大概再笨的同志也能理解吧？我使用的完全是超越政治党派的纯功利主义分析，无一语涉及道义，更没有进行道德批判。有哪位同志不服，在喊够口号之余，这就请上来驳倒，如何？

如果没谁能驳倒这些说道，则恐怕就不得不承认：我党现在实行的专制制度因其内部固有缺陷，缺乏自稳性，迟早要因自身烂透和中央缺乏权威，诱导党内野心家们出来抢权，触发全社会规模的大动乱，是不是？而咱们现在的考虑重点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果您真是忠于我党的话。

可惜那些忠党爱国的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生怕我党垮不了，生怕大乱来之不速，生怕未来的大屠杀不够残酷，拼命煽动对内对外的仇恨，甚而至于不顾我党的根本利益所在，拼命煽动民间对美国的仇恨，这客观效果，便是使我党在内部危机重重、自顾不暇之际，还得煞费苦心地压制民间仇外思潮，以免被百姓逼到正面和老美对抗，失去美国和西方源源而来的参汤，让中国再度变成毛时代的内外交困的国际孤儿，使经济成长失去势头，触发大规模内乱。

由此看来，这些忠党爱国的同志和历史上那些误国殃民的奸臣也毫无不同，完全是给我党帮倒忙。

问题还在于，即使我党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面的干扰破坏，那根本缺陷还是在那儿没解决。套我党最爱使用的话语来说，党天下迟早要垮台乃是客观规律，你承认它也好，不承认它也好，并不是掩耳盗铃就可以混过去的。

所以，根本出路还是“盗仙草”，也就是采纳老芦此前的一系列文章提的建议，逐步开放舆论管制，允许司法独立，把中国建成一个实行开明专制的法治国家，在条件具备后，再逐渐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

这在我看来就是我党唯一的自救之道。能不能实行它，则完全看我党领袖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魄力了，对此我深表怀疑。所以，这仙草是盗不来的。

2004 年 11 月 26 日

中共一时不会垮台

——王力雄先生在等待什么之一

王力雄先生是本人非常尊重服膺的独立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不意昨天竟然看见网友转来的他的文字，谓他现已被中共软禁，只觉得一片黑地昏天：中国共连这种持独立批判立场、反对激进民主、并直言不讳地分析探讨在中国贸然实行民主可能带来的灾难的独立知识分子都镇压，当真是害了失心疯，比当年镇压实行“第二种忠诚”的刘御史宾雁还乖张。这似乎只说明一件事，改革开放 20 多年，我党虽然在各方面都文明化了许多，但在这方面还是保留了毛共不知好歹、拒谏饰非、讳疾杀医的优良传统。

王先生文中说，紫阳 16 年来一直在等待，他自己也在等待，等待着那个收场的巨变到来。他坚信这一天迟早要来，理由很简单，因为有“天理”。

我完全理解王先生的愤懑之情：如果我无故失去自由，当然也会作此激愤之语。不过因为本人在自由的海外，有条件心平气和地思考，所以不能不觉得王先生此说大失水平。唯其尊重王先生，我才不惮将自己千虑一得坦率说出，目的还是想让王先生少失望些，不至于如紫阳一般空等一场。

自六四发生，不断听到人们作出一个又一个斩钉截铁的预言。最初的预言乃是跑出来的六四学领作的，其中最乐观的记得乃是沈彤的，说的是顶多再过半年中共就要垮台，到时他们就能“笑着回家”，那说的是 90 年初的事，到现在已经是 2005 年了，不知何故我党还顽健如斯。

最近的预言是“民运”人士胡安宁作的。据该鸭说，他入关时我英勇的公安战士问他中共能熬多久。他答，如果海外“民运”争气，则顶多再熬 30 年。

老芦是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早在六四大屠杀发生前就在留学生群中以乌鸦嘴惹得天怒人怨，如今又免不得要扫大家的兴，出来给大家高涨的民主主义革命热情泼点冷水。在我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党并无崩溃可能。

作此预言所根据的“天理”，早在三年多前和思云打擂时就说过了：

“在我看来，暴力革命要发生，通常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深重的社会危机，例如外战、饥荒、经济危机等因素引起的民生凋敝甚至民不聊生，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贫富悬殊引起的普遍民众不满等等。

2、 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导致维持社会安定的传统道德崩解，例如中国辛亥革命和伊朗革命前夕，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冲突引起国民思想上的严重混乱脱序；传统权威骤然丧失引起的意识形态真空，诸如沙皇（俄国人民的‘小父亲’）和清帝（中国人民的‘太阳’）逊位后，在俄国和中国引起的国民思想上的无所适从。

3、 一个弱势的统治集团。这种弱势可能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如失去对军队、警察等镇压工具的控制（例如沙皇）；也可能是主观上的懦弱无能，使得统治者不敢痛下杀手，枪打出头鸟，杀一儆百（例如俄国临时政府和晚清摄政王）。

一般来说，必须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时，暴力革命才会发生。当然，和一切规律一样，它也有例外，例如辛亥丑剧就是在只满足后两个条件时就发生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危机远没有今日严重，总的经济情况良好，然而由于两宫猝崩，袁大头趁机弄权，利用毫无人民参与的兵变实行逼宫。因此，它只能说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而已。

根据以上论述，暴力革命一般不可能在一个斯、毛式的极权国家出现，这是因为：

1、 从客观上看，统治者是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强势集团，垄断了全部国家资源（造反是要钱的，许多人忘了这个常识，真奇怪），绝对控制了军、警、特等镇压工具，控制了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人民根本没有可能组织起来，异议人士也没有可能宣传自己的主张。此外，精英既得利益集团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现状的‘钢筋水泥’作用。后面这个发明的蓝图，斯大林早在他的中学作文里就勾画出来了。

从主观上看，统治者是历史上最心黑手辣的匪徒，坚信‘如何巩固政权——杀人’（张春桥语）。不幸的是，这种根本国策行之而有奇效。这是因为人的本性贪生怕死，在极权统治下只有生物保存自己的本能。真正不怕死的志士如遇罗克、张志新之辈大概十万人里也找不到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有规模的挑战力量。

2、 社会不会陷入意识形态危机。这是因为统治者控制了人民的一切信息来源，对人民进行卓有成效的洗脑活动。人类的幸福感，说穿了不过是一种因比较而产生的主观感觉。铁幕不仅隔断了本国和外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了解，而且遮盖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腐化生活。这样，人民便失去了一切比较参考系，不能不相信统治者的谎言而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堂里，而别国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社会里根本不会产生普遍的民众不满。

3、 由于第二个原因。再深重的经济危机也不会转化为社会危机。这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饿死上千万人的大饥荒毫未动摇我党统治。换任何一个别种制度下的国家，那种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一定会使政权立刻崩解。

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极权社会（totalitarian）开始向威权社会（authoritarian）转化时，是社会最不稳定、最容易出现骚乱的时期。此时封闭在罐头里的人民第一次接触到了外界新鲜空气，不但获得了比较参照物，打破了那个原来虚幻的幸福感，而且外来先进文明开始取代原来陈腐的党教条，便造成传统权威的丧失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以上诸因素再加上改革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便容易触发普遍的心理失衡而导致社会骚乱。这就是八九学运的根本原因。

然而，因为民众的松绑主要只在经济上和思想上进行，上述第一条仍然成立，统治者仍然保有强大的镇压力量。如果煽动人民起来去抗争，就是教羊入虎口，白白去牺牲。正因为此，我们才应该谴责以儿戏民命国事来哗众取宠的方大教授、柴大小姐、李大教主之辈。”

（《以暴抗暴只能以暴易暴》）

如今我仍然认为这是基于现实的合理分析，共党会不会垮台，用不着使用寒树教授的伪劣水晶球，根据上面的条条就能分析出来。任何一个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必须承认，1989 年我党面临的社会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远比今日深重，六四开枪后更是全民离心离德，所以沈斗士才会说出“半年即垮台”的话来，那阵子人家都没垮，为什么现在危机缓解后反倒要垮了？请富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同志给大家讲讲其中的高深道理，行不行？

当然，今日中国仍然存在着无比深重的危机，但必须看到，当年的“物价关”已经闯了过去，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虽然出现了骇人听闻的贫富两极分化，但平均生活水平的确大幅度地提高了。富人虽富可敌国，穷人也不是真的活不下去，只要回国跑一趟就能看出这点来。

最重要的还是，当局吸取了教训，以高工资收买了知识分子——社会最不稳定的变数。必须承认，这一着非常高明，因为工农大众从来是愚氓，根本不具备“科学造反”能力，唯一的功能就是被那些宦途失意的小知识分子们煽动并组织起来，奋勇给人家当炮灰。富于反叛精神的青年学生如今成了只想发财的“犬儒”，和 80 年代的大学生完全是两种人。而且，相当数量的大学生都认定西方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记得西方某个著名电视台在去年六四前夕采访了首都大学生，被采访者都坚定地认为中国文盲太多，不适合搞西方民主。似乎可以说，80 年代普遍困扰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形态危机已基本消解。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共的苟安条件，也正是他们有恃无恐、燕巢幕上、醉生梦死、失去了驱动自己进行政治改革以救党保权的危机感的基本原因，这我已经在旧作《“和平恶变”的趋向似难遏止》中说过了。

因此，我认为，目前中国社会虽然危机重重，但那已经被中共用“长期储蓄”的方法推到了未来，社会并不存在即时的经济危机，党内没有政治危机特别是统治危机，社会意识形态危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物质主义和政治冷漠感冲淡稀释，全党没有 89 年式的全面分裂，全国党政军警特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手里。在这种情况下预言我党多少年内会垮台，完全是痴人说梦。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革命乐观主义者，甚至连睿智如王力雄先生都会情不自禁地“等待”起来了呢？原因很简单，他们出于感情需要，不能不相信冥冥之中的昭彰“天理”。

这“天理”便是老祖宗说的“失民心者失天下”。不容否认，共党统治中国 50 多年，现在基本上失去了民心。除了流亡海外的毛共余孽如“民运”坏头头高寒辈之外，举国无一人再相信马列主义鬼话。我党一面自己在搞最下等的官僚资本主义，通过权力疯狂鲸吞国民财富，一面却假惺惺地强迫大众信仰“共产主义理想”，这种劣等把戏，中国人民哪怕再蠢也骗不过去。这就是连接待胡安宁的国安同志都要问中共黑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原因。

但这又怎么的？在中国那种半极权国家，民意到底有什么鸟用处？海内外所谓“民主派”，绝大多数都其实并未与毛共的“民粹主义”决裂，相信人民群众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胡说八道，使得他们看不出自己陷进了可笑的悖论：谁都知道民意只能在民主国家起作用，在专制国家的作用趋近于零，现在您认定民意能够决定中共存亡，则中共政权必然是民主政权，那请问您还折腾什么呢？

说到底，无情的现实是，中共垮台必须满足上述三条件：全面的社会经济危机；社会意识形态危机以及统治危机。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哪怕社会出现了前两个危机即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如果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出现政权危机，仍具有坚定的镇压意志并能控制强大的镇压力量，则无论民怨如何沸腾，骚乱也只会被我党无情镇压下去。

这里面最关键的一条，我看是第三条“内因”，也就是统治集团保持强势。换言之，中共垮台的最根本必要条件是统治阶级内乱。这条件不满足，中共就绝对不会垮，无论人心如何涣散也能苟安下去。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小胡同志现已正式登极。他上去之前，我就看出以后没好日子过了，这契机乃是“西柏坡朝圣”。当时看了那消息（可笑的是，那是从法轮功的报纸上看来的，该报竟然当成好消息报导），我由不得心里直打寒战。如果说老邓当年看中老赵是因为他的才干，那么看中小胡可是因为他在西藏使出来的铁腕。我劝诸位别认错了人，这位同志当得上伟大领袖称赞的“棉里藏针”的铁腕人物，不动声色就把你做了。在他当国期间，我敢断言任何异动都只会遭到无情镇压，I can put my money on it.

所以，劝同志们还是早日死心，别再空等下去了，尤其不要指望紫阳的逝世再次触发政治风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上面早说过了，知识分子大多数对优裕的收入心满意足，苏东巨变和六四更使得他们认定中国走的路是对的，基本上认同了“屠民治国论”，青年一代连赵紫阳是什么人都稀里糊涂，怎么会去为一个他们对之毫无感情的人慷慨激昂，滥洒狗血？更别说当年那些学领以及其后可能有的黑手临难苟免，争先逃命，健步登上大洋彼岸的丑恶表演让人民倒足了胃口。要指望人家上您们的第二次当，这奢望恐怕也太不着边际了些。

我想在此再度呼吁：谁要煽动国内人民造反，完全可以，自己先回国去身先士卒、亲冒矢石，作个光辉榜样给大家看看。倘若如胡平主席那样，身居海外，高车华屋，由外国主子供养，要如刘青般实行“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职业道德”，则我等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真要讲“道德”，讲“良知”，讲“气节”，就该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学黄金律，自己怕死，也要容忍他人怕死。如要辱骂国内精英是“奴才”，是“犬儒”，自己就得剑及履及，率先作个不怕死的道德榜样出来。一味躲在安全的大洋彼岸隔岸煽火，“使傻狗咬石狮子”，这种“圣贤”未免做得太“相因”（胡主席的家乡话，“便宜”之意），太怯懦，太恶毒，太卑鄙。

2005 年 1 月 24 日

除了中共，人民别无选择

——王力雄先生在等待什么之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前文指出中共不大可能如倒共派梦想的崩溃于一旦的客观现实，网友徐建新先生不以为然，说他早就提醒过我，别忘了美国和台湾那两个“变数”。其实我早就答复过他了，那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台不是什么“变数”，乃是可以估死的“常量”。

先说台湾。

但凡对台湾国情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人家最大的心愿，乃是斩断和大陆的一切瓜葛，鸿飞冥冥，从此再不受那孽障莫名其妙、死缠烂打的性骚扰。民进党人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管大陆的闲事。唯一的心愿，乃是巴不得大陆大乱，再也无瑕东顾，他们好趁机独立，这就是那干人如此热心煽动大陆“民运”的根本动机。把那干“精神上的日本皇民”错当成做梦都想反攻大陆的先总统蒋公，指望那“优秀种族”来解放咱们这些“中国猪”、“支那人”，这种春梦只有时空感严重倒错的“焦大”王司令才会作。

再说米国。

当年我推出《重述“民主恩赐”论》，北京小左看都没看，就以为我之所以成了网上大汉奸，乃是因为盼望美国去解放中国，再将民主恩赐给中国人民，及至看了该文的开头（还仅仅是开头），发现根本不是那意思，不免大失所望，立刻写了篇“文章”来“驳斥”我，让我哭笑不得，惊叹世上竟会有这种浑人，有如此胆气公开发表如此弱智的言论。

后来美国打伊拉克，我才发现其实这其实是倒共阵营的主旋律。说来可悲，智力病态已经成了该阵营的常态，所以他们才会热昏到以为民主可以采用“人工授精”的方式，籍武力从外部强行注入一个国情民俗完全不同的世界。

就算民主可以“强奸生子”，老美也绝对没有胆量来解放中国。光强奸区区一个伊拉克就让山姆叔五痨七伤，几乎脱阳。上次大选，国民分裂对立之严重，为越战以来所仅见。伊战前夕老芦发表的预言，如今基本兑现。难道倒共壮士们的脑袋真是花岗岩做的，看了这两年多的无情现实还没醒过神来？

中国可是世上第三大国，人口 13 亿。便借老美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趟进那浑水去。甭说老美，连玉皇大帝都没那胆子。一旦踩进那泥潭去，不死几百万人绝无希望控制住大局。老美乃世上最心疼人命的国家。人家吃饱了撑的，上那儿送死去？

而且，“人不为利，谁肯早起？”老美不是普济众生的观世音菩萨，人家攻伊，说明了是为美国利益。伊拉克乃是数一数二的石油出产国，满地是黑色金子，这才引动了山姆叔。打中国那个资源小国人口大国，请问有何油水可捞？战争必然摧毁中国经济，老美吃饱了撑的，把自家的谷仓往中国兜底倒，去负责养活 13 亿嗷嗷待哺的难民？

所以，斗胆相劝同志们还是退退烧。这都老大不小的了，还说什么“为中共送行”一类的热昏话，没的让成年人笑话。

无情的现实就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共的统治不会崩溃。你承认它是这样，不承认它也是这样。

谁来取代中共？

更无情而且无奈的现实是，在当今海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中，中共尽管倒行逆施、腐败昏聩、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却竟然是最先进的！

凡是冷眼旁观过“民运”好汉们在网上表演的客观读者，恐怕都要同意我在《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中作出的结论：所谓海外“民运”，基本上由毛共遗孽组成，不但和“民主自由”毫不相干，而且代表着当今中国政治舞台上最黑暗、最反动的邪恶势力。虽然说得相当刻薄，但我在《突然觉得民运人士很可怜》中的观察确实非常准确：

> “这些人才是让毛共彻底毁了的一代：无文化，无一技之长，无语言能力在国外生活，无一星半点现代知识，而且因为语言障碍，这辈子也没指望获得这种知识。唯一的兴趣是政治，可除了马列主义毛思想那些

junk 之外，什么真正的学说都不知道。于是一开口就只能冒出那股腐尸味来，连写篇文章都离了那个马祖宗用过的‘幽灵’就无话说，除了党八股就没戏唱，就连作家老郑，写起政论来也只会打语录战（其实老马在隔壁说的一点都不错，他的文章就是青年时代写惯了的大字报的翻转），没有什么想法是自己琢磨出来的。而且，一辈子不相信人类社会就是没有个客观规律、‘历史潮流’——怎么可能呢？这不乱了套了么？一辈子只会崇拜革命，真的以为那就是什么推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的确，这些人完全是时代造出来的残次品，唯一的“学问”就是毛共党文化，唯一的“本事”就是整人搞运动。高寒先生大概是如今全世界唯一一个引用大屠夫斯大林语录作为论据的“理论家”，而王希哲先生活在 21 世纪竟然还以为自己是落难天子，将“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当成圣经，要网民绝对服从他那草头天子，否则就要施加各种毒刑！

最可怕的是他们还没登台，便露出了狰狞面目，动不动就在网上搞运动，兴大狱。当初高寒先生曾在此坛诬陷威胁基本上没写过什么政论的 2u2m，诬陷对方是“国安加强排”，扬言“总有一天要查出你的真身来”。后来老芦不过因为批判了他们的伟大领袖胡平主席，立刻就陷入他们掀起的红色恐怖中，不仅本人被打成共特，连网友都被迫一一表态，和我划清界限。

此后高寒先生更公开披露通过间谍活动刺探来的私人信息，编造海外奇谈，进行赤裸裸的政治诽谤限害，胡说什么国安特务头子多次宴请过我，并公开威胁我，说他日后一旦掌权，就要伪造档案，将我打成货真价实的共特加以镇压，甚至还在网上开设专门的举报信箱，号召芦敌广泛收集我在网上发表的一切文字，以便作为日后大兴文字狱的罪证，而广成子先生竟然也就踊跃响应了这一号召，用一模一样的话语威胁我！

不需要任何智力就能想象出来，如果这些人一旦上台，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镇压反革命”，“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血腥镇压所有与中共有点关系的人以及持不同政见者。须知中共统治中国已经 50 多年，和中共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少说也上亿，就连老芦这决不加入任何政党的独立知识分子，也有党员亲戚。由此不难想象，伪民运掌权后必然要进行的“镇反”将是何等可怕的腥风血雨。

中共再专制、再腐败，毕竟还是早就停止了毛时代的残民运动。如今只要你不公开反对它，起码的人身安全还是有的。有的国内网友长期在网上公开批评胡锦涛，不但没在网上受到我经历过的侮辱围攻诽谤，就连国内当局也并未铁腕镇压。如今老芦身居自由的海外，只不过对胡平辱骂容共知识分子为“奴才”的作法表示了点非议，立刻就遭到如此龌龊、如此下流、如此野蛮的政治迫害与陷害。这截然不同的遭遇，比什么都更雄辩地证明了伪民运确实是远比现代中共更反动的黑暗势力。

令人额手称庆的是，因为是毛共遗孽，这干东西的唯一本事与乐趣便是“与人奋斗”，其主要专业乃是花样百出、层出不穷的内斗，乃是连美国爸爸都扶不起的超级刘阿斗，绝对成不了气候。所以，哪怕是中共真的垮了，他们也绝对没本事出来收拾残局。作为政治势力，他们唯一的功能只是形成网络公害，其对中国日后的走向可能起到的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假定中共垮了，谁有那潜力出来问鼎？法轮功。

记得法轮功初露头角时，海外反共杂志上有人出来引古诗，兴高彩烈地欢呼：“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关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那意思是说，忙于内斗的“民运”“知识分子”们（约等于文盲）一事无成，而不读书的轮子教民们却不声不响地异军突起了，而就是这些人动摇了帝业。

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法轮功在短短几年内，竟然搞出如此声势来，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毫不夸张地说，这夥人已经成了当今中国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谁要是不相信，不妨去看一眼他们开的各种网站、办的各种报刊。

这也毫不奇怪。和伪民运不同，法轮功没有内斗，而这就是它最可怕的一点。

政府镇压法轮功之初，我对那干人还非常同情，写了若干文章抨击政府践踏法制和人权。后来我才发现，老法其实完全是白莲教、太平天国一类的政治邪教，根本不是什么正当宗教。和后者不同，他们的兴趣不在于彼世而在于此世，不在于灵界而在于政界，但又是以绝对服从的宗教方式组织起来的，实行了太平天国式的政教合一，因而最有战斗力、最能成气候，也最反动，最黑暗，最可怕。

其实早在 4 年前，我就给法轮功写了公开信，请他们早日“正名”。如果是政治反对党，就趁早打出政党的旗号来，光明正大地作在野反对派；如果自认是正当宗教，那就不该去搞旨在推翻中共的政治斗争，因为那不是正当宗教干的事。西方早期基督教备受迫害，人家也不曾掀起轰轰烈烈的打倒谁谁的政治运动，遑论“踩江意淫游戏”。哪怕是不被主流教会承认的“耶和华见证人”，在历史上备受迫害，人家也从来不曾干过法轮功干出来的那些事。如此非驴非马、不良不娼、敢做不敢当，专干挂羊头卖狗肉的烂事，对李大教主标榜的“真善忍”简直是绝妙的讽刺，只能在有识者心目中确证他们的邪教实质。

正因为法轮功是冒充宗教组织并以宗教洗脑部勒教众的政党，它才在中国那种愚昧国家特别有发展潜力，也特别有战斗力。所以，如果中共真的垮了，群雄逐鹿中原，我最看好的还是轮子们。那时中国社会将出现什么样的大倒退，简直让人不敢想像。

一句话，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并无可以取代中共的健康政治势力。

中共垮台意味着重大的民族灾难

这话已经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了。当前中国，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积压到了可怕的地步。社会之所以没有大乱，全靠中共的铁腕死死压住。一旦这镇压力骤然除去，则已达沸点的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立刻就会爆发出来。连盲人都应该能看见，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早就到了临界爆发点。而无数土法西斯分子还在网上日日侮辱少数民族，生怕日后的报应不够惨。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共垮台，新疆、西藏甚至内蒙、青海、宁夏等地必然要独立出去，而当地的汉族必然要遭到科索沃式的血洗。

除此之外，内地 18 行省也很可能爆发内战，再度出现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倘若真如此，恐怕还是个比较理想的结局——总比和平选举把李教主选上去作总统强吧？但这儿的变数是谁也不知道会不会用上核武器。

这就是王力雄先生很可能等到的结局，我并不觉得那是什么可以令人翘首以待的乐观前景。他居然将这期待奠基于“天理”之上，不能不让我啼笑皆非。中国从来是上帝遗忘或抛弃的国家，那儿的“天理”只有一条，就是“造

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杀人，就放火，就抢劫，就把国家弄得乌烟瘴气。

说起来，这主要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造下的孽。他让全国人民中了邪，忘记了中国的社会进步从来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的，历史上自下而上的造反作乱一无例外地带来了社会的大倒退。正因为全国人民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中了邪，所以如今咱们又蠢蠢欲动，抱薪救火，饮鸩止渴，想再玩一次 40 年代推翻专制腐败的国府，迎来标榜“民主自由”的共党极权统治的老把戏。

2005 年 2 月 1 日

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机会

——王力雄先生在等待什么之三

前文推出后，有位网友跟贴道：“What a dark future!”（“前途何等黯淡！”）那大概是唯一言简意赅说出该文主题的评论。我那篇文章就是这个意思：中国没有什么光辉未来可言，党国的未来无比黯淡，但漫说共党一时半刻倒不了台，就算真把共党弄下来了，那前景更要黯淡万分，因为比起其他魔鬼诸如伪民运和法轮功来，我党那魔鬼简直可以算天使了。

这大概也就是紫阳临去前的心思吧。王力雄先生以为紫阳在等待什么，他没有等待什么，因为前面并没有什么好等的。凡是看过紫阳先生“遗嘱”的同志，如果脑袋足够灵光，都能从字里行间读出那最明白不过的信息来。

我这里不揣冒昧，替过世的老人家总结一下他的最后最高指示的精神吧：

一、共党和历史上一切专制政体不同，垄断了国家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这种极权国家一旦转型为资本主义国家，毫无制约的绝对权力就必然全面转化为金钱，导致规模空前的全面腐败，只可能变成世上最下流、最烂污、最腐败、最肮脏的资本主义。

二、避免这种局面出现的唯一途径是在此之前便实行政改，采取有力措施防止政治权力转化为资本。

三、唯一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政治家只有老邓一人，连紫阳都不行，因为他没有实力。

四、因为错过了政改，如今的烂污局面便再也无法逆转。如同错过了改革良机的清廷一样，共党政权最后要被忍无可忍的人民推翻。

必须说明的是，我只匆匆跳着看了一遍“紫阳遗嘱”，现在也懒得再去查。如果理解有误，敬请读者指出。

对上述四项指示，除了最后一条我有所保留之外，其他基本同意，就是这么回事。那最后一条我只是后半部分不同意，我觉得人民没有本事推翻共党。我党只会一天天烂下去，最后因为内乱垮杆，将中国再次淹没于血海中。

这当然是为思维超级错乱者无从理解的“悲观理工思维”。正如鬼大那早就该解散的第二党校兼第二体院、教条主义大蜂窝出的唯一异类、已故王小波先生在《花剌子模国信使》中指出的，在中国这种地方，谁胆敢报坏消息，谁就该掉脑袋。想老芦只不过使出六脉神剑的少商剑来，用小指在伪民运的遮羞布上戳了几个窟窿，就被倒共义士们什么都糟蹋过来。如今这大实话一出口，只怕爱党人士也要加入“剿狩大军”。就连比较超脱的八股专家滕文公小六子恐怕也要旧话重提，骂我没本事为癌症病人开处方。

这悲观预言之后的浅显道理，我其实早在旧作中说过无数次了，实在懒得重复。不管怎样，还是重复一下吧。为便于大众理解，这里用提纲将我的基本思路总结如下：

一、既往中国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凡是社会进步都只可能由明君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取得。自下而上的造反作乱只会一无例外地引来巨大灾难，招致惨痛人命损失，摧毁国民经济，并导致社会大幅度后退。

二、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国情民俗特别是毛共统治对全民心术与智力的几乎是不可救药的巨大败坏，现阶段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实行西式民主的软硬前提（请参阅拙著《盲人摸象说民主》），唯一正确的转型途径是参考战前日本、德国、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国的经验，实行“极权社会——开明专制——民主社会”的转化三部曲。

三、要实行这种改革，前提是那明君必须如老邓那样，拥有足够权威与雄厚实力，才能压服党官僚的强有力反抗，又必须像紫阳那样，具有辽阔视野、广阔心胸以及足够的现代文明常识（也就是西方文明常识），才能看到正确的前进方向。简言之，不是“弱主民之福”，而是“英主民之福”。这就是“新权威主义”的芦氏诠释。

四、共党体制和传统帝制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最高统治者没有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威，必须靠下级亲信支持才能保住权位，由此导致了“权威逐代递减律”，构成了现代专制社会的先天内在缺陷。连盲人都应能看到在自毛而邓而江而胡逐代传递中发生的明显权威递减。老邓之后，再无人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威去压服庞大的特权阶级，实行损害他们利益的政治经济改革。

五、如今当国的小胡乃是积极分子团干部马屁精出身的政工人员，是我党那实行负筛选的“吸尘器”层层选拔出来的出类拔萃的超级渣滓（在这点上他

倒有点像敬爱的胡平主席）。他的远大理想就是向 50 年代的“黄金时代”甚至延安时代回归，根本就没有紫阳式甚至老邓式的文明改造中国的意愿。即使他有心，也绝对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威去整肃特权阶级。与此同时，特权阶级已经在江时代长成了多头凶龙，纵起老毛于泉下，恐怕他也没有那神通降伏，何况黄口孺子胡？因此，无论从能力还是从觉悟上来说，他都不具备将中国带出绝境的英主的先决条件。

六、由此可知，紫阳的四项指示的前“三句半”确是真知灼见。但如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的，人民绝对没有本事推翻武装到牙齿的中共。老赵用晚清来的例子来类比并不恰当，因为晚清覆灭的一个重大原因是袁大头和革命乱党控制了国家武装力量。更何况当时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强敌压境，而今日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最有可能的发展前景，就是我党一天天烂下去，最后烂到中央无力控制诸侯，党内发生内讧，国家解体。此时积压多年的各种社会矛盾一定会以百倍疯狂爆发出来，演出世界史上见所未见的民族自杀惨剧。

这腐烂所需时间大概比较长，反正不会是老芦生前能见到的事。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比较开化的东南沿海地带再度实行“东南互保”，两广和港澳组成国家，福建和台湾合并，如此等等。其实，解体大概是解决中国难题的唯一办法，省得半文明者和全野蛮人悉数捆死在一艘注定要沉没的烂船上。不幸的是边疆民族地区一定会变成屠杀场，那儿的汉族同胞绝对会变成屠宰对象，为土法西斯分子们如今在网上造的口舌孽付出血的代价。而从来代表中国落后势力的华北地区可能会落在王希哲、高寒那种毛共遗孽的传人手里。

这就是我根据刘伯温先生的推背图预测出来的可能性最大的未来中国模样。王力雄先生若能见到这篇文章，敬请赐教，指出其中荒谬之处。拜谢！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别的可能，但概率不是很大。最乐观的结局，就是我党及早效法早期的民主英国，实行精英民主。

但凡对西方文明史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民主并不是从来就是今天这种全民民主。例如 19 世纪以前的英国只有一部分人民享有公民权。这限制是随着时代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才逐渐放松的。直到中产阶级成了社会中坚，英国的民主政治才从贵族政治转化为平民政治。

其实中国的改革也可以走这条路，先在党内实行真正的民主，这可不是老毛和小胡在嘴上提倡的的传统明君虚怀纳谏的“民主”，而是将党内的利害斗争合法化、程序化，允许党内各种利益集团合法出现，并循严格游戏规矩在党内争权夺利。换言之，在奢谈“以法治国”之先，做到“以法治党”。

这应该是中国文明化的一个重大步骤。我在旧作中说过，紫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试图在被痞子党彻底毁灭了文化的中国重建文明。这话说得不够具体，因为“文明化”的操作内容多极。这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订出个明确的游戏规则来，强迫大众执行，久而久之大众便形成守法的本能习惯，再不要像毛时代的痞子那样无法无天的胡来一气。

根据鲍彤披露，我党管理自己的痞子方式，真是到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竟然连政治局常委例会制度都需要紫阳来首创！在此之前根本没有例会，更不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制，以致重大决策出台后如果出了问题，参与者竟然可以说他当初就不同意！

因此，按西方文明方式来改善我党的管理，使得党内争权夺利有个正式规矩，便能把权力斗争的阴谋化为阳谋，各派系之间的冲突有个和平的谈判桌，能够及时达成妥协，得到化解，不至于弄到后来兵戎相见、连累全民共同遭殃的地步。

如果小胡能如此行事，则还有三分保权救党从而救国的希望。但前面已经说过了，老芦估死他这超级庸人绝对没有这份胆识，也没有足够权威和实力推行这必然遭受死硬派反抗的改革。所以，这种可能性很小。

其实，我们曾经有过难得的机会，只是被人民愚蠢地断送了。

我在旧作中反复说过，老邓的 obsession 就是改革，因为这是唯一可以使他有别于老毛从而青史留名的事业。而最忠于改革的就是他的大将赵紫阳，他本人对此也心中有数。所以，只要老赵不对他个人起异心，则无论如何他也会保住老赵不让大老们颠覆。老邓虽然没有老赵开明，但此人乃实用主义政客，头脑是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如果没有 89 年那桩烂事蠢事，则老赵根本也就不会垮台。如果老赵在第一把手的位置上坚持下去，不难培养出足够的实力和权威来，获得前面说过的权势与见识的双重条件，成为再造中国的英主。

可惜历史没有这样发生。还是那句老话：在中国这个遭受上帝诅咒的国度，每逢事情有了点起色，人民特别是愚昧绝伦的所谓“知识分子”就必然要奋勇出来把大局弄砸。唉！

胡平先生那伟大的理论家最近想不出“理论”来，改行去做煽情家了。前几天看见他大义凛然的讲话，说中共高官不配悼念赵紫阳。这话或许有道理，不过愚以为，最不配悼念老赵的人，还是那些配合党内保守派把他搞了下来的无耻的“天安门一代”。

2005 年 2 月 4 日

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几句外行话

我和草庵先生之间有个简单区别：是否信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芦不懂经济学，便老老实实承认，可惜我看草先生虽然比我好些，但也根本说不上懂经济学，可他就有那本事自认是经济学专家，据他说连故杨小凯先生都佩服。

那位说了：你自己不懂经济学，怎么还能判断人家不懂经济学？

这很简单，因为草先生上次来给咱们开课露了怯，竟然说什么：

“坦率地讲，我不知道‘经济过热’这个词汇是如何来的，我无法在相应的英文词汇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英文词汇。”

我当即上贴告诉他，尽管我丝毫不懂经济学，但任何一个久住西方的人，哪怕是文盲，也能立刻“在相应的英文词汇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英文词汇”，那就是 overheated economy。一旦人们开始在电视里谈论“the economy is overheated”，下一步就是提高利率，让我等靠按揭买房的人苦不堪言。中文“经济过热”这词汇完全是从英文里直译过来的。

草先生露了此怯，便立刻改口说那是俗话，经济学家不用，我立刻便又转贴来几个帖子，全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包括诺奖获得者）使用“经济过热”这词汇的例子。接着我又指出草先生若干低级错误，诸如连凯恩斯主义是什么名堂都不知道，而要知道凯主义的要旨并不需要成为经济学家，连我这经济盲都绝不会犯下草先生那种错误。

争辩至此，草先生便使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扯到莫名其妙的地方去，开始威胁网友，说是他有国安关系，知道老芦的真身，于是我立刻便跪求他扒我的真身。人家当然不肯扒，于是闹得不欢而散，草先生就此消失不见，很久后才重新露面。

其实我跟草先生毫无过节，并不想和他过不去。说这些话，乃是我见到草先生又在楼下开始“抓共特”的老把戏。我很欣赏草先生的作品，特别是他那些内幕文章，真伪另说，起码非常叫座，而老邓早就教导过我们管猫是黑是

白，只要能逮住耗子就行。不过，我希望草先生和其他同志放弃这种“武器的批判”的不体面作法，严格就事论事。你要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那就先界定什么是经济崩溃，给出具体的指标来逐一论证。如果有人反驳，那就扣紧人家的观点反驳就是了，即使闹了笑话也没关系，犯不上借用国安和／或ＦＢＩ来增强说服力。

这当然适用于争论双方。反驳草先生的人似乎也不必追究人家的罪恶动机，认为人家是故意制造紧张空气，或是巴不得我党不垮，天下不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谁也不能说草先生不是居安思危，作“盛世危言”，警告中共当局注意迫在眉睫的大难。是不是？现代中国人总不能效法秦二世胡亥，把报坏消息的信使打入天牢，让后来的使者只敢歌颂升平，以致楚军入了关中还一无所知。

对于讨论本身，我觉得还是要先明确界定什么是“经济崩溃”，不然就成了传统的百家争鸣，为一个毫未界定、各有不同的理解的模糊概念争论得死去活来。

请问诸位内行，到底国民经济处于什么状态才叫“经济崩溃”？那指的是国家财政破产，，还是指类似 30 年代的大萧条？请专家们先为我等无知网友开开课，讲明这基本概念好么？

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动辄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似乎没有多少道理。为什么？持此论的人常常忘记了，中国虽然走资 20 多年，但至今并非自由经济国家，国家的经济命脉还牢牢地控制在我党手中，所以不能用资本主义世界那套来类推中国的情况。

话说希特勒上台后，利用经济奇才沙赫特作新政总设计师，短期内便走出了大萧条，消灭了失业（此前德国失业率是最高的），他的办法和凯恩斯主义也没什么不同，即由国家出面搞赤字预算，开办大型公共工程，藉此拉动内需，制造就业，恢复群众消费信心和购买力。这一套开头非常有效，短期内便让德国起死回生。

但后来基建摊子特别是扩大军火生产的规模太大，造成经济过热，老沙眼看大难在即，紧接而来的就是泡沫崩解，于是便请希特勒赶快刹车。可老希非但不理睬他，还解除了他的权力。老沙和其他内行都急得要死，算定德国会一头栽入深渊。但过了警戒线后却嘛事没有。他们这才悟出，原来自己根本不知

道极权国家具有多大权力。这种国家能够在危机到来时发挥出多大作用，在正常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根本就梦想不到。

这可是老沙的亲密战友自己在电视上说的。记得他说，他们根本没想到，希特勒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如此简单有效：下一纸命令冻结工资和物价就完了，于是预期中的通货膨胀就此消解于无形。

这种人为粗暴干预，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后患无穷。不过，从中我辈似乎也可以得到启示，那就是别用资本主义国家那套来死套中国模式。例如在西方，股市崩溃确实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所谓“经济崩溃”吧）。30 年代大萧条就是这么开始的。不过在中国那种半资本主义国家究竟是否会影响到全局还大成问题——到底中国公司有多少是上市的？股市运转到底和全国经济运作有多少联系？

更何况中国至今仍然由极权政体统治，这种政体在生死存亡之际从不吝惜滥用权力。冻结工资、物价之类难以在西方做到的事，在我党实属轻而易举。60 年代初那货真价实的全国经济崩溃（财政破产，大批工厂停工解散，全国农业停止产出，全国陷于大饥荒）都没引起政权颠覆就说明了极权政体顽固的生存力。当然，如今党完全失去了民心，如果那种大灾难再度出现，则我党马上垮台。但问题是眼前国内经济似乎还没到那恐怖状态，是不是？即使经济上出了比较大的麻烦，我党还是能使用强大的国家权力予以干扰，把灾难控制下来的。

这意思就是，不要过于轻易地预言“崩溃”。

2005 年 5 月 29 日

胡温，早该这么干了

昨见网友转贴的国务院什么文件，断言中国的医改失败，不由得喜动眉梢：党中央终于良心发现了。

早就说过了，如今中国最黑暗的地方，其实不是官场而是医院，绝对是“院门口，朝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90 年代末我回国，亲眼目睹了白衣天使们吃肉不吐骨头的凶残：不管什么病人，也不管是否对症，一律开昂贵的进口好药，哪怕是无法治疗的癌症晚期也如此，药费每天竟达几千元，三天一结账，交不出钱来立马拔针管赶出去。那穷凶极恶状，就连党电影上都没见过，连捏造出来的《白毛女》、《收租院》都望尘莫及。

中国装模作样冒充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如此，医疗就只能是慈善事业而不是什么盈利机构，哪能把这种慈善部门推到市场经济的主战场上去？哪怕就在最保守的美国，也从未听说哪家医院上市，发行股票。欧洲就更不用说了。福利最好的北欧国家和奥地利不用说，就连英国那穷国都全民享受免费医疗。病人不但不用出医疗费和住院费，就连伙食费也由政府全包。病人住院时连信用卡都不用带。见惯了国外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人，回国去享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实在是吃勿消。

好在如今党中央总算有了醒悟模样，这就值得表扬。本来，这也不是胡温的错而是江朱的错。世上资本主义有千百种，偏偏我党挑上了最烂污的一种，那就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由此制造出了无比深厚的社会危机。其实中国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政治制度问题，而是利用专制制度制造出来的权钱通婚的烂污资本主义。即使是专制国家，也可以是廉洁的国家，改革前的亚洲四小龙就是例证。人家从来就没有咱们现在这种惊心动魄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说句公道话，胡温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超级烂摊子，哪怕玉皇大帝下凡也没办法。

这就是昨天我在余大郎文后跟贴说的那几条的由来：

第一，权威逐代递减律导致胡温难以来真格的，党干已经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胡温绝对没有能耐泰山屠龙，降服那多头凶龙，这点我已经在旧作中多次指出了。

第二，胡温这些左派举措，虽然能讨草根百姓欢心，但必然引起既得利益集团不满，加剧社会矛盾。

第三，因此，胡温必然是无所作为的政权，他们唯一有本事拿捏的就是文化人，“反改革”只会在加强意识形态管制上体现出来。

第四，军内强人的叫嚣没有胡温背景，反而是对“和平崛起”口号的公开挑战。

第五，自由知识分子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不论他们采取什么立场都反正没什么区别。

本人是悲观主义者，预言难免悲观。其实我并不一概反对胡温左转，觉得他们如果决心开倒车，那最好是“政治右转，经济左转”，也就是放宽舆论控制，但对江朱的烂污走资加以刹车，整肃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减轻贫富差距。很明显，胡温这两条都做不到。放宽舆论控制他们不愿，而整肃官僚资本家他们不敢或不能。That's all。

早在胡主席转正时，他流露出来的左转苗头就让我担足了心。果然，老江下去后，他铁腕整肃舆论界，证实了我的担忧。但后来我再考虑了一番，觉得其实此子无足道，折腾一番顶多也就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主。既不能实现打击豪强、扶植民间中小企业、效法台湾走上均富道路的“历史使命”，又不可能开历史倒车，回到他向往的 50 年代甚至延安时代的“黄金时代”去，注定只能是个庸主。

即使大格局如此，也不是说就毫无可以建树之处，眼下这“医改”就是个好题目。医霸们虽是捞饱了不义之财的脑满肠肥的豪富，但并没有掌握什么政治经济权力，完全可以拿来立威。建议党中央迅速下定决心，痛下杀手，排除一切阻力，在医疗战线上大搞复辟，倒退到毛时代去，至少要恢复城市人民的免费医疗。

哪怕胡温在任上就做了这么一件实在的好事，我看作为共党的政客，也就够了。其他的空话还是少说，反正没人信。什么叫大庆精神？和网人“决战”的法西斯梦想有何区别？都是痴人说梦而已。

2005年7月30日

谁来指定第五代核心？

——以“点菜律”预测中国未来

前段几位网友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铁嘴钢牙地预言：“15 年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现全国民主化。”

我看了心里嘿嘿冷笑：哪来的这股子底气？不过，这“15 年”说得很有道理。小胡今年几岁了？他小人家大概今年 65 左右，再过 15 年便是“人生 80 今来稀”，到时候中国就没了万岁爷——谁来指定？就凭他小人家？

早在旧作中说过轱轳话了：现代专制制度不可能像旧式帝制那样动辄传上几百年，顶多四五世而亡，原因很简单：“权威逐代递减律”。

须知旧式帝王的权威是不会磨损的——靠性交传递的“天命”在焉。只要皇帝是金枝玉叶，哪怕传到末代也是天子，绝对不敢有人公开怀疑他继承大位的合法性。哪怕是遇到了奸雄如曹阿瞒，再弄权也不敢轻易篡位：他知道那“天命”虽然看不见，但可是能兑换成实力的政治权威资源，所以这才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即使是他儿子篡位，也得弄个“禅让”的花头欺骗草民，通知大众上天已经改变天命的传递方式，从生殖传递暂时改为无性传递了。

这或许就是老袁没做成皇帝的原因：他少了一道工序，却指望人民相信真命天子可以通过民国票箱产生。一旦他放弃帝位，重做他的终身大总统后，尽管问题的实质一点都没改变，各地“护国”烽烟立刻就熄灭了。所以，说到底，那“护国运动”跟“维护民主”毫不相干，而是人民不相信票箱可以制造天命，那玩意只能来自子宫。人民可以容忍独裁者，但绝不能容忍“假命天子”，此所谓“替天行道”，或更准确地说，是“人民替天打假”。

换言之，在传统社会的治世里，根本就没有网友阿随那“谁出钱谁点菜，谁强大谁说了算”的“点菜律”。明神宗罢工 30 年，也没见哪个强有力的奸臣敢去篡位。只有在乱世，“点菜律”才会起作用，拳头最大者才会经过残酷的竞争脱颖而出，做了全民的大爷。但那竞争只是暂时的，一旦点定了那道主

菜，天下复归一统，则大众只好捏着鼻子吃那道馊菜，一口气吃上几百年，直到饥荒或 / 和外患带来下一次丛林竞争，让点菜律再度发挥筛选作用。

这恰好是新旧专制制度的本质差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旧制度相对于新制度无可弥补的优越性。具体来说，传统社会只有在乱世才实行“点菜律”，而治世则靠“天命”提供系统的自稳。但“新”社会可不是这么回事，谁也别指望靠性交获得天命的好事，“谁的拳头大谁是爷”的“点菜律”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要不伟大领袖也用不着发动文革了。如果他老人家早生一百年，原也不必操那份儿心：甭说没人敢篡位，岸英同志继位也是天经地义，何必还特地送到朝鲜去，靠立下功劳而不是靠遗传获得天命，具备当国的权威？

换言之，“新”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潜在的乱世中，一时没有大乱，不过是拳头们达到了暂时平衡罢了。这种社会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哲学预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无产阶级马屁家们歌颂今日中国欣逢“太平盛世”，实在是发错了梦。

因为缺乏天命，老一辈革命家不得不动脑筋找替代物，这替代物就是“指定”。可惜，这玩意根本不能代替天命。那原因再简单不过：天命是不可竞争的，谁听说过处于治世的传统社会中有人去“竞争上岗”做皇帝？此所以“点菜律”根本无效，那玩意只有在处于丛林竞争状态下才能起作用。但“指定”则完全对竞争开放。

再说明白点吧：如果在传统社会，老毛进京之日，也就是岸英同志搬进东宫之时，无论是刘、是周、是朱、是彭、是林，谁也不会做梦想去跟岸英竞争，哪怕他们再功勋卓著、岸英再无尺寸之功也这样，因为功劳和子宫根本就是不可比的，再疯的疯子也明白这道理。前面已经说过了，天命只能来自子宫，而不是什么后天的功劳或别的东西。

一旦废除了天命，麻烦就来了。先帝当然可以指定新君，问题是，先帝并非上帝，他的指定并不等于上天指定，跟功劳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因此，尽管先帝爷指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可他小人家大位还没坐热就给老邓搬下去了，当时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没人觉得那是篡位一类的叛逆大罪。何也？老华靠的只是先帝的指定，老邓靠的是功劳以及随之而来的实力。指定和实力较量，也就是话语跟拳头打架，谁输谁赢是不用说的了。

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指定”的权威便越来越淡薄。当精神权威不复存在时，剩下的便只有拳头，于是统治集团内部就完全成了丛林世界，“点菜律”成了决定生死荣辱的唯一大法。在这种丛林中寻求“和谐”，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

哪怕是盲人都能看出来，党国的四代核心比下来，那权威绝对是一代不如一代，小胡不如老江，老江不如老邓，老邓不如老毛。待到需要指定第 5 代时，小胡说出来的话还能有什么份量？

更糟糕的是，因为靠点菜律产生君主，我党就不能不实行老人治国。这道理非常浅显：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冲龄践祚”，七八岁登极也毫无问题，所以可以作几十年的皇帝。党国领袖可是靠积累功劳和实力获得竞争资本的，不熬到相当年龄根本就没有资格。于是便成了 60 岁的人代替 70 岁的人。指定的太子就算是上去了，顶多也就只有 10 年的功夫来树立政声、剪除政敌、排除异己，安插亲信，而这些工作都不可能在他当储君时完成。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如此多的重大任务，稳固权力基础，对竞争对象取得压倒优势，实在超出了常人的能力，何况那常人还是个花甲以上的老朽。

小胡不就是这样么？亲政时已经是 60 几岁了，到 70 岁就得退休，这么几年里，他能完成上面说的那一系列繁重任务么？不管他主观抱负和能力怎么样，客观形势决定了他只可能是个地位虚弱的庸主。其实现在他就已经到了应该指定接班人的岁数了，可他说的能算数么？他自己泥菩萨过河，光应付潜在的挑战都来不及，又有那闲情逸致如老毛老邓那样，从容挑选和考察接班人么？老实说，这第 5 代核心怎么才能产生出来，老芦愚钝，还真想不出来。

问题在于，要治理中国那样一个广袤复杂的国家，没有强大的中央权威，那就只会引来噩梦。就算竞争接班人的党内丛林搏斗不至于如文革那样波及全民，一个虚弱的中央也无异于鼓励野心家特别是野心军人冒险。前段朱成虎的鼓噪似乎就是个不祥的暗示。在这种情况下，更可能的前景是“15 年内发生大动乱”，而不是“15 年内实现民主”。

这就是现代专制制度的最大难题。爱党同志热衷于歌颂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可从来没有讨论过这最明显的内在缺陷。其实正是这缺陷，决定了帝王制度能缔造的几百年安定再也不可能在中国重现。老芦虽然认定中国今天并未具备实现民主的主客观条件，最适政治制度乃是开明专制，但这方案是否具有客

观可行性，看来还大是问题。这个内在缺陷若不弥补过来，哪怕是党国领袖有意实行开明专制，也不可能避免权力斗争引起内乱，和全国人民一道，栽在为阿随阐明的“点菜狼羊律”上。

从理论上来说，纠正这内部缺陷的唯一途径，是向西方学习，化丛林为公开的费厄泼赖的竞技场，化暗斗为明争，化勾心斗角阴谋权术为正当竞选。大家都有通过正当途径竞选上党国领袖的正当机会，则不正当竞争甚至阴谋政变也就消于无形了。因为党国领袖是光明正大竞选上去的，自然也就像美国总统那样，自宣誓就职起有自动具有了足够权威，用不着再煞费苦心地去培植自己的权力基础。

这么说，还是只有民主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也不是。我的意思是，中国现下的政治改革方向，既然无法做到“逐步回到‘解放前’”，实行开明专制，那就应该向前南非种族政权学习，先让一部分人民主起来。既然我党不愿也不能把公民的基本人权一步还给全国人民，那就干脆先从党内开始，把全体党员变成像前南非的白人那种享有一切西方人权的正式公民，非党人士则暂时作为黑人看待。

这种有限民主，相当于历史上英国实行的有限民主，即将公民权限制于具有一定财产的人民之中。如此便可绕过“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的前提，不会因骤然实行民主而造成社会动乱。这当然不是全民民主，但比起现行的黑帮会政治来，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应能从根本上解决上文论述的现代专制的内在弊病。在全国水平，它可以看成是一种开明专制。

2005 年 10 月 6 日

胡温，屠民并非治国之道

12 月 6 日，广东汕尾市东洲村为政府征地修建风力发电厂事，爆发警民冲突，造成血案。我觉得，此事提示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暴力革命前夜，如果中央再不痛下决心改弦易辙，则大祸不远矣。

一、到底信谁的？

海外媒体和中国官方对此事的报道内容出入很大。据香港报纸报导，汕尾市政府计划在东洲村征收土地兴建电厂，因赔偿问题未能达成协议，加上官员贪污侵吞赔偿款，自去年 10 月起，就不断有村民在电厂建筑工地外示威抗议，让工厂无法开工。 12 月 6 日，由汕尾市政府多名高官押阵，约千名军警与镇暴部队赶至东洲村，但村民拒绝散去，而且邻村民众闻讯也赶到声援。双方因此发生冲突，武警开枪造成血案。

而据今日《广州日报》报道，则是一小撮坏人违法煽动数百名暴民围攻发电厂，并投掷鱼炮和燃烧瓶，警方因施放催泪弹无效，被迫开枪警告。由于当时天色已黑，现场非常混乱，造成误死误伤。

关于死者人数也各说不一，据《纽约时报》报道，共有 20 多名村民被杀。据说国内风传的更是高达 70 多人。而据《广州日报》，整个事件只有 3 人死亡、8 人受伤，其中 3 人受伤。

到底听谁的？本人倾向于相信海外报道，原因很简单：第一，人家是独立媒体，而我党发布的是官方消息，代表冲突一方。根据常识，两造的话都不能轻信，无论是受害方还是施暴方都如此。相比之下，独立媒体的报道要可靠得多。第二，媒体报道的此事暴露出来的社会弊病与本人的经验高度一致。大陆确实是无官不贪，有吏皆墨，而农民正是无依无靠的宰割对象，用如今流行的准官方意识形态“狼羊律”来说，他们就是典型的弱者，无助的小羊，活该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府敲骨吸髓。

因此，我觉得无论是工厂强行占地，还是官员中饱私囊，乃至死亡人数，都是海外媒体说的比较可信。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政府既然代表镇压一方，当然有缩小事态规模的天然倾向，更何况那“一小撮”之说实在太熟悉不过了，当初北京几百万人上街游行不也照样是“一小撮”么？连在全世界荧屏上发生的和平示威都成了“武装暴乱”，我党怎么还能指望世人相信他们的报道？

这当然不是说我党发布的官方消息完全是谎言，例如那村民投掷鱼炮之类，我就觉得很可信。那道理一点都不难明白：我早就告诉过我党了，中国人民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伟大领袖为了在他死后还能推翻今天这个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花了足足 10 年的光阴把人民训练成了无法无天的暴民，这本是伟大领袖高瞻远瞩埋下的定时炸弹，如今开始发作了，而这就是我这文章要重点说的事。

此段要劝告我党的，就是不要再刻舟求剑，自作聪明，要与时俱进。须知今日已是信息时代，毛时代那种靠封锁信息来为民洗脑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再不灵光了。如今再搞这套，只会使我党陷于被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小道消息流行是大道消息不发达的结果”。自家掩耳盗铃，指望一手捂住盖子，唯一的客观效果就是让国内民众从国外听到有关消息，口口相传，越传越蝎虎。因为这些消息早于官方报道，而且官方报道的信用在人民心目中已经彻底破产，百姓自然就只会先入为主，听风就是雨，反而可能在流传中编造出神话来。

因此，还是我早就说过的那句话：哪怕是为了我党自己的利益，揭盖子还是比捂盖子强。放开舆论管制对维护党国统治利大于弊。即使不能做到媒体独立，起码也要抢在西方媒体之前报道类似消息。似这般欲掩不能，欲盖弥彰，乃是世上比较愚蠢的事，只有蠢如我党才看不出来。

二、欲使国民守法，政府先得守法

此事一出，就有人出来痛责中国人民不懂法治，天生就是暴民胚子，并引用西方镇压犯法者的例子来证明屠民有理。我觉得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了。

本人并非所谓“民粹主义者”，并不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毛共屁话，但也不认为无论什么事都一律苛责百姓，为官府

辩护是什么客观立场。相反，我认为拉这种偏架只会坑了我党，让他们看不到大祸就在眼前。

凡是在西方生活的人都该知道中国的“法制”和文明世界的“法治”的根本区别，前者是法家的“法”，特点是单向性，统治者自己并不包括在内，只要求百姓无条件臣服；而后者则是社会契约，人民要守法，政府同样要守法，无论哪一方犯法都要受到严惩。此其一。

其二，中国百姓确实是法盲，但这首先是中共的过错。毛泽东本人的名言就是“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留给后世的影响最深远的政治遗产，就是把全民训练成了无法无天的痞子。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十年中接受的训练，不是如何学作文明公民，而是如何起来抗暴造反，推翻剥削压迫者。这就是建设文明中国最大的难题，就是中国最具体不过的国情。制定国策必须针对这国情出发，光在道义上追究谁是谁非，一点意思都没有。

要拆卸毛留下的这个炸毁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我看唯一的办法，还是把中国建设成法治国家。而要做到这点，需要的不是法家的法，而是法治国家的法。因此，我党必须先让干部带头守法，并依法严惩那些玩法渔利残民的贪官污吏，这才是从根本上消除动乱苗子的治本之策。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将司法系统独立出来，使得我党自胡温以下，统统处在法律的管束下。舍此不由，一厢情愿地指望民众遵纪守法，自己却违法乱纪为所欲为，那么百姓便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变成守法公民。这个问题已经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我再重复一遍：中国现阶段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在我有生之年，也没有希望看到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而且，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变成法治国家，就算是托列祖列宗之福了。不将中国建成法治国家，则中国就永远不具备建立民主社会的硬前提（请参阅拙著《盲人摸象说民主》）。更重要的是，建立法治乃是我党自救的唯一出路。如果这社会改造不完成，则我党必将毁于毛式暴力革命。

上面说的是基于功利分析的必要性，从可行性来看也是这样。只要不是白痴就该看出来，改造政府总比改造百姓容易。所以，使百姓守法难，使官员守法易。如果胡温连相对容易的社会改造任务都没本事完成，又岂能将人民改造

为守法公民？而如果不完成这生死系之的社会改造，从根本上去除产生民怨的社会原因，却指望以单纯镇压去迫使百姓循规蹈矩，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如今公正才是硬道理

老邓留下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成立，但如今社会不公已经到了世界第一的地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咫尺枯荣异，惆怅难再述”，已经完全成了神州大地上的现实。如此欲求长治久安，有史以来，未之见也。

网友们在楼下争论中国人是否有仇富心理，其实是追究责任究竟在官还是在民，当真是可笑之至。现在的问题不是追究责任，而是承认具体国情，根据这具体国情对症下药，救国救民救党。

为使同志们理解这点，现假定仇富心理在中国百姓中确实很普及。那又便如何？这就是中国国情，你制定国策不尊重这国情，就一定要恶化社会危机，使得暴力革命发生的可能日甚一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暴力革命前夜，在这种危如累卵的时刻，为救燃眉之急，哪怕是牺牲经济发展去“均贫富”都是应该的。既然我党把稳定看成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何就是为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私利，死也不肯去解决这最大的社会危机？

其实，我早在旧作中谈过这个问题了。落后的农业社会当然都有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中国传统社会自不例外，从圣贤那儿就开始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诲，此后“等贵贱，均贫富”一直是农民“起义”的口号。

尽管如此，传统社会仍然是世界历史上最稳定的社会，那原因很简单：儒道释阉割了百姓的反抗基因。儒家把“上下尊卑”的观念牢牢地刻在人民心头，“犯上作乱”一直被百姓视为十恶不赦的大罪。这洗脑有效到了这种程度：如果看看史书，你就会发现，就连那些“农民起义”头子内心深处其实都有深刻的罪恶感，认定自己是“做贼”（现代语为“当强盗”、“作土匪”）。而释家则教育百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地主老财有钱，是人家前世修来的。穷人只要认命，循规蹈矩，则来世也有作富人的命。

另一方面，儒家和释家也对富人进行洗脑，教育他们节制私欲，乐善好施。释家更以轮回转世和地狱学说，威慑为富不仁之辈。因此，传统社会中很少见到今天这种毫无忌惮吃人不吐骨头的两足动物。

这套传统伦理到毛时代就给彻底批倒批臭了。我党为了夺权，以及在掌权后为了把全民逼上梁山，刻意用“阶级斗争”学说为全民洗脑，用仇富心理改铸了人民的灵魂，把传统社会的富人统统说成是豺狼，把穷人统统吹捧为天使，唆使煽动百姓去打杀地主。再加上彻底破除了“迷信”，于是便造出了如今的病态中国人。其中穷人极度痛恨社会不公，向往毛时代的“公平与廉洁”，而新一代官僚资产阶级则完全没有任何伦理约束和人道观念，当真是马克思说的，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就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所在：富人和穷人都进入了毛为他们指定的角色：穷人被训练成了无法无天抗暴造反的英雄好汉，富人则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论者”，真个变成了我党在 60、70 年代中发动的“忆苦思甜”、“阶级教育运动”中捏造出来的那种豺狼。毫不夸张地说，上下两千年，环球八万里，无论是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到当今中国这种如此适合于毛式暴力革命的国家了，它早就彻底完成了毛式革命的全民理论准备，如今更按毛的假想模式逼真地制造出了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党国领袖就算是白痴，也该知道今天不再是把脱贫致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当成“主要矛盾”的时代了。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再讲“发展才是硬道理”，完全是切腹自杀。须知革命并不一定只发生在饥寒交迫的国家中，却常常发生在经济畸形发展，百姓生活水平较前大为提高之后。法国大革命如此，中国的辛亥革命如此，伊朗革命也如此。那道理很简单：社会极不均匀地富裕，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更容易引起爆炸性社会危机。

四、中国已经到暴力革命前夜

虽然科技进步基本剥夺了人民暴力反抗政府的物质可能，但我党仍然坐在时刻会爆发的火山上。老实说，如今的社会危机，远远超过了国共革命时代。据中国官方统计，去年一年全国各地就发生 74,000 起暴乱或严重骚乱，较前一

年大幅上升。如果现在国外有当年苏联那种颠覆势力，我党早就被推翻几万次了。

胡温必须牢牢记住，光靠暴力镇压，哪怕军队再强大也是有限的。就算你有几百万武警和防暴部队，如果全国同步进入大乱，这些部队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如果再爆发兵变，只怕两位要变成齐奥塞斯库。那时你就算有氢弹原子弹中子弹又如何？还不是一堆用不上的破铜烂铁。

今日中国还没有大乱，无非是因为没有个当年的中共在那儿组织煽动而已。但这种“稳定”岌岌可危，一旦出点大事，例如大灾荒、对外用武、中央内讧等等，全国马上就要变成修罗场。那时积蓄了几十年的仇恨爆发出来，引起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大屠杀，只怕要让古往今来一切人类自相残杀的惨剧都瞠乎其后。

所以，再次劝告胡温居危思危，早日痛下改革决心，政治右转，经济左转，迅速放开舆论管制，实行司法独立，不要再因循苟且下去，变成党国和民族的罪人。

2005 年 12 月 11 日

从加拿大华人惨死说到网人的民主痴梦

昨天在网上看到，到加拿大“留学”的两位衙内把在国内那套使出来欺压越南人，当场血溅当场，魂丧异域。国内网友立刻从此事在国内引起的反应中看出了官家奉行“狼羊律”的恶果，而别的网友则或叹“仇富心理”，或叹“中国人的冷漠”。

对此事应该如何解读？我觉得，争论各方说的都有一定道理，无非是看问题角度不同而已。此事折射出来的社会弊病和国民心理非常值得重视与讨论，这里不揣浅陋，略抒己见。

一、“仇富心理”是官家半公开奉行“狼羊律”的必然结果

那些将“仇富心理”归结于中国传统甚或是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同志，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为何香港台湾的中国人没有这个特殊问题？就算是大陆人也罢，区区在下受帝国主义糖衣炮弹轰击凡 20 年，已经养成了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并不仇恨或嫉妒所在国的大款们，然而加拿大那惨案竟然毫不引起我的任何同情。相反，在潜意识中，我甚至还觉得“活该”，虽然自己知道不该幸灾乐祸，竭力想把这种念头压下去。

相比之下，如果是国内惨案，远如六四就不必说了，近如黄静女士惨死，乃至最近出的汕尾惨案，都引起我的强烈同情甚至愤怒。即使是华人赵燕无辜被打，也一样引起过我类似的情绪反应。

这在精通毛共阶级分析的同志看来，当然是我阶级感情的表现，所谓“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老芦是根歪苗黄的黑崽子，自然要向雷锋叔叔学习，学会了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

可惜这套只适用于痞子们，并不适用于深受传统文明熏陶的士大夫。这些同志的视野基本上来自于我党教育，非常之狭窄，所以他们看不到，草民百姓中普遍存在的所谓“仇富心理”，完全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仗恃权力在手，倚

冰山如倚泰山，作威作福，欺压蹂躏百姓无所不为引起来的民众反弹。如果百姓连这种起码的自尊反应都没有，那当真是生贱了。

昨天我那文章已经说过了，中国的新贵们和古今中外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毫无伦理道德施加的自我约束，因此无所不用其极，丝毫没有什么“克己复礼”的概念，更不怕地狱报应。而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西方，富人常有一种罪恶感，常常在下意识中将“财富”和“罪恶”联系在一起。就连《圣经》中都有“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之说。正是这种社会意识约束了富人的社会行为，使得他们热心以慈善事业去“赎罪”，怜老惜贫，乐善好施，在极大的程度上缓解了因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矛盾。

老芦痴长几岁，算是见识过老一代富人吧，相当熟悉人家这种传统心理。哪怕是在“新”社会这些人变得一贫如洗，这种慈善情怀仍然终生不变。

我终生难忘的两件事，就是在孩提时代，小姐姐率大家去湖边游玩，捡到一匹布，兴高彩烈地拿回家去，却被先母严辞斥骂了一顿，说失主不知道该怎么个着急法，逼令我们又步行几里地送回原地，在那儿等候失主来寻。另一件事则是文革期间，一日先母和我在街头遇到一个麻风病人行乞（那时文革乱七八糟，麻风病人从传染病院跑出来也没人管），吓得我们立刻逃得远远的。但母亲越走心里越不自在，最后就果断率我再返回去，但那乞丐已经不见了。我们足足找了四五条街，最后才找到那乞丐，母亲把身上的所有钱和粮票都掏空了，全部给了人家，而我却让乞丐那烂掉了鼻子和手指的可怕形象吓得灵魂出窍，一个劲地往后拉母亲，想让她老人家站在安全距离之外。

这种事，在今日中国能够想像么？请诸位到楼下看看阿随和其他党朋那些新富们的心声。在他们看来，富＝成功＝伟大＝强者＝天然具有为所欲为蹂躏弱者的权力以及权利，穷＝失败＝渺小＝弱者＝活该被强者践踏。

中国有史以来，世界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个统治者敢说出阿随那些话来：什么国家是私器，是富人俱乐部，毛泽东卖国是富人之间的交易，人家爱划点什么势力范围，关你这穷棒子什么事？轮得到你说话么？等等，等等，如此嚣张猖狂放肆，视草民如无物，而且竟在国内成了准官方意识形态，你还去怪百姓有“仇富心理”，指责人家“充满深仇大恨”！

简言之，中国的新贵们和传统社会以及西方世界的富人有三个本质区别：

1、除了民间资本家外，统统是为富不仁，他们的“成功”不是比尔·盖茨那种靠真本事的成功，而是是罪犯的成功，基本上是靠贪赃枉法、利用手中权力大规模掠夺民脂民膏聚敛了大量社会财富。对这些人来说，富确实等于罪恶。

2、这些人铜臭薰天，斯文扫地，毫无自我约束，骄奢淫逸，暴戾恣睢，践踏欺负草民弱者无所不用其极，哪怕在这个坛子中都看得出他们的嚣张气焰来。

3、这些人目光短浅、利令智昏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居然公开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丛林哲学，其价值观和文明世界彻底相反，竟然以抢劫犯罪为荣，以被抢为耻。过去还只是笑贫不笑娼，如今以阿随为代表的党朋们居然歌颂起江洋大盗来，甚至说：这就是宇宙运行规律，谁让你没权力？不服气，你也来抢阿！只要你真有本事抢了天下，我便奉你为祖宗。哪怕我一再提醒他们百姓并不真是羊，欺负狠了也会变成狼，这些同志就是醒不过来。

一个社会竟然烂到了这种可怕地步，不能不让我这局外人不寒而栗，为“大灰狼”们以及“狼崽子”们捏了把汗，可惜这些人还望乡台上打莲花落，庆贺“唐虞盛世”！当真是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上天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百姓不闻祸则喜，那就毫无血性了。人家不特地写感谢信给那几个越南人就算是好的了。

二、笑看网人的糊涂“民主”春梦

某网友是研究“推背图”的专家，惯作惊世大预言，昨天又胡话连篇，铁嘴钢牙认定，中国 2020 年就能实现民主化。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我那《盲人摸象说民主》推出也有 5 年了，诸位何以至今还是不明白民主是怎么回事。那不是写得 idiot-proof 的么？连芦娘子那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都看得津津有味，而且立即就看懂了，诸位天天奢谈政治的人何以就是看不懂？

再说一遍：民主不光是个全民选举的问题，实质乃是社会各阶级、各集团和平分肥。如今我党完全变成了富人党，我军我警完全成了富人的护院家丁，

人家苦心孤诣的就是要独吃独占，尔等要人家交权，退回到和羊们同一个平台去，和平竞争政权，有可能么？

我党就是有心，也不敢放这权。民间仇深如海，正应了林副统帅的话“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民主乃是绅士的游戏，前提就是大家守规矩，和平争权夺利。如果社会危机不消解，你敢敞开让人家八仙过海来争权夺利么？只怕要争得血流成河！

这里再说一次轱辘话，把写在《盲人摸象说民主》中民主社会实现的前提再开列于下：

硬前提：

1、国家必须是法治国家。

2、国家的威权暴力机构诸如军队、警察、情治系统、政府机构（包括公务员系统）必须中立化或曰国家化，超脱于党派政治之外，只服从民选政府，不得受任何党派和私人控制指挥。

软前提：

1、公民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知道去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客来。

2、公民具有强烈的责任和义务观念，遵纪守法，尊重游戏规矩，知道尊重服从不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和一切立法。

这两条合起来就是所谓“公民意识”。

请问诸位革命乐观主义者，现在中国究竟具备了哪项条件？有什么希望在诸位开出来的日程表内实现？

说穿了，白让尔等在西方混了这么久，还有幸在本坛蒙受本人耳提面命多日，弄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民主，以为那就是简单的全民选举。那又有何难？中国不是一直在搞普选么？那就叫民主？

其实诸位如果真懂点政治，就该看出我为何要提出建立法治国家的主张来了，而那就是“政治右转”的重大内容。这是在当前国情下兼顾各方利益的最佳方案，如果胡温连这条都做不到，那请诸位最好还是死心，乖乖认同老芦的“无解论”。

三、政治右转，经济左转的具体操作内容

政治右转很具体也很简单，那就是我一直在鼓吹的“开明专制”，也就是“大陆香港化”。按照香港的模式去作就行了，英国人在那儿搞的其实就是开明专制。党从司法系统中彻底退出，逐步放开舆论管制，首先放开媒体对贪污腐败的侦察监控与披露，再逐渐全面放开，实行司法和舆论独立，党国不得干涉，并效法香港廉政公署，将现有的反贪机构改为独立于党政之外的监察机构。

经济左转就是从严打击靠权力鲸吞掠夺全民私产的犯罪行为，抑制豪强，立法限制官僚资本扩张，禁止江泽民时代实行的由党官僚疯狂化公为私的“改制”，扶持民间中小企业，使得所有的企业都处于同一竞争平台，按相同规则和条件竞争，实行台湾香港式的均富。

四、可惜，这也是春梦一场

以上所说，乃是救党救国救民，化解重重社会危机，避免暴力革命的最低限度措施。但我党决计作不到，原因早就说过了。

第一，胡锦涛的世界观早在 50 年代就已铸成，乃是花岗岩脑袋，高效炸药都炸不开。他的理想就是 50 年代的“太平盛世”，看得见的一线光明乃是延安枣园窑洞里的油灯。

第二，现代专制社会特有的“权威逐代递减律”决定了他只能是个庸主。即使他有心，也没有能力压服我党那多头凶龙。如果他真敢采用我上述建议，只怕要身首异处，步商鞅后尘。

诸位又要怪我泼冷水了，其实赵紫阳早在遗嘱里说过“没治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凡是对中国国情民俗历史有深刻了解而又天资颖悟者，绝对不会说出鞍子那种一厢情愿盲目乐观的话来。

诸位要责我悲观当然可以，这就请去敦促中央实现我上面开的政治右转经济左转那两条。那总比实现民主容易得多吧？如果容易者做不到，困难的反而能实现，请问那是什么道理阿？做不到这两条，则我免不得要请诸位闭嘴，少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乐观调调，这种儿歌成年人听来实在倒胃口。

那我的推背图是什么？

迄今为止，老芦在网上作的预言还没有不兑现过。诸如 2000 年预言阿扁当选；侵伊战争前预言灾难结局；2004 年预言蓝军获胜（可惜枪击事件未让它兑现，幸亏我事前已经加了个前提“如无意外情况发生，蓝军将胜出”）。这里再把我的信用押上去，预言一把：

我不是“崩溃论”的信徒，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中国没有希望实行民主，变成西方那样文明国家。最好的出路，就是在我有生之年也就是 20－25 年内完成香港化，为最终民主化奠定基础。

但这最佳可能性并非最大可能性，相反，它的可能性相当低。最大的可能，还是中共就这么一天天烂下去，既不被革命推翻，也毫无好转希望，到我死后可能由军界强人夺权，实行某种程度上的向毛时代的回归。此外，因突发事件引起全国大乱，我党被革命加内讧推翻，全国碎成七八十块，内战持续半个世纪的可能也不能排除，虽则可能性不是很大。基本可以排除的就是实行民主的可能。在 25 年内，中共既无希望和平演变实现民主，靠暴力革命求之就更是缘木求鱼，越走越远。

但愿我这推背图是伪劣假冒盗版货，苟如此，则苍生幸甚！

2005 年 12 月 12 日

我知道的一个“成功者”

那就是我原来所在的厂子的厂长。此人是老转，胸无点墨，初中毕业吧，还是文革里的初中。70 年代复员回厂，作了车间书记，90 年代原来那些厂领导因经济犯罪被调走或下台，他便作了厂长兼书记，一直干到大前年。在他治下，工厂从繁荣走向衰落，最后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于是他就让工人“买股票”，不买者就要开除，然后再用那钱去为工人发工资。

因为逐年亏损，上级觉得这工厂成了负担，前年（还是大前年？记不住了）便把工厂卖给了他，作价 3 百万。这真是胡来，因为他此前已经让工人认股，工人也有产权，可“改制”时就根本没管这些。这小子把厂子买了下来，发给工人三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也不开工，就卖那工厂，转手倒卖给港台商人，光地皮就卖了上亿。

这里的猫腻，恐怕就是白吃也能看出来吧：他名义工资每月也就两三千元，买厂子一口气掏出 3 百万来，接着又给几百个工人发遣散费，这钱到底是哪儿来的？那工厂的资产积累了几代人的血汗，包括我和太太的血汗在内，凭什么以如此廉价卖给他一人？

与此同时，我原来认识的那些穷哥儿们个个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对夫妇连水电费都出不起，只能到门前严重污染的池塘里去洗菜，天一黑就上床，因为没有照明。论文化程度和技术能力，这些人和那厂长毫无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政治上的，凭什么一个在天上，大众在地狱里？

因此，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在今日中国，除了白手起家的民间资本家外，凡是因做官变富者，绝对是罪犯，对这些人来说，富就是罪。

可就是这种掠夺了民脂民膏的罪犯，占尽便宜还要卖乖，反过来还要笑话被他们掠夺的受害人无用，无能，是弱者，天生该被淘汰，是上天造出来给他们吃的小红帽，这未免也欺人太甚了吧？还有脸拿西方富豪说事，以为自己和人家是一个类型的人，呸呸！

那厂长其实民愤不算大，在该厂的厂长中算是比较好的了。可就这种人，按文明世界甚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来说，也绝对是罪犯，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该同志要送孩子出来，以几亿的身家完全是小菜一碟。如果他孩子在国外遇难，您说我那些穷哥儿们会掉眼泪么？如果不掉，是不是就是体现了中国人冷漠心肠，抑或是“仇富心理”的民族劣根性？

2005 年 12 月 13 日

劝同志们千万莫拿美国跟中国比

否则越比越糟糕，连这都看不出来，当真蠢得可以。

昨天我那帖子贴出来，某网友跟了个帖，也没打开看，光看了标题，那意思是说，同样的事在美国也有，他的朋友所在的公司的老总把公司办得一塌糊涂，非但没有受到惩罚，走时老板还赠送了一大笔钱，云云。

那位网友搞笑了。请问，那家公司是国立还是私人的？如果是国立，则你说的绝对是神话。美国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你到欧洲去看看，如果真把国有企业搞亏了，人家要大张旗鼓成立独立中立的调查机构来研究琢磨你是怎么滥用纳税人的钱的。如果是私有的，那完全是老板自由决定的事，人家的钱，爱怎么花你管得着么？这谈得上抢劫民脂民膏么？

可我说的那事是这种性质么？我举那例子，说的不是那厂长无用----共党的干部有几个有用？说的是我党竟然利用这种无耻的“改制”，肆无忌惮地抢劫全民财富，把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血汗抢到了一个贪污犯手上。那厂子原来是公私合营的，老底子就是从资本家手上抢来的，后来变成国营，国家陆续投入大量资金，从原来的小厂变成个中等企业，拥有职工近千名，完全是全民财产，却让一个贪污犯先是贪污该厂的资金达几百万不受惩罚，后来又在旦夕之间，利用贪污来的赃款，“买”下了全民财产。与此同时却把职工扔到水深火热中去。这不是犯罪，什么叫犯罪？这种富人，也配和西方的富人相提并论么？

这根本不是什么个例，而是全国的普遍实践，国内的中小企业都是这么“私有化”的。比这更无耻的事多的是，不信请看我转贴来的国内经济学家秦晖教授的论文。

所以，就是我说的那一条：西方和中国都有贫富不均，但前者是个人条件诸如天赋、遗产、社会关系不一样造成的，谈不上什么严重的社会不公，而中国的富人主要是权贵掠夺百姓人为制造出来的，两者有本质差别。就连网友南京老右自己也多次在论坛里承认过，美国和中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只要你肯努力，总会有酬报。她只说出了现象，没看到本质，那就是人家相对公正的

社会状况确保了有能力、肯拼博的人能够脱颖而出。中国做不到这点，恰是因为权贵们不但垄断了国民财富，还垄断了一切机会，让有能力、肯拼博的人无法出头。

该网友糊涂，这才会把痈疽当宝贝，以为经济腾飞全靠社会不公。当然她没有这么说，她是把“贫富不均”当成了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却不知道那“贫富不均”其实反映的乃是社会不公。到现在也不明白人家是在说什么，还在强调必须反对均贫富，当真好笑。所以，我不免大喊一声：

不患不均而患不公！

正因为咱们的贫富不均是社会不公的结果，所以它不但每日每时在制造和加深社会危机，而且已经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就拿我昨天举的那实例来说吧：本来一个好好的工厂，如果由政府卖给外商，把所得发给工人作原始资本，让人家自谋生路，岂不是能起到扶植开创小企业的作用？就算用来救济那些失业工人，那也能让人家免于饥寒交迫，增加了那些人的购买力，不也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现在政府出面把价值几亿的全民财产抢来，送给一个私人，就算他花天酒地，那又能消费到哪儿去，能算拉动内需么？撇开社会危机不谈，光从经济学角度看也是胡来。

其实我也不用说这么多，只想请教同志们一个问题：为何在中国，“做官”和“发财”总是联系在一起？为何衙内们都是富公子？这到底正常不正常？算不算严重的社会病态？请同志们解释一下，为何当官拿那点有限工资，竟然一个个会变得富可敌国，可以把孩子送到国外来花天酒地“留学”？这钱如果不是利用权力贪污来的，那又是从哪个阿拉伯神话的魔术口袋里掏出来的？

西方有这种烂污事体么？人家的“富”和“贵”从来是分开的。你想发财，就去经商；想掌权，就去做官。做官发不了财，发了财也买不来官，井水从来不犯河水。如果谁因为作了官就此发财，那立刻就要构成轰动全社会的丑闻。

别说是发财了，就连走点后门都会构成政治危机。英国内务部长有个老姘，请了个外籍保姆，他只不过滥用职权，给下属发了个工作妹儿，过问了一下该保姆办工作许可的事，那还是在合法范围内（该同志理应获得工作许

可），他不过是加速了申请过程而已，可就这么屁大点事，立刻就被媒体揭发出来，构成政治丑闻，被迫下台。这种事，能在中国想象么？

所以，还是那句话：富在西方不是罪恶，在中国却多半是罪恶。富人在西方不是耻辱象征，在中国，财富则往往是罪犯脸上刺的金印。西方的贫富不均没有构成社会危机，更不妨碍经济发展，而中国的罪恶的贫富不均不但酿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而且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发展。

另外一位网友更搞笑，居然说，布什总统上学得的都是 C，可却先领导公司，后领导美国。这都哪跟哪阿？这种傻话，功夫不到一定程度绝对说不出来。

布什乃是个白痴，此乃众所周知，无庸置疑的事实。但他领导的公司是私人公司，破产了是他自己的事。他领导的国家是民主国家，那总统是人民选举上去的，并不是他巴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靠拍马行贿挣来的。你可以怀疑美国人民的智慧，并据此怀疑认为人民有足够智慧选举合格领袖的民主制度假设是否合理，但你无法据此指责人家是像中国领袖一样，靠下三烂功夫爬上高位。换言之，只有白痴，才会以此指责美国社会不公。

所以阿，劝爱党同志停止曲线倒共，刺激大众。用美国作样板去比较中国，只会越发凸显那烂污社会的黑地昏天，为早已沸腾的民怨火上加油。

2005 年 12 月 14 日

大陆为何不能香港化？

刚才进来看了一眼，见到网友南京老右作了回复，又看见阿随写了篇新作，都没打开看，只是看了标题。

我说南京老右，谢谢你没有使小性，不过阿，咱们说不到一块儿去的。你看，我说“千万不要用美国跟中国比”，那是讽刺的意思，用《圣经》上的话来说，就是你们只看见别人的瑕疵，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不是说两国没有可比性，而是说中国不配和美国比。中国如果真能到了配和美国相比那日，那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就是进入了资本主义天堂了。就这么个简单意思，你都要误解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还要以为我说两国没有可比性，要我给出个参照物来。

行阿，这就给你两个。

第一个是正面的参照物，亚洲四小龙，特别是具有华人文明背景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那就是典型的学习榜样，其特点是在实行民主化前便严格建立了法治，所以人家的资本主义是廉洁的资本主义，没有严重的社会不公，更没有中国那些说不完道不尽的烂污事。起码人家没出大量往国外派出富可敌国的衙内的咄咄怪事吧？蒋方良据说在经国先生死后一贫如洗，这种事，在大陆能想像么？

论均富，大陆能跟人家比么？香港台湾的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中小企业特别多，因此造成了资本主义式的均富。大陆呢？有多少私人中小企业？漫说是跟这些国家（地区）比，就连跟美国比，中国的贫富悬殊也远远超过了后者，早就是世界第一了。

照您的思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受阻碍，实行了毛主义复辟了吧？是这么回事么？

论起飞基础，这些国家（地区）比大陆又如何？香港在“解放”前落后已极，跟上海根本无法相比。此后大陆沦陷又逃去无数难民，人口骤增了好几倍，险些把那小岛压沉了。无论哪方面都比不上内地，而且是殖民地，英国人

根本就舍不得往那儿扔什么钱。台湾也差不多，50 年代，咱们和人家基本站在同一平台上。现在怎么样了呢？

刚才望题生义，猜阿随的新作是痛诉早期资本主义的血腥罪恶，以此为中国辩护，苟如我所猜，那在他倒是一大进步，不敢再吹咱们的“社会主义乐园”了。要列举早期资本主义的罪恶一点都不难，可以说上三天三夜——原始资本积累总是血腥残忍的不是？这是中国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伐？所以，不能把今日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中国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相比，否则不公平。

可惜阿，这一套再没法糊弄百姓了，亚洲四小龙乃至日本在战后的崛起，粉碎了这刻舟求剑的鬼话。请问这五个国家地区在战后的发展，经历过咱们的烂污血腥阶段么？为什么人家的“新菜谱”没有欧洲 19 世纪的血腥味儿？

如今的世界再不是 19 世纪，不再需要使用残忍手段来聚敛原始资本。那道理我早就说过了，这是美国人为全人类立下的功劳。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推倒了殖民主义时代的关税壁垒，建立了世贸组织。如今有的是国际剩余资本，只需去吸引来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如我党那样敲骨吸髓。

请问大陆为何不能向这些先进国家（地区）学习？到底是什么原因妨碍了中国实行“大陆香港化，香港民主化”的战略转变？据说实行民主会天下大乱，难道实行法治也会引起天下大乱么？为什么香港、台湾、新加坡没有大乱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一旦大陆香港化，则我党权贵就再也无法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了，搞不好还会进监牢，掉脑袋。所以，宁肯社会危机积累到爆炸地步，最关键的这一步改革是万万不可跨过去的。过去党中央之所以愿意发动经济改革，那是因为他们首先是通过权钱交易牟取暴利的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人民不过是附带的受益者。这就是他们还能发动改革的原因，但如果要深化改革，那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大陆香港化只会有益于国家民族，但妨碍了权贵们疯狂掠夺全民财产。

所以，我劝同志们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爱党就是爱党，爱贪污就是爱贪污，痛痛快快承认了罢，那“爱国爱民”的幌子，还是收起来比较不让人恶心些。大众都不是小孩子，不是那么容易愚弄的，何况权力并不等于智

力，掌权者并不见得比被糟践的人聪明，不要以为天下人都那么容易糊弄，任你指鹿为马。

负面的参照物就是南美，而这就是中国亦步亦趋正在走的金光大道。其特点就是烂污官僚资本主义，因为不实行法治，由统治集团疯狂鲸吞全民财产，在早期畸形繁荣过去后，经济泡沫破灭，跌入半死不活的持久萧条之中。而这就是未来中国的命运。将来中国不会大乱，因为我党牢牢地控制着枪杆子，除非内外出了大事，否则党天下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垮掉的，但也决不会是什么“太平盛世”。经济很可能步南美后尘，最后成了死样怪气，谁也没本事收拾的烂摊子。

2005 年 12 月 14 日

对汕尾惨案引起的海川风暴之再思考与自我批评

汕尾惨案消息传来，在本坛引起了各种激烈反响，燕南人网友的帖子出来后，更是火上加油。老芦赤膊上阵，大打出手，连南京老右一并打了进去。昨前两日进入高度亢奋状态，基本上没怎么合眼。今天暴睡一日，才平静了许多，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去反思这整个争吵的意义和本人的道德缺失，现拉杂写在下面，供网友参考。

一、对惨案的看法

我个人观点早就在一系列旧作里阐述过了。我认为，若干政治立场相对中立的海外华人的一个主要误区，就是拿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与中国相类比，认为在西方，法律享有绝对尊严，任何人想对抗法律的人格化身亦即所谓的 law enforcement，必然会受到惩罚。同理，中国政府使用暴力镇压违法攻击执法人员的暴徒，当然也是应该的。

这种观点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我已经指出过，不好拿西方法治国家和中国那种烂污国家作这种机械类比，因为它忽略了以下几个重要的中国特色：

第一，今日中国根本不是西方那种法治国家，法律不是社会契约，而是统治者单方面意志的表现，特别是涉及产权的法律或缺如，或模糊，又没有独立裁决双方冲突的司法机构，这一切给官员造成了枉法贪墨之机。统治者带头犯法，人民自然就会跟上。民间骚乱乃是这种社会弊病的必然结果。铁腕镇压并非治本之策，不但只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反腐倡廉，就连对统治集团维护自身国际形象也极度不利，实在是后患无穷。

第二，中国的大多数公民不但完全是法盲，而且在毛时代被系统地训练成了专门和当权派过不去，富于造反精神的暴民。在中国，犯法常常是双方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连它体现它单方面意志的法律都不遵守，公民犯法常常是政府先犯法的结果。用俗话说就是“官逼民反”。在这种情况下，不去

责备政府，促其整肃吏治，从根本上缓和社会矛盾，却去苛责用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民众，以西方公民的行为标准去苛求他们，显然毫无现实可行性，既不解决问题，更无公道可言。

第三，西方的警民流血冲突，多发生在警察与职业罪犯之间。普通公民的守法意识很强烈，即使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也是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按照法律规定和平进行的，酿成暴力冲突的例子并不多。即使发生了，当局对使用暴力也非常克制，闹成血案的很少见。一旦出了这种事，立刻朝野震惊，马上要组织独立的第三方调查警方或国民自卫队有无犯法情事，作出处理并公告全国。

但在中国，百姓被彻底剥夺了西方法律保障的正常抗议示威权利，凡是抗议示威，哪怕是和平进行的，都构成犯法行为。其次，当局迷信“屠民治国”论，深信杀人立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常常以极度野蛮横暴态度对付胆敢抗议的百姓，就连个区区交通警，居然都成了威风八面的土皇帝，欺凌鱼肉百姓无所不为。这种视草民如无物的结果，当然就是百姓忍无可忍，以暴力反击，导致血案发生。这和西方发生的情况有实质不同。将西方警察针对个别匪徒反抗而使用暴力，去与中国民众“非法”抗议引起的流血冲突相提并论，这种思维方式实在不敢恭维。说句不客气的话，持这种论点的同志当真是越留学越糊涂，连本国国情都忘记了。

总而言之，中国刻下官民冲突事件与日俱增，不是证明了中国的“刁民”呈指数增长，而是证明了中国的社会危机日甚一日。其根本原因，乃是公民的权益没有得到法律保障，任凭党国鲸吞。民众权益受损之后，又无法诉诸法律手段找回公道，就连施加压力的和平示威人权也给彻底剥夺，又没有媒体为他们诉冤屈，所有的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都给我党严密地堵死了，人家不犯法何待？

为使同志们明白这个道理，在此将情况外推到极限情形作个通俗说明：假定中国政府宣布呼吸犯法，那全国人民岂不是要统统变成罪犯？难道爱党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鼓吹“遵纪守法”不成？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极端例子，我不过是用来说明将法律当成统治者单方面意志的荒谬，以及无条件吹捧这种“法律”的荒谬。政府当然不会禁止百姓呼

吸，但却毫无理由地剥夺了人民合法解决官民利害冲突的一切可能，这本身就是社会化生产犯法者，就是孟子说的“网民”。

不仅如此，从汕尾事件拖延那么久，还可看出当局对民意无视到了何种地步。据报导，去年 10 月起，就不断有村民在电厂建筑工地外示威抗议，让工厂无法开工。 拖延了一年多，为何就是没有得到合理解决，非要闹到以杀人收场？哪怕真是刁民无理取闹，难道不可以逮捕祸首，循正常法律渠道解决，而要用向民众开枪这种不分良莠的最极端的最下策去“解决”危机？

最可悲的还是，哪怕出了惨案，村民还是无法指望能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由独立的媒体和独立的司法机构去调查，并作出公正判决，只能寄希望于镇压一方去当青天大老爷。可惜那“青天大老爷” 最关心的不可能是如何公正处理此案，而是怎么向国际社会拿出个说词来，好让自己已经是臭不可闻的国际形象不要更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覆盆之冤，又还能有什么昭雪的希望？

我估计，政府最后只会用“六四”方式解决此事，即认定那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暴徒煽起的暴乱。燕南人网友今日的文字似乎就提示了这一点。不管真相如何，我党承受不起那形象损失。这就是大局，就是革命的整体利益所在，就是我党的“公道”，它和西方法治精神毫不相干，希望那些用西方尺度去解读此案的同志牢牢记住这一点。

二、为什么“好得很”论会使我“出离愤怒”？

如果承认我上面说的那些铁的事实，就不难理解我的愤怒。事情刚出，我就看到了奥兰多的烂帖子，接着又卷入和南京老右的辩论，继而又看见游客指责“民运魔鬼”的无耻炒作，最后看见燕南人的大作和南京老右的跟帖，“量变引起质变”，最后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背，当场就爆炸了，炸得自己和别人同样血肉模糊，当真晦气。

“民运魔鬼”以及法轮大仙们当然不会放过这绝佳的倒共机会，要抓住死作文章，无限吹胀，大叫大嚷，暴露我党血腥凶残面目，以实现他们推翻我党的政治目的。那又怎么样？我一向坚持认为，无论是评价历史还是现实政治，重要的不是历史（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的具体动机，而是他们的行为的客观后果。

在这个问题上，民运和法轮“魔鬼”们的炒作，恰有利于中国人民，因为他们在此事上形成了难得的反对派，构成了对我党的合理政治压力。我反对的是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凡共必反，但有道理、有益于人民的反对我绝不会反对之。至于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谁有兴趣管那些不相干的事？

正如那天我当场质问游客的那样：请问民运“魔鬼”跟此事有什么相干？人是他们杀的么？导致惨案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弊病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么？把人民训练成坚信“造反有理”的潜在暴徒的历史业绩是他们完成的么？老芦迟钝，实在看不出“魔鬼”们对此事该负什么法律上或是道德上的责任。

其实，是人都该看出来，我党我军我警武装到牙齿，以此对付手无寸铁的“刁民”，“雷公打豆腐”尚不足喻其轻易。用不着同志们打气喝采，我党也能胜任愉快地完成屠民任务。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我看不但没有必要，反而会坑害我党，让他们在“屠民治国”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反过来，从政治学原理说，民运“魔鬼”们此类鼓噪，恰好提供了中国政治中最缺乏的对权力的制约，虽然他们人微言轻，起不到“刹车”作用，但若连这点鼓噪都没有了，那我党更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那是不是就是同志们的希望所在？社会弊病不解决，民怨日甚一日，哪怕是对我党也没好处。就算你几百万军队在手，效千手观音处处救火，也要疲于奔命吧？不去正本清源，却以杀人末道维持社会秩序，这杀到什么时候算是个结局？中国地方那么大，人口那么多，你杀得了那么多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胡温怎么就蠢到连这都不懂？党朋们怎么就蠢到连这都不懂？

以上是功利分析，目的是告诉大家，哪怕从维护我党统治的角度看，屠民也是最最下策。事情到了不得不以屠民来收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政府的大失败。哪怕曲在民方，政府也该吸取血的教训，抚恤受难者遗属，撤换严惩玩忽职守，导致案子迟迟不得解决，最终酿成血案的一系列官员，并昭告全国。此乃传统帝王向子民彰示爱民之心的标准作法，为何中共连旧式专制君主都不如？

从道义上来看又何尝不如此？假定果如燕南人网友所言，此案是一小撮坏人煽动起来的，那又便如何？死的人不见得就是犯法者。但凡是向百姓开枪的烂事，必然有误伤，开枪杀人更谈不上什么“无罪推定，公平审判”。例如六四大屠杀，打死打伤的大多是无辜受害人，在开枪后去虐杀士兵的罪犯根本就

没有受到惩罚。大呼“该杀”的同志到底是哪儿来的底气，认定若向群众开枪，哪怕是在黑夜里，也必然如灵巧炸弹一样，专打罪有应得的坏人？

说到底，汕尾惨案不过是冰山之顶。它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具体案情谁是谁非，而在于它暴露了中国社会现今骇人听闻的致命痼疾。真正关心热爱祖国的人，甚至哪怕是真正爱党的人，主要关心的不该是到底是哪方的错（那当然也重要，但毕竟不是我们能查明的事），而是此案暴露出来的严重的社会危机，为民忧愤，为国担忧，为党着急，这才是比干、屈原式的所谓“第二种忠诚”，而党朋们的支持则是蔡京、林彪式的“第一种忠诚”，这就是它激怒我的原因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燕南人网友似乎直到今天还没看到这点，他上贴披露“真相”，说那确实是一小撮坏人煽动起来的。假定确实是这样，那又便如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中国社会不是充满重重危机，官民关系不是如此紧张，几个坏人有可能煽起那么大的事件来么？为何西方从没见过一小撮坏人煽起广大人民去和警察发生流血冲突的怪事？这又不是个别恐怖份子即能完成的爆炸案，而且示威抗议已经延续了一年多，当局何以在这么长时间内还无法察觉并逮捕惩治这一小撮暴徒？忽略深刻的社会原因，却把责任完全赖到“一小撮”头上去，完全是弱智笑话，也只有在中国这个弱智之邦才会有市场。

让我愤怒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我察觉“屠民治国”论在海外中国人之中竟然还颇有市场，认为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或哪怕只是为了国家强大，屠杀部分人民就完全是应该合理的。这在我看来，乃是彻底缺乏人道情怀的表现，也就是我破口大骂“残暴基因”、“大血腥气” 、“没有人味”的原因。

不过，这毕竟是个人修养问题，似乎不便以此指责大众，否则有道德批判之嫌。我这么做，实际上违反了我以功利分析写政论的一贯原则。我应该做的，是指出信奉此论的人必然要陷入双重标准，失去指责帝国主义者当年屠杀中国人民以维护社会秩序的道义资格。

三、我的自我批评

昨前两日，我不但和燕南人大打出手，而且连南京老右也捎带上了，表现极度恶劣。

直到现在，我也不同意燕南人先生的基本主张。但我应该做的，是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地写文章驳斥之，而不该怒气填胸，口不择言，极尽人身攻击甚至诽谤诬蔑之能事，斥骂他“没有人味”，“残暴基因特别发达”。最恶劣的还是，我居然上贴要求法国当局驱逐他回国，并一再诬蔑他就是在六四期间残杀戒严部队士兵的罪犯。

这一系列下流作法，完全是我深恶痛绝的“以毒攻毒”的文革式诬陷。清算这种党文化流毒，其实就是我上网的初衷。没想到我这个以清除党文化为己任的同志，最后竟然堕落到驾轻就熟地带头搞这一套，对此我无限羞愧，无地自容，在此向燕南人先生谢罪。

如果说我对燕网的爆发还有那么点道理在内，骂南京老右那些话就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例如我把她和燕网熬在一锅里，说他们“忧国忧民”、“爱国”是假惺惺。这完全是诛心之词。这么做无异于指责她的伪善，是对她的严重侮辱。人的知识、能力和认识深度可能千差万别，但以感情而论，在上帝的天平上是完全平等的。谁也无权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爱国，更无权去垄断爱国这种个人感情，毫无理由就居高临下地指责人家假惺惺。对此我深感内疚，在此向她谢罪。

2006 年 12 月 16 日

终于明白了杨小凯先生

一、杨小凯先生的立场转变

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我最心仪者当数已故杨小凯教授。他曾是《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的活跃撰稿人，发表的文字我基本都看过。在追悼他的文章里，我曾经回忆道，通过阅读他那些文字，我发现彼此思想成长的过程惊人的类似，都从原来的“革命教徒”转变成为坚定的反革命分子，看穿了暴力革命绝非解决社会危机的正道，只会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引发规模空前的社会倒退。正因为彼此信念相似，我才把这位杰出的独立知识分子，引为万里之外素未谋面的知音。

后来却看到一个网友转来的杨先生的帖子，在那上面杨先生改变了原来的政治立场，转而认为人民不能放弃暴力革命的选择，否则无以威慑拒绝让步的顽固统治者，云云。

那帖子让我觉得十分震动而且失望，但我依然想，以杨先生之好学深思，绝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既然这么说，想必是有重大的理论考虑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批判暴力革命的一系列文章里，委婉地批判了“威慑”论，指出科技进步已经剥夺了人民的暴力手段，空谈暴力革命不但威慑不了统治者，反倒会吓得他们更加凶残，动辄过度反应，向人民毫无必要地举起屠刀。

二、我的基本信念

我的基本信念早就写在一系列旧作里了，那思路非常之简单，完全是基于连白痴都能看见、能明白的基本事实和常识之上：

1、现代科技进步和极权社会的组织方式，彻底剥夺了人民组织起来并武装自己的可能。人民再无可能如同传统社会那样，使用相当于统治者的暴力手段

去推翻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奢谈暴力革命甚至号召人民起来去推翻中共，就是让人民去自杀。

2、即使暴力革命能成功，也绝对只会制造出一个集权程度远比被推翻的旧政权高、新统治者比旧统治者更加心狠手辣的反动社会来。

3、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社会进步，都不是靠人民推翻统治者取得的，而是统治者主动或被动让步的结果。

4、统治者和人民的利益重合程度，远远超过了毛共余孽愿意承认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从远期来看，统治者对人民让步其实是双方都受益的事。

根据这些基本事实和常识，我提出"作忠诚反对派"的主张，建议反对派采取主动，实行朝野和解，主张人民放弃大而无当的政治斗争，改为维护自己权益的经济斗争。这种斗争必须具有明确、具体、可行的诉求，最高追求目标应在统治者的让步上限之内。人民应能在斗争中随时调整目标，及时与统治者妥协，避免出现僵局，招致血腥镇压。通过这种局部的、有限的、实际的斗争，逐渐改善人民的权利，点点滴滴地推动社会进步。

本着这一精神，我还提出争鸣各派放弃道德批判的传统作法，使用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功利分析，进行理性辩论，以达成满足统治者和人民双方远期利益的共识去求同存异，并主张知识分子以"舍命求真"的新作风，代替"舍真求善"的千年陈腐传统，绝不因政治需要或出于阶级、集团利益的考虑，就放弃对事实的追求。

这些思想都已经在我的头脑里酝酿了几十年，我觉得是颠扑不破的。上网六年，我一直在兜售这些黑货，也从未见到有谁提出过言之成理的质疑，遑论是驳倒它们。

不料继朱成虎事件之后，最近又接连出了一件大事，几乎彻底颠覆了我这些基本信念，让我陷入极大的信仰危机。几周来辗转反侧，灰心到了极点，甚至想从此放弃写作，去干点对自己有实惠的事。

三、汕尾惨案

汕尾血案引起了我极大的愤怒，因为它又一次证明我党仍在笃信"屠民治国论"。汕尾村民从事的正是我主张的有限的、具体的经济维权斗争，根本不

是 89 学运或法轮功示威那种毫无明确诉求、对人民的具体权益改善毫无帮助、只能引起统治者恐慌的假大空政治运动，然而统治者仍然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屠刀。这种毫无必要的凶残，哪怕是从统治者的远期利益来看，都是极度愚蠢的自伤行为。

更令我绝望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份据说是胡锦涛的内部讲话，他竟然对人民自发的维权斗争咬牙切齿，认定那乃是我党目前的打击重点，这说明我党已经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甭说与人民分享政权，就连起码的权益也绝不会恩赐给人民。很明显，人家就是横了心要一口吃尽社会财富，绝不让人民染指，卧榻之侧，岂容人民鼾睡？！

绝望之下，我终于明白了杨小凯先生为何要提出那“威慑论”，于是写了《胡温，屠民并非治国之道》，用人民革命来吓唬中共当局。可惜立刻就有人引用我的旧话来反驳我：“在一连武警前，一万民众也不过是一堆肉！”我还能说什么呢？从 20 岁起，我就丧失自欺欺人的能力了。

更令我目瞪口呆的是党朋们倚冰山如泰山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著名党朋首领阿随网友发表臭名昭著的“狼羊律”，认定国家就是富人俱乐部，中国是中共的私器，我党是吃人民不吐骨头的大灰狼，而人民不过是被这些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痛吃的小绵羊，此乃“宇宙运行规律”。你要不服气，这就去起兵造反，把我党推翻了。没这本事就趁早闭嘴。

这里面暴露出来的鼠目寸光的小人得志的猖狂气焰，让我目瞪口呆。如果我是胡中央，首先要整肃的就是这夥蓄意揭穿我党面具，以放肆侮辱人民的巧妙方式刺激煽动人民造反的“第五纵队”。这些人对我党维持欺骗统治起到的破坏作用，根本就不是传统奸臣如蔡京、魏忠贤辈可以望其项背的。与此同时，我还要鼓励那些“民运”人士如徐水良、高寒等辈尽情表演，好让他们暴露的狰狞面目把中立群众推到我党怀抱中去。

然而令我瞠目结舌的是，阿随透露出来的心态，其实正是我党决策阶层的主导思想，它不但没有引起我党警觉，反倒成了准官方意识形态！再也无法想像世上有如此昏庸、如此愚昧的政府了。我虽然谙熟中国人的愚昧、特别是历史上那些昏庸的统治者难以置信的愚昧，但也到此叹观止矣。

这些荒谬绝伦的现象，严重质疑了芦笛思想的基本假设。

上文介绍的芦笛思想，其实隐藏着一个假设："中共统治者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看到他们的远期利益何在。"

正是出于这个基本假设，我才主张人民进行有限的维权斗争，提出民间独立知识分子应该勇作"布衣帝王师"，学作中国从未有过的"忠诚的反对派"，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使用功利分析的手段去说服统治者尊重人民的权益，作出必要的让步。也正是出于这个基本假设，我才主张政治上的各派停止道义批判，代之以功利分析，以此求同存异，共存共荣。

但事实证明，无论是中共统治者和他们的民间代言人，还是形形色色的民间反对派，根本就愚昧到了无法看到自己的利益何在的惊人地步，这才会出现"倒共派曲线拥共，拥共派曲线倒共"的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因此，基于人类常识提出的芦笛思想，根本就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似乎是一种特殊生物，其心理和其他人类毫不相同。

四、不能服己，焉能服人？

本人上网，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从来不惮以真实面目示人。凡是我写的东西，无论是政论，是杂文，是抒情散文，都是真实思想、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凡是我鼓吹的信念都是自己真心相信的。现在这件事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我的基本信念。再写下去，只怕要加入那些"清流"戏子们，于人于己究竟何益？所以，我得闭关长思一段时间再说。在此留下那个日夜折磨我的问题，请有心者帮着参详：

中国人是否有足够智力看到自己的利益何在？中国人是否具有凡是生物都具备的趋利避害的智力？如果有，为何朱成虎将军那种小丑竟然会被当成民族英雄欢呼？为何"倒共派曲线拥共，拥共派曲线倒共"竟然会成了压倒一切的社会现实？

2006 年 1 月 6 日

一个反革命分子的个人烦恼

——答老贾网友

刚才拜读了你的赐教，发现你基本没有明白我那帖子的意思，当然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表达明白如此复杂纷繁的心绪。

你说：

> “芦兄判断的前提是人的行为是理性的。放在中国政治这个具体环境中就是统治者的行为是理性的，或者像你帖子中说的，他们需要第一知道自己的长远利益，第二愿意并且能够为长远利益克制眼前利益。
>
> 但这种假设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首先，人的行为可以是反理性的，其实人类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就是人可以逆生存本能而动，不管是让人匪夷所思的疯狂举动，还是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都是反‘理性’的。或者说理性只是手段，而目标是完全可以纯感性的。老话说宁和明白人打一架，不和糊涂人说句话，就是这个道理。”

你这儿倒真说的是绝对常识，我不至于不懂吧？其实人生最大的矛盾，就是感情和理智的矛盾，此乃我 20 岁就明白了的道理。我这儿说的不是“理性”这个含糊的概念——依马列斯毛看来，他们又何尝不是依据理性行动？那造成的灾难更深重。

我说的不过是超阶级的利弊分析能力，也就是一般人说的“策略”，而我为之绝望的，乃是中共最高决策层彻底丧失了这种智力官能，因此导致国家必然崩溃，任何人为努力都无法扭转这趋势。中共自杀乃是他们的问题，我乐观其成，问题是他们必然要把全民族拉进去殉葬，让人民苦吃苦做挣下来的一点家当再度鸡飞蛋打，这就是我最难受的地方。

> “感性的目标，不管是邪恶的，还是伟大的，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配合以理性（包括理性的操纵感性）再加上机遇，都可能实现，虽然可能短暂，但毕竟会成为现实。而所谓理性的目标，如果没有好的操纵，包括没有对感性的正确把握，则依然成不了事。

> 因此芦兄非要把自己的道理放大到不讲道理，或者道理和你不一样人的身上，自然是要碰壁的。这是芦兄缺乏的常识之一。”

你完全没明白我的意思。我难受的乃是大厦将倾，势必压死人民，根本不是什么“把自己的道理放大到不讲道理”。感性当然能暂时地局部地成事，太平天国、义和团和如今的法轮功不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么？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的烦恼正在于，在中国，common sense（通译为“常识”，但我觉得其实是“正常神智”的意思，我就是在这意义上使用的）永远敌不过这些宝货的魔力。假洋鬼子永远不是阿Q们的对手。我早就说过了，只有法轮功才真正代表了传统文明，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 “芦兄缺乏的常识之二是没有区分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的逻辑不同。再放到中国政治这个具体环境中来讲，符合统治阶级整体长远利益的事情很可能要损害具体统治成员的现在利益，那么在整个阶级既没有良好的利益统合机制又丧失了对成员的感情操纵机制（所谓党性，对党的宗教般的忠诚）的前提下，凭什么有些，甚至很多具体成员要主动做出牺牲？当这些成员并没有得到自己会长远地成为阶级的成员之一时，为什么要把赌注压在其长远利益上呢，这还是先假设他们会按这个理性出牌，更别说有些人早就报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士哲学。这其实牵扯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在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时候，让人们为长远利益着想是否有些缘木求鱼？”

无的放矢，自己弄个靶子出来批驳，跟我的意思八万杆子打不着。

自胡温上台后，我一直在给大众泼冷水，为小鞍子的“明主颂”唱反调。那阵子他和什么“天天天天”把这儿变成了“安天颂圣论坛”，我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起码有十多篇吧，反反复复告诉大家胡温即使有心，也绝对无法制服党机器那多头凶龙，党官僚都是鼠目寸光、“吃死老公不戴孝”的主，难道我活这么大人，连这点知识都没有，需要你来告诉我？

我最难受的是看到胡锦涛那个讲话，说明此人乃是横了心要自杀了，而汕尾惨案正好证明了那个讲话的可靠性。尽管我早知胡最好的前途也是个庸主，但毕竟还是抱一线幻想，希望他不要蠢到豁了边，那讲话彻底粉碎了我这幻想，证明毛共统治彻底摧毁了中共最高执政层（请注意，我说的是最高层）的

智力。其实熟悉中国现代史的读者都知道，毛上台前非常睿智而且实事求是，精通功利分析，是权谋和策略大师，而所谓策略无非也就是趋利避害那一套。他是靠这一套而不是什么马列主义才成功的。问题是，他执政 30 年后，所有的中国人都丧失了这种智力官能。别人我不在乎，胡温没有这种能力则绝对意味着全民灾难。

> “芦兄与其这般疗愚，尚不如李大师给人个永恒的天堂之愚法。当未来在价值观有一席之地，甚至主席之地时，谈长远理性才比较可能。”

是啊，你这就去加入法轮功吧，那是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替代出路了。我正是深知这一点，才无比难受。

> “芦兄缺乏的常识之三是没有区别系统形成后的机制和系统形成的机制的不同，虽然其对革命造成的迫害，以及对达成目标造成的障碍的担忧非常有道理，但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这样对旧系统的快速破坏，新系统根本没法形成，更何况很多时候是旧系统自我制造了自己的快速破坏，你搂都搂不住。系统有个发生学的问题，而在发生学中，革命是必然有一席之地的，这就好比生物界中基因和环境的突变会导致新生命的出现。”

全是 P 话，我早在反革命的一系列文章中批驳得体无完肤，懒得再说。你这儿所有 P 话中只有一个事实能成立：中国和英国完全不同，人民和统治者太愚昧，不可能防止革命这种惨祸周期性发生，摧毁整个社会和文明。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辛亥革命本来可以成为中国的光荣革命，却被革命乱党糟蹋了。自此以后，特别是在毛共执政之后，改变既存社会模式的唯一方式就是只有暴力革命了。而这就是我的烦恼所在，明白了么？

再说一遍：我的烦恼是一个铁杆反革命分子欲反革命而不可得，眼睁睁看着大难临头时的心情，恰如我在 1986 年和 1989 年无法制止灾难性的学潮发生一样。

> “芦兄缺乏的常识之四是默认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直线论断，认为民主法制平等就应该代替专制人治平等。其实不然，民主法制平等首先是一种观念和信仰，而专制人治不平等同样可以是观念和信仰，而且更容易被现实证明。在一个民主法制平等这样的观念和信仰尚未深入人

心，成为主流观念的时候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防止这种观念会给社会带来破坏性的革命实在是不着四六。其实启蒙在中国远未完成。其实芦兄的疗愚如果会有作用的话，也是在于其启蒙的部分，而非其反革命的部分。希望兄今后能更集中精力在这方面。”

郑重申请你先去看看芦文再来开课不迟，任何一个熟悉芦文的读者都不会闹出你这种笑话来。我扫荡伪民运期间，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冥冥之中没有什么“历史潮流”或“决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是人类的人为设计，而专制制度乃是中国过往几千年中最适生活方式。

但我也在《落后文明的尴尬》等文中同时指出，作为落后文明，中国持续动乱的基本原因，是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参照物，使得中国人再也无法生活在传统最适生活方式之中了。那原因是多重的：弱势的传统文明无法与强势的西方文明抗衡和竞争；人民有了另类生活方式作为比较参考系；民智大开，维护专制制度的“天命论”、孔孟之道等再也不可能作为国教，为专制君主提供不容质疑的权威，因此现代专制者再也不可能享受与生俱来的绝对权威，必须靠自己努力而不是“天命”来获得这种权威，由此导致“权威逐代递减律”，导致现代专制社会缺乏传统专制社会的内在稳定性，等等，等等。这一切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中国只能走日本的路，认同西方模式，据此修改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惜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国人没有此种智力。

你这儿说的这些Ｐ话，与我的基本观点毫不相干，请以后先看明白对方的观点再开口，否则只能搞笑。

“芦兄缺乏的常识之五是认为自己垄断了‘真理’。应为自己一直反革命，最近终于看到造反有理之一面之后，家觉得天摇地动了，其实大可不必吗。没有一个人，一个道理能垄断人类社会的道理群。大家都是这个互动群体中的一员。芦兄天天喊反革命，既有可能减小中国革命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增加革中国命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和中国革命的可能性毫无关系。你自去喊你的反革命，别人自去提倡其革命，最后结果自然是所有人反应的综合，何必非要自己完全正确呢，即便理论基础有缺陷，就不应该坚持理论了吗？看看人家基督家，就说人类只有六千年历史，着二百年不也坚持的挺好吗？你芦兄不也认为其存在有相当的意义吗？错误也可以坚持。坚持就可能生存，生存了，就有了生存的道理。”

如此鸡同鸭讲，当真是令人绝望。我再说一遍：不是我看到革命有什么道理，而是发现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愚蠢与顽固，革命终不可免，而这意味着全民灾难。

我明白了杨小凯为何主张以暴力革命作为威慑的心情与动机，但我仍然绝望，这不是说人民没有神圣权利起来推翻那反动腐朽没落的政权，而是说：第一，人民没有这种能力威慑那专制政权。第二，即使有威慑能力，也不会让那愚昧绝伦的专制政权让步，乖乖和平演变。只会让他们更加凶残。第三，哪怕最后全国真的大乱，中共被暴民推翻，那更是比如现在这般苟安下去更倒霉的巨大灾难。

你以为我的烦恼不过是个人信念危机，是不是？我算是什么玩意哪？值得么？笑话！

> “关于兄的问题：
>
> ‘中国人是否有足够智力看到自己的利益何在？中国人是否具有凡是生物都具备的趋利避害的智力？如果有，为何朱成虎将军那种小丑竟然会被当成民族英雄欢呼？为何“倒共派曲线拥共，拥共派曲线倒共”竟然会成了压倒一切的社会现实？’
>
> 结合以上常识，弟以为，多数个人是可以看到自己的 利益所在的，中国人多数当然具有趋利避害的智力。但作为整体，在现有博弈机制下，短期利益更容易占上风，这和中国不中国（指文化，人种）关系不大。社会如何发展，智力不是主要问题，社会理想却起很大作用，在这个科学和实用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忽视理想的作用，但没有理想，就没有目标，而没有目标，智力是没有用武之处的。”

这就是你的肤浅之处，关于理想祸国，我已经写过无数文字了，请去仔细学习。这里只想请问一句：西方国家有什么全民理想？中国人近代才知道有理想这回事，而它到底在中国历史上是造福还是致祸？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切重大灾难包括毛共的勃兴，都是一小撮志士仁人力图用自己的理想改造中国造成的，这起码的事实，你恐怕不敢否认吧？

关于趋利避害的起码人类智力问题，我已经在《犬儒篇·优伶之邦》中透彻地阐述过了。中国人确实在个体水平上有趋利避害的非凡能力，但在群体水

平上却拥有举世无双的集体自杀能力。如果你想明白这是什么原因，这就去攻读我的《犬儒篇》吧。

> “‘如果有，为何朱成虎将军那种小丑竟然会被当成民族英雄欢呼？’
>
> 中国的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都有其道理，其道理想必兄也知道。他们也是中国政治光谱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他当初民族英雄欢呼的人既包括认同之的，也包括只是表达某种情绪的。还是那个常识，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大家都在社会道理群之中，既要互相斗争，但斗来斗去，还是在一个社会之中。
>
> ‘为何“倒共派曲线拥共，拥共派曲线倒共”竟然会成了压倒一切的社会现实？’
>
> 其实倒共派不见得曲线拥了共。拥共派也不见得曲线倒了供，或者说这个曲线也实在太曲了，更加真切的情况是两边其实都对现实影响甚微。网上倒共派也好，拥共派也好，都和共倒不倒关系不大，还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多，这其实满正常，改变社会有许多因素，大家都是连门都没摸着的主，这点上，都需要向李大师学习。”

唉，你连我起码的意思都看不懂。我不是认为拥共派真能曲线倒共，也不是认为倒共派真能曲线拥共。我关心的不是这种行为的实际效果，更不是想实行舆论一律，这都哪跟哪阿？让我痛心疾首的，乃是从这种现象中暴露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的全民愚昧。不仅如此，胡中央竟然默认朱成虎这种对他们统治最实在不过的威胁，默认“狼羊律”这种颠覆自己统治的谬论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这暴露了胡温惊天动地的愚蠢。很明显，要靠这种丧心病狂的白痴化解社会危机，将中国领出危局，完全是痴人说梦。

行了，你这就去找李大师吧，老芦最痛恨的就是神棍。我跟你说，那些人在中共垮后可能猖獗一时，但绝不会统治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就算真是被上帝诅咒过的土地，毕竟也不是神棍可以长期统治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这点，太平天国就是最近的例子。你放心好了，你那不得了、了不得的“感性”、“理想”顶多只能享有短暂的局部成功。

早说过了，中国最好的前途是在大乱之后各省独立，再度实行“东南互保”，保下点精粹部分来。中国不解散，永远无出路。而这正是令我极度烦恼

的又一原因。不过这些话，再说也无人理解。尽管老芦讲的不过是常识，可惜令人扼腕的是，能理解者居然如此寥寥，唉！

2006年1月7日

“刁民”论

汕尾惨案发生后，燕南人网友出来欢呼政府“怒斩刁民”，激起了网上风暴，老芦带头大打出手。几天来我没怎么休息过，一直在想这些问题，刚才才恍然大悟，其实我这个特别提倡学习西式清晰思维，反对传统模糊思维的人，这次也居然跌进了模糊思维的陷阱，跟着众人傻傻地去起哄，却没想起来先界定一下这“刁民”究竟是什么玩意。

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其实不少，让我依次说清楚吧。

一、对“刁民该斩”论的“超法学论证”

具有西方文明常识的读者应该看出，“刁民”根本不是什么法律术语，世上没有什么“杀刁民”的法律依据，哪怕是中共制定的刑法也如此。

不仅如此，老芦无知，英文一塌糊涂，还真不知道英文里的“刁民”的等价物是什么。英文里倒是有 mob 这个词，通译为“暴民”，但那不过是社会学术语，并非法律用语，参加暴民行为称为 mass hooliganism，并不构成杀头罪名。英国足球流氓行为举世无双，但还从未听说过政府开枪屠杀的烂事。

这且不论。90 年代初英国人民在伦敦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政府的人头税政策，集会最后演成暴力，暴民们打砸抢劫了集会广场附近的商店，还放火烧房子，造成几百万镑的经济损失，酿成警民大规模暴力冲突，多名警民受伤，但官方只是短暂拘留了少数被抓到的人，因为缺乏起诉证据，不久便放了。这种暴民示威，事后不但没有进行全民整肃，层层揭发深挖，反倒造成了撒切尔内阁的倒台，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真难以思议。

那么，到底什么是“刁民”？“刁民该斩”论的提出者，到现在也没出来给个明确定义，大有伟大领袖发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模糊作风。迄今为止，我见过的对该理论比较具体的阐述论证，是网友随便和马悲鸣两位先生作出的。记得阿随在一个跟帖里说，中国人民被政府惯坏了，所以就是应该杀。

这种论证，不是人类可以理解的。姑不论中国人民是否真被政府惯坏了，就算真被惯坏了吧，那就是杀头的罪名？真要杀，似乎也得去杀惯坏他们的罪魁祸首中国政府啊？

另一位现代法家马悲鸣先生的论证更精彩。据他说，因为四川出过暴民杀害执法人员的事，所以政府就有权在广东杀人。他还认为，只要武警神经紧张，就可以开枪。

这些搞笑话语似乎不用再批驳了吧？否则太跌份。难得的是，这种“超法学论证”，竟然出自开口闭口“法律”的现代法家兼党朋精神领袖之口，可见党朋们的“法制”觉悟水平。

当然也有头脑比较清醒的网友。有的网友对我说，我没仔细看燕南人先生的帖子，他主张的乃是杀进攻执法人员的刁民。这不能说有什么错。我觉得，如果暴民中真有蓄意杀害或杀伤执法人员的坏人，在执法人员生命受到威胁时，当然有权还击，哪怕防卫过度也还可以原谅。但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该杀的也只是罪犯，不能用“刁民”的笼统称呼，把所有的人一网打尽。

二、“刁民论”乃是毛共“清理阶级队伍”政策的翻版

事实上，使用“刁民”这种带有侮辱性称呼的作法，本身就有毛共阶级歧视、阶级迫害之嫌，亦即把人民的一部分戴上与众不同的标签，加以政治歧视和迫害，动辄加以毫不讲理的血腥镇压。毛共的阶级歧视和阶级迫害，比美国曾经有过的种族歧视更恶劣百倍，它的一度昌行乃是全民族的最大耻辱，相当于纳粹党徒迫害屠杀犹太人，绝不能在今天换个面目再度复兴。

相比之下，“暴民”这个用语就完全不同，它具有鲜明的一时一地、就事论事的特指性质。例如你可以说，文革期间暴民运动成风，但你不能说“某地居民多为暴民”。这种说法之荒谬，凡智力正常者都该看得出来：即使该地居民过去确实从事过多次暴民运动，只要现在人家正在好好地过正常日子，那就任何人也无权作此诽谤性指控。

但“某地多刁民”这种说法却从传统社会一直流传到现在，它只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此乃专制统治者歧视侮辱人民的一种模糊用语，而模糊语言和模糊思维其实有利于专制君主，无怪乎毛泽东要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痛批形式逻

辑。第二，许多现代中国人，至今尚无起码的文明观念，思想境界还停留在毛时代那个中国历史上最野蛮的时代。

三、“刁民”该如何“界定”

好几个月前，燕南人先生写了《赵紫阳一怒斩刁民》，我看了后很反感，便写了《中国少的正是“刁民”》反驳，在其中，我指出，“刁民”本是传统社会官老爷侮辱人民的用语，其实这些人乃是自身权益意识比较强烈的先进分子。此文贴出后，有人批评道，我说的“刁民”和燕先生说的其实不是一回事。

可惜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到现在燕网友也没有给出个明确的“刁民”的定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猜测燕先生口中的“刁民”，其实是指“人民中某些蛮不讲理、得寸进尺的人”。

倘若燕先生真是这么理解的，那我觉得马悲鸣先生恰好是这种“刁民”的典型。如果用西式清晰思维作更准确地界定，“刁民”的典型表现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有毫无目的的闹事习惯，闹事根本不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哗众取宠，套用伯恩斯坦的话来说就是“闹事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2、欺软怕硬，得寸进尺，毫无双赢概念，不知道妥协，当对方退让时反倒气焰万丈。对方无情镇压时却又噤若寒蝉。

3、毫无现代契约社会的荣誉观念和信用观念，丝毫不知道尊重游戏规矩，作出的承诺转眼就能撕毁，而且毫不羞惭。

4、输不起，在同意参与分赃游戏之后，如果结果不利于自己就掀翻桌子不认账。

除了最后一条，马先生都占全了。他为左右互搏案纠缠郑义，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两年多前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后他还吵闹不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对我和郑义先生截然不同的态度则反复证明了第二点。毫无契约社会应有的荣誉观念和信用观念那条就更不用说了：这网上大概也只有他，当众赌咒发誓“永不攻郑”之后两三天又再度高喊“郑义不道歉，就叫他灭亡”的暴力口号。

第四条则是我参与的某个非营利企业的痛苦经历，当初同仁们关起门来分赃，达成了民主协议，可人家玩到后来发现自己吃了亏，不干了，干脆掀了桌子，让你们谁也玩不成，还要使出绝后计来，把所有财产抢劫一空走人。经此痛苦经历，我才会写下《民主是绅士的游戏，专制是痞子的游戏》。这儿的“绅士”指的就是有契约意识，有荣誉感和信用感的尊重文明游戏规则的文明公民。

其实上面这四条，乃是共党国家人民的共同特点。共党统治专门把人民变成痞子，整个前社会主义阵营或多或少都有点这种味道，只是中国特别严重罢了。独联体某些国家大选后反对派输不起，去进攻总统府就特别能说明这一点。而凡是目击 89 学运的人，应该都能看出上面开列的头两条恰好是当时的学领特点。

四、“刁民”其实是文明觉悟比较低下的人民

如果我上面界定的“刁民”就是燕先生所指的人，那么很容易看出来，这些人不过是缺乏现代文明意识罢了，而这毛病正是我党以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制造出来的流行病。

上面说的那四条乃是症状，病因则是两条，都是我党造的孽。

第一个病因就是我党“斗争哲学”和“造反有理”论的教育，使得人民习惯于轰轰烈烈的假大空政治运动，根本没有明确诉求，不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胡闹一气。闹起来后又毫无双赢观念，不知道该怎么和当局达成妥协。这在 89 学运中暴露得最明显，我已经反复分析过了，不再重复。

但在过去 10 多年间，随着“犬儒主义”昌行，人民已经变得现实具体了，往昔那种假大空政治运动已经丧失了诱惑力。近年来人民闹事，多是旨在解决实际问题，维护自己经济权益的斗争，在我看来完全是应该的。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建立，靠的就是这种具体的有限的经济斗争，人民的权益才逐渐得到了改善和制度性保障。

所以，需要强调的，也就只是人民应该注意依法斗争，并学会妥协的艺术而已。不分青红皂白，因为人民起来争取正当权益就主张屠杀，完全是丧心病

狂者的主张，只会激化社会危机，加速我党统治崩溃。党内主张屠民治国的人完全是别有用心，曲线倒中央，建议中央痛加整肃。

第二个病因则是丝毫不知道尊重游戏规则，这更是我党亲手教育的结果。早在 5 年多前，我就在《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中指出，在中国想发财，靠的就是不尊重规则，违法乱纪胡来一气。谁犯的法越大，谁就越能发大财，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就是说这回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执政党从上到下烂到提不起，成了不折不扣的“刁党”，你要人民不去跟上，那岂不是不跟我党保持一致？

因此，如果说人民真是刁民，那也是我党的错。要杀人，先得从刁官杀起，他们才是真正的教唆犯。放过罪魁祸首不问，却去捏造个刁民的名称作为杀人借口，如果这种逻辑说得通，那马悲鸣那种再典型不过的刁民也该斩首了。

说到底，“刁”不能成为一种法律上的笼统罪名，代替“牛鬼蛇神”成为国家暴力机构横扫对象。“刁民现象”的存在，反映了中国公民的普遍低下素质，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严重病态，但那完全是统治阶级造成的。它顶多只能用来证明中国目前还是个野蛮国家，不具备实行民主的主客观条件，绝不能用来作为为刁官刁党滥杀人民喝采的理由，更何况要改变这种社会病态，先得从刁党刁官下手，痛加整肃。不此之图，只知残民自逞，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只会一天天烂下去，到最后 13 亿人民必然要统统变成“刁民”。

2006 年 1 月 10 日

龙应台女士的“中国瓶子”

看到龙女士写给敬爱的胡总书记的公开信，第一反应便是想起了她的旧作《装不满的“中国瓶子”》。

龙女士是政治上的哪一派，到底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我毫不知情，光是朦胧地记得她是台湾什么高官，文化局长或部长一类吧。倘若此，则台湾式民主的确有点怪怪的——竟然会有共党和纳粹国家才有的官制。兴许那是先总统蒋公和经国先生从苏联进口到大陆，又带往台湾去的吧。

这“怪怪的”（台式儿语）感觉还不止此。70 年代看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则政治笑话：有人建议捷克斯洛伐克设置海军部，他人骇怪曰：捷克斯洛伐克乃是内陆国，连领海都没有，设置什么海军部？答曰：那么，苏联为什么可以有文化部？

这当然是卫星国国民痛恨老大哥导致的偏见，苏联当然没有能与俄罗斯文化相提并论的所谓“苏维埃文化”，但尽管人家平均水平远逊于先进的东欧国家，尖子水平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哪怕是在最黑暗的斯大林时代，人家还有肖斯塔阔维奇。硬要说人家没文化，完全是感情压倒理智的诬蔑。

不过这话用于台湾倒不错：台湾可以有文化部，则捷克也可以有海军部了。当然大陆也是这样。

兴许，这就是没文化的国家设立文化部的原因所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国家没文化乃是设立文化部的结果。那部名其实少了一个字：“灭”。所以，无论是苏联，是东欧国家，还是中国，自从建立了这“灭文化部”之后，原有的灿烂文化便扫地以尽。人类历史上设置过的一切衙门，就数这灭文化部的工作效率最高。据党朋们最新学术发现，其实这乃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文化与国家利益水火不相容，所以要特地设置个官僚机构出来，靠秘密警察或人民战争，动用无量民脂民膏，来千方百计地消灭这吞噬纳税人金钱的洪水猛兽。

扯远了，我知道龙女士，可不是因为她灭文化的丰功伟绩，而是因为看了台湾出的《丝语》杂志。好多年前，我在那杂志上第一次看到她的作品《妈妈的话》（题目不敢保证准确），觉得很有意思。

那文章说，国民党人到了台湾，强制推行“国语”，结果是造出了没有根的人为语言，如同电线杆一样笔直标准，却没有树木的根，云云。我看了那文章，顿悟台式国语为何“怪怪的”——那是因为它不是一种活语言，只有两个来源：一曰书面文字，二曰儿语。而这就是呆胞们何以老大年纪，还是孩子那副腔口，开口就是：“我好难受阿！”“这菜好好吃阿！”“那女生今年 41 岁了。”

这当然是国民党“灭文化部”的丰功伟绩。在这个特例上，文化倒也确实和大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势不两立，特别是在一个与母国分立了半世纪的前殖民地中更是这样。

不过即使就是这特例，琢磨起来也是一盆浆糊：大中华民国的利益，究竟和“台湾专区”的区区 2 千万草民有何相干？大陆人凭什么去胁迫人家以身家性命为抵押，为 13 亿中国人去扛自己没本事扛的全民族的十字架？难道为了弘扬国威，13 亿人就可以去强暴 2 千万人？这与 1966 年红 8 月期间高干子弟红卫兵为了解放全人类去杀人越货，到底又有何差别？真爱国，有本事把威风杀气使到外族头上去，先去收回沦陷给老毛子的 150 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没那本事，也该先把钓鱼岛抢回来，这才能具备起码的冒充爱国者的道义资格吧？敢情“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

又扯远了，还是来说龙女士的“中国瓶子”罢。

龙女士（或用台式儿语说，是“那位姓龙的女生”）的《装不满的“中国瓶子”》是不是也是登载在《丝语》上，我记不住了，只记得那大概是六四屠城不久后写出来的。龙女士在德国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大陆访客，带他在当地旅游，详加介绍当地的文化景观，细说人文典故。不料那仁兄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什么威廉凯撒毛奇腓特烈大王歌德席勒毫无兴趣，却一心以为鸿鹄将至，一会儿问曰：“你说李鹏何时会下台？”一会儿又说：“我看六四迟早要平反，你说呢？”

于此，龙女士便浩然叹曰：大陆人的胸腔中都放着一个装不满的中国瓶子，开口就是“中国中国中国”，浑不知世界之大之美，只知道盯住自己脚下那一亩三分自留地，云云。

我看了那文字，当下几乎把接受再教育时党和贫下中农教会我的粗话全骂了出来：让姓龙的那位女生去大陆居住 10 年，只怕她的“中国瓶子”比谁的都满！

这就是我那天看见龙女士的公开信时的第一感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嘻嘻，敢情你现在也有了“中国瓶子”，要满到溢为公开信，在全世界媒体上泛滥成灾了？

问题在于，还不只是龙女士一人有这种伪超脱。上网这些年来，类似的话我实在听够了。5 年多前在银河网站，那儿的“巨星”某某就曾用“心理分析”研究我，说芦某大概在毛时代受了什么心理巨创，所以要发为祥林嫂式的心声。此后有无数人重复这滥调。

对此误解，我从来懒得申辩，也用不着申辩。龙女士突然安装上去的比谁都满的“中国瓶子”就代我说尽了一切。

几年前在电视上看到，大约在 70 年代，法国某地农舍遭到雷击，全村顿时给轰到了九霄云外去，在地上留下了一个硕大无朋的环形山。当局赶快调查，发现在一战中，德军占领该地时，曾经修建了永久性地下防御工事，存储了无量弹药。后来德国人战败撤退了，回国去忙着挨饿，搞革命，街垒巷战，演说发传单游行示威，外带实验喂马共和国民主，还有谁会想得起那留在外国的地下弹药库来？雷击引发了地下埋藏着的弹药，当然立刻就把整个村庄轰到了月亮上去。

法国当局吓了一跳，立即找来德军当年的地道图，按图索骥，逐段仔细检查，发现还有一个巨大的弹药库安然无恙，那储量比爆炸了的那个还多得多。一旦被引爆，则整个地区都要给轰到火星上去。但由于我当时就没怎么弄明白、过后自然就迅速遗忘了的技术原因，专家认为，因为年深月久，已经无法安全撤走或灭活那些弹药，只有听之任之。

那地下弹药库的顶上就住着一家农家。可无论当局如何动员，那家人就是不肯搬迁。原因再现实不过：人家不光是住在那儿，整个农场都在爆炸范围内，那可是人家的全部家当。你让人家搬家不难，可得找个人来买下那农场，

否则人家岂不是要倾家荡产？但在那消息传出去后，还会有谁来买那人造火山顶上的农场？有如一文不名地活下去，还不如活在吉凶未卜的财富中（欧洲农民和中国不同，个个是百万富翁）。或许那农场明天就会遭到雷击，或许永远也不会，谁知道呢？

这其实就是让龙女士一度困惑不解的大陆人的“中国瓶子”。

“春江水暖鸭先知”，先知先觉们知道，13 亿人其实是居住在随时会被闪电引爆的巨大弹药库上，所以害怕得不能不大声疾呼，指望当局早日迷途知返，赶快动手拆卸那些弹药，以免玉石俱焚。而庸众如姓龙的那位女生不知厉害，要一直等到发现那弹药库可能累及无辜邻居时，才会临时装上那“中国瓶子”，还以为文明人和率兽吃人的生番之间可以有什么共同语言，因而有被说服的可能。

我常常想，和中共下台可能给全民带来的灾难相比，中共上台给全民带来的一切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很可能只不过是太仓一粟而已。过往 50 年间，我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每日挖山不止，在 9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下深埋了无量弹药，如今万事俱备，只待雷击。而这就是我为何挺身而出，勇作“专制制度辩护士”、坚决维护我党领导的根本原因——咱们再蠢，也犯不上自己去制造引发爆炸的闪电不是？

在我看来，中国最好的前途就是走前苏联的路，而我党的神圣历史使命，就是学习前苏共，实行“安乐死”，立即着手拆毁那弹药库，化解缓和一触即发的重重社会危机，力争为“后共中国”建立和平局面。我党过去再作恶累累也没关系，只要能做到这“安乐死”，使得中国避免了因共党骤然垮台遭受史无前例的浩劫，那么光凭这一丰功伟绩，也就足以赎去他们执政半世纪犯下的无量大罪了。

2006 年 1 月 31 日

给小马哥传授点共产主义ＡＢＣ

看了龙应台女士的文章，才知道小马哥在对台湾青年演说时，寄予殷切希望，盼日后台湾也出敬爱的胡总那样的人才。不意聪明颖悟如小马哥者，竟然也会说出这种惊天动地的昏话来。龙女士毕竟是文明人，不像老芦这喝狼奶长大的大陆人，是以口上积德，把马的昏话轻描淡写为 a bad joke（糟糕笑话）。孰料小马哥还不领情，强辩了一通。

不过，小马哥毕竟还是可以原谅的，他不曾在大陆生活过，不知道政工干部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儿向小马哥介绍一下中国的干部遴选制度罢。

我党执政后，对中国社会从头到脚作了改造的大手术，主要措施，就是无情消灭了一切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社会（包括城市所有的工会商会组织和乡村的传统宗法制度）以及一切独立于政府的精神权威（所谓“反动会道门”，例如一贯道），代之以党团队组织，由此形成一张严密掌握控制社会生活一切方面、无所不包的权力脉络网。

这权力脉络网在实质上乃是科学化了的黑社会，亦即把恶霸行为和告密行为制度化。恶霸行为乃是幼稚社会的通病，哪怕在西方中小学校中，同样也有恶霸。区别在于，西方小学或中学中的恶霸是自发的孤立行为，而只有在我党手上，恶霸行为和告密行为才登堂入室，成为社会建构的基本方式。

于是，这个庞大的权力脉络网上的所有“节点”，都由大大小小的恶霸和告密者组成。支配这个权力网运作的基本原则，乃是爱和憎、忠诚与背叛的“对立统一”。正如人民的好总理号召的那样，理想的革命战士必须具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对党无限忠诚无限热爱，对阶级敌人充满深仇大恨，残酷无情。

当这些空泛的口号兑现为具体实践时，就化成了“对上级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对上级讨厌的一切人充满深仇大恨，残酷无情，并随时准备根据上司的意图，背叛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生爹娘”。这就是我党遴选干部的唯一标准。凡

是能在那种制度下飞黄腾达者，必然符合这一标准，这就是我为何把那种制度称为“吸尘器”——它实在是一种专门提拔人渣的负筛选制度。

人民的好总理就是这“共产主义道德”的人格化。终其一生，他都对上司无限忠诚，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及时与伟大领袖意欲摆脱的各个政敌彻底决裂。他从来没有不变的同志和战友，只有不变的忠诚与背叛。为了这一至高无上的“原则”，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前来他家避难的贺龙送入监牢，在中央审查刘少奇的报告上批下“此人可杀”，听任妻子要求汪东兴立即逮捕那得罪了江阿姨的忠心耿耿的警卫……这些超脱了人类感情的超人式的高风亮节，根本就不是习惯于常态社会中脉脉温情的庸人们可以想像的。

这说的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马屁家。新一代又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老一辈革命家们毕竟还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它固然筛选出了具备心狠手辣素质的心态异常的歹徒，但也同时筛选出了有相当才干的同志。人民的好总理就是这两种素质的结合，同时具有杰出的才干与非凡的狠毒。如果不具备这两者，那早就为无情的战争淘汰了。这道理毫不难懂：光是具有取悦上司的非凡能力，并不能保证您不会因为低能而在战争中丢了脑袋。换言之，尽管我党遴选干部只有“忠诚与背叛”这个神圣原则，战争环境还是为我党强加了一个客观的“才干筛选”标准。

新一代无产阶级马屁家们则完全是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于是也就失去了“才干筛选”这条客观标准。既然伟大领袖蠢到发动了饿死数千万人民的大跃进还照样英明伟大，把企业办垮了当然也可以是“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至不济也是外行领导内行该交的“学费”。

所以，文明世界观察中国时必须牢记在心的一条，就是中国的干部遴选与政绩和才干毫无相干，而是“热爱与仇恨、忠诚与背叛的对立统一”。专职政工干部最完美地达到了这个神圣标准。相比之下，敬爱的李鹏前总理和江泽民前总书记那些技术官僚出身的要相对好得多——人家毕竟还有技术问题要操心，不是全日制地琢磨人，由此决定的性格养成歧异，必然会在国政层面反映出来。

这种“以权势地位决定爱憎忠奸的辩证统一”原则（用大白话来说，便是“看人下菜碟”的神圣原则），必然铸造出欺软怕硬的无产阶级马屁家，一方

面对权势者唯命是从，可以如勾践那样去为夫差尝粪，另一方面则对失势者和弱者毫不留情，什么狠毒的手段都能使出来。这说起来也不是个人的过错而是野蛮制度造成的——如果勾践不沦为身家性命决于夫差喜怒的亡国之君，他又怎么会养成那种可怕的两重人格？

如果龙女士和小马哥明白了我上面讲述的共产主义ＡＢＣ，则立刻就可以明白两人都错得一塌糊涂，区别只是 50 步与 100 步。

小马哥的错误就不必说了。台湾可能发生的最大噩梦，就是青年们给教育成了勾践。不过上面已经说过了，制造并提拔勾践们的乃是残酷的野蛮社会环境。台湾没有这种生态环境，小马哥再祝愿也白搭。

龙女士的错误，乃是天真地请人家“用文明说服我”，根本不知道人家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文明”和“说服”这两个词，只有“诈力”与“征服”。台湾最大的噩梦，就是变成勾践的下司，让人家当了台湾的“财东”，理直气壮地实行“谁出钱谁点菜”的“文明真谛”，如同关闭《冰点周刊》那样关闭“主旋律”之外的一切“噪音”。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龙女士的呼吁完全是徒劳的。敬爱的胡总当然有巨大的权力，可惜只会用于整肃胆敢偏离主旋律的知识界，绝不会用去对付买办官僚资本财团。这乃是必然的：前者毫无招架之功，遑论还手之力，而后者则是盘根错节的多头凶龙，他小人家万万不敢惹。哪怕是国民贫富悬殊到了危险的临界点又有什么关系？在中国那种科学化了的黑社会中，比起实力雄厚的既得利益集团构成的实实在在的威胁来，被人民造反颠覆自己的权位的危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胡中央若真的这么想，则我看也错不到哪儿去。两千年下来，中国人的学问就只有一门：如何维护君王统治，或曰“谋求社会安定团结”。这就是孔孟之道的宗旨，也是如今“和谐社会”的宗旨。如今咱们既然没了传统社会“化民成俗”那软的一手，当然也就只有全靠暴力镇压那硬的一手了。

在这点上，敬爱的胡总可绝对是称职的——当初老邓隔代指定他作接班人便是看中了他处置西藏骚乱的铁腕。不能不承认老邓确有眼力。我已经在讨论暴力革命的旧作里列举了暴力革命发生的主客观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乃是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如果统治者心狠手辣，则暴力革命就很难发生，更难成功。因此，胡总的主观素质，决定了他当政期间，不会有什么足以危及我党统

治的重大动乱发生。至于他身后中国是否会被他一手积蓄下来的深重无比的社会危机炸到火星上去，谁会去操那闲心？人路易15早说过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在胡温时代的基本走向：当前中国迫切需要的，乃是"政治右转，经济左转"，但我估计新中央只会反其道而行之，实行"政治左转，经济右转"，贫富悬殊日益加大，伴随着公民言论自由的日益丧失。

2006年2月2日

“道德政治观”可以休矣

——我看丁子霖教授与高智晟律师之争

最近英雄母亲丁子霖教授发表了给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让我感动莫名。丁教授不但是挺身反抗血腥独裁政体“屠民治国”实践，搜集整理了流芳百世的“丁子霖名单”、因此开创人道主义传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人，而且更能从一己哀伤中超越出来，看到中国民主事业的大局，为此给高律师写了那封语重心长、字字千钧的公开信。阅读那些处处能触摸到一位母亲眷眷之心的话语时，泪水不止一次湿润了我的眼睛。很明显，丁教授已把把永失爱子之痛升华为对青年一代的深沉泛爱。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看了那些诚挚的话语都不能不百感交集。

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高先生身为律师，竟然看不懂丁教授那些简单话语中蕴涵的深刻道理。他不但买椟还珠，完全错过了丁信主旨，在“政治化”上纠缠，闹出“‘政治化’是中共蓄意丑化异议人士的手法”的笑话，说明此子连我党的基本教义是什么都不知道，连毛共造的最大的孽就是把全民化为以政治立场为道德的政治动物这个史实都丝毫不晓，而且竟然连孙中山的弱智语录都抡不圆，把孙的文盲定义“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弄成了“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啼笑皆非之余，我也觉得丁教授根本不必为高律师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可惜。很明显，如此浅薄而且毫无理解力的同志，真要安心本职工作也不会有多大出息。

鸡同鸭讲、聋子对话也倒罢了，真正令我吃惊的是，面对丁教授那严厉的灵魂拷问，“民运”头子们不是噤若寒蝉，便是揎拳撸袖大骂出口。倘若那些隔岸煽火，躲在安全的海外，教唆煽动他人为自己火中取栗的“民运”领袖们黑漆漆的心底尚有三分天良残存，面对丁教授那海外人士应该体谅国内人士处境、不要把人家捧到下不来的高度上去的诚挚请求，本该汗流浃背，恨无地缝可入。

然而良心家们绝不会有这种“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起码良心反应。这些人不但天良泯灭，而且连正常人的羞耻心都彻底丧失了。

当初刘荻女士被捕，胡平、高寒等人或为了向施主们证明自己没有尸位素餐，或为了沽名钓誉，化他人灾难为一己政治经济资本，竟然不顾人家死活，发起“愿陪刘荻女士坐牢”的宣言，害得在那宣言上签名的国内网友杜导斌真的坐了牢。我悲愤交加，请他们实现自己的诺言，回国闯关，陪刘荻、杜导斌坐牢，以此向中共施压，迫他们放人。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我还特地说明此行只会有惊无险，只要约上西方记者团同行闯关，则中共根本不敢抓人。为了给他们打气，我甚至还提出自己愿意以观察员身份自费陪同他们前往。

尽管那文字贴在各大中文论坛上，英雄们却吓破了胆。那几位平时在论坛极为活跃的“民主闯将”都曾发誓“愿陪刘荻坐牢”，见了我那建议却噤若寒蝉，无一人敢搭腔。不仅如此，胡平先生不但丝毫不以发假誓欺骗愚弄公众、因而把国内志士诱入死地为惭，此后还竟然写出《精英与奴才》，肆无忌惮地辱骂那些拒绝被他愚弄欺骗，继续为他火中取栗的国内知识分子是“奴才”！

这就是立志把中国人民从中共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民运领袖”，就是他们作演说、写文章时不可须臾离开的“良心”！

这其实不是我想说的事，不过是那些“民运”垃圾对丁教授的放肆攻击引发的怒火。之所以写本文，还是想向那些理解力奇低还特别能自命不凡的海外“精英”们解释一下，丁教授那封公开信到底讲了些什么。

据我的理解（声明：此文所说，全是我个人体会，如有误解，与丁教授无关，由本人承担文责，并向丁先生道歉），丁教授那信的主旨是：搞大而无当、毫无明确的现实可行的诉求的政治运动，丝毫无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只会招来中共残酷镇压，导致社会倒退。社会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以渐进方式去点点滴滴地实现，因此，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于每个公民具体而微地去维护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具体到高律师身上，他能对中国进步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通过自己的职业实践，帮助一个个公民争取与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么做，要比他搞什么“反迫害接力绝食”有意义得多。

此中简单的道理，凡是有脑袋的人都能看出来吧？那“反迫害接力绝食”能让人严肃看待么？它到底有什么明确诉求？举出了什么具体的迫害事实？提

出了什么可能让当局同意的措施？难道中共竟有可能承认自己迫害异议人士，因高先生的抗议而痛改前非？绝食又对当局构成了什么具体压力？成年人居然会想出这种“接力绝食”的儿戏来，不但绝食时期很短，而且是在密室中坐关，当局有什么必要理睬这种闹剧？高先生发起这种根本没有中共可以接受的具体诉求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当局不理睬，绝食者们该如何下台？如果当局公开否认“迫害”的指控，绝食者们又该如何应对？退一万步说，就算当局以空对空，泛泛同意“停止迫害”（这是绝无可能的，这里是纯粹虚拟），请问这对改善中国公民实际人权状况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成年人都该看出来，高律师发起的这场运动，除了表演价值外，什么实际意义都没有。其唯一“意义”，就是把很严肃的事喜剧化了，不但给自己出了个“如何宣布运动取得辉煌胜利”的难题，而且使得以后严肃的抗争难以唤起海内外舆论注意。在本质上，它和高寒马戏班串演的“网络竞选政府”的廉价闹剧毫无二致。如果我是中共，我就根本不会理睬这种儿戏，任其无疾而终。这种儿戏闹得越多，对中共越有利，因为它起到“狼来了”的心理麻痹作用，使得普通人对此类事心生厌恶，更加促进空前泛滥的“犬儒”思潮。

这其实还不是丁先生那封公开信的最宝贵的教诲。我个人觉得，丁先生反对“政治化”的主张和我完全一致。我在旧作中反复强调过，真正的民主斗争，应该是从公民切身利益出发的经济斗争，而不是大而无当的空泛的政治斗争。它应该有非常明确的具体的经济诉求，处在统治者的让步上限之内，并能根据统治者的反应随时作灵活调整，避免发生对抗，使人民遭受不必要的牺牲。这才是为西方民主化的历史证明的真正的争取民权之路（英国历史上重大的民主斗争实质上都是百姓与国王或贵族争利的经济斗争，北美独立战争同样如此，就连法国大革命都是国王征税引起来的）。

用这个标准来看，中共执政下有过的唯一合格的民主斗争，乃是 70 年代末老知青争取回城的斗争。它具有明确可行的斗争目标，并没有危及中共统治，处于中共让步上限内，不会引起统治者的恐慌以及继发的过度反应，斗争因此取得圆满成功，不但使得几百万老知青重获在城市工作居住的基本人权，而且将此后的中学毕业生从“上山下乡”暴政下解放出来。虽然它没有感天地、泣

鬼神的美学价值，但那是共党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实实在在改善了相当数量的人民权益的民主斗争。

相比之下，89 学运就完全是照抄中共在“解放”前发动的“一二九”、“一二一”运动，其特点是具有强烈的表演性，提出的口号非常模糊空泛，却具有强烈的煽情力，富有打动人心的可歌可泣的悲情，却根本不是为了解决任何具体问题而发动的。示威者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和统治者通过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的意愿。他们的表演其实瞄准了民众而不是政府，说难听点便是“作戏给百姓看”。所谓“对话”的要求无非是为这表演所必需的一句台词而已。真到政府和他们谈判时，他们便什么要求都提不出来，正如蒋介石当初料定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而再三邀请毛去重庆谈判，毛去了后国府连个谈判方案都拿不出来一般。

这种以中共夺权拿手好戏为忠实蓝本的政治运动，只能让中共的 paranoia（疑心病）发作，以为示威者们是要推翻自己，因此决定绝不蹈国府覆辙，以血洗京城“保 20 年平安”，此乃他们的必然反应，熟悉中共思维方式的人不难在事前预知那悲剧结局。可惜国人竟然没从这惨痛的血的教训学会任何东西。几年后，法轮功又一步一个脚印地踏上那死路去，由此招来中共的长期血腥镇压。

这种中共式政治运动不但只会以悲剧收场，而且必将导致社会倒退。89 学运吓得中共停止了本来呼之欲出的政治改革，使中国从此走上了建设官僚资本主义的不归路，更使中共当局成了惊弓之鸟，从此把“稳定”当成了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倾举国之力镇压“动乱苗子”，使得统治者和人民之间丧失了良性互动的可能。

奇怪的是，如此彰明较著的事，天下竟然没有几个人看得出来，我们的“民主斗士”们至今还迷醉于共式政治运动中不能自拔，以为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良方，却不知道这么一个简单的经验规律：但凡以“民主”为口号的运动根本没有可实现目标，必然只会是误国殃民的作秀，而不打这空洞招牌，只实实在在为自己争具体权益的运动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上文提到的老知青回城就是如此。

仅此一端，便可看出党文化作了多大孽。从思想传承来看，毛共党文化其实是宋明理学的恶性发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奉行“道德宇宙观”，以政治

立场去偷换道德，把政治完全看成了道德问题。而这正是为何中国会出现 89 学运那种怪事——它其实是一场大规模的集体“道德表演”。

我已在旧作中指出，在毛共执政前，这“道德宇宙观”就害苦了中国人。明清末年都有所谓“清流”，这些人的特点，就是把国政当成道德问题。在明末，主张与满清议和的人就是奸臣。在晚清，主张西化者也必然就是汉奸。本人孤陋寡闻，还从不知道外国历史上是否有这种把政见或策略分歧当成善恶之争的怪事。

到了毛共手上，这种“道德政治观”就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极左的极权主义学说（如共产主义学说）与极右的极权主义学说（如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倾向于把政治“道德化”，而后者倾向于把政治“科学化”。例如共产主义学说虽然号称是“客观真理”，但它的主要诉求力还是道义上的。纳粹则只吹嘘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科学铁律”，对道德采取尼采式的鄙视态度。

因此，共产主义学说天生就有将政治道德化的倾向，尽管如此，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口里毕竟还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科学产物”。到了毛泽东手上，它便完全成了脱离社会生产力而存在的“至善天国”。不但共产党人和“阶级敌人”的斗争成了善恶之争，而且就连党内的策略分歧也成了与“阶级斗争”等价的“路线斗争”，同样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无产阶级不是在某个历史阶段由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客观形成的一个阶级，而是经“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改造肉身成佛，通过主观努力修炼而成的圣贤。

这一套思维方式被“民主派”全盘继承下来了。在他们，“民主”成了“善”，专制成了“恶”；“民主社会”成了“至善天国”的同义语，“专制社会”则代表“万恶地狱”；“民主斗士”成了“天使”，而“独裁者”成了“撒但”。在此，我们的“民主理论家”们完成的其实是化学上的“置换反应”：把《毛选》中的“共产主义”置换成“民主”、“无产阶级”置换为“民主斗士”，“地主资产阶级”置换为“独裁者”。这种“思维活动”，其智力附加值为零。

其实，稍微知道点民主常识的人都该看出，把国政道德化，恰是对民主精神的无情践踏。民主的根本精神在于对反对派的宽容，抽去了这一点，就绝对

没有民主可言。一旦把政治道德化，反对派必然要变成撒但，那还谈何宽容、自由与多元？

这就是为何海外“民主派”甚至比拥共派还缺乏宽容力的基本原因：在他们看来，容忍不同政见，就是道德上的堕落，正邪不两立，善良和邪恶之间不但不可能共存共荣，就连试图调和折衷两者，都是旨在欺骗背叛革命群众的犯罪行为。和我党一样，他们坚信“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而他们所谓“正邪善恶”之争，也就是民主与独裁，甚至是倒共与拥共之争。

明乎此，则立刻可以洞见为何从 89 学运直到今日高律师绝食那一系列伪民主运动具有如此鲜明的表演性，那其实是“集体道德表态”。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生死斗争之际，运动参加者们当然会感到一种强烈内心冲动，要挺身出来，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道德抉择。这也就是为何运动越到后来，激进派就越占上风，温和派就越发灰溜溜：那其实是一场“道德打擂”，而所谓“良心”也就是表演者们所唱调子的高度。

这种黑白两分法之荒谬，成年人应该一望即知，似乎不必再说了吧？早在旧作中说过无数次了：民主不是“善”，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确保社会成员合理分赃的手段，究其来源卑下得很，乃是咱们老祖宗看不上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没有什么出尘绝俗的苦修士式的清高。变成自身利益意识强烈而且不耻于公开争利的“犬儒”，不但没什么丢人的，恰是萌生民主意识的第一步。

这种道德政治观，正是触发了国内“犬儒”思潮的根本原因之一。国人在参加 89 年那场激情表演之后，无任懊丧地发现，越是良心高调唱得响彻云霄的同志，脚底抹的润滑油也就越多。胡平先生只知道痛骂“犬儒”，却不知道“犬儒”乃是政治骗子们大规模行骗的必然产物。当政治家们把只该针对自己个人的良心当成ＷＭＤ（大规模杀伤武器）投放政治战场大规模使用后，唯一的战果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出彻底唾弃良心的“犬儒”来。如果胡先生在骂“奴才”之前敢实践“陪刘荻坐牢”的誓言，哪怕是按我建议的，在记者团陪同下，去首都机场虚晃一枪作个“闯关秀”，则国内“犬儒”恐怕立刻就要少几个。

不过，正因为此，我倒觉得丁教授过虑了，其实您大可不必为高先生的安危担心。这道理明摆着：

第一，高先生的绝食活动不会引起我党注意，他们再是惊弓之鸟，也不至于蠢到拿这种儿童游戏当真。

第二，同理，这种儿戏起点太低，海外人士再有心炒作，也无法将其拔高到能吸引眼球的地步。就拿我这个例来说吧：如果不是此事惊动了丁教授，我根本也就不知道高先生这场表演。所以，高先生被海外“民运”人士捧到无法下台的可能性似乎不存在。

第三，胡共似乎比江共聪明，例如“今上”似乎悟出了“昨上”勇于充当阿扁“托儿”之蠢，上任后一改对台策略，对阿扁的独立秀采取“冷冻死”，确实比前任高明多了。我想，他迟早也会悟出，江共小题大作只成全了许多人的“反共成名术”，因而对国内异议人士也采取类似“冷冻死”策略，只会继续封杀其言论发表空间，而不大可能使用人身迫害的笨拙方式去帮助他们扬名天下。

2006 年 3 月 5 日

评摩登帝师温铁军的安邦定国策

最近在网上见到摩登帝师温铁军先生的讲话，在此对他的安邦定国策略作评论。

说是“评论”，其实言过其实。我与这温先生素昧平生，过去从未拜读过其大作，倘不是网友介绍此公乃当代帝师、温总理的经济高参，则我还根本不知道此人。据此公说，用古狗可以勾出上万条有关他的文字来，但我并无兴趣去系统研究他的“学说”。所以，还是凭看了那篇讲话残留下来的瞬时记忆随便说一通算了。总之，印象非常之好，那理由非常简单：

第一，此人虽贵为帝师，但毫无共党学阀的专横霸道，不敢以“真理托拉斯ＣＥＯ”的面目出场，而是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提出他的一家之言，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精神强暴行为，而是相当诚挚地说明那只是他的个人看法，欢迎批判讨论。这才是学者的态度，不是党棍的恶霸作派。比起他来，那些手中毫无实权，却大言不惭专给人民发号召下指示的“民运理论家”们如胡平、高寒等人只合羞死。如果我党“理论家”们都取这种态度，则我党庶几可救。

第二，该演说富于求实精神，毫不掩饰中国面临的无比深重的社会危机，并实事求是地和与会者一同探讨解决这危机的出路。温先生和那些见惯的御用学阀不同，没有厚颜吹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甚至没有欺骗自己和听众，硬要把刻下中国实行的烂污官僚资本主义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变相坦承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初阶的落后阶段。这种求实态度竟然出自摩登帝师，令人顿觉耳目一新。如果我党高参们都是这个态度，则我党庶几可救。

当然，因身份所限，他也不得不把党魁那些白痴吹成是高瞻远瞩的天才，把我党“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布朗运动式治国，吹成是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的有序展开。考虑到他的处境，愚以为这该算是最低限度的必要的自欺欺人，可以理解。

不幸的是，那演说的唯一优点，也就是认罪态度比较真挚，舍此之外乏善可陈。其最动人之处，就是它的智力附加值太低，连我这经济学的绝对外行都蒙不过去。如果帝师就是这点智力水平，则“胡温新政”实在没什么盼头。

如果我的模糊记忆不错，该演说的主旨大概如下：

一、在不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贫富两极分化是必不可免的。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将穷人出口到殖民地去，并不是靠先进的社会制度。

二、中国现在正在处于经济起飞之中，所以必然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而“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列宁语录），无法向外输出穷人，这就是中国贫富悬殊跃居世界之最的根本原因，并非中国政府的过错，更与社会制度无关。

三、贫富悬殊必然危及社会安定，为了防止中国在动乱中毁灭，必须坚持强势政府的独裁，断不能效法西方实行民主。

四、具体来说，学者们提出的城市化并非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放弃政府对人民居住和迁徙权利的无理剥夺，必然要导致农村贫民大量涌入城市，形成南美、印度那样庞大的城市贫民窟，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和福利问题。

以上所说就是我模糊记忆里残存的玩意，再强调一次，那演说我只匆匆看过一次，印象中的主旨就是这四条，很可能挂一漏万，但不大可能买椟还珠。

从上述“温四点”中，有点起码思维能力的同志不难看出，它的唯一智力附加值，乃是“荒谬的原创性”（absurd originality）。在这点上，温帝师颇有点像马悲鸣，可贵之处是具有言人之未能言的独创性，可惜提出来的观点破绽百出，乃是见木不见林的“隧道眼”思维方式。

“温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上述第一条中含有的两个基本假设：第一、贫富两极分化是经济起飞的代价。第二，迄今为止，解决贫富悬殊的有效手段是对外转嫁危机，把贫民大量输出国去。

不能不承认他那第二条假设富于原创精神，起码我这孤陋寡闻的同志没见到谁这么说过。可惜这两条都是隧道眼思维。提出者忘记了小学就该掌握的基本功，那就是“验算”。

在为鲁肃先生疗愚过程中，我曾苦口婆心地试图教会他这验算基本功，那就是，在提出一个归纳性的命题之前，必须将所得结果代入已知历史事实中去

验证，看看能否成立。只有在代入所有已知情况后都能成立时，才可以提出那一般性命题，否则无论那命题如何貌似言之成理，都只能放弃，或是作出重大修改，加上命题成立的限定条件，这才能拿出去招摇，而不至于如马悲鸣、鲁肃或现在的温帝师那样腾笑天下。可惜我循循善诱地教诲鲁先生一场，事实证明他一点都没受益，唉！

现在我以温帝师的理论为例，再次实地演示一番这“验算”的基本功，敬请诸愚看明白了，这次要是还学不会，本大师就再不免费教授了。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终生免费疗愚，而且老是在传授诸愚始终无法学会的正常思维ＡＢＣ，成了神憎鬼厌的“轱辘笛”。

假设温理论成立，则可以导出以下结论：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出贫民后，就解决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危机。

二、接受大量输入贫民的前殖民地国家（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经济起飞时又要面临贫富分化、因而又必须向外输出贫民。

三、没有条件大量输出贫民的国家，诸如战后的日本、西德、亚洲四小龙等国，在战后的经济重建（在日本德国完全是从零开始）或经济起飞中，必然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危机。这些国家如果实行民主，必然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

后两条结论似乎不用再说了——就连白痴也能看出它们彻底违反了历史真实吧？

那第一条结论，只暴露了温帝师缺乏世界知识。论大量出口贫民甚至罪犯，英国乃是世界之最——跟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白人聊天，最忌讳的就是询问人家的祖宗，那些人都是“军犯”后裔。但英国本土并未因此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直到上世纪 20 年代，英国城市都还有庞大的贫民窟，无产阶级的日子真是水深火热，《动物农场》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报导。历史的真实是，输出贫民以及掠夺殖民地并未使英国致富。二战以前，英国的国民平均富裕程度不仅远逊于美国，甚至不如加拿大和澳洲（至今也如此），普遍社会富裕反倒是在二战后实现的，伴随着的是丧失海外帝国，本国被迫大量吸纳从殖民地被驱逐回来的白人和印巴人！

至此，温帝师的光辉理论就如雪狮子向火，片片消融无遗。

更动人的是，温帝师在发宏论之先，居然就把中国历朝向海外大量移民的事实忘记得干干净净。他说，如果把散落在全球的白人全赶回欧洲去，欧洲就得挤炸了。那请问中国又如何？据我所知，泰国大部分居民都是中国人后裔，缅甸的华人后裔比例也很大。缅甸独立后的政客从吴努到奈温等人，据说都是华裔，就连昂山素姬，听说也有华人血统。如果把南洋所有华裔都驱逐回中国去，中国是否也会给撑炸了？为何输出了这么多中国人，国家还不会如英国一样，既发达又没有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呢？

身为帝师，说话得考虑“政治正确”。鼓吹这种“移民解决社会危机论”，不是变相煽动南洋的排华热潮么？印尼、大马、缅甸等国从来都认为华人掠夺了他们的资源，垄断了他们的经济命脉，为此多次掀起排华虐华高潮。温先生说这些P话，怎么就不想想可能引起什么国际政治后果？

南洋诸国的仇华心态，其实也有一定道理。记得某个鬼子曾经比较过中苏的经济改革，说中国具有前苏联没有的经济优势，那便是有由华人富商组成的庞大的海外经济帝国，形成了所谓“大中华经济圈”，能为中国提供经济起飞的原始资本。这话大概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说的，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该鬼（可惜忘记名字了）的高瞻远瞩，是这中国的“海外经济帝国”而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创造了今天的经济奇迹。套孙中山的话，说“华侨是缔造中国经济奇迹之母”，一点都不过分。

既然温先生的理论乃是伪科学，连学会验算的小学生都蒙不过去，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现在无比深重的社会危机的病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温先生所说，含有点滴真理在内。如我在《我看“中国之路”》中指出的，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是经济起飞不可避免的副产物，但那不是说经济起飞必然导致中国式的危险的贫富悬殊。贫富分化有两类，一类是健康的有限的可以弥补的贫富分化，而另一种则是无法抑制的病态的贫富悬殊。中国、南美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的就是后者。温先生难得地看到了这共同现象，却更加难得地没有找到真实的共同原因。

这共同原因其实丝毫不难看出，我早就在《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中讲过了，那就是中国、南美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是烂污国家，由流氓政府管理，其共同特点，就是拒不实行“机会均等”的费厄泼赖原则。在这种烂污社

会中，换取巨额财富的最有效的“硬通货”乃是权力，而这“硬通货”牢牢地控制在官僚集团手中，普通百姓无法染指，所以和西方文明世界的穷人不一样，永无靠自身聪明才智加苦吃苦做出头的希望。

要打破这种权力造成的财富垄断，唯一的办法是厉行西方式法治（rule of law，不是共党偷换的“法制”），建立不受党国操控的独立司法系统，把享受特权的权贵们降到与平民百姓等高的同一竞争平面上，党和国家全面退出经济生活，彻底剥夺党国官员们可能用于营私自肥的经济支配权，并开放独立的自由媒体作为监督措施。不此之图，却去强调提升国家权力，“加强我党的施政能力”，便只能火上加油，使得权钱转化永远处于无法抑制的恶性循环之中，使得已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不公雪上加霜，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危机总爆发，走上第三世界的共同道路，以军人政变告终。

温帝师这位医国手竟然为我党开出这种以热药治热症的虎狼方来，端的是让人瞠目结舌！

我知道，无论是胡温还是温帝师，大概都不愿意看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就这样一天天烂下去。这或许就是温总理在施政报告中奢谈“民主”的原因。所谓“民主”，在他们无非也就是效法传统明君虚怀纳谏，再使用行政手段搞点什么“政策倾斜”，损有余以补不足。这就是“胡温新政”所能到达的最高点，它其实一点都不新，无非是传统明君搞过无数次的老一套。

可悲剧恰在于，今日中国的所谓独裁制度根本不具备传统帝制的优越性，乃是人类能设计出来的最烂污的政治制度，当真是不良不娼，该民主时无法民主，该独裁时无法独裁。

这道理我已经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第四节中讲过了。该节乃是该系列写得最有水平的一节，可惜读者却最少。所有读者中，似乎只有小孙看出了妙处何在。他在跟帖中说，怪不得胡温枉担独裁虚名，空有反贪决心，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有整肃党外异己时才能真正雷厉风行。

这毛病乃是我党拜列宁建党学说之赐，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共党独裁制度不同于传统帝制，从理论上来说乃是“集团独裁”而非“个人独裁”，也就是对外镇压，对内“民主”。当老一辈实力人物死光后，新领袖们根本不具备足够的合法权威，可以去随意整肃党内巨贪大蠹。这和传统帝王完全是两回事，

后者的绝对权威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决心，连贪官的皮都能剥下来挂在县衙门大堂上，对“二把手”严嵩、鳌拜、和坤的家想抄随时就能抄。

换言之，如今我党领袖的“施政能力”只存在于党外。若要整肃党外知识分子，则我党领袖号令一出，必然一呼百应，全党雷厉风行，一体凛遵无违，就连太上老君也会急急如律令，雷公打豆腐尚不足喻其易；但若想整肃党内权贵，则党魁们立刻就要陷入“重症肌无力”；倘若想作制度的根本改革，实行司法与传媒独立，则党魁只怕立刻就要面临政变危险，得赶快写衣带诏：“今朕之大位行将不保，汝康铁军其速速想个救驾方略去者！”

于是，这天下第一烂污制度便构成了从两面杀伤党国的利器：对外镇压那面使得党失去了迫使党更新自救的民间压力；对内“民主”那面则使得党魁们面对飞速扩散、疯狂侵蚀党国肌体的癌症束手无策。

所以，温帝师有如去殚精竭虑地想那些虎狼方，还不如在这上头动动脑筋，想出个高招来改造那不良不娼制度，将我党从列宁的烂污设计中拔出来。

本人的建议是，先在党内实行真正的民主，也就是效法 60 年代的日本自民党，把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合法化，公开化，名正言顺地实行“党内有党”，在党内按西方规矩，公开争权夺利，竞选党魁，藉此赋予当选党魁以合法权威，使之获得整党的实际权力，彻底整肃中共那贪污腐败、藏垢纳污的总病源。如果连这条都做不到，则再说什么都是废话，胡温还是趁早忘了作“大有为明君”的美梦，延颈坐待铁腕军人崛起，以人民的名义荡涤朝廷的污浊。

2006 年 3 月 7 日

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

看了万润南先生探讨“中共气数”问题的文章，也想来说上两句。

“气数”到底是嘛玩意？

愚以为，万先生提出的“为何共产党至今不倒”问题本身的意义，似乎还没有这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暴露出来的问题令人寻味。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们会产生“为何共产党至今不倒”这种困惑？到底是什么人会有这种困惑？

窃以为，这种困惑之所以发生，恰说明了党宣传的威力。产生这种疑惑的同志，正是被我党改造得比较彻底的同志。这个困惑的潜在前提，乃是这么一个武断：

“凡是不得民心的政权，都必然要垮台。

共产党不得民心，

所以共党必然垮台。”

稍知逻辑的同志都该看出，这是典型的演绎法三段论。头两句话分别为大小前提，最后一句话为结论。受过严格思维训练的同志，首先只会审视大小前提是否成立，然后才会考虑那结论。这对受过中学教育的同志来说，早就应该成为不假思索的剖析习惯了。

然而我们的同志却没有这种习惯，在他们看来，那大前提乃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小前提当然也成立，奇怪的是结论预言的事却迟迟没有发生。为了解释这咄咄咄怪事，他们便在无意识状态中修改了大前提，使之成为“凡是得不到正常人民拥护的政权都必然垮台”。换言之，原来那三段论只适用于正常人民。因为中国人民不正常，所以原来的预言未能发生。

就这样，积极分子们把中国人民开除出那“宇宙运行规律”之后，便不但成功地挽救了那“客观规律”，而且就此找到了弥补办法，那便是使用早在襁

褓时代便从党妈妈那儿学来的《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抛出“狼论”和“狗论”来，大骂人民是奴才，是狗，指望用这种“启蒙”把人民变成为自己争权夺利壮烈牺牲的“正常”炮灰。

其实，是成人都该知道，那大前提根本就不成立。我早在论述暴力革命的一系列著作中阐明了，暴力革命要发生，必须满足一系列必要条件，“失去民心”不过是其中比较次要的一条而已。而且，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即使所有的必要条件都满足了，还不一定会出现暴力革命。换言之，失去民心不一定会丧失政权，获得人民拥护的政权也不一定能存在。

粗知历史的同志都该知道这历史的真实：后梁开国君主朱温乃是不折不扣的禽兽，他登上大宝，究竟获得了谁的支持？明朝几百年下来就没出过一个好皇帝，那政权何以就是不倒？帝国主义分明代表了先进文明，一个效法西方模式的改良政权，当然比老佛爷的顽固朝廷更符合人民利益，为什么华北人民要起来作反动的义和团，专门和光绪爷过不去？中共政权从本质上来说远比国府反动一万倍，为何一个反动政权会取代进步政权出现？论残民程度，国民党拍马也追不着共产党，为何人民不痛恨共产党而痛恨国民党？论顽固不化、择恶固执，世上没有哪个政权比得上金家父子统治的北韩，为何人家就是傲然屹立不倒？如果美国不动用武力去强行推翻傻大木政权，伊拉克人民又有什么希望摆脱它？伊朗人民为何要去推翻开明的巴列维国王，迎来政教合一的远古式黑暗统治，而且这些年下来也同样巍然屹立，令美国又气又恨又无奈何？

所以，没让我党的“拜人民教”的迷魂汤灌得彻底丧失了原始神智的人，应该一眼就看出那个三段论不过是个弱智笑话。

这笑话我早在 20 岁没出头就看穿了。记得那时偷读苏联出的《拿破仑传》，其中有件轶事令我终生难忘：拿破仑在当炮兵军官时亲眼目击暴民们围攻枫丹白露宫，羞辱威胁国王和王后。他大骂路易 16 是个脓包，说只要调来一连士兵，打死几十个人，汹汹不可一世的暴民就会立刻如鸟兽散，跑得脚后跟朝前。此后他执政时果然如此，竟然使用大炮轰击示威民众，刹那间便收奇效，从此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再也没谁敢上街游行，“争取民主”了。

这其中反映出来的简单道理无非是以下这么几条：

1、人民和唆使他们的政客一样，都是怕死的。此乃人类天性，是基因决定的保存物种的基本手段，毫不可耻。胡平、曹长青、高寒诸先生自己怕死不想

回国送命，也就无权剥夺人民怕死这条起码人权。允许人民怕死，应该是政客们首先必须具备的第一条良知。

2、如同士兵上阵前总是想着“打死的只会是别人，不会是我”一样，人民总是怀着侥幸心理才会参与闹事，他们的胆大是统治者纵容出来的，在闹事时，人民总是试着来。如果第一次没有遭到镇压，第二次参与的人也就越多，胆子也就越大，提出来的要求就更高，由此进入正反馈，整个 89 学运的过程就是如此。反过来，如果人民在事前就得知统治者必定要血腥镇压，则闹事根本也就不会发生。这就是暴力的威慑作用，如果暴力起不到维持统治的作用，那根本也就不会存在了。

3、在独裁国家中，统治者维持统治，靠的不是人民支持，而是枪杆子。在现代条件下，人民和枪杆子之间的对比，乃是肉和屠刀的关系。只有我党炮制出来的绝对白痴，才会指望精肉和肥膘们去打败镇关西郑大官人手中的屠刀。只有在郑大官人不敢使用屠刀时，精肉馅子们才会占上风。

4、因此，如无外力介入或致命内讧，旧政权被人民推翻，最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心慈手软，缺乏血腥镇压人民的魄力。如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显示出来的那样，革命建立的新政权远比被推翻的旧政权敢于屠民，因而也就远比旧政权稳定。暴力革命起到的作用，就是用人工手段把心狠手辣的独裁者们筛选出来并送上大位。因此，经过一连串革命的国家诸如中国，统治者的凶残便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5、我党充分总结了国民党垮台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完全明白我上面讲的一系列简单道理。小平看中锦涛，正是因为后者敢于头戴钢盔，亲力亲为镇压西藏骚乱。这就是小平眼力过人之处。的确，对于中共来说，维持统治才是第一位大事，国家领袖是否具有敢于镇压人民的主观素质，远比他是否具有治国才干更重要。

正因为看明白了这点，我才敢断言，只要小胡执政一日，人民就不敢起来造反，中国也就绝不会陷入动乱。我劝民运同志们的招子还是放亮些，趁早少作春梦，从徐水良、高寒之类的“全民起义”幻觉中清醒过来。

明白了上面说的简单道理，就不难明白万先生说的“气数”到底是什么玩意，在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民朋看来，那其实就是“人民支持”，而“气数已尽”其实就是指“失去了民心”。使用“气数”这种类似于

“天命”的古代用语，说明在这些同志心目中，上面那根本无法成立的三段论确实已经成了“宇宙运行规律”。

这些同志犯的错误，乃是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只记住了表面上的简单教义，却忘记了伟大领袖一再重申的“决不可书生气十足”的谆谆告诫，更忽略了我党选拔干部的最主要标准便是“对敌斗争坚定”那一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党是怎么上台的，于是便以为可以套用党史教的那套公式去取而代之。我党之所以造出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积极分子们来，除了受教育者的天资问题外，其实还是我党无法把真话讲出来的结果。

其实，在我这 cynical 之人（这儿和不懂英文的同志解释一下，这就是为学毛著尖兵胡平同志谴责的万恶“犬儒”），所谓“气数”，可以用现代语言破译为“独裁统治集团敢于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的主观意志和能力”。如果统治集团丧失了这种铁的意志，或是丧失了动用暴力的能力，则统治集团的“气数”也就尽了。反过来，如果统治集团具有镇压人民的铁的意志并能控制和投入镇压暴力，则他们的“气数”就如日中天。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敬爱的胡中央领导下的我党的“气数”正旺着呢。说出这大实话来扫诸位民运人士的兴，真对不起同志们了。不过我劝大家还是长大为好，老是以成人甚至老人之身冒充幼儿园大班的小宝宝，似乎也不是回事。所以，劝大家还是死心塌地，忘了充当新一代“民主”（亦即新一代人民之主）的美梦，准备客死异乡算了。当然，如果诸位要斩我这报坏消息的花剌子模国信使的脑壳，那也不必客气，只管挥刀过来便是。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万先生那“没有哪个敢于屠杀自己的青年的政权能长治久安”的话整个说反了。正因为我党敢于屠民，它才维持到了今天。万先生在作出那一般性结论来之前，怎么就不想想先去论证一番，回答“为什么敢于屠杀青年的政权必定会垮台”的问题呢？

什么样的人民支持？

前节贴出后，某网友诧道：“老芦，你这不是回到狼羊律去了么？”的确，我说的简单道理，从表面上看来很像著名党朋“随便”先生提出的臭名昭

著的“狼羊律”（统治者天生是该吃羊的狼，而人民天生是活该被吃的羊，无论哪种社会制度都如此），更像他历来主张的“屠民治国论”。

勿过，这相似只是形似而已。该党朋的“狼羊律”和我的“气数”论都指出，人民可以被独裁者任意屠宰，不过，他认为那是本该如此的天经地义，我则是无可奈何地作了事实陈述。类似地，他认为要治国就必须屠民，我只是告诉大家，他说出了我党心声，中共确实迷信“屠民治国论”，不是心慈手软的国民党，请大家停止做梦，以为可以用毛共上台前使用的那套“合法斗争”去斗倒中共。

最本质的区别还在于，如我早就指出的，所谓“狼羊律”发扬中国传统，用不伦不类的文学比喻偷换逻辑论证，因而不但把独裁政权的特点强加到民主国家头上去，而且把统治者和人民说成是天生如此、不能转化的“狼”与“羊”，但就连绝对白痴都该知道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狼羊转化”。就连毛共本身，过去又何尝不是“羊”？

其实，“狼羊律”恰好暴露了独裁社会特有弊病。独裁社会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天敌关系，在这种社会中永远存在着“羊”以暴力方式大规模转化为“狼”，向统治者们大举复仇的潜在可能，这潜在危险便成了一切独裁者们的永恒噩梦，构成了独裁社会特有的内部危机。

就连白痴也该看得出来，靠果敢屠杀人民，当然能维持独裁统治，但这只能是不得已之计。如果人民恨透了统治集团，那统治者就如同坐在不知何以爆发的火山口上，秦王朝的迅速覆灭就是生动例证。虽然科技进步使得人民失去了古代造反派的天然优势，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险恶政治局面必然使得统治者疲于奔命，毫无安全感可言，必须把所有精力都用于密切监视镇压人民最微小异动之上，生怕一粒火星点燃燎原大火。这就不必要地增加了统治者的工作量，这种统治者当得很累很不潇洒，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下策。

这就是独裁制度相对于民主制度的最本质的“优势”——它没有民主社会那套解决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的设计，因此是世上最不稳定的国家。因此，世上只有独裁政府才会处于全民包围之中，不得不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以小民为敌国，把“消除动乱苗子”当成政府的主要施政内容，把国家的大量资源用于监视镇压自己的人民，而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特殊难题。

因此，全面地说，丧失人民支持当然不会造成政权垮台，但光靠镇压维持的独裁政权毫无稳定性可言，而是处于持续的危机状态。聪明的独裁者一定会尽量避免处于这种被动局面，代之以使用革命两手，主要靠软的那手来欺骗麻醉人民，骗取人民认同与支持，实在不行时才撕下面具，把硬的那手使出来。似乎可以说，如何巧妙使用软的那手，体现了独裁者的智力。

毛泽东的那手是把国家封闭起来，对人民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使得人民永久处于互相暗算的内斗中。为此，毛赋予工农大众持续虐待迫害另一部分人民的特权，以此造成他们虚幻的“翻身解放感”，并时时用虚构出来的“变天噩梦”提醒他们过去和我党一起犯下的罪行，警告他们如果不效忠伟大领袖，一旦“还乡团”回来时，“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在设置内部假想敌的同时，毛还自绝于国际社会，设置了一系列的国外假想敌，有意将国家置于背水一战的绝望境地，以此保持“大救星”的地位。

这种土匪治国，古今中外历史上还见所未见，就连苏联都没使用过。它的工作前提是一个封闭而且持续处于紧张状态的社会，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处于类似战时动员的高张力状态，使国家机器变成了《571 工程纪要》说的“永动绞肉机”，势必不能持久。

后毛共部分继承了这套作法，继续利用“民族主义”唤起人民对政府的认同。不过，人民已经疲惫于无休止内斗造成的高度紧张，就连党国干部都受不了，邓小平不得不宣布停止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废除了毛设置的内部假想敌，改而寻求更聪明的欺骗方式，去最有效地换取人民支持。

于此便出现了万先生那问题引出来的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民支持？”

这本不该是个问题，可惜因为“民运”同志言必称“人民”，其实乃是天下最不懂人民是怎么回事的同志，所以这儿不得不再解释一下。

所谓“人民”，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物。13 亿中国人，包括疯人院的疯子们，每个人都是人民。在本坛发言的所有同志，无论是民朋、党朋还是独知，统统都是人民。人民就是“庸众”的别称，不是神通广大、全知全能的上帝，不会创造奇迹。当人民大规模起来之时，倒的确能扭转历史发展方向，可惜往往是把国家扭转进深渊去。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连续社会大跃退，从太平天国开始，历拳匪之乱，直到中共革命，无一不是如此发生的。

把平庸愚昧的“人民”莫名其妙神化为“上帝”，乃是毛共欺骗人民、夺取权力、维持统治的基本策略，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冒充“上帝”的解放者、教育者和代表者，并使用对敌斗争那套去对付自己的百姓，分化瓦解人民，挑拨煽动一部分人民去迫害一部分人民。

如民运垃圾们在网上生动展示的那样，他们把这两手忠实地学下来了。因此，鉴别伪民运的重要标准也就包括这两条，一是看他是否无耻吹捧人民并时时处处厚颜无耻地以人民代表自居，二是看他提倡的民主究竟是不是西式全民民主，是像西方政客那样，不但不敢以天然的人民领袖自居，更不敢教育人民，而是千方百计讨好选民，还是像毛共余孽胡平、徐水良、王希哲、高寒诸先生那样，动不动就以“民主”、“民师”身份出现，效法我党给大众下红头文件，今天发起这个那个运动，明天辱骂某部分人民是奴才和“犬儒”，后天企图改造人民的思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诸位见到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狂妄分子，那就一准是民运垃圾，啐他个满面花一定没错。

其实，“人民”是个大杂烩，从本身具有的能量来看，可以粗分为两大部分，其中一小撮称为“精英”，也就是知识分子，大部分乃是蠢人，也就是工农大众。在文明社会实行的脑体力劳动分工，决定了“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无论是建设还是破坏（亦即造反），知识分子都起到大脑和神经的作用，而工农大众则是“瘦肉”，亦即社会的肱二头肌与股大肌。

没有知识分子充当大脑与神经的社会运动，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革命造反，都注定只会失败。在经济建设中，知识分子乃是设计者和指挥者，工农大众充当苦力，也就是影片《创业》上说的“知识分子画圈，工人打井”；没有知识分子画圈，则工人们便发梦也找不到哪儿有油田。在造反暴乱中，知识分子躲在安全的后方摇鹅毛扇，煽动、教唆、组织、指挥工农大众去当炮灰。没有知识分子摇鹅毛扇，则暴乱农民只会如陈胜吴广那样，把“首义”之功变成他人嫁衣。

正因为知识分子的能量不是一般的大，刘玄德才会为了招揽诸葛亮，不惜去装孙子，把远比他年轻的孔明同志顶到了头上去。的确，如果他没有招揽到孔明，早就在曹孟德过江之际授首了，哪还有后来三分天下的风光？孔明不献《隆中对》，老刘又怎么会有那战略眼光，想到必须避开实力雄厚的曹操与孙权，去捏软柿子，填补四川存在着的难得权力真空？

粗知中国历史的人不难看出，我这话完全是难听的大实话。一场农民暴乱是否最后会成功，关键的一条是它的领袖是否如刘邦、朱元璋那样，礼贤下士，吸纳了大批读书人作军师，为他们出谋划策。事实上，历史上有点规模的农民暴乱领袖本人就是落第秀才，黄巢、洪秀全和毛泽东都如此。这些人因为过去受过主流社会排斥，得志之时其怨毒必然要以百倍疯狂发泄出来，乃是世上破坏能量最大的生物，超过一般文盲大老粗万倍。

建设又何尝不如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三次经济腾飞，每次都是知识分子主导的。第一次是国府 1928－1937 年的十年建国，因为蒋公实行了儒家的学者治国传统，使用海龟们作为经济发展的设计师，迎来了现代史上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第二次则是 50 年代按苏联专家治国的模式，搭建了基础工业的框架。第三次则是后毛时代的经济腾飞。这三次都是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因此都取得了成功。

反过来，在反右后，毛以为知识分子要造反，从此将他们入了另册，踢开他们干革命，马上就制造出“小土群”、“卫星田”的千古笑话来，让国民经济一头栽进了深渊，创造出在风调雨顺的太平年月几千万人民“非正常死亡”的奇迹来。光是这一奇迹，就说明了否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脑体力劳动分工的文明社会前提，弄假成真，真的相信了自己“卑贱者最聪明”的Ｐ话，会遭受到何等无情的惩罚。

那么，为什么东西方民主政客都要无耻吹捧人民，毛共更是把工农大众捧到了天上去呢？那道理很简单，西方政客需要选票，东方政客需要炮灰。光有大脑和神经，没有肌肉，则大脑们最好的前途也就是泡在玻璃罐里，去和好莱坞笑星马丁谈恋爱而已。因此，两者都必须甜言蜜语地去哄骗无知的工农大众，这就是政治的无耻处。只有老芦这种天生政治野心缺如的独知，才会为了保护肌肉们不至于沦为野心家大脑们的炮灰，把难堪的实话赤裸裸地说出来。

正因为此，聪明的独裁者都知道，所谓“获得人民支持”乃是句大而无当的空话，关键还在于“获得最有能量的那部分人民的支持”。人民中“最有能量的部分”当然是劳心者而非劳力者。获得了这部分人民的支持，就不但能有效地从事建设，而且也釜底抽薪，除去了最有能量的反对力量。

古人早就明白这道理了，所以李世民看到新考中的进士毕恭毕敬地进入皇宫朝见时，才会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如我在《中国ＡＢＣ：

千年活化石》中指出的，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极度稳定，其中的一个关键措施就是它发明了牢笼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用“政治六合彩”的巧妙设计，以潜在的、瞬息可获的功名利禄牢牢吸引住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元朝没有实行这制度，所以很快就垮杆了。

细心审视科举制度的设计原理，可以看出它的高明之处就是费厄泼赖，亦即为全国读书人提供了一种机会均等的潜在成功可能。换言之，科举制度提供的不过是一种“公平的允诺”。其实，朝廷命官数量有限而且固定，根本无法赶上人口增长速度，由此造成的供大于求，使得大部分读书人终生都没有中举的希望，遑论考上进士。但因为竞争是公平的，实行了所谓“形式上的平等”，它便永远能吸引全国读书人前赴后继，终生溺此不拔，再不会想到造反作乱上头去。

由此可见，要牢笼人民中最有能量的那一部分人，关键在于为他们提供一种潜在的成功机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给出路”。如果独裁社会能为知识分子提供多种出路，那他们也就只会把脑筋动在如何利用社会提供的机会，改善自身待遇上去，不会再去琢磨怎样寻政府晦气。而这就是老邓在六四后做的事。89 年以后中国进入经济起飞，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发家致富的可能。他们的注意力焦点因此从政治上转移到了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上去，普遍表现出了对政治的冷漠。

这就是胡平先生为何要在他那流芳百世的名作《精英与奴才》中破口大骂中国的精英们是“奴才”。他不愧是“民运”的“理论大拿”，看到了其他垃圾没能看到的事，那就是，本文第一节那个三段论的小前提“中共失去了民心”其实不准确。我党可能确实失去了工农大众的支持，但它却赢得了人民中最有能量的那部分人的支持。

这一历史性变化，在我看来，其实是难得的重大社会进步，是中国在折腾了这么多年后终于开始向常态社会转变的表现。社会应该为其成员提供多种实现自己抱负的出路，做到了这点的就是常态社会。反过来，如果知识分子什么出路都没有，改善自己的境遇的唯一希望就只在于推翻政府，那么这种社会就是病入膏肓的危险社会。它当然为在野野心家们提供了掌权机会，但我实在看不出来那对全民究竟有什么好处。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相当于 80 年代而言，内部稳定性增加了，这是精英获得过去从未享有过的机遇造成的。这一变化乃是统治者和人民双方趋向成熟的表现，其实是一种历史进步，只对惟恐天下不乱的民运野心家不利。以胡平《精英与奴才》为代表的诅咒，只暴露了民运垃圾包藏着的毛泽东式祸心。如此而已。

为什么要推翻共产党？

国人常见的毛病，乃是把“理性决策”与“灵性信仰”混起来，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需要在事前仔细分析论证利弊，后者则根本不需要理性思考过程。

例如信教吧，是否入某种教，跟理性思辩没有什么相干。没谁是在博览群书、比较鉴别所有宗教、通过理性论证证明了某种宗教确实是真理之后，才决定入教的。相反，越是这么干，就越不可能信教，老芦就是这种人。绝大多数人决定加入某个教门，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智决策，而是浊气一涌的结果。没有这股子浊气，您这辈子就没希望加入任何宗教。

这道理再简单不过：真正的理性思考的前提是“怀疑一切”，即不受任何既有的 presumption 的约束限制，而是认定任何声称在得到证明之前，都不能用作推理前提，因而去客观审视并无情剖析为一切大众普遍接受的“真理”，看它们到底是否成立。只有得到严格证明的声称才能用作推理依据。

但这种理性怀疑精神却与宗教精神格格不入，人家讲究的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根本就不容许您用怀疑态度去审查基本教义。就是容许也没用，宗教从来就是超越证明的形而上玩意，用形而下的科学论证方式去解决超出人类理性能力的疑问，只会钻入死胡同。所以，理性思维成了人生习惯的同志，根本就不可能入教。

不仅如此，真正的教徒，讲究的是不计利害。如果您加入某种宗教乃是指望获得什么具体好处，或是藉此逃避灾难，那么，该宗教必然是邪教。

这就是所谓信仰（belief），它的特点是超越了理性论证与利弊分析，与理性说服无关，不讲究“充足理由律”。入教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于己，传教则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于人。

奇怪的是，在倒共同志那儿，“推翻共产党”似乎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宗教信仰。他们不但自己不会想到“为什么要推翻共产党”这个问题，而且甚至不许别人产生这种疑问。

文明社会当然应该尊重宗教信仰。不过，文明人都知道，宗教是私人的事，政治才是大众的事。信仰只能留给自己，不能拿到公众场合来当论据，否则就是强暴他人自由意愿。过去法轮功的明心大仙就试图在这儿搞这一套中世纪勾当，将反对他的人一律打为只配销毁的魔鬼，最后碰得头破血流而逃。

既然“推翻共产党”不过是个决策问题，那就当然有“为何”和“ 如何”的问题，“为何”问的是“功利合理性与必要性”，也就是要求人们作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利弊分析。而“如何”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可行性问题。您先得解决了这可行性论证，这才能谈到具体该怎么去操作，是不是？

再说得明白些，倒共人士必须向大众证明以下几条：

1、推翻共产党是可行的。

2、推翻共产党是功利上的最佳决策，这是因为：

ａ、“推翻共党”乃是“人民普遍受益”的充分条件，换言之，共党一旦被推翻，人民就必将普遍获益，

ｂ、“推翻共党”乃是“人民普遍受益”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不推翻共党，人民就不可能普遍获益。

ｃ、推翻共党不会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人民即使付出代价，那也是利大于弊。

ｄ、推翻共党是一种事前可以精确计算、并在实施中得到严格控制的系统工程，绝不会像辛亥革命那样半道出错，不但没有达到原设计目的，反而使国家陷入长期动乱之中。

凡生活在西方的同志都该知道，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人民根据自身的利害考虑，选举代表，通过辩论表决，去作出种种涉及全民利益的决策。推翻共产党乃是涉及全民身家性命的重大决策，任何公民都有权对持此种主张的政客提出以上最起码的咨询，而民运垃圾若想冒充民主政治家，就有不容推卸的义务，对这些咨询耐心作出详尽完备的解答。

因此，只有在雄辩证明推翻我党不但可行，而且是功利上的最佳决策，说服人民取得共识之后，“民主斗士”们才获得了宣传鼓动推翻共党的道义资

格，才能去推行他们的暴力革命。否则就是强奸民意、一意孤行、视民命如草芥的孙中山、毛泽东式的大独裁者、大野心家。要这么干也成，那就直接打出毛泽东旗号来好了，拜托不要冒充西方民主政治家。

令人骇然的是，所谓“海外民运”到今天已经有 20 多年历史了，但倒共专业人士们似乎从来就没谁涉及过这些最起码的问题。天下再没比这些饭桶更尸位素餐的专业人士了，这些人才是世上最该扫除的政治骗子寄生虫！

不仅如此，在上智如老芦者写出一系列批判伪民运力作，揭示了这一系列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分析之后，某些下愚辈还要择愚而固执，写出愚不可及的烂“文章”来，认定“推翻共党”和“实现民主”一样，乃是一种必须不计一切世俗代价追求的神圣原则。谁胆敢偏离这道义立场，提出“共党骤然垮台会引起大规模内乱”、“暴力革命有可能触发核内战”的明智警告，就算不是帮助共党维持统治的帮凶，起码也是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

光是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倒共人士特别是民运垃圾是何等轻藐民意、视国脉民命如儿戏，更是何等愚不可疗。他们的拿手好戏，不是像魏京生、曹长青那些文盲积极分子一般，使用文学比喻，把我党妖魔化为“大灰狼”，就是反复忆苦思甜，痛诉共匪滔天罪行，却蠢到不知道列举共党既往的滔天罪行，与证明“推翻共党不但可行而且应该”完全是两回事。

这道理哪怕是白痴都该明白：无论共党过去作了多少恶，将来还可能作多少恶，都不等于推翻了那个作恶累累的下流政权，就能保证人民境遇就此得到改善，而不是反而因此恶化了。如果中国人民早在 40 年代明白这简单道理，也就不会热衷于拥护共党推翻国府了。因此，您要人民跟着您去推翻现有暴政，先得证明您的革命不会是中共革命那种“以强暴易弱暴”，让人民离开狼窝，却掉进了虎穴。

伪民运人士不敢正视上述问题，甚至禁止他人讨论这些问题，恐怕除了惊天动地的愚昧之外，尚有难言苦衷——一旦正视这些问题并找出可能性最大的答案来，则倒共也就无法再是一种职业了，岂不是要自动断了粮道？

其实我早就在旧作中多次分析过上述问题，再重复一次吧。

1、推翻共产党是可行的。

此乃绝对 P 话。我已经反复指出过了，在现代条件下，人民已经失去了以武力推翻共党的可能。共党无论如何倒行逆施，都不会被人民推翻。如果垮

了，也只会是因为丧失了镇压人民的主观意志和能力所致。这点还要在本文第四节中详论。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看不出人民有什么能力去推翻我党。既然是没有什么可行性的事，那还有什么谈论的必要？

因此，所有"销毁魔党"的噪音，都是哗众取宠，根本不值得任何成年人注意。老芦被这些蠢才连累得如此长篇大论，当真是天下第一倒霉之事。那目的不是为那些下愚疗愚，而是通过剖析这些病例，为大众演示一下什么才是合理的思维方式。

2ａ、"推翻共党"乃是"人民普遍受益"的充分条件，换言之，共党一旦被推翻，人民就必将普遍获益，

这是武断认定，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现有证据提示的完全是相反结局：推翻共党只会使得大多数人民遭殃。

有点人类常识的人都该知道，人民普遍受益的必要条件，乃是良好的社会秩序。胡平在"弱智语录集"《一面之词》中痛驳"相对于动乱来说，暴政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批的其实是难堪的大实话。古人早就说过，"好死不如赖活"、"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安定的社会秩序乃是人民安居乐业的最起码前提。如果人民生命财产都得不到起码保证，谈何受益？

现在的问题是，共党骤然垮台，必然导致全国大乱。粗知政治学基本原理的人都该知道：中共是极权社会，没有缓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设计，只会用高压手段将社会矛盾强行压下去，将社会危机积压储蓄下来。这种高压社会一旦失去控制乃是世上最可怕的事，由此骤然出现的权威真空必然使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半世纪积累下来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党群矛盾等等就要以空前的烈度爆发出来，使得全国变成修罗场，过去的压力有多高，爆发也就有多猛烈。南斯拉夫就是榜样。

这就是我为何反复说，中共乃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大的犯罪集团，但他们犯下的最大罪行，可能还不是在执政期间犯下的，而是因为他们实施高压统治，在身后给国家民族留下了最可怕的灾难。

因此，凡是神智正常的人都该看出来，共产党只能消亡，不能消灭或推翻。要使病态的高压社会转为健康的常态社会，必须有个逐步减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足以取代共党的替代权威来。略去这个过程，轻率推翻共党，必然导致史无前例的灾难。

要避免出现这种乱局，前提是后继政权有足够的权威和实力去迅速接管，施加与共党相当的高压，镇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暴民。请问，能取代中共的政治势力在哪儿？伪民运不过是一群小丑集群，唯一的本事就是内斗，连他们自己的队伍都没本事整合团结治理，遑论治理全国人民？还没掌权就营私自肥无所不为，一旦掌权，还不得因分赃不均，带头狗咬狗，咬出肠子来？

如今具有唯一的中央权威、纪律严明、具有战斗力的在野政治势力，只有法轮功一家，但现代国民（起码是知识分子们）绝无可能接受那政教合一的反动组织的统治。李教主的野心必将引起人民大规模反抗，此时因为共党垮台，人民获得了武装斗争的物质条件，接之而来的必然是全面内战。

就算这一切都不发生，伪民运和法轮功联手和平掌权，那也只会是再度出现社会大幅度倒退。

我早在《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的系列文章中指出了，伪民运基本是毛共余孽，乃是现代中国最缺乏现代文明意识特别是民主法治意识的反动分子，是时代造就的“只红不专”的“专业运动员”，只会“抓革命”，不会“促生产”，毫无起码治国才干，唯一的学问就是效法毛共发红头文件，僭妄地给人民发号召，下指示，发动“反扫荡”之类的整人运动。其中最有“学问”的就是政治课教员胡平，而他除了冒充列宁毛泽东之类的“民主民师”，给人民开政治课，试图改造人民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之外，便什么治国眼光都没有，至今从未写过一篇像样的时事评论，表现出如老芦这种鞭辟入里地分析中外大事、并准确预言结局的远见卓识来。

法轮功那中世纪的邪教组织就更不用说了。如果那些人上台，那就是伊朗革命再现，乃是中国第二个太平天国。如果说伪民运与现代中共相比犹如毛共与国民党，那么法轮功与现代中共相比便如同发匪、拳匪与国民党相比。哪怕光是为了防止这些人上台，大众都得两害相权取其轻，拥护我党，绝不能给那些时代制造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残次品以可趁之机。

２ｂ、“推翻共党”乃是“人民普遍受益”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不推翻共党，人民就不可能普遍获益。

这已经为改革开放 20 多年在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彻底证伪，不必再说。

２ｃ、推翻共党不会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人民即使付出代价，那也是利大于弊。

我已经反复指出，我党区别于过去独裁者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特别心狠手辣，笃信“屠民治国论”。过往半世纪已经反复证明，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可以使出何等令人瞠目结舌的血腥手段来。因此，要武力推翻共党，第一后果必然是血流成河，造成无量的经济损失。胆敢否认这一点就是睁眼说瞎话。

早在 4 年前，我就郑重地请高寒先生给出人命和经济损失的预算，通告大众，他们到底准备付出牺牲多少亿人和多少亿美元的财产的倒共代价。奇怪的是，他除了辱骂我之外，从来没敢回答这问题。

我在这儿再次重复这问题，并郑重请所有在网上露面的“民运人士”包括胡平、魏京生、王希哲、徐水良、刘国凯、封从德、李洪宽、高寒等人提出自己的预算表来，并给出诸位有权代表人民作出这惨痛牺牲的决策的法理依据。谢谢！

2ｄ、推翻共党是一种事前可以精确计算、并在实施中得到严格控制的系统工程，绝不会像辛亥革命那样半道出错，不但没有达到原设计目的，反而使国家陷入长期动乱之中。

这种愚昧认定，我已经在 2ａ中驳斥过了，因为缺乏及时接管的有力权威，共党骤然垮台只会导致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

要补充的是，世上变数最多、因而最难预知结局并加以严格控制的事件，就是人民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乃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最有实力、意志最坚强的空前绝后的大独裁者，可就连他都无法控制文革，使得不仅延时之长远远超出了他“一年发动，二年进行，三年扫尾”的原设计，而且进程与结局与他的预期目的基本相反，最后不但弄出个林彪来，而且使得预定培养为革命接班人的青年一代成了反叛的一代。

因此，要使革命不逸出自己控制的轨道，必须厉行军人铁腕统治，这就是孙中山何以要提出“军政”那第一部曲。要做到这点，民运垃圾们就得把自己的政党改造为毛共式的黑社会组织，还得像毛共那样掌握一只绝对忠诚的党军，这样才能在推翻中共后立即对全国实行军管，等社会秩序恢复之后再逐渐还政于民。这在我看来就是唯一可行的策略。

但漫说伪民运没这本事，即使有，那又无非是重复中共的历史悲剧。早说过了，与其指望暴力革命筛选出来的铁血强人恩赐民主，还不如指望被贪污腐

败弱化了的旧统治者被动让步。因此，暴力革命的唯一意义是改朝换代，只能使一小撮野心家受益，非但不能解放人民，反倒使得他们连已有的自由都丧失了。

最后要说的是，即使民意测验表明，当代中国人民如 30、40 年代的人民一般愚蠢，误以为推翻了万恶共匪就有好日子过，那也不能算数，还必须通过严谨理性论证和预测。如果理性论证和预测提示推翻共党可能如同当年推翻国民党一般，使得人民陷入空前灾难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去抹杀良知，迎合愚民的肾上腺去制造灾难，就是对国家民族犯罪。如果诸位只是因为愚蠢犯下了这种罪行还可饶恕。如果诸位在上智如我者反复当头棒喝后还置若罔闻，那就是丧尽天良了。

因此，如果诸位不能驳倒我上面所作的严谨利弊分析，则诸位就此失去了任何以民主名义鼓吹推翻共党的道义资格，只配就此乖乖闭嘴——当然，那是说，如果诸位还残存几许知耻之心的话。

我党真正七寸所在

写完上节，不由得再一次沉浸在深沉的悲哀中，再度痛感中共革命使得国家民族倒退了有多远。毛共对全民作下的无可超越的大孽，就是它彻底败坏了全民道德与智力素质，使得今日中国的政治局面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比起毛共上台前的 40 年代来真是不可同世纪而语。

40 年代与我党那反动政治势力抗衡的，不仅有先进的开明政治势力国民党，还有更先进、更开明的青年党。此外还有所谓“第三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民盟，那也是先进政治势力，只是因愚昧和野心上了中共贼船。正因为民盟是先进的政治势力，才在共党上台后受到了无情清算。

而今和我党那反动势力抗衡的政治势力，只有更反动的毛共余孽伪民运和更更反动的邪教法轮功，前者不成气候，无非是一群热衷于意淫的无梁可跳的小丑，后者倒足堪忧。相比之下，现代中共本是反动势力，却让这些垃圾和超级垃圾，生生给对比成了相对的进步势力，变成了今日中国政坛上当仁不让的最进步势力。以致老芦这种最坚定的理性反共同志，也不得不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被迫支持我党，反对它的政治敌人，又痛何如也！

这种空前的民族悲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我党全面控制了宣传教育，以其反动教义反复向人民洗脑，使得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大脑都成了一片只长仙人掌的荒漠，从而制造出了中共反对派比中共更反动的荒唐政治局面。伪民运的头面人物无一不是“‘民主’其外，毛共其中”的政治骗子。

这倒不是他们有意行骗，甚至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如同梦游症患者一般，他们完全是身不由己。早说过了：北极爱斯基摩人是绝无可能画出南半球的星空来的。在发射宇宙飞船前的几万年中，人类中最聪明的天才也无法想像出月亮那面是什么样来。

生活在毛中国那不见天日的文明黑洞中，连部美国电影都没看过，您让胡平、王希哲、徐水良、高寒那些大跃进炼出来的废钢铁又怎么可能知道西方民主是怎么运作的？后来虽然出了国，可惜又因年龄过大与天资低下，始终过不了语言关，只能在臭味相投的几个华人中打滚，您让他们怎么去跟得天独厚的国内青年一代比？国内小青年看过的那些读物和录像，他们又上哪儿去看？

所以，废钢铁们的效法榜样当然只能是苏共和毛共的革命家，对施政的理解当然只能不是发红头文件，号召全民《紧急动员起来，强力制止江泽民称帝！》，便是写出类似毛的《反对自由主义》的《犬儒主义——当代中国流行病》一类小册子来，僭妄地对人民进行思想改造；他们理解的“民主”当然只能是毛共的“人民当家作主”亦即“人民民主”，而那“人民”当然绝不能包括反对他们的人；他们理解的“反对”当然就只能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打倒”与“推翻”，而他们对待别人反对的方式当然也就是无情镇压。

这才是一切悲剧中之最可悲者，一个政权居然制造出整整几代令人瞠目结舌的心灵与智力的双重残废来，当真不能不令人作七日之哭！

悼词念完了，下面切入正题。

因为民运垃圾不成气，到现在他们也没能指出中共的死穴在哪里。这些年来我上网，自始至终只看见倒共阵营耍弄一件法宝，那就是道德批判，从来只知道用民主制度道义上的优越性去“战胜”专制制度的辩护者。一旦遇到彻底否认道德存在的超级“犬儒”，则他们的二十响立即卡壳，只能改为抓特务，再不行便“民主脏话”层出不穷，以“流氓民主”去弥补“毛共人民民主”之不足。

其实，中共最大的弊病还不在于道义上的不合理，而是它乃是一种天下最背时、最缺乏稳定性的专制制度。不是人民是中共的掘墓人，我党才是自己的掘墓人。

此中道理我已经反复说过无数次了，再吹一次轱辘笛吧。好在全中国除了轱辘笛之外，还从没谁有那眼力看出这最彰明较著的事来，所以，重复多次似乎也是应该的。

前文已经说过，民主制度的最大优点，乃是它具有缓和化解社会矛盾、和平解决社会危机的设计，而专制制度没有这设计，便只能使用高压手段压服。这结果是把社会矛盾存储下来，留到最后总爆发，闹得全社会玉石俱焚。此乃一切专制制度的通病，为旧式帝王制度和现代极权制度所共有。

但传统帝王制度有着一系列的设计上的合理优越性，现代极权制度拍马也追不着。因此，传统帝王制度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动辄就能维持几百年，共党极权制度则绝无此种好事，共党政权寿命再长也难熬过百年。这是由两者的建构方式区别决定的结果不同。

首先就是前文说的革命的软的那手。传统制度实行的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道德洗脑。在此理论基础上设计的帝王制度有以下四条最主要的优点：

1、君王统治是“宇宙运行规律”。全民是皇帝的儿子，皇帝本人是上天的儿子。天子本人受命于天，代表老天爷治理万民。皇帝的权威来自于上天，只欠上天的情，只需感谢上天，而臣僚的权威来自于皇帝。前者与生俱来、不会因传代弱化，也不会因胡作非为自动丧失，后者则天生成了皇帝的债务人，全靠君王深恩才得以飞黄腾达，永远处于感恩图报的被动境地。

这条教义最重要的作用是，它使全民坚信：全国只有一人配作皇帝，那就是以性交方式传递天命的皇家直系子孙。换言之，天命就是开国君主的基因。凡是不携带皇帝基因者还要胆敢做梦，那就会遭到“天谴”，也就是“神人共殛”。无数民间说部和戏剧用佛家因果报应的方式，把儒家的这一教义牢牢地植入全民大脑，成了他们本能反射的一部分。看过《聊斋》的同志都该记得，据说直到清朝，死去千多年的曹阿瞒还在受冥报惩罚。

这结果是臣民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的方式去敬畏上级特别是皇帝，彻底丧失了造反作乱的念头。大臣无论如何位高权重，也不敢稍存不轨之心。除非出现大规模乱世，使得臣民开始怀疑朝廷“气数已尽”，天命或已

转移到别的接班人身上去时，皇帝便再传多少代，再胡闹顽劣如明武宗，再昏悖谬乱如明神宗，都具有与生俱来、无人胆敢怀疑、遑论挑战的绝对权威。除非是皇帝自动弃权，听任魏忠贤辈弄权，则绝无大权旁落之虞。即使是魏忠贤那种气焰薰天的权奸，崇祯上去没几天也就轻而易举地拿下了。

皇帝的这种绝对权威，从心理上杜绝了野心家们的窥伺，保证了统治的长期稳定性，使得皇帝不必时时担忧他人篡位，推行新政时不必担心下属造反，从而使明君具有整顿吏治或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天然实力，历史上的改革都是通过皇帝进行的。哪怕是王安石那种激进改革也不曾引起公开叛乱。如果不是老佛爷介入，则光绪推行的政治改革也绝不会流产。后来老佛爷自己的改革比光绪还激进，照样畅行无阻。

2、因此，传统专制制度是一种真正的独裁，也就是皇帝个人独裁，不是集团独裁。皇帝本人的地位和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例如丞相（或明清的首辅）有本质不同。皇帝的地位超越于整个统治集团，绝对不容置疑，不容挑战，不能解雇更不能砍头，而自宰相以下整个统治集团都没有这种特权，由此构成了“江流石不转”的政治结构，亦即“不变的皇家和流动的统治集团”。

3、它实行旨在牢笼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前文已经说了，科举制度用费厄泼赖的方式，向每个有志者提供一种潜在的飞黄腾达机会。和欧洲封建社会不同，它不讲血统或地位歧视，除了皂隶倡优之外，对所有的平民开放，因而使得统治集团更加具有流动性。历史上有无数贫寒农家子弟藉此跃入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饼轮流咬一嘴”的社会公平。“天命”论的反面震慑与科举制度的正面诱惑，使得在野野心家们循规蹈矩，按既有的必然渠道去实现自己的野心，从根本上消除了最有能量的在野反对派。

4、作为辅佐洗脑手段的道家和释家教义主张出世的消极无为哲学，唾弃富贵荣华和一切物质享受，因而为壮志未遂的野心家们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消除挫折感的最佳麻醉剂。这“出世哲学”与官方正面提倡的孔孟“入世哲学”相反相成，更加增加了社会的稳定度。

正因为此，古代中国根本不需要什么现代意义的国家机器，马克思说的“国家是阶级镇压机器”，在传统中国根本就不成立。除了外患严重的朝代，古代中国根本没有常备军，更无警察，监狱既小又简陋，一个县也就一个县太

爷，三两文吏，几名捕快，哪有今天几百万共军、遍布各地的大小军区人武部、上百万武警、庞大的国安部、公安部、中宣部那些无比壮观的排场！

和现代专制者们比起来，古代君王真正实现了高枕无忧的理想境界，怪不得据说拿破仑要说，文人一枝鹅毛笔，如同20万枝毛瑟枪，而田汉编写的京剧《西厢记》中崔莺莺要歌颂张生道：“我爱他笔尖儿横扫千军”。的确，统治者没法不爱上老孔，他笔尖儿一扫，就把几百万常备军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去了。

明白事理的同志至此应该看出，“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自从万恶的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咱们便永远失去了传统生活方式。落后的中国文明被磅礴于全世界的西方先进文明推进了枯井里，卡在中间，成了“孤王半天吊”，民主民主不起来，独裁独裁不下去，端的是不良不娼。

对比上述传统帝王制度的优越性立刻就可以发现，我党每一条都缺如：

1、“天命论”。据说我党统治也是“宇宙运行规律”：无产阶级受命于天，授权共产党那先锋队作统治者。可惜，共产党一上台就必然要“走向反面”，再也不是无产阶级了，变成了某亲共网友英明指出的“富人俱乐部”，从而自动失去了天命。毛时代还可以强装一阵子，但现代中共实行的赤裸裸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用我党的经典天命观来看，乃是逆天行事，正是新一轮共产革命的当然对象。

因此，和孔孟之道的功效完全相反，我党的“宇宙运行规律”专门和自己过不去。只要我党不扔掉马列毛主义这自杀利器，则我党对原教旨明目张胆的无耻背叛就永远是个潜在的七寸，邀请不得志的党内野心家去痛捏。这些人若想发难，最方便最义正词严的借口就是利用毛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号召人民起来打倒那货真价实的法西斯党、修正主义党。这些人可不比没有能量的工农大众，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但您若劝我党干脆扔掉马列毛主义，那岂不是让他们欺师灭祖，自动承认毛共乃是土匪，自己乃是匪徒余孽？

所以阿，现在我党面临的理论困境，当真是神仙也解不脱，连老芦这上智都想不出高招来，不能不令人无比同情。然而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党便永远如同“旧”社会中没有光明正大坐了花轿拜过天地，而是靠姘上老爷当了继室的

来历不明的娼妇，永远上不得席，永远不能理直气壮地抬头面对乡亲，更无脸面对死去的太太娘家的人，永远缺乏执政权威。

2、最致命的还是，用“无产阶级代表天命”取代“皇帝代表天命”，就是用集团独裁取代个人独裁。

上面已经说过，传统社会中，在理论上，每个读书人都有机会成为宰相，但只有皇家基因携带者才有资格成为皇帝候补人。换言之，所有的官位都是开放的，但皇帝的位子却是封闭的，由此造出了世世代代得到理论保证的个人独裁制度。但在现代专制社会中，每个党员在理论上都有资格问鼎最高统治权，党皇的位子和其他官位一样，乃是开放的。此乃世上第一背时、第一愚蠢的独裁制度，由此生出了无穷弊端。

第一个弊病就是孙大圣质问如来的那句话：“他凭什么当玉皇大帝？”共党理论从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没能在半世纪以上的执政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不成文法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如此。不管是哪国共党的党章，都无法给出个作党魁的实在可行的标准来。这结果，便只能是用《天龙八部》上的星宿派方式，靠弱肉强食去决出党魁来。

当上党魁无非是靠两条：一曰“政绩”，二曰“实力”。前者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正确”似乎也就是“天命”的代用品。老毛就是靠在夺权中显示出“正确”去从理论上击败竞争者们。这就是为何皇帝可以下“罪己诏”，共党领袖则万万不可：皇帝犯了错误，并不因此失去皇帝基因，而党魁犯了错误就再无资格代表“历史潮流”和“客观规律”。

但这条不过是官样文章，在共党内部，是“正确”还是“错误”，乃是由实力决定的——毛发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还不是照样“一贯正确”？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实力，也就是控制人、特别是控制军队的能力。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对我党内部来说确实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毛坐稳龙廷靠军队，斯大林则靠特务组织ＮＫＶＤ。离开这两个法宝，则两人根本就无法长治久安。

因此，共党领袖的权威只有一个真正来源，那就是实力。他们只能通过弱肉强食的流氓大赛决出头领来。这就使得共党永远处于持续内斗中，党皇本人毫无安全感，不能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厚植人脉、防范政变上去，为此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先发制人的大清洗，在党内实施恐怖统治，这就是斯大林和毛泽

东的施政特点。传统社会根本就无此必要，只有朱元璋那不懂孔孟之道妙处何在的文盲疯子，才会毫无必要地屠戮功臣。

但这种伤筋动骨的大清洗搞多了，必然把党搞得奄奄一息。因此，后继党魁必然要改用比较温和的清洗手段，但那天生的内在缺陷仍然在那儿，而且其严重后果与日俱增。

这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就是“权威逐代递减律”。在中国那种大国，除非皇储从 20 岁开始便有意培养全国性实力，否则在 60 岁接位时必然是实力不足的虚君。但共党干部哪有这条件和胆子？如果小胡不是动心忍性装聋作哑，韬晦到了 60 多岁，他早就给人家无情地掐了。但若没有实力作权威，即使当上党皇也是虚的。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权威逐代递减，等到后来就连个中央主席都决不出来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看出了这问题，于是效法帝王，搞出了“指定继承制”，以为他的指定可以代替实力作权威。他蠢到看不出来：今非昔比，皇帝可以指定太子，您老人家没那资格。皇帝指定的太子携带着别人没有的皇帝基因，所以建文帝只可能被明成祖那样具有同样资格的人颠覆。而在理论上，我党五千万党员统统携带“党皇基因”，都是“皇家子弟”，所以钦定皇储英明领袖华国锋被邓小平轻而易举地搞下去，连个死节忠臣方孝孺都没有。小胡之所以成功实现了“指定”的历史使命，有如说是靠老邓的身后权威，莫如说是靠老江的权威因传代而极大弱化了，无法阻挡他而已。

因此，现代极权制度实行的“集体领导”，乃是世上最凶险的专制体制。它将传统的“不变的皇家，流动的臣僚”改变成了“流动的党皇，难以流动的臣僚”，使得党皇成了大众觊觎的焦点，使得党成了个永动绞肉机，乃是最大的动乱温床，成了中国最不稳定的因素。

由此产生的现代极权制度的第二大弊病，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难以流动的臣僚”。

如上所述，皇帝的权威来自于天，并不来自于臣民的拥戴，根本不需要培养什么私人势力。相反，臣僚的权威全靠皇帝恩赐，乃是皇帝的债务人，终身处于感激圣恩的被动地位。任何时候皇帝想撤回他的浩荡恩情都是他的自由，他想砍谁的脑袋都毫无问题。

现代专制制度则根本没这条。党皇的权威全靠实力，而所谓实力也就是各级掌握实权的干部的效忠。没有这些人效忠，则党皇立刻垮杆。

哪怕是老毛那种貌似拥有绝对权威的大独裁者，也不敢随便自断爪牙，文革再乱，他也不敢动那些军头如许世友等人，连斯大林的威风都没有。他为了搞掉刘少奇，不得不使出一系列流氓招数来（就连用共党那流氓党的眼光来看都是出格的流氓手段），肆无忌惮地践踏党纪国法，动用暴民，使得全国几乎陷入灭顶之灾。这种事若拿到传统社会去，皇帝要搞掉首相不过是闲话一句而已，哪怕是要废储也绝不会如此惊天动地。

后继的党皇就更是王小二过年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怕谁？不光党臣怕党皇，党皇同样怕党臣，根本就不能如传统皇帝那样随便罢免任何一级官员。任何人只要进入干部队伍，除非卷入权力斗争中失败的那派，无论怎么作奸犯科都下不来。

由此便导致了第三个弊病，也就是现代独裁制度枉负独裁之名，却是内里瘫痪、中气虚弱的病夫。这倒真实现了伟大领袖说的“两重性”：对人民是铁老虎、钢老虎，成千成万地吃人，对党内则是吹口气就能倒的纸老虎、豆腐老虎。

因为党皇的权威来自于厚植人脉，党内便分裂成各种实力集团。党皇本人不过是这些实力集团之间角力后达成动态平衡的妥协结果。因此，这种杂烩党的专制效率只体现在利害一致之时。事涉镇压人民，则全党必定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表现出独裁政体的高效率与无情铁腕来。但如果党魁提出的政策伤害到党内利益，则即使得到了政治局批准，也一定会被下面各级党组织的消极抵抗消解为无形。此时现代极权政体就完全是世上最软弱无能的政治制度。如西方法治国家那种法令一下，全国凛遵毋违的局面，在咱们伟大祖国便下辈子也没指望出现。

由此又派生出了第四个弊病，那就是党魁没有强制推行与党内实力集团利益相冲突的政治经济改革的能力。哪怕第一代铁血党魁都没这本事，毛的文革在老干部手下遭到惨败就是明证。老邓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完全是因为党官僚发现自己乃是最大的受益集团，没有抵抗而已。毛邓尚且如此，何况是乳臭未干的小胡？

由上派生的第五个弊病，则是共党彻底失去了整顿自身的自救能力。上面已经说过，共党官员和传统官员完全不同，周转率非常之低。哪怕是老毛，也要奉行“小节无害论”，以部下的忠诚作为唯一的“道德品质”，大搞招降纳叛、藏垢纳污那套，就连当过叛徒的张春桥，做过汉奸的陈永贵也加以重用，林副重用黄永胜、邱会作那些色狼就更不用说了。贾庆林因为是老江死党，便犯了该杀头的贪污重罪也照样逍遥法外。

这种事在传统社会中根本就不会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都是皇帝的家当，全国臣民都是皇帝的儿子。在皇帝心目中，大臣远没有百姓重要。因此，大臣压榨百姓贪污受贿，就是偷盗皇产，就是破坏他爱民如子的明君形象，皇帝本人第一个就容不得，这才会有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实草的野蛮事。

党天下取代家天下之后，问题就来了。如某亲共网友英明正确地指出的，如今咱们实行的乃是“普天之下，莫非党产”。问题是，党产和皇产不同，它如同共产一般，产权没有明确到个人头上去。于是偷盗国家财产便如同当年工人偷盗厂产似的，谁偷到就是谁的，谁也没脸说谁，遑论法办谁谁。这结果，便是党皇根本不会如同传统帝王一样，对贪污犯罪感到心疼和气愤，从根本上就缺乏惩罚贪官污吏的感情动机，更没有惩罚他们的魄力——党臣不是党皇的儿子而是他的权力基础，他又怎敢自断爪牙，毅然自杀？

使这问题更加严重的是，皇帝从世袭改为轮流做之后，党皇就此失去了珍惜社稷，以便“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守财奴心理，代之以短期行为。

过去的皇帝总想把江山永远传下去，如秦始皇那样指望传万世而不竭。继承的子孙也时时痛感祖先创业不易，生怕做了败家子，把偌大家私断送在自己手里，崇祯为此殚精竭虑，苦吃苦做到连性欲都丧失了。

党皇哪有这种心理？反正不是作一辈子，70 岁就要退休，此时不捞，更待何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敬爱的江总那聪明人就模范地实践了这一条。就算捞垮了党江山，那又便如何？反正不是我家的。我家后代早就送到美国去，在海外各大中文网站踊跃充当党卫军了。就算贫雇农在党内野心家率领下起来进行“二次革命”，那时我也早就死了，垮的又不是我的江山，我又何必心疼？

这综合结果，便是我党只会一天天烂下去，任何党皇哪怕有心，也都没有本事治理。

3、我党从未实行过传统社会那种公平的科举制度，也不可能实行。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它的整个权力体系是靠“叠罗汉”的方式层层叠起来的。每一级干部上面都有后台，下面都有死党。

这在传统社会根本就无法想象。在传统社会中虽然也有结党营私，但那不是遍及全社会的公开实践，在理论上为孔孟之道反对，在实践中为明君制止。上天就是皇帝的后台，他也不需要什么死党作为权力基础。但在现代专制社会中，从党皇本人开始就搞这套，小胡过去的后台是老邓和小超，死党则是“团派”。因此，这种靠私人效忠关系作“权力砖块”修起来的大厦，根本就不可能实行传统社会的科举制。

这结果，就是使得我党彻底成了私人派系的复杂关系网。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我党干部不是靠君恩作朝廷的官，而是靠上司和部下当某个派系的官。这种烂污体制，在党魁权威经过多次传代弱化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导致四分五裂的政治藩镇割据状态。

4、传统社会的粘合软件儒道释已荡然无存。毛泽东强加给全民的禁欲主义已经被西方消费主义彻底扫荡。国内人欲横流，更比美国或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疯狂万倍。无限高涨的物质消费欲望只会造出越来越贪婪的贪官污吏，使得大众欲壑加深的速度超出国家财力的填补速度。这结果就是官僚机器的疯狂腐败和全社会不满心理日益加深。

综上所述，我对未来的预测就是，我党只会自己断送自己，不是被人民推翻，而是毁于内讧。用当年插队从老乡们那儿听来的民歌来说便是：“不是爹娘坑害你，你自搬石头自打脚！”这苦酒乃是我党自己酿下的，他们从执政那天起便已经上好了定时炸弹。

尽管我这辈子很可能看不到我党倒台了，但吾家小芦肯定能看到。我算定中共政权很难熬到 100 岁，那计算方式很简单：现在中共领袖基本是每 10 年传一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岁时，还要在 60－70 的老头子们之间传上 4 代。中央权威根本就经不起这种呈指数曲线的稀释。等到中央权威稀释到了临界点，代之而起的就是军界强人崛起，最可能的前景就是国家分裂成若干片，民族地区统统独立出去。最坏的前途是陷入南斯拉夫式内战，最好的前途则是再

度实行“东南互保”，使得独立了的“中华吴楚共和国”幸免战祸，为国家、民族与文明抢救下一片金瓯来。

2006年4月4—6日

就中共“气数”问题答网友

前文推出后，多位网友作了批评，答复如下：

老邑说：

> “芦笛此论的死穴在没有考虑科技进步这因素，哈！信息化的作用在那里？老芦和马克思测不准资本主义没啥本质区别，区别只在于马是在没露端隙时测的，芦则不然。”

难道苏东集团分崩离析不是信息化的结果，而是信息不灵通？如果罗马尼亚人民没从电视上看见柏林墙倒掉，克格勃也没那么容易在那儿发动“人民革命”。

金湖网友说：

> “同意老芦前面的分析，但不认同老芦预测结果。
>
> 老芦说的中共将一天天烂下去并最终垮于内讧，这是最有可能结果。但是中共之后的中国则未必如老芦所言，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如今日之台湾。随着中共党魁统治权威的代传递减，党内不可能再出第三个毛、邓，党内派系争斗会日益激烈和广泛，但很难再一派独大，结果是各派相持不下，为达到平衡最终可能不得不走向民主。
>
> 老芦在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是很理性的，但是面对未来，老芦恐怕是有点跟不上趟了。”

你建议的这种结局，我早想过了，为此至少写了七八篇文字吧，在其中我一再向我党呼吁，请他们效法日本自民党，将党内派系合理化，竞选党魁，先在党内实行民主化，如此便能解决党魁没有合法权威的致命问题。但这只是最佳前景，中共无人有此胆识采取这大胆步骤，最可能的出路还是传统的分裂。

小孙说：

> “但当前的精英没有政治诉求，他们更像解放前三十年代上海做生意、搞研究、谈恋爱、听歌剧的‘高级华人’。其实现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都很像解放前的中国：一小撮精英，一个相对反动的官僚统治集

团，和广大被社会发展抛弃了的农民支撑下的更反动的在野政治势力。怕的是这边精英在‘精致’的工作、生活，那边各种反动力量会打出各种旗帜异军突起，再次把中国拖回去。”

是的，我完全知道这情况，旧作中也说过，现在精英和劳苦大众彻底分道扬镳，前者醉生梦死，后者水深火热，这种分裂孕育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在短期内，这种情况有助于中共维持统治，因为工农没有组织造反的能力，但从长远看，如果我党分裂，则工农大众势必沦为野心家们的炮灰，那巨大的政治资源非常具有诱惑力。

再说得明白点，工农大众是如今受苦受难最严重的阶级，但也是最反动的潜在政治势力，他们对社会的巨大作用只能被野心家释放出来。这其实就是共党内讧可能导致的最可怕结果。

Tannhaueser 网友批评我说，传统社会的稳定性没有那么高，例如南北朝和 5 代 10 国都很短暂。所以，我的说法无法成立。

先生似乎没看明白我的文字。孔孟之道要起作用的前提乃是社会环境能够使用天命论。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国。短暂朝代都是发生在外敌入侵，导致群国并立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天命观根本不适用。但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就不然了。这就是为何陈抟老祖听说赵匡胤当了皇帝，喜欢得从驴背上掉下来，说天下从此太平了。那也就是“真命天子”终于出世了。而多国并立的混乱局面中，谁也不是真命天子，自然毫无稳定性。

鲁肃网友说：

“你看，按你的说法，毛共反动，表现之一是它捣毁了民族素质，只能产生比毛共更坏的民运。也就是说，共产党把中国越弄越坏是他的罪恶，是不是？你是这么说的吧。这点我非常同意。

就算民运那帮人比毛共更坏，但是，这并不说明比毛共更坏的民运会把中国也越弄越坏，是不是？假设民运成功，焉知它建立的制度不形成良性循环，毕竟是另一种制度么，而你对新的制度并没有论证，却想当然地以为民运人士坏，则一定建立导致更坏结果的制度。”

这完全是误解，您竟然以为我说的是这么一个三段论：

凡是坏人就只会建设出坏制度来，

伪民运是坏人，

所以，伪民运只会建设出坏制度来。

因为你未受过逻辑思维训练，无法如我一般有条有理表述出来，只是在下意识中觉得那大前提有问题，于是便指责我“想当然地以为民运人士坏，则一定建立导致更坏结果的制度。”

很对不起，这不是我的意思，其实已经有网友跟帖提醒你丝毫没看懂我的文字了，可惜你还置若罔闻，还特地要把那笑话提上去另作一帖。

第一，我从来没用“好”、“坏”这种儿童用语。我说的是伪民运是毛共余孽，是比现代中共更反动的政治势力。难道你连现代中共已经不是毛共都不知道？

第二、我指出，现代中共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国民党，而伪民运搞的完全是毛共那套，在理论上对西方民主毫无认知，在手段上逼真效法毛共那套。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就只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崇高的目的绝不可能靠下流手段实现。伪民运如同当年毛共一样，以民主为虚假旗帜，却试图发动毛共式暴力革命，就算是成功，也绝对不会建立起民主社会来。

请问，这和你的指责有什么相干？难道你认为由毛共余孽领导的暴力革命可以建立起比现代中共实行的准开明专制社会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来？

人和动物的能力，就是人有预见能力，而动物没有。你这种指责，就如同我俩看见有人要跳楼，我上去制止，你却指责我：“焉知他跳下去不会飞起来？不形成良性循环，毕竟是另一种境界么，而你对新的境界并没有论证，却想当然地以为他伤心，则一定只会出悲剧。”

您说，我这类比和您的疑问是不是一回事？您敢否认“在毛共观念指导下的毛共式暴力革命必然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即使成功了也只会建立起比现代社会更反动的黑暗社会”么？

> “民运的起点低，但只要它不像毛共一样把国人的素质不断地越弄越糟，而是给于民众恢复自身素质的机会，这显然也是民运的目标，那就因该支持民运，而不是支持你自己已经认定只能把中国弄得更坏的共产党。至于民运人士的个人思想和政治作风的问题，仍然可以启发或批判，也依然可以说他们比毛共更坏，但不能因此说，坏人建立的制度也是坏的，完全两回事。”

首先，这不光是什么素质问题，上面已经详细解释过了。如果您实在看不懂，建议您拷贝下来去反复阅读，估计看到七八十遍之后，或许会有点效果也未可知。当然我也没把握，不过建议您还是尽量试试。

其次，您也如同樊教授那样，认为伪善也是善，所以，判断政治势力只需根据他们的旗号就行。而且，政治运动完全可以由发动者的意愿控制，是不是？所以，只要伪民运发誓不把人民的素质越弄越糟，保证给民主恢复自身素质机会，那就该支持民运，是不是？如此说来，大家都该去支持马列毛主义者，因为他们发誓保证要建立一个人类从未有过的美好善良社会，其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圣贤。

第三，我没有说共党“把中国弄得更坏”。谁都得承认，中国人民日子在过去 20 多年中普遍好过多了，这能用“弄得更坏”的儿语来概括么？

我说的是，中共建立的社会缺乏内在稳定性，因为我党只会把社会矛盾积压下来，形成了严重社会危机。但使用毛共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适得其反，也毫无可行性。我扫荡伪民运，是想治疗这批人，让他们伪转真，效法西方反对党，形成忠诚的反对派，和我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以在野之身向执政党施加建设性的压力，促进社会健康转型。但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我脱离国情的梦想。所以现在我已经根本不拿这夥人当回事了，只是在兴之所至时骂上几声开开心而已。

> “换句话说，物体的当前位置并不决定运动方向，x 的值并不决定 dx 的正负。民运那帮人显然并不打算做全民的一统教育，这难道不是其它有志之士提高国民素质的希望所在？人们反对共产党，不正是因为它剥夺了其他思想言论的传播机会吗？不也正是如此才有了今天的所谓民运人士的素质不如共产党吗？但民运并不打算建立一整套专制制度，哪怕那里面每个人都是恶棍，但民主制度不就是假设即使是恶棍们在民主制度下也比伟大领袖在独裁制度下更让人可以接受吗？因为毛共必定产生比毛共更坏的民运人士，因此就反对更坏的一群人，而放弃建立良性循环的机会，这道理明显说不通么。“

首先，您这儿暴露的是浅薄的理工科学人的通病。如同文人喜欢使用文学比喻来解释社会现象一般，理科文盲们如樊教授和你也喜欢使用“数学比喻”。这两种作法貌似不同，内里实质完全一样，都是使用毫无可比性的东西

去比拟无比复杂的事物。您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最笨拙可笑的“数学比喻”，任何脑筋正常的同志都不会错乱到以为可以用机械运动来类比社会现象。

其次，恕我直言，您似乎有必要去补习一下中学和大一的数理，以免说出“物体的当前位置并不决定运动方向，x 的值并不决定 dx 的正负”的外行话来，这只证明你没学会经典力学。刻划物体运动的乃是曲线方程，而不是什么“当前位置”，也不是什么“dx”。请问您这儿的 x 是指什么？是时间，距离，还是速度？dx 是什么的增量？有您这么讨论运动的么？当真好笑得紧！

上过中学的同志都该知道，机械运动涉及到时间和距离，距离对时间求导数就是速度，速度的导数就是加速度。两者都是矢量，包括数值和方向两个参数。而这方向并不一定能用正负来表达，例如曲线运动就是如此，那速度和加速度并不能用正负号来简单表述。

如果您知道这些最烂的常识，那就应该知道，要知道某物体在某个特定时点的运动状况，首先必须知道的是运动方程，其次是初始条件，而这初始条件并不光是如你设想的什么“x 的数值”，更不是什么含混不清的“当前位置”，而是在某一时点的速度数值以及方向。例如下落物体运动，初始条件确实影响了运动方向，如果是初速度与重力方向一致或相反，那就是直线运动，如果成一定夹角，那就是曲线运动。在发射宇宙飞船时，初速就更重要，有所谓“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之说：初速必须达到一定临界点，火箭轨迹才会依次从圆变为椭圆直到开放的抛物线。

只有您这种不懂数学和力学，没有合理思维习惯的同志，才会不但用机械运动来类比人文现象，而且竟然连怎样用数学解决机械运动问题的 A B C 都不知道。如果您经过苦学之后，终于掌握了上述烂常识，还要坚信可以用机械力学解决人文科学问题，那就请你给出个“革命运动曲线方程”来，怎么样？

如果您坚持认定可用“数学比喻”替代逻辑思维，那我这就给你个现成的“革命运动曲线”出来。上面那跳楼的比喻已经告诉你了，伪民运是在跳楼，跳下去的运动方向就是地面，这方向跟“当前位置”无关。“当前位置”只决定位能，位置越高，摔得也就越惨。他们没有可能到达毛的位置，真是全民幸事。而初速度的方向则决定了那些人跳下去后的轨迹到底是直线还是抛物线，懂了么？

至于“民运那帮人显然并不打算做全民的一统教育”、“民运并不打算建立一整套专制制度”等等，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建议你先去看看我扫荡伪民运文字里给出的那些罪证再来胡说八道。

> “除非你改口说，毛共没有把国人弄得更坏，而是更好，比如产生了比它自身更可爱的民运一帮人，我们才应该支持共产党。但因为我们不相信更可爱的民运人士要建立的制度也会使国人素质提高，我们才应该反对民运，是不是这个道理？但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要骂民运更坏，只是说我们不支持它的努力方向好了。”

本人从来不改口，昂藏磊落，有错就认，从不含糊。矢口否认自己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话似乎是您而不是我的习惯。下次拜托读懂了人家的文字再来请教，行不行？

再说一遍，我说的根本不是人的素质问题。我只是告诉大家，那些人变成这个样子，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根本不是说他们上台会让人的素质变得更坏。我说的是，这些人上台只会造出个远比现代中共实行的制度更反动的制度来，如同当年毛共取代国民党一般，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和革命手段决定的必然结果。

> “你这文章里还有其他的逻辑错误。比如，现有的民运和法论功以外，难道就不可能生出其他民主力量？你不能因为对民运和法轮功做了一番不如共产党的分析，就得出唯一结论，必须支持共产党。排除法的前提明显不成立么。这就不多说了。“

这话再一次凸显您的思维高度错乱。我说，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中共代表的是中国相对最先进的政治势力，所以我当然支持中共，但这难道是否定日后会有更健康的政治力量出现？请问我什么时候排除了日后出现更进步的政治势力的可能？什么时候使用了排除法？这又不是确定因果关系，必须在多个因素中逐一排除其他因素，最后找到那真实原因。你不伦不类地扯上排除法干什么？

再跟您解释一遍，这不过是个选择问题：现有三个政治势力：中共、伪民运、法轮功，最先进的就是中共，所以我当然选择支持中共。这就如同前段法国大选，选民尽管讨厌现任总统，但如不选他，则极右派有可能上台，所以只好投了他的票，难道这就是说法国人民认定日后不会出个更好的总统候选人？

而且，我的所谓“反对”是西方选民式的反对，不是毛共那种斩尽杀绝的反对。我的“拥护”也是西方选民式的拥护，不是东方式的绝对忠诚，如果伪民运改恶从善，放弃毛共那套下流作法，则我当然会相应改变态度。不过，这些起码区别，谅你也没能力分清，所以就不多说了。

“两个错误都是太想当然，缺乏起码数学修养。”

嘿嘿，还在“数学”！我早就说过无数次了：中国理科学人的通病，就是没本事看到不同学科思维方式的共性，在学习数理化过程中，把这共同思维方式找出来，以此去研究人文学科，却以为可以用简单的数理思维去直接穿凿其他学科，因此闹出来的笑话比文科学人还出格，您这帖子就是最生动证明。

2006 年 4 月 7 日

是我党高明，还是歌颂者愚昧？

刚才拜读了鲁肃先生近作《我党的高明》，觉得该文是最典型的中国伪知识分子不会思维的例证，颇有疗愚示教作用，因逐段加以评点，以期通过剖析这一特殊案例，揭示中国伪知识分子们思维方法上的痼疾，起到普遍启蒙作用。

“我党一直很高明，并非今天才这样。”

此乃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捣浆糊惯伎。以“高明”为题，而且开篇即此语，却丝毫没有界定是哪个意义上的“高明”，其实我早说过了，论治国，毛共乃是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白痴，即使现代中共也与“高明”无缘。鲁肃想说的“高明”乃是策略意义上的，其实无非是说我党为夺权和维护统治不择手段罢了。可怜他没拎清爽这简单问题，以致讽刺不像讽刺，称赞不是称赞。

> “很久以来，也就是从毛时代开始，共产党在表述自己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时，就一直把自己打扮成拯救贫弱中国的救星，在这方面的自我歌颂甚至超过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也就是说，共产党早就意识到，作为民族党比作为共产党对其自身的政权合理性更加意义重大，它硬是成功地从国民党手中夺过了民族救星的大旗。于是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两面大旗，一面是意识形态的先进政党，另一面是民族大救星。这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一旦共产主义破产，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此丧失其全部生存基础。为了这个目的，我党一直教育国民使他们相信，共产党在民族性方面比以民族性为旗帜的国民党做的更好，国民党是败家子、是龟缩在重庆的投机分子，这种说服工作，被已经对国民党丧失信心的知识分子上上下下几乎彻底接受，四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原因正是如此。他们支持共产党，并非因为它的共产主义信仰，首先是所谓民族救亡运动。当时在中国，意识形态远不如国家民族的存亡更有紧迫感，而且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并没有

充分暴露出来，延安整风的黑幕隐藏的很好，知识分子大意了。共产党这着高明，从策略的角度上来说，的确让人佩服。”

什么叫作“它硬是成功地从国民党手中夺过了民族救星的大旗”？这只证明了共党窃据天下后洗脑的成功，以致作者全盘照收了党宣传，还以为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

其实国统区人民只知道国府抗日，根本就没听说有共党的什么事，原因很简单——大战都是国军打的，战报上从来没有共产党的名字，就连 18 集团军名义上也是受最高统帅蒋介石指挥的国军。

正因为此，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作为“民族救星”，威望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峰，后来失去民心乃是内战迅速爆发，国府的表现远远落在了乱极思治的人民的期待之后，吏治腐败，物价飞涨，导致人民丧失信心而已。

在 40 年代，共党用来颠覆国党的武器乃是美国人倡导的“民主”，根本也就不敢指责国府未抗日，最后也是用“民主”争取民心的，根本不存在作者从党史中学来的“它硬是成功地从国民党手中夺过了民族救星的大旗”神话。这乃是共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全面篡改伪造历史的结果。可悲的是只看过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分子”鲁肃竟然照单全收了这一套伪历史，还以此作为立论根据！

“于是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两面大旗，一面是意识形态的先进政党，另一面是民族大救星。这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一旦共产主义破产，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此丧失其全部生存基础。”

尽管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特色是愚昧，但仍然难得见到如此出类拔萃的弱智话语。这么说，原来我党早期领袖并非走火入魔的信仰坚定的志士，而是早就料定共产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会失败，因而深谋远虑地设立了民族主义作为“备胎”？作者真的能相信这种弱智笑话么？

从普遍疗愚的意义上来说，这智力错误倒很有示教作用——它是最典型的“刻舟求剑”，即用今日的图景去想象穿凿过去的情势。稍知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偏离真实有多远：我党是在 60 年代和苏联决裂后才有意开始使用民族主义这个法宝的，但即使在那时也不是主要的旗帜，强调的还是“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作者何以连当初在中学里学的那套口号都忘记了？

> “我党建政，开始实施自己的纲领。但当我党意识到共产主义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走不通之后，当发现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变成不仅是打击‘阶级敌人’（土改和肃反） 和‘知识分子’（反右 ）的利器，最后甚至危害到党的成员甚至是高级成员自身（文革）的安危的时候，对此有了切身体验的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果断地放弃从苏联那里继承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禁止党内对这一实际转换的讨论，瞒天过海，领导全党摆脱了党内党外对其自身有着根本危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高明策略，一方面摔掉了已经开始被否定的共产主义理论外衣，从而使外界对其理论基础的批判不再对我党有致命危险，另一方面，也相当程度地缓解了党内斗争的严酷性，制止了党的周期性自杀。这又是一着高明的策略。”

这儿犯的智力错误数不胜数，姑择其大端随便说说：

第一，作者根本不懂共产主义理论，分不清毛犯的个人错误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固有缺陷，以为斯大林主义便是正宗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搞共产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相残杀。

第二，作者不知道共产主义理论（哪怕是富有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也罢）的根本缺陷在于它违反人性，提倡必然会压制生产力的公有制，却以为实行共产主义理论的弊病只是可能造成党的周期性自杀。

第三，作者不知道在铁血独裁者死后上台的统治者必然以“温和”面目出现，此乃共党阵营的普遍特点，却把它说成似乎是中共的特有现象。

第四，作者把无奈何的被动改过之举，吹成什么聪明的运作。其实任何有脑袋的人处在邓小平的位置都会这么做，谈不上什么“高明”。

>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还玩弄了一个非常有趣和机智的技巧。为了避免这一改变所造成的尴尬，也为了多少给它自己提供一些行为解释的理论基础，它以马克思主义更基本的‘解放生产力’理论为出发点，只不过以前他们推导出的是‘共产主义’，如今推导出的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于是我党依然可以在不否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理直气壮地做着和过去完全相反的事情，现在所说的完全是他们七十年前领导中国知识分子所痛加批判的东西。当时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当时说的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又觉得他

们现在说的很对，解放生产力么，至于现在人们觉得他们当初说的不对，则批判归批判，计较却不必多计较了。我党避免了尴尬，还赢得了相当程度的拥护，你能说我党不高明吗。】

这里暴露出来的错误又是不胜枚举，只能拣重要的说：

第一，这些话充分暴露了中国伪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也就是权势崇拜成了本能冲动，以致他们连掌权者出于被动采取的无可奈何的权宜措施，甚至连愚蠢举动都要吹嘘为什么了不得的高明策略。

第二，中共为了生存，竟然不惜背叛自己的信仰，这虽然在客观上对人民有利，但乃是毫无原则、不择手段的卑鄙作法。不料这竟然引起了作者的油然崇拜之心，为此大赞大颂，与他后文提出的为了坚持“原则”可以不计利弊的主张相映成趣。

第三，作者连起码的共产主义ＡＢＣ都不知道就敢信口开河，而且还敢代中国知识分子发言，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无知，以为“解放生产力”的口号就是“共产主义”的全部内容。其实就连文盲都看得出来，只要抛弃了公有制，肆无忌惮实行私有化，就是对社会主义信仰的赤裸裸背叛，更不用说公开在党章中规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资本家可以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了。

第四，共党背叛自己的信仰，肆无忌惮地走资，乃是连文盲大老粗都心中雪亮的事，除了作者一人外，根本就没有瞒过 13 亿中国人，不仅是我党最大的尴尬，而且构成了无穷隐患，为野心家们提供了日后义正词严讨伐的借口，对此我已经再三讲述过。不料作者不但看不懂，还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把这我党无法解决的心病吹嘘成什么“我党避免了尴尬，还赢得了相当程度的拥护，你能说我党不高明吗”，当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与此同时，我党依然大力宣传自己拯救民族的功劳，也就是同时以一种民族党自居，依然保持两条腿走路的策略，赢得尽可能广泛的支持，不吊死在一棵树上。”

嘿嘿，“两条腿走路”！不知何所见而云然？要冒充民族主义者不难，要冒充马列毛主义分子，全世界唯一会上当的同志，大概只有鲁肃先生。把共党不能不扔、又无法扔下的历史包袱当成支持它行走的“腿”，把人家不可告人的心病当成“聪明睿智”，这种颂党法，恐怕连中宣部都想不出来。

“不仅如此，我党依然保持着足够的理论机动性，它即代表了随便怎么解释都行的先进生产力，更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正没有人进行统计谁是最广大的人民，由我党说了算。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我党代表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眼前利益’，人民即使表达了自己的利益所在，也依然可以被解释成是眼前利益，党是我们的母亲，她照料着我们。

仅仅从这些方面来说，我党并不因此而应该被推翻，这就是我党的高明之处，也是它得以在相当广泛基础上获得支持得以生存的原因。”

嘿嘿，越出越奇了！这么说，只要一个政党能甜言蜜语哄骗人民，使得人民以为“党是我们的母亲，她照料着我们”，则那就不但不“因此而应该被推翻”，也是它的“高明之处”，更是“它得以在相当广泛基础上获得支持得以生存的原因”？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这是另一个话题，简单说来，被反对的首先不是共产党，而是共产党的独裁。反对某党独裁，并非一定是因为它多么邪恶，它是不是邪恶先另说，这不是它被反对的首要原因，被反对的是独裁，而不是哪个党，谁独裁都不能接受，比别人伟大或者比别人更不混蛋都不是支持它独裁的理由。”

鲁先生这段话，分明是我那“为什么要推翻共产党”的疑问引出来的。可惜我那疗愚之作不但没有凿开他的混沌，反而使得他更深地跌进了浆糊桶里，寥寥数语反映出来的众多弱智错误，让我不能不写很多的话去治疗。不管怎样，还是举其大端说一下吧：

第一，我那文字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教会读者理性地看问题，不能用宗教信仰来讨论政治问题，只能以“人民普遍受益”作为唯一标准去作功利分析，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实质。正因为这点，“为什么要推翻共党”才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问题。主张推翻共党的人必须证明那是“人民普遍受益”的充分必要条件，才取得宣传这种主张的道义资格。

可鲁先生丝毫不明白这道理，抛出另外一个宗教信仰来缠夹不清，给出了个三段论（只是他毫无逻辑思维的起码概念，一如既往地在下意识中应用而已）：

大前提：凡是独裁都该反对，

小前提：共产党独裁，

结论：所以，应该反对共产党。

如果我的治疗有效果，他就不会再闹这种笑话，就该知道那大前提如果未经证明，则不能用来作推理前提，否则就只能是强加于人的宗教信仰。因此，你要证明“应该反对共产党”，首先就必须证明“凡是独裁都该反对”。而判定所谓应该不应该的标准，必然还是“人民普遍受益”这条。所以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必须证明“反对独裁是人民普遍受益的必要充分条件”。

第二，他似乎死也不明白，“推翻”和“反对”不一定是一回事。我早在旧作中说了无数次：中国人的反对观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人理解的反对就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就是打倒推翻，再踏上一只脚，而西方的反对可以是共存共荣的反对。

鲁肃把我提出的“为什么要推翻共产党”偷换成了“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充分证明了此人至今只有东方式的反对观，而且可能永远也无法建立现代反对观。其实我早说了，老芦是最坚定的反共志士，但不是倒共志士。我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势不两立，但不一定反对打着共党旗号的某个政党。

第三，与“为什么要推翻共党”的问题完全不同，“为什么要反对共党”完全是个弱智问题，因为它暗示了“不应该反对共党”的可能答案。其实，世上没有不可反对的政治势力，不管是中共、民运、法轮功，还是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统统都没有超越于反对的豁免权。

凡生活在西方的现代人都该知道，所谓“反对”乃是具体的、集中于某一政策主张上的，并不是什么大而无当的毛共式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例如我反对共党的许多政策，但我并不反对它的一切政策。同理，我支持共和党的内政措施，但我坚决反对它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中东的冒险活动。这就是成熟的文明人的举措，不过是西方公民的一般水平而已，

窃以为，鲁肃先生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在中国理工科“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那就是第一缺乏逻辑思维能力，起码不知道怎么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使用逻辑思维，却热爱使用“数理比喻”来类推复杂的社会现象；第二缺乏起码的文明常识，根本不知道西方民主是怎么回事；第三极度无知，不但没有政治学常识，就连马列主义毛思想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更彻底缺乏对中国历史

特别是现代史的了解，却把当年党妈妈伪造的历史牢记在心。如果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解决，则咱们的“知识分子”们将永远和文明绝缘。

2006 年 4 月 12 日

“东亚病夫”正解

有两个智力笑话最能反应东西方文化隔膜以及中国人的普遍无知，一个是所谓“龙的传人”，另一个就是这“东亚病夫”。

“龙的传人”的笑话我已经在《马屁之邦》中指出过了，这完全是全民误会。其实不需要什么国学知识，稍微看过本演义说部的同志都该知道，在传统社会，只有帝王子孙才是龙的传人，谁要敢这么自称，那就是灭族的份。不料到了现代，全国人民某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成了龙的传人。89学运期间，文盲侯德健那首同名歌曲，几乎取代了国歌，全民同唱，悲壮万分。自人类有史以来，我还没见过比这规模更大的笑话。

笑话之始，乃是当初我大清加入国际社会，发现人家都有国旗国歌，唯独我中华上国没有，于是只好把天子的黄龙旗拿去代替。那旗子是三角形的，跟戏台上的常山赵子龙背上插的一样，旗上写了“大清国”三个字，这就是中国第一面国旗。

这国旗一亮出去，鬼子们轰然大乐：中国国旗上竟然绣了个邪恶丑陋的dragon！这dragon也是神话动物，不幸的是，它是一种凶兽，跟魔鬼也差不多，不喷水而喷火，其本职工作似乎就是专门抢走公主，把她们囚禁在城堡里，好让英勇的骑士去舍身救美。常规操作程序如下：

被囚禁在城堡的公主不相信马悲鸣“强奸也是爱”哲学（或因dragon没有性能力，待考。我曾经询问过所有我认识的鬼子，dragon们抢走公主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性犯罪还是绑票勒赎，至今没有一个鬼子答出这问题来。不仅如此，他们竟然连犯下此类刑事案的dragon们的性别是什么都不知道），于是便从塔顶扔下一个写着“Help！”（“救命！”）的手绢之类，不知怎么让某游侠捡到了，于是游侠便冲到城堡之下，吹起号角挑战，和应声而出的凶龙决斗，其实也就是和在二战后期普遍使用的火焰喷射器决斗。大概游侠全身披了石棉衫，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救了公主返人间。

这就是西方“骑士风度”的来源，骑士们消亡后，“骑士风度”便变成了“绅士风度”。某些号称女权斗士的国女们一窍不通，以为“女性解放”就是要让国男们去作西方中世纪的游侠，把她们从古堡中救出来。这就是她们的“解放”，也就是“被解放”。

姑不论这种理解和西方女权主义的真意相去十万八千里，就算符合人家的原教旨，那也没什么指望。本人在西方混了许多年，觉得西方女性的普遍地位还不如中国。反正至今我没有听说过谁去古堡救公主，倒是发现打老婆的体育运动远比中国普及。

当然洋婆也不是好打的。记得90年代英国有个恶婆谋杀了丈夫，独立司法系统竟然屈服于女权斗士们的强大压力，在罪犯服了几年刑后就放了她，放出来后才发现那人不是什么善类，但无法再把人家抓回去了。美国的另一案例更邪门：妻子趁丈夫熟睡，使快刀连根割了他的孽根。最滑稽的是那丈夫竟因此出名发财，在作了整形手术复原后，竟然成了走红的三级片影星。

扯远了。总之，鬼子们见了大清国旗后，从此“dragon”就成了“中国”的侮辱性诨名，如同他们管英国叫“约翰牛”、管法国人叫“蜗牛”、管俄国叫“北极熊”一般。如果说有什么差别，那就是“dragon”的侮辱性质要比那些辱称更严重。

我过去的技术员喜怒无常，饶是老芦骑士风度翩翩，时间长了也吃勿消，有天碰巧两人心情都不好，于是我便恭维她：“你真是个dragon lady（龙女）！”她勃然大怒，因为那无异于指责她是心狠手辣的谋杀犯一类。我见她翻了脸，赶快进行无耻的甜言蜜语诱骗活动，佯作吃惊，满脸无辜地呼道：“这在中国是最高级的恭维阿！难道西方的dragon和中国的不是一回事？”这才算把她绥靖下来。

过后我去图书馆找了本介绍中国的烂书，把其中一幅插图复印下来，拿回去进一步哄骗她，说她就是那画上的小龙女。其实那是一个小伙子骑着龙的画像，只是画得清秀过分，跟个女的似的。鬼眼不辨中国男女，她自然是看不出来，郑而重之地把那烂画贴在办公桌前的墙上。人来问起，她便解释道：“那是中国的dragon，和咱们的不一样，是一种神。笛说我是中国的dragon lady，那意思就是goddess（女神）。”

由此可见称中国为dragon是何等严重的侮辱，不料咱们将侮辱当恭维，竟然由此创作出准国歌来，这应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辉煌的“反败为胜”吧。

国人对“东亚病夫”的理解也完全是误会。那是中国的又一诨名，原文是“The Sickman of East Asia”，这儿的“病夫”是单数而不是复数，而且是大写，乃是比喻，意思是“中国是东亚病夫”而非“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说中国是个害了重病的国家，不是讥笑中国人的体质不好。不光中国有此殊荣，一战期间，土耳其也被欧洲列强称为“欧洲病夫”，同样是说人家的社会危机严重，国力贫弱，和国民身体素质八万杆子打不着。

依区区愚见，这与称中国为“龙”完全不同，不是侮辱而是事实陈述。中国确实是害了重病的国家，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概还得如此。过去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因为中国害了重病，折腾了一个半世纪，这病却越发重了，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东亚病夫”这称号对中国来说更名副其实，我觉得应该改译为“东亚痨病鬼”或“东亚病痨”才到位。

为什么咱们越折腾病越重？依愚见，那是因为咱们从来没找到病根，反而治凉病用热药，胡太医误用虎狼药，不但把凤姐的孩子打了下来，而且让她更加虚弱。

这国症是什么？就写在马悲鸣著《郑义的逻辑》一文中。

中国社会的千年痼疾，就是统治者坚信“狼羊律”，利用权势作威作福，把子民当成毫无反抗能力的羔羊屠宰，百姓因此奋起抗暴，追求平等，却从来没能弄明白平等是怎么回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虽然有道义上的善恶之分，但两者的觉悟却没有什么区别。不仅如此，有时反抗者的觉悟甚至比“压迫者”的还低得多，于是当反抗者们取胜时，社会反倒更加不平等了，中共革命和文革就是最生动的证明，而这一条明明白白地写在马悲鸣的大作中。

“平等”从来是人类的美好幻想，但国人从来也不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不但国人不懂，就连西方思想家也未必懂，我那洋本家卢梭写了《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当年对我启发很大，但到西方来混了许久后，才发现其实连他也不知道“平等”有些什么涵义。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大家都买六合彩（Lottery的香港译法，台湾似乎译为“乐透”）。天下再没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了：几百万人的钱全让个别家伙捞

去了，你说这有何公道可言？可大家为什么不造反？因为那是世上最公道的事：中奖的概率虽然极小，但每个人打中的机会绝对一样，更何况这是自愿赌博，谁也没拿枪杆子逼你去买彩卷。既是以自愿为基础，有严明而绝对公正的游戏规则，玩输了你当然只有羡慕人家的运气好。

我多年前参加过的本地中国学联组织的春节联欢抽奖则与此完全不同。使馆给学联头头一笔钱，那几个人便买了电视和卡拉OK之类放在家里天天使用，逢年过节才拿到集会上供大众难得地使用一次。等到春节，使馆照例是要发点钱，于是他们便搞点抽奖活动，使用留学精英的高智商，设计出各种巧妙的掉包之计来，确保抽中的都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当然，那时大家普遍都很穷，摊现在大概没人稀罕那点小便宜了，但这种小得出奇的下道，实在让人恶心，所以后来我就再不参加那些烂活动了，省得过后食欲不振好几天。

中国和西方的区别，也就是人家的乐透和咱们的抽奖的区别，咱们的永恒国症也就在这里。

人类所谓不平等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能力或运气不平等等主观因素造成的贫富不均，另一种则是权力或财富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上面的例子就能看出这点来：同样是财富的不平等流动，西方乐透的机会是均等的，不平等的结果是运气不同使然，而学联抽奖则是个别人坚信“狼羊律”，利用手上那点狗屁权力造成机会不均等。这两者的结果的表象都是不平等，但有公平和不公的本质差别。

由此可见，人类能争取的平等只能是机会均等，而决不能是能力和运气的均等。一定要追求后者也平等，必然会造成真正的不公。例如谁若对乐透的结果不服气，成立一个杀富济贫党，去把那中奖的幸运儿抢了，“剥夺剥夺者”，再根据党内权位高低分红，那才是世上最大的不公平。

不幸的是，中共革命和文革干的就是这种事。更不幸的是，直到今天，许多“自由知识分子”们仍然不明白这世上最简单的道理，在张春桥死后还要出来歌颂他的“理想主义”，认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了不起的“正义”。最近庆祝文革发动40周年，“民运”人士王希哲、胡安宁辈还要肯定毛“打倒党内特权阶级”。最令人气短的是，反驳者们也一样糊涂。就连某些宣称“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保守党人，但凡人家出来抨击国内报酬与努

力不称的社会弊病时，也要出来指责那是“仇富心理”，当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传统社会的最大弊病，就是“升官＝发财”，以权力决定财富分配，这结果不但造出了贫富不均，而且消除了机会均等。做官竟然成了发大财的唯一途径，“富”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富而不贵”者从来是官府的敲榨对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那个黑暗社会的忠实写真。

本来，做官是做官，发财是发财，前者是人事管理，并不参与财富的创造和流通，那是资本家的领域。敲锣卖糖，各管一行，在正常社会中，官员根本就没有发财可能，而资本家在理论上（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只是理论上而已）也给剥夺了靠金钱操纵政策制定的机会。如果做官能发财，那就必然是利用了手上的权力，把资本家该得的钱抢到了自己手上，乃是社会患病的表现。如果做官竟然成了发大财的唯一途径，那种社会就绝对是重病在身的病夫。所谓“腐败”指的就是这个。

简言之，资本家发财是份内事，官员发财就是咄咄怪事了。富官必是贪官，其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患病的表现。官僚集团占有的社会财富的比例则是社会病态的直观指征。如果官僚阶级与资产阶级合而为一，成了官僚资产阶级，那这种社会就是烂透了的社会，是随时都会倒地而死的痨病鬼。

这种下滥社会的特点，是结合了传统社会“按权分配”和资本主义社会“按钱分配”的双重弊病：官僚阶级利用手中权力侵吞财富变成了资本家，再使用手中金钱层层收买权贵，上下其手操纵政治，专门制定有利于自己经济政策。如此双管齐下，便达到了使用权力与财富剥夺他人发财机会的最理想的境界，成了人类可能想象的最烂污、最黑暗的国家。

不幸的是，今日中国就是这种国家，此所以我为何要说“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东亚病夫’这称号对中国来说更名副其实”，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把大部分社会财富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无论是南斯拉夫德热拉斯抨击的“新阶级”，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打倒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如今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相比，当真是太仓一粟。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如今这烂污社会乃是追求工农解放的中共革命的必然产物。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管如今这世道再怎么烂污，它毕竟还是要比毛社会公正得多。

如今许多人（特别是愚昧的工农大众）无限缅怀毛时代，却不知道那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公道、压迫人民最广泛、最无微不至、最结棍的社会。光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彰显国人的公道观是何等混乱。

所谓“压迫”乃是大家用惯的词汇，可惜没几个人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那似乎是“压迫就是被人管束”，这其实就是马悲鸣那篇文章的中心概念：郑义是清华党总支批准的校团委委员，是管学生的学生，所以就是该推翻的压迫者。倘若此，则这世上还真没有不压迫人的社会了，而且无论人类如何努力，也绝对不可能建立起消除压迫的社会来。套伟大领袖的话来说便是，除了沙漠以及收留星期五前的鲁滨孙，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压迫者（管人的人）和被压迫者（被管的人），过去、现在、将来都如此。

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所谓“压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成员恃仗权力，剥夺了另一部分成员的各种机会特别是发财机会。用这个定义来看，则立刻可以明白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全国人民不但丧失了所有的财产，而且连一切发财机会都被彻底剥夺了，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遭受的无理压迫最严重。有史以来第一次，农民被当成二等公民，彻底丧失了改行和移居城市的天生权利，成了被强行捆在土地上的农奴。除了少数能考进大学或参军提干的幸运儿之外，没有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待遇，包括稳定的工资收入、粮棉副食品定量供应、免费医疗、具有起码质量的中小学教育，等等，等等。受害人如此之多，被剥夺的机会如此之全面，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见过。

但这种暗无天日的时代，如今竟成了工农心目中的黄金岁月！为什么？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不公平，不是机会的不平等，而是贫富不均，而毛时代的确基本作到了均贫富，至于大众的发财机会甚至起码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这个事实，他们是看不见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共之所以要犯下这史无前例的罪行，恰也是出于病态的“公平观”。“解放”后头几年（当时称为“过渡时期”），“新”社会还是保留了许多“旧”社会的公正。虽然很快就建立了反动的户口制度，接着又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也就是国家垄断粮食购销，但尚未动用国家权力严禁人民发财，也不禁止农民移居城市，允许大众公平竞争。这结果就是出现天然的贫富分化，它立刻吓坏了老毛，于是便开展集体化运动，在短短几年后便彻底剥夺了本来是分给农民的永久性财产——土地，并以定量供应和户口挂钩的

办法，将全体农民转化为国家的农奴。农民和地主再不是传统社会那种自由雇佣关系，却倒退为类似欧洲中世纪农奴和贵族之间那种不可解除的关系。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最反动、最无公道可言的生产关系，而这竟然被全民一致视为“人民解放”。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时至今日，还有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激赏这种病态的畸形的“公平观”，看不穿毛的“反对特权阶级”的反动实质。

这些同志忘记了，毛共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民压迫者，亦即最大的特权阶级，而毛本人就是最大的“特首”。由这种人来反对“特权阶级”，当真是空前绝后的笑话，他反对的永远只会是贫富不均，念兹在兹的就是“中国还有商品贸易、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不把这些费厄泼赖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消灭了，代之以柬埔寨那样的社会，他便死不瞑目。幸亏他的革命失败了，否则中国社会不知还要倒退到哪儿去。

最有趣的还是马悲鸣。我已经说了，他那篇大作，在本质上重复了高干子弟红卫兵在红色恐怖期间写的那些烂文字，那些玩意其实确符圣意，起码和敬爱的江青同志《谈京剧革命》和《在林彪同志委托召开的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如出一辙。

老帮菜都该记得毛发动文革的最初理由吧？那就是据说在文艺领域里存在着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怎么个专政法？那就是“洋人死人占据了舞台”。因为国家是工农兵的国家，所以只能由工农兵占据舞台。如果演了“大洋古”，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要砸烂所有文化精英的狗头，把大权夺过来，只演工农兵，据说这就是工农兵盼望的艺术享受。

教育战线据说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为什么呢？因为实行“分数挂帅”，而这据说就是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报复的方式。电影《反击》中，调干生于洋竟然给试卷迫害得当场晕倒，甚至因此被赶出无产阶级的学校。所以，大家必须像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起来造资产阶级专政的反，不用考试就能上大学，作大官。这就是高干子弟红卫兵们在1966年6－7月间起来造反的动机。

我已经介绍过了，大饥荒前，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教育阵地占了上风，师生不是搞运动就是大战钢铁，要么就是兴办“江西共大”那种烂“学校”。大饥

荒后毛退居二线，刘邓出来整顿教育，才开始强调教育质量，1964年以前，学校实行的乃是“又红又专”，亦即“听话出活”，这结果，便是许多既听话、成绩又好的黑崽子成了班团干。

如果按马悲鸣“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的两分法，则当时许多黑崽子与灰崽子确实是积极分子，似乎构成了班团干的主体。他们积极，乃是自知出身不好或不怎么的，成功机会天然就不如人，所以必须以此弥补之。而红崽子本来就是“自然红”，用不着积极，也用不着“专”，天生就拥有比大众更多的机会，再积极的黑崽子也绝无可能获得这种机会。所以红崽子们当然多是落后分子，在贯彻“阶级路线”前没多少人当学生干部，也没多少是团员。

例如考空军在当时乃是百万里挑一的好事，而这种机会只严格限制在红崽子中。马悲鸣据说从来是落后分子，从未申请过入团，但这种好事只会落在他头上，郑以便再怎么苦学毛著举杠铃甩标枪也没什么用。

简言之，积极分子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病态的反映——社会强使一部分成员天然处于竞争劣势，逼得他们靠“又红又专”来弥补。因此，当时的学校里，比较突出的是三类人：但凡出身不好者多“又红又专”，如郑义、胡平然；既不红又不专、政治上落后、学习一塌糊涂者，多半是有恃无恐的红崽子如马悲鸣；而“白专分子”则是小芦这种天性无法削足适履、塞进任何僵硬框架的阮籍、稽康转世。所谓“白专”就是成绩好，但“品行”不好。

因此，所谓“又红又专”方针，其实是在极不公道的大前提下实行的极度有限的公正，那就是以政治效忠为代价，为被剥夺了同等竞争机会的黑崽子们提供极有限的机会补偿。所以，它其实是绝对不公中的相对公正。那道理很简单：与出身不同，“积极”的机会是敞开的，马悲鸣若想当班团干那类“压迫者”，只管去积极就是了，并没谁不许他积极。

然而高干子弟连这都无法容忍。在他们看来，既然江山是他们老子打下来的，根据“狼羊律”那“宇宙运行规律”，当然所有的班团干也只能由他们作。这就是他们起来“造反”的正当理由，这造反不但让师道尊严的几千年传统扫地以尽，使许多师长被活活打死，而且使恐怖遍于国中，令中国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精英毁于一旦。

尽管红崽子们后来撞在了毛的枪口上，但红卫兵运动其实深得毛思想精髓，那就是机会只能由党来分配，绝不能开放给全民，让大家凭本事竞争。文

革新贵信奉的也是这套，不过更极端而已。直到后毛时代，这仍然是我党的指导思想。记得89学运后，彭真同志在报上公开扬言，中共为夺权死了几千万人，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权。那意思就是肥水决不会落到外人田去。谁要追求机会均等，over my dead body！

这就是现代中国为何出现了空前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基本实现了当年高干子弟红卫兵们的宏大构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老郑的义愤也有充分道理。

为他和其他“自由知识分子”没看到的乃是，虽然官僚集团强占了大部分发财机会，但人民毕竟部分重获了有限的发财机会。比起毛时代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那些钟情于“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同志们应该看到，假定毛的理想天国实现了，统治者靠权力剥夺了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发财机会，严格实行巴黎公社制度，普选出来的官员和大家拿一样的工资，并随时可以撤换，那又便如何？那不过是人类能设计的最严重的全民自虐而已。

因此，咱们要做的，就是剥夺官僚集团的“机会决定权”，使得政府没有动用政治权力分配发财机会和其他成功机会的可能。很明显，要完成这重大改革，靠毛式革命或其他形式的暴力革命只会南辕北辙——它只会造出权力更集中、因而实现机会均等的希望也就更渺茫的新政府来。

要完成这重大改革，当然需要人民斗争，但主要还得靠统治者让步。可惜从我党到党朋一律信奉“狼羊律”，认定以权力把持垄断一切机会乃是“宇宙运行规律”，这就没什么好事了，谈到此，为呜咽，就此打住吧。

2006 年 5 月 25 日

陈良宇·司法的被动性·强奸与诱奸

中午上网来看了一眼，才知道一位中共高官陈良宇给抓起来了，而阿随网友似乎对此很不满，建议通过法律，将高官的特权固定化，说中共当到了政治局常委一级，那就应该有特殊的弹劾程序，云云。

这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不过我还隐约记得几个月前，这小子曾著文严密论证“抓捕搞动乱的总书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如今胡总书记不严格遵照法律程序便抓了高官，是不是属于搞动乱，该不该由阿随发动国安特种部队把他抓捕起来，老芦水平太低，不敢妄言，还请熟悉我党规矩的党朋大军指点，谢谢！

那位说了，你凭什么说中央抓陈没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这不是我说的，是摩登帝师温铁军在其著名讲话中公开主张的。

记得他在那讲话中论证了中国为何无法效法西方实行讲究无罪推定、严格遵守法律程序的法治，那理由是，如果讲究这套，那么巨贪大蠹根本就无法落网：您若如西方一样，没有确凿证据不起诉，那就无异于给罪犯以充足时间销毁罪证，司法机关就永远无法找到确凿证据立案了。所以，为了不让罪犯逍遥法外，司法机关必须使用“双规”等践踏人权的非常手段，这就是“为了执法必须犯法”的“辩证法”。

不能不承认，温帝师此论，的确是洞察国情民俗的真知灼见，那水平比咱们坛子里的什么法律专家诸如和合、马悲鸣、阿随等人高多了。自从看了他那讲话，我一直在琢磨这主张，觉得确实如此。唯一的担忧就是，它奉行的还是毛共“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爷”的土匪哲学，也就是阿随言必称的“狼羊律”。而我早在旧作中说过，不与这土匪哲学彻底决裂，未来的潜在的最大的受害人还是胡总书记。

这道理哪怕白痴也该明白：按国法党章，胡总书记的地位如同其前驱赵紫阳一般，乃是不能随意颠覆的，可按“狼羊律”，他慢慢眼就可能让某个强人抓捕起来，名正言顺地以猜想为立案依据，实行“双规”。到时就算他清廉如

水，人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和既往党魁毛、邓等人相反，胡的优势在于法律而不在于实力，可他小人家竟然昏愦到去避虚击实，扬短避长，效毛邓玩实力，不强调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您说这是不是傻得出了奇？

所以，反腐并不是某些比较头脑简单的同志想像的那样，只需由中央的青天大老爷们以违法的霹雳手段严打贪官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种事干多了，势必上行下效，最终只能危及中央的合法地位。治本之策，还是实行司法独立，为"党大还是法大"的野蛮笑话给出文明答案。当务之急是将反贪和政治斗争彻底脱钩，让整个党国处于独立的司法系统的监督之下。做不到这点，则非但河清无日，而且后患无穷。

一旦明白了上述简单道理，则不难预言，胡总的廉政无非是两种收场策略（exit strategy）：要么他触怒了庞大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被人家"抓捕搞动乱的总书记"；要么他自己见坏就收，让所谓"廉政"再一次以雷声大雨点小匆匆收场。即使是后者，我倒觉得也没什么丢脸的——君不见朱前总理准备下的100口棺材至今还空着呢。

令人遗憾的是，党朋竟然无一人能看出这党国根本利益所在，无论是直线朋还是曲线朋，发扬的都是千年的奸臣佞臣传统，讲究的是易牙、蔡京、林副式的"第一种忠诚"，专业就是俯首歌颂天皇圣明。

这倒见惯不惊了，令我意外的是，在有关讨论中，有的读者竟然连"司法的被动性"这一起码常识都没有。不仅如此，小咱居然还要我论证诱奸（seducement）相对于强奸（rape）的合理性！这可悲的现实，让我觉得疗愚正未有穷期，只好再来进行点常识教育。

所谓"司法的被动性"一语，我是从著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看来的。书看得太早，难免记忆模糊，这里只能讲讲我的心得，无法区分哪些话是原作者说的，哪些是我自己的发挥。

记得老托对美国的司法制度颇为赞赏，说了许多，其中有一条就是这"司法的被动性"。在我看来，这一特点很重要，可以说是现代法家们和西方法治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

据我的理解，这司法的被动性有两个重大表现：

第一，犯罪在前，惩罚在后，执法机构决不能以猜想或恐惧为依据，"防患于未然"，在嫌疑人还未犯法时就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具体说来，司

法机关不能毫无证据就先把人抓起来，关入“牛棚”或实行“双规”，以此非法手段去搜集罪证或是逼迫口供。

第二，所有的民事诉讼，都是“民不举，官不究”，司法机构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决不主动介入民事纠纷，以期把对民间生活的干扰降低到最低限度。除了恐怖活动、颠覆犯罪、杀人、强奸等恶性犯罪外，处理一般刑事案件也遵循这个原则。

这司法的被动性非常重要，它符合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构想，亦即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将威权机构对社会活动的干涉降到最低限度，使它们在非干预不可时才介入民间生活，充分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活动。

对照中国的国情，立刻就可以发现无论是统治集团还是人民都毫无这种观念，越到现代越退化。除了秦朝那个短暂时期，历代中国统治者基本还是做到了第一条，亦即先有犯罪，后有惩罚。然而到了毛共手上，就连这条都保不住了。

在人类历史上，毛共首次公开提出为了巩固政权就可以主动出击、以大规模杀人、有意制造恐怖的方式来维持统治。伟大领袖毛主席 “必须杀掉一批人，不杀政权不能巩固”的英明指示，和他的好学生张春桥“如何巩固政权：杀人”的心得体会当一道流芳百世，为后人代代感念不已。邓共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这光荣传统。大陆出来的网友都该记得，每到“国庆”前夕就要来个“严打”。司法为政治服务竟然到了这种如影随形的地步，堪称史无前例。

江总铁腕镇压法轮功又何尝不如此？当初法轮功确实犯了法，未经许可就在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但那根本不是我党铁腕镇压的真正理由。那理由大家都心知肚明，网上就有许多人告诉我，法轮功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太平天国等政教合一的组织，仅凭这点，就该从严打击。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敝人对法轮功毫无好感，对法轮功与白莲教、发匪、拳匪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我早就洞察无遗了。问题在于，仅仅因为这个，司法机构就有权去镇压人家么？好歹人家还没找到金田村吧？从恐惧出发就能任意抓人捕人，活在这种暗无天日的世界上，还能有什么起码的安全感可言？

此所以我说“中共治下无冤案错案”，盖我党和历史上所有统治者的执法目的不一样，人家是为惩罚犯罪而执法，这才有可能弄错了，冤枉了好人，而我党执法的目的根本不是惩罚罪犯，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根本不存

在弄错的问题：不管被杀者是死有余辜还是冤枉送命，反正都达到了“震慑民众巩固统治”的原初目的，又何错之有？

那第二条就更不用说了，古代民事纠纷基本还按“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只是在处理刑事案件时丝毫不懂无罪推定，更不知道刑侦基本技术，破案的唯一手段就是“三木之下，何求不得”。

这些都还是小事，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无论是官是民，古人都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亦即“为民作主”意识，记得80年代有部《七品芝麻官》的电影，其中正面角色的著名语录就是“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白薯”。

这还不只是官场心理，传统中国人只要处于上一等级，替下级强行作主的冲动就完全是沛然莫之能御的，而这一切据说都是对下级的体贴，正如陆游他妈硬要逼迫他休了表妹唐琬一般。怪不得阿随要让羊们感谢狼们为了他们的幸福吃了自己。

即使到了今天，这种传统还非常强大。我认识的一家人就怎么也见不得他家长子“觉新”同志的太太，不但父母如此，兄弟姐妹也如此，其中一人是我的旧友，曾多次向我扼腕，说他哥应该进服《聊斋·马介甫篇》上的“丈夫再造散”。直到我最后终于听不下去，直截了当地说：“人家愿意受虐，干卿底事？请记住，人家夫妻才是直系亲属，你作弟弟的不过是社会关系而已，岂不闻‘疏不间亲’的古训？”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到了“新”中国，这种“皇帝不急太监急，政府强行为民作主”的传统就发挥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法轮功诈骗案”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我到现在也想不通，国安部到底是群什么白痴在主持网上倒法攻势，开口闭口就只有一个主旋律，如同烂唱片来回来去就只能放那一声一般：法轮功骗人，谋财害命，格支格支，法轮功骗人，谋财害命，格支格支……（附注：这儿的“格支格支”不是四铭在想像中为孝女洗澡，而是模拟烂唱片发出的噪音。）

国安领导同志竟然会发动这种劣等水平攻势，而这种拙劣宣传竟然不会引起现代人反感，似乎只说明了中国人至今是何等缺乏现代文明意识，连最起码的“尊重个人自由意愿是人权的主要内容之一”都不知道，人家心甘情愿上当受骗，干尔等什么事？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有谁上法庭以诈骗罪起诉法轮

功，并拿出不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确实是法轮功信徒，并非在国安威逼利诱下作伪证。在法庭宣判之前，诬指人家诈骗犯罪，本身就是诽谤行为。这种宣传作得越多，便越暴露我党至今还是那野蛮痞子的瓤子，完全是砸自己的牌子。

上面已经说了，司法的被动性原则，来自于对人民自由的极度尊重，就是为了使得一切威权机构除非万不得已，不介入干预民间生活，才确立了这个根本原则。不但如此，整个民主社会都是基于这“尊重人民自由意愿”的基本原则建立的。

这就是我为何说专制和民主的区别是“强奸”与“诱奸”的区别，前者是领袖们强暴百姓自由意愿，使用用暴力强占大位，并任意抢夺人民血汗凝成的财富，而后者则是政客甜言蜜语地哄骗人民选自己。两者外在表现相似，但有本质差别。

我党和法轮功的区别也类此：我党是靠抢劫偷盗人民致富，而法轮功则是靠善男信女心甘情愿的解囊奉献。前者侵犯了受害人的人权，后者则连玉皇大帝都管不着，正如我认识的那家人从父母以下，谁都无权去强迫那“觉新”同志去退送母老虎一般。这么简单的道理都需要老芦详细讲解，这种铺天盖地的愚昧当真使人绝望。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据说有的女人内心深处有被人强暴的欲望。我原来一直不相信这说道，直到看见小咱要我论证为何“诱奸”比“强奸”更合理。不过到此地步，我还是不懂：就算两者是一回事，尔等还为何一把鼻子一把眼泪地痛诉在美国加拿大被诱奸的无限痛苦，歌颂在神州大地上被强奸的无上欢乐，感激历史上最大的强奸犯毛泽东呢？敢情被强奸的滋味美过了洞房花烛？

2006 年 9 月 26 日

中国“双城记”

《双城记》乃是英国文豪狄更斯的著名小说，描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在巴黎和伦敦的事。我看中国和前苏联都有本“双城记”，在这点上反映了两国的相似性。

早在旧作中指出过，前苏联和中国在如何对待西洋文明上都是心态上的弱者。论传统文明，俄罗斯还远远不如中国，原来根本是野蛮人，后来的一点文明是彼得大帝去舶来的。彼得大帝乃是俄国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发现欧洲文明先进，立志学习西方，便在新边疆筑城，不顾贵族反对，把首都从莫斯科搬到那儿去，命名为彼得堡，使得该城成了密切接触并迅速引进欧洲文明的桥头堡。此后彼得堡一直成了原始野蛮落后的俄罗斯的“西方文明之窗”，全国的科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俄国人不仅效法欧洲榜样，建立了俄国最好的彼得堡大学，成立了彼得堡科学院，还把欧洲第一流的学者请来作院士，例如著名瑞典数学家欧拉就是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后来苏联吹嘘自己文治武功如何强大，动不动就请出这位尊神来，言必称“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欧拉”，使得小芦一直以为他是俄国人。

相比之下，莫斯科作为古都，就相当闭塞守旧顽固。跟中国一模一样，俄国也存在两大派，先知先觉们主张向先进的西方学习，采用西方生活方式，自己全盘西化了。当时许多贵族甚至走了极端，竟然以讲法国话为荣，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就用连篇累牍的法文描写入侵法军的对话，让读者实在契无消，但也显示了俄国贵族（老托本人是伯爵）对法文的娴熟。在车尔尼雪夫司机的《怎么办》中，是否懂法文更成了市民想攀附贵族的巨大障碍。

另一方面，平民小知中“国粹派”的势力也极其强大。这些人犹如中国的徐桐和后世的党朋一般，吹嘘根本就不存在的本土文明，主张文化仇外主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彼得堡和莫斯科便变成了外来文明和本土文明的地理象征，如同咱们的上海和北京一般。

这种两派缠斗，在文明后进国家似乎成了普遍现象，而且一无例外地引出巨大的民族灾难来。据现代学者研究，纳粹现象之所以席卷德国，主要一个社会心理原因是后起的德意志民族相对于先进的英法民族的在文明上的自卑感，因此，纳粹的“日尔曼人是理当统治世界的主子种族”的疯狂主张便非常能打动国民的心。日本人也是这样。不用说，咱们的国粹派们也是一步不错地踏着外国和中国先辈的脚印走。

在俄国布尔什特党（the Bullshit Party）内部同样也有这种尖锐斗争，布党元老统统是上等家庭出身的高知，完全西化了，又长期居住在瑞士或其他欧洲国家。例如十月革命爆发前，列宁在国外居住的时间竟然超过了他在俄国居住的时间，跟孙中山也有一拼。因此，早期布党元老虽然是走火入魔的邪教信徒，但在内心一致承认欧洲的先进，自列宁以下都认定俄国是落后国家，按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把共党革命爆发的希望寄托在欧洲先进国家之中。直到革命在俄国爆发，布党领袖们还一直在期望革命将蔓延到欧洲先进国家中去，认为只有世界革命爆发才能保障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和早期中共一样，布党内部也有海龟和土产痞子两大派。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如中共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一般，乃是海龟，而斯大林如同毛泽东一般，乃是土产痞子。这两类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自然要打上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斗争的印记。最后阴谋家斯大林大获全胜，于是他那积极分子的自卑情结便大发作，大吹“苏维埃文化”，让苏联教育部与文化部成了世上最大的谎言工厂，把人类所有的重大发现发明都吹成是俄国人作出的：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是罗蒙诺索夫发现的，蒸汽机是巴祖诺夫发明的，无线电是波波夫发明的，飞机是儒可夫司机发明的，等等，等等。

十月革命后约一年，布党因为害怕德军攻占彼得堡，便迁都到莫斯科去，俄国以彼得堡为西方文明之窗的传统就此中断，但双城仍然作为文明对峙象征而隐隐存在。莫斯科代表了祖传的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的野蛮嗜杀传统，而彼得堡好歹残存了一线西方开明气息。

在苏共历史上，彼得堡党委从来具有特殊位置，也是斯大林清洗最频繁的重灾区，每次大清洗都逃不了。30年代大清洗就是彼得堡（当时改名为列宁割了）党委书记、斯大林的接班人基洛夫被刺引发的，随后几乎所有的党委成员

都被肉体消灭。斯大林为了绝对控制那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特地派他的忠实走狗日丹诺夫去担任该城党魁。即使如此，在战后该市又隐隐显示出离心倾向，致使斯大林再次举起屠刀，不仅使日丹诺夫巧妙地死于“心脏病”，而且竟然秘密逮捕并处决了列宁格勒党委的所有负责人，而就是这些人在列宁格勒围城中创造了苦撑不倒的奇迹。

即使在肉体消灭了所有潜在离心者之后，苏共内部似乎仍然有这两派斗争的蛛丝马迹可寻，这从师哲回忆录中就能看出来。我在旧作中说过，俄罗斯原是介于欧亚之间的野蛮国家，远离当时的欧洲和亚洲文明中心，所以就连“厕所”都是外来概念，必须使用音译引入。在毛访问苏联时，斯大林从师哲那儿首次得知中国人使用的词汇都是“原有的”（他和师哲都不知道中文中绝大多数现代词汇其实是意译，并非原有），不禁非常惊奇，对中国文明充满敬意，转过头去跟政治局委员们说：看看，你们还崇拜什么欧洲？由此可见即使是政治局内部也不见得就是清一色。

聪明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看出中俄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咱们也有自己的彼得堡，就是上海，可惜不是敢于改革开放的皇帝建立起来的，也有莫斯科，那就是古都北京。在近代史上，这两地代表了文明与野蛮、海龟与痞子斗争的基本阵地。代表先进的求新求变的士绅集团的国民党建都于南京，继承了千年痞子造反传统的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土匪则从黄土地中走出来，进了万岁爷的龙城，这地理上的象征意义，根本就不是偶然的。

中共建政以后，京派与海派的斗争从来是权力斗争的重场戏，每逢有双城中某城党魁垮台，那就必然意味着政局的重大改变：北京市长彭真斗不过上海的张春桥，中箭落马，掀开了上海帮入主中央的新篇章；上海帮悉数被擒，英明领袖华主席才能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北京书记陈希同锒铛入狱，敬爱的江总这才坐稳了第三代核心的宝座……不难想见，如今陈良宇落马，黄菊岌岌可危，上海帮在中央失势，当然要意味着小胡同志“施政能力”的空前加强。只有比较迟钝或是不惜一切哈共的同志，才会只从“反腐”的官样文章中去解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必须指出的是，因为我党代表了反文明，在其权力斗争史上演出的“双城记”，已经没有什么文明对峙的象征了。可以总结的规律就是，上海从来比较激进而北京比较保守。但“激进”未见得就是文明，很可能恰好反过来，越激

进便越远离文明，毛共这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最血腥、最野蛮的激进集团推翻先总统蒋公代表的保守集团就是明证。激进的四人帮颠覆保守的彭真也是类似的情形。到底是激进还是保守对人民有利，具体还得看那主政策是什么。如果是祸国殃民的毛主席革命路线，那当然是越激进越反动。

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双城分别代表“激进”和“保守”的特点仍然不变。出国前我一直在北京，先求学后任教，多次到南方出差，亲身体验了北京的死气沉沉和南方的生龙活虎的鲜明对比。所以后来希同为了什么情妇收礼（那礼品似乎也没被贪污而是放在办公室里）锒铛入狱，我明知他那点事比起敬爱的江总来是小菜一碟，仍然对那落水狗毫无同情。更何况八九学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那狗东西挑衅刺激起来的，此人堪称中国历史上引狼入室，请军队来放手屠杀治下子民的第一位“父母官”。不管他因为什么事蹲牢，那都是“大快人心事，粉碎北京帮”。

如今良宇被“规”，其中的政策涵义倒值得中国观察家们细细参详。如果楼下的“晴天霹雳”贴出的良宇言论有点可信度，则他入狱的基本原因除了阿胡借此立威（这倒是必要的，早说过了，没有足够权威的中央只能引来大乱）之外，恐怕还有政策争论（亦即所谓“路线斗争”）。如所周知，胡中央乃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对如今恶性走资颇为不满，曾在登基前到西柏坡和延安朝圣，立志要施重手为民作主，遏制住走资狂潮。很明显，良宇的意见与此相左，当然要变成必须搬走的绊脚石，必须打倒的拦路虎。

窃以为，这才是该重大历史事件的重大涵义。对于胡中央为民作主，遏制恶性走资的决心与魄力，我本人表示极度赞赏。早就多次说过了，如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乃是官僚资产阶级疯狂掠夺人民财富，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了极度严峻的社会危机。胡中央对症下药，哪怕是极有限的杀富济贫，也能缓解社会危机，这无论从全民利益的角度还是从共党保权救党的角度来看，都是值得赞许的。

但潜在的问题我也指出过了，胡中央的保守似乎不仅限于经济，政治上也如此。而本布衣帝师早就多次英明指出过，当前应该干的是经济左转，打击官僚资本豪强，扶持民间中小企业，政治右转，实行司法独立、舆论独立，最低限度必须允许并保护媒体监督揭露官场腐败。舍此不由，靠祖传的“御史加锦衣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拿办个别贪官，根本就不可能遏制住贪腐的

滔天洪流。如果胡子拿办良宇竟然意味着他在政治经济上都决心统统左转，那必然是在得罪党内实力雄厚的官僚财团的同时失去人民的支持，最终陷入孤立。无论对他本人，对我党，对人民而言，那都将是一大不幸。

2006 年 9 月 28 日

写在秋叶飘零之际

国内一位读者写信给我，说明自己并不同意我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不同意我对中国未来的悲观估计，这令我非常高兴。

我写的其实是“盛世危言”，并不是想诅咒祖国，而是看到了潜在危机，免不得要大声疾呼，引起众人警觉，以期防患于未然。我当然知道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我也看到危机与希望同在，而伴随经济繁荣出现的社会危机深化恰恰是王朝末年的典型景观：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二月革命前的俄国以及霍梅尼革命前的伊朗都这样，这不是偶然的。

专制政体似乎有个共同的难题：如何在一个高压社会中安全减压。

现代专制社会必然是高压社会。如果一味高压下去，人民倒是毫无怨言，社会也相当稳定，可惜却毫无生机，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为了向社会注入活力，统治者便被迫为百姓有限度的松绑（用难听话来说就是把自由“恩赐”给人民），而这一松绑必然要引出连锁反应，经济倒是上去了，但人民对自由的胃口也给提起来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不满心理。

这儿的主要问题是，从上到下恩赐的自由不是按费厄泼赖的原则分配，而是按“狼羊律”以权力分配的。换言之，当自由兑现成现实好处时，它不可避免地要按权力等级逐级递减，等到好处传到社会底层，已经所剩无几了，那结果就是社会不公以空前规模出现。工农大众虽然也从改革中获益，却相对贫困化了，于是便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吊诡景象——百姓日子比原来好过了，反而比原来更不知足，更怨气冲天了，抗争风潮于焉出现，而这是在“往昔的好日子”里从未见过的。

这就是89“风波”的由来，它是松绑必然引起的痉挛。如果当局不铁腕镇压，民众就会变得越来越胆大，情绪互相传染，越来越怨气冲天，有可能演成严重事件，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连锁反应的结果，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也是这个原因。辛亥革命更是这种“改革导致政权覆没”的先例。

这种反应为当局始料未及，也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百姓日子好过了反倒更加不满了？此时他们更惊恐地发现自由与专制彼此之间的不兼容性。对他们来说，自由意味着社会动乱，只有施压才能保障稳定，于是他们的应对就必然只会是“收”，也就是把恩赐给百姓的政治自由收回去。

这就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在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民意党人暗杀后采取的措施，也是89年后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从赵而江而胡，每换一届班子就收紧一层。80年代恩赐给中国人民的那点经济自由倒没多少损失，甚至还有增加，但政治自由已经回收得差不多了。如今小胡整垮了竞争对手，巩固了权威，更可以放手实行他的新时代的毛泽东主义了。

可惜这不过是鼠目寸光的应对方式。尼古拉的倒行逆施并没有拯救了沙皇统治，反倒使革命以无比血腥横暴的方式爆发，连他全家都被布尔什特党人谋杀了。“收”的好处是它的表面上的立竿见影，正是这种效果的即时性使得它在统治者眼中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可惜他们无法认识到，以施压换来的稳定不过是一种假象。只要原有的社会矛盾没有解决，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并不会因此自动消失，只是被储蓄下来了。专制制度的致命症结就在那“狼羊律”上，施压非但不能带来费厄泼赖，更使得人民失去了及时释放怨气的安全阀，于是当统治者的控制力弱化到临界点时，社会危机就要以空前的烈度爆发。

施压的另一个重大弊病，是统治者把原来可以争取的盟友甚至主动合作者大规模驱赶到敌对阵营中去。一个专制政体下总有改良派和革命派。因为人类本性倾向于求稳怕乱，革命派一开头只是少数极端分子，改良派则是“责任伦理”观念比较强烈的老成谋国之士，对民众有相当的感召力。不幸的是，因为这些人要求政治自由，而统治者此时已将政治自由看成是只会招来动乱的洪水猛兽，于是这些人便不可避免地要变成统治者的眼中钉，最终被当局当成比极端分子还更可怕的敌人而加以镇压，到最后便把自由派逼成了革命派，这就是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前夕发生的事。

一言以蔽之，专制统治者害怕自由的必然结果，就是让自己彻底丧失了选择自由，把绝大部分人都赶到了敌对阵营里，最后手中只剩下暴力镇压那张牌。这一手一旦因内忧外患不灵之日，就是革命爆发、统治者死得惨不可言之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因为统治者对此前景心知肚明，他们就更加死死地抓住那救命稻草不放，越压越是百病丛生，于是便成了恶性循环：施压——危机深化，人民不满，社会动荡——统治者恐慌，更加施压——危机更深化。这样越到后来便越不敢给百姓松绑，等到最后终于熬不下去时才骤然撒手，可惜已经太晚了，反而触发了大规模革命。俄国沙皇和清室临终前都有过类似的“灭亡前的猖狂一跳”，火烧眉毛时才匆忙决定还政于民，反倒断送了卿卿性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专制统治者们倒颇像瘾君子，而权力就是他们的海洛因“四小姐”。镇压如同吸毒，能立竿见影地消除一切病痛，而越是麻醉自己，那疾病也就越发恶化了，等到最后没钱买海洛因那天，就是大限到日。

因此，所谓改革或改良，其实就是个戒毒问题，需要的是既不至于因戒得太快而引起强烈副反应甚至送命，又能最终戒断。如何才能在一个大国完成这艰巨任务，迄今成功的只有前苏联，可惜人家没有经过文革，原有的社会危机恐怕还不到咱们的万分之一，所以那大概也不算什么人间奇迹。

可惜当局似乎死都不明白上述简单道理，胡中央对海洛因的爱好似乎远远胜过江泽民，上台后明显左转，加大了施压力度。最近国内彻底封杀本网站和芦笛的文字，似乎并不是针对我个人或网站而来的，而是全面加强舆论管制的表现，无论是海纳百川还是芦笛，都不过是飒飒落下的一片落叶，预示的是肃杀深秋即将到来。

那天某网友说，芦笛对中共无害，我当即回答道，你知道这点，我也知道这点，但那些白痴不知道！一旦沉溺于海洛因，就完全丧失了正常判断力，所以不但王力雄那种举国无出其右的忧国忧民的独立知识分子要被昏庸的共党打成“间谍”，就连临死都还忠于自己的马列主义信念的刘宾雁老都要被视为“敌对势力”，连“狐死首丘”的微不足道的心愿都无法实现。在当局眼中，为和平改造中国殚精竭虑规划方略的王力雄，要比哗众取宠的浅薄骂手余杰可怕一万倍。

这才是统治者最可悲的悲剧：恩将仇报，将解药当毒药，将恩人当仇人。老芦上了榜，那又怎么样？不回去就是了，反正父母双亡，最重要的感情纽带已经不存在了。恩将仇报，讳疾忌医，那损失是他们的而不是我的。

如今那位读者却来信说，我过于悲观了，令我欣喜莫名。其实我每次作出悲观预言时，心里的沉重不是可以形诸笔墨的。我又何尝不愿意自己的预言落空？无奈党妈妈给我的一个好处，就是彻底失去了自欺能力，不管感情上何等痛苦，都能正视现实并毫不犹豫地说出令众人不快的大实话来。

然而我毕竟长期脱离了国内生活，预言落空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上次有网友就说，看我议论国事常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让我看了只觉得心花怒放。巴不得有更多的国内网友告诉我，我在上面说的这一切，不过是杞忧而已。

2006 年 10 月 5 日

中国有必要引入社会主义运动

一、钱理群先生的教诲

刚才在网上看到钱理群先生两年前发表的文章《20年来思想界的重大失误》（见附录）。光这题目就让我错愕久之：中国竟有“思想界”！这对我来说还真是新闻，再接着看下去，更是不敢相信堂堂北大教授竟会无知如许。

最精彩的是这些话：

> “我的另外一个认识就是，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现在的中国和30年代的中国非常像，好象历史在重演。其实30年代国民党的统治是发展的，也是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产生了两极分化，上海是最突出的。国际上，我个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新的种族主义正在兴起。美国人的生命比其他国家人的生命更重要，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不是种族主义吗？而且，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英美绥靖政策，在纵容这样一种法西斯化。我觉得，历史好像正在重演。问题是，30年代面对那样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时候，我们有资源可以对抗。比如说，面对德国法西斯，当时有英美的自由主义，还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对抗。当时，我们国内，有国民党所代表的国民统治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来对抗。但是，我们今天拿什么东西来对抗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现实？这是困扰知识界，思想界的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今天，有些年轻的朋友非常强调这样一个传统，社会主义的传统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我觉得，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思潮是有问题，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历史经历的，它在本世纪是有问题的，它也曾经带来灾难。这样，我们现在不能把它整个搬过来。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合理性，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至少比过去看得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认为，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但是，它存在的问题，也长期地没有被研究。我个人认为，而且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遗产是我们今天面对现实可以继承、借鉴和考虑的一个遗产和资源。但是，这个资源是没有经过总结和研究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变得困惑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应该防止两个倾向，一个就是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曾经带来的弊病就本能地拒绝它，这是我不赞同的。但是我也不赞同，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整个地搬过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认为，中国知识界，一方面科学地总结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一个迫切需要，那这是中国知识界能够对人类对全世界知识界作出的一个最好的贡献。”

钱先生的意思很明确，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数条：

1、现代中国和30年代的中国很相似，主要表现在贫富两极分化上。

2、现代世界和30年代的世界也相似，表现为美国的法西斯化及其崛起。

3、无论是现代中国还是现代世界，其实都不如30年代。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缺乏制约“主旋律”的政治势力，当时国内有中共制约国府，国际有英美苏制衡法西斯国家，而今天无论是国际国内都是一派独大，毫无制约。

4、国际上如何补偏救弊，钱先生没有说，但国内的弥补之策，则是“认真清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继承、借鉴和考虑”“社会主义遗产”。

北大文科教授竟然连西方大老粗的水平都没有，连最起码的政治概念都拎勿清，“辩证法”那种烂污货却成了本能，开口就是“两种倾向”。光从这个事实看，就足以洞见我党执政50年造了多大的孽。所谓“中国思想界”彻底沦为“无思想界”或“混乱思想界”，良有以也。遥想北大在20、30年代的辉煌，令人不能不拊膺长叹。

二、“法西斯主义”是嘛玩意？

所谓“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如钱先生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种族主义的内容，凡是种族主义都是法西斯主义，或凡是帝国主义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稍微

有点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世上可以有“民主帝国主义”（例如二战前的英法），也可以有“民主种族主义”（如改革前的南非），但绝不可能有“民主法西斯主义”，正如绝不可能有“火热的冰”一般，盖“民主”与“法西斯”水火不相容。

奉行种族主义政策当然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醒目标志，但并非其根本特点。它和共产主义一样，最本质的特点是对内实行极权主义，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只是它对内实行极权统治远远不如共产主义全面彻底，对外扩张也远远不如共产主义巧妙。因此，它的潜在危害和实际造成的灾难远远不如共产主义深重。基辛格名言曰：“共产主义离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其实完全说倒了，应该是“共产主义的邪恶与造成的灾难，法西斯主义拍马也追不着。”

这其实是本人在70年代初期的感喟。那时我就明白了伟大领袖为何要说“我们的党就要变成法西斯党”。他老人家并非糊涂虫，完全明白共产党那极左组织和法西斯党那极右组织在组织原则、操作原理、思维方式、信奉的极端集体主义价值观等方面的惊人相似，其区别只在于随时可以转换的政治立场，因此才特地郑而重之地一语道破共党转变为纳粹的轻易。这一观察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洞察力。的确，新纳粹运动最猖獗之处，不是在钱老先生想象的美国，而是在前苏联和东欧那些地区。

如果钱先生明白了这最简单的常识，那就该知道，美国不但是民主国家，而且是特别强调个人价值、以自由创业为立国精神的民主国家，从根本上就是任何一种极权主义的天敌。哪怕全世界都沦为法西斯国家，那美国也只会是最后一个。如果根据奉行种族主义这条就将其打成法西斯国家，那就必然要闹出“民主法西斯国家”的天字第一号笑话来。

更何况“美国奉行种族主义政策”这指控本身就是笑话。国内愤青受我党宣传欺骗，说出这种昏话情有可原，但钱教授既是“高级知识分子”，犯这种超低级错误就难以原谅了。其实钱先生若如我等老知青一般，早在70年代就看了《光荣与梦想》一类大路货，那也就不至于闹出这笑话来了。那时我就发现：原来美国废除种族歧视，主要还是政府努力的结果。哪怕是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在阿拉巴马州首次实行黑白合校时，也曾派兵保卫黑人学生进入学校上课。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在任上通过的民权法案就更不必说了。请问世上能有这种法西斯国家么？

钱先生的指控，只有一点近似真实，那就是苏联垮后，美国在白痴总统布什领导下，确曾显示了走向帝国主义的趋势，最突出的就是不顾国际舆论，踢开联合国闹革命，悍然入侵伊拉克，颠覆人家的合法政府，甚至把人家的国家元首抓起来处死。这我早就在网上反复抨击过。

但我也同时指出，白痴布什总统的“弱智囊”们受了从前苏联出来的某犹太移民写的论述“新帝国主义”那本烂书的影响，想建立“善良帝国”，乃是最典型的刻舟求剑，必然要遭到惨败，那是因为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如今都不再具备建立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从国际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民族主义觉悟在第三世界人民中空前觉醒，如今这世上再没有谁愿意自己的国家变成殖民地了；从美国来说，现代媒体的发达以及人道主义观念的空前普及，使得美国人民不可能像老牌殖民帝国英法人民那样，对子弟兵在国外的兽行一无所知。这两条合在一起，就注定了英美在海外冒险必然要以惨败告终。

这些预言是在美国发动侵伊战争前夜作出的，至今已一一应验。现在布什总统的战争政策在美国已经成了反对的焦点。新近民主党在国会选举大胜，控制了国会，通过法案承认侵伊战争已经失败，并明确规定了撤军时间表。布什总统虽能依法否决该法案，但毕竟无法挽回已经丧失的民意支持。在我看来，撤军乃是迟早的事，而伊拉克必将因英美在搅S之后半途撒手，沦为中东乱源，变成国际恐怖分子的根据地。早就说过了，不是所有的错误都能弥补，小布闯下来的这泼天大祸，纵是姜子牙下凡也无法解救。

这难道是钱教授幻想出来的“没有制衡”的局面？钱教授缺乏世界知识，没有世界视角，只看得见我党指给他看的东西，却敢奢谈天下大势，其勇气倒确实值得钦服。只是阿，世界并不是我党指给您看的那“一线天”。

如今国际上确实没有苏联来制衡美国，但美国的盟国并非只知唯唯诺诺服从主子、不管本国利益的奴才。更重要的是，美国是民主国家，民选政府受民意制约，这才是最根本的制衡力，不是什么外部压力可以取代的。而就是这种制衡，决定了美国不但绝无可能变成法西斯国家，也不可能在海外如右派之愿，建立所谓“善良帝国”。早在4、5年前我就说过了，建立帝国是要付出人命代价的，而世上最珍视人命的国家就是美国，这种国家根本不可能像二战前的英国一样，不顾死人，在全球疯狂扩张。

三、“社会主义”究竟是嘛玩意？

比起所谓“法西斯化”的笑话来，钱教授在这方面闹的笑话倒情有可原——毕竟，因为我党的谬种流传，于今中国大概没谁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其实“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是两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乃是标准西货，从未引入过中国。它其实就是“欧洲工人运动”的同义语，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其诉求代表了社会弱势集团，要求的是和平地合法地改造社会，建立起劫富济贫的公平的福利社会来，其代表政党就是“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其实“社会党”是中共的欺骗翻译，原文多是“社会主义党”），走的就是我党百般辱骂的“议会道路”。

该运动从18世纪开始，在19世纪达到高峰，在20世纪结出了丰硕成果，使得北欧诸国、奥地利、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或是变成了准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在国民经济中含有相当大的社会主义成分。例如奥地利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全民免费医疗，女性产假长达一年，而且连配偶都能沾光休假（当然没有产妇那么长），去陪老婆坐月子，国家还负责发尿片、婴儿服装等等。这些好事，根本就是国人不敢想象的。

国际共运则完全是只对野心家有利的欺世盗名的夺权战争。无论是在执政前还是执政后，它从来不曾代表过工人利益。西方学者一致同意，十月革命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特党（The Bullshit Party）在俄国工人中毫无根基，其绝大多数领导人并非工人出身，都是列宁那种终生大部分时间在书房或图书馆中度过的知识分子。列宁本人是大地主（还不是出身问题，他本人就是靠地租为生的大地主），从未下过乡体验农民生活、进过厂实地考察工人生活状况。就连他自己都多次坦然宣告，工人群众不可能自发掌握马克思主义，必须由知识分子从外部输入。布尔什特党从未领导过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人运动，只知道组织利用工人去作自己夺权的炮灰。列宁本人就坦承，夺取政权才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中国就更不必说了，中国从来没有工人运动传统，就连罢工都是引进的洋货，从根本上与孔孟之道格格不入。20年代共产国际曾指示我党搞工运，一度发动过什么“二七大罢工”、“安源罢工”，但那目的并不是为工人自己谋福利，而是将其用作夺权的政治斗争。30年代以后，我党发现工运不能达到这目

的，便转而从事深符中国腐恶传统的农村痞子暴动，不再使用工人作炮灰。即使是在40年代后期在城市里和国府捣乱，靠的也是学生愤青而非工人。我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与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却毫无渊源，乃是典型的红色幽默。

这种红色幽默不止中国一家，凡是国际共运猖獗之处，必然是资本主义最不发达、工人运动也从未成过气候的国家。整个苏东帝国如此，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如外蒙、北韩、北越、柬埔寨，中南美的古巴就更是如此。蒙古、北越、柬埔寨、古巴等国，革命前就连产业工人都找不出来。

这还不光是个欺世盗名的问题，它更反映了国际共运那种伪劣假冒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互不兼容的关系。如所周知，从列宁到毛泽东，共产党人从来最恨的不是右派资产阶级，而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翻开《列宁全集》立刻就可以看出，他写的最多的驳论，还是辱骂“工联主义”、“第二国际”。这其实是李鬼遇到李逵的恼怒。

反过来，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与共党竞争工人，而且也最能识破共产主义的邪恶实质，在这点上远远超过了民主国家的右派。人类历史上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反共经典文学名著《动物农场》、《1984年》不是右派写的，而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乔治·奥威尔写的。他之所以要写那两本历万世而不朽的名著，完全是因为国际共运劫持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名义，在人们心目中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明白了上述基本常识，则不难洞见，钱教授呼唤的不是从未被引入中国、遑论留下“遗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冒充社会主义的恶魔，也就是作恶累累的毛泽东主义。这两者的区别，凡是文明人都看得出来，最根本的还是个手段问题。真社会主义是为弱势集团实实在在地谋福利，走的是议会道路，使用的是合法手段，而共产党则蓄意煽动仇恨，撕裂族群，欺骗教唆煽动组织指挥暴民，挑起“阶级战争”，推翻政府，实行盗用阶级名义的一党独裁。不幸的是，中国从无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传统，却具有无比深厚的毛主义传统。在当前社会危机极度深重险恶时呼唤假冒的“社会主义”，无异于呼唤毛主义，势必把中国再度推入血海。

四、资本主义基于利，社会主义基于义

所谓“利”与“义”，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荀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得清清楚楚了。用现代话语来说，“逐利”是人类的生物性，乃是人类天生的冲动，并不需要学习，更不需要提倡鼓励；而“取义”则是人类的社会性，也就是人类为了群体合理生存设计出来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功利设计，需要以洗脑的方式注入社会成员大脑，战胜逐利天性，才能在个体中建立。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化性起伪”，也就是用后天教育改变先天人性，人为建立起行为规范来（“伪”是“人为”的意思）。

从社会效果上来看，“逐利”与“取义”完全不同，前者乃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借用我党的话来说，也就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竟然把生产力看成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却看不到隐藏其后的私欲，当真是出类拔萃的“隧道眼”），而“取义”则与生产无直接关系，其功能主要是调整社会财富分配，在一般情况下起到的是刹车而非油门的作用。

明白这简单常识之后，则不难看出以下的一系列必要条件链：要脱贫致富，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要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释放私欲那个第一推动力。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造成一种社会环境，确保最大数量的社会成员能尽己所能地逐利，而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机所在。

在迄今人类实验过的所有生产方式中，唯有资本主义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使社会财富在短期内便呈现爆炸式增长。这不但为欧洲、澳洲、北美、东亚四小龙的实践证明，而且已经、正在、并将在咱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得到证明。任何敢于面对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奇迹，完全是我党挂羊头卖狗肉、偷偷摸摸走资的结果。很明显，要圆了绝大多数中国人那如此难圆的强国世纪梦，就只能坚定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下去，起码“五十年不变”。

但问题在于，若是不加制约，光造出一个能使得人类生物性（其实也就是兽性）能够充分发展的社会环境来，那社会迟早要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最后造出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演成深重的社会危机，最终引起玉石俱焚、生灵涂炭的全面暴乱，造成社会的大幅度倒退。而这不幸就是中国既往两千年的周期循环史，如今中国再一次来到了那永恒循环的暴乱期前夜。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人类便不能不发明出一系列的制动系统来，由此产生了人类的社会性，它与人类的生物性互相撷抗，构成了自控系统中的“起动”与“制动”两大撷抗机制，使得社会问题在积累为危机之前便能迅速地得到解决，不至于酿成祸国殃民的暴力革命。

人类的社会性中，最重要的一套就是所谓“道义”。社会主义思潮就是源出于此。它不是马克思那科盲标榜的“必然实现的客观规律”，其实不过是人类基于自己制定的道德原则规划出来的理想社会罢了。

不幸的是，一个可以运转的社会，决不可能是某个道德原则的展开或物化。要具有可行性，它的运作机制首先必须符合人类天性，可惜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恰恰忽略了人类自私自利天性，所以它根本就是不可能运转的。

这就是无论打着何种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改革实验都统统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苏式“社会主义社会”不必说，就连欧洲那些已经改造得相当成功的准社会主义国家诸如北欧诸国，或是一度实现了重大企业国有化的国家诸如英国、法国等，都因为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而不得不拍卖国有企业，掉过头去重新走资。也许可以说，20世纪不但是共产主义被实验证伪的世纪，也是社会主义理想惨遭挫败的黯淡世纪。

但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理想惨遭挫败，并不等于它的全面失败，更不证明它作为一种国际运动就此失去了存在价值。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可能获得全面胜利，但也不可能全面失败，这是因为一个常态社会（亦即实现了真正的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能没有制动系统，而究其本质，社会主义起到的乃是“刹车”的作用。一部汽车当然不可能以刹车取代发动机运转，这就是人类无法建立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但汽车也绝不能光有发动机没有刹车，而这就是为何如今西方先进国家，哪怕最保守的美国也罢，其社会建构中都含有社会主义成分，区别只在于多寡而已。

以上所述，倒是犯了我反复抨击的“以文学比喻代替论证”的中国伪知识分子的顽症。不过鉴于中国伪知识分子们的惊人智障，似乎也只有用公元前的哲人布道方式疗愚才行。

其实我已经在旧作《从糊涂走向更糊涂》一文中给出正经论证来了。那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思潮驱使下的工人运动，使得西方国家进行了程度不等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劫富济贫”，使得财富分配不至于严重

不公，保障了弱势集团不至因资本家残酷剥削而堕入赤贫。这不但化解了社会政治危机，而且为社会总体消费水平设置了一个安全线，避免了毁灭性社会经济危机（如30年代世界性大萧条）重现，保障了社会经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严格说来，如今西方先进国家实行的既不是19世纪那种经典自由资本主义，也不是北欧式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杂交，准确说来应该是“资本主义为主，社会主义为辅”。用国人热爱的模糊表达便是“资正社奇”，既有资本主义油门，又有社会主义刹车。

五、今日中国需要的是“独立运动”

钱老先生正确地看到了中国今日正在向30年代回归，也正确地看到今日中国社会彻底缺乏撅抗机制，可惜在这两个问题上，他都未能入木三纳米，连皮相之见都谈不上，令人不能不为之扼腕。

诚然，今日中国确有向30年代回归模样。不过，这正是我党在倒行逆施30年后，终于开始改恶从善的表现，值得鼓励与表彰。我不但在一系列旧作中反复肯定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社会从反动黑暗的极权（totalitarian）社会逐步进化到威权（authoritarian）社会的伟大变化，而且在旧作中给我党打破了坚冰，指明了航向，题目直接就叫《逐步回到“解放”前就是改革的努力方向》。

但不能不承认，眼下的政治改革还远远没有回到30年代的崇高的出发点。无所不包、统治一切的党天下虽然被私有化有限地突破了，但中国人还至今没有重获49年以前拥有的全部自由。党至今拒绝从政府、司法、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媒体等界全面退出，还是那个包揽一切的黑社会老大。这和30、40年代的中国社会的光明模样完全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正因为此，当今中国才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官僚资本财团统治，堕落成南美那些下流国家，使得走资成了恶性走资。这与国府统治完全是两回事。任何一个稍知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同志，哪怕是费正清那种亲共左派人士也罢，都承认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是个大杂烩，根本不是我党诬蔑的“官僚资产阶级”。只有在我党那“无产阶级先锋队”统治下，中国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由官僚资本财团统治的下烂国家。这种趋势若不迅速扭转，迟早要再度激发大乱。

不仅如此，“解放”前的国府之所以比共党先进到不可比拟，恰在于它有内部擷抗制衡系统提供了自我完善机制。主要的制衡政治势力不是钱老先生心目中的中共叛国集团——那些人只会促成社会发展的恶性变化——而是所谓“第三势力”。如果不是中共叛国集团在苏俄帝国主义主子支持下发动内战，分化瓦解了第三势力，则今日中国早就成长为一个西方式的文明国家了。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所谓“训政时期”，国府的司法、警察、文化、教育、研究、新闻媒体等界都是独立的。这些重要部门构成了常态社会必备的擷抗制衡机制，从根本上杜绝了包揽一切、进而达到“权钱同一”的完美理想状态的党天下的出现。

因此，要对症下药，就必须在中国发动全面的 “独立运动”，礼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政府、军队、公检法、监察、情治、媒体、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领域逐步退出，让这些部门统统变成伟大领袖生平最忌恨的“独立王国”。当务之急是首先实现司法界和传媒界的独立。做不到这两条，则中国永远无望变成法治国家，也就绝无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实行费厄泼赖，化恶性走资为良性走资，兼顾“效率”与“公正”，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从而逐步化解深重的社会危机。

要作到这一点，当然需要全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但这不是靠钱老先生主张的“讲政治”能做到的。与钱老先生相反，我认为近年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发生的“去政治化”是进步的表现，它的出现其实与钱老先生一厢情愿地自认“始作俑者”没什么相干，乃是商品经济引入中国后的必然结果。

我之所以认为它是国民成熟的一个指征，乃是因为既往的中国伪知识分子已经被毛共彻底腊制成只懂“斗争哲学”、只会玩空头政治、只醉心于为自己夺权的纯政治动物。这种局面一日不扭转，则中国当永远不会有为自己而不是为政客争利益的民主斗争，也就绝无可能引入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

六、中国有必要引入社会主义运动

我觉得，从中国的特殊国情来看，中国确有必要有意识地引入社会主义运动。不过，这和钱老先生的原意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须知中国最严重最可怕的隐患，乃是毛那些简单而极度有煽惑力的口号诸如“工农翻身，当家作主”、“造反有理”等等深入人心，完全主宰了工农大众的内心世界。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生前就预见到他死后会发生右派政变（＝粉碎四人帮），为此特地发动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反修防修，为颠覆今日中共官僚财团的腐败统治认真进行了彩排和预演，而这就是现代中共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最大的噩梦，毛泽东思想极有可能在未来变成敬爱的党中央的催命符。

要破解这威力无穷的催命符，唯一的办法是用“李逵”去赶走“李鬼”，在中国引入货真价实的工人运动，使得工农大众能享受西方先进国家人民大众拥有的基本权利，在受到虐待或不公正待遇（诸如无理解雇）时，有工会为自己鸣不平；在工资微薄无以养家时，有工会代表大家去跟老板谈判，要求增加工资，行不通时就组织大家去示威游行乃至罢工，等等，等等。工农大众有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正常渠道，自然也就不会在走投无路时，效法毛泽东揭竿而起了。

要达到这个目标，前提是两个，第一还是上文说到的“独立运动”，亦即结束共党御用“工会”只管发电影票送花圈的下流笑话，使之成为真正的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第二是完成社会全面的“去政治化”，避免“逃杨归墨”，使得从共党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工会成为不受一切政治势力渗透、控制、干扰的真正独立组织，去为自己的利益斗争，而不是去为某个或某派野心家作炮灰。要做到后面这一点，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尽一切努力，把“为自己而不是为政客们争实在利益才是真正的民主斗争”的常识，灌输到愚民心目中去。

不幸的是，我党惊天动地的愚昧，在对待工人的态度上暴露得最突出。如前所述，本来国际共运乃是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跟工人运动毫不相干。但蠢党弄到后来竟会被自己的欺骗宣传所蛊惑，真的相信工人是改天换地的主力军，于是便把工人阶级当成了心腹大患，一遇到工人闹事就一定要铁腕镇压，与从宽对待闹事学生判若泾渭。这一点在89学运中表现得最明显。

因此，我党决不会容许独立的工人运动发生。对此，我给伟光正的教导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尔等作为万民所指的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死仇不是考茨基，而是毛泽东。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要求的不过是社会公正，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要的可是尔等及其子孙的命。邓拓同

志早就说过：“堵塞不如开导。”这里面的祸福利害，尔等这就去垫高枕头好好想想吧。

2007年4月28日

——————————————————————

附录：

钱理群:20年来思想界的重大失误

20年来思想界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认真清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潮

80 年代的事情，我好像也是始作俑者之一。今天需要来反省一下。我觉得，当时我们这批人还是从中国的问题出发的，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的。比如说80年代，我也是比较强调纯文学，虽然我自己的研究路子并不是纯文学的，但我还是关心过纯文学的。那么，这个很简单，我们是针对文革带来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政治对于文学构成的一种困境，当时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才提出的。实际上，当时我们提出二十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也带策略性的，正是为了打破文学史和政治史等同的事实。应该说这种提法，我至今还是觉得，是有意义的问题，决不是假问题，而且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今天回过头去看，你强调纯文学是遮蔽了一些东西，遮蔽了什么东西呢？其实，当时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那种政治性的反抗。但就理论来讲，它遮蔽了实际存在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八十年代也存在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遮蔽了它，遮蔽是带有策略性的，因为我们处的位置不便点破。但是，实际上遮蔽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权力的关系。那么，这个背后其实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党内的改革派的一次合作，这本身是有问题的，但问题在哪儿呢？特别是，当我们这种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派，包括二十世纪文学这个概念逐渐被学术界接受，成为主流派，甚至进入教科书，通过文学它影响了下一代，但这个影响不一定好。我很紧张，因为当时我们遮蔽、忽略的东西可能给年青的一代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始作俑者的日子不一定好过，老想着这些跟自己有什么责任。因此，到了九十年代，当然也因为内在的各种矛盾的暴露，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我们的文学受到了权力和资本这两者的影响，而且这权力和资本它又是和最新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互相纠缠着，

互相渗透着，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形成对文学，对整个思想，整个社会发展的巨大的压力。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我们要强调纯文学的关念被遮蔽的东西就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所以，我完全能理解，当年的鼓励者，为什么他们现在率先反过来对此进行反思。我觉得，他们不是赶时髦，而是出于自己的一种责任，自己认识自己当年提倡的可能遮蔽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反思并不意味着对他原来提倡的东西要完全否定的。

现在为什么不大谈纯文学，我要着重讲权力、资本、新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的对文学对社会的一种破坏性作用。我们现在看到原来遮蔽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因此我们要强化这个问题——按我的理解，这个主题是这样产生的。我觉得现在要讨论我们现实中国是什么样子，有很多分歧在于，我们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社会？这很像 30 年代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一样。而我的认识是，我经常想起鲁迅的一句话，鲁迅说，旧病没好，新病又来了。这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既有前现代又有后现代和现代一样，我们现在的社会既有旧病，一定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专-制，这是我的理解。旧病还在，没有完全解决，新病，资本所带来的，它和权力勾结起来，这样造成新病、旧病并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认识。

我的另外一个认识就是，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现在的中国和 30 年代的中国非常像，好象历史在重演。其实 30 年代国民党的统治是发展的，也是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产生了两极分化，上海是最突出的。国际上，我个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新的种族主义正在兴起。美国人的生命比其他国家人的生命更重要，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不是种族主义吗？而且，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英美绥靖政策，在纵容这样一种法西斯化。我觉得，历史好像正在重演。问题是，30 年代面对那样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时候，我们有资源可以对抗。比如说，面对德国法西斯，当时有英美的自由主义，还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对抗。当时，我们国内，有国民党所代表的国民统治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来对抗。但是，我们今天拿什么东西来对抗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现实？这是困扰知识界，思想界的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今天，有些年轻的朋友非常强调这样一个传统，社会主义的传统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我觉得，问题在于，社会主义

思潮是有问题，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历史经历的，它在本世纪是有问题的，它也曾经带来灾难。这样，我们现在不能把它整个搬过来。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合理性，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至少比过去看得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认为，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但是，它存在的问题，也长期地没有被研究。我个人认为，而且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遗产是我们今天面对现实可以继承、借鉴和考虑的一个遗产和资源。但是，这个资源是没有经过总结和研究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变得困惑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应该防止两个倾向，一个就是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曾经带来的弊病就本能地拒绝它，这是我不赞同的。但是我也不赞同，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整个地搬过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认为，中国知识界，一方面科学地总结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一个迫切需要，那这是中国知识界能够对人类对全世界知识界作出的一个最好的贡献。这是比较宏观地说。具体来说，听了几位的争论，我很自然地想到 30 年代，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文艺界的争论，实在是太想像了，几乎是完全重演。我想起了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叫《闭门读书论》，他有分析，有三种态度糟透了。第一种人是认同他，借机爬上去。这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不赞成的，不赞成有两种选择，一种人就是勇敢地冲上去，和他打，就是刚才旷新年所呼唤的，开展一场阶级斗争，这就是当年左翼的选择。还有一种人，周作人很低调，其实/他很自省，“我没有那么勇敢，我就退回来闭门读书，文化坚守”。类似陈思和今天说的岗位意识，这也是一种对抗，守住文学本身的尊严，守住纯真。旷新年说，你不冲上去，你就客观上帮助了敌人，不管你主观上怎样。郜元宝其实保持了类似周作人和沈从文的自豪，你可以搞，但你搞来搞去是第二流的。我守住我是第一流的。其实当年沈从文和周作人也是这样的观点。面对类似的情景，我们所能做的几个选择，周作人概括得非常好，一个就是对着干，我反抗；一个就是我守住一些东西。就我个人来说，我偏向于冲上去，这和我的性格有点关系，我主张要有战斗，要有反抗的文学。我还要再补充几句话：同样主张冲上去的，也有矛盾，也有区别，我是偏向鲁迅的立场，文学是需要战斗的，但它同时必须是文学，

这是鲁迅一再强调的。文学是斗争的武器，但这武器是文学的武器。我觉得，我们应当吸取当年的一个经验教训，我们能不能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试图说服对方，因为每一个人作出自己的选择是根据自己的生命、自己各个方面的因素来做出的，但我觉得，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对方有一定的理解和同情，而且能不能从对方吸取一定的合理因素？或者说，你认为对方是不合理的，那么，对方提出的质疑，能不能使你有所警惕，有所借鉴，以免使你的合理性走向极端。这个问题很普遍。

我刚刚开了一个语文教育的会议，语文界也正在争论这些问题。搞语文教育，我们都强调说真话，强调人的个性，强调主体。但是接着就有人批评，现在的中学生已经是一切以个人为中心，欲望泛滥，这时候你还谈写自己的话，那么，“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潮在今天还有没有应对现实的能力？这很像薛毅的批评：私人小说，它个人欲望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你还要求它继续私人化？我在这个语文会议上说，我们是旧病未去，新病又来。如果我们客观地看一下当下中小学生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是存在双重的问题。一方面，还是奴化教育，还是不能说自己的话，不能说真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强调说真话，还是有效的；但是，又有了新病，确实今天的孩子，也存在着以个人为中心，也存在着欲望的极度膨胀。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认识到“五四”话语的有限性，因此我们不能仅仅鼓励孩子写真话，还要进一步追问，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很狭窄的人，尽管你说的是真话，说的是个人的话，但这些话的价值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而我们要培养的孩子应该是一个大气的人，应该有广阔胸襟，那么他写的文章才有大气，才有很大的价值。因此，我认为“五四”的话语，没有完全失效，没有完全失去现实意义。但同时要看到它的有限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到文学上，它们有相似之处。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我和年轻的朋友意见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就是说，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念在今天是不是还有价值。我认为，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现实，它还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的。但同时，它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得到一种一致，就是反抗权势和资本的结合。这一点大家可以达成共识，但具体的路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必然会互相冲突，互相争论，这都是正常的。

听国内网友谈国情

一、河水有多深？

最近国内网友金唢呐先生光临本坛，向咱们这些海外赤佬介绍国内真实国情，让我想起“小马过河”的寓言来。此乃文革前小学教材，不知道文革中上小学的中帮菜以及新新人类是否学过，为安全起见，还是罗嗦一下吧。

小马过河前，一头大象告诉它河水非常之浅，才到它的膝盖。小马刚要下水，不料一只松鼠却紧张地叫住了它，说河水非常之深，前两天才淹死了它的兄弟。小马给弄得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该听谁的好。直到老马（悲鸣）来了，告诉它河水既没大象说的浅，也没松鼠说的那么深，大概会淹到它的肚腩皮。小马涉进河去后，发现果然跟它妈说的一样。

这就是读金文时我时时想起的童话。老金其实也说了，网上从大象到松鼠甚至蚂蚁都有，各人眼中的河深完全不一样。东海先生的观感不必说，就连冷酒独酌网友对中国国情的观察也和老金不一样。那么，我辈隔岸观河的海外赤佬到底该听谁的？

这当然是我时时痛诋的文学比喻，毛病显而易见：影响观察的因素决不是童话里的“身高”那么简单，观察者所处的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收入、阅历、洞察力、接触面等等无数因素都会影响观察结果。

其实用鬼子的话来说更准确：如果你听大夫的，那么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卫生的；如果你听军人的，那么这世上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如果你听卖人寿保险的，那么这世上就没有不会导致你丧生的行当。所以，就算观察者竭力排除主观情绪干扰，职业养成的思维定向也会影响结论的客观性。

老金其实也强调了这问题，指出我不能通过网络看中国，许多网络言论不过是在作戏，当不得真。例如所谓“台海危机”也就只是在网络上闹，他在国内根本就没有感觉，云云。

我觉得此话非常有理，只是不适用于我针对网络言论进行的疗愚。那道理很简单——戏子们只会作豪放英勇英明状，甚至有可能装坏人，但绝无可能装白痴，说出愚不可及的蠢话来。

某网友质疑老金的介绍的客观性，说老金对知识分子的心态了解很可能失真，因为人们不敢说出真心话来。此话当然也有道理，但我觉得此问题未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金的观察。

看老金的文字，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此人的阅历和心路历程和我惊人地相似，大概是我的同代人吧。我们那代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害怕我党，简直是怕进了骨髓去，以致我跑出国来20年后，至今还在筛糠不已，俗称“小腿弹三弦”。

这种心态在小帮菜中就没有那么突出。他们当然也怕我党，但他们的恐惧心理是没点灯的月夜，而我辈的则是冲胶卷时没开灯的暗房。这也是代沟之一。

过去有位国内青年网友跟我来信，我第一封信就劝他不要再上网写文章。他没理解我的意思，自然也就没听我的劝告，让我每见一帖都又喜又惧。可等他后来真的消失了，我又怅然若失起来。

有一阵子我跑到国内一位小友开的论坛上去玩，从头到尾蒙面，根本不敢使用“芦笛”的名字。那人大惑不解，来信问我为何这么做，我说我大概早就让国安叔叔挂上号了，用芦笛的名字只怕要连累你。如果小帮菜也像我辈一样小腿时时弹三弦，那就绝不会产生这种疑问了。

青年国内网友立刻就要告诉我这是杞人忧天。这其实也不错，老帮菜的恐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惯性思维。现在国内知识分子的安全系数，根本就不是毛时代可以梦见的。只要不是太出格，政府也实在顾不过来了。

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老金介绍的知识分子心态调查的客观性。那是两方面的：主观上，他接触到的中小帮菜没尝过厉害，所以不像我辈老帮菜那样三缄其口，非至爱亲朋不说实话，相对来说开放得多（当然不是在政治学习会上）。客观上，我党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控制也极大地弱化松弛了，政治空气相对宽松得多。

国内同志大概可以证实上面说的这些。90年代初我回国去，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抱怨，所有的人都在痛骂我党，痛恨世道不公，世风日下，风俗浇薄。我

走访的师长同学无不如此，倒让我听得非常不耐烦。88年回去奔丧就更不用说了。我当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山雨欲来：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如此不满，那结果当然是社会动荡，除非我党铁腕镇压，否则一定要出大乱子。

但后来回去，气氛就开始变了，越往后变得越明显，大家逐渐停止抱怨，不再讲国家大事，话题变得只有一个：钱，怎样才能多出钱财，快出钱财。没谁再对国家命运社会弊病那些大而无当的破事感兴趣，普遍都对生活的大幅度改善相当满意。我那些工人铁哥们儿当然不满，怀毛怀周，这我已经如实报导过了，但也就是骂骂而已，除了少数人外，大部分同志也没真到饥寒交迫、再也活不下去，只有“奴隶们起来起来”一条路。个别脑袋灵活的同志甚至还发了财。

所以，去政治化的确非常明显，并不是某位网友说的“躲政治化”。80年代、90年代中期以前的知识分子为何不“躲政治化”？为何天天半公开地骂我党？难道如今的我党比那阵子还凶残？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毛时代，仍然有可能了解到周围的人是怎么想的，尽管非常有限。早就反复交代过了，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是在70年代完成的，后来上网不过是把30多年前的心得写出来而已。但即使是在那阵子，我这些思想也统统和密友交流过，只是他们都是老同学，并非同事，没有利害冲突，因而不会出卖我而已。我在和他们的密谈里甚至使用过“Ｂ毛”的脏字，那可是枪毙十次还不够。

就连在公开场合我都忍不住要使用春秋笔法骂我党。记得我在旧作中介绍过，“评法批儒”那阵子，我荣任“车间理论小组”成员，一项任务就是给大家讲解马列。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就坐在我身边，可我欺负他们是睁眼瞎大老粗，郑重其事地说什么：我们要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让外国阶级弟兄也过上我们这样的幸福生活，每月20斤大米，10多斤杂粮，二两菜油，半斤带骨猪肉……

这些Ｐ话，有点初中文化的积极分子都能听出真实涵义来，可我从来没被人举报过。不过那也确实无法举报：你凭什么说我是诬蔑而不是歌颂国内大好形势？！我早想好了，谁要举报我，我立刻就倒打一耙：难道你认为咱们过的不是蜜罐里的日子？难道我描绘的不是国外那些吃糠咽菜、挣扎在死亡线上、

处于水深火热的阶级弟兄望眼欲穿苦苦盼望的幸福生活？！对这种幸福生活你难道还不满意，莫非想变天？

因此，愚以为，根据国内政治生态否定有了解周围人群的心态的可能性并不能成立。老金生动介绍的周围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我上次回去了解到的差不多。

更别说有的事根本没必要演戏，例如老金说他们学校的教师去庐山旅游，大家都去瞻仰毛在庐山讲话的席位，毫无兴趣去看就盖在附近的彭德怀纪念馆。以我迟钝想象力，实在无法想出这么做会是出自避祸心理，更无法理解那又怎么能讨好领导，换来恩宠。

那老金介绍的他们参观滴水洞的对话就更是真实心声。某同志嘀咕道，大饥荒年间饿死那么多人还花几个亿修这无用场所，另一位同志振振有词地驳道，人家家里死了那么多人，花这点钱算什么。第一位同志讲的是真话就不必说了（由此也可见国内之宽松），第二位同志讲的也确实是心里话。人家真是这么想的。如果是积极分子显积极，他就只会说：这是人民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所以即使在那种艰难岁月，为了表达他们对伟大领袖恩情的感激，他们也克服了巨大困难，为他老人家自发修建了这个休息的地方，由此可见领袖和人民是多么心贴心。

二、老金说了些什么？

这个标题似有贬低老金表达能力的涵义，不过我看他虽然说这么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懂了，所以不管他是否多心，我都得来再用轱辘笛解释一下。

首先要对某些网友解释的是，老金是试图向海外荞糕们介绍国内的真实情况。这就是说，那是一种事实陈述，并不是价值判断，更不是抒发他的爱憎喜恶。当然，他说的是否真是事实可以另说，但没有任何根据怀疑他确实是想努力尽己所知向大家介绍他眼中的客观事实。

所以，我等可以质疑他的介绍是否全面客观，可以指出何处失实，可以论证他的视野必然受限，但似乎不宜因为他介绍的情况不符合自己的主观心愿就

认为他反对民主，也不宜因为他描绘的图景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便拒绝接受，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大家都是成人，我想这最简单的道理还是能理解的吧？

因此埋怨中国人民六四才过了十几年就忘了民主就更没意思了。六四并非什么民主运动，不过是全民的错觉而已。就算它真是民主运动，人民在十多年后真的抛弃了他们当初为之献身的神圣事业，那又便如何？我辈还不是只有接受这无情的现实，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作出胡平式的嫉妒弃妇状来辱骂“犬儒”、“奴才”，只能更加让人民唾弃。

那么，老金说了些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条理如下：

1、比起80、90年代来，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是增加了。在可以遇见的将来不会出现大动乱，遑论“中国崩溃”。

2、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政府摸索出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减压阀”，缓解了社会危机，主要是经济起飞使得社会各阶级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即使是工人老大哥和农民老大爷也都如此。贪官污吏们当然是经济起飞的最大受益者，但人民也在不同程度上尝到了甜头，诸如百万农奴站起来，不但去逛新城，而且去住新城，子女成了大学生，自己搬到了城里去作苦力等等。但这是否属于“可持续发展”还有待于时间检验。

3、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朝野都没有这种要求，既无压力也无必要。我党只想维持现状，内部没有什么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统统是既得利益派，只想牢牢掌控党天下，绝不会拱手让权，而民间也没有什么民主诉求。知识分子普遍信奉“狼羊律”和“点菜律”，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实行西方人道主义那一套，必须“治乱世用重典”（或曰杀人治国），民主只能加剧贪污腐败，造成失控乱局。

4、与80年代不同，人民对社会不公的反感度极大地降低了，对贪污腐败的耐受力与日俱进，因此，社会不公并不会造成触发政权垮台的严重社会危机。

5、毛主义并不是我党的催命符，各级党官僚把毛当成给他们带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的权力的大救星，知识分子将他看成民族英雄，愚昧的工农把他当成菩萨拜，新新人类羡慕他搞女人的风流本事，大众眼中的毛多如牛毛，并不是我看到的那根Ｂ毛。

总而言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实行实质上的政治改革，取得突破性社会进步，但也不会出大乱子，甚至崩溃。

这当然是我的肤浅理解，如果失实或不完全，敬请老金指正，并向他道歉。

以上所说，我有保留地同意。其实我以前就多次说，在我有生之年大概看不到我党垮台了，还特地劝郑义死心，让他早早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我和老金的分歧，只在于我还多了那么一句话，便是“我党执政撑不过百年去”，而且多次说了那理由，就是党是靠狼羊律来组建运转的，这必然导致权威逐代弱化。虽然在小胡手上没问题，但再传下去就不好说了，而毛主义必然是将来党内权力斗争的最强大的理论武器。这是纯理论分析，是否正确其实不取决于对现状的观察。

三、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这就是老金那系列在我心中引起的复杂感觉。喜者，它证实了我对时局的估计——近期内中国不会大乱；忧者，它证实了我对未来的预测——将来中国一定会大乱。

其实驱使老芦上网劳作不息凡七年的最主要的感情动机，还是在文革中看怕了血腥和肮脏，从书上看够了近现代史上的无休无止的流血与破坏，生怕中国有朝一日再度堕入无边血海。我之所以向国人介绍西方文明常识特别是有关民主的常识，希望中国有朝一日能实现民主，就是出于对未来大乱的恐惧，而我之所以反对激进民主，也是出于对骤然实行民主必然引发大乱的恐惧。

说到底，我真正关心的是人民的身家性命财产福祉与安居乐业，不是某个神圣的道义原则，更不是自己的政治宗教信仰。如果中国现行专制制度能保证中国脱出两千年的周期性血光之灾，则我根本就不在乎能不能实行民主，甚至不在乎是否实行政治改革。在我看来，民命之树长绿，而道义和理论总是灰色的，无论是道学家还是思想家，只要真有点天良，就该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当成终极目的、最高原则，这就是唯一可以而且应该信奉的政治宗教，舍此之外更无一物。

可惜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偏偏是世上最不知好歹、最不识抬举、最不知道珍惜自己性命的的下贱民族，尤以所谓“知识分子”为甚。在咱们这儿，所谓大英雄，就是敢于牺牲亿万人民性命去实现自己的野心、道义原则或政治理想

甚至捍卫一己“尊严”的丧心病狂者。“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咱们举国奉行的英勇观。一个政治家越敢于牺牲民命，牺牲规模越大，“英雄气魄”也就越足，也就越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敬佩、顶礼膜拜。

两段领袖语录在人民中引起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最是令人凄然泪下。一段是先总统蒋公在抗战爆发前夕的讲话：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当时人民各界的反应如何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这段语录激怒了热血愤青，认为那是怯懦无骨的表现，以致它一直被我党当成蒋公卖国的铁证，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中，至今还被大陆伪知识分子们视为国耻。下贱愤青愤中愤老们竟然白痴到看不出来，这话只体现了蒋公作为负责的国家元首的崇高的天良与职业伦理：一旦以积弱之身与强敌开战，蒙受惨痛牺牲的决不会是他家，只会是草民包括那些白痴下贱愤青们。要他慷慨激昂又有何难？但麻雀请客只可能请到谷堆上。

另一段则是老中帮菜个个倒背如流的“老三段”之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原文载于毛著《愚公移山》，全句其实是“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意思再明白不过，要让全党知道，必须不怕牺牲人民的生命，才能取得胜利，什么代价都不必考虑。

另一段语录说得更明白：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这一套果然灵光，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国民党最后败给共产党，一个主要主观原因就是国军军官没有共军指挥员那种不计伤亡的铁石心肠。

我党统治半世纪，彻底扫荡了传统文化包括儒道释在内的一切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卓有成效把全民改造成了毫无人性的嗜血禽兽。政治上无论哪极，哪怕是不关心政治者也罢，个个是“拜血教徒”。

我回国最无法接受的一条，乃是就连我家的亲人，似乎都对强行使用死刑犯器官作移植毫不在乎。他们都觉得那是废物利用，何必大惊小怪？我接触过的人中，无论政治倾向如何，所有的人都认为惩治贪污的正道就是严刑竣法，

杀的越多越好。一个无比坚定的共识就是，中国人多的是，杀点算什么？毛泽东于1957年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宣布的以全人类丧生1/3换来全球实现社会主义，“还是划得来的”宏图壮志，确实已经化成了全民的宗教信仰，无论左中右，越是政治动物就越丧心病狂。

90年代王若望先生出国后，在《中国之春》（《北京之春》？记不住了）和周舵先生发生争论。周先生指出，激进民主会触发大乱，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王先生竟然重弹毛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滥调，代表全民宣布：“只要换来民主制度的建立，再大的代价也付得起”（大意）！

我当时看了那文章，震惊到失语的地步，然而就是那种只会讲毛话的同志，居然还号召大家“警惕心中的小毛泽东”。那时我和民运垃圾没什么接触，所以还不知道那其实是少所见而多所怪，和他的同袍比起来，故王老先生的“英雄气魄”当真算不了什么。

前些天蒙面大侠高寒来此捣乱，再度把尿片子当成辉煌战旗挥舞，专提自己不开的那把壶，生怕大众忘记他是何等丧心病狂，重提“28字决杀令”来强化大众记忆，蠢到居然忘记了那早就成了我一系列经典文章特别是《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系列的写作依据。

新网友可能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简介一下吧：我发动扫荡伪民运后，向暴力革命的鼓吹者提出挑战，请他们证明发动暴力革命触发核内战的概率为零。高寒先生竟然用28字一劳永逸地结果了我：“请芦笛先生给出一个风险为零的决策来”！

高先生至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知道此话只暴露了他起码的人性都丧失了，却以为那是大智大勇的表现。这种可怕现象，其实非常富有启示性，它说明我党狼奶喂养出来的中国人从根本上就灭绝了人性，以致他们的荣辱观彻底颠倒了，根本不知道正常人应该是什么样，不知道那种豪言壮语只能暴露自己是嗜血成性的野兽，丝毫不以国脉民命为念的丧心病狂者。

后来高大侠发动“天鹅绒革命”（或曰“癞蛤蟆想闻天鹅屁”政变），栽赃陷害国内毫无自辩余地的异议人士，在网上向国安诬告那些人士是他组织的伪政府成员，导致他们被捕被判重刑。犯下这种伤天害理、死后必下地狱的罪行之后，高竟然还在网上猖獗至今，并未因此变成过街老鼠，从未受到任何一个民运人士的公开谴责，光这个事实就是以证明所谓“民运”阵营完全是富集

了人渣的垃圾库。如果这些人上台，民命又得再一次变成战略家们实现自己野心的“零代价”。

我一生最黑暗的时刻有两次，一次就是1967年在街上看见造反派贴出的大好消息，说全国医疗专家给伟大领袖检查了身体，发现伟大领袖可以活到两百岁。我当时只觉得头嗡的一声就大了，双腿发软，只想坐到地上去。心里只有一个绝望的念头：完了！我再也没希望熬到他死了！

第二次就是前年朱成虎将军毅然出来代表中央宣布中国的世界战略：如果美国胆敢干涉台海战事，那么中国就要用几百枚核弹攻击美国，同时准备牺牲西安以东的人民的生命财产。

这豪言壮语让我只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痛感中国当真是上帝诅咒过的国家，绝对没有获救希望了。任何一个正常人居住的国家，哪怕是前苏联或纳粹德国也罢，绝对不会有谁敢公开发布这种伟大战略计划，而朱将军居然不怕引来文官政府的整肃，不怕在国民中身败名裂，不怕我党我军爱民如子的神话破产，出来胡说这种美国根本没人相信的疯话蠢话胡话，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那个国家、那个政府、那个人民极度反常，而他引来爱国壮士的狂热欢呼，更证明了从中央到民间，整个国家都是疯子之邦。

最令人绝望的就是几乎没有不疯的人，“民主阵营”谴责朱将军，不过是因为政治立场与其针锋相对，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在灭绝人性这点上，他们和朱完全是一丘之貉。咱们这个世界是头足颠倒的世界，什么好玩意从国外输进来都要变得面目全非，大概能高保真引入的只有大烟、海洛因、摇头丸、马杀鸡、脱衣舞一类西方文明精华。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们长了一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不管是西方什么好东西，一旦让那手指头碰上了便立即“化腐朽为神奇”。

诺曼底登陆前，艾帅心头非常沉重，对小蜜说，他就要把百万生龙活虎的美国儿郎送入生死地去了。等战争结束时，不知道那些小伙子会有多少倒在异国的土地上，再也无法还乡。但明知如此，他还是只有硬起心肠下那个命令，因为那使命非完成不可。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只会为艾帅这诚挚的内心独白深深打动，由此窥见了西方人的良心是什么，而所谓人道主义又是什么玩意儿。

其实这种内心矛盾与烦恼并不为艾帅所独有，也不为1949年前的西方独有，不必说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三吏》、《三别》的光焰万丈的名篇（其中《新婚别》与艾帅语录异曲同工，作者借新娘之口，一面哀婉地诉说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另一面又硬起心肠鼓励丈夫从军杀敌平叛，好结束苦难）、“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将功成万骨枯”等流传千古的名句，就是从蒋公那段语录中，我也读出了同样的大慈大悲。

可别说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中绝不会有哪个指挥官有这种痛苦和矛盾，就连“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都如此。谓予不信，请去看作家郑义引用艾帅的语录证明他在六四中鼓动学生市民去送死、自己逃出生天是应该的，乃是追随艾帅的光辉榜样！

这难道还不足以使人绝望？我党糟践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彻底，以致无论是恢复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还是引入西方人道主义，我看根本就没有希望。

正因为中国已经被我党成功改造成了豺狼之邦、疯子之邦（请老金原谅，我再度使用那“之邦”的话语，忍不住阿），我才为中国一时不会大乱而欣喜如狂，更为未来中国必然大乱而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四、为了全民眼前利益，中共不能垮；为了全民长远利益，中共必须垮

鉴于中国社会危机极度深重，国家最需要的是稳定，在这点上，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毛共余孽才会坚决否认统治集团和人民有利益的交叉点，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时时处处将政府视为必欲消灭的仇敌。鉴于普通中国人特别是所谓 “民主阵营”的惊人低劣素质，在这种国家，一旦骤然实行民主，则必然是血沃中原肥劲草。我完全同意老金以及他周围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西方民主至少在目前不符合中国国情民俗。

哪怕白痴也该明白这一点。早就反复说过了，民主是绅士的游戏，专制是痞子的游戏。民主制度运转的软前提，乃是参与各方都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在捍卫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如果有一方想实行“赢家通吃，不服者铁拳侍候”的狼羊律，那文明游戏肯定只会变成丑剧。

当年海纳百川网站分裂的悲剧就是证明。那阵子咱们闭门开会讨论分赃，我一再呼吁化暗斗为明争，请大家光明正大地为自己争利益，但不要搞违反俱乐部章程的阴谋活动，也不要想一派独大，赢家通吃，力争达成双赢局面。但人家明争不过，便依靠手中那点技术优势，一面欺骗麻痹我们，一面偷偷下载数据库，等到把俱乐部财产抢劫一空便拉闸断电，让我们统统翻船落海。等到我们从海里挣扎出来，募捐买被抢走了的服务器，人家还不饶，还要斩尽杀绝，为此不惜犯下欺诈罪，冒充海纳百川俱乐部成员在网上发诽谤声明，诬蔑我们非法集资，巴不得我们永沉海底。

这还是留学海外的精英，绝大部分人都有硕士以上学位，争的也不是什么大田大地，无非是一个毫无产出、毫无利润却需不断投入人力物力的烂网站，都还闹成这血肉模糊的乌眼鸡样，更何况是中国那种超级痞子烂国家？早就说过了，我党辛辛苦苦几近60年，把全国人民改造成了流氓，只有那个流氓党才能宝塔镇河妖。一旦把那宝塔推倒了，让民运垃圾流氓痞子一塌括子跑出来，all hell breaks loose，那简直是人类可能设想的最大的噩梦。

所以，我党的“高明”，就在于它通过彻底败坏人民心术，全面彻底扫荡了民间社会，造成了一种“方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有恃无恐的局面，而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完全认同这一点。这种局面一日不改变，则中国就不应该实现民主化。

迄今的世界历史表明，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都配享受民主。大陆中国人民就是此类劣等族群的一员。至于将来能否获得这种资格，那也只有天知道。只有毛共余孽才会先验地认定，民主社会是类似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到来的人间天堂。

以上乃是目前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必要性论证。从可行性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毫无这种可能。最大的障碍就是我党。除非使用暴力，我党绝对不会拱手开放政权，让他人分享。但即使不论暴力革命只能南辕北辙，在现今条件下也毫无爆发可能。

老金花了大量篇幅说明暴力革命不可能爆发也不可能成功，类似的话我早就说过车载斗量之数了。《重建常识丛书》有一卷就是《反革命书》，其中许多篇什就是专门论证暴力革命已成化石，把它当成活物谈论者完全是白痴。就连“如今中国没有志士只有骗子，因而根本不可能产生革命领袖”的无情社会

现实，我都在《关于暴力革命的识字课本》中分析暴力革命的主观条件时指出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毛共统治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中国人的信仰能力，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再不会出真正志士的国家。比较一下八九学运的领袖人物和中共烈士的表现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暴力革命党人自高寒先生以下就不敢潜回大陆，怎么还能指望其党徒大批回国去完成暴动的准备工作？”

那篇文字是2002年扫荡伪民运时针对高寒写的，几年后他就以大规模栽赃陷害国内异议人士的“癞蛤蟆想闻天鹅屁政变”留名青史，至今拒绝回国投案，把被他坑害的无辜换出来，雄辩地为我那英明论断作了生动证明。

最令人绝望的是，愚昧绝伦的中国伪知识分子们竟然和毛泽东那大老粗超级痞子一模一样，至今仍然没有“凡事必须先作必要性论证和可行性论证”的观念，越是“民主理论家”就越是如此。这结果便是出现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奇观：“民主觉悟”竟然和智力成了不兼容的东西，越是“志壮坚信民主”的同志就越是白痴。这就是他们的“四十而不惑”。

我推出《赫鲁晓夫的治国之道》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疗这 “国愚”，在此请同志们去看看第一节。

话说莫斯科当年修建地铁，原用方案是德国式的沿街挖明沟（老北京人应该记得北京的地铁就是使用这种低级手段修建的，沿前门大街一路挖明沟，致使交通阻断了很长时间）。有位年轻的工程师提出应该采用英国式，亦即先打深井，下去后再效法土行孙在地下钻，在地下掘隧道，这样地面就不会受到影响，不必沿街修筑，可以从地下钻过地面建筑物。因为掘得很深，加强了的洞壁洞顶很坚实，可以在战时用为防空洞。

这小青年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却被总工程师反对，该同志是苏联最有名的建筑师，即使是赫鲁晓夫那高干也无法压倒，只能把争论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当那权威说英国方式太昂贵时，斯大林敏锐地打断了他，说：“你的工作不是判断财政上是否可行，那是政府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告诉我们那方案在技术上是否可行。”

斯大林此语，说明他的脑袋是何等清晰。人家不但知道要干什么事前必须先知道是否可行，而且还把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的职权分得清清楚楚：行政领导的权责是判定财政上的可行性，而技术领导的权责是确定技术上的可行性。

两者都不能相互越权。哪怕是他那为所欲为的大独裁者也不会侵犯技术领导的职权。如果人家说技术上不可行，那他无论如何权势薰天，也不至于违反人家的劝告蛮干。反过来，如果某方案技术上可行，则财政上是否可行、是否划算就是政府考虑的事，轮不到总工程师插嘴。

这不过是西方是人都知道的烂常识，可惜中国人就是不懂。如果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的一个天才有这点烂常识，那就绝对不会闹出“全民炼钢”的丑剧闹剧悲剧来，在饿死了几千万国民同时，还使得国民经济彻底崩溃，财政彻底破产，工农业全面垮台，直到1965年才算从深渊中基本挣扎出来，但仍然远远没有恢复到1957年水平（在我记忆中，1957年是毛共治下供应最好的一年，但家长说其实此前特别是1953－55年供应更好，但我那阵太小，毫无印象）。

最可笑的是，伟大领袖似乎也朦胧意识到了世上有“可行性”这个东西（顺便说一句，古代中国人似乎没有明确的可行性观念，反正经典策论中很少作可行性论证，常见的还是基于利弊分析的必要性论证，不信请去看《古文观止》中的策论）。据李志绥大夫说，58年大炼钢铁那阵，毛常常自言自语：如果小高炉真能炼出钢铁来，那么西方人为何还要花钱办昂贵的大工厂呢？他们又不是傻子，是不是？

没有哪段轶事能比这更生动地凸显泥腿子大老粗的白痴治国之道了。毛或许在打仗时有估计胜败可能的本能，但在建设中竟然连最起码的可行性观念都没有。就算在朦胧想到这问题后，也居然连怎么去判定有无可行性都不知道，要独自一人苦苦思索！如果是一个西方的弱智庸人去坐他那位置，又岂会去为此类技术事务独自冥思苦想、思而不学则殆？只需责成某部下负责，成立个专门的职能委员会（commission），把冶金专家召集来调查研究一番，写份报告出来就完了。连这都不懂，还配治国？

最可笑的还是他完全是个土棍子，乡巴佬，一辈子只知道“为省一寸布，撕破一条裤”的false economy（假省钱）。在他那超级高聚焦隧道眼中，只有中央政府花出去的钱才是钱，地方政府和民间花费的钱就不是钱。之所以要全民炼钢，无非是政府拿不出钱来盖昂贵的大工厂，所以让民间义务捐献，“土法上马”。他就不想想，用这种毫无计划无法管理的全民战争去从事经济建设，所费的那些人工和材料简直是无法计算的天文数字，就算炼出来的是金

子，那也只能是得不偿失。就算大跃进没有引来大饥荒，每个小土高炉炼出来的都是优质钢，国民经济也要彻底破产。这种治国白痴，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还真找不出第二例来。

他不但不知道可行性，还害怕面对现实，因而不许旁人作可行性论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记录了他的一个内部讲话，那阵子他发现原来苏联也不是搞社会主义的权威，想独创社会主义道路，又是写《论十大关系》，又是提倡“双百方针”，在中央会议上大肆鼓动繁荣文艺创作。某人插话说，现在纸张供应很紧张，大概无法做到这些设想。他立刻斥道：我们在这儿说百花齐放，你却来说没有纸，真扫兴！

这种鸵鸟心态，便是后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国策的由来（请小帮菜无要误会，这可不是色情论坛用语）。

悲剧还在于这种白痴是遗传性的，凡是民运中的毛共余孽，统统遗传了这种先天愚。和毛泽东一样，他们自己不但不知道事前必须作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而且还不容许别人作这种论证。芦某之所以当了大共特、大共奴，无非就是免费代他们作了这种论证，告诉他们推翻共党实现民主，在现阶段既无必要又无可能。

但悖论恰好在这里：共党统治现在万万不能垮，否则非但不能实现什么民主，还要出现半个世纪都收不了梢的大屠杀，只怕全国人民十停要去了七停。因此，维护共党统治为现在全民利益所需。但如果共党不垮，中国就绝无可能脱出周期性大血崩的循环，绝无可能实现长治久安，将来一定会大乱。危机储蓄时间越长，失控后爆发的烈度就越猛，灾难也就越不堪设想。要避免这长远悲剧的出现，就只有效法西方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这就需要礼请共产党人逐步出境，但这是不可能作到的，只有必要性而无可行性。因此，如今中国虽然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但仍不会有什么好结局。这前景在我看来乃是明明白白的，不必非要过到那天始知，对此我准备在另文中作详细论证。

2007年7月4日

未来中国社会走向预测

一、社会稳定性解析

所谓社会稳定性，乃是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健康状况的量度（measurement）。如果两者之间关系紧张，社会就不稳定，如果两者关系和谐，社会就达到稳定。

具体来看，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两者之间既有利害冲突，又互相需要、互相依赖。无论哪种政体的统治者都要掠夺人民，区别只在于专制政权把钱抢去后，躲在暗房里操作，不许人民追问钱抢去后都干了些什么，然后再实行“国家拿大头，个人拿小头”，而民主政权则被大众盯死了，连零头都不敢拿，只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老老实实向人民报账而已。

这当然不是说凡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合理的。例如美国政府抢了人民的钱，发兵去打伊拉克，军费一天起码上百万（“血税”不计），那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白痴布什总统并没把那钱揣自己腰包里去，据说是花在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上了。但这种无私行为您说对美国人民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又如毛政权无情压榨子民，使得工农大众的平均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解放”前，但那抢去的票子绝大部分并没让党国领导鲸吞了，而是拿去塞狗洞：不是去“全民炼钢”，就是去建造竣工第二年就因泥沙严重淤塞而不得不炸坝排沙的三门峡水库；不是去修建根本没有能源供应，因而竣工后无法投产的武钢，就是去援助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和老大哥比赛谁才能更慷慨地收买穷兄弟，把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老挝、柬埔寨、古巴乃至非洲黑兄弟当成高堂双亲，顶在头上奉养，以便日后人家在咱们孝心稍有不足时便翻脸，把孝子们恨进骨髓里去。这就是遗老遗少如今怀念的毛时代的清廉。

反过来，如今我党之所以让遗老遗少们痛恨，正是党国领导终于发现，有如千辛万苦地把子民的票子抢来，为的不过是去塞狗洞，不如把那钱的一部分

自个揣了，再拿剩下的去干点真正能使国民富裕起来的正事。论清廉程度，毛共当然决非现代中共可比（毛泽东等少数人的穷奢极欲不计，这里是整体比较），然而您说这两种作法哪种对人民更有利？

可见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政府主要是抢谁的钱？第二，政府把钱抢去后是否装了腰包？第三，即使没装腰包，那钱是否用来最有效地改善国计民生？如何看这些问题，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民对政府是否满意。

本来，无论东西方，政府的工作就是抢人民。你不许它这么干，世上也就没有政府了。没有政府来魏武挥鞭，痛打恃强凌“羊”的“狼”，那人类社会立刻就变成赤裸裸的丛林，最后大家玉石俱焚，谁也没好处。所以，为了全民共同利益，大家别无选择，不管怎样肉痛，还是乖乖听任政府来咱们怀里抢票子算了。

这就决定了人民和政府之间本来就具有敌对可能，由此引出了社会稳定性问题，亦即如何解决两者之间潜在或已经爆发的冲突的政治艺术。

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如所周知，便是民主制度。政府（含国会）由各阶层各集团的代表选出，不但决定哪个阶层该抢多少钱，抢来的钱该怎么用，事前向全民交代预算，而且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独立于政府的监察机构和民间监察组织，不错眼珠地盯死那些主事的官员。纳税人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如同防贼一样地防着政府，便基本上杜绝了“劫贫济富”、“抢票子塞狗洞”以及“国家拿大头，自己拿小头”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政府知道自己能力极度有限，不是千手千眼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若要出来充当包揽一切的阴天大老爷，那必然是动辄得咎，面面得罪人，所以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只管非管不可的公共事务，其他一律不管：该怎么办学搞研究提院士是臭老九的内部事务，该怎么打仗是军人的事，该怎么投机倒把买空卖空是资本家和股民的事，该怎么判案是法院的事……不管是好是歹，跟本政府毫不相干。

所有这些领域都有独立的监察制衡机构，自行解决纠纷。谁要是立下战功未赏，或没评上院士，或被资本家无理开除，或冤枉坐牢，自有相应的机构去伸冤叫屈。政府即使介入，顶多也是扮演中立的调解角色（例如调解危及全社会的劳资纠纷），但最后解决还是得靠两造妥协。如果有哪个蒙冤受屈者把仇

恨转移到政府头上去，跑去信访办公室门前餐风宿露，或是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或是在天安门广场自焚，那只会引起全体公民槽牙紧急脱落。

即使设计如此周密科学，仍有可能出现政府与人民敌对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处置是严格依法行事，谁要胆敢搞暴乱，立即就以铁拳痛击，但如果抗议者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则政府胡乱镇压就是犯法，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在国会应付反对党的趁机大举出击，出席各种独立听证会，乖乖回答质询。于是民意便构成了政府决计不敢掉以轻心的具体而微的压力，迫使政府作出相应的政策修改，甚至不惜换马以求绥靖选民。撒切尔夫人就是这么挥泪下台的。

这就是西方民主社会获得了真正的稳定性、实现了长治久安的根本秘诀所在。美国立国两百多年，只打过一次内战，英国自1640年爆发革命之后，300多年从未打过内战。法国因为政治制度设计不够合理以及国民的愤青特性，相对而言是民主国家中最不稳定的，自1871年所谓“第三共和国”成立并荡平了巴黎公社之后，虽然政治危机不断，但毕竟没有演成内战。

中国的社会稳定设计思路则完全与此相反，如所周知，传统社会实行的乃是孔孟之道。它的设计要旨我已经反复介绍过了，那就是反复为百姓洗脑，告诉他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分三六九等，这是天理如此，万万不可改变，凡是犯上作乱者都要遭到天诛天谴。大儒曾国藩讲得最清楚：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此话深得孔子真传。的确，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维护上下尊卑神圣不可侵犯，把君臣关系类比于父子关系，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看成是家族道德那样的“人伦”，甚至把人伦也解释为一种等级关系。儒家著名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支配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原则，在儒家看来是同一的。

这一套非常有效地切除了百姓的“反抗基因”，使得人民把政府看成是全民共同的大家长，对皇帝的“忠”和对父母的“孝”本质相同，只是前者道德层次更高。如同儿子不能反抗父亲一样，臣民当然也只能服从皇上。反过来，它也让皇帝觉得人民是自己的儿女。一个和谐社会，就是子女无条件服从尊重家长，“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而父亲心疼爱护自己

的孩子。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履行同一道德规范。这一套稳定设计也相当高明，使得一个朝代动辄延续几百年，才被人口超载或外患倾覆。

毛共的社会稳定设计除了传统思维定式之外，更从苏联引入了空前严密的控制子民手段，由此建成了空前稳定的毛社会。这种设计的特点，是统治者极度病态地缺乏安全感，下意识中以为自己一定会被人民推翻，“以小民为敌国”（李慎之语），因此把“治理国家”的主要内容理解为“全心全意地监视控制子民，确保他们决无二心”，将主要精力和国家资源花费在这一战略目标上。在大饥荒过后，国家领袖更是把全部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这就是“抓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

既把小民当敌国，那朝野之间当然就是个实力对比的问题。朝廷当然要最大限度地增强自己的实力，最大限度地剥夺敌人的能量。这些削弱人民实力的重大措施包括：

1、强占国家一切物质资源，确保它们不会落在反抗者手中。扫荡一切独立精神权威和道义权威诸如宗教组织等等，垄断把持文化教育宣传新闻传播，以此垄断全国精神资源和信息资源。

2、将所有国民都编织入一个无比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网络中，就连无业者也有管理单位（街道委员会），将每个社会成员终生焊死在原位，不但没有游动可能，而且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持续监控。这一条非常重要。因为历代痞子造反的先锋队都是没有正当职业的游民，所以朱元璋那暴发游民上台后便首先实行严打游民的措施，首创将游民登记在案，不许他们到处流窜的政策。

3、剥夺一切人民财产，实行党有制，控制了每个人的粮道，使得全民彻底丧失自食其力可能，造成“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局面，使党成了人民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人民则化为党的奴隶（这里提醒诸位注意，“奴隶”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的囚犯，是可以到处走动的。传统社会的丫环就是按等级领取“月份”的女奴，其与主子的关系实质与人民和党的一模一样，凡事不能自己作主，必须一生交给党安排）。

以上措施算是“硬件”。它能保证人民永远处于绝对劣势，没有造反可能，但并不能保证人民满意，使得君民关系和谐。为此毛共给“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装了一系列“软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它绝对是个伟大发明。

须知幸福不过是一种因与周围其他人比较（“横比”）或以现实所得与自己原有期望相比（“纵比”）而产生的满足感。道家早就看出这一点来了，所以才说“知足常乐”。因此，最简单的使得人民幸福的办法，便是造成一个让他们“知足”的政治生态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1、将中国封闭起来，使得人民没有和外界比较的可能，因此不会产生“横比”造成的不满；反复宣传西方地狱场景，使得人民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别的制度下。

2、根据国人“公平不是机会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传统理解，在政治上实行等级制度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并严厉惩治贪污，进一步使得人民不会因“横比”产生不满情绪。只要大家一样穷，便穷死而无怨。

3、设置“阶级敌人”作“幸福对照组”，进行“正面横比”，让他们的低贱衬托出人民地位的崇高；以唆使、奖励、逼迫人民无止境地迫害阶级敌人作为“幸福致幻剂”，在这群体吸毒过程中让人民获得一种“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高人一等的强烈幻觉。

4、剥夺人民一切发财致富的可能，并将人类发财致富的天然欲望当成最可耻的罪行加以反复的严厉谴责。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发财，无希望当然也就无所谓失望，从根本上杜绝因结果未达预期值而失望的可能。

5、开展持久的“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办“阶级教育展览馆”，以极端个例甚至虚构事例（例如最有名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进行“正面纵比”，将“旧”社会描绘为人间地狱，使用西方发明的广告手段反复强制输入强烈信号，直到全国人民，就连知道真相的过来人也罢，都被彻底洗脑，为他们有幸泡在今日“蜜水”里而无限幸福。

6、效法传统君王通过任命官员而使得官员变成“沐天恩”的债务人，通过控制人民粮道，变成人民的衣食父母，使得人民永远处在欠下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的被动位置上；指令无耻文人创作大量马屁作品诸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反复强化人民的条件反射，使得毛在人民心目中成了超过父母的第一恩公，连吃饭喝水都忘不了感谢毛主席。我们贫民窟一位老太太在毛逝世时哭昏几次，以为她的退休工资是毛从自家腰包里掏出来的。他老人家一死，粮道当然就此断了，只有跟着他老人家去了。

7、将高干奢侈腐化的生活严密封锁在“军事禁区”中，让普通人绝对看不见，听不到。绝对不许百姓知道政府其实是靠抢劫人民而存在的，更不许他们得知被抢走的钱用到哪儿去了，只在媒体上强力宣传伟大建设成就，因为一般没有明显贪污现象，愚民自然也就不会想到他们的钱其实被政府塞了狗洞，只觉得能接触到的中下层干部都极度清廉，当然不会产生“政府为何要把我的钱抢走，又用到哪儿去了”的疑问。

8、将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视为重点监控对象，不断发动运动痛打之，彻底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养成对党的终生敬畏心理，并向他们反复灌输“原罪”观念，使得他们终生处在诚惶诚恐、自觉自愿的“思想改造”中。

这一套非常高明，既有进口的斯大林主义，又有传统社会那一套。从美学的角度上来看，的确是天才才想得出来的杰作。这就是为何毛时代的人民的确非常幸福，而且赤诚效忠的缘故，说穿了一钱不值。

颖悟的读者至此不难看出89“风波”是怎么起的了，那并不是人民对丝毫不懂的“民主”的激情突然高涨，而是以上8条软件于旦夕间统统不复存在了。于是幸福感便骤然破灭，刹那间所有的人都极度不满，真的和朝廷成了敌国。但失去的只是欺骗软件，控制镇压硬件依然故我，因此双方实力对比不变。此时也只有白痴才会指望“现在只有人民起来和那个法西斯政府较量了”（柴玲语）：两军对垒，穷棒子们手无寸铁，对方武装到牙齿，结局还用说么？

二、改革开放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

由上可知，毛共建立的“新社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奴隶社会。这决非愤激夸张之词而是逼真贴切的准确描述。它的特点是，若略去非人的“阶级敌人”不计，则社会由奴隶主（党）和奴隶（人民）两大等级组成。人民和古代西方奴隶一模一样，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特别是全部生产资料，连迁徙择业自由都被剥夺了，以致不能自食其力，得靠党来操心喂养之。新时代的奴隶主等级则完全是苏联的邪恶发明，漫说在中国，就连在世界历史上也见所未见。

凡是大陆人都该知道，中国社会的唯一统治等级就是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真ＴＮＤ文

盲！典型的分类交叉，难道“学”不是“民”的一部分？）它伸入社会每一角落，成了全社会唯一具有主动性以及政治能量和经济能量、能驱动社会同步运转的大脑、脊髓和神经，而人民（包括本是最有能量的知识分子在内）则统统成了瘦肉、五花肉甚至肥肉，唯一的功能就是被动地听从党神经的驱策，如臂使手一般圆满实现中南海意图。

这种奇特景象不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而且也不存在于西方文明世界。西方是“大社会，小政府”，从无一个严密的政治军队作为脊梁贯穿全社会。政府的权力不但极端有限，而且各级政府是分别选出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并无党派隶属关系，可由不同政党组成。不仅如此，民选政府其实只是蛋糕顶上薄薄的一层奶油，人数很少，政权的主干还是公务员集团。后者并非民选，是只知忠实执行民选政府制定的法案的中立职能机构，决不会听某党某派指挥。这种社会结构和“大政府，无社会”的中国完全是两回事。

因此，中国社会的特殊权力结构，使得党成了构成社会稳定性的最关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假定美国政府和中共政府同时被核弹消灭了，引发的社会后果绝对不一样。美国是由多个“自治板块”拼装起来的，即使没有联邦政府，全社会照样能运转。而中国政府乃是全系统中唯一能发出主动指令的中枢，一旦把这中枢去了，全社会瞬间内就要陷入无法想象的混乱。

因为把全社会资源和主动性全部集中在领袖一人手里，这种极权社会能无限制地强制动员人力物力，由此发出的群体合力是惊人的。苏联之所以能在短短20多年内就迅速地从欧洲最落后原始的农业国变成世界工业大国特别是军事强国，靠的就是这种军队式社会设计。

不幸的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搞的不是苏式专家治国而是太平天国式白痴痞子治国，于是掌控在他手里的空前的人力物力资源便成了“大跃进”一类民族切腹的好快刀，折腾30年非但没有造出苏式奇迹来，反倒使得中国进入了穷国前缘。

如上所述，这种新型奴隶社会的稳定性是空前的。如果只从私利计，邓小平毫无必要搞改革开放，只需当守成天子就是了。那今日中国肯定也是北韩那种稳定天堂。虽然党内权斗无比凶险，但绝大多数人民一定非常幸福，哪会有89年的百万人民上街示威？

但老邓既然从九死一生的权力斗争中好不容易胜出，当然就想干一番事业，好青史留名。他在江西“将军楼”庭院里兜圈时，总算看出了现代奴隶社会虽然空前稳定，也能如古埃及一样，靠强制动员人力资源，完成与原始条件极不相称的浩大工程，但它和西方古典奴隶社会一样毫无生机。奴隶们给彻底剥夺了主动创业精神，当然只会出工不出力，甚至不出工不出力，再怎么狗屁倒灶，奴隶主还不是照样得喂养？

这就是老邓为何一意孤行，逆党心民心而动，执意“恩赐”，把抢去的部分经济自由归还给人民，这结果便是不但自行去除了制造虚幻幸福感的8大软件，还削弱了操控人民的3大硬件：

1、党虽然继续垄断全国精神资源 、信息资源和大部分物质资源，但不得不放弃部份物质资源。

2、私有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以及人民在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有限的流动，使得相当比例的国民逸出了组织网络，削弱了党监控全民的能力。

3、私有化使得党失去了对全民粮道的严密控制，奴隶社会开始解体。

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统治者和人民的实力对比，但人民的绝对劣势仍然保持不变。这道理连白痴都能明白，就民运革命家不懂：所谓“暴力”的涵义与时俱进，现代暴力手段再不是原始人的拳头、弓箭、大刀长矛、甚至步枪手榴弹了。连萨达姆拥有的暴力对老美来说都根本不是暴力，而况赤手空拳的中国人民乎？他们和政府的关系乃是鱼肉和刀俎的关系，谈何“和法西斯政府较量”？

这倒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民才是“裤子档里阮”，全世界人民的硬度我看都差不多。

1942年5月29日，纳粹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被捷克流亡政府派出的杀手刺杀，6天后伤重不治身死。捷克人民闻讯后先是暗自称快，可没多久便开始忧心忡忡，最后竟然痛恨起杀手来。那原因非常简单：纳粹和我党一样，深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事件发生后便开始大批枪毙人质，一直枪毙到抓到凶手为止。光是海死那天就枪毙了150多人，先后一共杀死了1500多名捷克人和犹太人。

这疯狂报复吓坏了据说是决不会向暴力屈服的英雄人民。被枪毙的人质以抽签随机选出，于是每个人都担心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全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当海德里希下葬时，20多万布拉格人民全体出动，举行了该市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全民追悼大会，沉痛哀悼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家海德里希同志不幸逝世，愤怒谴责胆敢谋害国家领袖的恐怖分子。

这集会完全是自发的，当局并未组织。英雄的人民之所以干出这种令后世子孙甚至盟国蒙羞的丑事来，动机很简单：向当局表忠心撇清自己，希望当局就此开恩不要杀了自己，同时真诚地表示对累及无辜的凶手的强烈义愤，更由衷盼望他们早日落入法网，就此摘下无端挂到了全城人民头上的那柄达摩祖师神剑。

须知纳粹是异族侵略者，日尔曼民族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积怨长达几百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同仇敌忾，誓死抵抗德国入侵。纳粹占领了该国后，全民都将入侵者视为仇敌，这与人民对本国政府的态度有本质差别。饶是如此，两者实力对比之悬殊，仍然不能不让英雄的捷克人民乖乖俯首对屠刀。

这还不仅是捷克一国。所有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除苏联和南斯拉夫外，都始终没有像样的地下抵抗运动。直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长驱直入，纳粹内外交困、大局崩坏时，抵抗运动才开始活跃起来。那也丝毫不难理解——望风使舵打死老虎从来是人民最拿手的专业。

这在法国最明显。因为英国先把法国扔在灾难里，自己从敦刻尔克逃回本国去，后又在法国在北非的海军基地搞“珍珠港事变”，击沉了中立的法国舰队，法国人民恨透了英国，反和德国占领军建立了军民鱼水情，把领导抵抗运动的戴高乐将军当成卖国贼谴责。在某将军拒绝在北非向戴高乐投降而回国时，巴黎人民倾城出动，欢迎这位伟大的爱国英雄。正因为此，在诺曼底登陆后，英军一直怕遭到法国人民抵抗，连进入巴黎都只有请和维希政府一直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美国人打先锋。不料进城才发现水性杨花的人民只知忙着抱胜利者的粗腿，无论是美军还是英军都成了解放者，一律以姑娘的免费热吻（法国式湿吻？）不限量侍候。

因此，哪怕人民和朝廷真成了敌国，前节所述硬件软件统统丧失，统治者陷于全民包围中，只要朝廷“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那就一定会“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更何况三大硬件只是部分被冲蚀，并未全部崩解，丧失的只是那8大软件而已。但89“风波”吓破了我党的胆，近20年来它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弥补破墙，在防民如防寇的同时也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替代软件。大概可以总结于下：

1、以“民族主义”取代马列毛主义国教，靠煽动仇外思潮转移人民对内政的注意，唤起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认同。

2、以高工资收买人民中最有能量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变成与政权休戚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借鉴传统社会以科举制度牢笼士大夫的作法，将政权向知识分子有限开放，把他们变成统治等级的“士官生等级”。

3、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将经济自由部分归还给人民，刺激起人民的主动创业精神来，为僵死的奴隶社会注入生机，促成经济起飞，以此给人民普遍带来空前的发财机会，不但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且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空泛的政治转移到具体的经济事务上去。

4、形成一套社会赖以“和谐”运转的新时代的“潜规则”，其主旨是，尽量避免“取之于民，塞之狗洞”的毛作法，代之以“集体拿大头，自己拿小头”的明智作法。这“潜规则”说白了就是：不可不贪，不可太贪，要贪大家贪，我拿大头，他人拿小头，综合起来便是“集体拿大头，自己拿小头”，使贪污从个人行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升华为全民行为，大家都分了一杯羹，只是多少而已，于是领导满意，群众开心，大家都幸福。

这就是贪官反而获得人民欢心的原因：他尽管给自己搂了许多钱，但还是给人民扎扎实实地办了许多好事，最主要的是思想解放有魄力，敢于并善于找到灰色甚至黑色的发财空间，敢于并善于使用灰色和黑色手段搞活本单位经济创收，使得全员沾光。虽然自己是最大受益者，但百姓觉得那是应该的。换个谨小慎微的清官去，虽然本人两袖清风，但也害得众人跟着他两袖清风，那又有什么意思？这就是新时代的“清官淘汰律”（请参考吴思著《潜规则》）。

当然，这第四条软件恐怕并非中央的原设计，而是社会在强制转型过程中自行“磨合”出来的。但不管怎样，它的确是那个烂污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兼稳定粘合剂。

5、人民抛弃了“仇富心理”，改奉弱肉强食的“狼羊律”。

如上所述，毛将“公平不是机会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传统误识，强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培养出了人民空前绝后的“仇富心理”。89“风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心理大规模发泄的产物。一直到90年代中期，它还是人民嫉恨的主要来源。

但人民总是务实的，因为经济起飞给全民带来了空前的发财机会，于是大众终于发现，与其作无济于事的愤愤不平家，还不如钻头觅缝地去寻找发财机会。“先富起来”的幸运儿们如今不再使得人民胃酸大量分泌，转而刺激其唾液腺，使得中国人民成了发财欲望最强烈的民族，万众一心，红了眼睛，效法跟随领导，扔下一切顾忌，寻找机会去肆无忌惮地宰人。

这其实就是网友观察到的“人民对腐败的耐受力空前提高”的实质。如费正清指出，传统社会使腐败制度化，让它变成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运转杠杆。为网人普遍推崇的吴思先生所著《潜规则》，其实不过是用具体事例来演绎费正清的发现罢了。但无论是费还是吴似乎都没有明确指出，这潜规则之所以能存在并成为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杠杆，乃是因为在等级社会中权能生钱而已。如果严格实行西方社会的权钱分离，则这一套潜规则顿时消解于无形。

但即使如此，我认为，以上五条稳定软件除了第一条后患无穷之外，其余四条都值得肯定。第三条允许人民发财就不必说了，那绝对是应该的。哪怕是剩下那三条也是相对进步。相对于西方常态社会而言，它们当然是肮脏的，但相对于毛式奴隶社会而言，不能不承认还是伟大的社会进步。

就连那污浊不堪的新时代潜规则的出现也如此，“个人拿小头，集体拿大头”虽是违法分贼赃，总比“取之于民，塞之狗洞”对人民更有利吧？即使与传统社会相比它都是一大进步。如《潜规则》一书所举大量历史事例表明，传统社会的潜规则实质是“百姓收买官吏免遭迫害”，而新时代的潜规则则是“群众容忍官吏贪污以求尝点残汤剩饭”。两者之间有被动与主动的区别。

总而言之，这些软件除第一条外，其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从奴隶社会转变为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说它“半封建”，乃是它类似中世纪欧洲，存在着一个贵族等级；说它半资本主义，是因为社会上出现了新兴民族资

产阶级。正因为是一个“解放脚”，于是便出现了新时代潜规则之类的“病态的社会进步”的吊诡现象。

由上可知，80年代后期乃是社会最不稳定时期，此后党控制人民的三大硬件虽然进一步削弱了，但由于上述一系列软件的建立，社会稳定因素较前有极大增加，六四一类全国性政治事件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是我为何鼓动胡温采用“婴儿学步疗法”，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为六四平反。如果社会极不稳定，政府反而不宜作此类让步，否则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但若在天下基本太平时还不施这种有利无弊、无惊无险、防患未然的仁政，则政府真是蠢到不可教也。

三、深重全面的社会危机

因为奴隶社会转型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新社会里便埋下了大量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疑难杂症，构成了全面深重的社会危机。它的特点是如同火山一样，表面上平安无事，但等到岩浆和地壳之间的压强增加到临界点就会爆发出来。

先看意识形态危机。如前所述，毛式奴隶社会的稳定全靠那8个软件制造人民的虚幻幸福感。这一套在打开国门之后便立即迎风而化，再也无法起死回生，更别说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就直接是对它的无情嘲笑。

官方现在使用的“民族主义”代用品根本就无法取代破产毛教，因为它没有与之相配的一系列欺骗软件。更何况此举完全是饮鸩止渴，对此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论证过了：在民间制造种族主义思潮，为将来南斯拉夫式大屠杀作足铺垫；把知识分子化为新拳匪，导致“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错觉再次出现，为日后党内野心家特别是军阀向“卖国政府”发难提供了雄厚的“民意”资源和“道义”资源。

那么，为朝野实际信奉的真正国教“狼羊律”（亦即“以权点菜律”）又如何？过去20年间，政府腐恶的政治经济操作以及六四学领的丑恶表演，使得民间价值观念出现了自发改变，百姓在看穿了毛教和由中国伪知识分子代表的伪劣“西方民主”的欺骗性之后，就此认定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和公道，更没有

不可逾越的规则，唯一真实的只有拳头，唯一值得尊重的只有权力。谁有拳，谁点菜。不管是谁上去都这样，天下没有白乌鸦。

这种价值观的出现，从根本上颠覆了毛共竭力灌输给人民的病态“公平心”，却使社会心理走向更可怕的另一极——势利心。如今人民不是“仇富怜贫”而是“羡富欺贫”，认为以权力牟取暴富是天然合理的，穷鬼则是只配鄙视欺负的窝囊废。因此，自己的努力方向不是去想法解决这社会弊病，而是效法有本事的人，尽可能获取权力，最大限度利用这权力牟取暴利。而所谓权力，就是处在别人有求于己的敲诈地位。

这结果就是社会成了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丛林，大夫、教师以及所有其他具有服务性质的行业的人都成了敲诈专业户，专业就是发现、创造并利用他人有求于己的机会狠狠创收。城市中大量“钉子户”出现就是人民天才地运用这“点菜律”的表现。没有什么更能比这体现中国人的首创精神了——就连自家居住的危宅，也能化为刁难敲诈他人的“权力”。据说国内现在最热门的读物乃是《三十六计》。这一点都不奇怪，没文化的人民热心攻读此类龟孙子兵法，目的是从中获取灵感，完善自己的敲诈艺术。

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似乎有利于朝廷统治——百姓不再要求政府均贫富，转而去全心寻求讹诈他人机会，好让自己也富起来。但这也酿成潜在的社会危机。汕尾事件就是个例子。那当然首先是政府犯罪，但我后来冷静下来想想国内民情，觉得当地居民有趁机敲诈工厂的动机也不能完全排除。我有时忍不住要想，其实为海外“民主阵营”欢呼的国内维权斗争，当然基本是正义的，但恐怕不能完全否认其中有借机敲诈政府的事件，涉及到经济纠葛的事件更是如此。

这种新型社会心理出现的有利之处，我已经在《“犬儒”篇》中指出了，那就是人民开始成熟了，对大而无当的政治运动丧失了兴趣，不再“见义忘利，义令智昏”，像六四那样被野心家煽惑起来傻闹的可能性极大减小了。更重要的是，具有鲜明的自我利益意识，正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前提。过去毛共把孔教“重义轻利”教条推到了顶峰，将民众维护自己的权益当成可耻罪行加以严厉惩罚和谴责，导致公民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如今人民开始知道捍卫自己的利益了，这当然是个巨大进步。

但只有这一条而无守法意识和双赢观念，则只会变成所谓“刁民”，亦即贪得无厌、不遵守游戏规则、缺乏妥协精神的低素质民众。如果统治者引导有方，可以把这种刁民逐步训练为公民，但如果听任这趋势发展下去，则刁民势必要在政局失控时化为毛式暴民，痛快淋漓地使用“狼羊律”，滥用落在他们手中的暴力权，使得全国浸泡在从未见过的血海之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统治者昏昏若死，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另一个潜在的意识形态危机也是毛共遗留下来的。如前所述，毛式奴隶社会的特点，是建立了人民对党的全面人身依附关系，由党扮演人民的衣食父母，将后者当成没有自立能力的幼儿，负责照管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一切方面，由此养成了奴隶对奴隶主的依附心理。后毛政府发现自己没那能耐冒充他人父母，竭力想扔掉包袱，于是便引起“弃儿”们的怨恨。工农大众的不满心理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造成的。

可笑的是蠢党到现在还没悟出当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父母”的愚蠢，还不肯退步抽身，从各领域中逐渐撤出，改扮超脱的中立仲裁者，还在奢谈“加强党的施政能力”，还要继续扮演阴天大老爷。再这样至死不悟，只会自搬石头自打脚。

据说国内股市目前持续狂涨到了荒唐地步，虽然政府完全是无辜的，而且还采取种种宏观调控设法冷却之，并一再警告股民后果自负，但股民置若罔闻，那心理就是“到时政府不会见死不救”。等到日后泡沫爆破了，经济虽然不至于如日作春梦的草庵指望的那样垮台，国家更不会因此“崩溃”，但崩溃了的细民们一定会莫名其妙地把深仇大恨转移到政府头上去。

除此之外还有毛主义的驱不散的幽灵。毛思想根本也就不可能失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民间私藏儒家经典者格杀勿论，然而孔子思想并没有就此绝种断根。毛思想因其愚昧性、野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愚民的巨大感召力，特别符合中国民情。它必然成为今日党内权力斗争的道义资源，也一定是日后野心家发难的理论武器。至于毛在百姓心中的具体形象如何其实无关紧要——试问当年搞共产暴动的工农乃至毛周式知青们中又有谁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有毛作为“公正”、“爱民”的象征来比衬现领袖的卑鄙龌龊就足够了。

第二个社会危机，也是最大最可怕的危机，还是政治危机。

首先就是社会不公引起的朝野冲突。近年各地大大小小的朝野冲突频频爆发，汕尾事件不过是其中比较大者。现在的人当然都是犬儒，也精于权衡利弊，但似乎并未改变心浮气躁的气质，贪欲更助长了这种浮躁，以致一点无足轻重的事都会引起不相干的人暴力抗争。前些天四川某地才爆发了几千人参加的骚乱，据说那不过是因为一个女学生不知何故死了。

这说明病态社会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内心失衡，于是随便什么Ｐ事都能变成大众发泄那失衡感的机会。工农大众大概是内心失衡最严重的阶层：毛时代他们不但和别人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而且是趾高气扬的“领导阶级”。这是否事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坚信这一点。再加上和其他阶级相比，他们“以权点菜”的机会要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让人家怎么能平衡下来？

主要的隐忧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其实是政府用钱向人民买来的，而这就有个“可持续收买问题”。

要让前节所述诸稳定软件工作，前提是经济必须持续增长，这才能为“个人拿小头，集体拿大头”的全民和平分赃提供安全基数。同样是贪污一万元，从100万的工程里拿只是百分之一，从10万元的工程里拿就是百分之十。前者要比后者安全得多，因而“可持续性”也就高得多。

所以，目前“狼羊分赃律”还能“和谐运转”，靠的完全是国家以空前宏大的规模在搞建设。但从西方经验来看，哪国的经济都不会永久高增长，到了相当水平就会停滞下来。那时也就是新时代的潜规则失灵之时。知识分子一旦失去高比例的灰色收入（指名义工资之外的额外收入），只怕欲作不问国事的犬儒亦不可得，更不用说那些直接承受经济衰退打击的工农大众了。

当然，这些危机并不能导致暴力革命爆发，只会引起此起彼伏的局部骚乱，可为政府轻易荡平。但一旦政府失去镇压能力，则全国立即陷入大乱就决非危言耸听。

因此，最主要、最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危机，还是潜在的统治危机。上面已经反复论述过了，稳定软件只能淡化百姓对朝廷的敌对情绪，真正决定政权存亡的还是统治者内部的精诚团结。哪怕朝野真成敌国，只要统治集团始终保有镇压能力和决心，则政权就绝无垮台之虞。可惜中共的死穴恰好在此：它一定要分崩离析，由此触发全国大乱，这就是我为何反复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乱源。

那理由也反复讲了Ｎ＋1次了：靠狼羊律上去的党魁，不能像传统帝王或民选总统那样一上台就自动具备最高权威。第一、第二代党魁靠的是“以拳服人”，第三、第四代就只能靠人脉作为权力基础，这就决定了他们处在被下属讹诈的被动位置上，不敢自断股肱。最后的趋势便是中央权威逐代弱化，地方诸侯逐渐坐大。这在民主国家倒是正常的，不幸的是在“以权治国”的虎狼窝则意味着弥天大祸。

党内权力斗争其实主要是利害冲突引起的，国策分歧或意识形态分歧不过是导火索或甚至是借口罢了。正因为大家都信奉狼羊律，那权力斗争就不但必然发生，而且必然是血淋淋的。这与是否坚持改革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只考虑国策分歧，江政和胡政也有明显差异。敬爱的江总和胡总性格其实完全不同。江乃是维扬小才子，本质上是个风流倜傥的“玩主”，颇像李煜和宋徽宗，当上皇帝完全是偶然，所以他并没有什么青史留名的雄心壮志，自然也就不可能如老邓那样，敢冒党心民心之大不韪，毅然把国家领上改革开放的不归路，主要关心的还是吃喝玩乐弹琴梳头。

胡总则完全不同，此人出身不咋样，并非太子党，完全是靠坚韧卓绝的毅力爬到了权力最高峰。这种人既然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当然有勃勃野心，等到一朝权在手后，自然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以便青史留名。而这就决定了他一定不满现状想改革，因此必然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

为了建立权威，胡总别无选择，只能以非常手段杀一儆百，陈良宇就是他给诸侯作的榜样。可惜采取这种“超限战”非但有作法自毙的潜在恶果，而且只会激化党内矛盾。据说现在胡对陈案如何处理进退两难。陈的罪名主要是那个社保基金案，可查来查去根本无法当成大罪。据说干这种事的诸侯实在太多，如果要认真，只怕要人人自危，何况陈据说还用社保基金作资本发了点财，人民并不曾受害，而其他诸侯挪用类似基金投机倒把贴得一塌糊涂。如果真要借陈之首号令诸侯，只怕要逼反了他们。我看这事最后大概不了了之，反倒弄得小胡十分被动，以后更不敢随便诛杀方面大员了。

依我胡猜，胡大概最后将以面面获罪的庸主之名留在史书上。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一方面，他想在历史上打上私人印记的欲望肯定很强烈；另一方面他又是积极分子出身。这种人发迹全靠准确审时度势，见风使舵，趋炎附势，非常精于计算实力对比，善于避祸保身。前者导致他迟早要因多事改革而开罪

既得利益集团，后者导致他在较量到来之时缺乏孤注一掷的毛邓式土匪气魄，却及时风行草偃，伏低做小。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便是他只敢铁腕镇压民间骚乱，但没有胆量和党内实力集团摊牌，最后是欲奸不敢，欲罢不甘，什么都干不出来，谁都不喜欢。

最可怕的隐忧还在于军队。我党和苏共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远比苏共更烂污，严格实行“枪杆子里面出党权”的狼羊律，而苏共从建立红军那天起就把军队当成监控对象，从不动用枪杆子解决党内权力斗争。

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宁等一众政敌搞下去，靠的是组织表决，只是后来才动用秘密警察制造冤案，但ＮＫＶＤ在名义上是国家司法部门，枪决政敌也走了“法律系统”的过场。赫鲁晓夫搞掉大批政敌也是靠组织表决，朱可夫介入也就只敢用军机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拉到莫斯科来罢了。即使如此，赫不旋踵就撤了朱国防部长的职务，逼他退休，罪名就是他是“波拿巴主义者”（亦即我们说的军阀。所谓军阀，就是实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人）。赫鲁晓夫最后下台也是被中央全会罢免的，并不是谁动用枪杆子赶走了他。

我党则完全两样，早期还忠实拷贝主子，到后来便由大军阀毛泽东实行狼羊律，以少胜多，靠枪篡党，以井冈山将领为权力基础，联合了白区党魁刘少奇，把总书记打下去，爬上了党魁宝座。文革前他更联合了国防部长林彪，再度以少胜多，靠枪篡党，把几乎整个党中央都打入地狱。老邓复出后，先籍雄厚的武力把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搞掉，后来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竟然以国家军委主席之身调动大军发动政变，非法罢免政府官员，软禁党总书记。第一、二代领导核心的示范作用，使得“以枪篡党，枪杆子里面出党权出政权”成了我党我军无比深厚的优良传统，昭示了法律程序在武力面前一钱不值。

以此背景来透视今日中国，则种种怪现状便一目了然。2000年台海危机期间，熊光楷将军居然代表文官政府宣布如果美国干预台海战争，中国就要用核弹袭击美国洛杉矶。此后共军200多名将领上书中央，要求打台湾。前年朱成虎将军更出来毅然发布中国的世界战略计划，宣布美国如介入台湾战事，中国就要牺牲西安以东地区，用几百枚核弹袭击美国。一个国家的武人集团嚣张至此，屡屡代替政府对全世界作重大国策声明，世界历史上只有日本军国主义有此先例。

最令人毛发倒竖的还是，最近国内网上登出某军头反对军队国家化的文章。那篇文章肯定有来头，大概是军阀集团针对党中央内部的要求作出有力回击。那完全是造反宣言，充分流露出武夫们对党章国法不屑一顾的张狂气焰。

看出这点来的也大有人在。那篇文章后面有许多跟帖，尽管绝大多数是拥护的，但有几份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款，亦即全国武装力量由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虽然那跟帖作者一句话都没说，但除非是爱党成狂的白痴们才看不出，那是告诉大家那位将军反对军队国家化的口号完全违反了宪法。此类帖子的出现，和那篇文章突然问世一般耐人寻味，它暗示军阀集团和中央较劲已经从暗到明了。

因为我党是个密封党，所以一般人看不出它的内部裂痕，但对明眼人来说这并非难事。即使没有这些症状，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读者都不难看出，以上理论分析无懈可击。

由此不难预知中国的未来，那就是因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没有实力压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实行必需的政治改革，国家政治危机就只能强行压制积累下来，由此反馈回统治集团内部中，加剧党内权力斗争。最后或因大规模经济危机导致各地同步出现骚乱，或因外部冲突（例如台海危机）引爆党内矛盾，导致统治集团公开分裂甚至兵戎相见，于是全国便陷入狼羊大战中，半世纪内恐怕尘埃都无法落定。

四、如何防患未然？

上文长篇大论，无非是论证了未来中国的阴暗前景：不但没有实现民主的希望，而且没有改良的希望，就连暴力革命发生的可能都没有，唯一的可能就是这样一天天烂下去，直到党弱化到丧失控制全局的能力，全面战乱爆发。

这阴暗前景，无论是激进民主派、渐进民主派、暴力革命家还是保守党人，看了都只会怒火腾腾，将我这臭嘴乌鸦恨之入骨。这也难免。咱们的民族传统从来就是诛杀报坏消息的人，从伍子胥、屈原就开始了。芦某何人，敢指望不同对待？打破大众的幸福幻想，拔了人家的桩，让他们无法再自欺下去，或起码自欺得不再那么痛快，从来就是激起众怒的最有效措施。可惜我这辈子

干的就是这专业，六四大屠杀发生前干得最欢，几乎没让那些民主积极分子活吃了。

当然，上文的论证尽管点水不漏，那毕竟只是我心目中概率最大的可能事件，就连必然都会被偶然打破，何况还不能说我的预测事件发生概率为1。倘若这预言落空，那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预言家。六四前我预言镇压在即，未几那预言兑现，感受到的不是得意而是撕心裂肺的痛苦。911后我预言中国政府将情不自禁地出来扛反美大旗，事实证明我高估了政府的愚蠢。预言落空了，我却因此心花怒放。其实，谁也不愿作不祥预测。我巴不得有人能驳倒那一系列论证。

但就算我的思路不严密，忽略了其他因素，那大家总得承认我指出的那些问题毕竟存在，因而那预言确有一定可能发生吧？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有了个防患未然的问题，该采取什么措施根除我指出的那些社会弊病呢？

毫无。

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看出我反复说明的道理：世上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稳定，一种就是中国式稳定。它的特点是统治者实行狼羊律，以拳点菜，靠为暴力支持的权力无情压榨掠夺人民。但人民并不真是羊，迟早要起来反抗。为了消弭反抗，统治者便只能推行欺骗性国教。它与西方的国教不同，是一种政治宗教，其设计目的是通过以基本教义为百姓洗脑，将他们的“狼基因”阉割了，于是社会也就获得稳定。直到“阉狼”们再也活不下去，重获“狼基因”而起来造反，等到少数造反“羊”变成了“狼”，便又重施前任老“狼”的旧伎，使用那国教再度阉割“羊”们的“狼基因”，社会便又重获稳定。

这就是古代中国两千年反复发生的循环，也就是孔教出现并成为国教的历史依据。传统社会的稳定性主要靠那国教提供。但那政治宗教只能在封闭状况下工作，当中国不再是封闭系统时，先进的价值观如潮水一般涌入时，它就再也不灵了，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为何发生一系列动乱。

在很大程度上，毛走的也是这条老路：人为造成中国的封闭环境，将腐恶传统与外来邪教结合起来，制造出了一种新型欺骗性政治宗教，以此为人民洗脑，使得社会获得空前稳定。它的结局也和孔教一模一样：随着国门再度打开，被汹涌而入的先进的西方价值观彻底粉碎。

由此不难看出，当今中国社会缺乏稳定性的根本原因是，它是靠狼羊律驱动运转的，却又缺乏保证社会稳定的欺骗国教。“羊”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了社会现实，自己总结出了“狼羊律”，那就是前文转述过的：

“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和公道，更没有不可逾越的规则，唯一真实的只有拳头，唯一值得尊重的只有权力。谁有拳，谁点菜。不管是谁上去都这样，天下没有白乌鸦。”

这里的唯一错误就是它是坐井观天，将局部现象放大到全天下，但有谁敢说这不是支配中国社会运转的根本规律？从政治局直到民间居委会，又有哪个单位不实行“谁的拳头大谁是爷”的“宇宙运行根本规律”？

于是朝廷便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凶险：所有的“羊”都跃跃欲试要当“狼”。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还从未有过这种信念危机。尽管大规模动乱周期性爆发，还从来没人敢怀疑过孔教作出的“狼－羊划分”，从未有人意识到“狼”并不是天生就是“狼”，“羊”也并不是天生就是“羊”。从生理上来说，每个“羊”都有变成“狼”的可能。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我要受尽别人的盘剥压榨欺凌，不得反抗，只能束手待吃？

这危机还不限于朝野之间，在政治局内也同样如此。旧式专制之所以能稳定运行，靠的是孔教阉割了臣子们的“狼基因”，使得他们认为皇上乃是上天决定的“狼”，自己是“羊”，两者不是同一种系。如今的政治局委员乃至中央委员甚至省委委员，若有谁以为自己和胡锦涛有什么上天决定的本质区别，他天生是吃我的狼，我天生是乖乖让他吃的羊，那就只有进疯人院一条路了。

这就是为何现代专制搞不下去、迟早要垮台的根本原因。和民主比起来，它最致命的弱点是无法长治久安。

这就是小胡同志面临的无比凶险的绝境，他小人家不但被民间无数汹汹群狼包围，而且被朝廷群狼窥伺，无论是臣工也罢，草民也罢，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心狠手辣、斩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的潜在的大灰狼，逮住第一个机会就要把自己变成羊，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噩梦？

民间无数潜在的狼倒还不用担心，虽然缺乏“阉狼国教”，毕竟强大的镇压硬件确保了“羊”无法变成“狼”，真正要担心的还是党内窝里反，而这梦魇根本就不可能消除——无论是孔教的“天命论”还是毛教的“历史潮流客观规律论”都已彻底破产。哪怕是天才也无法发明出一个新国教来，证明皇上是

狼，臣工是羊；官吏是狼，草民是羊，两者之间只能有绝对无法改变的吃与被吃的关系。

要消除这一致命隐患，唯一的办法是在党内引入西方民主，那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谁也不是狼，谁也不是羊。谁要想当党魁，那就必须按严格的文明规矩来。谁获得最多选票，谁就能上台。一旦上台，无论是投了反对票还是赞成票者都只能奉命唯谨。谁要想践踏文明规矩便严惩不贷。

这就是消弭潜在的统治危机的釜底抽薪之道。如果做到这条，就算不能消除其他社会危机，至少统治集团不会窝里反起来，因而也就保住了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前文已经反复论证过了，党乃是保证全社会稳定的脊梁。因此，它确实是保权救党的最根本措施，本该具有可行性——实行党内民主并不要求中共拱手让出江山，对庞大的党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并无什么损害。

然而就连这最起码的救命措施，我党也决不会采取，那原因和无法在全国规模实行民主是同一个：大夥儿都信奉狼羊律，谁要占了上风就一定要斩尽杀绝。所以，无论是朝廷对百姓也好，朝廷内部也好，都只能有“吃”与“被吃”两种结局，“退后一步就全完了”。

例如假定胡锦涛他小人家看了我老人家这篇宏文，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在即将召开的N大上提出，允许党内派系斗争合法化，公开化，各自提出政纲在党内合法竞选，谁当选为党魁便自己组阁施政。合法当选的党魁拥有不容置疑的最高权威，谁要胆敢不尊重这权威便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与会代表都接受了他这一提案，形成新的党章，并付诸实行，选出了新党魁。可惜小胡同志落选了。当选同志上去后，立即翻脸不认人，撕毁协议，喝令将小胡这乱党分子推出午门斩首，全党一定要坚持毛、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传统一百年不变，拒腐蚀，永不沾，坚决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侵蚀。那决议获得与会代表一致欢呼，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于是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小胡同志乖乖授首。您敢排除这种可能么？既然不能排除，小胡同志就算是活佛，视帝位如敝屣，也不至于傻到去自杀吧？

敬爱的林副统帅哼哼教导我们：“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

这永远是支配中国政治的“宇宙运行根本规律”。人民早就在文革中开始自发意识到这一点了，启发他们作出这一发现的乃是74年后复出的老干部们，那时的口号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说到底，中国最大的悲剧，乃是我党窃国将近60年，至今还是“谁的拳头大谁是爷”的土匪党，折腾了四代还没折腾出个和平转移、和平分享权力的文明规矩来，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建立这规矩。而这就决定了中国必将因党内窝里反而沉没。

要解决这一系列难题，关键在于破除事实国教“狼羊律”。但这玩意乃是我党率先实行起来的，百姓只不过是见样学样罢了。要想破除它，当然只有我党痛改前非，以身作则，不但放弃以权谋私，厉行西方式权钱分离，而且把贼赃统统吐出来，这才有可能让百姓放弃那坚定的宗教信仰。但这可能么？哪怕头让碓打晕了的同志也不至于昏到发此春梦吧？

这就是中国永远无法解决的悖论：唯一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是我党，而我党不愿、不能或不敢实行实质性政改，因而成了妨碍社会取得根本进步的最大障碍。在这点上我和“民主阵营”并无分歧。我和他们的分析，是我认识到了更深层次的悖论：我党确实是妨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但它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保障。推翻中共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只会招来更大灾难。因此，还不如就这么慢性自杀下去，那大祸晚来一日也是好的。

2007 年 7 月 8 日

十七大加深了无边的绝望

最近做了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恍惚听说我党在开 17 大，也没关心，不意今日进得坛来，却见某网友捶胸顿足作愤懑状，不禁莞尔：都什么事啊？至于么？

令他痛不欲生的，似乎是我党早在会议前就圈定了政治局常委名单，而《多维网》及时获得并披露了这一情报，这对我党来说乃是标准做法，却彻底粉碎了他对我党政治改革的幻想，此前他大概把胡温“实行党内民主”的口号当成了真的，以为胡温要借 17 大初步演练一下，不料人家依然故我不说，还无耻到把内部圈定的名单泄露给多维。幻想破灭了，当然要痛心疾首。此外，他似乎还期望锦涛同志能将江派势力彻底逐出局去，大刀阔斧地实施他的“新三民主义”（亦即什么“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之类）。

他的愤懑当然可以理解，但我觉得那基本是热脸贴不上冷屁股的单相思失恋之痛。当初胡温亲政时，他和另一位网友载歌载舞，豪情满怀，把此坛变成了“颂圣论坛”，一口咬定胡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中国从此和平长入民主也。我稍微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泼了点冷水，险些被他们不蘸酱油（亦即四川人所谓“打蘸水”）就活吃了。其实我不过根据“权威逐代递减律”指出，不管主观意愿如何，胡锦涛只可能是勃列日涅夫一类无所作为的庸主，我党只能这么一天天烂下去，绝无自愈希望而已。和这位网友不同，我对中共现领导没有注入什么个人感情，既不如他那样痛恨江泽民，当然也就不像他那样把所有美好愿望都寄托在所谓胡温新政上，所作的分析当然也就更客观，更能经受时间考验。无希望自然也就无所谓失望，当然也就不会如他现在这样痛不欲生。

话虽这么说，这位网友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代我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彻底绝望。我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指出，社会进步并不是人民造反革命干出来的，一般只能通过统治者主动或被动的让步来实现。统治者之所以主动作出让步，多半是高瞻远瞩的领袖或是为了富国强兵，或是看到潜在的危机，因而力排众议，主动把部分权利归还给人民。而被动让步在中国则是因为社会出了

严重问题，迫使统治者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实行政治改革。两者动机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统治者都不满或不安于现状，感到了“不改革不行，不能再因循苟安下去了”的急迫需要。

今日中国的问题，恰在于统治者根本没有这种心态。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的高增长，不但导致国民空前富裕，也使大部分知识分子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想的只是维持现状。新贵们就更不用说了，如那位网友指出，我党现在完全把持在一群毫无理想信念与道德操守的蝇营狗苟之徒手里。这些人信奉的乃是“狼羊律”，唯一的念头就是把最大限度的国家财富以最快速度转入私囊，为此不惜以铁拳粉碎局外人分肥的非分之想。要这些人真以国家民族为念，在捞到差不多时便适可而止，学西方奉行费厄泼赖，无异于缘木求鱼。

这说的是统治者的素质。从现代专制专制的致命内在缺陷来看，“权威逐代递减律”规定了党领袖权威的逐代弱化，这种背时制度最后只能制造出无所作为的庸主来。当全党成了垃圾桶后，为吴思先生揭示的“清官淘汰律”便充分发挥出“汰清留浊”的负筛选神效，使得贪污不但成了党国官员求生的前提，更成了党领袖使得下属安心并获得崇高威望的必要条件，最终结果便是党领袖变成贪官首领，此所以胡不如江，他能熬到现在，还煞有介事地拿办了陈良宇，几乎可以算是奇迹了。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的虚假繁荣，促进了我党上层的苟安因循，而体制的内在弊病，决定了真有改造中国的抱负的领袖无法产生并获得足够权威去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更要命的是，党领袖们早在国外营就了销金三窟，既无远虑，亦无近忧，当然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确保独霸国家资源一百年不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中国在可见的未来“跑步进入民主”，实在是发错了梦。不说全民民主，就连在党内实行西式程序化了的明火执仗的争权夺利，都绝对没有可能。这前景本是明摆着的，自不必要等到今天才知道来此呼天抢地，17 大的召开不过是再次证实我那悲观估计的理性基础是何等坚实罢了。

说起来，这和六四也没太大差别——虽然我早就预见到了镇压，但一旦它真的发生了，还是不能不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和刻骨铭心的绝望。

其实我早在《芦文指要》中说过了，悲剧在于，中国取得社会进步的唯一希望，乃是我党的让步，但我党绝对不会让步，只会就这么烂下去，烂到最后

实在无法苟安下去，不得不改革为止，而迟来的改革反倒加速送了我党的命，使得中国变成他们的殉葬品，全国特别是民族地区血流漂杵，乱上个把世纪都安定不下来。此乃大清走过的死路，而我党如今正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前辈开创的道路迅跑。

兴许，大结局来的比我预期的还会早些。前些天和某内行聊天，据他说，等奥运会开过，中国股市便要崩盘，触发世界性经济危机，甚至连美国都会被波及，云云。这话让我无比懊丧：和腐朽垂死的美帝不同，中国式的安定团结是我党用金钱买来的，一旦经济停止增长（还不必说负增长），则立刻要触发政治危机，引发连锁反应，把我党这几十年辛辛苦苦存储下来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矛盾统统释放出来，这前景端的令人不寒而栗。

更大的可能还是台海危机触发的军人政变。而小胡此次的表演不能不令我格外担心。我对英俊领袖胡锦涛素无好感，认定他那种团干部的最高境界便是延安枣园和西柏坡村，对“民主”的理解便是毛泽东式的“为民做主”，更喜欢风流倜傥的江梳头，从来就不曾对这种政工同志抱过那位网友式的高期望。但我非常欣赏胡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不幸的是这很可能恰是他的死穴所在。这次他对台再度发动和平攻势，阿扁立刻就针锋相对地作了回击，一点面子都不留。不难想见这一定会在军内引起强烈反响，构成他日讨胡时的“丧权辱国”罪名。倘若台海危机再加深，胡总势必进退失据：不打就要被军人推翻，打则引发全国危机，加速中华帝国的崩溃。江总当年辛勤熬制下的“爱国主义”苦酒，或许最终要断送了胡总的卿卿性命。无过，反正是没有解药，捆着吊着全一样，由它去吧。

2007 年 10 月 22 日

真实的黄祸——也谈中国对世界的污染

网友转贴的秦晖教授论“世界中国化”的文章，我反复读了几遍。本人非常佩服秦教授及其太太。一位朋友借给我几本秦氏伉俪的著作，我看后竟起了干没之心。这种偷书的念头在我 12 岁之后便灭绝了，想不到几十年后又死灰复燃，可见秦教授伉俪的威力。

可惜网友的反应似乎提示不是所有的读者都看懂了，所以我这个外行还是不揣冒昧，为秦教授的文字作点翻译吧。

所谓“世界中国化”，乃是一种语言艺术，准确说来乃是“中国的流氓作法对文明世界造成的污染”，这在我看来才是真正的“中国威胁”。西方极右派嚷嚷的“中国威胁”是指军事上的，那完全是外行瞎掰——武力扩张从来就不是这个怯懦民族的传统长项。秦教授首先指出的“中国污染”才是西方必须正视的威胁。

要明白秦文，先得知道西方的“左派”、“右派”是什么意思，前者又称自由派（liberal），后者又称保守派（conservative）。两派在政治经济主张上的分歧是，前者或多或少有社会主义倾向（是正宗社会主义，不是马列的盗版光盘），主张提升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但相应也承担了更大的照料国民福利的责任；后者则主张自由经济，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相应对国民福利的照料就比较少。

简言之，左派政府把公民的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等问题看成是它的责任，权大责也大，靠加重税收来保障国民基本福利，施政的结果便造出了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右派则强调公民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诸问题，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无为而治，权小责也小，靠减税来刺激资本家的投资热情，搞活经济。前者是社会主义好汉（不是共产党的伪社会主义），后者则是资本家的乏走狗。

因为主张分歧，欧美走上了不同发展道路。就总体而言，西欧北欧国家远比美国左。美国的左派民主党到了欧洲可能只能算中右，而共和党到欧洲可能得算极右。因此，美国公民的社会福利远不如北欧西欧国家，盖美国政府认为高福利政策只能养懒汉，使得资本家因高税收失去投资热情，国家入不敷出，

进行赤字预算，导致整个经济丧失竞争力。樊弓教授就是笃信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

有趣的是，即使是在同一国家内也可能实行“一国两制”。例如英国本土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但在香港却放任自流，殖民政府既不收多少税，也不负责公民福利，反倒造成了香港超过英国本土的繁荣。

过往实践似乎证明了右派有理。70 年代以前是欧洲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但此后社会主义国家便显出了缺乏竞争力的弊病，主要是高工资、高税收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从 70 年代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在走资，拍卖国有企业，削减福利预算，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了。这似乎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哪怕是欧洲式人道的社会主义也如此。

中国则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左右派都迥然不同的道路，亦即官僚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政府拥有巨大的无从制衡的权力，却不是用来为公民构建福利社会，专门用来压制民间经济自由，保证统治财团能够独占国家资源，牟取暴利。这种“人民政府”只负责享受手中的巨大权力为自己带来的好处，却不对公民承担任何责任。公民既享受不到左派政府治下的高福利，又享受不到右派政府治下的高度经济自由。

秦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大城市总会有许多移民从外地迁入城内，为这些人盖福利房便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责任。然而在中国却从来没这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决不会想到原来政府还有这种责任，秦教授说得很生动：

> “可是过去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给这些新移民盖什么福利房，恰恰相反，我们不给他们盖，他们自己要盖一些房子，我们还叫它‘违章建筑’。我们过去是既不给新移民盖福利房、也不允许他们形成所谓的贫民窟，我们只允许他们以单身劳工的方式住在所谓的工棚里面，而他们在工棚里面是永远无法在城市定居的。”

简言之，这种下流政府拥有无限权力，却不对公民承担任何责任，使得中国社会福利之差名列世界前茅。

然而吊诡的是，这种下流做法却在国际上形成了可怕的竞争力，有改变西方文明生活方式的危险，秦教授那文章就是强调指出这一危险的，可惜似乎没有几个读者看懂了。

秦教授已经点明了这种病态竞争力的来源：那就是没有制衡的权力，确保了政府可以无视一切经济规律和文明准则，全面压低资源价格（包括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矿产资源价格，公共资金等等一切人力物力资源），人为造成生产成本非常之低下，自然要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披靡。

因为政府不惜血本地贱卖国家资源，中国便成了外国资本家的乐园，造成了西方“产业空洞化”。这趋势首先发生在香港。90 年代东南亚遇到经济危机，港商为了降低成本，纷纷将工厂迁往珠江三角洲，导致香港产业空洞化，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就业危机。

类似的情形似乎现在正在欧洲国家发生。欧洲素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深厚传统，工会势力非常雄厚，但现在西方无产阶级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立场却被东方无产阶级大幅度削弱了。如今资本家有恃无恐，根本不怕尔等穷棒子罢工——不行我就把厂子迁到中国去，那儿不但什么都便宜，而且自有万能的中国政府做我的护院打手，绝对不会有工潮发生。

这趋势还不限于蓝领，白领也照样受害。网络的发明，使得欧美的资本家可以雇佣廉价的印度白领工薪阶层为他们干活。据电视报道，现在有的美国医院和研究所的实验结果竟然是靠远在万里之外的印度人来为他们分析处理。据说他们只需将原始数据输进电脑，便可下班回家，印度人则利用时差，在美国的晚间印度的白天作分析，使得老美次日一早就能拿到结果，非常及时而且廉价云云。

所以，中国的“大国崛起”，很可能意味着西方高福利社会的衰落，而这必将在西方引出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改变西方文明国家几百年来的游戏规则，从而动摇人家的立国基础。这在我看来才是真正的“中国威胁”。

阴谋论的爱好者们喜欢谈论外国资本家对中国进行的“货币战争”，这在我看来完全是唐吉诃德战风车的想入非非。那说的似乎是外国投资统统逃走，人家为什么要逃出那冒险家的乐园？遮莫是头给碓打晕了？请问那操控所有外资的阴谋集团是谁阿？莫非西方政府竟然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样，能统一部署、统一指挥所有的资本家？真正受到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是西方既有的文明生活方式。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乃是“民族解放理论”。他琢磨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相对和绝对的贫困化”为何迟迟不发

生，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何迟迟不垮台，最后结论是，这是因为资本家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来维持西方工人的高工资，以此买静求安。因此，为了搞垮资本主义世界，必须声东击西，先去第三世界发动“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西方资本家丧失东方的廉价原料与市场，使得西方无产阶级应了马克思的诅咒，迅速贫困化。这就是十月革命成功后老毛子要派出那么多特务来中国捣乱破坏的理论依据。

列宁的伟大理论于今果然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明。实现了“民族解放”的东方无产阶级现在果然获得了搞掉西方无产阶级高工资的潜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不是通过剥夺西方资产阶级的廉价原料和市场来实现的，反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政权”为西方资产阶级提供了廉价人力物力资源。

西方面临的这一严重威胁，我认为是相当现实的。如上所述，这种“超限战”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能改变西方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和立国基础。秦教授已经举出了法国新任总统萨科奇的施政纲领作例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文明世界的污染和回回的恐怖主义颠覆相类似。区别只在于回回的搞法太明显，太不得人心，而中国威胁比较潜在，受害人无法理直气壮地禁止而已。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直到临死他也没能做到这点，一心盼望“震惊世界”，但可以“震惊世界”的也就只有“亩产万斤粮”、文革那些好货色。反倒是全面背叛马列毛主义的现代中共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实实在在的威胁。这大概可算历史的又一讽刺吧。

不过我并不认为西方无法化解这一严重挑战。西方世界已经战胜了比我党强大百倍的流氓希特勒和斯大林，难道还能在这小河沟里翻船？再说中国虽然“地大物博”，资源总是有限的，卖光那天也就是大难到来之时。到时咱们自顾不暇，哪还顾得上搞穷西方无产阶级老大哥、搞富西方资本家阶级敌人的伟大的世界革命事业？

2008年1月14日

中共的龟孙子兵法不大可能污染文明世界

刚才看见两位网友就中国对外输出价值观问题的发言，一位说：

“我觉得问题恐怕远没那样简单。前一阵读老易的贴子时我就追着他问过几次，我一直不解的是，既然政治体制上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经济发展还那样快。例如老易说中国的乡镇企业的做法只能算作城市化的次选择。可是这个次选择竟然有那样强大的作用。

消极对日本的价值观的输出可能也低估了。其实 Toyota 的管理方法在美国的很多大企业都很受重视。

价值观的融合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未必总是先进的取胜。老共统治下输出了多少落后的东西，未必全都是用枪杆子逼出来的。老共最拿手的就是扒拉出人性的丑陋，用它来毒害全国人。把人变成鬼是它的本事。看看海龟中有多少能挺得住的，欧美企业有几家不学着搞邪道的就够震动人的。

说老共没好的价值观输出我同意，说它没价值观可输出则是另一回事了。恐怕闹腾一阵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另一位网友闷闷不乐地表示同意：

“其实昨天我看金老的那帖子后就郁闷了好久。

世界要真中国化了，那不得暗无天日，彻底绝望吗？可是正如河老，金老分析的那样，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想起前一阵子芦区讨论普适价值观的事，提到过融合，那不过是是泛泛虚言，这次‘世界中国化’的问题却是迫在眉睫而且与大家都可能有关的实事了。要真那样了，一是活的不爽，二是倍感丢脸。

我觉得，这个潜在灾难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中国化’并非一种文明形态，再有害，好比伊斯兰原教旨也好，斯大林希特勒也罢，好歹建立于一套完备的意识形态之上，是一个有机体，这就给西方文明的抵御制造了前提。而‘中国化’却可以化整为零，在任何犄角旮旯进行渗透，

不择手段的伎俩往往能无微不至地迎合人性中利己的一面，从而无孔不入。好比癌症，任何一个正常细胞都可能中招。

所以，现在想起来，我那篇胡紫微的帖子说的就不对，以权钱占有女人的方式，从今往后很可能迅猛输出。君不见在中国的老外早以熟谙中国女人的心思，为所欲为。

这太恐怖了。怎么办？”

我觉得这未免有些杞人忧天，太高估了“中国应当对世界有较大贡献”的能力了。

愚以为，价值观融合，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过程，先进的强大的价值观排斥了落后的弱小的价值观，先进的强大的文明驱逐消灭了落后野蛮的文明。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东南亚华人几百年来还能顽强保持中华文明，而欧美华人第二代就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就够了。

人性总是喜欢洁净，讨厌肮脏，要干净的鬼子学会唐人街的脏乱差，“三天洗头，五天洗澡”，恐怕没什么指望，哪怕你给人家发重奖也没戏。同理，要让人家放弃道德上比较干净的生活方式，学会中国男盗女娼的生活方式，即使诱之以重赏，也难以克服本能的抗拒。

第一位网友说的不错，落后的价值观有可能战胜先进价值观。在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多次，但那多是异族入侵，靠武力以野蛮战胜先进，例如欧洲野蛮人颠覆了先进的罗马帝国，野蛮的蒙古人取代了文明的大宋，咱们有那本事征服世界么？中国的传统历来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怯于外斗，勇于自相残杀，就这德性还征服世界？做梦去吧。

我已经说过了，要让一种价值观在某个社会中普遍确立，社会必须建立一种赏罚环境。中式价值观是靠赏恶罚善的社会环境建立的，咱们能在西方复制那种社会环境，从而腐败毒化文明世界么？休想！

第三位网友说得很好：

“依我看，维持这个奇观还要感谢毛主席，是他从体制上造就了九亿一出生就注定下贱的低等公民。他们盖起高楼大厦，修建马路桥梁，清洁道路房屋，照看小孩老人，维护花草树木，让市容整洁，市民开心，也‘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纵然他们自己要住在窝棚里，但 who care china？他们是一群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 nameless，在没有福利

的情况下被限制了自由也仍能默默奉献。而且，即使如此，却也比要他们一辈子困在农村的土地上种地要好，足以吸引他们趋之若鹜了。”

的确，他们就是托起中国奇迹的脊梁，但要复制中国式成功，必须先把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化为毫无自我尊严，毫无存在价值的 non-beings，有哪个西方政客，萨科奇包括在内，有这个本事？人家几百年来的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熏陶竟然会被中国的野蛮生活方式一朝消解为无形？要这么做也行，先建立起一个为所欲为的极权政体来。没有这前提还想让一小撮人随心所欲地驱使压榨广大苦力，岂非痴人说梦？

法国人乃是世上比较缺乏政治智慧的民族，大约仅次于中国人。萨科奇不知道，中国模式和西方格格不入，是没法学会的，西方人学不会中国人的肮脏生活方式，正如我们无法学会西方的干净生活方式一样。没有那个社会环境，人文传统，他就是想把中国生活方式搬过去，也绝对只会落空。一个有权无责的民选政府，简直跟“火热的冰”一样，属于一种弱智笑话——敢情百姓选您出来是为了把您供在头上作威作福，什么责任都不必承担，还要无情压制咱们的经济自由哪？就算是法国人也不会蠢到这个地步吧？那不成了中国人了？！

老金说，如果中式“科研”方式腐败毒化了西方学术界，那世界也就没有科学了。这噩梦决计不会发生，理由很简单：体制不同。科研经费来自于资本家的基金会，不是捏在某个独裁政府手中，人家花的是自己的钱，不是搜括来的民脂民膏，讲究效益，绝不会像中国政府那样，科研人员在一流杂志上发表一篇文字就奖赏上万两银子——发论文本是你的份内事，哪有干了份内活还大把赏赐银子的？

外国人到中国后学坏是必然的，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可以向外界输出烂污价值观。我本人就是个例子。90 年代我回国，一下飞机就给拉去交钱抽血验艾滋。如果在西方我就会乖乖跟着傻排队，但那可是我可爱的家乡阿。于是我趁人不备就溜掉了，免去了挨可疑针头扎一针，还遭受经济损失。接着我又在过道上偷了一部工作人员内部使用的手推车（那时首都机场的手推车非常之少，而且需要押金。我没有人民币，腰又疼得要死，提不动沉重的行李）。回到家乡后支气管炎立即复发，我当即在大街上非常豪迈地响亮吐痰，终于找到了“回家”的幸福感觉。

但这一套也就只能在国内使出来。国外没有卫生监督岗罚款，但那社会风气无形中形成一种压力，作用于你天生的羞耻心，让你没脸做出那种烂污事体来。当然这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我认识的某些中国人来到西方多年后还忠实保留了随地吐痰的习惯。不过对一个洁身自好的人来说，这种无形的压力非常有效。

所以，那些靠个白人面孔便能在中国尽情渔色的鬼子，回到本国后绝对不敢再把那套使出来，正如当年在朝鲜和越南尽情渔色的鬼子回国后也不曾败坏了国内社会风气一般。

总而言之，我觉得诸位过虑了。中国烂污生活方式对文明世界的颠覆与污染，在我看来只限于搞垮欧洲福利社会这一条，中国的廉价劳工为西方无产阶级制造了就业危机，引出许多社会问题。至于要在生活方式上污染腐败人家，恐怕没什么希望。

至于老河的疑问很容易回答。上述第三位网友其实已经回答了，那就是把 10 亿以上的农民变成连古代奴隶都不如、可供任意作践的 non-beings，任意榨取他们的血汗。在这大前提下，无论政治经济体制有何等弊病，只要有个和平环境，政府不像毛共那样蓄意破坏经济，就一定会创造出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来。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专业人士答不出来，乃是因为他们看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无一人能想象到世上竟然会有如此烂污的社会，所以根本不曾考虑过它的运转机制而已。经济学本来就算不得什么科学，别看他们使用许多数学公式，统统是蒙人的。

十多年前我就指出了，中国乃是一匹神骏，可惜被统治者死死地捆住了几千年，被迫一直停留在原地。只要政府给他们个机会，立即就会创造出经济奇迹来。可怜咱们连这最低限度的要求都无法满足。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人民也就只享受三次创业机会：一次是满清新政时期，一次是国府“十年建国”（1928-37），一次就是改革开放的 30 年光阴。这三次都是中国人民暂时脱离了无穷无尽的战乱，并荣获政府有限松绑，可以去专心致志地过小日子的黄金岁月，每次都创造出了经济繁荣，都出现了世界为之动容的经济高增长。这次时间最长，基础也相对最高，当然要创造出比上两次更灿烂的成就来。

除了这三次难得的例外，中国人民在其余的时间内不是被孔教剥夺了经商可能（清朝以前），就是让战乱剥夺了发财致富的机会（民国），要么就是让

毛泽东那疯子白痴组织起来去大规模破坏资源，摧毁国民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容易有了这三十年的连续稳定的创业时间，如果不创造出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来，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了。

这并不是我们的烂污社会组织方式造成的奇迹，而是中国劳动人民举世无双的苦吃苦做的天赋使然。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潜力只会发挥得更充分。看看那些福建文盲在海外过的小日子有多滋润就足以说明这点了。我已经在《中国人穷只能怪社会，美国人穷只能怪自己》的旧作里说过这问题。

全球化可能给西方带来的真正的灾难，除了搞垮欧洲福利社会之外，还有一个严重问题，便是从第三世界来的大量移民降低本国人民的素质。特别是中国人以其举世无双的生殖能力，假以足够时日，只怕要 “劣币驱逐良币”。这个问题在美国特别突出，在欧洲也越来越是个严重问题。我觉得应该把这真正的黄祸导入俄罗斯，效法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使得广袤的俄罗斯鞑靼化，以报老毛子为近现代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之仇。

2008 年 1 月 15 日

现代中共乃是史无前例的资本家的强走狗

某网友的跟贴我看到了，提上来回答吧。

一、别搞笑了，谁跟你说美国的勃兴是靠奴隶制？奴隶不过是在工业化前的南方种植园（主要是棉花种植园）里充当劳力罢了，那对经济起飞毫无用处，反倒构成了障碍。共党宣传说，林肯解放黑奴乃是为了替北方工业资本家获取自由劳动力。这话虽然反映了典型的共党阴暗心理（阶级论者从来不相信世上有超越于利益的良心），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很有限）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当时美国的工业主要在没有实行奴隶制的北方，正处于起飞阶段，而南方经济极度落后，还是处于前工业化的农业时代。这事实连《飘》那种烂小说作者都看出来了，书中的主角白什么就曾断言南方一定要打败，因为现代战争是打工业实力，而南方没什么工业。这就是奴隶托起了美国的经济起飞？就连农民都知道种田是发不了财的，若南方靠种棉花就能发家，那实行了几千年的农耕的中国早就发了。

二、欧洲自古罗马之后就从来没有过奴隶制，人家的经济起飞也是靠奴隶托起的？当然，19 世纪无产阶级的待遇很糟糕，但社会主义运动勃兴后就大幅度改善了。欧洲的经济起飞其实是在二战之后完成的，二战后德国成了一片废墟，英国财政全面破产，起点之低远远超过咱们的 49 年，而这段时期恰恰是社会主义运动获得空前胜利的黄金岁月，英国工党就是在那时上台并完成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建设的。请问按你的理论该怎么解释阿？类似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似乎也没靠中国模式起飞吧？

三、中国的成功秘诀，是靠引入外资与无情压榨“解放农奴”。前者提供原始资本（这比什么都重要，毛共折腾 30 年毫无结果就是因为缺乏这第一桶金），后者提供廉价劳力。两者结合在一起，试看天下谁能敌？整个系统之美，网友已经指出了，乃是毛共把中国的 10 多亿农民化为史无前例的二等公民，将其打入 18 层地狱。邓共把他们提到了第 17 层，允许他们进城当毫无福利的苦力，他们便一个个感激涕零，绝对不会如欧美工人那样意识到，原来政府还必须负责为他们解决最起码的福利问题。

有这种感恩戴德的解放农奴，生产成本还能不低么？谁都知道西方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力价格远远高于原料价格。你要是用科研拨款雇人开过题，就该知道工资支出在预算中占相当大比例。在这点上，任何西方国家也不能与中国竞争，何况我党乃是资本家梦寐以求的铁腕打手。在中国根本没有工会保护工人的基本权益，罢工只会遭到政府的血腥镇压。这难道能在外国找到任何先例？就连朴正熙统治下的南韩都没这么暗无天日。人家照样能组织工会，照样能发动罢工，只是朴唆使流氓去捣乱而已，哪像中国连罢工的可能都压根儿就没有？

总而言之，你所谓“中国模式乃是经济起飞的必经阶段，西方也曾如此”论纯属无视历史的胡说八道。

2008 年 1 月 16 日

可笑的“三个包子”理论

这是左棍们的理论。据他们说，却原来，邓小平并非毛主义叛徒而是忠实传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乃是毛邓联合设计的一以贯之的三部曲。第一部就是 50 年代按苏联模式搞基础工业建设；第二部则是 60-70 年代毛泽东“建设性破坏”了苏联的集权管理的计划指令经济；第三部则是邓小平解构苏式计划经济，代之以市场经济。这就是让中国经济起飞必须吃的“三个包子”。少了哪一个都吃不饱，都不会出现今天的经济奇迹。所以，中国人民过上了今天的海屁日子，不但得感谢邓小平，还得感谢毛泽东。

这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无论何等弱智的理论，都有足够愚蠢的人去发明出来。本来，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看了上列中国发展三部曲，都只会得出结论：中国的当家人完全是乱撞乱飞的没头苍蝇，拿庞大的国家当实验室，学苏联的理性计划经济不成，改为文盲胡来，最后干脆抛弃之，代之以国家资本主义，这本身乃是一个蠢动过程，殊不料就是有人能把它说成是深谋远虑的战略的一以贯之的展开！哪怕是我党用头撞墙，左棍们大概都有本事把它说成是天才的创举。“凡共党干的事都天然是合理的”就是这些人的哲学。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三个包子理论的无耻之处。例如同样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式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据说是补药，在苏联却成了毒药。如果苏式计划经济确实是妨碍经济改革成功的绊脚石，那么起码第一个包子得被当成毒药吧？难道因为毛泽东先选择了这邪路，接着又用文盲蠢动去破坏它，竟然成了一种历史功绩？

第二个包子构成第三个包子的前提更是白痴搞笑，其发明人似乎是个鬼子，可见洋白痴比起土的来也绝不逊色。破坏也能看成建设，这种辩证法只有共产党人能相信。这么说，在广岛扔下原子弹也能是该市经济发展的前提了？

要此说成立，必须假定毛“建设性破坏”了斯大林的理性计划经济之后，还发明了自己的管理模式，而按他的模式改建过的国有企业因为具有自主经营能力，在经济起飞中起到了骨干作用，保证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滑过渡，避免了前苏联转轨时因青黄不接而出现的经济秩序混乱。

毛确实留下了自己的管理模式，那便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以及“企业办社会”的“五七道路”，前者是大老粗反智主义对国民经济蓄意破坏，后者是复古癖废除社会分工的大倒退，请问它们在哪一方面训练出了企业经理们的自主经营能力？在哪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在投入市场经济时的竞争素质？又有哪个中国国企没有遇到与俄国国企类似的麻烦？难道中国的经济起飞不是靠外资企业和乡镇企业作骨干，而是由毛留下的国企托起的？

有意避免苏式弊病、给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的人倒确实有，但不是毛泽东而是南斯拉夫的铁托。“包子”理论的发明人如果尊重起码事实，应该把荣誉归于他。可惜啊，就连南斯拉夫也没能避免转型造成的巨大混乱，遭难甚至更惨，请问包子店老板们如何解释这一怪现象？

尽管“包子理论”的发明人是鬼子，国产左棍不过是拾人唾余，但看官切不可误会，以为洋人都是白痴。其实早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中国还在“鸟笼经济”的困境中挣扎时，就已经有鬼子预言过中苏两国命运不同，中国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中国有大批富商分布在港澳台与东南亚，组成了所谓“大中华经济圈”，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宝贵的原始资本，而苏联（那阵还没垮）没有这个条件。

那文章我记不得是从哪份报纸上看来的了，作者是谁我更没上心（鬼子的名字本来就难记，比单词还难记），但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记得我还把这意思写在某篇杂文里，发表在《华夏文摘》上。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人家的真知灼见。中国的起飞靠的是两条：潮水一般注入的外资以及靠社会制度人为制造的廉价人力物力资源。打个不准确的比方，前者是“外国包子”，后者是“中国蒸笼”。

这两条缺了哪一条，包子都蒸不出来，论靠社会制度去系统地无情地榨取工农大众，滥用人力物力资源，谁也比不上毛泽东，但他没有外国提供的第一桶金，所以再折腾也是“光蒸汽（争气）不蒸馍馍”，而老邓两样都有，当然要蒸出包子来。

具体的操作过程如下：鬼子要吃包子，就拿着钱到中国来租地皮、买面粉和肉馅，雇佣中国苦力为他们蒸包子，包子蒸出来后发给中国人一点钱，鬼子再把包子拿回国去卖。中国得到的那点钱，有一半被政府转手借给老美了。老美又用这借来的钱拿去买包子吃。这结果是双方皆大欢喜：鬼子有包子吃，咱

们有钱赚，尽管那赚来的钱有一半又流回美国去了，但剩下来的那点也就足够让咱们过上从未有过的好时光了。

鬼子为何要来咱们这儿做包子涅？原因很简单：在本国，无论是地皮、面粉、肉馅还是人力都贵得出奇，所以不如干脆把蒸笼搬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的廉价地皮、人力和原材料做包子，再拿回国去卖。如此一来，资本家就能牟取高利润，却害得国内产业空洞化。工厂都搬到外国去了，工人阶级也就失了业，导致本国内贫富悬殊加剧，但好在中国包子便宜，普罗大众吃得起，美国政府靠从中国借去的钱发放信贷也能维持国内繁荣假象。

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也是外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家秘密，从头到尾和毛泽东蒸的“两个包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2008 年 1 月 19 日

“逆向货币战争”

我党为中国人建立的永久思维方式乃是阴暗心理思维，亦即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用邪恶的眼光去揣摩隐藏在所有人事之后的卑劣动机，这我早在 8 年前写的《毒眼》中指出了。毒眼加上受迫害妄想，就构成了所谓“货币战争”的宏大阴谋论。

据网友介绍，《货币战争》一书乃是某位海龟专业人士宋鸿兵写出来的，借鉴了某部文献片 The Money Monster 的记者手法，刻下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甚至被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乔良少将奉为教科书。他的有关讲话我已经转贴到楼下了，请有兴趣的同志去看看。

我虽然没看过这书，但也断断续续地看过网友的一点文字。他似乎也是专业人士，写了许多关于经济的文字，描述了帝国主义如何“饱食远扬”，在中国输出资本后把中国经济搞垮逃走，留下一片废墟的凄凉景象。

对这末日图景，本人一概不信。我虽然是经济学的绝对外行，但我知道，自由世界的组成方式，决定了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步调一致的资本家财团，事前作深谋远虑地谋划与统一部署，关键时刻再“听得一声集合令，浩浩荡荡他们出了村哪！”（调寄《沙家浜》）。别的不用说，看看昨天的往事就够了。

如所周知，六四以后，老美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牵头发起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可美国政府并非世界政府，更不是共党式极权政府，就连本国资本家都难得指挥，遑论港澳台日的资本家们？那制裁只成全了港澳台的资本洪水般涌入中国，托起了中国的经济起飞。最后老美看没什么效果，便借着求中国不要在老布什解放科威特的联合国动议投票时动用否决权之机下台阶，自己也解了禁。于此，制裁活动以彻底失败告终。

过去指挥不动，将来就能“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么？请问老美何时给各国资本家甚至本国资本家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哪？资本家唯一服从的

号令乃是利润，那就是人家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完全打不破的。纸老虎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纸老虎。

而且，人家又为何要逃出中国那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资本家的乐园？上哪儿去找那么廉价的资源和劳工，而且还有强大的“专政无产阶级机器”做资本家的看门狗，为西方资产阶级敌人彻底剥夺东方无产阶级兄弟的基本人权，好让他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

不仅如此，昨天看了网友的《法罗斯的价值 1.4 万亿美元的问题》，我才发现，中国非但没有可能被西方资本家盘剥一空，“饱食远扬”，反倒有可能靠货币战争搞垮美国，起码是把山姆叔的睾丸捏在手上（说明，此乃英文常用表达，不算不文明用语）。以后山姆叔若胆敢和咱们反目，只需稍微挤压一下，纸老虎便立即瘫倒在地，“栾平他醉成泥一滩”也。

上面说到的那文章写得非常好懂，而且例外的毫不枯燥，可惜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多的也不用说了，只说要紧的吧。

话说咱们连年出超，把产出的一半存了起来，只将一半用于消费（这就是东方小农思想和西方寅吃卯粮、靠借钱发财的资本家思想的区别），这钱就是所谓“外汇存底”。

存钱怎么存涅？若放在本国金库里，那不但不会增值，还会随美元贬值而贬值。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拿去买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公债（bonds）。如所周知，债卷的利率比较高，这样一来咱们的外汇存底就起码能保值。如果利率高过了通胀率，则外汇存底还能增值。如果两者持平，那起码能保值。只有在美国通胀率高于利率，美元大幅度贬值时，实际外汇存底才会贬值。

这么一来，中国就成了老美的债主，而且还不是小债主，乃是惹不起的大债主。据说现在中国的外汇存底已达 1.54 万亿，其中约 70%买成美国债卷，亦即美国联邦政府欠了中国政府 1 万亿美元的债！

这巨额债务成了一根绳子，把美国和中国捆在一起，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两个蚂蚱。中国怕美元贬值，因为那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缩水；美国也怕美元贬值，因为那意味着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对美国来说最要命的是，这么大的债务捏在中国手上，国民经济也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了。例如中国若想搞垮美国经济，只需抛售手中庞大数额的债卷就行了，那必然导致本来就在狂泻的美元一泻千里，泻到脱水倒毙而后快。所以，借用宋鸿兵以及乔良少将

的话来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中，中国政府其实握有制强敌于死命的灭门凶器。

倘若这战略核武器捏在老一辈痞子革命家毛周等人手上，则他们早就不假思索地动用了，但如今的当家人没有那么咄咄逼人。而且，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来，特别是中国政府开始背叛马列疯狂走资之后（芦按：这一句是我塞入的私货），世上的事就联成一气了，想分都分不开。"

如今中国经济已经初步纳入了全球化，不再是当年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闭关锁国的世外桃源。倘若美国经济垮了，势必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要跟着栽。就算这世界性经济危机不波及中国，美元狂泻不但意味着中国丧失外汇储备，而且意味着人民币相对升值，使得中国对美出口遭受沉重打击，势必给中国的财政收入造成双重损失——已经赚到的钱莫名其妙地融化了，未来赚钱的路子也给堵塞了（当然不见得是堵死），那咱们岂不是吃了大亏？

因此，按法罗斯的说法，中美现在的格局，类似当年苏美对峙，处于一种MAD 状态，亦即"互相确保摧毁"状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其实也就是疯狂状态。双方都能摧毁对方的经济，但双方都给吓得不敢动弹，所谓"此亦不敢先，彼亦不敢先。"

依愚见，在这场较量中，中国占有不容否认的优势。

第一、美国的经济实力并不直接被政府控制。政府只能通过立法约束，而这在民主国家并不是容易办到的事，势必遭到利益集团的抵抗。中国政府则是极权政府，所有的外汇全捏在政府手上（在自由世界，外汇分散在民间银行中，并不捏在政府手上），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毫无阻力，毫无制约。货币只有捏在为所欲为的极权政府手中时，它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武器。换言之，只有中国政府才具备发动货币战争的资格。

第二、美国政府是文明政府，如同宋襄公一样，讲究"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与"君子有所不为"，所以才会在伊拉克弄得一屁股两肋巴。倘若老美把傻大木或日本人、纳粹的辣手使出来，则伊拉克早就河清海晏了。多的也不需要干，只需把德国人枪毙人质那套使出来，规定凡一个联军士兵死亡，必定枪毙 100 名伊拉克人，实行一个月后，我敢保证伊拉克人民一定会自发起来，举

报甚至自动驱逐为他们带来无穷灾难的恐怖分子，正如海德里希被刺后布拉格20 万居民悉数走上街头，哀悼海领袖不幸逝世，愤怒谴责声讨万恶的恐怖主义杀手一般。

相比之下，中共这种什么烂事都干得出来、丝毫没有道义底线的痞子流氓政府，在面临覆灭时，一定会不惜以全世界为殉葬品。萨达姆撤出科威特时放火烧毁油田就作了生动示范。不难想见，如果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恶化到一定程度，中国政府屈服于军内野心家压力决定动武，为此与美国发生对抗时，不能排除他们动用这货币武器的可能。

以上所说，当然只不过是门外人语。文明世界是否面临这一潜在危险，还请专家指点。

2008 年 1 月 17 日

中共官僚阶级是西方封建贵族的等价物么？

拙文《传统中国为何不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贴出后，不止一位网友指出，如今中国出现了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相当于欧洲封建社会的贵族，乃是实现中国社会良性转化的契机。这里随便说说我的想法。

如该文所述，中古欧洲实行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 ）与中国传统社会（被官方历史称为“封建社会”）结构完全不同。其统治方式是国王统治贵族，贵族统治领地内的农奴。贵族既是统治阶级，也是被统治阶级（其实应该称为“等级”。关于两者的区别，请参考拙作《等级社会与阶级社会》）。后者决定了他们处于与最高统治者的冲突之中，有利于权利（rights）观念的自发产生，而权利观念的普及正是民主社会诞生与资本主义能够充分发展的前提。

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却与此完全不同，皇帝乃是唯一的统治者，具有无限权力（power），官府直接就压在广大自耕农头上。因为缺乏足够的统治能力和意愿，朝廷无法抑制土地兼并的自然发生，使得土地逐渐集中在崛起的豪强手中，导致大量无地游民出现。朝廷税收短缺，只能加重对农民的盘剥，到了一定程度后游民便揭竿而起，倾覆皇朝。新皇朝在人口剧减之后“计口授田”，重建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理想社会。在此过程中，冲突双方不是贵族和国王，而是广大农民和朝廷官府。因为势孤力单，农民不可能如西方贵族那样，与国王进行有节制的合理斗争，达成合理妥协，使得社会获得平滑渐进的进步，只能在最后实在活不下去时诉诸极端手段，拼个鱼死网破。这种斗争再多也不可能带来社会进步，只能起到“权力洗牌”的作用。

有的网友提出，所谓“农民起义”主要是天灾和/或外患引起的。我认为那不是主要原因。历来都有“农民起义”，其先锋从来是无地游民，而他们的出现和壮大，乃是土地兼并伴随着朝代的腐败越演越烈的结果。因此，“农民起义”一般并不是天灾或外患引发的，常常在后者发生前就已经出现了，天灾和或外患的发作不过恶化了事态，增加了暴乱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在风调雨顺时照样会有“农民起义”，但一般不至于颠覆皇朝。但在连续遇到天灾和重大外

患如同明末时，它就会颠覆皇朝。人口超出了土地的承受能力时也有这个危险。

总而言之，一个皇朝垮台的原因是多种的，乃是各种因素的总合，在我看来，制度的内在缺陷导致的兼并乃是一以贯之的痼疾。如果没有制度的毛病，即使发生天灾和或重大外患，也不会半个国家都成了杀人场。“广积粮”历来是中国那种农本社会的国策。如果社会合理，天灾的恶果就算不能彻底消除，起码也是能缓解的。

那么，现在咱们有了庞大的官僚阶级，是否为打破这循环提供了社会转型的契机？窃以为事情不那么简单。诚然，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中共官僚阶级有点像西方封建时代的贵族，这我已经在《阶级社会和等级社会》的旧作中讨论过了，那就是它是一种封建社会的“等级”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其特点一是按权力（亦即拳头）而不是按资本和能力分配社会财富；二是没有流动性，圈外的人打破头也不可能钻进去。从这些特点来看，它确实像西方封建社会的贵族。

但从别的方面来看，它连西方封建社会的贵族都不如，倒更像传统社会的“豪强”。中国传统社会的豪强和西方贵族的区别，在于它不是朝廷的压榨对象。相反，豪强们常常享有免税特权，例如《明律》就规定官员可以依据其等级，享受不同程度的徭役赋税减免，这才导致所谓“投献”的土地恶性兼并发生。而且，豪强常常就是官僚变成的，豪门巨族也常常左右朝政，在东晋时代尤其如此。因此，豪强们当然和君王可以有冲突，但那只是个案。虽然有个别明君（如曹操）打击豪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豪强和朝廷并不构成冲突双方，而是联手压榨无权无势的子民。

这在明末最明显，当社稷就要被“起义军”倾覆的生死关头，崇祯惦记的还是如何去子民身上剥皮，却毫无本事强迫豪强们顾全大局，忍痛出血，毁家纾难。他先要武清侯李国瑞拿出 40 万两银子助饷，李国瑞却宁愿因此被削去爵位并瘐死狱中也不肯掏钱。后又要国丈嘉定伯周奎带头捐献 10 万两，周死活不干，最后好歹掏了 1 万两。等到闯贼进京，刘宗敏日夜以毒刑夹拷大臣，光从周奎那儿就榨出现银 60 万两，其他珍宝无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豪强和西方的贵族很不一样，贪婪到了不知死活的愚昧疯狂地步。而且，他们和皇帝“斗争”的方式也和西方封建贵族不一样。

中国现在出现的势力雄厚的官僚资产阶级不像西方封建贵族，更像他们的老祖宗豪强，两者都和政府狼狈为奸，联手盘剥子民。因此，中国现在实行的烂制度要比西方封建制度更反动，更难改造。

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从“个人独裁”转为“阶级独裁”。传统帝制大臣类似总统制的内阁阁员，没有决策权，当然可以提出国策建议，但听不听是皇上的事，大政必须由个人一言而决，所谓“乾纲独断”。朝臣当然可以苦谏，但皇帝并无义务听取。这一套从朱元璋起搞得更邪乎，原来还有丞相作行政首脑，率领六部尚书办事，朱把这套废除了，自任行政首脑，集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于一身。有的网友沿袭钱穆先生的“部族专政”说，认为清朝不是皇帝个人独裁。我不能同意此说，满族亲贵享有特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干预朝政，满清沿袭的还是明朝的政制，朝政仍由皇帝一言而决。

毛时代实行的“无产阶级独裁”其实只是个人独裁，只有武力支撑，并不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而后毛共现在实行的“无产阶级独裁”则是官僚阶级独裁，它的政权基础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阶级，党魁不过是这个阶级的代言人，并非毛泽东式具有无限权力的为所欲为的暴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总算走出了帝制时代，进入多头专政（oligarchy）。此乃中国两千年专制史上从未见过的新事物，其缺乏传统赋予的内在稳定性可想而知。

从概率来看，集体独裁比个人独裁犯下大错的可能要低一些。“大跃进”和“文革”就是只有在个人独裁下才会发生的灾难。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政府无力推行伤害官僚阶级利益的政治改革。例如假定胡锦涛如赵紫阳一般开明，他也只会无所作为，因为他并非独裁者。在需要国家作大幅度改革时，有个英明的独裁者反倒是好事，例如老邓就是这样。如果当时实行集体领导，他在政治局里绝对是少数。集体领导最大的隐忧，还是有可能出现两派互不相下而使得国家瘫痪，诱发暴力内讧大规模发作。民初的府院之争就是如此。

所以，能否从眼下的官僚集团独裁中发展出有限民主（亦即在官僚阶级内部先实现西式按程序进行的公开争权夺利），从而获得真正的稳定，还是因大规模内讧导致垮台，端看我党的努力。

2007 年 11 月 21 日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看了某网友的归国感想，触发了我一直在想着的问题，我辈在网上忧国忧民，会不会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那帖子写的是他做了官的朋友对中国国情的观察，要点如下：

1）中国从来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民运要想靠暴力革命夺权已经彻底没戏了。

2）精英阶层出路多元化，只有做官才能发财的“独木桥社会”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各有各的奔头，不想轻易改变现状，而草民们力量分散，能量有限，没有精英组织，根本不可能构成对政权的威胁。

3）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描述的乃是中国人的最适生活方式，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

结论当然是没有必要改变现行社会制度，而且该制度定将长治久安。

上述两点我都没有异议，其实我早就在《也谈中共“气数”》中讲过了，只是我没有他那么乐观，认定中共最终会垮于内讧。但百姓是不可能强力改变现行社会制度的。

第三点则是我看了吴思的那两本书一直在想的问题。那两本书写得确实不错，当然许多内容我早就知道了，不可能给我什么“震撼感”。真正令我吃惊的是某些民运人士太弱智，竟然会以为吴思鼓吹那种生活方式，反对引入西方民主，抓住“利益最大化”的思考角度大作道德文章，指责吴思是利欲熏心的小人，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令人啼笑皆非。

我在这儿简略转述一下吴思的思想吧，因为看得太匆忙，所以其中到底有多少是他的想法，有多少是我的蒸馏升华，我还真说不上来。

他认为，传统社会的帝王和草民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官僚权贵阶层掠夺民脂民膏损害了帝王的利益（其实是把帝王该得的抢走了）。因此，但凡明君都是爱民的，急于“为民作主”。朱元璋和毛泽东一样，鼓励人民起来造贪官污吏的反，马克思所谓“阶级社会”的模式根本不适用中国传统社会。但明君总是少于昏君暴君，即使是明君，以一人之力解天下于倒悬也毫无可能。因为

有着许多确保“制度内贪污”的“潜规则”（也就是不成文法）确保了官吏能安全地用权力聚敛财富，于是贪官也就不会受到惩罚。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势必吸引其他阶层的人挤进官吏队伍，使得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

官僚机构如何实行“制度内的安全的常规贪污”，把权力化为自己的财富呢？那就是使用“合法伤害权”。因为草民的权利被剥夺，官府的权力其实就是潜在的暴力，可以用合法的暴力伤害敲诈子民，而草民即使有朱元璋那种“明君”撑腰，也未必敢去告御状，因为成败不可期，而成本代价太高昂。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如乖乖听任官府敲诈，用贿免的方式去避免官府的“合法伤害”，民间源远流长的俗语“舍财免灾”就是这么来的。

这结果，是官府机构越来越庞大，对子民的敲骨吸髓越来越厉害，资本主义就根本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富人永远是官府掠夺的对象，因此中国只有权力控制暴力、暴力掠夺财富的“生产方式”，没有资本控制暴力的西方生活方式（顺便说一句，他对国外颇隔膜，竟以为西方是资本控制暴力）。官僚集团急剧膨胀的结果，不仅使得官僚们为了保证每个官吏都得到足够份额而加大敲诈力度，而且使得皇家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小，再加上自耕农越来越少，税出当然也就越来越少。这就逼使朝廷杀鸡取蛋，不顾后果地搜刮百姓，极度偏离了孔孟之道的设计。当暴力抢夺集团与生产集团的比例达到失衡水平时，草民便揭竿而起，砸烂整个权力机构并大规模杀死人口，重新分配土地，推出一个为民作主的新君，使得朝政又大致与孔孟之道相符，回到循环的原点。这就是为黄炎培观察到的“腐败周期律”。

吴思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病态循环，乃是孔孟的原初设计忽略了人性，以为靠人的主观道德约束和修养便能确保社会结构与运转正常，不知道“人之初，性本恶”，权力必须以权力去制衡，因此社会的实际运作当然要逐渐偏离新朝的道德原点，最后言行彻底分离，使得孔孟的仁义道德对君民彻底丧失制约力，天下当然也就只能大乱了。

明白了这一切，不难看出中国今日社会仍然处在上述循环之中，而且已经到达了权力机构空前庞大，贫富极度不均的与传统末世极度相似的时代。但吴思没有指出，时代毕竟不同了，如今获得财富的捷径并不只有做官（也就是获得所谓“合法伤害权”）一条路。资本主义毕竟已被引入了中国。如今的潜规则已经从“草民行贿避免受到合法伤害”变成了“草民行贿以求分贪污的一杯

羹”。不能不说这是个极大的社会进步，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推迟了末世的来临。

为吴思忽略了的，是传统农耕社会生产力很低，财富创造率总是赶不上人口增长率以及官僚集团膨胀率，而如今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可是远远超过贱民财富被抢夺的速度，因此并不容易出现传统社会那种活不下去的饥民。这情形老金已经在他最初发的系列里介绍得很清楚了。

我的疑惑是什么涅？看了那两本书，我一直在想，其实世上没有什么“最好或比较好的生活方式”，只有“比较适合或最适合的生活方式”。从单纯的理论角度来看，民主制度当然是比较好的制度，但它可能是中国最不适合的生活方式。再美的成人服装，对于天生侏儒而言又有什么意义？

现行社会制度当然不公平，但它并无可能被草民推翻，也无和平改造可能。如果真给推翻了，也只会如同满清被推翻那样引出大乱来，以迎来又一名大独裁者告终，那又何必去折腾？或许咱们现在磨合出来的这个不良不莠的烂污生活方式就是新中国的最适生活方式也未可知。既然不可能改用更好的生活方式，那又何必去操心？如今连鬼子都在电视上承认中国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民调显示大部分受试者认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咱们还伤什么脑筋呢？毕竟，绝大部分草民的梦想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民主”“自由”，只不过是混个肚儿圆而已，我辈还胡思乱想越俎代庖干嘛涅？

2008 年 3 月 5 日

我看“潜规则”与“血酬律”

国内学者吴思先生所著《潜规则》与《血酬定律》，大概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部重要著作。早有多位网友向我推荐，要我写点评论。有的网友还给我作了网上摘要链接。我也早就答应了，但一直没有时间看。前些天才在网上找到匆匆看了看，但似乎都不是全文。而且，《潜规则》我只看了几段就没能坚持下去，原因很简单：那些事我都知道，谈不上什么新发现的“社会定律”。倒是《血酬定律》我还看完了（当然只是网上能找到的那点东西，大约并非全书），觉得作者确实相当成功地指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循环现象的部分发生机制，颇有独到之处。

遗憾的是，就我看过的那点内容而言，吴先生似乎有些话没说透，因此基本还停留在现象学水平，亦即相当准确地总结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现象，但未能充分阐发这些现象的发生机制。所以，所谓“定律”云云，似乎应该改称“现象”才是。不过，发现“社会定律”如今似乎是国内文科学者的时尚，大约他们对理科学者眼热得紧，以为所谓“社会科学”也有类似自然科学的定律等待他们去发现。当然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未足挑剔。

下面拉杂谈点心得。因为只是草草看了一遍《血酬定律》，记忆力又因最近害了老年性痴呆而大幅度衰退了，下文说的到底有多少是作者的观点，有多少是我的补足发挥，我还真说不上来。请有兴趣的读者去攻读吴先生的原著。

所谓“潜规则”

吴先生似乎不重视定义，也不兴在讨论问题之前便明确界定使用的中心概念，但他后来毕竟还是在《血酬定律》中给出了“潜规则”的定义。那定义我记不住，还是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吧。

所谓“潜规则”，就是传统社会乃至现代中共社会普遍实行的不成文法，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活动赖以运作的杠杆，是权力化为财富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它和明文制定的国家制度有两条区别：第一，为官方奉行的价值观谴

责，因而端不上桌，永远只能是潜在的游戏规则；第二，它是真正管用的社会运行规则。为官方颁布或认可的“明规则”其实只是官样文章。离开潜规则这套真正的游戏规则，官场便无法运转，因此无法废除。

潜规则的主要运作方式便是所谓 “合法伤害权”的运用。官僚集团在行政或执法时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可以动用手中权力，名正言顺地对子民或下属造成肉体或经济上的伤害，而这种恶意伤害从表面上看并不违反国法或诏令。

“合法伤害”之所以能奏效，乃是因为子民或下属没有保护自己的有效合法手段。即使不考虑官官相护的因素，“合法伤害”也是官员或上司弹性执法造成的，亦即大众熟悉的“穿小鞋”。这种迫害一般很难从字面上找出违法证据，反抗只会招来更严重的报复。即使有朱元璋那种“明君” “为民作主”，公开鼓励号召小民起来告贪官，百姓若真想循合法途径去讨还公道，即使最终胜诉，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担诉讼成本。若失败就更是雪上加霜。因此，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草民或下属自然只会选取“破财免灾”的最佳决策，以金钱贿赂上官，尽可能将 “合法伤害”降到最低点。

还必须指出，所谓“伤害”也可以表现为“刁难”，也可以发生在同级官吏甚至下级对上级间的公事来往之中。凡是跟我党官员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办同样一件事，是否加了“润滑油”的效率完全不同，既可以是咄嗟可办，也可以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卡脖子”、“紧鞋带”的还不一定是大官，有时不过是个恰好处在关键位置上的区区办事员（亦即传统社会的“吏”），俗话所谓“县官不如现管”。离开这种“制度润滑”，官场就不会运转。换言之，潜规则乃是保障官场正常运作的不可或缺的机制。

官吏集团行使名目繁多的“合法伤害权”，就是传统社会中权力化为财富的主要方式。因为它立竿见影，几乎没有成本投入（掌权前的钻营成本的预投入不计），“产出”极丰，“经济效益”极高，轻易致富的诱惑几乎是无从抗拒的，因此它并不能为严刑峻法吓阻，而且对各行各业的人都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吸引他们挤进权力圈内来。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

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组分是皇帝；第二部分是中央到地方的官僚集团（包括附着于官吏的寄生伥鬼集团），第三部分则是生产集团（包括农工商）。其中第二组分实质上是敲诈集团，其主要功能是使用“合法伤害权”敲诈生产集团，牟取巨额财富。唯一能制衡约束这敲诈集团的只有超然于这两大集团之上的皇帝。但他即使是明君，也不可能是遍察人间疾苦与官场弊病的千手千眼观世音。何况昏君和暴君的数量总是远远超过明君，在更多情况下皇帝不过是敲诈集团的头子，于是统治者和人民之间便只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构成了典型的刀俎与鱼肉的互动关系。

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最显眼的区别。请注意，“敲诈”并非“剥削”，投入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产出”不是靠什么“利滚利”，而是靠暴力威胁。这种国家其实是一个作了“仁义道德” 的堂皇包装的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土匪山寨，与西方（哪怕是处于奴隶社会或封建时代也罢）毫不相同。在这种国家个人求发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做官为吏或依附于官僚集团。此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独有特征，似不见于出路多元的西方社会。

由此可知，中国传统社会根本不是马克思笔下的阶级社会。它主要由两大集团组成：生产集团与暴力敲诈集团，后者的出现和存在并不是社会分工造成的，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无关，根本不符合西方的“阶级”定义。将两大集团之间周期性发生的战争图解为“阶级斗争”毫无道理。

“潜规则”决定了封闭的中国只会无限循环下去

当一个新皇朝初建时，除非是大臣篡位得国的司马氏之类，开国君主一般都能看到末世皇朝的无穷弊病，深知敲诈集团“虐民害物即豺狼”，了解生产集团的痛苦，因此都能励精图治，大幅度精简官僚机构，减少敲诈集团的人数，并设置监察官员去监察他们，以期制约敲诈力度与广度，甚至还会像朱元璋和毛泽东那样，鼓励草民起来与“官僚主义者阶级”斗争，与此同时还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此时便出现国人所谓“太平盛世”：战乱大大减轻了人口负担，土地过剩，敲诈集团人数和力度都得到了相当控制，生产集团的人数比例相对增加，

于是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经济开始恢复，直至最后出现农耕社会允许的最大限度的“经济繁荣”。

但因为孔教取消了国人政治发明能力，新朝的社会结构永远只会是前朝模式，仍然由权力毫无制约的敲诈集团与毫无权利与自卫手段、一盘散沙的小农生产集团组成。两者之间仍然是单向压迫的刀俎与鱼肉的关系，官吏可以靠敲诈而轻易致富。这便必然刺激现有敲诈集团加大敲诈力度，并吸引圈外人如百川归海一般加入进来，使得敲诈集团越来越庞大，生产集团越来越萎缩。敲诈集团兼并了大量土地，使得朝廷税入锐减（这在明朝最突出，朱元璋在降低官员俸禄的同时，规定敲诈集团成员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蠲免赋税和徭役，由此造出无穷弊端），于是皇家应得的份额相应剧减，被迫增加对生产集团的敲诈力度，使得大量生产者失去生产手段，变成游民。无以为生的游民便仿效官家，组成民间敲诈集团（亦即“农民起义”，旧称“贼”，后改称“土匪”）。当两者的比例到达临界点时，民间敲诈集团便和官方敲诈集团展开旨在抢夺肥羊的生死大搏斗，最终由民间敲诈集团化为官方敲诈集团，这就是所谓“改朝换代”。社会至此又回到了“太平草创”的循环原点。

不难看出，在这种山寨式的国家中根本没有自发诞生资本主义的可能，“萌芽”一长出来就给敲诈集团掐掉了，而潜在的资本家的唯一功能便是为敲诈集团作肥羊。据故李慎之老介绍，史籍中描述的宋代或明代那些大规模的作坊，其实都是官办企业，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它们和后来的国营企业一样，讲究的是政府需要而非经济效益，完全靠政府财力支撑。发匪也在南京办过这种“社会主义企业”，靠向“满统区”输出大量丝织品和其他手工业产品提供天国的战争预算。

因此，可以断言，如果鬼子不打进来，中国只会按既有模式无限循环下去，不会自发长入资本主义。西洋文明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的冲击，还是打开了为孔孟之道禁锢了两千多年的国人的政治眼界，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奠定了观念基础。

潜规则的发生原因

吴先生似乎不曾涉及这个问题，也没有解释“潜规则为何总是潜在的，不能化暗为明”，而且连潜规则的最大特点就是违反了官定价值观，他好像都没有指出。他虽然探索了潜规则不能被废止的原因，但说得似乎也很不到位。

依愚见，潜规则之所以出现，乃是朝廷以孔孟之道作为构建与管理社会的原则的必然结果。

孔教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乃是圣天子高高在上，君临亿万自耕农，子民们则由朝廷命官代天子“放牧”。统治者爱民如子，草民敬官如父，两者之间乃是“父慈子孝”的和谐关系。“父亲”的权力当然不能以“儿子”的合法抗争去约束，“儿子” 对“父亲”自然也就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并无权利可言。这在圣贤看来乃是天经地义，大儒董仲舒就曾公开主张“屈民而伸君”。一言以蔽之，孔教的核心就是道德，而孔门道德主要是两条：表彰臣子敬畏顺从君父权势的奴性，告诫君与父必须体恤爱护臣与子。

用现代人也就是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这种“道德空想主义”的政治设计，脱离现实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是人都该明白，子民就算是对上官敬之若父，上官也未必爱之如子。即使略去亲情血缘不计，父子之间也是祸福与共的利害共同体。君与臣、官与民之间难道能是这种关系？一个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毫无抗争的合法权利、甚至连身家性命都得不到保障的百姓，在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官吏眼中，迟早要变成一头嗷嗷待宰的肥羊，无论该官员在从政前是怎样熟读圣贤书，立志爱民如子都如此。特别是当官场形成了强大的负筛选机制，把一切违反潜规则行事者无情淘汰出局之后就更是这样。

这就是朱元璋用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惩治贪官，把贪官的皮剥下来悬挂在官府大堂上警告继任官员，仍然无法扼住贪腐洪流的缘故。他不知道官府的权力必须以民众的权利去抗衡约束，离开保障百姓的基本人权，“爱民”就无从谈起。要官吏们爱护百姓的前提，是百姓有爱护自己的能力。由皇帝“为民作主”、实行自上而下的监察非但没用，而且会引出副作用来。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元璋那样，将弹劾权赋予几乎所有的官员们，连六七品的小官都可以上疏弹劾一品大员，而且是“有闻即奏”，哪怕是根据谣传也可以发难，并无调查核实责任。然而这制度非但没有达到原设计目的，反而为最终倾覆大明的无聊党争提供了充足的用武之地。

总而言之，潜规则之所以无法化暗为明，是因为它违反了为朝廷提倡、全民信奉的孔孟的爱民教导，因此永远上不得台面。它之所以无法废除，是因为孔孟之道严重偏离人性，不切实际地指望君上以完善自身道德修养来自动抑制对臣下的抢夺，完全没有可行性，乃是绝对的空想主义，必然要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严重分离，亦即官定价值观与私下行为准则的两元背离。这就是潜规则何以出现而且无法废除，还在实践中取代了朝廷根据孔孟之道制定的“王法”，变成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国家政治经济运作杠杆的理论原因。

古今潜规则异同

颖悟的读者至此不难看出现代中国仍在搞这一套：官定价值观亦即马列毛主义规定的“干部是人民勤务员”毫无可行性，绝无可能变成官场的实践原则，当然就只能使用传统的潜规则（亦即“狼羊律”）作为替代的治国之道。社会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三大组分：皇帝（或曰“党中央”）、敲诈集团与生产集团。区别只在于在传统社会，皇帝和官僚敲诈集团可以分开也可以合流，至少在理论上，前者对后者还有制约作用，而后毛共的政治局直接就是敲诈集团的董事会。敲诈集团人数增长速度也同样惊人，如今的敲诈力度与广度都趋近于甚至在若干方面超过了传统皇朝末年水平。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最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引入后出现的社会变化。资本主义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财富的生产速率，因而使得财富增长的速度大于敲诈集团聚敛的速度。传统农耕社会生产力很低，财富增长总是赶不上人口增长率以及官僚集团膨胀率，而如今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可是远远超过贱民财富被抢夺的速度。虽然贫富悬殊加深，但从绝对财富占有量来说，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比过去极大的富裕了，并不会轻易出现传统社会那种活不下去的饥民。

另一个变化则是权力与资本相结合，使得权力集团从单纯的敲诈集团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传统的敲诈集团聚敛财富的手段是“豪夺”，并不介入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而如今的官僚资产阶级则是“豪夺”与“巧取”相结合，通过权力介入经济活动来牟取暴利，除了抢劫之外自己也参与了创造社会财富。即使是豪夺，那也不再是传统官吏使用的赤裸裸的强盗式抢劫，而是以

权力垄断资源以及商机。与传统敲诈相比，它更复杂，更巧妙，也更隐蔽，不像传统敲诈那样易于激起民愤，一般也不给受害人带来肉体伤害。

第三个变化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知识分子出路多样化，“官本位独木桥”开始被拆除。在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只有参加敲诈集团才能得到一切：金钱、名声、地位以及尊严，但如今知识分子不做官也能获取名声与财富。这不但减缓了敲诈集团的膨胀速率，更极大地减少了愤愤不平的高能量野心家的数量。

最后一个变化则是人权观念总算开始点滴渗入中国了，尤其在得西风之先的城市更是如此，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学会了怎样保护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敲诈集团不可能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为所欲为。起码肉刑在名义上是禁止了，“灭门县令”之类的中国特有生物趋于灭绝。因此，在城市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传统的“行贿以免迫害”的潜规则似乎正在变成“行贿以求分到贪腐一杯羹”。

这些大概都可以看成社会进步，特别是以中国的低标准来看就更是如此。这些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危机，推迟了末世的到来。再加上科技进步赋予统治者的强大物质优势，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官方敲诈集团和民间敲诈集团的生死大搏斗似乎不会重现了。但与此同时，这些进步也消除了逼迫统治者进行改革的社会压力，纵容他们因循苟安下去，使得社会危机日益积累下来，等到将来资源耗尽，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之后，大动乱便会因官方敲诈集团内讧而爆发。当然，这是说过无数次的旧话了。

2008 年 3 月 6 日

“霸道乐土”就是咱们的“太平盛世”

凯迪网《猫眼看人》里贴出了许多伪满洲国的照片。不看那玩意，我还真不知道原来“满洲国”不是“满州国”，而后者一直是我的写法。郑孝胥不是大儒么？怎么会闹出这种笑话来？

所谓“洲”， 原意是河里或湖里很小的陆地，如“沙洲”然，比岛还小。现代意义乃是从佛经而来。看过《西游记》的人都该记得，古印度人把世界分为四大部洲，亦即“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瞻部洲”和“北俱芦洲”。中国古人向无这种世界观念，在翻译佛经时不便译为比较小的“岛”，便使用了 “洲”字，表示四周有水。有此先例，西学东渐后把 continent 翻译为“洲”，似乎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因此，这“洲”和“州”不是一回事，后者是行政单位名称，如“幽云十六州”。所以，东北当然只能是“满州”而非“满洲”，无论从古义还是现代意义上都只能如此——它既非四面环水，也非 continent。郑孝胥当真是文盲。

废话少说，却说那些照片显示了伪满洲国当年的繁荣富强：“新京（长春）”经过合理设计的现代市容，满铁打破世界纪录的高速列车，大连港口新颖的圆形建筑物，满洲电影明星……当真是琳琅满目，更有人给出了详细的统计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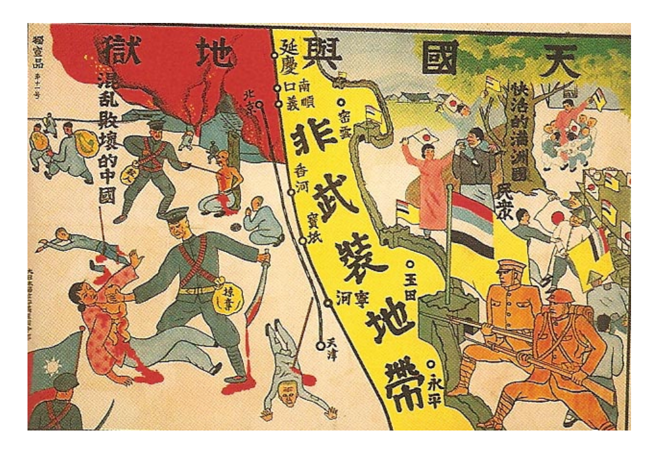
> “1931 年 9.18 事变前夕，东北城市化水平为 11.5%，1942 年达到 23.8%，而中国城市化水平 1990 年才达到 18.96%（2001 年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达到 52.1%，而 2003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 37%）。1939 年东北铁路里程超过 10000 公里，1945 年达到 11479 公里，而中国 1949 年铁路总里程 22000 公里，1943 年东北公路总里程近 6 万公里，而到了 1949 年，中国含东北在内公路总里程才 8.09 万公里。 1932 年，东北航空线总里程 1.5 万公里，当年或近年的中国航空线总里程目前没有数据，但是可以参考的是，1950 年的中国民用航空线总里程才 1.14 万公里。1940 年，时速 130 公里的弹丸高速列车由大连机

车厂研制成功。1934 年至 1943 年运营于南满铁路新京至大连区间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采用大连制造的 SL-7 流线型机车，全封闭式空调车厢。

到 1945 年，东北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被誉为‘东方鲁尔’。东北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31 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26.9%增加到 59.3%，而中国 2003 年才达到 57.5%。1938 年，伪满洲国共发电 16.3 亿度，而且有亚洲最早的大量的水力发电，1943 年，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发电能力每年 22 亿度，而到了 1949 年整个中国发电量才 43 亿度。1943 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 49.4%的煤，87.7%的生铁， 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业。1945 年时，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东北占 85%，台湾占 10%，连年内战的‘一穷二白’的中国其余部分只占 5%。而传统教科书说‘旧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等大城市或局限于一隅’，中国竟然大到会有 11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一隅’？”（请参见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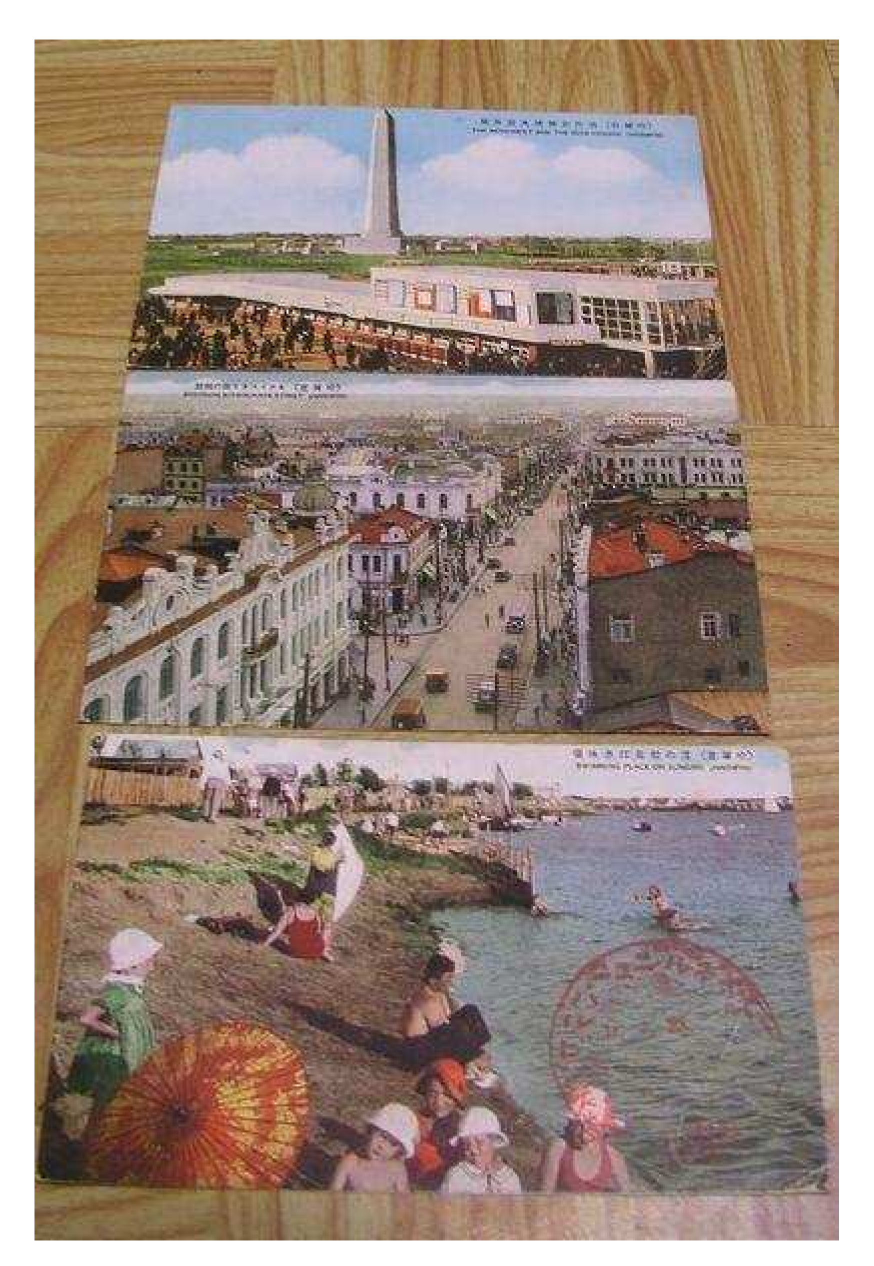
作者认为，官方宣传蓄意无视满州的富强，在介绍“旧”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状况时有意把东北地区排除在外，这种作法极不公平。这我也同意，但他似乎没看见最醒目的事实：满洲再繁荣富强，也不是中国领导人努力的结果。相反，满洲越是兴旺发达，就越能彰显中国人的耻辱，强烈提示国人似乎确如当时列强认为的那样，没有本事管理自己，只有在外国人的领导下才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当然无论是国是共，都只能对“满洲奇迹”讳莫如深了。

那些照片中最令我感慨万千的一幅，是伪满政权当时印制的劣质宣传画《天国与地狱》。画面从中分为两半，左面是关内的地狱，人民在连绵不断的兵患匪患下受苦受难；右边则是关外的天国，满洲国军与大日本皇军精诚团结，并肩保卫国境，使得关外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在幸福的天堂中。



这画耐人寻味，倒不光因为它虽是宣传画，说的却是正派人无从否认的事实：的确，伟大祖国自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就陷在无穷无尽的内战之中。民国成立后没多少年，国家便被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的武装叛乱撕碎，内战从此无日无之。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中国后，战乱仍然层出不穷，蒋冯阎发动的中原大战乃是现代中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血腥内战，此后的“三大战役”更因其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而将作为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最辉煌纪录而永垂史册。即使是在短暂统一的“太平年月”，困扰民生的匪患也从不曾得到根除。民国肇始，中原就惨遭豫匪白狼的蹂躏，后来更有在江南腹地猖獗荼毒众生的红匪，即使是在奉系军阀的老窝中，仍然有着大大小小的“坐山雕”。

但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代管”了东北后，刹那间关东便河清海晏、天下太平：抗联、“胡子”、马贼等等统统被剿灭，“国家”随之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其成就已经为那篇文章充分总结了，轮不到我这关内人置喙，只在此请读者看看照相机记录下来的“天堂一瞥”：



我觉得意味深长的还是，那漫画其实说出了中国人的千年政治理想，勾勒出了咱们“太平天国”的蓝图。

依愚见，咱们的“理想国”包括如下要素：

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不一定是现代极权政府）。

二、政府以“霸道”治国（亦即“强化 X 产阶级专政”），不仅扫荡了一切反对势力，实现了国内持久和平，而且不受西方司法程序以及人权保障的约束，铁腕镇压扫除土匪，严惩刑事犯罪，强化社会治安，甚至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果敢屠民，造出“夜不必闭户，道不敢拾遗”的良好社会秩序（据说日本人当初在台湾抓住小偷就枪毙，真个实现了“道不拾遗”）。

三、政府穷兵黩武，建立傲视全球的武装力量，重建“犯汉天威，虽远必诛”的国威；强力动用自然资源与民力，建设“为国增光”的重大面子工程，使得全民觉得无比熨贴。

四、国民生产总值、科技发明以及文化事业在统计数字上居于世界前茅。

五、政府搜刮人民的力度再大也没关系，但官员必须廉洁，刮钱必须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古训。

六、百姓能吃饱肚子，以便鼓腹而歌，歌颂唐虞盛世。

大概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中国人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国吧？难道党朋们连篇累牍地歌颂我党，说来说去不就是按此模式？“解放”之初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竭诚拥护我党，难道又不是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霸道乐土”即将来临的一线曙光？如果他们知道世上有“一重标准”这档子事，该去歌颂真正的“霸道乐土”满洲国才是。

以上列出的六条要素，比起古代帝王追求的“文治武功”来，只不过多出了时代附加的比较坐标而已。过去中国就是整个世界，与周边蛮夷不存在平起平坐的比较问题，只有耀武扬威的必要，所以不需要第三、第四两条中与其他文明世界比较的内容。当然，在传统中国，第三、第五条常常被民间知识分子反对（例如杜甫就反对“武皇开边”，鼓吹体恤民瘼），但此类噪音从来不是主旋律。

以上所述乃是“理想国”的“最高纲领”，在实践中除了满洲国，谁也不能全部做到，特别“官员必须廉洁”这条从来就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满洲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沉重的战争负担，第六条也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国民党则一条都没做到，所以让大众唾弃。毛泽东做到了第一第二两条，第五条做到了前半截，后半截则是“取之于民，塞之狗洞”，而这就已经满足了咱们的理想国的“最低纲领”，所以备受人民歌颂。如今的中共政府则开始向除了第五条之外的各条逼近，因此，客观说来，它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有过的最符合中式政治理想的政府之一。当然它比起满洲国来差远了，但满洲国不能算成中国政府，其辉煌衬出了中国的黯淡，当然只好忍痛略去不计。

上面“六项基本原则”还是复杂了些。要满足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其实只需做到两条：第一，天下太平；第二，公民有起码的经济自由。除此之外，被西方人视为必需品的民主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诸如言论自由，政治权

利，人身安全保障等等，乃是大众觉得缓不济急的高档消费品，并非普遍需求。

别以为这两条要求低得太可笑，过往几千年中，能满足民众这两条基本需求的政府实在不多。能做到道家“无为而治”的就更少。其实只要长期保证了这两条，国家立即就能繁荣兴旺起来。盖中国百姓乃是天下第一能苦吃苦做的苦力，只要给他们几十年的和平，为他们留下最起码的经济自由，则他们立刻就能创造出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来。

这在近现代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次：晚清新政废止了国家蓄意压制民间工商业的传统，立即就引出令鬼子刮目相看的经济繁荣；国府在“十年建国”时期为江南一隅人民提供了和平环境，立即就使得全国的 GDP 增长速率连年超过日本；改革开放部分恢复了人民被彻底剥夺的经济自由，不到 30 年功夫中国便成了世界经济强国（鬼子甚至称为“经济超级大国”）。国府之所以没能变成“理想国”，完全是因为它运气太糟，遇到了强大外敌入侵，无法保障几十年的和平罢了。

由此可见，在中国，政府唯一的职责就是提供国内和平，只要做到这条就是称职的政府。除此之外，政府的功能基本是个负值，因此“贵在无为”——政府越是清静无为，百姓便越有福。

从这个意义上说，称职的中国政府有好有坏，所谓“好政府”就是尽量避免将这负值强加给百姓的政府，如实行新政的清廷、十年建国的国府以及如今的中共政府；坏政府则是秦始皇、隋炀帝、毛泽东式的残民政府，其共同特点是不肯让百姓干自己的事，定要彻底剥夺人民的经济自由，敲骨吸髓、耗竭民力去修长城、挖运河、建“小土群”、“卫星田”、“红旗渠”、“人造平原”等等。

至于像满洲国那样合理高效地动用人力物力，主导经过科学运筹的全面经济建设的真正有为政府，则根本不是中国人可以指望的。谁要是躐等躁进，去追求国人不配幻想的好事，难免要重蹈辛亥覆辙。当初辛亥乱党就是不肯知愚守拙，却要好高骛远，为成立“更好的政府”，把既有的 “好政府”砸了，其结果是连个能保障国内和平的称职政府都建不起来。折腾几十年，死了亿万人之后才总算有了个称职政府，却不幸是个历史上最坏的政府，害得百姓全面彻底丧失了自由。一直要等到强人统统死光，政府弱化到让民众重获了极有限的

经济自由，国家才又重获生机，但国家制度仍未恢复到清末的先进水平，连名副其实、有职有权的中央“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都没有。这历史教训强烈提示，中国人不配拥有一个西式文明政府，能指望的就是传统“盛世”再现。

的确，如今的“盛世”了无新意，在本质上和旧有的“汉唐盛世”、“康乾盛世”也没有太大区别。政府的贡献仅在于两条：提供了和平环境，又没有过度剥夺人民的经济自由。唯一的差别只在于如今的国民可以利用极度有限的经济自由，使用高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使得经济自发增长的规模与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古而已。

唯其如此，它也极大地加快了“盛世”的腐烂速度。不幸的是，“霸道乐土”的霸道只针对草民，不针对官僚机构。在这点上，现代盛世连古代盛世都不如。而且，上述理想国理念里没有“制约权力以根除腐败”这一条。许多知识分子反而认为以权谋私乃是天经地义，非但不把吴思揭示的“潜规则”、“血酬律”等丛林法则看成是严重的社会弊病，反倒解读为“宇宙运行规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理当如此，万世不易，甚至如同欺软怕硬的学童对老师见人下菜碟一般，鄙视仁厚君王，敬慕屠民暴君的“霹雳手段”。于是这盛世便注定了只能是传统的“中兴”，亦即末世到来前的带病兴旺发达。国家永远无法靠和平改革拔除自爆雷管。大众只能延颈等待“乱世” 的到来，再次回到“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循环原点去。

2008 年 3 月 8 日

附录：东北竟然曾经如此富强！

（作者不详）

东北独特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形势决定了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北亚各大政治势力的演武场，多少次文化建设在毁灭性战争后几乎要重新来做，这是东北古代文化缺少遗存的重要原因，而东北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更加扑朔迷离，令史学家望而却步。可叹的是，在文化纪录和传播手段日益完备的近现代，我们仍然难以知道东北的那段岁月。

零星读到过《奉/天日报》和《满/洲日日新闻》等张/作霖时期和伪/满/洲国时期的报纸，但对东北从 1920 年到 1949 年的历史一片模糊。读罢曲晓范先生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除了惊讶于东北昔日的富强，更佩服于曲先生治学的公心、魄力，悲叹于中国的文化胸怀。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东北 1949 年以前的历史，讲的只是奉系军阀和关内军阀一样压榨百姓，伪/满/洲国的 14 年就只是日本如何奴役人民。而对关内中国工商业介绍得太多，以致于谁都知道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知道江浙财团。关于中国电影史则总是反复讲上海影业的繁荣，阮玲玉、胡蝶、赵丹广为人知，而对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厂——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只字不提，总是直接跳到 1945 年中/共到长春接受日伪设备、厂房、人员，成立东北电影公司。这就有太多的自相矛盾，怎么 1949 年的东北突然就成了共和国长子？怎么与 1931 年不同，1945 年时国共两党突然那么热心于东北，拿出血本来争夺？东北又是拿什么来支援解放战争和赤贫中国的建设？长春又怎么突然成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其实，东北人从年纪大的长辈那里很难听到象关内那样的对于旧社会生活的痛苦回忆，小时候的疑问在曲先生这部书里我们找到了线索，原来，正是被剪辑过了的历史塑造成现代东北人经济生活的自卑。

1925 年，奉系军阀在第三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占领上海，这背后的基础就是东北的经济已经比肩江南，20 年代末东北工业化水平已超过长江流域，张氏父子的新政使东北的民族工商业成为日本满/铁附属地经济的威胁，这成为 9.18 事变的经济诱因。东北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而直到 1949 年，关内中国可怜的的工业还只是局限于几个大城市。20 年代末，北平、上海拍发到欧美的电报需转经沈阳。东北易帜前夕，东北拥有了中国最强大的海空军，易职后全部移交南京政府。而当我们广泛宣传上海滩的繁华时，千万不要忘了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亚洲第二国际大都市 ——哈尔滨，34 家外资银行在哈埠开设分支机构，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哈埠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在哈尔滨的外国商业机构达 1809 个。1928 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 1926 年，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

电台成立并开播。1928 年 5 月，哈尔滨车站已经可以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

1932 年 3 月 9 日，伪满洲国成立， 1943 年，当时世界上约有 80 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承认伪满洲国的有苏联、泰国等 23 个，中华民国虽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但在 1935 年之后与其建立了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从 1933 年到 1942 年，伪满当局详尽规划了大大小小 109 个城市的建设，而这样的对东北的全面系统规划我们还没有做过。在这些规划中，如果我们是一个有出息有远见的民族，只要对照这些城市在 1945 年以后的规划的杂乱无章、长官意志以及建筑质量的低劣，就应该从灵魂深处振作起来，改造我们的国民性，这远比口头的反日更容易战胜日本。中国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只有大西北和西南，同为亡国奴，我们没有资格瞧不起伪满洲国，而作为日本认为可以永久占领、认真建设乃至迁都长春的地方，东北的 14 年发展无疑比其他地区有着更多值得学习和反思的地方。

举简单几个例子佐证一下伪满的城市和工业建设。

长春曾是亚洲近代唯一一个比东京还先进的城市，是中国第一个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的城市，是中国唯一的仿照外国首都建造的城市(巴黎、堪培拉)， “国都新京（长春）”到 1934 年，整个城市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因此有了“城市山林”和“森林之都”的美称。到 1942 年，长春人均占有绿地 2272 平方米，超过华盛顿 1 倍，是日本大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 5 倍，为世界大城市之冠，一时在国际上声名鹊起。1934 年，长春建成亚洲最大的无线电台——新京无线电台，长春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的城市，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的城市。长春是中国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1938 年开始，在长春规划 120 公里的环城地铁和有轨电车道路，还有环城高速公路。主要街道的照明和电讯线路采用地下管线，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

伪满洲国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关内连年内战，赤贫的中国人口大量涌向关外，1936 年 1 月，全东北人口 3097 万，到年底猛增到 3701 万人，1941 年达到 4229 万人。东北在张氏家族时代就以惊人的城市化进度超越东部沿海，伪满时期城市人口继续增长，

东北惊人的财富早已进入美苏两国和国共两党争夺的视野，中共先期潜入东北，当时天下共知，谁拥有东北谁就拥有中国。毛泽东甚至决心，如不能进取关内，就在长春建都。作为全亚洲最美丽的城市，长春一度成为许多学者讨论国民政府还都何处的首选。而最终最大的胜者是苏联。胶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为了换取苏联参战以大幅减少自己对日作战的伤亡，在雅尔塔，美英合伙秘密出卖了中国，以中国在外蒙古和东北权益的巨大丧失为代价换取了苏联的参战，他们指出："惟有苏联参战，才能最终战胜和彻底摧毁日本"。1945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 150 万军队在满洲里、朝鲜半岛北部、南萨哈林岛（库页岛）迅速摧毁了日本军队。仅仅 23 天的战争，苏联军队以极少的对日作战伤亡从中国换取了巨大利益，（中国抗战后没敢追究关于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加入苏联成为图瓦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又在 1946 年 1 月被迫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合计失去达 173.5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打下 1300 万平方公里江山的清政府才丢失领土 150 多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地区和外蒙古大部是丰美的草原和高山森林、草场，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和丰富的矿藏，而我们中国人至今还以为那里都是戈壁荒漠。）还缴获了丰厚的战利品。这还不知足，从1945 年 9 月到 1946 年 5 月，苏军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国，9 月起 7 个月里火车日夜不停，甚至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仅拆运宏大的鞍钢就用了 40 天，发运货车 60 列。1945 年 11 月 15 日前，仅从沈阳每天就有 200 辆货车开往苏联，到 1946 年初，大沈阳 90%以上工厂都成空壳，连门窗都被拆走。共计劫走东北铁路机车的 75%和货车的 93%，而东北集中了中国当时的大部分铁路物资和几乎全部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运输车辆。

忙于内讧的国共两党对此置若罔闻甚至争相献媚于苏联，倒是中共对苏军在东北奸淫妇女提出了抗议，国统区群众对中苏密约出卖外蒙古和苏军侵吞东北庞大资产的行径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大公报》总主笔王芸生为此奋笔疾呼，却在 50 年代被扣上破坏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帽子不得翻身。东北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抗战后曾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面对当时东北复杂险恶的形势，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定地说："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据我党的一贯说法是，1946 年 3 月 9 日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但至今仍有歧义认为是苏军所为。著名地质学家、吉林人张莘夫受国民政府委派接收抚顺煤矿，1946 年在试图阻止

苏联工程师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害。鉴于苏联在伊朗、东北、东欧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威胁了美国利益，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中国要求下对苏联提出交涉，1946 年 3 月苏军开始回国。

残存的千疮百孔的东北工矿交通和破败的城市仍然让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咋舌，解放军更没有见过密集的高压电网和遍地飞驰的火车，留下了“将军全国都走遍，发现工业聚南满”的惊叹，还有“火车不是推的”的笑话。

中国特色——一个庞大的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

吴思先生的《潜规则》、《血酬定律》指出了一个过去一直为人忽略的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截然不同，乃是国（皇帝）——官——民（普通百姓）的“三明治结构”。介于“国”与“民”之间的“官”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独立集团，它的利益当然与百姓不一致，但也常与皇室相冲突。

古人早就觉察到了这一点，明朝官员邱橓给万历皇帝上疏，说：“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而又以富买官！”

这是传统社会最典型的末世病态：官僚集团把皇家和百姓都抢穷了，自己却越来越富，越来越庞大。其膨胀机制邱橓已经指出了，那就是“以官致富，以富买官”：当官后靠敲诈百姓致富，致富后再贿赂上司求得升迁，好做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或是富户为了逃避敲诈去买官做，由此既获得护身符，又能靠敲诈百姓加倍收回投资。这结果当然是官僚敲诈集团越来越庞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他们的手中，国库和百姓的钱包也就越来越萎缩，直到百姓再也活不下去起来造反为止。

这现象出现完全违反了传统社会的设计初衷。孔孟之道的理想官员不过是天子的代表。这些人毫无私心杂念，拒腐蚀，永不沾，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勤劳王事”，一面代天子“牧民”，传播“教化”，亦即用官定的奴才哲学去为百姓洗脑，“化民成俗”；一面用圣贤之道去约束君王，告诫君王为了自己的远期利益爱惜民力，由此在百姓和皇帝之间起到一种调节双方的制衡缓冲作用。而理想的君王则能根据圣贤教导，体恤民艰民瘼，及时为民作主，撤换惩处贪官污吏，同时也严惩胆敢“犯上作乱”的“刁民”，对官与民的冲突起到调节制衡作用。

然而这设计却忽略了百姓的权利，使得百姓对官对“国”都毫无制衡能力。朱元璋和毛泽东都发现了这一设计缺陷，前者一面严惩贪官，一面鼓励百姓起来上告虐待他们的贪官污吏，而毛泽东更以发动 “文化大革命”来“反修反修”，指望靠暴民造反斗倒斗垮斗臭斗烂“官僚主义者阶级”，使干部变成巴黎公社领导人那样的普通劳动者与人民勤务员。

如所周知，两人的努力都失败了，朱元璋还没死就变相认输，哀叹无论他怎么残酷地惩罚贪腐，贪官污吏还是层出不穷。而毛泽东发动的暴民造反非但没有摧毁“官僚主义者阶级”，反而使得他们在东山再起后变得更强大，使得“官” 相对于 “国”与“民”的比例，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实力上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不管怎样，毛泽东发明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一语确实很精辟。虽然“阶级”一词用得很不恰当——阶级乃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集团，而官僚集团与之毫无相干，但此语的提出，毕竟说明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亦即中国社会中的官僚集团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立的实体。

在我看来，该集团具有以下特征：

1）它是一个不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超越于时空独立存在的永恒实体。

2）它的存在、膨胀与兴旺发达完全靠政治权力来维持，而这政治权力其实就是动用暴力的能力。

3）它的权力无从约束，哪怕是在理论上拥有无限权力的皇帝或是党中央政治局都奈何它不得，顶多只能惩罚其中个体，但无法彻底剥夺它的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更不可能消除它的独立性，使之附着于君或民，为后者服务。

4）因此，它是一种自己支持自己的实体，其发生不需要什么经济基础，其存在不需要民意支持拥护，甚至也不代表其他阶级，只代表它自己。

5）它具有一定流动性，并非中世纪西方的世袭贵族，通常能把社会上的才俊之士吸纳进来，因而变得越发强大。

6）它本身具有无限膨胀倾向，具有吸纳社会财富的强大能力，不可能以和平的合法手段消除之，也不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消除其内在的独立性，被改造为具有附属性质的政治集团，只能 “物极必反”，在达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临界点时，以暴民造反暂时摧毁之，为的不过是它在新朝中再度投胎成形，最终长成撑破胆瓶的阿拉伯魔鬼（genie）。

一言以蔽之，它和恶性肿瘤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两者都能无限制地吸取机体营养，都能无限制地疯狂生长，机体内都没有抑制或消除它的机制，一般只能以外科手术切除。

鄙人无知，还未在西方社会发展史中见到类似物。西方社会的政客总是代表某个或某些阶级的。英国早期的国会议员代表的是贵族领主和一部分上层市民的利益，后期的国会则是社会各利益集团的代表依法争权夺利的场所，而国会立法则反映了各阶级、阶层与集团的利益折衷。公务员集团则完全是个中立的职能机构，既不具备吸纳财富的能力，又没有行使“合法伤害权”的可能。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西方的政治家们就有很明确的代表性。政治家们的阶级意识也相当明显（所谓 class-conscious）。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大概是法国大革命前国民公会中的“第三等级”与王室的利益冲突最终恶化为暴力冲突。

正因为此，西方历史学家和社会学者们是如此习惯于“阶级分析”，以致费正清在《剑桥民国史》中不无纳闷地指出，国民党政权并无阶级基础，它并不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也不靠哪个阶级的支持，而是一个靠自己支持自己的政治集团，而支持的手段就是武力。

其实岂止国民党政权如此？我党那“三个代表”不必说，传统社会的官僚集团难道又有什么阶级基础？地主和富商乃是他们的渔猎对象，并不是保护对象。穷棒子的骨头里能榨出什么油水来？和珅家中抄出来的八亿两白银，若要靠从杨白劳头上刮，就算全国四亿杨白劳都刮遍，也绝无可能从每人头上刮到二两白银。这点常识随便哪位和贫下中农结合过的老同志都该知道。

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尾大不掉的官僚实体，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国”还是民，都没有制裁约束该实体的能力。虽然皇帝在理论上拥有至高无上、予取予夺的权力，是一切官吏的恩公，但并非全知全能的超人，即使有心也无力时时处处充当官民冲突的仲裁人。何况大多数皇帝关心的不是别把百姓刮到活不下去，而是如何通过官吏去更有效地搜刮百姓。草民则如同一盘散沙，既无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又不可能结成合法组织来保护自己，只能俯首贴耳，任人宰割。

这传统传到今天就更加难以遏制，遑论逆转之。如我在旧作《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中指出的，现代社会连传统社会都不如。传统社会里的官吏是靠君恩做官，而皇帝是靠天恩做天子，并不需要谁的支持拥戴，因此他任何时

刻都可以撤回对臣工的恩赐，想剥哪个大员的皮都毫不是问题。而现代皇帝是靠部下的拥戴当领袖，得罪了官僚集团便连皇帝都做不成。毛泽东枉自作了“千古一帝”，尸骨未寒太太和侄子就给抓了起来，这种事绝对不会在传统社会发生，除非是不幸遇到乱世的汉献帝。

因此，时代的“进步”反而使得官僚集团实体变成了无从撼动的南天一柱，左右逢源的弄潮儿。秦晖教授用的“尺蠖效应”一语，就非常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点。

所谓“尺蠖”乃是尺蠖蛾的蛹虫，它移动的方式是将躯体一屈一伸，无论是屈还是伸，都总是向着一个方向运动。这也就是我党改革的实质，无论政策是向左还是向右，收紧还是放松，受益者总是官僚集团。国家强调企业自由时，他们便大规模化公为私，国家强调对私人企业加强管理时，他们便趁机整垮私有企业的竞争对象。无论国家的政策如何变，他们总是“江流石不转”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受益人。

其实公平地说，国家政策的设计初衷倒未必是变着法儿地损民肥官，胡温试图扮演的仍然是传统明君的角色，所谓“新三民主义”（“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乃是典型的传统明君的“为民作主”。因此，他们在察觉到某项国策损害了草民利益时，不免要出来“为民作主”，提出一个相应的弥补政策来。可惜到了下面就被官僚集团掐好火候，“忠实执行”成了再度损民肥官的“尺蠖”高招。秦教授在那篇长文中举的“赠送国有股权”的例子，就再生动不过地表明了官僚实体们是如何屈伸如意，如鱼得水地利用每个国策损民肥己。“左右逢源”这个成语的新解，便是“无论政策左转还是右转，都一无例外地要变成官吏集团的财源”。

这种社会能有什么前途不难想见：百姓过去好歹还能指望明君或挟帝威而临百僚的贤相（如张居正）出来“为民作主”，稍微压下官僚实体的权势，给他们让出一线喘息空间，新时代则连这个指望都没有了。就算是党领袖有心当明君，他也没有这么做的传统条件了，官僚集团这个庞大实体已经在新时代长成了一枝独秀、甚至能吞噬皇帝的百头凶龙。

很明显，要这个一枝独秀的怪物同意搞自残肢体的民主改革绝无可能，而传统的暴力屠龙方式也已经过时。吾人可以预期的，便是这章鱼长得越来越大，最后因不堪自重的负荷而肢体断裂。如此而已。

2008 年 3 月 11 日

古今官僚社会异同

看了网友对拙作《中国特色》的质疑，想补充几句话。限于篇幅，没能写在那篇文章里。而且该文主要是剖析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重点不在于比较古今异同。

这位网友虽承认国民党控制人民与政权的程度决非我党之匹，但他认为从长远时段来看，国府时代照样保留了我指出的中国特色，亦即社会主体乃是一个庞大的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这点我当然同意，并已经在该文指出，无论是我党，是国民党，还是传统社会，都具有这最大的特色，因此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很不一样。

但他据此认为我对中国的前途太悲观没有什么道理。他的意思似乎是说：既然台湾都能民主化，大陆又何以不能？我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大陆民主化的前景远比台湾黯淡。

从总的方面看来，中共社会和传统社会相比，其实更加倒退了，传统社会的改革远没有中共社会的改革困难。满清可以由朝廷下诏，主动实行宪政改革，而中共今天就绝无可能做到这点。同样难以想象，蒋经国宣布解除党禁报禁的好事会在大陆平安无事地发生。这是因为中共社会除了秉承传统社会的背时传统之外，还从苏联进口了更加反动百倍的极权制度，使得民主改革基本没有了可能。

与传统社会相比，中共社会具有如下最明显的特点：

1）理论上的绝对君权没有了，因而社会结构从三明治变成了“二明治”，亦即皇帝那层没有了，只有官僚和人民两层。

2）皇帝对官僚集团的制约力就此丧失。这意味着再不可能出现明君改革。当年慈禧老佛爷一纸诏书下令各省设立谘议局，全国凛遵无违，反抗的念头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谁的脑海中——孔孟之道没有这一条，顶多只有“臣死谏”，但绝不会有哪个臣子因为改革伤害到自己的利益，便联合其他大僚起来造反。

如今可不是这样子了，我已经反复指出过，权威逐代递减律使得党领袖仰承部下鼻息，即使有心改革也不敢开罪他们，否则“今朕位且不保”，还谈其余？

3）官僚集团操控人民的能力空前强化。传统社会包括国府时代的人民从来就没像毛共时代那样被严密地组织起来，处于党无所不在的监视控制之下。如今党的控制虽然不像毛时代那样无微不至，但仍非帝制时代或国府时代可以望其项背。

4）人民“原子化”，也就是所有的民间社会都被无情粉碎了，人民成了彼此之间毫无连接的分散的原子。这和传统社会或国民党时代是两回事。古代中国民间社会虽然没有西方发达，毕竟还是存在的，诸如同乡会，民间宗教组织，会党等等；民国时代除了各种西式政党外，更有相当发达的商会，工会，学生会等等，只是后两者常被共党渗入。人民的原子化使得人民基本丧失了能量，极大地增加了统治集团相对于人民的优势。

相比之下，民主改革前的台湾的优势简直就不是大陆人可以梦见的。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就很软弱松散，对人民几乎没有控制，地方党部并不控制政权，省长都是由政府指派的，具体来说也就是老蒋指定的，与党没什么相干。省党部根本无权控制省府。类似地，市长县长也由上级政府机构指派，与地方党部毫不相干，更不接受后者领导。地方党部对非政府企事业人员毫无控制，对基层人民就更不必说了。国党播迁台湾后虽然加强了对下面的控制，但毕竟不如我党百分之一，而且孙中山毕竟是靠玩“民主”起家的，以最终实行宪政为标榜，“建国大纲”写得明明白白，徒子徒孙们没那脸抵赖，因此国民党从 50 年代便开始县长民选。大陆恐怕再过 20 年也没有这个希望，连“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都能引起轩然大波，这种丑剧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中华民国在台湾”都不会闹出来。

5）科技进步使得政府完全垄断了暴力，使得统治者有恃无恐，再不会感受到传统帝王生怕被暴民推翻的入骨恐惧，因而失去了被动让步的可能。

总而言之，如今乃是官僚集团的黄金时代。有史以来还从无哪个时代如今天一样，官僚集团既不受皇帝约束，又不为草民震慑，实力膨胀到了空前程度，成了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从无哪个时代如今天一样，官僚集团将触角伸到了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完成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就连学术科研机构都官僚化了。

与旧时代相比，新时代的唯一优势只在于西方给中国人带来了先进的价值观念。但这种观念改变要兑现为社会转型，唯一可行的途径是由觉醒了的明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晚清、苏联以及台湾经验然。自下而上的剧变只会适得其反，如民国经验然。但上面已经说过了，因为党领袖权威递减以及官僚集团势力的剧增，如今中国已经没有了自上而下作良性改革的可能，任何改革都会变成“尺蠖”闹剧。

我知道会有人引苏联的先例来反驳我，不过，请允许我提醒大家，苏联的官僚集团历来比较廉洁，而且人家是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党官僚从未变成集权力与资本于一身的庞然大物。改革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根本没有中共官僚可能蒙受的那么惨重，当然也就不会引来他们的疯狂反抗。

2008 年 3 月 13 日

中共治下无冤案——陈良宇案判决有感

顷见网上署名“林彤”的文章，为陈良宇呼冤，说胡中央加给陈的贪污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等不能成立。据他说，贪污罪由三部分组成：国家对陈良宇父亲房产的赔偿、陈良宇之子的工资收入、陈妻的工资收入以及出国旅游开支，这些均不能算成是贪污。受贿罪则是“资本家对政客的捐款”，“在西方国家，商人向政客捐款赠款是合法的”，不能算受贿。挪用社保基金也不属于滥用职权，而他弟弟从土地交易中牟取暴利也算不上“玩忽职守”，云云。

这位林先生的倾向很明显，他对陈良宇案情堪称熟悉，知道局外人不可能知道的陈父房产的瓜葛。为了为陈呼冤，他甚至连“在西方国家，商人向政客捐款赠款是合法的”的神话都发明出来，似乎从未听说过洛克希德公司行贿案，而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又是怎么进班房的。西方商人向政客捐款不假，但一般是为竞选运动捐款，并不能捐到该政客的腰包里去。请问陈良宇是这么回事么？

其实当初抓老陈，理由乃是挪用社保基金去投机倒把，并不是什么纳贿贪污。如今政府的宣判，恰好证明社保基金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与我听到的小道消息完全一致。据说所有的诸侯都这么干，有的还把老本贴得一干二净，而陈不亏反赚。中央拿这问题说事，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连国家的外汇储备不也买成了美国债券么？社保基金拿去投资，避免了通货膨胀造成的缩水，只能证明陈有经济头脑，并不能作为罪行。唯一需要检查的是陈是否严格按照程序操作，但若按这标准，只怕我党没有一个官员能及格。

其实分说这些毫无意思，林文只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老陈当初气冲斗牛，满不把小胡放在眼里，及至身入囹圄，不但本人在法庭上乖乖认罪，就连在海外也只能有个别人为之呼冤，不能不给人一种《好了歌》的凄凉感。

我早就说过了，中共治下无冤案，盖“社会主义法制”不是文明世界的法治。人家说得明明白白，他们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并非社会契

约。是否该动用“专政机器”对付某个（群）人，并不是因为那个（群）人犯了罪，而是看此举对巩固我党统治有无必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把这基本原理说得非常清楚：“必须杀掉一批人，不杀政权不能巩固。但要杀得有理有利有节，杀得各界无话说。”

因此，之所以要杀那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是因为伟大领袖觉得不杀他们，政权就不能巩固。只要君王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随便杀人，此乃“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理，各级领导必须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文明世界的“法治”则完全不是这回事，它是对罪行的被动惩罚，犯罪在先，惩罚在后，这才可能有冤案错案出现，所谓“冤案”乃是“无罪被罚”或“罪不当罚”。这概念根本就不能套到“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去。“社会主义刑罚”乃是旨在慑服潜在的挑战者的主动打击，并非事后惩罚，这才会有“双规”这种中国发明。它的实质，不就是中央领导觉得有必要整某人，但又苦于无法找到借口，只好践踏法律程序，把那人抓起来，“规”到让他再也扛不住，只能乖乖悔罪为止。待到人家自己都在法庭上主动认罪了，别人还来什么劲呢？

所以，中国乃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用文明世界的“冤案”“错案”观念去硬套，未免谬以万里。在那个野蛮世界唯一能使用的文明标准乃是功利分析，也就是有无必要。

以此标准来衡量，毛泽东在文革中整死整垮一大批袍泽，属于没有必要，因为自刘少奇以下所有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都是铁杆毛分子，别说在他生前，在他死后也不会砍倒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完全是瞎马自惊、庸人自扰。而无论是江泽民整垮陈希同、胡锦涛整垮陈良宇都很有必要。套伟大领袖的语录来说就是：“必须整垮个别桀骜不驯的诸侯立威，否则寡人政令不出中南海。”无论是谁上去都得这么干，陈良宇若爬到最高层，照样也得这么干。一个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有什么值得同情的？

早就反复说过了，我党不如传统帝制的一大弊病，是没有“天命论”来保证新领袖不容置疑的权威，因此新皇帝必须靠整人立威，这就决定了党内权力斗争只能是无比凶险的生死之争。好在新皇帝们采用了“双规”这种比较文雅的绞杀办法，关起门来静静地拼个你死我活，再不像伟大领袖那样以暴民代替克格勃清洗政敌和潜在的竞争者了，这应该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吧。

只是胡锦涛就算借此立了威，他也只有顶多十年的功夫能作个稍微像模像样的皇帝。等到下一个皇帝上台，又得来这一套，于是“双规”便要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周期性现象，哪一天皇上本人也被诸侯联合“规”了进去，麻烦可就大了也。

2008 年 4 月 14 日

小议“软实力”

听网友说，现在国人总算在“器物”之外，悟出了还有“虚”的软件在，亦即所谓“软实力”，而这些不但决定了国家的文明度，也构成了国家的看不见的实力与潜力。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极度欣慰。

软实力委实不是什么神秘难解抽象的新概念，发现它的存在也不需要什么博学多知，深思明辨。稍微有点世界知识的人迟早都该察觉它的存在。

早在 70 年代初，文革大规模骚乱期过去后，我党在互相猛掐脖子万儿之余，忙里偷闲，看了屋外一眼，这才发现日本已经无声无息地成长为一个世界巨人，引起了我党深刻恐惧。出于这恐惧心理，伟大领袖便采取了惯用的有效防御措施：偷偷为“朝修”平反，派人民的好总理去访问了一趟平壤（那好像是文革期间周恩来唯一一次出国访问），在《两报一刊》上猛烈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在内部放映了《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军阀》等几部电影，让嗷嗷待哺的小芦享了点眼福。至今我还牢牢记得：“平田一郎！”“到！（念“刀”）”接着便是那雄壮的进行曲，英俊挺拔的平田一郎在乐声中庄严健步上前，接受奖赏。

这些伟大战略部署一使将出来，果然立竿见影，日本人本来是要复活军国主义的，立刻就给咱们吓得不敢复活了。所以后来咱们不但不再提这茬，在大贪污犯田中角荣来访时大谈阿倍仲麻侣、鉴真和尚、“一衣带水”和“中日不再战”，而且好像还怪日本不够军国主义化，没去用武力向北极熊收回北方四岛（当然没有这么直接说出来），最后就连 60 年代前誓死反对的“日米安保条约”也成了大观园里宝二爷脖子上的那块石头，必须“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了。

这些其实是题外话，无非是见缝插针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无比坚定的革命原则和深似大海的大智慧罢了。我想说的还是，那似乎就是我第一次开始想这“软实力”的问题。我想：日本和德国就是有点与众不同。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联手打这两个国家，意大利不过是个帮闲，整个世界还被打成个半残

废。最后全世界合力，总算把魔鬼打入地狱（典出卜迦丘《十日谈》），把俩国炸回了石器时代，基本丧失了工业生产力，但硝烟散后不过三四十年，这俩国家又如不倒翁一般弹回原位，其复兴能力甚至与社会制度无关。例如东西德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可两国都成了各自阵营里最发达的国家，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就粉碎了四人帮，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重申现代化的战略宏图，全国人民跟随英明领袖新长征，现代化成了时代最强音，自然也就引起始终在密切观察西边这庞大邻居的小日本的注意。忽一日，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日本人为中国出的高招，说中国现代化其实很容易，只需全党动手，大办石油，把中国建成石油高产国，那便立刻能像中东国家一样实现经济腾飞。

那胡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想：这“现代化”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变成世界第一富国么？好像是吧，反正大家的理解都是“过上好日子”，大众羡慕香港台湾同胞（当时国门初开，港台人民的水深火热的真实生活状况已开始为国人知晓，引起了强烈艳羡），不就因为人家是土财主，咱们是穷措大么？但即使发了财又如何？中东那些石油出产国不就是先例么？暴发的土老冒和穷贵族是两回事，这是谁都知道的。

70 年代末的中国梦，30 年后终于成真，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万年的枯木发了芽，如今咱土老冒呀有呀有钱花啊，感谢党中央的恩情大啊恩情大，中国总算成了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满可以傲视远不如咱们的欧洲国家了，俄罗斯更是不在话下。

这是不是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追求的民族目标？好像是吧。但这种“中国现代化”与卖石油发家的回回国家又有何区别涅？我实在看不出来。两者不都是靠出卖资源发财么？区别只在于回回国家出售的资源单一，而咱们搞多种经营，什么都卖，不但卖矿产资源，卖人力资源，就连生态环境、国民福利都捆在一起大贱卖。中国之所以变成世界血汗工厂，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那儿办厂的投入实在低，西方资本家可以逃过本国政府的各种严苛限制，不必在为雇员支付高工资之外，还要为保障职工福利和生态环境花费大量投资，当然要变成冒险家的乐园。

指出这相似性不是想作道义谴责，靠出卖资源致富也没有什么可耻的。但凡涉及人的利害，一扯到道义问题就意味着跌入浆糊桶，可以争论到世界末

日。例如中国现在排出的二氧化碳跃居世界先进水平，眼下国际社会正为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犯愁，于是就跟中国谈判，请中国设法解决这问题，被中国政府理直气壮地拒绝了，说中国排出的二氧化碳绝对数量虽高，但若除以人口基数，则人均排出量非常之低，比起发达国家来低多了，所以咱们非但不必限制，还应该增加。西方记者因此采访了好几个大街上的中国人，大家都认同政府的立场，认定国际社会提出这问题是实行双重标准，故意和咱们过不去。

你说这种事能讲出个是非曲直来么？就连功利分析都未必行得通。你要说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影响了全球气候，会在未来造成巨大生态灾难，引起海平面上升，中国也要受害，只怕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那些海拔很低的冲积平原都要大部分被淹没，更何况现在中国就跟在蒸笼里也差不多了。90 年代末我回国就发现全国都已“四川化”，就连干燥的北京都笼罩在大雾中，完全成了不阴不晴的第三态。说它是晴天，可苍穹就像个灰暗的纱罩，在飞机上看下去还以为下面在下雨；说它是阴天，可分明能看见并不是很刺眼的太阳。再这样下去还能是人住的地方么？可本国人民都不在意，人家愿意这么活，你哪来的权利告诉人家该怎么活？

我想说的还是，发财当然光荣，但在金钱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除了发财之外恐怕还得有点别的追求，否则当初党中央应该把科威特、沙特当成咱们的追赶目标才是。那些国家虽富，可至今也没谁把它们当成发达国家，仍然得在第三世界里混。除非爆发战争，平常谁也想不起它们来。欧佩克除了能影响发达国家的油价外，似乎对人类生活没什么影响，对人类文明就更谈不上贡献。做这种国家，究竟有多少可以自豪的理由？论收入，退休的老芦远不如中餐馆老板，恐怕连福建非法移民打工仔都不如，可难道那些同志就比我光荣？

第一个认识到这“软实力”存在和它的意义的似乎是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他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就指出，经济基础并不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唯一因素，例如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基础都给摧毁了，但这并没有摧毁了该国的上层建筑。国民的良好教育，使得国家短期内就恢复到原来水平，仅此一端就足以证明唯物史观有问题，起码是把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了超简化处理（声明：以上所说到底是波普的原意，还是我本人的发挥，实在无法肯定。如

果说是波普的话，则有歪曲可能；若说是我的想法，则涉嫌剽窃。因此特作此说明，请有兴趣的读者去攻读他的原著）。

其实这是明摆着的：假定核大战发生，把全世界炸回了石器时代，等到残存的穴居人从地铁里钻出来，重建文明社会，那就决不会“而今迈步从头越”，再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沿着所有的已知社会发展阶段潇洒走一回，只会按核战爆发那天的模式重建社会。

这就是软实力。它看不见，更无法像钞票或金子那样可以点数计量，不是生活必需品，却是人区别于动物乃至原始人的必需的精神财富。做物质上的资产阶级和精神上的无产阶级，便永远不能为自己赢来尊严。无论在微观宏观中，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国际大家庭里都是这样。法国总理说的那句话“中国若没进步到可以输出价值观的那天，就不能算成真正的强国”，其实应该修改为“凡不能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国家就只能算野蛮国家，无论怎样富裕都如此”。

这还不只是尊严或文明与否的问题，软实力也是实力，其威力可以超过硬实力。老金在阿三系列里其实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论“综合国力”，印度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过去不是，现在恐怕也不是，可中印在国际舞台上较量却令中国大败亏输，不但丢了将近 1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在国际社会上成了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过街老鼠，就连苏联老大哥都不相信侵略者是印度。印度以弱胜强，无论在实惠还是在道义上都获得完胜，靠的就是从牛津、剑桥、帝国理工学来的软实力。

类似地，达赖喇嘛不过是个“丧家之犬”，没有人民，没有国家，没有资源。可就这么一个“国际乞丐”，与拥有 13 亿人民、9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周旋，竟然非但至今不倒，还把文明世界的同情统统争取过去，使得我党无奈到只能采取“拖死达赖”的无赖战略，把自己壮丽的失败归结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全世界串通一气和咱们作对，出于恐惧妄图肢解伟大的中国，于是咱们便“反败为胜”，“又赢了一回”。

就算这理由能成立吧，那请问当年中印之争中全世界站在印度一边，又是为了何来？美帝国主义若真想肢解中国，何以又要痛恨陈水扁，要对小马哥上台给予最高礼遇？

说到底，对多数国人来说，咱们对西方的认识还是停留在鸦片战争时的“器物”水平，只看见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器物之后的制度，制度之上的文化。而制度与文化，才是使得国家持续强大并能屡扑屡起的真正的生命力。不获得这真正的生命力，则咱们最好的前途也就是把整个国家建成中看不中吃的北洋水师。

2008 年 6 月 11 日

瓮安事件引出的一点绝望感想

几天前，网友通知我贵州瓮安县发生骚乱，希望我能写点评论，但我实在是兴趣缺缺，盖大陆就是发生一万次骚乱，官方的解释也绝对只会一模一样。那个公式，就是白痴也能倒背如流了：一小撮暴乱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烧，危害了社会治安，破坏了安定团结，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但在我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和果断处理之下，事件迅速得到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处理方式也绝对只会一模一样：出动重兵镇压。万能的枪杆子一使出来，自然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四五运动、六四、汕尾、拉萨、瓮安……哪一次不是这么解释，哪一次不是这么处理？区别只在于事件规模和地区罢了。

让我惊奇不止的，是人民何以能忍受这种千篇一律毫无创意的机械重复。撇开道义不说，这也是对中国人民智力的放肆侮辱：难道 13 亿人民个个是白痴，只需喂以智力含量为负值的粗饲料，便会傻傻地鼓腹而歌，歌颂天皇圣明，民罪当诛，坚信人民永远不会对，政府永远不会错；坚信政府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民间流传的一切都是假的；坚信在党英明领导下的太平盛世里，一小撮坏人就是能轻而易举地动辄煽惑上万群众，围攻政府机关那全民爱戴中心，而“不明真相，轻信谣言”就足以冲销他们对党国的无限热爱？

这种拙劣表演，弄上一次也就够了，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都知道。这不等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是白痴政府，中国人民是只配让白痴政府饲以比锯末还乏味的粗饲料的白痴人民么？

因此之故，我实在是懒得去看有关消息。然而刚才打开邮箱，见一位网友来信，给我作了个新华网的视频链接，只好打开看看，原来是贵州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转播，看了之后绝望到连脚杆都抹细了。

最强烈的印象，就是那些人民公仆的惊人弱智。名曰记者招待会，所有的人都是照本宣科。那位主要发言人最绝。当他念到 6 月 22 日晚间李树芬投水、

陈某刘某下水打捞的节骨眼上，突然发现下面缺了一两页发言稿，不知道下文如何，便只好戛然中断。经过一段难堪的沉默，他遍寻缺文不获，别无选择，只能用嘴匆忙简单地通告大家李树芬死了，接着念既有的讲稿，案情介绍便突兀地跳到 6 月 28 日的事件。于是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王、刘、陈又是怎么处理的，便只有天知道了。离开发言稿就不知道事件经过的人，居然也能充当案情介绍人。既然如此，何不使用更可靠的录音机？起码不会出这种“中间没有了”的事故不是？

整个招待会都给人一种演戏的感觉，显然是针对网上传闻而召开的。不同记者给指派了不同的问题，提的都是网上的说法，而答案早已写就，并指派专人宣读。亏得那主持人的记性还好，谁的手上有相应的答案记得清清楚楚，一点没弄错。又幸亏没谁再像那位主要发言人一样遗失讲稿，而答案都是针对问题事先写好的，于是那指定回答者便流畅宣读了预先写好的讲稿，完美解答了问者的疑惑，大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大将风度。

如此记者招待会我还真没见过，当真是开眼界了。它对网络文化的贡献，便是“在桥上做俯卧撑” 以及“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的经典名言，肯定与“很黄很暴力”一样，要在网上流传一阵子。

据政府告诉我们，李树芬自杀前，兴致勃勃地和同学出去玩，兴致勃勃地和他们一道吃晚饭，却在席间毫无来由突然提出要自杀。而同学也竟然没有被吓坏，把她送回家去或是通知家长，还要跟她去桥上玩，并在一旁做俯卧撑，似乎生怕她没有机会兑现前言，而李果然没让同学失望，在自杀前还宣称：“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所以，她的全部自杀动机，似乎就只是为了检验河里能不能淹死人！

老实说，这说法之离奇，以致我禁不住都要怀疑那是真实的了——如果是编造，就算我党官员的智商再低，也该弄点稍微有点可信度的说法出来吧？

于此，我便遇到不可解的两难：假定那证词是真，又能排除李是精神病患者，则世上就是有人会为了检验投河能否致死而去自杀；假定那证词是假，则贵州公安乃至省政府官员的智力就低下到了神鬼莫测的地步。我虽然不惮从最坏处估计中国官员的智力，然而打死我也难以相信他们会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化境。

不幸的是，尽管事前写好了脚本，大概还作了彩排，人民政府的官员们毕竟还是留下了两大漏洞。第一就是那遗失讲稿的主要发言人念的：“6 月 26 日经县做工作，死者家属同意县工作组的协调意见，同意在 28 日上午签订协议，了结此事……”

这未免太蹊跷得过了份：既然李是自杀，那公安局的责任，似乎也就是通知家属真相吧，哪还需要县里专门组成工作组来做家属工作，甚至“签订协议，了结此事”？签什么协议？那是需要双方同意的买卖么？谁听说过自杀者的亲属要跟政府签协议的怪事？了结什么事？自杀是需要了结的事么？怎么个了结？要了结也就是家属办后事吧，与政府什么相干？还要特地签订协议，以确保家属不会反悔！

第二个漏洞就是李的叔叔去公安局谈完话后，在保险公司门口遭到毒打，以致重伤入院。为什么挨打？莫非也是为了检验一下去找公安局麻烦的后果，如果没被打死就好好活下去？公安局不是专管社会治安的么？那时上哪儿去了？为什么竟然坐视一个从本局走出去的人被流氓毒打？这岂不是故意扫自己的面子，让执法机构的威信荡然无存么？

我不是说凡是政府的说法就要怀疑，我深知民间流传难免夸张，例如李的叔叔被打死就被证实是误传，谁谁的头发被剪光也未必属实。但政府凭什么让大众相信自己的一面之词？就凭手上捏的万能的枪杆子？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开什么记者招待会，直接动用暴力严格封锁消息不就完了？就算要按伟大领袖的指示办事，那还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一条啊？凭什么不让大家相信群众只相信党？

稍微有点文明常识的人都该知道，我们不该相信群众，我们也不该相信党，我们只能相信独立的第三方调查。这独立的第三方可以是媒体，也可以是司法界，而不许媒体和司法界独立的政府，当然就永远只能是天然的伪证罪嫌疑人。哪怕党朋也得同意，无辜者绝对只会欢迎独立的第三方调查。

这些其实都是老话了。我最觉得绝望的，还是再次感受到中国社会自“解放”以来的惊人倒退，以致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上虽然发生了巨大进步，然而政治上的清明还远远没有进步到“封建”王朝的水平。

任何一个对传统社会略有所知的人，都该知道这种事若发生在“封建”王朝，不论是非曲直如何，地方官都得掉脑袋。盖地方官员代天子牧民，其责任

是爱护子民，但凡激起民变，不管曲在何方，都说明该地已经民怨沸腾，地方官虐待子民引起了反弹，朝廷当然就要惩处当地官员。还从未有过但凡官民发生争执，朝廷永远只会站在官府一边的怪事。在传统社会中，官官相护寻常事，君臣相护就少见了。相反，明君最怕的就是官吏虐待百姓，毁了他的明君名声。皇帝和官僚集团的利害并不一致，常常是互相冲突的。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明君的努力目标就是竭力防止官吏利用他授予的权力侵害人民。

换言之，传统皇朝的构建方式，使得皇帝成了官民冲突的最高仲裁人，在理论上起到了制衡官僚集团权力的作用。在这种社会中，“明君为民作主”具有充分的理论可能，缺乏的只是可操作性罢了。

但在现代极权社会中则连这种理论可能性都压根儿不存在。在这种烂污社会里，没有权威高于一切、不容质疑的皇帝，只有“最大的官”，而这最大的官之所以能爬到最高位，全靠下面的官的支持。与皇帝不一样，“最大的官”和下面的官利害完全一致。他能保住权位，靠的不是人民而是官吏集团的拥戴。

于是传统的“君—臣—民”的三明治结构便成了“官—民”两极结构。在这种烂污社会里有的只是官官相护，绝无可能发生传统社会那种皇帝为民作主，严惩贪官污吏的事。传统社会是“百姓怕官，官怕皇帝，皇帝怕百姓”，而如今连环少了一节，只剩下“百姓怕官”了。

这就是为何但凡官民发生冲突，党国政府永远只会指责百姓。如果杨乃武生于今日，则绝无指望有个慈禧太后出来指派干吏，进行相对独立的司法调查，洗雪他与“小白菜”的沉冤，并撤职查办自钦差大臣胡瑞澜、巡抚杨昌睿以下三十多名官员。

由此可知，胡锦涛所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为民负责”等等，不但是假话，而且是大话，他就算有心，也没那个胆子兑现。

2008 年 7 月 2 日

中国还有改良的可能么？

拙作《瓮安事件引出的一点绝望感想》贴出后，网友跟帖道：

> “另一个绝望：民主恩赐论。对中共这样的的流氓政府，根本不能抱任何希望。
>
> 如果死的是我女儿，如果我也无法可想，我也会北京那个刀客一样，冲进派出所，捅一个算一个。”

引发该文的网友来信说得几乎跟这一模一样，他说，芦先生，我完全同意你反对暴力革命的和平改良主张，但如果这种事轮到了我头上，我也只会与恶警拼个你死我活。

此话使我深感震撼。我想，既然能同意我的主张，当然是比较理性的读者，连这种人都会这么想，中国的和平改良还有什么指望？即使是我自己又如何？真的摊上了这种事难道还能冷静？

党朋“法家”们如马悲鸣辈动不动就援引西方法治社会的公民义务要求国人守法。但凡发生骚乱，他们只会一无例外地指责“不法分子”，支持政府铁腕镇压“刁民”，却拒绝承认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天生暴力倾向的良民，都只想安分守己过小日子。如果中国的法律如同西方法律一样保护人民，谁还会去暴乱？暴乱频频发生，本身就说明了普通民众对依靠法律保护自己的绝望。这用老话来说就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政府早就说得明明白白，他们单向制定的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不是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西式社会契约。只有白痴才会指望这种法律保护自己，惩罚统治者。

上述引文提到的“民主恩赐论”是我在八年前与民朋论战时首次提出来的，一年后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作了系统论证。我个人认为，那是我上网以来写的最好的文章，堪称政治学中的“哥伯尼革命”。当年康德对他的哲学思想颇为自豪，认为那是认识论中的“哥伯尼革命”，把人类的视角颠倒过来了。区区不佞，也认为那篇文章颠倒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中国的社会进步

是统治者的让步而不是人民斗争造成的，人民斗争只能带来社会的大幅度倒退。中国今日史无前例的黑暗，正是自辛亥丑剧以来人民持续斗争的结果。

该文给出了“民主恩赐论”比较正规的表述：

> “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不可能通过人民斗争建立，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能通过统治者的让步来实现，而统治者的让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陆人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去赢得。”

正因为它是政治学里的哥伯尼革命，所以只会遇到日心说的命运，至今无法为大部分中国弱智知识分子们接受。他们竟然看不出来：这不过是个事实陈述，您若不同意，举出斗争使得中国社会发生进步的例子来就行了，何必侮辱敢于说出事实的论者？而且，这还是个否定式陈述，并不是“统治者的让步可以为中国带来民主”的肯定陈述。相反，我特地在该文中指出：

> “以上论证，实际上只说明中国的社会进步可以并只能通过统治者的主动或被动让步来实现，并未证明这种让步可以最终导致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民主必然在中国实现’和‘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其实都是先验的武断命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逐步、有序、受控的社会实验。但根据上文论证，可以推出如下结论：如果民主制度真能在中国建立，它也只能通过统治者的‘恩赐’。传统的人民斗争不但毫无效果，反而只能带来灾难。”

写下这些话时，我还未对中国的前途彻底丧失信心，总难免出于感情抱有希望。经过这些年的折腾，当年残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我的结论和赵紫阳一样：“没治了。”准确说来，便是：“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既不可能通过人民斗争赢得，也不可能靠统治者的让步建立。”

这结论的前半截话我已经写过无数文章论证过了，这里再简单重复一次。

所谓社会进步，这里指的只是政治上的涵义，也就是人民拥有的权利的多少。在一定范围内，人民的权利（rights）和统治者的权力（power）成此消彼长的关系。人民拥有的权利越充分，统治者干扰人民正常生活的权力越薄弱，则社会也就越先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人民的持续斗争史与社会倒退史，人民革命一次就丧失一部分权利，统治者的权力也就增加一部分，社

会也就倒退一步。斗争一次，舒服一次，彻底斗争，彻底舒服，一直斗到中共当了国，获得了空前的权力，人民彻底丧失了权利而后快。

这丧失的最主要的权利就是斗争的权利。在今日中国，人民连进行欧洲式的理性斗争迫使统治者让步的可能都没有，因为所谓理性斗争（例如著名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只能是合法斗争，但现在中共把一切斗争都定为非法，还谈什么西式理性斗争？

这还不是主要问题所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我昨天指出的那个：现代烂污制度中不可能产生传统式明君，因而不可能出现类似晚清统治者还政于民的实质性让步。而就是这种结构性分析，使我得出了上述结论的后半截：“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不可能靠统治者的让步建立。”换言之，中国现行烂污制度远比传统帝制落后得多，后者还具备和平改良的足够空间，而前者毫无实质性改良余地。

这结构性分析我其实已经在近年文章里反复作出了，这里再扼要重复一遍。

如昨日文章所述，传统帝制的结构是“君—臣—民”三明治结构。皇帝的统治合法性来自于凡人不敢质疑的“天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臣就是官僚集团，它是一个与生产方式无关的暴力敲诈集团，具有自我支持、无限膨胀的特点，跟恶性肿瘤十分相似，是人民苦难的主要来源。

皇帝和这敲诈集团的关系既有互相依赖的一面，更是互相冲突的。皇帝依靠这暴力敲诈集团去实施统治，但又不愿让它尾大不掉，为所欲为去残害人民，因而从根本上动摇自己的基业。因此，为了自己的家业能代代传下去，明智的皇帝都要设法抑制打击这暴力集团，维护人民利益，御史监察制度就是专门为此设立的。但孔教只指望官吏以道德修炼约束自己的贪欲，从未想到过靠人民去制衡官僚，从根本上限制它的恶性膨胀，因此官僚集团总要疯长起来，不但直接抢劫人民，而且间接抢劫皇帝。直到最后不但民穷财尽，国库也空空如也，人民揭竿而起，倾覆旧皇朝，建立新皇朝，以暴力切除无比庞大的官僚集团，为的不过是让新的官僚集团受孕怀胎，在未来逐渐长大，撑死那个新皇朝。

比起现行烂污制度来，这种背时设计的相对合理性是，除非在末世，皇帝并不受官僚集团的挟制。皇帝是靠天命作皇帝，不是靠官僚拥戴作皇帝。相

反，官僚的权位才是靠皇帝恩赐的。君臣关系是主奴关系，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皇帝对臣子为所欲为，连处死都是“赐死”，臣子死前还必须感谢天恩。因此，在理论上，皇帝若要大规模推行政治改革，臣子并不敢起来造反，顶多只会消极抵抗。这就是晚清何以能自上而下推行大幅度改革，也就是传统帝制具有改良的可能性的原因所在。

说到底，中国式的政治改革，无非是朝廷令官府放弃权力，恩赐给百姓权利，使得官僚集团无法再敲诈百姓。它的必要条件是皇帝既有这么做的意愿，也有这么做的能力。

先看改革意愿。这么做其实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因此明智的皇帝可能被说服。慈禧老佛爷决定立宪，就是被载泽“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说动的。毕竟，皇帝并不和百姓直接打交道，让官府失去任意敲诈百姓的权力并不会给他带来损失。中国要直到晚清才开始此类改革，无非是因为中国御用“思想家”们太蠢，从来看不到具有无限膨胀趋势的官僚集团对皇家构成的危害，哪怕在朱元璋看到之后，也没人有那智力想出个根本解决办法来。

如果不是鬼子打进来，让中国人知道原来世上还有立宪这档子事，便到地球毁灭那天咱们也绝不会想到那上头去。日本人虽然缺乏原创性，但他们毕竟还能搞出个强调君权同时也保障了基本民权的帝国宪法来。如果不是他们打败了，被美国人“强迫做爱”，我深信这套制度一定会在日本“万世一系”地运转下去。

因此，传统帝王只要足够聪明（满清的皇帝都很聪明，和明朝完全是两回事），又有先进的样板可供照猫画虎，则完全可能具备改革意愿。

皇帝具有改革必需的权力就更不必说了。上面已经说过了，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臣子只能服从，顶多只能苦谏。当年慈禧一纸诏书，原来处于中古时代的东亚病夫便“跑步进入20世纪”，就连废除千年科举制都没有引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改革不是被反动势力而是被革命乱党颠覆的。此乃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中共实行的现代极权制度则完全没有了这种相对合理性。它区别于传统帝制的两大特点，一是政府权力膨胀到了空前地步，霸占了一切国家资源特别是暴力资源，彻底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特别是斗争手段，连在网上发点无关大

局的牢骚都可能进班房。这和晚清完全是两回事。当年我大清依法处决武装暴乱分子秋瑾竟然遭到报界强烈抨击。这情景今日根本就无法想象。

另一特点是它没有一个靠天命统治的皇帝，国家元首相当于土匪山寨的寨主，乃是靠拳头大赛决出的冠军。因此，它的建构机制和传统社会恰好相反，不是臣子靠君恩做官，而是党皇靠臣子拥戴上台，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恰好倒了个个。因此，党皇便沦为官僚敲诈集团的代表人。如果臣子们觉得寨主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便可撤回“臣恩”，另推一个更合格的代理人上去。

这结果便是中国社会从原来的“君—臣—民”三明治结构变成了“官—民”二极结构。新的官僚敲诈集团和传统官僚集团一样，也是个自我支持、自我代表并具有无限膨胀趋势的恶性肿瘤，其区别只在于它拥有的权力更大，疯长速度和腐败速度都令老前辈们望尘莫及，而且根本不受朝廷约束，因为再也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来制裁他们了。如果说邓小平在世时还能靠他的“拳威”强行推动改革，那么第一代强人死后，中共作出实质性让步，甚至还政于民的可能性就再也不存在了。新领导人即使有改革意愿，也毫无改革必需的权威与实力。如果他胆敢轻举妄动，则立刻就要面临“谁要改革谁下台”的可怕前景。

因此，今日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三无世界：人民没有造反可能，政府没有民意压力与改革意愿，国家没有和平进化可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背时局面乃是革命前辈为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当年他们坚信“改良主义行不通”，非要把具有改良可能的传统政府斗倒了，七斗八斗，硬是斗出个比铁还硬、比钢还强、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官僚暴力敲诈集团的铁桶江山来。使得中国发生政局剧变的可能完全落在了吉凶难测的统治集团内讧之上。

2008年7月4日

“俯卧撑”、“自杀”与天津教案

瓮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我看主要是以下几条：

1）社会实在太黑暗，越到下面越是暗无天日，特别是公安城管等直接镇压人民的系统中，可以说没有一只白乌鸦。那些人比党电影上的虚构坏人还要坏。我党统治的结果，就是把社会变成了他们虚构出来的“旧社会”，无官不贪，有吏皆墨，见钱就捞，无恶不作。这种彻底腐烂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理由也说过了：“旧”社会第一官府从无这么大的权力，第二多数人受传统道德特别是因果报应约束，不是现在这种“五不怕”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2）官场实在太腐败，贿赂公行，裙带主义已经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Nepotism is the socialism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民怨沸腾，而政府还隐恶扬善，坚持欺骗宣传一百年不走样，因此彻底丧失公信力。百姓对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已彻底丧失信心。昨天我才看见个帖子，谓现在在大陆，连信访都被暗中禁止了。在当地信访就要给押到派出所去，若去北京信访，被遣送回籍还不说，还要在北京机场留下记录，以后终生无法进北京。

4）由于以上原因，一旦出了人命，民众只会使用阴谋论猜想内幕，绝不会相信“人民政府”会主持公道。越是不利于政府的消息越是不胫而走，经过多次正反馈循环后，必然就要严重偏离真情，具有极大的煽情效果，势必引起群情汹汹，酿成暴力事件。

5）由于同样原因，当消息通过网络传遍全国后，必然引起类似舆情反应。大众只会相信坊间流传，政府说下大天来也只能适得其反。这其实是政府洗脑的必然结果：大剂量反复多次灌输同样信息使得人民产生了对该类信息的强大免疫力。

6）白痴政府在网络时代还坚持包办舆论，还想使出毛时代那手来，事出后实行新闻封锁。多出来的唯一一手就是使用所谓“新闻发布会”驳斥网上流传，却又干得令人难以想象的拙劣。

例如我看新闻发布会的视频时，就觉得那些提问完全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但这只是一种感觉，毫无证据。不料刚才看见《天涯》网站的帖子，眼睛贼亮的网民通过截屏，果然抓到了某个穿格子衬衫的男子从台上领取了问题，在会场上偷偷传达给台下的记者。有的网友更指出，为何所有的记者包括香港《文汇报》记者在内，一律是贵州本地人？如此笨拙做戏，还指望百姓相信，岂非白痴说梦？哪怕他们说的句句是实话，百姓也要坚信他们撒谎了。你说蠢党究竟蠢不蠢？他们最蠢之处，还是极大地低估了百姓智力。

总之，在网络时代还要包办舆论，不许传媒独立，政府就必须为可能产生的一切恶果包括百姓信谣传谣承担责任。党宣传“走向反面”完全是自作自受，须怨不得谁。我早就向白痴政府建议过了，党应该停止扮演那包办一切的万能角色，从各个领域中逐渐撤出，转而取得一种超脱地位，否则永远只会是民愤焦点。但蠢党太蠢，绝无那智力听取这明智建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日我党就像海禁初开时的洋鬼子，成了人民公敌，而各地的骚乱事件也有点像当时各地发生的“教案”。天津教案就是为大众熟知的例子。愚民和士绅们本来就见不惯怪模怪样、不拜孔孟的鬼子教士，再加上二毛子作威作福又被教堂庇护。当时的地方官最怕的就是惹了洋人立即就要丢官，因此二毛子犯案也不敢追究。引起民怨沸腾。再加上民间盛传鬼子教堂用迷药把民妇和小孩弄去，挖出心肝来合药等等。最后一点小事便激发出大规模民变，而全国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天津暴民，谴责实事求是办案的曾国藩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害得他自称“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这类比当然不能成立：现代国人当然不是当年处于绝对蒙昧状态的愚民，而且，洋鬼子在多数情况下是蒙受了冤枉，而在今日国人大多数情况下并未冤枉我党。这里唯一的相似之处是，我党今日在百姓眼中的形象，和当年万恶的鬼子在国人眼中的形象也没太大区别。

我想强调的还是，没有独立的司法界和独立的舆论界出来作独立调查，在我党彻底丧失公信力的情况下，民众只会一边倒地相信坊间谣传。胡温需要问问自己的是：

“为什么人民专门听信不利于政府的谣传，越是说得无恶不作就越相信，也就越是怒火万丈，甚至不惜为此犯法，宁肯在事后蹲牢，也要发泄腾腾怒火？！”

至于事件真相究竟如何，我的基本态度已经说过了，我们不能相信群众，我们不能相信党，我们只能相信第三方独立调查。这是一条根本的原理，如果不遵循这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会上当。

当然，猜测事件真相乃是神圣人权，但既然是猜，那就只能是个概率比较问题。无论猜得如何可信（plausible），毕竟都只是 guesswork，不能算成调查结果。

有网友说，他不觉得在桥上作俯卧撑有什么离奇的，那女生也有可能是自杀。盖当事人是挺能杰儿（teenager），处于激素不平衡期，什么怪事都会干出来，不能以成年人理性度之。

此话很有道理。但我建议这位网友使用 possible 或 probable 来清晰思考这些问题。很明显，无论当事人是在桥上作俯卧撑，还是死者投水自杀，都是 possible 的，但未必是 probable。要认定李树芬是自杀，要么得假定她有精神病，要么得肯定"青春期激素不平衡可以导致自杀倾向"，否则我个人认为是 improbable 的。

至于当事人在桥上作俯卧撑的发生概率，我觉得不能脱离前因后果来看这问题。正如这位网友说的，我辈那个年纪时，比半夜在桥上作俯卧撑更怪的事都干过，毫不足奇。但问题是，李在此前已经扬言过自杀，而且王某还给吓坏了，安慰了她半天，此后却彻底忘记了那茬，跑到桥上去玩到半夜三更，这概率就比较小了，虽然不能说 improbable，起码可以说是 not very likely 吧？

当然，小概率事件并不等于 impossible，并不能排除，所以它尽管不可信，仍然完全可能发生。这就是我在有关文章中从未把话说死，强调的是第三方独立调查。

真正值得可疑的，还是我指出的那俩问题：李既是自杀，为何县里要专门成立工作组"协调"家属？为什么要让家属"签订协议，了结此事"？而李的叔叔在跟公安谈话后，为何会遭到黑社会的毒打？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不就此两问题作出可信解释，则李投水自杀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其实胡中央要是再稍微不那么蠢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就该看出此乃绝佳的作"亲民秀"的良机，万万不可错过。我要是他，就立即派出中央纪检与公安部的联合调查组，撇开贵州各级政府，彻底调查李树芬死亡案以及她叔叔被打案，将调查结果向人大常委作详尽报告，并在报纸上公布，

再根据结果决定是否该惩办地方官员。此乃“封建”王朝的标准作法，可我料定胡中央断不会这么做，此无他，“社会主义”不如“封建主义”，党皇帝不如真皇帝也。

至于“俯卧撑”成了网上最热门的流行语，我认为毫不足怪，无非是因为它的双关暗示作用罢了。凡是带点暧昧暗示的用语都会为大众津津乐道。此乃人类天性，不足深责。网民要真想弄清真相，该做的是要求公布瓮安县政府或公安局与李家签订的那个协议全文，并要求公安部早日公布李的叔叔被打案的调查结果。在司法独立与传媒独立之前，这就是热心伸张正义的公民唯一可做的事。

2008 年 7 月 5 日

杨佳成为草根英雄本身就是悲剧

大众热烈议论杨佳袭警案，不想谈论亦不可得，因钻出故纸堆，随便说两句。

我认为，杨佳袭警案犯罪事实清楚，是故意杀人，也不存在精神失常问题：他去上海没买返程机票；在博客最后一页留下了“万古流芳”的墓碑照片；在案发那天跟招待所说不再住了；在作案前作了一系列精心策划安排；对选定现场作了精心踩点侦查，并购买了多种作案工具；在作案前考虑周密，作案时准确按原计划进行——在大门口扔燃烧瓶将保安调开，趁乱潜入大楼，沿途杀人；杀人手法极度狠辣熟练，专朝颈动脉或胸腹部下手，扎入后向上挑，使受害人因大出血在几十秒内丧生，圆满完成了预定计划；在被捕前对持枪警察说：你开枪打死我吧，我已经够本了。这些都不是神志失常者可以做出来的，更不能当成是过失杀人。

以上所说不过是个人的看法，虽然无罪推定是现代司法的基本原则，但公民有权以私人身份发表自己的看法。

从司法角度来看，杨佳当然是匪徒而非英雄。多的也不用说，受害者都是公安内勤人员，平均年龄 50 岁，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这些人不仅不是过去打他的警察，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横行乡里，欺压良善，当然是无辜受害者。滥杀无辜者当然是匪徒，这应该是文明人都能同意的吧？

然而悲剧也就在这里：国内外舆论同情竟然基本在杨佳这边，在许多人心目中，杨佳竟然成了传奇式的替天行道的大侠！

这不能不令我想起在美国发生的卢刚事件，两者都是滥杀无辜。美国没人认为卢刚是英雄大侠，国人恐怕也不会这么看。但为何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舆论反应竟会如此不同涅？

原因很简单：袭击的对象不同。如果杨佳跑到学校去滥杀一气，我深信舆论绝不会同情他，但他袭击的是民愤焦点公安局。弱势团体平时受尽烂警察黑恶势力无微不至的欺压荼毒，敢怒而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杨佳只身深入虎

穴，一口气连挑六名警察，当然要觉得大快人心，当然要认为杨佳是替天行道的大侠了。在他们眼中，“警察”与“无辜”二字根本就不搭界。“无警不恶”的公式在不少人心目中就是成立。

这种情绪之偏激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前阵我在新华网上看到，高速公路上大雾弥漫，某交通警疏导交通，不幸被货柜车撞死。在那则报道之后有许多网友评论，尽管大多数表示哀悼同情，但也有不少幸灾乐祸的跟帖，让我看了毛发倒竖。

这就是杨佳案令人悲哀的地方：民愤已经泛化到公安系统所有部门中去了，连案牍文吏、科技人员无辜丧生，都竟然得不到民众同情。这社会到底处在何等严重病态，还用得着说么？如果中国的警察如同西方国家那样，真是人民警察，这种舆论反应还会出现么？

我在旧作中说过几次，我到西方第一个强烈感触是，原来警察也会微笑，也会和你开玩笑，甚至会向你彬彬有礼地道歉。一次我骑摩托出事，半夜三更昏迷不醒地躺在公路上，有人路过看见报警，警察当即前来救醒了我，送到医院去。在救护车上他们就要我吹管子，检查我是否酒后行车。我颇为不满，说他们铁石心肠，哪怕人家只有最后一口气，也要让人在断气前把那口气吹到管子里去。那家伙颇有幽默感，听了哈哈大笑，笑完赶快向我道歉，说他不是铁石心肠，而是我的讽刺很幽默，让他不能不笑出来。他也知道那要求不合理，但那是法律规定的，云云。最后警察要离开医院前，还请护士来问我家住何处，他们好去通知家属。

我的一位亲戚从国内来看我，在我带他去旅游时不慎走散了。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那时手机还不普及，无法与我联系。幸亏我事前给他写了个条子，开明住址和电话号码，并告诉他如和我失散就交给警察。他此时便依计而行，于是警察便开车把他送回了我家。这种事在国内根本无法想象，但在国外则是警察义不容辞的职责。人民养警察就是让他们干这些事情的。这就是西方的警察，真正是人民警察。

而在国内，人民养警察，就是为了让他们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欺压良善。90 年代初，我父母的家因为无人居住，被窃贼进去洗刷一空。我家人发现后去当地派出所报案，竟然备受辱骂。那警察骂够了，还是不得不按规定办事，接过了失物清单，当他看到其中有黑白电视机时，竟然骂道：“这值几个

钱？也值得来报案！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花子贼，连黑白电视都要偷？你们他妈的又是什么花子失主，连个黑白电视都舍不得？”

比起我的一位朋友来，我家人算是幸运的了。她家也被窃贼洗刷一空，去报案时警察竟然大骂之，还威胁要把她铐起来。窃贼无事，报案有罪，黑白颠倒，无复此极！

正因为有这些经验，我才相信杨佳一定被警察毒打过——连报案的失主都差点被铐起来，何况是他涉嫌偷车，在被盘查后还竟敢和警察争辩？正因为此，我也才能理解国内同胞为何同情滥杀无辜的杨佳。一个社会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者竟然如此痛恨，说明那社会秩序之不合理已经到了人民无法容忍的地步了。

更可悲的是，杨佳被人视为英雄也不是毫无道理。网友已经指出，杨佳案发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大陆恶警出于对自己性命的担心，只怕要在作威作福时稍微收敛三分。当然那为时有限，过段时间他们也就忘记了这茬，照样作威作福。一个社会竟然要靠暴徒犯法来极有限地威慑执法者带头守法，使得滥杀无辜竟然成了推动社会改良的压力，这悲哀当真是无法描述。

最可悲的还是，当局很可能从反面去吸取教训，认为应该加强警察权威与随便动武的能力，以此去震慑住“刁民”。如果当局真是这么想，那就必然会使得警民互动进入恶性循环：警方越暴，百姓越刁；百姓越刁顽，则警察越横暴……，循环往复，不知伊于胡底。

杨佳的悲剧还不止此，任何一个有点文化的人都能看出来，他本身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牺牲品。父母离异，本人失业，渴望爱情与友情又毫无前途，两次受到警察毒打与凌辱……，这一切压力足以使得一个心态本来就容易失衡的青年发生心理变态，而母亲在察觉这倾向后，竟然因为贫穷无法求医，这才最终酿成了可怕的悲剧。

总而言之，愚以为，杨佳既不值得歌颂，遑论效法，也不值得责备。他犯罪的后果自有他本人去承受。真正该责备的，还是那个把一个热爱生活、渴望爱情、本可拥有灿烂前途、美好人生的青年变成了匪徒的暗无天日的下流社会。倘若当国者还不幡然猛省，看到这悲剧揭示出来的无数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问题与制度弊病，痛下决心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则未来还会有无数杨佳

被批量生产出来。倘若此，则无论是杨佳还是他的受害者，都白白失去了宝贵的性命。

2008 年 7 月 17 日

崩溃即将到来？

——读《大裂变来了》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中国人现在是世上最海皮的民族，民意测验显示，80%以上的人对现状表示满意，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在这太平盛世里也有不和谐噪音。国内学者袁剑先生最近推出《大裂变来了？》一文，作出了不祥预言。此文先由《南风窗》登出，后在多家国内网站转载，反响相当强烈。我以外行之身不揣浅陋，在此汇报一下读后感。有兴趣的读者请去攻读原文。

必须强调指出，下文乃是我的理解与发挥，未必符合原意。所有政治错误概由本人负责，与原作者无关。

一、解读“中国奇迹”

1）“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实涵义

作者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共识只有两个，一是“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二是经济增长。邓小平通过 1989 年的“风波”发现，中国“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凝聚它的唯一法宝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这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由来。朝野达成了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

因此，“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 1989 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

作者还指出：

“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

这是说，百姓关心的不是经济高速发展，而是日子好过。但经济高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普遍的福利改善。换言之，百姓的“隐性宪法”其实是“普遍发财才是硬道理”，亦即“均富才是硬道理”，而这与高增长不一定是一回事。政

府允诺了高增长，从未允诺均富，百姓的期望与政府的允诺之间，潜藏着大众尚未认识到的差值。

这里需要补足的是，迄今为止，持续的高增长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稳定。经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官僚集团，但知识分子也分了一杯羹，而就是他们构成了社会稳定性的要素。工农大众不过是肌肉，没有知识分子大脑组织指挥，即使闹事也无关大局，只会是局部的，可为当局迅速平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高增长没有带来均富，反而加剧了贫富悬殊，危机也只会被储蓄起来，不会立即爆发。

总之，中国之所以还能维系精神上的统一，全靠政府用高经济增长向知识分子买静求安。稳定是用钱买来的。全民的理想不是什么振兴国家民族，而是发财，这种精神状态相当可怕。哪天经济停止增长了，萧条到来，全民的发财梦破灭后，社会的共识也就只剩下“策略性民族主义”。但作者所谓“策略性”，无非是委婉地说，此乃官家转移百姓对内政的注意力的障眼法，在内政危机积累到再也无法转移大众视线时便会失效，于是提供国民内聚力的纽带彻底断裂，社会便会如 1989 年那样，再度分崩离析。

2）奇迹的秘诀：贱卖使得中国成了吸引国际资本的“百慕大三角”

作者指出：“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 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

中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资源小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20%至 30%，按理说资源价格的市场价格应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能源价格、土地价格、水价格、环保标准、劳动标准、税收等成本却被压到超低水准，只有腐败成本居高不下。以上成本的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巨大差价，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

说穿了，中国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是政府不顾血本大甩卖，将中国相对贫乏的物力资源和原本就恶劣的生态环境以及无穷的人力资源，半卖半送给国际资本家的结果。在这其中政府只收取腐败成本，使得在中国投资能使外国资本家获得从来不敢梦想的暴利，中国因此成了国际资本家的天堂。古希腊人说：“自然害怕真空”，资本的流动也是这样。违背经济规律的惊人的低成本造出

的反常的高利润，形成了强大的引力场，如黑洞一般，把全世界的资本都吸了进去，于是便在短期内造出了高产能。这就是中国奇迹的秘诀所在。

3）中国奇迹的出现前提是“先进的社会制度”

前段我读吴思《潜规则》与《血酬律》，写了点感想，指出用西方阶级社会去套中国模式完全是南辕北辙。中国社会的实际统治者从来是官僚集团而不是地主阶级。这个官僚集团与社会生产方式无关，不是西方定义的“阶级”，可以附着于任何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它靠暴力自我支持，具有靠吸取宿主营养而无限膨胀的天然趋势，与恶性肿瘤具有相当高的相似性。理论上唯一能制衡它的力量是皇帝，因此，君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构成了古代政治斗争的一个重大内容。尽管皇权被明太祖在理论上提升到了最大限度，但“以皇权抑官权”缺乏可操作性，而且昏君总是比明君多，因此官僚集团总要像恶性肿瘤一样疯长起来，把皇家和百姓都抢穷了。百姓再也活不下去之时便揭竿而起，以暴力切除庞大的肿瘤，为的不过是让它在新皇朝中受孕怀胎，逐渐长大，再次撑死宿主。

此后我又反复指出，今日中国社会仍然是换汤不换药，依旧是官僚集团充当统治者。所不同的是官僚集团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权力，霸占了所有的资源，对人民的控制无微不至，而制衡它的理论力量皇室却再也不存在了，传统的“皇帝—官僚—平民”的三明治社会，变成了更加反动的“官僚—平民”两极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官僚一极独大，再也没有了“百姓怕官府，官府怕皇帝，皇帝怕百姓”的“相生相克”。传统社会中具有远见卓识的明君还会因为自身的长远利益“为民作主”，打击官僚集团，而今日的百姓就连这种好事都没法指望了。

但我没有指出的是，传统社会中除了皇帝与官僚之外，还有士绅集团这第三个实力集团。士绅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没有截然分野，它由退休官吏或有点功名身家但未授实职（如举人，有时甚至只是秀才）的读书人组成，在很多情况下与官僚集团狼狈为奸，构成了官僚统治的终端，但两者之间也有利害冲突，常常在官民冲突之间起到缓冲层作用。近读冯友兰回忆录，他认为辛亥革命是“绅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我觉得这种解读比生硬套用马列阶级斗争学说，把辛亥革命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智力笑话要更逼近真实。如果辛亥革命按英国的光荣革命的路子走下去，则可以以实现士绅民主为全民民主的

第一步，使得中国和平长入民主，摆脱官僚统治的千年噩梦。抗战后中国再度出现这种局面，可惜被中共革命断送了。

中共革命当然是历代痞子造反的传承，但它与前驱不同，具有社会改造内容，因而是“革命”而非“造反”，其社会改造有三个重大成果：第一，它造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官僚集团，从建立政权那天起就霸占了国家的所有资源，全面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垄断了社会上所有的权力，将人民置于无微不至的监视控制之下，这和过去“农民起义”建立的官僚集团相对弱小的新皇朝完全不同。第二，它没有一个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的皇帝。第三，它扫荡了一切旧有的民间社会，能与官僚集团微弱竞争的士绅集团不复存在。这些特点决定了官僚集团自我支持的能力特别强大，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压力都不能动摇分毫。连毛那种创业英主都在权力斗争中输给了官僚集团，死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毛之后的最高统治者就只能是官僚集团的代表，绝无可能变成为民作主的传统明君。

明白了中国社会的这些本质特点，则不难理解中国奇迹完全是咱们“优越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如果现代官僚集团不垄断了一切资源与权力，则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土地价格、矿产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只会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上面已经说过了，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不是以权力人为扭曲供求关系，则资源价格只会高出世界平均价格，对国际资本的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而如果人民的权利不被官僚集团全面剥夺，则资本家就必须付出与西方相当的生态投资，以确保企业不因污染环境而被迫关闭，甚至付出巨额赔偿。同样地，如果不是人民的权利被全面剥夺了，资本家就得面临工会的巨大压力，再也不可能开办血汗工厂。把这些要素逐一抽去，再加上国外没有的腐败成本，中国就根本不是投资乐园。而没有外资，哪来的中国奇迹？

这就是作者为何说：

“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

说穿了，中共革命其实是通过两步走的方式，把国家改造成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所曾见过的最理想的殖民地。第一步是由痞子靠暴力夺取政权，抢夺了全部国家资源，建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官有制”，更垄断了全部权力，剥夺了人民的所有权利，使得他们无论是对国事还是切身相关的具体事务都彻底失去了发言权，遑论作主权。第二步则是由革命形成的空前庞大的官僚集团充当掮客（=马泊六），将国家全面贱卖给国际资本家，靠收取佣金而获得暴利。在这种国家，外国资本家可以毫无抑制地毁灭性地掠夺当地资源，把当地既当成阿拉伯神话中的魔法口袋，从中源源不绝地掏出各种美味来，又当成垃圾场，任意倾倒工业废物，排放污水毒气。

就连大英殖民者当年在印度、非洲等地都不敢如此杀鸡取蛋：首先他们必须尊重土著原有的产权，不能动手强抢。即使是在北美，还得用点玻璃珠什么的换取印地安人的大片土地，在已经建立了私有制的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其次他们还得爱护环境，避免把殖民地变成不可生存的地方；最后他们还得尊重土著的基本人权。当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以港英当局屈服结束，而历时一年多的省港大罢工也不曾招来港英当局的疯狂镇压。如今国际资本家在中国根本就不必有这些担忧，自有护院家丁买办集团防范未然，营造世上独一无二没有工人运动与民间抗议的“和谐社会”。

60 年代我党开展忆苦思甜运动，出了本题为《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小册子，今日则由我党亲手写下“中国，全世界资本家的乐园”的新篇章。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真谛。

最奇妙的还是，建立殖民地还必须穷兵黩武，攻城略地，付出军备投资以及人命投资，而中国今日沦为列强的共有殖民地却不费帝国主义一枪一弹与点滴血汗，占领军、警察、特务、打手等等全由中方自动出钱出力承办。中国人讲究“以夷制夷”的兵法，其实最擅长的还是为鬼子“以华制华”。

二、“裂变”即将来临？

这儿的“裂变”涵义模糊，此乃国人通病，大概是“崩溃”的意思吧。但网友已经指出了，此乃外行模糊用语。我过去已经和草庵居士争辩过，题目就叫《不要轻言“崩溃”》。在我这外行看来，所谓“崩溃”应该是国民经济破产，工农业产量大幅下滑几近于零，如三年大饥荒后的惨景，或是日本德国在战后的遭遇。否则就连国家财政破产，国民经济都未必崩溃。二战后英国就曾破产，全靠凯恩斯去美国借来了印子钱才算喘过气来，真正起死回生乃是马歇尔计划带来的。但如今英国除了专家外，没谁记得山姆叔这一恩情。

总之，我的理解是，作者预言，中国眼下的高增长难以为继，经济危机即将来临，而这可能引发所谓“大裂变”。他虽然没有明说，那“大裂变”的意思似乎是社会出现大幅度动乱。理由是：

1）高增长难以为继

作者认为，眼下的高增长其实与毛时代相似，是高投资造成的，区别只在于如今的资本既来自于国内也来自于国外。当投资减少时，增长速度必然放慢。这就有个投资饱和问题。更严重的是，高投资造出了高产能，而这产能需要资源来维持，这就是中国经济的限制所在：

“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为什么难以持续？首先是国内消费不足以吸纳高投资制造出来的过剩产能：

“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 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中国的高增长实

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

他的意思似乎是，经济繁荣的代价是剥夺人民的社会福利，从而造成了国内的低消费。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只能是外向型，或起码是持续繁荣取决于海外市场。当国外市场萎缩之时，国内经济就势必要受到影响。

更严重的问题是，成本不可能永远被人为压制在低水平上。资源总是有限的，正如列宁总结的帝国主义五大经济特征指出的那样：“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康熙五十年，江南发生科场舞弊案，心怀不满的士子们把江南“貢院”二字改为“賣完”。而这据说就是中国正在面临的困境：国内资源本来就贫乏，迟早要被卖完。卖完之后若要想维持高产能，就别无选择，只能从外国进口原料。外国可没有咱们优越的社会制度，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于是中国巨大的产能必然要拉动国际原料与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环球通胀：

“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当然也包括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 2006 年，中国消耗了世界 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 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 2006 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 31%。另外一个最新的例子则是，当中国 2007 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 2010 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暴涨’，前几年的一句调侃，竟然一语成谶。”

据懂经济学的网友说，袁剑先生是外行。他这儿提供的数据是否可靠，尚待专业人士证实。如果是真的，则赵紫阳当年的智囊设计的“大进大出”战略（如今只见大众骂老赵的智囊，却忘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的就是他们设计的这条路），恐怕真要难以为继了。

愚以为，即使作者过于悲观，他提出的问题也值得思量：如今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大概是不争的事实了吧？这还不是 80 年代的简单出口加工业，什么服装、折叠伞、玩具等等，而是基础工业。现今发达国家的制造产业都转移到中国去了，只留下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与金融产业。我记得美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就当废铁卖给了中国。这似乎是全球化在发达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国际分工。既然中国承担了制造业的大头，则对原材料的需求迟早要耗尽国内的储备而转向国外，就算这巨额需求不造成环球通胀，国际原料价格与能源价格仍然保持在同一水平上，起码也比国内的价格高吧？如此一来，中国产品便再也无法做到原来的价廉物美了，势必在国际上丧失竞争力。而国内市场又不足以吸纳，这结果当然只会是制造业的萧条。

2）美元的脆弱与疲软将雪上加霜

这个问题咱们其实已在本区讨论过了。袁剑先生似乎也认为美元和黄金脱钩，使得其价值失去客观指标，完全成了信心的函数（他认为是信用和“软实力”，我觉得后一术语含混不清，主要还是信用决定钞票价值。在我这外行看来，废除金本位之后的美元与股票也没有什么实质差别，全靠信心维持）。而且，美元成了世界货币，藉此把资本主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统一在一起，但它并不是“世界政府”而是美国这民族国家发行的。当出现危机时，货币的发行者只会考虑本国的利益而不会兼顾全世界，这就是凭借美元建立的环球经济体系的内在悖论。

那么，美元的地位对中国的影响何在？他认为：

“以一个民族国家名不副实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消费能力被美元大大的放大了）来吸纳人口数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国家的产能，进而维持整个体系的扩张，是目前这个美元体系中的一个深刻悖论。”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过去咱们讨论时说的那个问题：老美靠借债过日子，寅吃卯粮，靠滥发美元向中国进口廉价商品，维持表面繁荣。中国换来了大量美元，又用去买美国的债券，于是美元又流回美国去了。整个体系就是这样靠信用在运转并不断扩张，当这信用突然失去之后，美元就会贬值，不但无法再继续吸纳中国的产能，就连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也会变成一堆废纸。这对中国出口型经济将带来多重打击：首先是产品卖不出去了，其次是原料能源价格因美元贬值而急剧上涨，最后是多年来苦吃苦做的血汗钱蒸发了。

必须说明，上面这些话是我的理解，作者并未阐明经济危机发生的具体机制。

作为外行，我不知道上述理解是否正确，但我觉得言之成理。它当然可能失于简单化导致的夸张，但美元自去年暴跌之后，今年 3 月间又跌到谷底，至今虽然略有回升，但远未回复到原来水平。这趋势能否逆转，就连伪经济学家们（不是说这些人是冒充的经济学家，是说经济学是伪科学，那“伪”字修饰的是“经济学”不是“家”，此乃中文模糊导致的歧异。经济学其实相当于炼金术或占星术，英文专家应该循 alchemy vs chemistry、astrology vs astronomy 之例，造出个 econology 的词汇来与 economy 对应。但问题在于经济学永远也不可能变成研究客观规律的科学，因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经济，一旦抽去了主观因素，就再不可能运转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3）全球都将陷入经济危机

由于上述原因，作者作出预言：

“如果我们对二战之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猜测恰好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走在全球巨变的前夜。沿着已经出现的线索，不需要任何想象力，我们首先就看到了一幅全球滞胀的可怖图景。具体来说，就是发达国家之滞和新兴国家之胀。”

作者在此把“滞涨”拆开来说，这倒很新鲜，盖伪经济学家们似乎从来不兴这么说。所谓“滞涨”乃是二战后发生的奇特景像。此前通货膨胀只会伴随经济过热出现，亦即投资活跃，经济成长加速，萧条期只会出现通货紧缩，亦即商品跌价。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纳凯恩斯主义并实行福利政策，确保了最低消费水平，避免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重现，却因此制造出了过去没有的“滞涨”，也就是经济成长停滞的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此中原因我已经做过外行猜测了：那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经济成长停滞资本家而劳动力价格不跌，当然生产成本也就不会下降，而随着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生产成本也就随之上涨，于是便出现了“滞涨”。当然这不过是题外话。

作者此处的预言，我不知道有何依据，在我看来，中国最可能出现的还是萧条，起码是经济成长停滞。在高增长的 30 年中建立起来的高产能难以为继，当国际市场萎缩，原料和能源价格上涨之后，必然要出现“生产过剩”，使得

企业倒闭。它会不会伴随着通胀，端看国际市场上的原料和能源价格是否会回落。从目前趋势来看，滞涨的可能性很高。

4）不要指望人民与政府同心同德共度难关

因为“发财才是硬道理”成了中国的“隐性宪法”，构成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当发财梦破灭后，也就是“隐性宪法”土崩瓦解之时了。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繁荣是以剥夺工农大众的权利为前提，以贫富两极分化为代价的。它制造出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只是这危机被储蓄下来而已。但当考验的时刻到来时，这些预付的潜在成本就要出来索债了。作者指出：

“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 1990 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

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层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作者没有明确预言这“裂变”将会采用何种方式进行，但读者不难想象那很可能是大幅度的社会动荡。

我的直觉是，“裂变”也好，“崩溃”也好，都不大可能发生。早就反复说过了，现代极权制度的设计与科技的发达，使得统治者对人民握有绝对优势，只要统治者内部同心同德，在必要时刻果敢屠民，则政权就永远不会被人民推翻。除此之外，极权政府使用无限权力干预经济，常能使得国家化险为夷。这早就为希特勒显示过了。当时他重用的经济奇才沙赫特发现经济过热，泡沫即将爆破，以为大祸将临，多次警告希特勒，但后者置若罔闻。等到危机果然到来时，沙赫特却大吃一惊，发现希特勒一纸行政命令便冻结了工资和物价，预期的灾难就这么给轻易避免了。如今自由世界的伪经济学家们也常犯此类低估极权政府生存力的错误。这话我在几年前就告诉过草庵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作者确实说出了许多事实，其警告或许失于夸张，但并非无据。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确实走到了尽头，难乎为继。就算萧条不发生，好日子也过到顶了，以后很可能会进入经济成长停滞期。如果再出现持续高通胀，则社会危机将进一步加深，局部动乱将时起时伏，使中央疲于奔命。如果党内出现分裂（这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则作者预言的社会裂变并不是不可能设想的。

三、呼唤公平与正义是对牛弹琴

作者开出的药方是实行社会公平，此乃我上网以来一直不倦呼喊的口号，但我只从化解社会危机、实现可持续的真正的安定团结着眼，从未从经济角度加以分析。有趣的是，作者也并未这么做，他对公平与正义的呼唤更像是道义呼吁，对我党没有多少说服力。

其实从利弊分析来说，要经济能持续发展，就必须实行社会公正。这道理非常简单，连我这外行独脚猫都想得过来，看看老美和日本的先例就足矣。

我曾经在旧作中解释为何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老大哥，却使得美国发了财，那其实是最有效的凯恩斯主义：本来毫不生产财富的武器制造，为国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部分国民富裕起来后，就提升了消费力，刺激市场，带动消费品生产；消费品生产增长，又给基础工业造成市场需要，于是百业都兴旺起来了。

须知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力是市场需要，而要它永远保持活力，前提是国民具有强大的购买力。美国和日本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大的市场是在国内而非海外。换言之，均富才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南美的教训就是违背了这“客观规律”（如果经济学也能揭示什么客观规律的话），经济繁荣是靠掠夺人民实现的。这种繁荣绝对不可能持久，这道理两千多年前的荀子早就阐述过了：

>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

这就是“藏富于民”的道理。如今中国面临着国际需求萎缩的前景，必须“拉动内需”，将外向型经济逐步过渡为内外兼顾，以内为主，变成日美那样的国家，而这就需要大幅度提高国民特别是农民的消费能力。如果百姓富裕起来了，那么无论国际市场如何萎缩，13 亿人的市场将是永远无法耗竭的。因此，哪怕是从利弊分析的角度来看，均富，只有均富，才是国民经济从病态转入健康，避免南美式昙花一现的短暂虚假繁荣的根本途径。

但这呼唤并不会为我党听取，原因早就反复说过了，如今中国实行的是官僚资本主义。自然害怕真空，官僚害怕公平。提倡社会公正，有财大家发，无异于断了人家利用权势发财的路，又有哪个官僚会听取？胡温不过是官僚总代理，其亲民秀只会具有“尺蠖效应”，这点秦晖教授早就指出了。这体制不改革，则社会就不可能实行公平与正义，而要改革体制，达到最终废除官僚统治的目标，咱们如今又没有了具有绝对权威的传统帝王。因此，中国政治无可能出现实质上的改革，而中国经济当然也就只会处于危机四伏的病态之中。

2008 年 8 月 15 日

也谈所谓“举国体制”的利弊

网友转贴了国内经济学者李子暘谈“举国体制”的文章，写得似乎不太高明，我看了一半就没法看下去了，觉得或有可补正之处。

诚如作者指出，“举国体制”乃是个意义含混的词，不过他认为这是个中性词汇就大谬不然了。其实发明此语者用心良苦，乃是用来取代“极权制度”那不好听的名称。

所谓“极权制度”（totalitarian regime）并非集权制度（centralized government），我已经讲解过多次了。此乃政治学常识，这里不想再作详尽解释，只想再简略重复一次：所谓极权制度乃是专制程度最高的专制制度，特点是政府权力空前庞大，剥夺了人民的所有权利甚至生产资料，垄断了国家的一切资源。最恶劣的形式就是苏式社会主义，其次是纳粹。今日中国则已经走出了毛中国的最黑暗的时代，只能算半极权半威权（authoritarian），当然这比例尚待讨论，到底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是威权成分重还是极权成分重，还有待于国内网友指出。

因此，作者认为民主国家也可以有举国体制，这无法成立。所谓“举国体制”，讲的无非是举国集中全力去作某件事，例如这次开奥运会。但要这么做，前提是政府拥有全面掌控调拨国家人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权力，这在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可思议。

咱们也不用说大事，就举个小小的例子吧。当年某诺贝尔奖得主去中国访问，我认识的某人作东道主，给人家上满汉全席，招待的跟帝王无异。等到后来这家伙回访，那诺贝尔奖得主却招待得无比寒酸简陋。这原因毫不难懂：我那熟人动用的是国库的钱，而诺奖获主掏的可是自家的腰包，这两者能比么？虽然那阵中国还穷得要死（80 年代的事），但再穷也穷不了国库不是？

当然民主国家也有实行所谓“举国体制”之时，作者也指出了，那就是进入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之时，此时国家便采用所谓“战时体制”，政府获得了和平时期根本不敢指望的巨大权力，甚至实行舆论管制。但这和极权国家的“举国体制”还是不同：第一，它是特殊状态下的应急措施，有明确时限。第

二，政府获得的权力毕竟有限，并不能剥夺人民财产，对人民权利的限制也极度有限。英国甚至还在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便举行了大选，把领导人民获得对德战争完胜的丘吉尔选了下去（英国人民真 TMD 伟大，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人作领袖。丘吉尔只能用来作战马，指望他那右派领导建立福利国家则毫无希望）。第三，虽然战时两党暂停争吵，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但反对党的权利毕竟没有被剥夺，可以随时质疑战争的组织与指挥，必要时换马。这些都是极权国家不会发生的现象。

也正因为这些特点，民主国家战时体制的动员力根本就没有极权国家的强大。作者用美国在二战中激发出来的强大国力来作为人家动员能力的证明，似乎无法成立，盖他忽略了美国原有的强大工业生产力。我已经在跟帖中指出了，以苏联之落后，如果不是靠极权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把西部工厂悉数搬迁到西伯利亚并立即开工的奇迹，就绝对不可能出现，遑论生产出几万辆 T-34 坦克来。如果当时苏联是民主国家，则绝对不会幸存下来。极权政体的生存力是惊人的，我早在介绍苏联二战的一系列译作中介绍过了。哪怕是实行了战时体制的民主政府，也绝不会有哪个首脑敢像斯大林那样，命令列宁格勒守军无情射杀德军用来作肉盾的俄国人质。

正因为极权制度的惊人动员能力，它才会被民主国家在战时或处于紧急状态时部分采用。当年罗斯福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国会授予他相当于战时总统的权限，使得政府能获得空前的权力去应对大萧条的空前危机。由此可见，赋予政府巨大权力，去调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确实能形成巨大的合力。这也就是我们热衷于歌颂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容否认，就是这制度优越性保证了上次地震救灾活动的及时与成功。

但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也就只存在于应付战乱或其他紧急状态之下。它的最大弊病，作者已经指出了，就是使得举国只有元首一个脑袋，全民起到的只是肌肉作用。即使是斯大林的脑袋，使用这种制度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但也势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而若那脑袋是毛泽东的，则就一定会遇上“全民炼钢”的巨大灾难——谁敢否认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是“举国体制”造出来的奇迹？历史上有哪个政权有那权力规定农民必须把土地深耕到几尺？又有哪个君王敢下令全民把农具锅碗瓢盆砸了，塞进“土高炉”里去？

这一事实我已在《Russia’s War》的读后感指出了：

“‘在 10 年中，钢产量从 1928 年的 4 百 30 万吨增加到 1 千 8 百 10 万吨。煤从 3 千 5 百万吨增加到 1 亿 3 千 3 百万吨。卡车从微不足道的 700 辆增加到 1038 年的 18 万 2 千辆。在 1928 年初，红军只有 92 辆坦克，到了 1935 年 1 月便有了 10，180 架。1928 年空军只有 1394 架不同种类的飞机，到 1935 年便有了 6672 架。从 1930 年到 1934 年，战斗机产量增加了 5 倍，轰炸机产量增长了 4 倍。’

可惜，毛享有同样的权力，也和斯大林一样残酷无情，不计代价，但因为他是惊天动地的治国白痴，便在花费了比人家更惨痛的代价后，非但未能使国家工业化，反倒制造出了大饥荒，怪不得培根要说‘知识即权力’。伟大领袖因为是绝对科盲以及高选择性的‘治国智障’，他的权力中便缺了这最重要的一项，成了‘权力跛脚鸭’，如同大力士生为瞎子那样不幸，专门以超乎寻常的动能以头猛撞石壁。”

因此，民主制度或许不能给我们带来奇迹，但它同样不会造成全国规模的巨大灾难，起码是安全的。

更严重的局限在于，极权制度的优越性，说到底在于它恢复了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不惜人命代价创造经济奇迹。既然实行奴隶制古罗马能靠低下的生产力建起罗马斗兽场、万神庙等奇迹，现代极权制度造出斯大林式的经济奇迹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我在《Russia’s War》的读后感已经指出两者的相似：

“斯大林使用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巨大权力，以无比野蛮残忍无情的手段强行动员全国人力和物力，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代价和资源损失之后，在短短的十年内就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重工业强国。客观说来，这应该算是个奇迹——当然是非人道的野蛮奇迹，它证明了在获得空前的权力之后，大独裁者的意志确实能改天换地。这种英雄业绩和古法老使用奴隶劳动建造出金字塔来一样，永远以其规模效应在肤浅者心目中引起如同对神灵一般的敬畏，这也就是苏联模式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所在。”

但正因为这种极权制度的基础是奴役，因此它必然具有与奴隶制相似的结局，亦即社会缺乏生机，增长势头难乎为继，最后不得不垮台。苏式社会主义是奴役全民，靠的是邪教感召力以及恐怖统治，但邪教刺激出来的无私献身迟

早要耗竭信徒们的肾上腺，而恐怖统治则使得国家永远处在类似战时的紧张状态中，人民也不可能永远忍受下去。虽然现代科技进步剥夺人民反抗政府的客观可能性，但百姓总可以如古代奴隶那样消极怠工，而这就是苏联和毛中国后期出现的普遍景观。在极权国家生活久了，奴隶们迟早要“从必然走向自由”。我一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时光，还是 70 年代后期在工厂度过的。到后来大家都参透了怎么对付政府，合法怠工并偷盗国家财产，政府也就没辙了。因此，化全民为奴隶毕竟是空想共产主义，缺乏长久的可操作性，特别是处于国际和平时期更如此。因此，其实是共产阵营经不起和平竞争，害怕国际形势缓和。此所以毛泽东要反对“三降一灭，三和一少”。

这也是老邓为何要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改革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的要旨在于在 “举国体制”的框架下引入资本主义的活力，也就是化全民奴隶制为部分奴隶制，亦即把国民分为城市自由民与乡村奴隶两大类，由自由民们提供创业热情，由奴隶提供廉价劳力。两者相辅相成，相得弥彰，缺一不可。正如老金转述的国内经济学家指出的，如果没有制度蓄意制造出来的不平等，没有政府用暴力维持这不平等，那就没有广大农村贱民在毫无福利保障甚至人身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苦吃苦做，高楼大厦又由谁来造？而没有自由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们的心满意足，社会安定又如何保证？

至此，我党似乎终于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勾画的蓝图：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用文明人的话语来翻译，那就是说，我党终于成功地造出了一种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极权制度。这大概可算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吧，起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但问题在于繁荣的可持续性。政治上的动乱无足虑。虽然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剥夺人民权利上的，与费厄泼赖针锋相对，必然制造出深刻的社会危机，而现有制度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无法化解这种危机，只能把它积蓄下来，但在极权体制下人民根本没有造反可能，若发生动乱只可能是共党内讧引起的。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无这种迹象。

作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濒临“卖完”困境，资源已经被廉价地甩卖得差不多了。随着中国转向资源进口，产品的竞争力也将失

去，美元的疲软也将导致国际市场丧失吸纳中国巨大产能，由此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发生。但不仅经济学家易明认为这种前景不存在，老金更认为中国是 truly exceptional，并不受经济学理论制约。这很有可能，因为经济学从来是伪科学，迄今为止尚未揭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这两位都比我熟悉中国如今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的预测为真，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还将繁荣兴旺下去。

因此，看来我党确实证明了 the impossible，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确有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无从梦想的功利上的优越性。这对文明世界的常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值得学者们仔细研究之。

2008 年 8 月 30 日

赵紫阳提出的难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去年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由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我断续看了大约 1/3，觉得非常精彩。

从该书可以看出，老赵确实是个我党绝无仅有的人才，其思想之先进开放，不仅在党内鹤立鸡群，恐怕在党外也找不到多少可以相比的。看来我党的先进分子都在抗战爆发后加入中共的城市知青中，其优秀代表就是老赵、李锐、宗凤鸣等人。这些人的智力素质与道德素质都远非农村游民痞子出身的老红军或老八路可比，真正是操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爱国志士。可惜这些老家伙现在都死得差不多了，把国柄留给"解放后"经过"阶级斗争"反复负筛选出来的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分子们：（

我发现，老赵的治国理念与我惊人的一致。他也承认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中国的前途在于向西方学习，建设资本主义（当然他没有这么说，改用"补资本主义的课"），并最终实行民主制度。但他同样也看到了特殊国情，因而主张渐进主义。为避免出现权力真空而天下大乱，先在坚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把中国改造为香港式的自由社会（其实也就是恢复到"解放"前，只是他限于出身，无法同意共党推翻国府是错误的罢了），在条件成熟后再实行多党竞选。与此同时应该实行与经济改革同步的政治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撤销各部党组，让党组织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撤退，为最终实行民主创造条件。

赵的谈话表明，他才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老邓不过是个董事长，他则是 CEO，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有功之臣。具体改革的构想都是他提出来，经老邓拍板，再由他推行的。王小鲁在比较中苏改革时列举的中国成功经验，其实都是老赵的设想。江泽民不过是个"脚踩西瓜皮"的投机分子，开头在改革与复辟之间首鼠两端，后来无非是看老邓的改革决心不可逆转，因而沿袭了老赵的思路，出来摘现成桃子罢了。老赵经济改革方案的最关键的一条，是实行双轨制，亦即先扶植非国有经济（他称为"体制外经济"），并推行市场经济，等到非国有经济占了国民经济的大头，市场也充分发育起来后，再把国有企业股份化，推向市场，这样就不会因为青黄不接造成经济灾难。俄罗斯不走

此道，采用“休克疗法”，将国有企业产权平均分割给职工后贸然抛向市场，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贫富两极分化，这弊病老赵早就预见到了。

当然俄国有自己的难处：人家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远没有咱们的大，过剩人口远没有中国多，无法依靠大量的农村与城市闲散劳动力兴办乡镇企业，或充当三资企业的苦力，海外又没有庞大的“大中华经济圈”提供原始资本，国民经济也没被毛泽东搞得一塌糊涂（这据说是毛的伟大贡献，如此说来，希特勒下令德军在撤退前炸毁所有工厂，原来是为了德国战后腾飞），不具备“负帕累托效应”。但即使如此，老赵也功不可没。光是为了中国人民今天能过上好日子，人民都应该感谢这位改革的总设计师。邓江朱胡温过桥抽板，卸磨杀驴，“以小拿大”，非法软禁党总书记，用马悲鸣的说法就是“谋篡”。

我本来想在看完后写个系列：《赵紫阳的治国理念》、《赵紫阳谈六四》等等，但实在是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只想说一声，老赵对六四的看法也和我基本一致，认为学运本可和平化解，冲突是党内顽固派“两面挑”挑起来的，而学生的过激行动成全了他们的阴谋，让他至感遗憾（当然他豁达大度，没像我说得这么明白）。宗凤鸣还安慰他，说学生领袖在出国后也作了忏悔道歉。其实哪有此事！吾尔开希、柴玲辈那些小毛泽东是绝不会“下罪己诏”的。

却说老赵在谈话中谈到了政治改革的最大难题，就是怎么把共党那多头凶龙收进净瓶里去，逐步把“党天下”改造为“民天下”。这确实是最大的难题。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指出了，民主社会的实现前提，是国家一切威权设施以及公务员系统必须中立化，不得介入政治斗争。党天下只要存在一天，中国就没有希望改造为现代文明国家。

老赵想到的，就是党政分开，各级党委只管党务，不再干涉行政。但对于怎么理顺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他先是表示想不出什么办法，后又笼统地说了声：人大要硬也可以很硬，要软也可以很软，但还是没说出具体改革设想来（当然也可能在后面说了，我还没看完该书）。

如所周知，人大制度照抄苏联的“苏维埃”，乃是聋子的耳朵。只要“坚持党的领导”，人大就绝无可能“硬”起来。是党大还是法大？其必曰：当然是党大！人大不过是个表决机器罢了。老赵透露，老邓从来就把人大当成安排人的去处。那意思是说他专把过气共干往那里塞。这一直是我党各级组织的实

践。实际上，人大成了“干部离休过渡所”，干部离休前先去那儿过渡一下，如同宇航员或潜水员在出舱前先得经过个过渡舱一般。

因此，要坚持党的领导，人大就是个不可改革的机构。不仅如此，所谓“党政分开”也是空想——难道政府不是变相的党组织？就算按老赵的设想，把两家机构的功能截然分开，那也不过是消除了现行体制内叠床架屋的重复设施罢了，除了精简机构减少扯皮外，并没有什么政治进步。

现实情况是，不但立法机构是党组织，行政机构是党组织，司法机构是党组织，就连军警宪特等威权机构也是党组织。这种骇人听闻的国家组织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国民党按照孙中山的设计实行一党专政，起码司法机构是独立的。地方行政也由省主席、市长、县长负责。地方党部只管党务，根本插不上手。

我的想法是，干脆把毫无必要的婊子牌坊拆了，把中国先改成个古罗马或南非式真正的共和国。在这种国家中，只有党员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权，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非党员公民则比古罗马的奴隶或南非的黑人待遇高一些，虽不得享受党员的从政权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权利，诸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安全、通信自由、迁徙自由、财产权、经济自由等等必须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

具体作法是，撤销现有各级人大，以各级党代会代替之，各级政府就是党代会选举出来的内阁。国家主席也全国党代会选出，属于虚君。党内实行英式民主，选举必须是严格的西式竞选，党代会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Parliament Sovereignty），一切国策必须经全国党代会以提案方式提出，经过充分辩论，在多数票决后，以法案的方式交给内阁执行。在地方权限内的决策也由地方党代会以类似方式决定。所有这些都必须公开进行，让全民（包括党员一等公民和非党员二等公民在内）洞悉选举和决策过程。

各级党委会则予以撤销，仅在党代会下设党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党员登记、党代表定期选举等技术事务。军警宪特内的党组织一律撤销，实行首长负责制，最高首长接受政府领导，对政府负责。司法机构内的党组织也予以解散，完全独立于立法与行政系统。

此外还可以考虑由全民（包括党员一等公民和非党员二等公民在内）选举与党代会平级的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政府施政以及司法机构的执法。监察委

员会有权弹劾渎职失职官员，将弹劾案交给相应级别的党代会，后者必须及时、公开地讨论审理，并公布判决。

在我看来，这不失为和平进化的一个理想方案：先在坚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将中国改造为自由的国家，其中大多数公民没有挑选领袖的政治权利，但享有充分的自由。它照顾了共党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构成了通向全民民主的平滑过渡阶段。不难想见，倘若真的实行这方案，共党就会逐渐分裂为代表不同利益的两党或多党（本来共党就很大了，内部含有复杂的等级成分，从农村草根直到亿万富翁），此时一党专政就能平滑过渡为多党竞争，而精英民主将最终发展为全民民主。

2008 年 9 月 14 日

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致国内网友

一、缘起

前两天看见某位年轻女士坦承，她过去是我的粉丝，为了看拙作，一边努力突破国内封锁，一边心里骂共产党。因为受了我的影响办出国，共产党一点没刁难，她因此对共党充满感激，反倒是到了美国后大失所望。据她说，她认识美国军界和 CIA 的头子，从那些人的谈话中发现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因而对我充满刻骨仇恨，认定我是 CIA 雇佣的文化特务，云云。

我看到该帖后备感震撼，当即转到本人所在的论坛，并写了个帖子，解释了一下我觉得值得深思之处，另一位网友当即写了个跟帖：

> “坦白的说，我对老芦也是又爱又恨。我接触网络在 99 年，看到芦文是在 2006 年，也就是老金刚来此地，发布长篇雄文读芦文有感系列的时候。从此沉醉于芦文不能自拔，从网上找来芦文电子版日夜研读（哪位网友没搜到可以找我）。两年的时间里，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工作没干劲，学习没兴趣，越来越孤独，日常生活一塌糊涂，连性欲都下降了不少（老芦要负责啊）。唉！真不知道是福是祸。老芦揭示了真象，却也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要是没看到老芦的东西，傻傻活下去也许也很快乐。想起老芦对他老丈人的态度‘不忍揭穿真相’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我虽一直浏览本坛，但是脑子里没装多少东西（不象老金），从来没发过言，前段时间再也忍不住了，就注册了上来和各位网友交流，以便能减少一些痛苦。并且也准备刻苦攻读鸡阿姨，兴许有朝一日能脱离苦海。”

当下只觉得五雷轰顶。我从来没想到拙文会起到这种作用，我原来只想着把传统中的弊病找出来，澄清某些普遍误解，让后世子孙不要重蹈覆辙，从未想到把真相说穿了，会使人悲观失望，产生放弃和逃避心理。更严重的是，这似乎不只是一个人的感觉。闹半天，我上网写作的客观效果，就是告诉大家中国是一艘要沉没的船，赶快逃出那儿是上策啊？这可绝非我的原意。

然而历史不讲动机，历史只看效果，动机并不是我可以原谅自己的理由。虽然我与鲁迅的写作动机完全不同，但两人似乎都是作孽。区别只在于他哺育出了只会使用肾上腺反抗黑暗社会的愤青，为中共革命输送了大批热血青年，我则让人绝望，教人逃避。您说到底是谁作的孽更大？聊可自慰者，也就是我没有他百万分之一的影响力。

为了补过，我看还是只能写这个帖子。至于是否有效，那我可就不知道了，尽人事以听天命吧。

二、为什么动念疗愚？

这问题已经反复说过了。我上网是 2000 年台海危机激出来的一时冲动，当时并没有多想别的，更没想到会在网上一呆就是八年多，但一旦卷入江湖风波，要退步抽身就难了。因为专门讲大实话，我多次遭到爱国愤老中青和“民主”愤老中青围剿，蔚为海外中文网上一大景观。在这过程中，我多次震骇于对方那难以言状的愚昧，骇然发现国人无论左中右，都不但缺乏起码常识，而且连什么是正确的思维方式都毫不摸门。

最典型的就是樊弓教授与我的论战。樊教授是“民主理论家”，被民朋奉为网上高手，以反共为己任（其笔名就是“反共”的谐音），因为我扫荡伪民运，拍案而起批判我，赢得了民朋的狂热喝彩。但后来他自己又承认，他不但是美国的数学教授，曾到欧洲最高学府讲过学，而且还常在我党头牌理论刊物发政论，乃是两面通吃的“国师” 。然而此人却什么逻辑笑话都能闹出来，我为此特地写了几万字的《疗愚篇》，化许大心力去点拨愚顽，堪称对自己智力的空前戕贼与浪费。

那就是我网上生涯的转折点。我本来早就觉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灾难乃是国民特别是精英们难以思议的愚蠢造成的。就算不是主要原因，起码也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但要等到上了网后，我才痛切地感到，比起愚昧的前人来，现代国人依然毫无尺寸进步。那就意味着前人犯过的错误，后人一定会高保真地重复。中国历史已经再三显示这一最突出的特点了。我在旧作中曾愤激地说过，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咱们从来不会犯新错

误，每个错误都是前人早已经犯过千百次的。“吃一堑，长一智”不是中国国情。

粗知历史的人绝不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中国近现代之所以陷入无穷尽动荡，乃是遭到了西方文明的全面入侵。因为鬼子在各方面都更强大、更先进，使得传统文明在一切方面都相形见绌，传统价值观土崩瓦解，因而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亘古未见的“亡文明危机”，失去了惯常的运行轨道，再也无法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了。在这严峻的情势下，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态，虚心向西方学习，把西方之所以强大的根本秘诀学过来。这才是真正的救亡图存之道。

可惜事实证明除了极少数先知先觉外，绝大多数中国精英缺乏起码的调适应变智能，更缺乏起码的自知之明。鸦片战争过后 60 年内，大多数国人竟然连“西方文明比传统文明更先进”这么一个简单事实都无法承认。现代人只知道骂慈禧老佛爷顽固排外，却不知道或忘记了，她的确代表当时绝大多数民意，正如我党代表如今绝大多数民意一般，拳匪轰轰烈烈的“扶清灭洋”的人民战争最能证明这一点。一直要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列强瓜分已经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举国上下才总算睁开了重如泰山的眼睑，这结果便是晚清的新政。说来可叹的是，它之所以能推出，还得感谢八国联军为民除害，命令老佛爷把顽固派官僚统统干了，这才总算搬走了改革的拦路虎、绊脚石。

（这儿顺便介绍一下：当时当国的政治家如袁世凯等人最怕的就是被列强瓜分，举凡考虑内政，必先考虑列强的反应，如同小媳妇般战战兢兢。革命家如孙大炮等人也如此，只不过思路完全反了过来，乃是如何勾结上个外国主子，靠出卖中国利益夺取政权［这条路最后终于被毛泽东走通了］。但双方都认识到列强［后期则是苏俄和日本］是解决一切内政问题的先决条件。对比日本的崛起，不难看出老大帝国的卑微，而这完全是六十年的愚昧造成的。）

晚清新政虽然晚了六十年，但毕竟算是走上了正道。它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为国民经济松了绑，解除了统治者出于孔孟之道规定的“天理大义”动用国家权力对民族工商业的压制，使得中国经济立即出现前所未见的繁荣。

可就在中国行将起死回生之际，孙文等革命乱党又出来破坏捣乱。辛亥暴乱本来为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清廷为免灭亡，退到了最底线，不但公布了《重大信条 19 条》，宣誓太庙，以彰信守，而且真的还政于民，摄政王退归藩

邸，将大权交给资政院选出来的责任内阁。如果革命乱党见好就收，则辛亥革命就能转化为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社会进化的里程碑，而中国今日也就绝不会是这野蛮样子了。

然而孙文等人却要捣乱到底，这结果最后就是国家分崩离析，不但使得国家在日寇全面入侵之际毫无还手之力，全民遭受了惨痛牺牲，而且更造成“非武力不能一统天下”的客观局面，待到强人真用枪杆子一统天下之后，中国便在政治上完成了骇人听闻的大倒退。自有人类以来，这种出于纯净的愚蠢的倒行逆施恐怕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宿命论）影响的读者只会觉得这一切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他们也一定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论证那必然性，并证明中国发生的这种社会大倒退不但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曲折的进步。黄仁宇、唐德刚就是这种“画靶就箭”的好手。但问题在于，如果国人不是那么愚蠢，辛亥革命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老袁也并不必然会称帝，国家也并不一定会分裂，军阀混战的爆发也不是必然的，中日也不一定非得交战不可，而毛共上台就更是可以避免的了。这一系列事件之所以从“或然的”变成“必然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知青们（革命家中无一人可称为知识分子，只能叫做知青）蠢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是他们的愚蠢使得国家遇到了本可避免的一系列灾难。

的确，即使是最死硬的“必然论者”，也找不出什么客观理由来解释，清廷何以会在 1840 年至 1901 年这么长的时段内，顽固地闭眼不看世界，宁愿反复挨痛打，一次次蒙羞受辱，也不愿抛弃一钱不值的“天朝国体”、“世道人心”，坚持维护注定要灭亡的传统生活方式。

须知冥冥之中并没有什么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剥夺了中国效法日本主动改革的机会。列强就更不曾反对过中国改革，戊戌变法可不是鬼子镇压下去的。相反，鬼子对无法打交道的顽固派深恶痛绝，对据说是改革派领袖的光绪皇帝素有好感。如果不是他们干涉中国内政，光绪早就被慈禧废黜了。最后改革之所以能发起，还全仗鬼子命令慈禧杀了顽固派头子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等人。新政启动后，列强非但没有干涉，反倒对改革取得的经济成就赞扬备至，说中国如此改革下去，几十年内便能称雄天下。虽然日俄暗怀鬼胎，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公开干预中国的文明化。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当好，百业兴旺，百姓压根儿就没有“翻身解放”的要求。国内史学界已经有相当多的客观评价了，这儿随便引一段网上勾来的大路货：

> “首先在经济上，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明显发展。1904 至 1910 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在 1895 至 1898 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 55 家，年均 13．75 家；而 1904 至 1910 年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 276 家，年均 39．4 家，是前者的 2．87 倍(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878—919 页。其中纯官办企业未计算在内。)。这种发展还表现在矿业上，1904 至 1910 年新建矿 48 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在农业上，由于土地面积的增加(拙作：《清末发展实业初探》，《北方论丛》1985 年第 3 期。)，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增长；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入(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868—879 页。)，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也带有近代的色彩。”

当时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外患，所谓“主要矛盾”就是这个，具体来说就是虎视在侧的日本人和老毛子。他们巴不得中国陷于无穷内乱，被内战弄得民穷财尽，内部四分五裂，失去对外抵抗力，好让他们任意肢解控制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孙文那天上有世间无的白痴才会提出“以革命止瓜分”，以制造内乱来“解决”民族危机，在客观上迎合日本人和老毛子的战略意图。

奇怪的是，这种白痴主张竟会获得留日士官生以及偏激文人们的认同。比起孙文煽动民族仇恨的感性宣传来，梁启超的理性警告当然缺乏煽惑力。到后来，革命的目的就完全成了“驱逐鞑虏”，乱党们关心的不再是救亡图存，而是如何趁国难当头之际，把鞑子皇帝搞下去。两宫猝崩后，摄政王的弱智为涌动的革命暗潮推波助澜，竟然推出所谓“皇族内阁”，使得连立宪派都大失所望。种种偶然因素加在一起，便演出了辛亥丑剧。讽刺的是，清廷的种种救亡努力，诸如派留学生赴日学军事、编练新军、实行西式新闻自由，试行地方自治，乃至最后还政于民等等，反而促成了它的灭亡。它留给后世独裁者的教训就是：千万不能讲“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宁肯亡国，也不能放权，搞自由化。

因此，辛亥丑剧既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更非人民诉求。御用学者们竟然将之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弱智笑话——晚清新政开始后才放松国家对民间工商业的压制，满打满算也就近十年光阴。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能在中国制造出个资产阶级来，只有神话中的“撒豆成兵”才有此功效。上引数字就能说明中国当时到底有什么“资产阶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套伟大领袖的话来说就是：“搞资产阶级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真实的历史是，从头到尾，革命完全是一伙捏了兵权的愤青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愤青之所以要以革命祸国，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惊天动地的愚昧。

以后的事就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革命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然而愤青们见了棺材还不掉泪，反而觉得那是革命不彻底所致，而要论彻底革命精神，谁敢跟毛子比？当然只能“以俄为师”。这遭革命倒是成功了，可人民也彻底丧失了从财产直到人身自由的一切权利。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斩断旧乾坤，中国人民为自己锻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奴隶社会。

那天我看见有人在隔壁重复毛泽东的无耻谰言，说什么“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其实那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跪下去了”。就连秦始皇、隋炀帝也不曾没收全民财产，实行官有制，建立人民对官僚的全面人身依附关系，造成“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可悲可怜局面，让全民彻底失去独立谋生的可能，只能乖乖地“一生交给党安排”。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当然有着苏俄帝国主义在华发动代理战争以及日本人直接入侵的客观原因，但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如果愤青们不是那么蠢，则也不会踊跃去充当苏俄别动队，为他们颠覆本国政府，陷国家于战祸，削弱国防能力，更不会为了“保卫苏联”，把日本人的祸水引到本国来。光是国内的社会问题，根本就不足引发革命，否则 49 年后的中国早就爆发 N 次革命了。早在旧作中说过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也不曾见哪个饥民揭竿而起。

综上所述，我认为国民特别是所谓精英的惊天动地的愚昧，才是中国在近现代蒙受一切苦难的主要原因。

三、精英愚昧的主要表现

这我已经反复在旧作中说过了，再综合重复一遍。

我发现，中国人与鬼子的微观思考方式差不多，都是趋利动物（这只是从主体而言，当然有许多例外包括本人在内，并未一网打尽），然而宏观思考方式却大相径庭，鬼子仍然是趋利动物，咱们则是“趋义动物”，常常为了莫名其妙的“天理大义”彻底丧失理智，专干跟自己过不去的蠢事，是为“义令智昏”，乃是中国独有的景观。

奇怪的是除了老芦外，至今尚无人发现这一中国特色，反而使用从西方趸来的“唯利史观”分析历史人物的动机，难免要谬以千里。

就说 1840-1901 那个“坚持挨打，绝不改革”的怪现象吧。您说朝野为何要搞这愚不可及的“四个坚持”？莫非真是我党说的那样，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统治”？那走资不是更能让土财主们发财么？台湾不就是个例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快钱大钱，岂是挂“千顷田”匾额的土财主能梦见的？要么，那真是“民主理论家”们说的“为了维护君权”？那日本明治维新反而提升了君权啊？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在宪法里不就完了？就算没有日本人的原创力（其实日本人已经够缺乏原创力了），抄袭人家的宪法总会吧？后来晚清制定的宪法草案不就是照抄日本 “天皇万世一系”的滥调么？为何不能早几十年这么干？而且，几亿人之中，怎么就不会有人看出“官权”才是“君权”的大敌，“官权”与“君权”的斗争从来是传统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重大内容，而皇帝从来也没找到限制官权的正道。效法鬼子，让民权发达起来，制约抗衡官权，与君权鼎足而三，不也是一种崭新的治国之道，更有可能实现皇室“万世一系”么？

再说抗战。中国从 1912 年便跌入无穷无尽的兵祸、匪祸与战乱，至 1937 年已是 25 年之久。国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实际治权只限于东南数省。其余各省都由割地自雄的军阀统治，都拥有专门用来打内战的军队。张学良在其口述自传中吹嘘东北的军工如何如何发达，他如何如何用重炮收拾吴佩孚，一口气打了多少多少炮弹，然而那如何如何厉害的重炮却从未在外战中放过一炮。九一八事变他一枪不放退到锦州，国府令他出兵收复失地，他竟然抗命不从，一口气逃到关内，还要在自传中造谣诬蔑蒋公。他后来为“抗日”发动西安事变，内幕如今已被国内学者揭得差不多了。那就是和西北军阀、阎锡山乃

至西南军阀一道，以抗日为名，实行“西北大联合”，取得苏俄武力援助，肢解分裂中国。最后苏援盼不到，反而盼来了莫斯科严厉指责，他当然只好顺风转舵，就此成了“民族英雄”。光是这种“民族英雄”的出现，就是对中国人智慧的放肆嘲弄。

这种由白色红色杂色的武人任意蹂躏的乌烟瘴气的烂国家，去和全民同心协力的军事强国开战，岂不是找死不拣日子？“攘外必先安内”的简单道理，凡是成人都能理解，为何中国知青就是死也不懂？蒋公说得如此明白：“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责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责也。”据唐德刚说，这由陈布雷捉刀的文告，当时给编进了中学教科书，作为学生必背内容，为何到了爱国愤青们那儿就是“有如东风射马耳”？

再来看老邓的改革。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了，改革开放遇到的最大阻力，乃是官僚集团的顽强抵抗。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应该视为老邓的个人作品，基本上是他违背党心民心，一意孤行搞起来的，在他自断左右臂之后就更是如此。八九“风波”之后，改革甚至面临夭折的现实危险，以致他必须效法毛泽东南巡，一路发指示，威胁“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才吓阻了“姓社”歪风。此后老而不死是为贼们死光了，官僚集团也从改革开放中尝到甜头，阻力才最终消失。

这用“唯利史观”根本就无法解释。老贼们之所以要抵抗改革，强调“姓社不姓资”，并不是出于维护一己或集团的特权与私利，而是为了坚决捍卫“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神圣原则。这种执拗的愚蠢，愚蠢的执拗，不但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也损害了权贵们自己的利益，委实是损国损民不利己，完全是满清传统的逼真继承。

那么，这种与众不同的损国损民不利己的“宏观趋义动物”是怎样炼成的？本人才疏学浅，只能说点一孔之见。愚以为，它不是什么生理原因导致的先天弱智，而是传统造成的民族性格使然。

在我看来，国人与鬼子的最大区别，还是咱们的幸福要素构成不一样，“面子”和其他心理满足构成了幸福要素。鬼子以谋利为 happiness 的前提，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如此。在微观上，咱们虽然也是谋利动物，但幸福的涵义和鬼子不同。两千年前的项羽已经说明白了这一节：“富贵不还乡，如穿锦衣夜

行。”对咱们来说，显摆乃是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离开显摆无幸福可言，显摆就是幸福。此所以中国和台湾都是豪华轿车最多的地方。

微观如此，宏观上就更是如此。事涉外交，中国人考虑的最重要的大事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国家的面子。在这压倒一切的大事面前，就连民族的生死存亡都可以毅然置之度外。在这上头，百姓甚至可以比朝廷更激昂，30 年代的愤青就是鲜活证明。这怪事的发生机制，我已经在《优伶之邦》中解释过了："卫道"（捍卫儒教的天理大义、民族大义、社会主义神圣原则等等）能给大众带来强烈的戏剧式的崇高感、悲壮感、庄严感，这种心理快感恐怕不亚于海洛因造成的欣快感。至于满足这种快感会给全民带来什么灾难，他们是绝不会考虑的，因为那与眼前的切身利益无关。

明乎此，则立刻可以看出上面那些蠢事是怎么发生的，全 TND 同一放电环路：满清之所以坚持"宁肯挨打，绝不改革"，那是改革的前提是承认自己不如人，实质是"用夷变夏"。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天朝上国居然要向茹毛饮血的"犬羊"们学习，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在此强烈推荐茅海建教授的两本巨著《天朝的崩溃》与《苦命天子》）；辛亥乱党之所以要以革命祸国，乃是他们觉得让鞑子皇帝统治大汉族太丢脸；30 年代愤青之所以要强迫蒋公毅然实行民族自杀，乃是实在无法接受"我泱泱中华大国实在太烂，绝非日本那蕞尔小国的对手"的难堪事实；80 年代老贼们之所以要坚持"姓社"，乃是他们认定那是他们的领袖确立的"优越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放弃它去学习西方那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乃是他们能想象的最大耻辱。

鲁迅曾在其杂文中引用过日本人的话，道是"中国人的血管里都流着要面子的血"。说这话的人的确参透了咱们的民族性格。只是无论是他还是鲁迅都没有悟出，面子常常是咱们标榜的各种各样"道义"的真实内涵，无论是爱国愤愤的"民族大义"，还是民主愤愤的"民主大义"，说穿了都是这东西。不尊重前者为面子在国际上"奋起抗暴"的心理需要，你就是汉奸；不尊重后者为面子在国内奋起抗暴的心理需要，你就是共奴。

这就是"义令智昏"的发生机制——咱们之所以愚蠢，乃是因为咱们太要面子，因而在宏观上彻底丧失了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这就是朱将军"西安以东"秀的国情基础，也是民运垃圾"全民起义"秀的国情基础。

正因为我明白这一中国特色，我才从未反对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去办奥运。我知道那钱是应该花的，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咱们的幸福感不能离开此类面子工程，而它并不会如“西安以东秀”或“全民起义秀”那样引出重大祸患，那又何乐而不为？国人所谓“有钱要花在节骨眼上”，此其时也。

关于面子问题还可以略作补充。国人在微观中也讲究面子，为此可以一掷千金，但这并不妨碍咱们为了谋利，放弃起码尊严，去肉麻谄媚讨好巴结领导。这两者似乎互相矛盾，其实不然，盖“受到领导垂青重用”本身就是最大的面子，丧失小面子（个人尊严）去换来大面子（党国重用），岂不是有赚无赔？国人对人与人的平等号召非常反感，却特别执着于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不知个人尊严为何物，却特别讲究“民族尊严”。这里面的玄关何在，老芦尚未参详出来。

四、奇特的“自尊自信自闭自宫”

稍知心理学常识的人不难看出，面子之所以对中国人如此生死攸关，乃是因为咱们的心理素质太脆弱，骨子里饱受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的折磨，乃是不折不扣的心理上的弱者，表面咄咄逼人，不可一世，内里无比虚怯。这才会把自己的幸福整个建立在他人的承认上。如果别人不承认，咱们便惶惶不可终日。此所以我要将北京奥运恶毒讥讽为“侍妾扶正认证大典”。即使是在最排外的文革时代，照样也是鬼子放个 P，便是“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那阵子的报纸，无论是“两报一刊”还是《参考消息》，连篇累牍尽是鬼子们的赞颂。一个国家的媒体竟然以他国对本国的观感为重大新闻，这种弱者心态奇观，我还从未在西方见过。

这就是咱们为何要反复死吹四大发明——因为底气太虚，所以不能不请出祖宗神主来给自己壮胆。这点鲁迅早就看破了，他曾在《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吗》一文指出，中国人从来也就不曾有过自信力，所以才要吹“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信“历史”、信“地”、信“物”，其实是一种“他信力”，云云。他没有指出的是，中国人的幸福来自于“自信”，而后者其实是“自欺”的同义语。因此，除非面临斧锯加身的直接危险，国人绝不会承认自己不如人，而若要让咱们承认过去那些“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伟大领袖”以及

“民族英雄”等等，不过是一伙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白痴，那就哪怕斧锯加身也绝不会让步了。用敬爱的叶群同志的话来说便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这就是造成中国近现代一切苦难的主观原因：中国人理解的“自尊自信”，就是晚清徐桐、倭仁、载漪的“自尊自信”，就是毛泽东的“自尊自信”，它将国人关在一个自制封闭系统中，彻底阉割了国人的学习智能，让精英们陶醉在自我膨胀的幻觉中，拒绝向西方学习，听任民族危机或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直到沉疴难治，回天乏术。

比较一下老美和其他西方国家，立刻就能看出这一鲜明的中国特色。老美没有历史可吹，也不见人家吹嘘货真价实的“地大物博”，然而一开口就是“can do ”的冲天牛气，大概可算全世界最自信的民族。但这并不妨碍人家反复检讨自己的毛病。当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苏联人自己也没想到会给西方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只在《真理报》上发了个不起眼的消息。然而消息传到美国，举国震惊，朝野上下一致沉痛反思，翻箱倒柜地寻找导致美国科技落后于苏联的原因。这结果不但是此后的总统为了安抚民意，把在太空竞赛中获胜当成了全民努力目标，而且实行教育制度改革，甚至改到中小学教科书上去，连外语教育都改变了从二战沿袭下来的“短平快”实用主义教育方式。

又如英国吧。真要吹祖宗，我看全世界没哪个民族能比英国人更有资格——牛顿和达尔文都姓英，离开这俩人能想象现代科学么？更不用说人家在社会科学中的四大发明（自由主义、法治、君主立宪与两党政治）奠定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可我还真没见过人家被辉煌的古人持续“雷倒”，看见的多是人家没完没了地数落过去干过的蠢事：一战时将领的愚蠢指挥，使得英军在索姆战役一天就损失六万人；二战前朝野如何一致陶醉在白种人优越心态中，小看日本“黄猴子”，以致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兵败如山；新加坡要塞的设计如何愚蠢，大炮全对着大海，结果日军从陆路过来，要塞彻底成了废物；蒙哥马利如何计划不周，在西线发动 Operation Market Garden（市场花园战役），为盟军造成了大量不必要伤亡，等等，等等。那花园冒险甚至还拍成电影，“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都知道”。

说到底，西方的生机，正在于人家对自尊自信的理解不同，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敢于把壁橱里的骷髅架搬出来，细细考察毛病究竟出在哪里。这并不会让他们丧失自尊自信，反而正是他们能不断自强的根本原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忘记这两条原理，咱们就必然丧失学习能力，为国家反复造成灾难还至死不悟。"（说明，当年红卫兵批斗陶铸，要他背诵毛语录"老三段"，其中第三段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结果陶铸把毛的另一语录［据说是他人捉刀］嫁接上去，闹出笑话来。此处后半截话是我加上去的）。

这道理是人都该懂——你要"日日新，又日新"，日新月异，不断自强，就必须具备学习能力，善于把人家的长处学过来。而要学习，前提就是敢于比较自己和他人，敢于找出自己不如人的地方来，否则还怎么可能自强？

国人为何不能明白这连学童都该懂的道理？那是因为咱们的自信只能建立在自欺之上，承认自己的缺点只会引起"自卑心理"。对此，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彭亚非在金纲《论语鼓吹》研讨会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在他看来，以西方文明成就为参照物批判儒教，是"文化自卑"。一个民族要有尊严，就得把传统文化变成宗教信仰，用它去"整合"人民的精神：

> "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它自己的文化信仰不能传承下来，这个民族是没有尊严的。比如说美国政府它可以是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政府，它的建国理念是人民的建国理念，可是它的信仰文化还是基督文化、还是基督教。它是建立在自己的前提上，我们信仰上帝，我们信仰基督教，但是它并不以它来治国，但是这是它的文化信念体现的一个支撑，没有那样的价值信念、没有那样的道德体系建立起来，他完全靠一种现代的文明理念，他很难对整个国家的人民进行精神上的整合。这个精神上的整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所谓的灵魂拯救，这是它的宗教起的作用，第二个是精神关怀，任何一个社会的人民都是需要精神关怀的，但是一个完全现代的民主、自由的社会在精神关怀方面它可能会有所忽略，因为一个现代社会每个人有自己的权利，

他是自由的，他是个人主义，那普适性的这种精神关怀由谁来做呢？如果没有信仰文化支撑的话是不行的。”

这些话我倒不是一概反对。我反复在旧作中说过，原始儒家不失为很好的伦理学，儒教的谬误是把伦理学放大为政治学，把君臣、官民的政治等级伦理化（也就是把权力伦理化，将百姓反抗官府、臣子反对皇帝当成儿子反对老爹那种违反人伦的大逆不道），并进一步把“三纲五常”捧到“天理大义”的吓人高度，就此成了帝王专制的最佳工具，造出了无数流弊，因此被时代抛弃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是说个人不能把它们当成行为规范，我本人就是这么做的，至今深受《朱柏庐治家格言》影响，认为这些名言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便有着不容否定的价值（当然其中的果报恫吓不足为训）：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

……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

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

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但彭先生竟然认为，为了民族尊严，必须把儒教制造为真正的宗教，用它实行毛式“统一思想”（所谓“精神整合”）。这种话出自现代国人之口，那就令人不寒而栗了。

这且不论，我只想问一声：那么，没有什么传统文化留下来的民族该怎么办哪？莫非民族尊严只能用谎言堆积起来的宗教来维持？

这话好像很难听，却不幸只是用大白话把彭先生的“义理之学”说穿罢了：

> “我们现在看西方的信仰文本，你看《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耶稣跟弟子也是老生常谈，为什么西方人几千年一直在阐释它，第一方面首先是信它，你要崇信它；第二个是在阐释它中建立起崇信的。但是它经过了几千年的阐释以后，这个里边所包含价值就建构起来了，这就是义理之学。”

芦某愚钝，理解的意思好像是：孔子或耶稣的真实面目如何并不重要，他们的言行是否是诠释者们说的那样睿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采取盲目崇敬态度，去不断给它抹上化妆油彩，使得他们显得越来越伟大，其“微言大义”都是人类智慧顶峰，在这过程中你还必须虔诚信奉自己涂上去的包装油彩。据说只有通过这种包装工程，才能最终建立民族尊严。

这话确实一针见血，说穿了孔教的本质。而且，正如彭先生所说，大儒们经过两千年的“崇信”与“阐释”，也确实在天朝建立了不可一世的文明优越感、权力优越感以及种族优越感（我已经在《林则徐》文中指出，这就是中式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至今仍然部分适用，维护文明优越感仍是当代爱国主义的重大内容。抽去这一条，咱们也就没有爱国主义了）。

我所不解者，乃是：徐桐、倭仁、载漪等人确实是维护民族尊严的永垂不朽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你决不能责备他们对孔教崇信与阐释的不够。但他们的伟大事业为何失败了？咱们的民族尊严与自信又怎么会因此彻底轰毁，堕入“用夷变夏”的屈辱境界，以致需要彭先生等志士来重建“整合”涅？我相信彭先生的十字军圣战一定会成功，但该怎样“崇信”和“阐释”，才能保证重建起来的民族尊严不至于再度轰毁？彭先生是否研究过先烈的失败教训，并找出了弥补之道，确信自己业已发明比先烈们用过的更强大的“造教”手段？

就是因为我看出了中式“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尊心”不但在过去给中国带来巨大苦难，而且构成了今日中国文明化的最大主观障碍，我才出来比较剖析东西方文明，指出人家的优越性何在，强调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老老实实学习西方。老祖宗的妄自尊大在过去人为加深甚至引发了民族危机，使得人民备受苦难；而如今国人的妄自尊大，则正在妨碍中国采用西式手段去化解深重的社会危机，完成文明化。这话已经写在《为何呵佛骂祖》中了，也一直是我几乎每文都要强调的主题。

这就是我变成网上大汉奸的基本原因。而“汉奸现象”这种中国独特景观的出现，正是国人为了维护虚幻幸福感的正当支出。

五、我为何对国家前途深感悲观？

我在介绍西方民主的一系列文章中强调指出，民主制度的最大的功利合理性，乃是能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防止它们积蓄下来，恶化为社会危机，招致玉石俱焚的暴力革命。因此，民主制度确实是医治中国千年痼疾的对症良药，但这意味着统治者必须让步。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我指出，与一般错觉相反，社会进步不是靠暴力革命、而是靠统治者主动或被动让步实现的。换言之，统治者的让步乃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不满足这条件，则中国绝无可能取得实质上的政治进步。暴力革命只会适得其反，把柔弱的旧统治者搞下去，把绝不会向人民让步的铁腕强人捧上宝座。它唯一能起正面作用的时刻，就是革命者们“引而不发”，逼迫统治者让步，及时达成妥协，如英国的光荣革命然。但难题在于，革命一起来之后，那多头凶龙就很难控制了。辛亥革命逼得清廷同意实行虚君共和，然而革命乱党却决不愿见好就收，就此铸下了永远无法弥补挽回的大错。正因为我看到这些问题，我才会堕落成为死不悔改的反革命。

比较晚清和现代中国如今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但在我看过的网文中，似乎没有哪个作者看到，从社会进步的潜能来看，中国现在根本无法与晚清相比。晚清其实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时代，那是因为它是统治者最可能让步、让步空间最大的千载难逢之机。在被列强反复痛打、最后因拳乱闹得几乎亡国之后，清廷总算认识到了“不按鬼子模式改革就要亡国”的真理。而士大夫们也

总算看到了“西洋文明起码比中国文明更强大”这么一个简单事实，因此朝野上下都一心变法图强。慈禧太后一纸上谕就废除了奉行千年的科举制，断送了无数士子的前程，然而社会上却纹风不动，这在今日根本就无法想象。

今日中国的最大难题，就是再也没有了这种自强不息的主观动力。无论朝野都如此。我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指出，统治者之所以愿意主动让步，乃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么做有利于自己的长远利益，被动让步则要么是为了解决民族危机，要么是为了避免革命。晚清统治者之所以同意大规模的西化改革，最后同意还政于民，原因就是这两重。

然而今日中国却再无这种好事了。外患早在二战后便已消失，中国再无亡国危险，国际上毫无压力。老邓的改革造出了经济奇迹，使得器浅易盈的国人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们欣然自得，傲视西方，张五常甚至讴歌中国那“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现代科技的发达又彻底剥夺了人民武力反抗政府的可能，使得政府消除了对民变的恐惧心，认定他们吃定了手无寸铁的人民，随便怎么胡作非为都没关系。于是，政治改革就彻底丧失了动力：朝廷再没有为了保存皇室、愿意让步放权的皇帝，官僚集团中再也无人觉得有让步必要的开明重臣，民间再也没有充满危机意识、热心国事、渴望通过学习西方模式迅速赶上西方的士大夫。国家当然就只能这样一天天烂下去，深重的社会危机只能储蓄下来，毫无用西方手段化解的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要深感绝望。这不是什么简单的反共情绪宣泄，更不是对国人的天资丧失信心，而是基于我对国情民俗的深入了解，作出的“盛世危言”。

六、对既有结论的再反思

以上总结的是芦文的写作动机与主题，但自从金唢呐网友来此贴出第一篇文章后，我便开始考虑自己的悲观结论是否成立。他对国情有着远比我深入的认识，越看他的文字，我便越觉得自己可能忽略了某些因素。

我的悲观主要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基本认定上：那就是西方的社会设计远比中国的合理，中国必须彻底扬弃自己陈腐的社会设计，全面改用人家的先进设计。然而国人却一直顽固拒绝这么做，屡屡坐失历史良机，最后竟堕落到去学

老毛子，待到学成那反文明绝技之后，便彻底丧失了学习西方文明的可能。于是中国社会便永远只能是一个周期性爆发大规模内战的病态社会，一次又一次让全民苦吃苦做积累下来的一点家当化为青烟。

在旧作中我也曾详细比较过东西方社会设计的利弊。我指出，西方社会设计比较符合人类的天性，它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人欲的扩张引向创造财富，以民主制度化解分赃不均引起的内斗，使社会成员把精力都集中到创造社会财富上去，保持了社会持续发展的势头，而阶级矛盾能及时以和平协商妥协的方式化解，不至于积压下来，化作社会危机，最后爆发为内战。

中国社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存天理灭人欲”，以国家权力禁止人欲向外扩张，把社会划分为不同的权力等级，指望权贵作为贱民的道德楷模，带头“克己复礼”、“节用爱民” 、“斗私批修”。因为背离人性，这社会设计使得权力成了吸纳财富的强大手段，人欲只能靠内斗来满足，而内斗便集中在争夺权力之上。不管圣贤们说得如何好听，它实际上造出了一个土匪社会，奉行的是“养猪不如抢猪”的土匪哲学。这就是敬爱的林副统帅为何要哼哼教导全党：“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

这就是中国式“万人敌”。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治世”与“乱世”，区别只在于抢劫对象不同。治世是权贵抢劫百姓，乱世则是百姓抢劫权贵，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这循环之所以出现，乃是中国人一直没有认识到，因为背离人性，原初设计只能造出病态社会。

这病态到毛社会便达到了顶峰。毛乃一介土包子，懂的“洋货”只有毛子发明的“革命工艺学”以及“人的控制论”，建国灵感则全来自于线装书，与马列毫无关系。他的施政方针只有两条：一、严禁人民向外扩张人欲创造财富；二、鼓励提倡全民大规模内斗，让它成为满足私欲的唯一途径。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严禁养猪，奖励去别人锅里捞肉”。他果然成功地使得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内斗却如火如荼，酣畅淋漓。到最后竟然成了“内斗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给斗得鼻青脸肿。就连当年的风头人物，后来回首往事时都觉得无聊，吴法宪就曾在回忆录里如此感叹过。

老邓的改革，就是把西方发明的资本主义引入了中国，使得人民有了向外扩张欲望的渠道，在短期内便造出了震惊环球的经济奇迹。但不幸的是，他的隧道眼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没有看到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因而以“四

个坚持”的明确方式，坚定保留了权力等级体制。于是改革在为百姓提供追求实现正当人欲的机遇的同时，也为权贵们提供了靠抢劫致富的天赐良机，以权力疯狂吸纳财富。

于是现代中国社会便忠实保留了传统社会的两大特征：第一，少数权贵以合法抢劫作为满足人欲的最有效手段。第二，社会没有根除这种弊病的设施，无法化解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只能积累下来，最终以大规模暴乱的方式获得暴烈“解决”。

不仅如此，当代中国甚至比传统社会还糟糕，盖它实现了“权力”与“资本”的完美结合，而这正是一个社会能遇上的最大噩梦：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都是潜在的恶，因此西方社会设计的重点，就是确保两者不至于联姻，并以保障人权来遏制这两者。而今咱们却造出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拼命压制人权这唯一的抗衡力。要这种烂污社会长治久安，宁非痴人说梦？

这就是我的忧患所在。但老金来此后写了一系列详尽介绍中国现实情况的文字，使得我开始推敲自己是否杞人忧天。想来想去，我觉得光明面还是有的。大致可以总结于下：

1）暴力革命不但在客观上失去了可能，而且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有识者唾弃。八年前我初上网，因为太违背国人头脑中“拜革命教”哺育出来的“天经地义”，提出的反革命论调堪称惊世骇俗，为此遭到无数民主斗士的侮辱。现在此类说法已成大路货，不信请去看《多维》的社论。

这倒不完全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智力终于发育成熟的结果，更是国内拜金主义歪打正着。“犬儒”们大量出现，使得中国再也没有了志士。这固然使得改革失去动力，但也从根本上烂掉了志士祸国的顽固传统。我已经反复强调指出，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革命志士＋爱国志士的祸国史。如今“犬儒主义”总算把这负数变成了零。前段某网友出来讴歌 80 年代的“民主”愤青，我倒是觉得，论祸国潜能，现代“小犬”远比那伙愤青安全。

因此，无论在客观还是主观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既没有暴力革命发生可能，也没有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危险。统治者因现代科技获得了对人民的压倒性优势，这固然使得使得他们不必再因对革命的恐惧而向人民让步，但也可能由此打破千年的治乱循环。这对人民来说可谓有利有弊：人民固然不可能

因改革获得与西方人同等的人权，社会更不能根除腐败，但缓慢腐烂总胜过国人惯于追求的暴烈死亡。

2）如老金的雄文指出的，我党已经摸索出了一套缓和社会矛盾的办法，那就是层层分肥，收买“知识分子”（＝知青）。这些人乃是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稳定；若收买他们，便买来了稳定。此外，改革允许人欲向外扩张，使得国人具有了空前的创业机会，也极大地减少了内斗的必然性与必要性，降低了内斗烈度。经济奇迹也使得国家极大的富裕了，如今连农村子弟也能上大学，获得了靠正当手段改善自己境遇的希望，不必再靠内斗来实现自己的欲望了。换言之，虽然还相当有限，但社会开始出现“养猪胜过抢猪”的健康环境。

3）统治者虽然是科技进步的最大受益者（获得了更强大的控制人民的手段），但人民也可以部分沾光。互联网的出现，意味着中国自 49 年后首次开始有了舆论，使得极权政体的黑箱操作能有限曝光，党国政治开始具有极有限的透明度。山西煤窑案、瓮安事件、杨佳案、毒奶事件在网上曝光并激起强烈反响，在暗无天日的毛时代根本就无法想象。这在客观上对统治者形成了有限监督，使得高层不能不有所忌惮。胡温之所以在四川地震后大做亲民秀，不能不归结于这种具体的民意压力。这也有限地减轻了社会矛盾。

4）改革开放造成的信息流通与学者们自由的对外交流，使得中国开始出现具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王力雄、秦晖、沈志华、袁伟时、杨奎松、茅海建、易中天等一大批学者写出来的功力深厚的杰作，根本就不是 80 年代知青们的浅薄煽情可以比拟的。虽然还有诸多禁区，但现代中国的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已非昔日可比。连温铁军那反对现代化、提倡回到老子憧憬的桃花源生活方式的反动主张，都能自由发表。庶民议政已经有了点萌芽。在这种情况下，再出现无知痞子当国，发动全民 “大炼钢铁”的荒唐闹剧的可能性已经极大地减小了。

5）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中国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权力等级社会大概就是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传统中国从来不是阶级社会而是等级社会，未来中国也肯定不是阶级社会而是等级社会。等级社会的最大弊病倒不是一般人最容易看见的贪污腐败——两千年来它从来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能设想与贪腐无关的中国生活方式。即使实行了民主制度，中国

也一定是贪腐社会。同志们信不信？反正我信——而是两条：第一，全民被一个疯子（如希特勒）或蠢货（如毛白痴）高效率地领上灭亡之路；第二，社会因缺乏“减压阀”而周期性爆炸。如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犬儒当国，第一个危险性极大地降低了；而上文已经指出，第二个危险也基本可以排除。

6）世上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制度。一种不适合国情的社会设计，哪怕在理论上再具备功利优越性也是枉然。国民塑造制度，制度也塑造国民。一旦国民性被塑造成型，换一种生活方式反而格格不入。正如老金说的，到了国外，生活极度单调，出门还不能随地吐痰，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优越性来。确实如此。那位女士之所以在出国之后感受到所谓 reverse culture shock（逆向文化休克），说穿了也就是这个原因。卢梭早就指出：人民一旦丧失自由，就再不会觉得它的可贵了。只有对珍惜人权的民族而言，自由才是一种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而中国传统文化里从来就没有“权利”这个概念。

所谓 happiness 就是“开心”，不管是什么制度，百姓开心就行。前段西方记者进行的民调显示， 80%的答卷者对中国现况表示满意，为全球之冠。如果只是根据理论上的功利优越性，或是“不证自明的普世价值观”，就强迫人民放弃他们喜爱的生活方式，必然造成巨大灾难。起码许多人会如同民国前辈那样，对缺乏铁腕领袖不满，更痛恨议会终日争吵不休，更别说没法通过潜规则实行短平快的发财了。

根据以上理由，我目前倾向于认为，在经受强大的西方文明冲击之后，经过 160 年的折腾，中国人总算根据自己的传统爱好，磨合出了一种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生活方式，它采用了舶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列宁斯大林发明的人民控制术，继承了传统式的权力等级社会，却扬弃了古人对人欲的谴责压制，并因高科技发明的出现无法继续无情压制舆论，使得中国在 49 年后再度出现民间舆论萌芽。因此为中国实行开明专制初步奠定了基础。不能不承认，虽然这种社会的健康度仍然无法与“解放”前相比，但比起毛时代来，已经是天翻地覆的伟大进步了。

在我看来，中国人能指望的最佳社会制度（任何稍懂数学的人都该知道，所谓“最佳”乃是在一定范围内比较而言的。只有姚文元那种科盲，才会不准华罗庚宣传“优选法”，认为“最优化”违反辩证法。我这儿所谓“最佳”，是兼顾功利性以及可行性而言的），就是将现行制度改造为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乃是为伏尔泰认可的最佳政体，但我使用这一概念内涵稍有不同。它指的是维持现有的权力等级体制，但厉行法治，并在给予公民高度的经济自由同时，也实行高度的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以此对政府决策起到最低限度的监督制约，防止当国者再干“大跃进”那种惊天动地的蠢事，同时有限地消除民间积怨，使得社会安定不至于完全建立在高压上。

这种社会的唯一风险，是“权威逐代递减律”可能导致权势集团内讧，使得共党内部狗咬狗再度祸延黎民。要消除这一致命危险，我看只有在党内实行真正的亦即西式民主，党内公开争权夺利，拉帮结派，磨合出一个和平夺权、和平分享权力的方式来。须知我党可以轻而易举地镇压暴民造反，所以即使没有和平化解社会矛盾的设施也没关系，反正高压锅的钢材足够好，并不会爆上天。但若没有和平化解党内矛盾的设计，则党国存亡就岌岌乎危哉。可以断言，以后中国若再度发生爆炸，那必然是我党狗咬狗所致。

解铃还须系铃人，建议张五常老儿在歌颂“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百忙之余，不妨向党中央委婉进言，陈述利害，特别是要尽快实行军队国家化，破除“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山大王哲学。

七、向急于逃出中国的网友进言

那位女士之所以有上当受骗感，我觉得是她没看明白我的文章（或者是我没说清楚，待考），她以为我批判中国的传统文明，肯定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是告诉大家西方是天堂，而中国乃非得逃出不可的地狱。等到她“越狱”成功，跑到美国来却发现根本不是想象的那回事，这儿照样有无数麻烦，当然就要幻灭。为了防止他人上当，便义不容辞地出来揭穿我的真相。

她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负责。我上网是来说实话的，既不图名又不求利，更不是为了发泄仇恨或积郁，而是把自己对中国社会的长期的痛苦思索所得讲出来。其中很多内容是我早在 20 出头时便形成的想法。主题就是一个：为了中国的进步，中国必须学习西方。过去咱们遭受的苦难就是拒绝学习西方造成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学习西方的结果（最近的例子就是邓小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造出了中国奇迹，这大概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吧？难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写在《四书五经》里？要么是写在马列经典

中？）。但在这过程中，我不能不流露出我对前人与今人的颟顸蠢笨的愤懑，也无法掩饰我对中国前途的悲观。于是这就难免使得读者受到我的影响，让他们认定中国毫无希望，能做的事就是赶快从那条要沉没的船上逃下去。

对此副作用，我至感歉疚，并感谢网友提醒我注意到这一问题。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并不会大乱。在那儿居住很安全。事实上，如果政府能放过我，我还准备回国长住，以便搜集国外无法接触的史料，完成我对近现代史的学习研究。

我更想在此强调指出，中国并非地狱，西方更非天堂，照样有如山的社会问题。人性本来就不是完美的，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永远有麻烦。决定移民的网友最好事前问一下自己：你到底喜欢什么，追求什么？如果想发财，那依我看国内才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广阔天地，大款们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国外什么都上了轨道，不像国内正在起飞，发财机会多如牛毛。此所以海龟们要一窝蜂跑回去淘金。许多香港人出于对“九七大限”的恐惧，办投资移民去了加拿大，后来又统统回去忙着发财。

即使没有发财梦，在西方过日子也未必如国内惬意。这儿没有灰色收入，逢年过节单位不会给你发月饼年货，更不会组织大家免费逛公园或是度假，什么都得靠自己的工资支付。因此，别看国外工资高，纯购买力可能不如在国内。美国还好些，工资既高，物价又便宜，但欧洲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您在移民之前，最好先去考察一番，免得日后失落。现在国人有的是钱，完全能承受旅行费用。

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文化寂寞。中国人的幸福是和“热闹”联系在一起的，拥挤社会里长大的人已经把“熙熙攘攘”当成了人生幸福要素。在国外除了商业区，一般街道上都冷冷清清，越是逢年过节越是如此，网友转贴的漫画就描绘了这差别：西方过节都在家里，中国人过节都在街上。当然，现在美西华人很多，个别地区我看与国内也差不多了。但一般说来，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远比咱们习惯的疏远得多。乍离自幼熟悉的文化环境的滋味更是难受，年龄越大、英语越差的人越如此，完全是钻进了文化黑洞。未来的移民要对此做好足够精神准备。

这些问题当然因人而异。例如我这人乃是国人中的异类，从来就不喜欢“热闹”，尤其痛恨过年放鞭炮。在国内时每逢节假日，我常常逃出城市跑到

郊外去，一个人拿本书在树荫中看。我更讨厌无比紧密的人际关系，对日日在人际关系的地雷阵里摸索深恶痛绝，更喜欢的是一人幽居独处。所以到国外后真是如鱼得水。而且我天性渴望自由，不太在意物质享受，有几分颜渊式的“一箪食，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风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西方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丝毫不用担心后果，可以充分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当然要乐不思蜀。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不足为训。上面已经说了，我是国人中的异数。千万不要受我个人的感觉误导，以为这儿是天堂，如那位女士一样，一头扎进美帝怀抱，心都碎了（此处抄袭杨朔《茶花赋》），那我在网上写作反倒批量制造出反美愤愤来，毒化中美关系，从而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可就罪不容诛了也。

2008 年 9 月 26 日

悲观乐观，见仁见智

拙文《中国还是有希望的》贴出后，引出各种反应，有的令我啼笑皆非，如老金说许多人当初怀揣芦文奔向美国，还有不少人读完芦文后准备出国，说得跟当年热血愤青们怀揣鲁迅《呐喊》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奔向延安一般。我想不至于吧？我哪来那么大的号召力啊？至于有人在我在《凯迪》的博客里跟帖要我偿还中介费，那就完全是搞笑了——闹半天，我成了蛇头的托儿了。

其他反应则令我觉得有些问题没说清楚，因为此文作点补充。

一、关于历史观与“社会设计”问题

自黑格尔提出历史按冥冥之中的某个规律发展之后，流毒至今未散，唯物史观就是最著名的例子。黄仁宇和唐德刚也相信这套，认为全世界各国都会照同一途径走向同一归宿，只是他们把“共产主义社会”置换成了“现代化”，或“社会转型”。按照他们的说法，凡出现过的都是必然的、必要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因此当然也就不存在“走错路”的问题。无论政治家们怎么胡作非为，用“大历史观”来看都是“天然合理的”，因为他们不过是按“史神”事前写就的脚本，忠实扮演派给自己的角色罢了，如同神灵附身的巫师一般。此所谓“偶然是必然的表现”。

这套说法对国内学者颇有影响，例如国内青年学者严泉就在他的精彩论文前言部分承认他受到唐氏的启发。

我对此的看法已经反复说过了。早在 20 岁出头时，我就觉得并无证据支持冥冥之中有个由理性（黑格尔）或物质（马克思）决定的客观规律，规定了各国历史取同一发展途径。已知证据恰与此相反——人类的发祥地非洲就是生动证明。而且，这种说法来自于回溯，根本无从验证，不过是断章取义式的臆测，根本不能称为科学理论（当时我还没看到波普尔的著作，可谓独立发现了如何判别某种说法是否科学理论）。

在读了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之后，我恍然悟出，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多元函数，影响因素极多，既有自然、地理、气候、经济、人口密度诸多因素，更由人文传统影响。后者起到的作用甚至更大，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是由历史自己书写的，这就是西方学者为何说“历史总是重复自己”。

这现象在中国这个古国表现得最明显，有如说中国的历史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莫如说它是由文化传统决定的。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一文中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使用密集人口进行原始农耕，需要一个高度专制的社会以获得最大的功利优越性，而这个需要则把孔孟之道筛选出来。经过秦朝的对照实验后，皇帝发现孔孟之道对维护统治更有用，因此把它捧成了官定意识形态。儒家变成国教后，以其静态设计，有效地冻结了社会发展，赋予社会以高度稳定性，符合农耕社会的普遍利益，因此长盛不衰，其高稳定性变成了巨大的惰性，因此改变了国民性格，使得国民丧失了创造力和应变力。

当这种高稳定高惰性的封闭系统遇到强大外来文明入侵之时，当然就要变得颟顸迟钝，冥顽不灵。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封闭系统造成的文明优越感；二是孔教特别是程朱理学“重义轻利”教义。前者使得国民丧失学习能力，后者使得国民的肾上腺过份发达，大脑相应萎缩，因此不但丧失应变能力，还因为不敢或不屑于利弊分析，专干损国损己的蠢事。这两条合起来，就是招致中国近现代一切重大灾难的主观原因。

我知道有人要用同样处在儒家文化圈的日本的反例来驳我。我想在此指出，日本与中国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他们反而沾了不是文明的原创者而是学习者的光，具有学习先进文明的出类拔萃的能力，但他们也同样是程朱理学的受害人，否则也不会干出“全员玉碎”、“一亿玉碎”的蠢事来了。除了迅速学会西方文明外，日本人也确实聪明不到哪儿去，在与老毛子争夺中国的明争暗斗中，从头到尾让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竟然为了获得战略资源维持与中国的持久战，去太平洋发动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消耗战，其蠢笨几乎可比咱们的大跃进。

所以，我认为，历史发展确实有必然因素，但这并不是什么共同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必然，而是社会文化传统陶冶出来的民族性格决定的反应定式。中国社会的一个醒目特点就是它的均一性（homogeneity）。夸张点说，你只要了解一个中国人，便可以了解所有的中国人。因此，中国人的群体反应颇像个体反

应，而如所周知，个体对某个事件，总是按既有思维定式作出反应的。这放大到全社会仍然成立。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在晚清 70 年的表现，乃是由民族性格决定的必然事件。在《林则徐》文中，我指出，无论是换谁去坐道光和林则徐的位子，结局都不会有什么本质不同，因为当时全民看“天下”的思维定式都是夜郎自大，以文明歧视、权力歧视、种族歧视为“天朝国体”。在此“三项基本原则”支配下的行动，当然只会引出战争来。处在中古原始落后野蛮状态下还要去跟世界一流强国动武，当然只会大败亏输。

但这所谓必然性并不是客观上的必然性，我已经在前文中说明了，是前人的愚蠢，使得本来可以是“或然”的事件成了“必然”。打个通俗的比方：从万丈悬崖上跳下去必然要摔死，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但并没有什么客观规律逼迫你非跳下去不可。你如果因为吸毒，出现幻觉，以为跳下去就会飞起来，踊身跳下去（这是我从报上看来的真实故事），那摔死是主观造成的“必然”，并非客观规律决定的必然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中国在近现代发生的事，文明优越感与义令智昏就是咱们的海洛因，使得全民族连起码的祸福利害常识都丧失了。这才会出现以祖传金钟罩铁布衫的横练功夫去和马克辛重机枪较劲的千古佳话。

正因为它是主观而不是客观造成的必然，才有纠正的希望，我也才会反复写文章宣传传统海洛因的祸害，以求后人鉴古知今，惩前毖后，慎终追远，而采用黄仁宇、唐德刚的“大历史观”则根本无助于总结历史教训。如果不把这脓疮挑破了，告诉后代前人曾经干过什么样的蠢事，继续歌颂孙中山那些祸国英雄，则这种蠢病就永远不会断根。

所以，某网友说，在那种大气候下，个别睿智人物如老袁回天乏力，我完全同意。但这不是说不该指出“我们本来可以这样做”，这就是国手们下完棋后一定要复盘的原因——不是为了追悔，而是为了未来。更不是说因此我们就可以沿袭国民党编造出来的神话，继续贻误子孙。神话只能制造更多的海洛因，真相才能使人清醒。

至于他的这些话，我觉得不能成立：

> “在前辈一系列的断古去疑的文章中，大量的使用了逻辑推理，并且事实验证了逻辑手段的强悍威力，但同样不得不说的是，如果历史具

有逻辑，那么也必然具有理性，就不可能是偶然的。在此冒犯一下先贤，我同样无法认同黑格尔前辈的必然性，只能承认每个人或者集团就个体而言是理性的，因此才可以采用逻辑手段拆解历史，例如袁在其时的行为。但这种手段是否可以用来‘设计未来’，我深表怀疑，这种怀疑与前辈对历史唯物的怀疑并不二致，如果击溃一种历史决定论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这无非就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翻版，就如前辈的经历，可以看出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窃以为，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具有逻辑性”并不等于“有理性”。逻辑是人类的理性穿凿外界的唯一工具。因此客观规律必然具有逻辑性，否则人类便无从把握，但你不能说客观规律有理性。

第二，“有理性”不等于“必然性”，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人类有理性，但人类许多行为都是偶然作出的。

第三，人类只可能用逻辑手段去研究一切事物，包括非理性的自然界在内，历史事件当然也只可能用逻辑手段研究，但你不能因此说历史由此获得了“理性”或是“必然性”。“承认每个人或者集团就个体而言是理性的”并不是“采用逻辑手段拆解历史”的前提，否则人类也无法用逻辑手段去拆解无生命的物质以及没有理性的细菌、病毒、昆虫了。

第四，你没有弄明白这儿有两种“决定论”。黑、马、黄、唐的“决定论”是说历史发展如同播放事前编好的程序，而我说的“决定论”则是可以改变的主观定式。

第五，我并无“设计未来”的雄心壮志。我只是想告诉读者历史真相，着重指出前人犯过的愚蠢错误以及其主观必然性所在，以期后人避免重复悲剧。如果说这是“设计未来”，那也只是从消极方面去“设计”。

这儿顺便说一下“社会设计”引起的种种误会。我当初不该用“社会设计”这个容易引起误解的语汇。其实我不过是想指出西方社会的建构原则与东方的区别，指出前者在功利上的合理性，并不是说自己要设计社会。

另一位网友则认为我提出不能用“唯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不能成立。其实这问题我早就反复在旧作中讲过了，这里引旧作《传统“学问”与智力不兼容》第三节《“道义”压死智慧》一段：

更精彩的还是这段：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这意思是，齐国的陈成子杀了国君齐简公，孔子洗澡洗头后（表示庄重），去见鲁哀公，说："陈恒弑君，请发兵讨伐。"当时鲁国政事由三家大夫决定，哀公根本无法作主，何况鲁弱齐强？于是就答覆说："去跟三子说去！"孔子出来后便自言自语道："我是从大夫之后（当时他已退休），出于礼法，不敢不向国君提出这建议，但国君自己不去命令三家大夫，却让我去转告他们！"他去晋见了三子，被否决了，又说："我是从大夫之后，遇到这种违反礼法的事不敢不报告"。

这把戏在后世不断重演：遇到弱肉强食的乱世，孔教提倡并维持的主尊臣卑的社会秩序被颠覆或是受到严重挑战之时，士大夫就一定要分化为两类人：通权达变的现实主义者和迂腐的教条主义者们（"清流"）。老孔虽属于拒绝面对现实的"清流"，但毕竟还不像后世那些革命接班人死板到了姥姥家。他只是去报告，听不听则是国君的事，此后他便觉尽到责任，可以心安理得了。

后世"清流"们是如何看待这问题的呢？那肉麻程子说：

"左氏记孔子之言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若孔子之志，必将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与国以讨之。至于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也，岂计鲁人之众寡哉？当是时，天下之乱极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复兴乎？鲁之君臣，终不从之，可胜惜哉！"

这意思是：根据《左传》，孔子说："陈恒弑其君，大约有一半民众没有参与那暴乱。以鲁国举国国民，再加上齐国的一半国民讨伐之，可获胜利。"这不是孔子的话。如果孔子真这么说，那就是从实力而不是道义出发处理政事。如果按照孔子的心愿，那一定是确定陈恒的罪名，上报天子，并通报诸侯，再率盟国讨伐之。至于怎么才能战胜齐国，在孔子不过

是小菜一碟，他怎么会去计算鲁国的人力是多少？那阵子天下大乱到极点，如果孔子的计划实现了，岂不是复兴周室的大好时机？然而鲁国的君臣就是没有听从，多可惜阿！

看看，这是什么典型屁话！就是这类清流屁话断送了南宋，断送了南明，后来又几乎把大清断送在鬼子手里。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强调“大义”到了坚决闭眼不看现实的地步，以致从实力而不是从道义着眼分析问题竟然成了道德缺失。所以哪怕是以鲁国那种蕞尔小国去讨伐齐国那种“万乘之国”，那也绝对用不着事前计算双方的实力对比。反正“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老程不但自己热衷于作这种“道义白痴”，还强暴他的祖师爷，逼着他老人家也跟着去做白痴，硬要否定孔子的同代人左丘明记在史书中的孔子语录，说老孔决不会说出这种丧失立场、影响自己光辉形象的昏话来！然而肉麻是无止境的，朱熹集的胡氏的注解说：

“《春秋》之法，弑君之贼，人得而讨之。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

按孔子自己宣传的礼教，征伐乃是天子的专利，并不出自诸侯。所以，孔子去见鲁哀公，请求讨伐平级的齐国，这本身就严重违反了他自己的布道，属于“非礼”行为。为了替圣人补这漏子，程子代孔子作主，自己加了个“若孔子之志，必将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与国以讨之”进去，而这位胡先生觉得那还不够过瘾，说其实孔子先斩后奏正是按照春秋大义行事！

就是这些肉麻同志（所谓“经学家”），不仅在有宋以来的传统社会中受到君王褒奖（朱熹后来配享孔庙），而且在今天也被当成什么“伟大的思想家”备受赞颂。请大家看看，这就是他们的“学问”。有哪位能告诉我，这些肉麻屁话到底有什么思想或学术价值？

我想请教这位网友：您说孔子提出这种政见，后世大儒将其发挥到极致，把它定为安邦治国的正当思维方式，到底是出于哪家的私利？

再看该文第五节《渊博的白痴是这样炼出来的》中的一段话：

中国历史上，不知道出过多少次这种“智慧打不过道义”的怪事，就连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至尊爷都不是对手。

如所周知，北宋建国时沿袭了后周的首都开封，但武将出身的宋太祖觉得开封是所谓“四战”之地，位于无险可守的平原，很不安全，想迁到洛阳甚至西安去。廷臣不同意，便请晋王赵光义（赵匡胤之弟，亦即后来的太宗）去劝止之。赵匡胤向他解释：“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光义却驳道：“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秦据关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这道德大帽子立刻就把赵匡胤打哑了，过后他慨叹道：“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考虑是人都该明白：东京开封无险可守，当然只好靠大量驻军拱卫之，这就是“八十万禁军”的由来（据说后来发展到了百万之众）。人民要养活如此庞大的驻军，当然吃勿消。老赵看到了这点，甚至预见到不出百年全国就要为此民穷财尽，想把首都搬到安全所在去后裁军，减轻人民负担，但就是抵挡不了他弟弟“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的道德批判，被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将京师定在那八面来风之处。后来北宋果然如他所料，被军费弄得民穷财尽，这才弄出个“为天下理财”的王安石财政改革来，使得百姓更加水深火热。不仅如此，定都开封直接导致了靖康时国都的轻易陷落。您说这专门与common sense为敌的“大义”厉害不厉害？

我想请教这位网友：您说这怪事该怎么用“唯利史观”解释？赵光义反对他哥的拟议，是否出于篡位心理？而他哥被迫同意那愚蠢建议，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让他弟弟捏住了，所以不得不违心屈从？

二、我对基本国情的认识

我认识到的政治学原理：

1）所谓“社会进步”，一般是指人民获得被统治者剥夺的权利（这就是“解放”的真实涵义），它只能通过统治者让步实现。暴力革命只会提升新统治者的权力，进一步剥夺人民的权利，促成社会倒退。中国近现代出现的社会大倒退，正是一系列的“以强暴易弱暴”的暴力革命所致。

2）统治者能否被动让步，取决于朝野双方精通利益博弈，都知道斩尽杀绝后患无穷，只会两败俱伤，因此都知道见好就收，及时达成妥协。这就是英美实行的利益集团理性对抗的特点，在我看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

3）因此，统治者被动让步的出现前提，一是人民（或弱势群体）的斗争有节制，二是统治者（或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有克制，两者缺一不可。全英国大夫放弃对工党于1947年推出全民免费医疗计划的一致抵抗，从私人开业的阔鸠山乖乖变成拿固定工资的国家打工仔，就是这种妥协的漂亮演示（等我有空介绍一下此事）。

中国的实际国情：

1）以上第三条指明的智能为国人彻底阙如。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往往不是强者拒绝妥协，而是弱者自以为天下事尽入一己掌握，拒绝与强者达成妥协：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气焰万丈，毫无必要地开罪重臣，实行“关门主义”；“二次革命”时孙文以卵击石；立宪时国会立志建立凌驾于政府之上的超级议会；89年学生领袖们以为共党可以被他们逼得缴械投降……，等等，等等。因此，要通过英美式理性的民众斗争求得社会的实质性进步，在中国恐怕是一种妄想。

2）中国现在毫无民族危机，国力空前加强，迫使政府改弦易辙的国际压力已不复存在。

3）知识分子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只想维持现状，迫使朝廷让步的国内压力也不复存在。

4）中国从传统的“皇帝-官僚-百姓”的三明治结构变成“官僚-百姓”的两层结构，唯一能抑制官权的君权已不复存在，官权成了毫无制约的一权独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出了明君，也奈何官僚集团不得，而那些人当然不会主动让步，放弃手中的权力那“聚宝盆”、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5）现代科技的发达使得统治者对于百姓获得了绝对的全面压倒性优势，暴力革命再无可能发生。

6）因此，在可见将来，中国既有社会结构没有取得突破性进步的希望。但上列第五条也提示千年的治乱循环有可能因此结束。唯一威胁这一前景的是“权威逐代递减律”有可能导致共党内部大规模内讧，引爆积累下来的社会危机，使得全国再次陷入大乱。

7）因此，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我党，最重要的稳定是共党的稳定。我党面临的严峻任务，是结束土匪山大王无法无天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悠久传统，迅速摸索出一个和平争权夺利的文明规矩来。但从目前情况看来，我党绝无能力拔除这一自爆雷管。

这就是我对中国未来持悲观绝望态度的基本原因，迄今我并未改变对此国情的基本估计。

三、海屁与否，全在一念之间

我过去指责民运“理论家”们秉承儒家传统，实行“以道易天下”，以为民主社会乃是道义原则的物化。其实我自己也难免这传统影响。从上文不难看出，我之所以悲观，完全出自“‘解放’就是人民获得被统治者剥夺的权利”的西式理解。已经反复说过了，民主社会的基石，就是个人的权利，但这完全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无“权利”这个观念，它之有无并不影响人民幸福。

正因为中国人从来不明白“权利”是怎么回事，中国既往的“民主革命”或“民主运动”统统是谬托终身错相思，根本就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确保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政府，而是为了解决这样那样的具体任务。革命家和愤青们要么以为民主是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速成手段；要么以为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不管什么阿猫阿狗，“人人可做皇帝”；要么以为它是块阿拉伯神话里的魔术桌布，从里面可以掏出无穷无尽的鸡鸭鱼肉来。而国人理解的自由，就是“爱干什么干什么”的随心所欲。中国的“民运之父”魏京生跑到美国后，竟然抗议人家禁止他在公众场合抽烟，说那是侵犯他的人权，说明“他爹”连自由的界限在哪儿都不知道。

这就是许多人跑到美国来后发现自己并不能“当家作主”，因而觉得受骗上当，认为民主乃是骗术的根本原因。他们不知道，人民不是均一的，彼此利害互相冲突，因此绝无可能实行“人人当家作主”：让富人当家，穷人就要受委屈；让穷人当家，富人就要受委屈；兼顾穷富，则吴耐白领纳税人就要受委屈，所以只好让各派代表去议会里吵吵，实行轮流兼顾的动态平衡：今天左派上台，照顾穷人，增税改善社会福利，打击资本家投资热情，使得经济成长减

缓，政府负债累累，到一定时间使得全民都受害，于是右派获得多数民意上台，砍去福利措施，实行减税，鼓励自由经济，把经济搞活，又制造出社会矛盾来，于是又让左派趁机占了上风，卷土重来……，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如此即可及时化解各利益集团的矛盾，避免形成危机，甚至触发武力冲突。当然它也不是万能的——如所周知，美国民主制度并未化解南北武力冲突。不过比起“七八十年来一次”的专制制度来，它的设计的功利优越性是不容否认的。

但这一套烦难操作并不见得能被国人学会，而民主制度的完美运行需要全民合作。不具备足够智能去操作它，造成的灾难甚至可以比专制制度还严重，民国不如满清就是明证。即使最终学会了，民主社会也未必会让咱们心满意足，正如美国的民主制度让许多大陆人心怀怨恨一般。

这原因我已经在上面说过了：中国人的幸福要素里没有“权利”这一条。权利和自由只有对知道它们的价值的人才是必需品，对许多国人来说不过是大而无当、毫无实惠的有害装饰品。国人更无法接受“所有公民都享有同等的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的说道。

事实上，幸福乃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主观感觉，拥挤社会尤其如此，面子之所以对国人生死攸关，而显摆构成了个人幸福的最大要素就是为此。使国人海屁的最便捷手段，便是让他们看到有一部分人比自己下贱。这就是毛泽东为何要制造让工农大众任意作践的“阶级敌人”来使他们心满意足。邓小平解放了这些贱民后，在工农大众中激起了强烈不满。我的工人弟兄们都跑来跟我痛骂邓矮子，说，老干部平反是搞错了，臭老九右派平反也是搞错了，现在竟然连地富都平反了！难道他们也是搞错了？！毛主席说的一点都不错，邓矮子就是个反攻倒算的走资派!

因此，我在前文中说，中国过去是等级社会，从来不是阶级社会，未来也只可能是等级社会而绝非阶级社会，这断言是有足够依据的。任何人只须看看城里老爷们对乡巴佬们的不可容忍的粗暴，便可立即洞见这一点。90年代我回国，目睹老同学们在饭店里对侍者颐指气使的吆喝，让我极度难堪。后来我回国侍候病危的先父，在医院里目击医护、病人、家属对农村保姆们的歧视侮辱，简直是怒发上指冠，后来我曾把这感觉写在小说《虎子的天空》里。

因此，别看痞子造反动不动就喊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雄壮口号，如发匪与共党建立的等级更加森严的社会昭示的，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仍然是等

级社会，只不过他们必须是上等人罢了。老金的朋友跟他说，中国必须维持城乡差别，否则城里的高楼大厦谁来建？这话极有启发意义。

其实我已经在《“霸道乐土”》文中揭示过大多数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模式了，那就是对国人幸福要素的总结，简短截说就是这么几点：

1）一个强大的国家能使全民维持文明、种族、权势的优越感。

2）有足够的经济自由能让自己迅速发财。

3）有贱民等级作对照，成全自己的海屁感。

4）社会能长治久安。

请大家看看，除了最后一条外，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基本满足了国民的幸福要素？难道还不是中式理想社会？

正因为熟知国民心态，我才力图避免把自己的西式价值观强加给国人（这就是某网友察觉我推销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力的缘故），而是针对以上第四条推销民主制度的功利优越性。已经反复说过了，我认为价值观言人人殊，很难统一。据此立论，只能引起持相同价值观的读者的共鸣，很难说服具有不同价值观的读者。大家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乃是功利分析。而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衡量社会的先进度有两个指标，一是发展生产力的空间；二是调节化解社会矛盾，和平地有规矩地解决内斗，避免社会自爆。前者反映了社会的活力，而后者则反映社会的健康度。

从这俩指标来看，西方社会设计远比中国合理。所以，咱们学西方，无非是学两条：一是引进资本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二是引进民主制度以打破千年治乱循环。我并不梦想中国引入民主制度后能消除贪腐，看一眼资深民主国家意大利便能知道这点，但我深信民主是打破祖传治乱循环的唯一对症良方。

如今中国总算做到了第一条，引入了资本主义，并创造了震惊环球的经济奇迹，连哈佛教授都说，中国经济有望在十几年内（准确数字记不住了）赶上美国，成为世界首强。所以，上述四个指标已经做到了前三条，中国成了个有活力的病态社会，剩下来的就是预防专制制度最可怕的两大弊病：疯子或白痴将全民引上灭亡之路；矛盾积压引起周期性自爆。

第一个弊病现在看来已不存在，这固然因为当国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犬儒”，既不是希特勒那种疯狂志士，没有那个尿脬实行“西安以东”；也不是毛泽东那种文盲白痴，“乡巴佬，大裤裆，支援工业拉风箱”（按，这是58年

我们那儿的童谣）的盛况不可能重现，更是因为权威逐代递减律使得党国再也没有了可以为所欲为的大独裁者。

第二条弊病则上文已经说了，民运垃圾号召的“全民起义”已成梦呓。最大的潜在危险是共党大规模狗咬狗引爆社会危机，而我至今看不出共党有改革自身、防患未然的能力。这就是咱们“太平盛世”的唯一美中不足，也是我残存的唯一杞忧。

总而言之，海皮与否，全在于你怎么看。如果想让国人采用西方价值观，实行西式生活方式，则恐怕这梦想终成镜花水月。160年过去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离西方越来越远，雄辩证明了洛克说的“设计未来社会要充分照顾（give allowance to）到传统”的原理。没有证据提示中国会在未来160年内接近西方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我辈可做的，也就是“退后一步自然宽”而已。

“上天并没有赐给我们幸福，

习惯就是我们的满足。”

——普希金：《叶尔盖尼·奥涅金》

2008年9月27日

中国的事，未便以西方常理度之

刚才看见某网友在《悲观乐观，见仁见智》后跟帖，说：

> “中式理想社会其实就是病态社会，无论是这篇，上篇，还是老芦的所有旧作都反复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病态社会目前还看不到有好起来的希望。‘没有证据提示中国会在未来 160 年内接近西方价值观’。老芦以前就说过了，这是个烂泥塘，散发着恶臭，而且这恶臭一天天的越来越浓了。”

又说：

> “我党在逐渐的，有限的开明。但猛然开明起来怕是不可能，也不符合惯性定律。虽然这病态社会一天比一天腐烂，百姓却一天比一天海皮。西藏骚乱，汶川地震，奥运夺金，飞船上天。很多对我党不满的普通百姓又自觉或不自觉的站到了我党的一边。没有压力，我党更不会马上开明了。”

这确实是拙文的意思，只是我强调的是所谓“病态”是以西方标准来度量的。现在的问题是，过往 160 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人不会接受西方标准，未来 160 年内能否接受还在未定之天。既然如此，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岂不是自寻烦恼？忘掉它，改用中国标准，社会的病态不也就不药而愈了么？须知社会的病与身体的病不一样，前者是“我思故我在”，不知道它存在，它也就不存在了。知道它存在又无法强迫他人和自己一道采取西方标准，岂不是自寻烦恼？是可谓：“社会本无病，庸人自扰之。”

这当然是自欺欺人，但似乎也有些道理。

所谓“病态社会”，乃是一种文学比喻，其实算不得严格的学术表述。人体的病和社会的病固然有其相似性，但也有区别。前者是某个器官或组织出现了器质性病变或功能性障碍，导致正常功能无法发挥，引起患者痛苦，而后者则不能归结于某个社会部门的病变，而是原社会设计导致的社会矛盾的积累与加深，使得社会不能再运转下去，只能以自爆方式暂时解决那些矛盾。但社会

矛盾说到底是百姓的不满心理所致，只要消除了不满心理，则社会矛盾也就消失了。

传统文化之所以能起到极大的稳定作用，正是因为它瞄准了这一点。无论是儒道释都否定人欲，儒家以清贫自持、淡泊自甘、安贫乐道为美德，道家以富贵为过眼烟云，佛家则告诉你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希望在于来世。这些都极大地消除了百姓的不满心理，使得传统社会动辄就能维持几百年。这就表明社会危机反映的主要还是人民的海皮度。

正因为此，如果一个社会的设计用西方眼光来看毛病百出（faulty），但人民却十分海皮，那就似乎不能称为是病态的。因为它是不是病，取决于百姓的感知，不取决于局外人的瞎三话四。

就拿这位网友举的使得国人海皮的那几件事来说吧。我党对西藏骚乱的果断处理，满足了国人对一个铁腕霸道统治者的期待值。具有强大镇压力的党的存在，消除了国人生怕社会大乱、国家崩解的恐惧心理；汶川地震显示了极权政府组织、动员、调拨人力物力的高效率，满足了人民对一个关心民间疾苦的贤明大家长的期待值；奥运夺金和飞船上天则满足了百姓执着的文明优越感、种族优越感与权势优越感。

这些幸福感都不是西式民主社会能提供的。相反，按西方的人权观发展出来的“民族自决”只会使得西藏脱离中国，那虽不能真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什么严重损失，反倒能使国民收入增加，却一定要给百姓带来难以承受的心理损失，让百姓大大的不海皮。

这其实生动具体地阐明了“多难兴邦”的基本原理。过去说“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其实我看是“家贫出逆子（孝顺是需要物质基础的，交不出医疗费来便只有坐视父母病死，这种事我在农村见多了），国难盼明君”，而所谓“明君”，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敢于杀人、善于杀人的铁腕强人。做不到这点的统治者就要为百姓鄙视，老蒋就是榜样。

此所以连海外华人都要歌颂六四杀得好，杀得妙，呱呱叫，别别跳。我在 85 年对学生们讲的那则谢德林的寓言的确符合中国国情。不吃青蛙的国王不是好国王，没有“霹雳手段”不配作中国的菩萨，这就是咱们的价值观。你当然可以说它是病态的，但你无权强迫人民改换门庭，信奉另一种你认为是文明人道的价值观。

中共在抛弃了毛共使工农大众海皮的方式，又无法沿用儒道释禁欲主义之后，现在总算找到了使百姓海皮的替代途径，那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对稍知历史的人如我者来说，眼下的太平盛世很像传统社会王朝末年的前驱期（尤其是明朝万历年间）：经济繁荣，全民醉生梦死，以性放荡为突出特征的道德沦亡（用老话来说便是“荒淫无耻”），贫富两极分化，等等。这就是我的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的来源。

然而我也知道，历史不会简单重演，如今的统治者的强大可绝非传统皇室可比。过去的皇朝动辄能维持几百年，如今我党虽然没有了儒道释的稳定软件，难以从根本上消解因欲望不遂引起的不满，但从苏联引入的人民控制术足可代替，更别说以中子弹、坦克装甲车、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钢铁长城了。如果它能维持上百年，则我辈又何必为下世纪才会到来的自爆操心？

更何况中国的事情，实在不能以常理度之。前些天卧病读史，发现一桩很奇怪的事。

如所周知，我大明之垮，始于万历年间。《明史》断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话不是毫无根据。万历皇帝以贪婪入骨著称于史（当然现在痛骂“满狗”的土法西斯们要说那是满人造谣，《明史》是满人编写的诽谤性作品，毫不可靠云云。那些人太无知，没听说过逃过满人文字狱的《国榷》，以及保存了大量原始档案的《明实录》，民间野史笔记就更不用说了）。

万历最大的恶政，就是绕过官僚机构，派宦官到各地去征收所谓“矿税”。太监们拿着鸡毛当令箭，到处横征暴敛，为非作歹，硬要指殷实之家宅下有矿苗，要把人家的豪宅夷为平地，趁机敲诈勒索。如果挖不出矿来，就指责左右人家“盗矿”，捉将官里去，直到把“赃银”吐出来才罢休，甚至闯入民宅强奸妇女（太监如何强奸妇女，我到现在想不明白。想来是他们的狐群狗党吧）。害得天下骚然，民不聊生。

这也倒罢了，对草民来说，最糟糕的还是不断增加的赋税。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怨皇帝，盖明末边患频仍，民变迭起，朝廷要安内攘外，当然只好不断加税。据魏源 说：“ 明之末年，加练兵十有八万，辽饷、剿饷、练饷，至千有七百余万，弊亦同之。”所谓“辽饷”，指的是在辽宁作战的军费，“剿饷”则是剿灭闯贼献贼的内战军费，而“练饷”则是训练部队所需费用。朝廷每年征

收赋税高达一千七百万两，这还是朝廷实得数额，被官僚集团中饱的恐怕两三倍不止。农业国本来就没有多少 GDP，如此盘剥，百姓焉有不反之理？

但凡开国君主都想“万世一系”，因此即位后必然要仔细研究前朝得失。在这方面，满清做得最好。康熙爷在总结了明朝教训之后，定下了“永不加赋”的祖训。所谓“赋税”乃是传统皇朝的收入来源，“赋”就是人头税，见人有份。“税”则主要是土地税（有时又倒过来说，例如土地税称为“田赋”，总之比较混乱）。康熙根据当时的人口数，规定了一个死数，说明以后不管人口怎样增长都只能按那数额收税，不许增加。雍正把赋与税并在一起，称为“摊丁入亩”。因为田亩数不会怎么增加，而人头税又规定了个死数。这就使得清朝的税入基本成了个常数。

这似乎是典型的爱民仁政，然而到了咸丰朝便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其时我大清对外遇到亘古未见的洋强盗，对内碰上亘古难见的土强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第一件事便是筹措军费，这常识只有毛主席哺育出来的革命教徒不知道，咸丰爷可是知道的，但祖宗早规定了个收税常数，这战费从哪儿来？只好让疆臣自筹。“厘金”由此生焉。

所谓厘金，就是商业税，地方官吏到处开设税卡，凡是货物通过都得缴税，这用现代话语来说是“通过税”，而货物成交时也得纳税，称为“交易税”。这就是说，无论您是行商还是坐商，要做生意就得出血。

这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明朝恶政再现，势必打击工商业，弄得民穷财尽。可您猜怎么着？ 它竟然促进了中国的工商业发展，诱导出了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厘金制度，还真难想象“同光中兴”是怎样出现的。当然唐德刚也说了，那主要靠的还是海关收入。而海关收入之所以能托起经济繁荣，全靠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由账目清楚、手脚干净的英国鬼子代每个毛孔都流着贪污的血的国人收税管账。但厘金增加了朝廷收入仍然不能忽略。它不但使得国家有钱镇压内乱，也有钱向外国支付赔款，甚至搞活了经济。

这种怪事，用西方常理根本就无法理解。我想了半天才约摸想出个道道来：增税之所以没有打击民间工商业，反倒刺激了它的发展，完全是此前荒谬的制度设计造成的。满清忠实秉承了儒家农本主义传统，以为农业是本，工商是末（这传统被毛泽东那只读线装书的土包子逼真继承下来了），因此扶植农业，打击压制工商。将国家收入完全限于农业产出之上。原始农业生产周期很

长，增长有限，利润微薄之至，中国当然也就只可能是苦吃苦做的穷国。但谁要从事工商，则势必遭到官僚集团名正言顺的敲诈。那敲诈还与土地/人口赋税不同，并不是由朝廷规定的常数，完全是个无底洞。在这种情况下，经商如履薄冰，搞不好就要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厘金制度推行后，工商税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官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杀鸡取蛋，而要养着这母鸡不断下金蛋。这就是公开征税反而能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原理：它取代了无止境的暗中敲诈。

在始作俑者，厘金制度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的权宜之计——朝廷又要地方练兵剿灭发匪，惩罚还严峻之极——按满清军法，失陷城池，守官就得掉脑袋，又不发钱给地方，要如伟大领袖一般，“调动地方积极性”，“土法上马”，田赋又是毫无膏腴的鸡脚，实在刮不出什么油水来，当然只好去打商人的主意。但它引出来的副反应可是谁也想不到：它不但促进了民间工商业发展，而且使得地方获得了财权，中央大权旁落，地方离心倾向开始形成。这就是晚清地方自治呼声甚高，试行地方自治成了晚清新政一大内容，最终出现民初军阀割据，完成了国家崩解的重大原因之一。

所以，中国的事，若一味用西方常理来揣度，难免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啊，说不定中国就这样一天天烂下去，到头来会烂出个好结果来也未可知。

2008 年 9 月 28 日

浅析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以及国人的性格优势

这次美国经济危机，让我想想起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当然，在可见将来，星条旗还得飘扬下去，老美的世界经济的核心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这次危机必然要影响到中国未来的走向。

我觉得，这次美国经济危机，必将极大地增强中国人的自信，让美国模式极大地失去吸引力。如今国人终于圆了梦，看到了自己成了财大气粗的国际财东，甚至可以纡尊降贵地弯腰伸出手去，把陷在泥坑里的美国老大哥拉出来。敢问世上还能有比这更让中国人开心的么？咱们折腾了一个半世纪，盼的不就是今天这风光么？

这可不是国人擅长的自慰。如今就连美国和其他 G8 国家首脑，提起中国这大财东来都毕恭毕敬，都指望中国在这危急时刻伸手出来拉老美兄弟一把。而形势也决定了中国不会坐视美国经济崩溃——就冲那世界第一的外汇存底，也不能不设法保住美元价值啊。人民币在过去 10 个月内一直坚挺不倒，跟吃了伟哥一般，过去的软通货如今成了世上最硬的通货。就算中国什么都不做，光这点也对世界金融作了贡献了。

如果这次中国真的不负众望，出手救市，对中国的国际威望必然是一个极大的提升，以后西方对中国必然要客气许多，这岂不是比奥运更有效的面子工程？以提升“民族尊严”为第一大事的国民岂不是更要如醉如狂？国人心目中的“先进性”、“优越性”的判据，不就是财富这一条么？哪种制度更能发财，哪种制度就更先进、更优越。国人过去崇拜美国，除了人家财大气粗这条外，有几个真懂人家的强项在哪里？如今老美把自己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甚至还需要中国伸手救援，依国人的势利天性，还能看得起这种失败者么？

从这个角度来看，老美这次遇上的麻烦，就算会连累中国经济，对中国政府来说仍然是利大于弊，它使得朝野更加坚信自己的烂污制度确有优越性，政改的可能性就更微薄了。

这对于渴望中国出现突破性改革的同志来说，当然不是好消息。不过我从青年时代就丧失了自欺能力，早就习惯于面对现实了，希望诸位不要斩报坏消息的花剌子模国信使，为我的“道德相对论”着急。

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次危机确实暴露了美国经济指导思想的固有弊病，反衬出了中国国民性的一大优点。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中国经济指导思想似乎更合理些，起码更安全。这与共党毫无关系，而是咱们的国民性使然。

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似乎就是消费主义。那思路是：经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需求，因此要使经济不断发展繁荣，就得使用一切手段鼓励诱骗刺激消费，广告术、按揭、分期付款、信用卡等等，全是为此目的发明出来的。国民收入花在消费上越多越好，哪怕全部花光、毫无积蓄都还不是理想境界，最好是靠借贷消费，寅吃卯粮。

这次引发经济灾难的主要原因，我看就是这种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所谓次贷危机就最典型：银行为了鼓励消费，不顾顾客偿还能力，发放无头款的购房贷款，那假定是房价持续上涨，因此就算借贷者还不出利息来也没关系，没收拍卖房产至少可以保本。不料房市原来的上涨就是个泡沫，一旦回落，放出去的按揭就成了烂账，由此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连累整个国民经济都遭殃。

这种事，中国人是不会干出来的。中国历来是个饱受自然灾害折磨的原始农业国，由此决定了中国人苦吃苦做、克勤克俭、省吃俭用、逆来顺受、谨慎保守的国民性格。不管你是高知也好，农民也好，全一样德行。某网友说他当初谨慎，不敢借钱买房。我又何尝不如此？我工作后好几年都不敢买房，生怕负债破产，直到攒够了一半房价才敢去借按揭，以后又忙着还贷款。此乃标准的国人行为方式。大概出国的华人中，一百个总有九十九个是这么干吧。

这在鬼子看来十分蠢。他们的理论是，把钱存起来是最蠢的事，必须用去投资。要投资发财，就得借钱，借得越多，发得越快。

这道理也很浅显：例如你开个企业，需要投资 10 万，投产后年利润为 2 万，利率为 20%。如果那 10 万块全部来自于借款，年利率为 5%，那你一分钱不出就净得 1 万 5 的利润，平均一元钱生出来的利息为无穷大；如果你投资 1 万，则自己所得利润为 1.55 万，平均一元钱生出来的利息为 1.55 元；如果你投资 5 万，则 5 万挣来的利润为 1 万 9，平均一元钱产生的利息为 0.38 元；如果

全部投资都是你的，那 10 万挣来的利润为 2 万，平均一元钱产生的利息只有 0.20 元。

由此可见，你投入的钱越多，借来的钱越少，你的每元钱挣来的利润也就越少。因此，要想让你口袋中的钱能最大限度地挣来利润，你就得拼命去向银行借钱。借得越多，你就越占便宜。

但这儿的假定是，你那企业的利率能始终高于银行的利率，一旦你的产品卖不出去，没有了利润，你就还不出利息来。银行可不会让你拖累，人家会来夺走你的企业拍卖出去，以此回收投资。所以，你借钱越多越占便宜不假，但风险也就越高。你要干这种烂事，就得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

中国人大多不明白这道理，即使明白，也没有那个赌徒素质。大多数人都和我差不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然也希望发财，但更怕破产。这早由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生活方式写在咱们基因里了。咱们的祖先可不是北欧海盗，而是安分守己、苦吃苦做的小农，信奉的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最忌讳的就是“寅吃卯粮”，最恐惧的就是饿肚子。“寒号鸟”的故事，咱们从小就是听熟了的。

明白咱们和鬼子这点性格上的差异，则立刻可以洞见为何国外从来见不到讨饭的华人，也立刻能明白为何中国国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不仅居家过日子如此，政府操持国民经济也如此。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外汇存底都高得出奇。台湾过去的存底好像居世界第二，现在不知道是多少了，大陆则在近年来一直稳居第一。

这就是说，同样是搞资本主义，咱们搞的是谨小慎微的资本主义，而西方特别是美国搞的则是高风险的资本主义。别看咱们谨小慎微，最后却成了龟兔赛跑，如荀子说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老美玩聪明高招，咱们埋头傻作土财主，最后也不比聪明人差到哪儿去。

之所以谨小慎微还能把经济搞上去，跟党的领导毫不相干，完全是因为中国太适合搞资本主义了。过去中国之所以落后，全是政府以动用国家权力压制民间工商业所致。然而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实在是旺盛，只要稍微松点绑，立刻就能从巨石的重压之下曲曲折折地冒出来，瞬间便能葱茏一片。近代史上已经反复多次出现过这种奇迹，可惜每次都毁于政府毒手摧残。

晚清资本主义的迅猛诞生和发展，与外贸并无直接相干，而是因为新政放松了国家对工商业的捆绑。我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满清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乃是 1902 年-1911 年实行新政时期，而此期中国还承担了最沉重的对外赔款庚子赔款。

类似的事在此后又多次重复。每逢国家稍微放松权力的压制，资本主义立刻就冒出头来：尽管民国时资本家仍是各派军阀的首要敲诈对象（特别是国共两党的敲诈对象），是军饷的主要来源，但只要战乱稍微有点停止迹象，也立即出现经济繁荣。在共党以辣手彻底铲除民族工商业 30 年后，稍微放松一下，国人立即又造出了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中国资本家们的忍耐力、活力与创业的艰辛，根本就不是自由世界的人可以想象的。

所以，以民族性而言，中国人天生就姓资，中国两千年的悲剧，就在于发明了孔孟之道那个背时国教，使得历届政府以压制资本主义为神圣义务，谁敢姓资谁就是圣教叛徒、人民公敌。哪怕是革命乱党也那德行，就连无知孙大炮也要提出什么“节制资本”的口号。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对所谓唯物史观最有力的驳斥，它生动演示了意识形态是怎么塑造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在中国，政府的权力从来是个负数，只要稍微减少那负值，就能极大地改善国计民生，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可笑的是，但凡政府稍微减低了对国民经济的强大杀伤力与破坏力，愚民们便要出来歌颂政府英明领导，以为那财富是政府创造出来的。

不仅如此，中国人的这一民族性，还决定了中国本该是个均富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除去暴力敲诈集团这个破坏经济的人为因素，限制政府干预民间经济的权力，停止靠国家暴力制造制度性不平等，听任经济自由发展，则中国的贫富差距应该是世界上最小的，起码不会出现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那些无家可归的乞丐。这道理我早在旧作中说过了：咱们的传统教育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中国人只会以苦吃苦做干牛马活来避免“挨饿受冻”的永恒恐惧，绝不会如某些黑人或白人一样无忧无虑，望乡台上打莲花落还其乐融融。

2008 年 9 月 30 日

土改：为众多“知识分子”笃信至今的弱智神话

一、小姐与长工

我党乃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谎言专业户，几乎无话而非谎言，然而因为把持了国家宣传机器，再加上中国人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愚昧透顶，种种弱智的弥天大谎便成在国人心目中成了不容置疑的天经地义，尤以林思云为代表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为然。在他们看来，所谓客观的历史态度，就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我党对中国革命的解释，否则就是因为反共而丧失客观立场。

这其中影响最大、流毒最深广的弱智神话，就是说中共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压迫，丧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乃至一切谋生手段，不得不起来造反。中共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广大农民翻身解放的要求，获得了他们的全心全意拥护，而蒋介石未能解决这问题，于是便被中共领导的农民推翻了。在我党领导下，广大农民首次获得了土地，过上了海皮日子，整个事情就这么简单明快。用林思云的高度概括话语来说，就是“共产党救了农民”。

然而事情真是这么简单明快么？至今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解放”前农民真是因为土地兼并被逼得活不下去，看到的只是近年国内学者高王凌先生基于翔实调查写出的严谨学术论文，证明“解放”前中国农村并未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地主对佃农的剥削也绝不是共党宣传的那么严重。

恰好相反，地主反倒常常处于佃农的挟制之中：若地租按收成分成，则佃农可以虚报产量而赖去部分地租。这根本就无法验证，亩产到底是多少，还不是佃户说了算？即使是固定地租，佃农仍可自称减产而长期欠租，而地主并不敢轻易夺佃，因为未必能立刻找到接佃的人。这与租房还不同——驱逐欠租的恶房客后一般能较快地找到新房客，而租田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佃户只能是居住在附近的农民，其需求很容易饱和。若夺佃后找不到接手的佃户，错过了农时便全年无收；若夺佃后自己招募长工栽种，在没有广告手段的农村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夺佃只会给地主招来更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地主与佃户或长工的关系，并不是共产党宣传中的那个一边倒的刀俎与鱼肉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即使忽略孔孟之道与佛教因果报应的洗脑对地主行为的约束不计，地主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不能不善待佃户与长工。

前段在国内网上看见，在大陆家喻户晓的《半夜鸡叫》，完全是高玉宝的文学创作。据知情人揭发，“周扒皮”的确是个小气鬼，但给长工的待遇比对自己还好。根本就不曾有过他钻进鸡棚学鸡叫的事，那完全是高玉宝瞎编出来的。

这也确在常理之中：长工既非古罗马的奴隶，亦非欧洲封建时代或毛共公社里的农奴，而是出卖劳力的自由劳动者。两者是自由雇佣关系，并非公社社员对党官僚的全面人身依附关系。地主并不能如公社全面控制社员那样，控制长工或佃农。何来什么半夜鸡叫的神话？真要半夜鸡叫了，长工躺在炕上不起来，请问地主能有什么办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进城去找活路。“旧”社会农民并非“新”社会体制外的贱民，毫无户口约束，乃是走遍天下无约束的自由劳动者，在乡下给地主老财扛活，与在城里给资本家老爷扛活，到底有何区别？农忙季节得罪了长工，人家撂挑子走人，庄稼烂在田里，那损失可就惨重了，地主敢得罪人家么？就算不走人，难道连怠工都不会？公社社员既能在大田里耍奸使滑磨洋工，又胡不可在地主的田里来这一手？难道地主比我党干部还厉害，监管的更周密？

以上所说，本是常识范围内的事，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而且与我本人耳闻目睹完全一致。我在回忆录中写过，1963 年，我校去支农劳动，团支书请来了本村的老雇农对大家进行阶级教育，可人家忆的苦全是大跃进大饥荒之苦，思的甜尽是当年“恶霸地主”某老爷农忙时以大鱼大肉侍候他们的甜。

回忆录里没写的是我太太讲的故事。她的姥爷就是佃农。人家租种了几十亩农田，农忙时忙不过来，便请短工帮忙，照样是以大鱼大肉侍候之。他老人家枪法通神，打来无数斑鸠腌了，届时以斑鸠作下酒菜，侍候请来的短工们，宾主皆大欢喜。小日子过得肥里流油。因为他长得仪表堂堂（可惜没传给我太太，sigh），又善于舞狮，常在集市和庙会上大出风头，最后竟然引动东家小姐的春心，和他私奔了。我太太的姥娘她爸是该县的大地主，开头倒也暴跳如

雷，但最后还是原谅了女儿，承认了这门亲戚关系，让这幕真实的《小姐与长工》获得了圆满结局。

以后若有空，我当帮太太写出这段真实的中国历史来，庶几破除我党捏造的那弱智神话，帮弱智“自由知识分子”们醒醒水。

二、传统社会的土地兼并机制

实行土地国有化乃是我党早在上台前便已决定的国策，这是那个汉奸党亦步亦趋效法苏俄主子的必然结果。但若把这政策说穿，则农民便不会上当，因此我党把抢走农民的土地搞成了两部曲，第一部是暴力土改；第二部则是所谓“集体化”。我党搞集体化时的欺骗宣传，就是说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土地自由买卖必然要导致土地兼并，造成两极分化。因此只有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弱智欺骗宣传至今尚未被多数国人特别是弱智知识分子们识破，他们以为我党此举真是为农民的切身利益着想。正因为如此，刻下中共放出风声来要允许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知青们便开始忧虑，一旦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还能自由买卖，则下一步便是土地兼并，穷富两极分化了。

不容否认，土地兼并的确是历代必然发生、而且从未得到彻底解决的传统问题，也是历代皇朝被倾覆的主要原因。但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该知道，土地兼并并不是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土地不能自由买卖的结果。

所谓自由贸易，指的是严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的贸易，其前提乃是没有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干扰。西方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说穿了就是“钱”对“权”的反抗，目的就是要排除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扰。所谓“贸易自由”，就是彻底排除了权力干扰、只根据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贸易的人权。

不幸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与《血酬律》讲得很清楚，中国历史上少有纯粹的经济活动，发生的交换主要是官僚集团使用暴力进行的敲诈，与土匪绑票并无本质差别。他没敢说的是，

中共革命的唯一结果，就是造出了一个实力空前雄厚、对人民的控制空前严密的官僚集团，从而将这种土匪式暴力敲诈推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

土地兼并就是这种官府敲诈农户的结果，在明代发生得最严重。现在土法西斯知青们自李泽厚以下，动辄骂“满狗”，认定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让满狗们掐掉的，可谓无知至极。他们不知道，朱元璋才该为此负责。清朝不过是萧规曹随、继承明朝的作法罢了，而且还比明朝干净清廉到不可胜计。

根据茅海建教授的研究，宋代民间商业已经相当发达，以致国家税入的大头都来自于商业税，而朱元璋却扭转了这进步趋势。（说明，以下的话是我说的）如果蒙古人不入侵，朱元璋不趁乱上台，这趋势持续下去，则中国有可能在西方之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道理并不难明白：朝廷为了税收，必然会扶植民间工商业这会下金蛋的金母鸡，逆转孔孟之道对商业的压制，限制官僚集团对商人们的敲诈勒索，建立起一个相对排除了权力干扰的比较健康的市场体系来，如同晚清新政一般。以中国人的苦吃苦做精神，只要放松意识形态和官僚集团对他们的压制，资本主义很快就能冒出头来，正如改革开放的经验提示的那样。

然而朱元璋上台却改变了一切。据茅海建教授说，朱元璋出于小农心态，压制工商，中断了宋朝的进步作法，以农立国，使得国家岁入完全建立在搜刮农民上。其实在我看来，朱元璋并不是什么小农而是游民出身。他之所以如此倒行逆施，其动机与毛泽东完全一致（我常常怀疑毛泽东是不是他的转世，两人的相似实在惊人），乃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千秋大业。他从自身经验中得知，游民乃是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是巩固政权的大敌，因此上台后严格禁止人民流动，就连农民进城交易乃至农村集市都严格加以限制。商业意味着人口与资金的大量流动，对巩固他万世一系的统治极度不利，当然要遭到他的铁腕禁止。

把孔孟之道的农本主义推到极端的结果，就是农业成了朝廷以及官僚集团的唯一收入来源。从黄土地中刨食能刨出几个钱来？这结果当然只能是官府的敲诈变得特别凶残。马克思把贫困分为“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我看官府敲诈也可以如此划分。论敲诈所得，现代贪官绝非前朝可比，但因为现代贪官敲诈的是财大气粗的现代工商业，其“相对凶残度”就要远逊于前朝。

如吴思指出的，朝廷和官府乃是互相争饼的关系。大饼就只有那么大，官僚集团抢多了，朝廷所得就要减少，为了维持原有收入，朝廷便只能增加税收，进一步加深人民的苦难。他没有指出的是，这种状况只会发生在以农立国的原始社会。土地收入成了 GDP 的主要来源，不但使得国民经济失去增长可能，而且使得土地变成了朝廷这“冤大头”以及官僚集团的主要勒索目标。臭名昭著的“投献”就是在这背景下发生的。

所谓“投献”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也就是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们踊跃把自家的土地无代价献给豪门。为何会出现这种“知青自愿下乡”的怪事？原因很简单，朝廷不断加税，而税收的主要方式就是土地税。当税收高到超过种田所得之后，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们能做的“利益最大化”，便是把土地自动献给不必上税的豪门，自己投身为奴。

由此可见，政治权力才是驱动土地恶性兼并的最强大的杠杆。如果土地真能不受权力干扰而自由买卖，由此造成的“兼并”一是有限的，二是良性的，只会有利于国民经济。

这道理其实很浅显：从黄土中刨食乃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方式，根本就刨不出几个铜子来。冯友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家乃是家有几千亩土地的大地主，然而也掏不出多少现金来。而买地要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自耕农们再苦吃苦做一辈子，也未必能买田置地。毛泽东他爹要不是加入湘军，跟随曾家兄弟去南京抢了一把，能变成小地主么？因此，传统社会的大地主祖上或本人一般都曾是官宦，属于或曾属于暴力敲诈集团，这才有可能大量买地。

由此可见，如果摒除了政治权力因素的干扰，把土地均分给农民并允许自由买卖，则为知青们担忧的土地兼并根本就不可能大规模发生。即使发生，也只会是小规模的，其实起到了优化资源配置的良性作用。下过乡的人都知道，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不一致，有懒有勤。所谓“贫农”与“富农”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惰农”与“勤农”之别，如大包干显示的，把土地均分给他们后结果并不一致，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们入不敷出，而勤俭持家的人家则步步登高。80 年代中期我曾回过一次原籍，发现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们又变成了贫农，而地富又变成了地富，看来勤与惰乃是写在基因里头的遗传性状。

据此不难看出，如果土地因自由买卖而从惰农流向勤农，那其实是良性兼并，优化了资源配置，使得土地能在勤农手中出产更多的财富。这对惰农来说

也不是什么损失，盖务农是自由职业，需要的是自由职业者的“主动的勤快”，不是雇员那种“被动的勤快”。像老芦这种有惰农基因的人若去经营自由职业，必然要饿死，只能去为人打工，从而实行“被动的勤快”，反而足以糊口。

由上论述可知，如果把土地均分给农民，并彻底摒除政治权力的干扰因素，真正实行土地的自由买卖，由此造成的“土地兼并”只会产生出中小地主，没有可能产生大地主。这其实是一种良性变化，它不但能优化资源配置，而且能解决那些因天性必须靠“被动勤快”谋生的惰农的生计问题。

三、民国年间土地兼并应该不是严重问题

如上所述，这个问题已经有国内专家高王凌先生的学术专著证明过。人家是基于翔实调查作出严谨的学术结论，我则毫无作这种研究的可能，只能根据常理与逻辑推断一番。这当然不能取代学术研究，不过或能破除“自由”知青们的弱智思维方式，并为那结论提供机制解释。

如上所述，传统社会发生的土地兼并乃是暴力集团敲诈农民的结果，但要这现象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使得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不能不起来颠覆皇朝，在我看来还得满足以下必要条件：

第一，土地产出构成 GDP 的主要来源，致使权贵掠夺土地成了致富的主要手段。

第二，社会上有免税的特权等级，兼并土地不至于造成权贵税收增加。

第三，具有兼并能力的豪门贵族能持续存在，不至于因为衰亡而造成土地的再分配。

明朝满足了以上所有必要条件：朱元璋把农本主义推到极端，使得农业收入成了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土地因而成了豪门的主要掠夺目标。朱元璋小气入骨，实行所谓“廉政”，发给官员的薪俸根本不足糊口。为了弥补，他便按等级赋予官吏不同程度的免税特权，等于鼓励豪门放手掠夺百姓土地。他更废除了前朝实行的“爵位世削制”，使得具有免税特权王侯贵族随着皇室繁殖而越来越多。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到了嘉靖年间，所谓“投献”就已经成了普遍

的社会现象。此后遇到饥荒加外患，逼得朝廷不断提高税收，更促进了土地恶性兼并，到最后饥民活不下去，当然只能起来铤而走险。

清朝虽然沿袭了明朝的农本主义，但好在自康熙起便规定了“永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把人头税和土地税并在一起，固定为常数，这就使得逃税没有可能，也避免了农民因不堪税收重负而自动把土地献给豪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明朝的弊政，预防了大规模恶性兼并的发生。此外，满清还恢复了爵位世削制，只有八个“铁帽子王”是世袭罔替的，其他的贵族一律实行“爵位逐代递减律”：第一代为王，第二代降为公，第三代降为侯……实现了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就在消除了豪门代代为贵族、永远具有兼并能力的可能。除非是代代有人做官的世家，否则即使有一代人做官，加入了暴力敲诈集团，买下了大量土地，因为中国实行的是遗产均分制而非封建欧洲的长子继承制，田产也势必要遵循“逐代递减律”，因后代繁殖而分散。

根据这些原因，尽管我没有数据支持，但似乎仍能断言，清朝的土地兼并绝对没有明朝的严重。等到晚清新政开始，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暴力敲诈集团就不会再以勒索土地为聚敛财富的唯一手段了。

资本主义在民国年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进一步转移了暴力敲诈集团的勒索兴趣。加上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辛亥革命制造出来的政治暴发户们你方唱罢我登台，只会将勒索兴趣集中在捞取快钱上。随便看本过来人的回忆录，你都能看到军阀们的主要敲诈对象乃是富商巨贾，陈其美就是此道高手。人家哪有那耐性扎根农村，兼并并不会长出蓝田玉的土地？

现代中国最能说明这一问题。论敲诈集团实力之雄厚，人员之众多，权力之大，贪污财富之多，历代敲诈集团有谁能跟我党比？然而我党的敲诈兴趣完全集中在城市工商业，还从未听说过哪个贪官靠兼并农村土地致富的，除非那是为了作工商业用地出售。

民国资本主义虽然远不及今日发达，但毕竟与毫无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朝代相比是空前发展了。但它毕竟还处在资本主义萌生阶段，土地主要还是生产资料而非商品，由此决定了工商户的现钱才是贪官的主要勒索目标。更重要的是，不管怎样不彻底，民国毕竟还是向西方学习，以有限的法治保障了公民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恶吏任意敲诈良民。

由此可见，土地兼并在民国时代当然必然存在，但不可能构成严重问题。所谓因为农民丧失土地而无法活下去，被迫起来跟随我党干革命的经典解释，根本就不能成立。

既然如此，孙中山何以要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口号？愚以为，孙大炮乃是众所周之毋庸置疑的白痴，提出这口号并不能证明中国当时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必须采用革命手段解决的紧迫程度，正如当时中国并没有什么庞大资本需要节制一般。平均地权自远古时代就是国人的梦想，井田制就是孟子的理想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何况据唐德刚说，孙文提出的“平均地权”其实是生吞活剥西方理论，指的是城市商业用地而非农村耕地。当然，唐氏并未出示此说证据，因此这“地权”究竟何所指，便因中文的模糊而无法确凿查明了。

四、中共革命并非农民旨在夺取土地的自发革命

近现代中国发生革命的根本原因，我早就解释过了，乃是西方侵略刺激出来的知青们的蠢动，与民生并无相干，并不是国民经济危机刺激出来的。相反，辛亥革命前的经济还相当繁荣。中共革命自然也如此，那原初目的乃是为了国家的自强，这点就连张国焘那建党元老都承认。此后国共两党共同发动的所谓国民革命，本质是苏俄帝国主义为了控制中国发动的代理战争，大多数知青投身革命的初衷还是结束辛亥革命引发的军阀混战，统一中国，也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与解决民生问题并无直接关系。

然而不容否认，无论是国共两党共同发动的国民革命，还是国共破裂后共党单独进行的革命，都与辛亥革命划然而别，确实是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人民革命，中共革命确实也是农民革命，其“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也确实构成了强大动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列宁斯大林革命工艺学的伟大成就。我已经在旧作中解释过了，列宁的本事就是发明了革命党，以此人为制造革命，而贫困的国家就是制造革命的理想温床。尽管中国农民并不是真的活不下去，但过去农村的确非常之穷——靠原始农耕，一般农民能做到的无非也就是糊口。在这种地方，要充分利用人类天性中邪恶的那一面，煽起大众对富户的嫉妒心、仇恨心来，把他们遭受

的贫穷困苦，统统归结于地富的剥削，告诉他们只要把地主的土地抢过来，就能“美好的日子万年长”，当然会有广大市场。

当然，这过程很复杂，各方面的心理因素都有。组织发动群众乃是我党的看家功夫，这里面既有挑拨煽动，又有鼓励奖掖，更有威逼恐吓，缺了哪一方面都不行，光强调一方面也必然失之片面。记得张戎曾把淮海战役期间我党组织的空前规模的民工支前运动完全归结于恐怖统治，我觉得那未免过于简化了极权政党操控下的群众运动。

要明白这种群体心理有多复杂，只需想想文革就够了。谁也不能否认，文革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群众最多、群众革命热情最高的人民革命，然而这革命真的是因为人民在“走资派”统治下再也无法活下去，不能不起来造反么？任何一个过来人都能告诉你是不是这么回事。文革前 17 年虽绝非什么黄金时代，但除了大饥荒时期，百姓也不是活不下去。66 年经济已经基本复苏，那就更没有必要造反了，更何况起来造反并不是因为共党饿死了几千万人，恰是为了红色江山万年长。有谁能说清大众如火的革命热情是哪儿来的？

用张戎的“恐怖统治胁迫”说，根本就无法解释这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运动。我早就反复说过了，当时全国党委都已瘫痪，国家完全由群众组织统治，两派武斗乃是在自愿基础上爆发的，并没有谁逼他们去参加。两派为何要莫名其妙地兵戎相见，打得死去活来？

实际上，处于暴民运动中的群体心理非常复杂，根本也就不能以理性度之。人民革命之所以发生，多半是革命党人为制造出来的，并不一定是局外人在事后冷静分析出来的具体原因触发的。参与革命的群众演员们动机非常复杂，其中既有肾上腺功能亢进的真诚志士，有野心家与投机分子，有稀里糊涂随大流蠢动的愚氓，也有出于恐惧或自保心理跟风的胁从者。

中共土地革命的动因，我看也就不外乎这些因素，它唯一有别于我党发动的历次人民运动之处，只在于这儿有个具体明确的诱饵：土地。它起到了双重作用，既是诱饵，又是“投名状”，而 后者正是中共发动“土地革命”的真实目的与成功诀窍。

近来常在国内网上看到“投名状”字样，但使用者似乎根本不明白这意思。其实《水浒》讲得很明白：林冲去投奔梁山，王伦要他下山去杀个人，以此作“投名状”，也就是用人头作名片。此乃过去土匪确保革命队伍内部团结

的根本措施：一旦背上命案，就断了后路，再也无法反水投靠官府了，只能横下心来和同志们干到底。

这就是我党发动土地革命的真实目的所在。我已在前面指出，土地国有化乃是列斯主义的根本主张，更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路线斗争”焦点。我党作为斯大林的忠实弟子与驯良走狗，早就把这当成了神圣教义。他们发动土地革命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真想把土地分给农民，而是以土地作诱饵煽动农民造反，并以暴力土改断了他们的后路，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跟党干到底。

这就是我党为何一定要坚持进行暴力土改，把这当成了至高无上的革命原则。毛泽东曾在内部讲话中批评某“兄弟国家”的和平土改（芦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隐去了该国国名），说：“和平土改，后患无穷。”那意思就是没有起到投名状的作用，未能以“疾风暴雨”来“锻炼革命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定他们的革命立场和决心”。因此，光是抢走地主的土地和浮财还远远不够，必须毒打、羞辱、杀害地主甚至其家人，否则运动便“煮了夹生饭”，必须“回锅”。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政治势力如此冷静地、系统地、全面地、有效地化民为匪。

正因为此，华北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还乡团”。本来世代和睦的乡邻，在我党的精心挑拨之下，竟然成了互相疯狂厮杀撕咬的凶狼，随着国共两军的来回拉锯反复仇杀，将黄土地浸泡在血液里。如果光是动用政治权力和平地分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则这种惨剧就绝不会发生，而淮海战役也就不可能由“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大军”“用车轮推出”了胜利。

五、中共的土地革命乃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土地兼并

如前所述，土地国有化乃是列斯主义的根本主张，共党搞暴力土改并不是真心让“土地还家”（按：这是土改口号），而是以此化民为匪，“组织起千千万万民众，调动起浩浩荡荡大军”，获得控制农民、巩固统治的永久性手段。哪怕是在他们彻底抢走了农民的生产资料之后，直到 70 年代，我党都还在反复提醒贫下中农们当年犯了什么罪，用“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的“变天”的恐怖前景反复恐吓他们，唆使他们持续犯罪，去把“人还在，心不死”的“阶级敌人”毒打到人亡心死。

正因为此，如费正清指出的，作为中共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的农民，竟然成了共党在土改完成后的第一个剥夺对象，甚至比城市资本家还早，讽刺性地兑现了马克思“剥夺剥夺者”的预言：在共党教唆煽动威逼组织之下，农民用暴力剥夺了地主富农的田产，转瞬间，这些剥夺者的田产又被共党迅速剥夺了，两次剥夺时间相差不过六年（1950 年全国“新解放区”开始土改，1956 年“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全国普及），当真是比《好了歌》唱的还快。而我党过桥抽板的无耻行径，至今还被人称颂为“救了农民”！

这个再抢劫过程是逐步发生的，当年小学教科书上有一首“民歌”，描述了这诈骗三部曲：

“单干好比独木桥，

走一步来摇三摇。

互助组好比石板桥，

风吹雨打不坚牢。

合作社铁桥虽然好，

人多车稠挤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

通向天堂路一条。”

所谓“互助组”不涉及产权，也无收入分配问题，无非是几家人在自愿基础上互相帮忙，彼此换工。这倒无可非议。

合作社分为“初级社”与“高级社”两种。最初的合作社称为“初级社”，是合资企业，在理论上由农户以农田、牲畜、大农具（如犁耙）等自愿入股，合股经营，秋后根据各人的股本与劳力投入分红。这就涉及到了产权问题，由此形成所谓“集体所有制”。至此，仅就理论上而言，农民尚未丧失土地。而且据说入社乃是自愿的，退社也允许，收入分配还兼顾了股本与劳力投入，这还不是侵犯产权的犯罪。

但这不过是理论上说说而已，而我党的理论从来是“骗局”的代名词。首先入社就不是自愿的。盖当时农村已经实行统购统销，亦即由国家垄断了粮食买卖。你若不入社，国家就不买你的粮，而私自出售粮食可是犯法的。更别提国家只向合作社供应农药、化肥等农用工业品了。

因此，不入社就根本没法活下去，只能如沙家浜村民一般，“自愿”给胡司令送礼（当年我看样板戏，每逢听到阿庆嫂这句台词，就忍不住想起知青“自愿下乡”来）。退社的权利也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各项公民人权一般，只存在于纸上。尽管如此，至少在理论上，至此政府尚未犯下侵夺私人财产的诈骗抢劫罪。

1956 年普及的所谓“高级社”，则是把原来的几个“初级社”并在一起，政府首次剥夺了社员的股权。分红制度被废除了，股东们当初投入的农田、牲畜、大农具等等与主人再无相干，代之以所谓工分制度，亦即收入分配完全根据劳力投入决定。但它仍然还保留了“合作”的名目。

1958 年全面推行的公社化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官府抢劫民财犯罪活动。许多高级社并在一起，变成了人民公社，农户由原来合作社理论上的股东，变成了公社的长工，就连他们自己也压根儿忘记了原来的股东身份。原来合作社无论真假，还有社员可以退社一说，如今这茬也再无人提起了。就是疯子，也绝不会说出“我要退社”的话来，这权利甚至不存在于纸上。

可笑的是，这种赤裸裸的抢劫犯罪产物，竟然还保留了“集体所有制”的名目。其实所谓“集体所有”，乃是共党最擅长的“只占便宜不负责”的局诈。一开头我党也想搞全民所有，早期人民公社实行所谓“一平二调”，吃饭不要钱等等，完全是全民所有制的搞法。但我党迅即发现，如此一来，农民便成了国家雇员，政府必须养活他们，并承担其劳保福利，不如用“集体所有制”的名目赖掉这责任。光是抢走他们的土地就够了，此后生老病死，各安天命。

这局诈最无耻的地方，是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本身不但是经济单位，也是地方政府。公社干部是国家干部，相当于原来的乡长镇长，而这些国家干部领导的乡政府，竟然是什么“集体所有制单位”！

更可笑的是，这“集体所有”的无耻名目，竟然刻舟求剑，保留到了今天！弱智的中国知青们煞有介事地讨论农村问题时，还在认定农村土地至今为“集体所有”，以致秦晖教授必须写出《土地六论》来郑重其事地澄清之！

13 亿中国人里竟然没有几个人问一声：“集体所有”？那“集体”究竟在哪里？不是早在 80 年代就解散了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土地究竟是附着在哪个鬼魂身上？公社乃是合作社变来的，而合作社乃是合资企业，这两者有产

权传承关系。公社既然解散了，为何不把当初股东们投入的土地、牲畜、大农具等退还给人家，却由官府不明不白地贪污了？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所谓“集体化”，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官府抢劫全民资产？

就这样，我党先后犯下了两次抢劫罪：先领导组织暴民犯下武装抢劫罪，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抢到手里，分给贫苦农民，此后又直接出面，以令明朝瞠乎其后的“投献”方式，抢走了全体农民的生产资料，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把全国农村化成了“党家庄”。亿万农民从世世代代的自由劳动者，沦为全面依附于庄园主的农奴，连起码的迁徙自由都被剥夺了，与当年投效 “祝家庄”、“曾头市”的家奴毫无区别，连“旧”社会的长工都不如。

我党为何要犯下这种史无前例的罪行来？那动机无非是两重。其政治目的是把全国无数小农悉数编织入组织网络中，成了庞大的“全民军队”的一员，使得他们彻底丧失了流动性和独立生存能力，不能不接受我党无微不至的控制，就此丧失了骚乱造反的能力，一劳永逸地杜绝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农民“起义”。不能不承认这的确高明。如果不是把全国农村化为“党家庄”，很难想像在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之后，社会还能风平浪静。

经济目的则是斯大林早就搞过的那一套，亦即以残酷压榨剥削农村，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行国家工业化。这就是我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亦即“一化三改造”（国家工业化，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方面，毛比斯大林走的更远，苏联的集体农庄还不是完全彻底的“党家庄”，农民并未丧失迁徙自由。苏联更没有如毛一样，连农村集市都要限制，连农民的“鸡屁股银行”都要没收。毛对“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病态的执着，有如说是像个正宗的斯大林主义者，莫如说更反映了朱元璋为代表的愚氓传统。两人都对人民的流动表露出入骨的恐惧，都对长久掌权毫无信心，都让“丧失政权”的病态恐惧担忧支配了自己的全部行为，都视财富为败坏人心的祸水，都把农田收入当成命脉，都以农民的救星自命，都在痛恨官僚集团敲诈勒索农民的同时，采用种种措施加深农民的苦难。一言以蔽之，中共的土地革命和一切农村政策，都是中外邪恶文化之集大成。

这就是“共产党救了农民”。

六、台湾的人道土改——大陆农民本来可有的希望

许多知青们认定，台湾的土改是老蒋逃到台湾去后痛定思痛，想出来的防患未然的社会改革措施。本坛更有说话颠三倒四、毫无筋节、坚持用脚后跟进行思维的同志认为，台湾的土改是老蒋从中共那儿学过去的。

看懂前文的读者，立即就能看出第二种说法不过是谵语，与该同志发出的其他胡言乱语一般，认不得真，一笑了之可也。

至于第一种说法，我不知道这认定有何依据，不知道当年台湾的农村土地兼并是否已经达到了足以危及社会稳定的程度，也不知道老蒋搞的土改是否起到了纾解民怨、缓和社会矛盾的关键作用。我所知道的就是，台湾搞的人道土改，确实推动了社会转型，这久为中外学者交口盛赞，凡是西方介绍台湾的书籍必然提到，以致连我这完全彻底的门外汉都能得而闻之。

与中共武装抢劫犯罪完全相反，台湾土改是在尊重私人产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其具体做法是由政府掏钱，把地主的田买下来，再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户。据大陆专家李昌平介绍，土改后，土地仍可自由买卖，但必须限于农业用途，禁止城市资本侵夺农田。

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台湾土改没有侵犯私人产权，把全民化为无法无天的土匪；从人道的角度来看，台湾土改没有撕裂族群，由政府在人民中蓄意播下仇恨分裂的种子；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台湾土改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而中共的土改则实现了“耕者无其田”；从经济学来看，台湾土改造出了一个有钱阶级，地主们拿到政府给的赔偿后便搬到城里去，改行从事利润更丰的工商业，从地主迅速转变为资本家，促进了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为台湾起飞奠定了基础。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我已经在前面说过了，所谓“地主老财”虽然有点土地，其实是比较没有钱的人。这道理恐怕海外有点房产的人都该能理解：您拥有的不动产起码有几十万，但那并不意味着您银行里能有多少钱。所谓 real estate 并不是 cash。你手中的现钱，取决于你的实际收入，而地主老财的收入恐怕连如今的低薪族都不如。盖他们能换钱的不过是些农产品，而农产品在农业国非常廉价，换不来什么钱。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要地主自发转为资本家，就算没有骆驼穿过针眼那么艰难，起码也和泥鳅钻蚂蚁洞的难度不相上下。要获得走资第一桶金，地主就得变卖田产，而除了政府那个大买主外，谁也没有那个财力，能一举将全国地主的田产都买下来。因此，要靠地主自发转化为资本家，完成社会转型，其过程必然旷日持久。

仅此一端即可洞见先总统蒋公杰出的治国才干。说实话，我并不认为土地兼并必定是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而农村有地主存在，又是什么了不起的社会不公。中国人思考问题，总是离不开“民以食为天”的小农思维框框（亦即伟大领袖的“以粮为纲”）。

在我这外行看来，土地兼并是否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端看该国的 GDP 的大头是哪儿来的。只有在农业国里，“均富”才等于“均田”，而土地兼并当然就意味着极大的社会不公。但若在发达国家中，人员可以任意流动，挣钱的方式多元化，农业收入不再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则谁爱兼并土地就兼并好了，那并不会制造出赤贫户来。英国领土仅 24 万平方公里，人口高达 6 千万，农业人口仅 1 百万，只有约 1.7%的人口占有农田，论“兼并”程度，当为中国历朝历代望尘莫及，可也没见哪个饥民在那儿揭竿而起，号召打土豪分田地。

由此可见先总统蒋公的英明。要使国民富裕起来，不是如毛泽东那个文盲土包子那样，坚持全民土中刨食，甚至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去加入刨食大军，所谓“改革”，就是用暴力或欺骗手段，把既有农田的主人换来换去，而是人为制造出一个新生资产阶级来，促进社会转型，使得社会财富来源多样化，使得广大人民再不必靠务农为生。

这在我看来，才是台湾土改的真正意义所在，它不是如大陆无知知青们（对了，今后我应该改用“无知青”这个词来指代中国所谓“知识分子”）悬想的那样，只是一个消极的防患措施。

七、今日中国土地问题

这问题在我看来，如我党蓄意制造出来的其他社会问题一样，根本就没有解决希望。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共若要改恶从善，最合乎逻辑的措施就是按照当年“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把巧取豪夺来的土地退还给当年的合作社的股东们，并折价偿还人家当年投入的牲畜、大农具等等，真正实行“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

然而中国的烂污国情决定了合法并不一定合理。真要这么做，则毫无人权产权保障的农民必然要成为暴力敲诈集团的鱼肉对象。我党“打土豪分田地”几十年，结果是抢走了每个农民的土地，在农村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土豪集团。和村干部比起来，党神话中的黄世仁、刘文彩等等不值一笑。土地一旦真的还家，不旋踵就要落在土豪恶霸们的手里。那才会制造出空前的社会危机来。

因此，这问题和其他问题一道，如浏阳河一样，绕来绕去，绕了 99 道湾，最后又回到了那个根本问题上——说到底，只有国家实行根本性政治改革，以法治充分保障公民人权，从一切经济活动中排除政治权力的干扰因素，使得公民真正享有完全彻底的经济自由，中国的经济改革才能获得真正的社会进步意义。在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之前，任何经济改革，包括刻下奢谈的“土地使用权流转”，都只会具有“肥肉上添膘、鸡脚上刮筋”的“尺蠖效应”。

2008 年 10 月 13 日

国人最没本事弄明白的几个基本概念

前文贴出后，某位网友跟帖说，共产党原来也想拿出钱来把地主的土地买下来分给农民云云，这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看懂我那无比浅近的文章，更不是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昨天的真实历史，必须再作点说明。

那位网友要为我党辩护，我非常欢迎，并乐观其成。可您怎么也不能搞成强奸诬蔑我党吧？凡是大陆人，哪怕是文盲也该知道，我党最痛恨的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最反对的就是调和、折中、和稀泥，最坚定的原则就是坚持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斩尽杀绝，痛打落水狗。这就叫“革命的坚定性”。连文盲都该知道，武装斗争乃是“民主革命三大法宝”之一。在 60 年代和苏修大论战中，叛徒赫鲁晓夫主张的“议会道路”、“和平过渡”乃是中苏最重大的分歧之一。

而今您却竟敢强奸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造谣说他们曾想用金钱把土地从地主那儿买下来，再分给农民！您如此放肆造谣诬蔑我党，请问有什么证据？《毛选》或我党历史上所有文件中，有哪一句话暗示过这种反动意愿？莫不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 “好得很！”的欢呼，启发了您这一伟大发现的灵感？我不是在正文中传达过毛“和平土改，后患无穷”的内部指示么？您怎么还能造出这种谣来？

不过幸亏有了您的跟帖，才让我第 N 次痛苦地发现国人是何等容易愚弄。老实说，在公共论坛写作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我反复发现，原来我几十年前便戳穿了的弱智谎言，至今还被许多国人奉为天经地义，于是便不断促使我写出普及常识、介绍真相的文字来，几百万字就是这么给刺激出来的。

例如中共土改是怎么回事，我早在当年上山下乡时便弄得一清二楚了。当时就不胜惊骇地发现，农民之迟钝麻木，比起鲁迅在《故乡》中描写的老闰土犹有过之。他们压根儿就忘记了当年的股东身份，忘记了“人民政府”曾经郑而重之地发给他们大红的“土地证”，连这“变天帐”都没收藏起来（也不可能收藏，因为入社时已经交给合作社了），反而一致认定“土地是国家的”，所以无偿交公粮乃是天经地义，还为我党恩准他们栽种自己的土地感激涕零。

当然要说农民麻木也未必，在某种意义上，人家比弱智无知青们更朴素地认识了现实。他们本能地知道自己是国家的农奴，对国家只有义务，毫无权利可言，只是把这种有史以来的最大压迫剥削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恩惠而已。

因为我党恐怖统治，我从来不敢与人交流思想，于是便假定大家与我一样，都经历了觉醒过程。要不是海外有了中文论坛，我可能到死那天也不知道，原来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看穿了我党的拙劣的“仙人跳”（旧上海“拆白党”烂人搞的局诈）。这次若不是有人说什么“台湾土改是跟中共学的”，我也绝没有意识到，我在此之前上帖质问“中共何时才把抢走的农民的土地还给人家”， 原来被某些读者误解为“中共何时才把抢走的地主的土地还给人家”。我若不特地写篇文章介绍一下土改真相，只怕他们到死那天也未必会知道，我党抢走的不光是地主富农的土地，更是全体农民的土地。

正因为此，读者称赞该文的跟帖，反而让我深感绝望：这本是秃头上的虱子啊？何必要我专门写篇文章，大家才如梦初醒？中国人的智力，到底有无遗传问题？用弱智谎言持续愚弄他们，何以如此容易？

最令人绝望的是那位爱党网友的反驳，如果他说的是真心话，那可就真是不可救药了，盖他指责的“胡说八道”，乃是任何一个智力正常者不需要任何专门知识和调查，仅仅基于常理，通过逻辑推理都会得出的结论。

我那篇文章的要点如下：

1）所谓经济自由，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彻底摒除政治权力的干扰因素，只根据逐利原则进行经济活动，而所谓贸易自由，就是在排除了权力干扰后，严格实行等价交换。

2）中国传统社会的致命弊病就是从未做到这点，权力从来是最强大的“经济资本”，于今越演越烈。

3）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土地兼并是政治权力介入经济活动，由权贵靠权势夺取自耕农土地造成的。

4）若去除权力干扰因素，由于农业的高投入、长生产周期、低产出的特点，在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国，不可能因土地自由买卖而发生大规模的恶性兼并。

5）迄今无任何证据表明，中共革命是农民因为土地恶性兼并，失地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不得不揭竿而起的自发“起义”。民国年间发生在农村的一切骚

乱，都是共党蓄意制造出来的，从未听说过没有共党组织的大规模自发起义，这与传统皇朝末年景观完全不同。正如文革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民革命生动演示的，要使得人民大规模起来骚乱，需要的只是卓有成效的煽动与组织，可以毫无经济原因。如两大派武斗雄辩证明了的，没有仇恨可以煽动出生死大仇来，世上再没比这更容易的事了，而这正是我党的专业，是他们唯一精通的本事。

6）正因为抢夺土地并非农民的自发意愿，我党才把发动暴力土改，当成了把农民逼上梁山的强大手段，为其武装斗争人为赋予了充分的群众基础与草根性。不这么干，则我党绝无可能获取农民支持。

7）因此，暴力土改乃是我党的夺权手段，并非夺权目的。他们的目的乃是剥夺一切人的财产，使全民化为全面依附为暴力集团的奴隶。5 亿农民紧接着地富之后被剥夺，甚至比资本家被剥夺还早一步。通过剥夺全体农民的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我党成功地实现了历史上见所未见的空前土地兼并，把全国农村化成了“党家庄”，把全国农民变成了党的农奴。

8）邓小平的改革虽然把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农民，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政府仍然拒绝吐出赃物，改革的进步意义还不如西方从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不仅如此，我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农村建立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土豪集团，制造了无穷后患，使得此后的所有改革都只会让该集团成为最大的受惠者，让“三农问题”变成了一个无解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若中共吐出赃物，则立即会落在土豪集团手中，反倒制造出深重的社会危机来。

这就是我那长文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为什么会有读者看不懂，反而认为是胡说八道？愚以为，这反映了许多国人永远也无法弄明白某些最基本的政治学概念，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概念恰是国人使用频度最高的。

第一个概念就是“解放”，这大概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度最高的词了吧？大陆出版物举凡叙述历史，必然要使用“解放前”、“解放后”这相当于“公元前”、“公元后”的纪年专用语。这些词语早就自咱们牙牙学语时深深植入语言中枢，大概比本人姓名还要熟极而流，然而可曾有人问过自己“解放”到底是什么意思么？

那位说了，这还不容易？“解放”就是“翻身”，就是“当家做主”呗。什么是“翻身”？那就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

这就是我党为大家提供的标准答案，可惜我党忘记告诉大家，“当家作主”怎么才能与“一生交给党安排”、“做党的驯服工具”等号召调和在一起，更没解释为何农民连土地该翻多深、该施多少肥、栽秧该有多密，遑论该卖多少“余粮”，都无法做主，得乖乖服从政府（公社那“集体所有制单位”就是基层政府）的决定。有史以来第一次，皇上竟然操心到农民可养几只鸡头上去。若农民不慎超标多养了几只，就要由武装民兵五花大绑起来，如当年的土豪劣绅一般押去游乡。若谁胆大包天偷养了猪，那祸闯得就更大了。这就是“当家作主”？

那“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倒容易理解，过去工厂农村的主要娱乐活动，除了观看样板戏外，不就是隔三差五开批斗会，痛打那些阶级敌人甚至其子女么？但“压迫”和“剥削”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压迫就是欺侮人，剥削就是巧取豪夺他人财富。这的确简单明白，可要论欺侮压迫人，有谁能比大队干部？就算是党宣传中所谓“恶霸地主”，想来也不敢如我党干部那样随便辱骂、批斗、毒打地富及其子女，乃至私养了家畜的村民吧？要论剥削，还有什么能比按国家规定的指标上公粮，按政府单向规定的价格以及数量卖“余粮”更霸道的欺行霸市，敲诈勒索？就算是“解放”前的佃户，种什么，卖多少，价格几何，地主好像也无权决定吧？

知青们到死那天恐怕也不明白：所谓“压迫”，就是“以政治权力剥夺公民权利”，所谓“剥削”，就是“通过以政治权力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而自肥”，所谓“政治权力”，就是“统治者以暴力为后盾的使得人民服从命令的慑服力”，而所谓“解放”，就是“人民获得被统治者剥夺的公民权利”。

这些定义，只怕是我党理论家也不敢否定吧？但一旦同意它们，则他们也就不能不同意，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哪个时代，人民丧失权利有在我党统治下那么完全彻底：在政治上，人民非但没有西方国家公民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而且没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一系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权利；在经济上，毛时代所有公民不但丧失了财产，而且被剥夺了一切发展权甚至独立谋生权；在人身权利上，毛时代的公民不但毫无最起码的安全感，随时都能因为出言不慎，遭到非法囚禁毒打、劳改甚至枪毙，就连决定自己头发可留多长、裤脚该是几寸的微不足道的权利都被剥夺

了。敢问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个朝代，“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满清包括在内，人民丧失权利还能有如此之彻底？

这就是“解放”？原来，文明世界的解放，是人民获得被统治者剥夺的权利，而在咱们的反文明世界里的“解放”，则是由统治者完全彻底地剥夺人民的权利？

如果用人民享有权利的充分性来衡量社会的进步程度，则所谓“新”社会也者，难道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的社会？就算是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想来也无法反驳这一衡量标准，以及由此导出的结论吧？

类似地，我党理论家包括樊弓教授在内，只怕也得同意我在上面给出的“压迫”与“剥削”的定义。但如此一来，他们就不能不同意，正因为我党剥夺人民权利之完全彻底，为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所以共党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最强大、最无情、最残暴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在此还得着重讲一下“剥削”的概念。我自己觉得，前作有点见地的一段话是：

“所谓自由贸易，指的是严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的贸易，其前提乃是没有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干扰。西方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说穿了就是‘钱’对‘权’的反抗，目的就是要排除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扰。所谓‘贸易自由’，就是彻底排除了权力干扰、只根据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贸易的人权。”

在文章结尾我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说到底，只有国家实行根本性政治改革，以法治充分保障公民人权，从一切经济活动中排除政治权力的干扰因素，使得公民真正享有完全彻底的经济自由，中国的经济改革才能获得真正的社会进步意义。在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之前，任何经济改革，包括刻下奢谈的‘土地使用权流转’，都只会具有‘肥肉上添膘、鸡脚上刮筋’的‘尺蠖效应’。”

若不用大白话进一步解释，只怕爱党同志要永远住在五里雾中，认定我是胡说八道。

什么是剥削？剥削就是不等价交换。什么是等价交换？那就是严格依据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进行贸易。而剥削就是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权力干扰因素，

使得交换偏离这个原则，不按正常价格进行，让权力拥有者获得了靠等价交换无法获得的利益。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这点吧：在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村中，大家都苦吃苦做，从土中刨食，每年要投入大量劳力，而一年顶多有三次收成（北方只有一次，南方某些种双季稻的地区可有三次），生产周期非常之长，劳力投入非常之多，产出就那么一点。即使全村的收入加在一起，刨去支出，只怕全年盈余还不过一两千元钱吧？全村最富者，只怕也就能有个百把元的盈余。靠这点钱，就算能从惰农或遭到人祸的农户手中买田，顶多也就是一两分，就算年年有这种好事，那勤农到死也就顶多能买上几亩田。他死后就算是代代单传，遗产不至于分散，而且代代都是勤农，年年能遇上村邻倒霉的好事，能从人家手里买过土地来，也得积累几十代，才能熬成个拥有几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

这里引入了若干假设，最关键的是世代单传这一条。这一条若不满足，则勤农积攒下来的田产立刻就会因分家而分散，地主梦就再也做不成了。但吊诡的是，若引入这假设，则那勤农再勤也无法发家——谁都知道，农民喜欢多生孩子，固然因为那是农村的主要娱乐（也就是老金说的：“日，歇歇，再日”），更是因为孩子意味着劳力资源。于此便出现了一个互相否定的悖论：非多子无以发家，而多子则造成遗产分散。无论是哪种情形，地主都无法产生。

由此可见，我那“在农业社会中，在无政治权力干扰前提下，土地的自由买卖不可能造成大地主”的结论，不过是个常理范围内的事。只有连起码思维能力的人都没有的同志，才会认为那是胡说八道。

然而如所周知，传统中国农村有的是大地主。这些人当然只可能靠权力掠取土地产生。他们发家的秘密，吴思早就在《潜规则》中讲解过了，那就是运用权力（也就是隐藏的暴力）赋予他们的“合法伤害权”，使得受害人面临“留财不留命，留命不留财”的选择，则人家当然只能“无私奉献”。本来供求关系决定的是一亩地二十两纹银，如果双方交易的动机完全是经济考虑，就只会出自自由意愿，按市价买卖，何来剥削可言？如今变成了低价出售或甚至无偿投献，等价交换的原则被践踏了，当然就是剥削。我党的“集体化”，说穿了也就是这名堂。而共党所谓“统购统销”，由国家垄断粮食买卖，并单向规定不许谈判的收购低价，更是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

明白了这最简单的常识，则立刻可以洞见国人最熟悉的“贪污”，也就是“以政治权力作为最强大的经济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牟取暴利”。知青们可能明白“行贿受贿”是什么意思，却无法理解那是权力作为资本投入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

其实，权力作为放大倍数最大的“经济杠杆”主宰国民经济，历来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特点，更是“新”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特点。我党有别于历代统治者之处，只在于他们虽如历代造反痞子一样，以抢劫富户起家，但在当国后非但不效法前朝统治者施行仁政，与民休息，把土地均分给人民，反而把抢劫对象扩大到全民，在毛死后又从土匪党，变成以空前强大的权力操控市场经济、因而剥削效率最高的贪污党而已。

明白这最简单的常识，也立刻可以洞见我党所谓“反腐倡廉”就算是真心号召，也绝对只会缘木求鱼，盖全国经济活动中只有一个最硬的通货：权力。不把它赶出交易场，则贪腐将永远是我党的生存方式。然而若真做到了这一点，则我党立即就要垮台。胡温就算犯了失心疯，也绝不敢自断经络。因此，中共所有策划中的经济改革，包括现在谈论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绝对只会为贪官污吏们提供创收机会，正如原本着眼于保证矿工人身安全的安全制度，为矿霸们提供了空前创收机会一般。

2008 年 10 月 15 日

中国宪法不过是个劣等智力笑话

——驳《〈零八宪章〉是在呼吁修宪还是制宪？》

自国内三百多名人士推出“零八宪章”之后，网上评论蜂起，其中广为流传的一篇文章是寒竹先生的《〈零八宪章〉是在呼吁修宪还是制宪？》。作者列举了《零八宪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精神相冲突的话语，援引美国修宪成例，强调 “修宪的前提是不能否定原宪法的基本精神，不能打破原有宪法的框架，这是世界各个宪政国家的共识”，据此认为 “《零八宪章》的基本构架采取了在形式上要求修宪和改良，而在内容实质上要求重新制宪和再造国家的迂回方式”，由此得出结论：

“宪章的内在逻辑很清楚，如果宪章的主张能实现，那么宪章就不仅仅是在修宪，而是要推倒现有宪法而重新制宪；宪章也不仅仅是要在体制内进行渐进改革，而是要发动一场体制外的革命。”

所以，中共把刘晓波抓起来并迫害其他签名人士，当然是理直气壮地制止“希望中国在转弯中倾覆”的“反华分子”的颠覆政权犯罪活动。

如此高明的文字狱诛心功夫，如今是难得见到了，起码中宣部没谁有这两下子，可谓“国中多愤老，海外有遗贤”。

可惜这不过是诡辩。

所谓“修宪”，先得有部处于工作状态的宪法，也就是国家实行宪政，政府严格按宪法基本精神执政。如果政府持续违宪，那就得立即下台，甚至还可能因此被审判，这应该是“世界各个宪政国家的共识”吧？能言善辩如寒竹先生者，想来对此也不能不同意吧？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就没有过这样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也就不是一个宪政国家。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是一部持续暴烈违宪史。据官方媒体披露，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用宪法教育自己的子女，说他们领导的红卫兵去暴力抄家违反了宪法，可不但没能制止所谓“破四旧”的大规模违宪犯罪，就连他那个国家主席都毫无人身保障，在备受折磨后死于非法监禁之中。世上有过这种“宪政”国家么？

那当然是往事，如今又怎么样了啊？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中国公民能享受的基本权利，又有哪一条得到了落实和保障，有哪一条不是一纸空文？刘晓波因为签署 《零八宪章》被非法逮捕，其他人遭到当局骚扰迫害，难道不是对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与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规定的放肆嘲笑？

就算《零八宪章》确实是呼吁政府重新制宪也罢，那不过是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并未煽动百姓起来造反，可听这位寒竹先生的意思，政府肆无忌惮地违宪无罪，公民行宪反而有罪，这算是哪个“世界各个宪政国家的共识”？

可我党以及党朋的逻辑就有这么奇怪，处处反对任何一种“宪政共识”，不但百姓行宪有罪，就连呼吁政府行宪也有罪。西藏流亡政府不过是请求中央政府行宪，让藏族享受宪法规定的一系列权利，就被我党与党朋诬蔑为“藏独”、“分离主义者”甚至“恐怖分子”。就连我都受了欺骗，以为流亡政府要求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直到前段看到《明报》记者采访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的录像，才恍悟西藏流亡政府犯下的十恶不赦的大罪，原来不过是要求中央政府严格按照他们制定的宪法办事而已，而中央政府非但不理睬，还坚持违反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利用官方媒体长期对“达赖集团”进行五花八门的攻击、侮辱与诽谤。

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无论是否赞同“世界各个宪政国家的共识”，都不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唯一功效就是欺骗百姓，第一条就是弥天大谎：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人阶级又有哪一毫微秒领导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难道又不曾与农民一道沦落为社会最底层，同为“被繁荣遗

忘了的族群”？而除了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又有谁胆敢去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定义，所谓“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它与雇佣劳动、市场经济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格格不入。然而我党在邓小平领导下公然背叛马列，破坏马列式“社会主义”制度，疯狂走资。党的 13 大首次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2004 年修改的宪法又将它正式写进宪法总纲。党的 17 大甚至允许马恩发誓要消灭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资本家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当今之世还能找到哪个执政党，敢如此如此明目张胆地践踏自己规定的宪法第一条？

当然，我党这么做，也有说不出的苦衷，盖苏联 70 多年、中国 30 年遭受的无穷灾难与挫折，明确无误地宣布了苏式“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为了中国不被“开除球籍”，我党不得不迷途知返，毅然改错，从那条通往深渊的道路上退回来。为了把持政权，他们又不能承认自己把中国人民领上了死路，只好挂羊头卖狗肉，偷偷摸摸走资，在实践中否定马列式社会主义，把已经建立起来的党有制社会，改造为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同时有限地容许民间资本主义出现。这结果，就是把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变成世上第一劣等的智力笑话，光看看总纲这段话就够了：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任何一个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略有所知的人都能立即看出，这三样东西互相否定，根本就不可能冰炭同炉。马列规定的“社会主义模式”与现行中国社会制度的针锋相对就不用说了，光是毛泽东“思想”竟然能和邓小平“理论”捏弄到一起去，就绝对是只有我党才能造出来的人间奇迹。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打天下的权术，在今日中国根本无法应用，能指导治国的最主要“思想”，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

论”。对此每个过来人耳熟能详，那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广大工农，发动他们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打倒“党内资产阶级”，与此同时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人为消灭“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坚持到 50 年至 100 年的时间，直到世界革命胜利。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远远超出了毛泽东当年最可怕的噩梦与最严重的担忧。他连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都不能容忍，能忍受令叛徒铁托和赫鲁晓夫瞠乎其后的邓小平的改革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中国已经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已经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已经改变颜色了。毛若泉下有知，能忍受现代中共领导对他如此放肆、如此暴烈的强奸么？

所以，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真正能作数的也就只有一条：“党的领导”。除此之外，所有各条都是特地制定出来专门让我党违反的。不仅如此，它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拙劣无比的智力笑话，这在世界宪政史上堪称独一无二，就连“斯大林宪法”都比不上它——斯记宪法的每条都是让执政党违反的，但人家好歹没像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那样，弄出个“油炸冰激凌”的宪法总纲来。

皮都没有，毛将焉附？既然中国宪法不过是个骗局与笑话，不但从未发生过一毫微秒的效力，而且因为其基本精神中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也永远无望进入工作状态，那么，即使是呼吁废除这种拙劣的装饰又何罪之有？这就叫“要发动一场体制外的革命”？！就叫“希望中国在转弯中倾覆”？！这是哪家的“世界各个宪政国家的共识”规定的？！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像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共识涅？寒竹先生看不到我党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违反宪法除了“党的领导”一条外的所有基本精神与具体规定，却高选择地看见了《宪章》对“党天下”的否定，请问到底是何原因啊？

《零八宪章》的内在矛盾，稍微有点智力的人都能看出来。但这矛盾之所以产生，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个弥天大谎必然导致的结果。国家根

本大法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还为公民规定了详尽的权利，然而中共这既非工农代表、又与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各阶级无关、完全靠暴力垄断权力的统治集团却罔顾宪法基本精神，全面剥夺公民特别是工农的政治权利，坚持把一切政治权力垄断在手中，将绝大多数公民排除在国事决策之外。这才是任何正直的观察者都不会错过的宪法的根本内在矛盾。而这就是这矛盾，造成了“宪章的内在逻辑”的矛盾，也决定了寒竹先生“敏锐地”察觉了其中包藏的叵测祸心。

其实任何一个立论客观、心地正直的人都能看出，尽管《宪章》有不少问题（我在后继文章中还要详谈），但其主旨就是针对纠正宪法内在矛盾、消除其欺骗性，在本质上是呼吁政府停止违宪行为的建设性建议。如果这就叫“颠覆国家政权”，那我看不如干脆宣布宪法是反动文章，一切旨在让它名副其实的努力都是犯罪算了。我党若真做到这点，倒还比现在这种拙劣表演更符合“世界各个宪政国家的共识”些。起码，“行恶法”总比“奉伪法而行无法”要更言行如一、更符合西方法治精神些。

2008 年 12 月 19 日

《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在我看来，《零八宪章》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文献永垂史册。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说它发人未发，为人类完善自己的管理贡献了新思路或新观点，也不是说它会对世界宪政运动史有什么贡献，甚至不是说它能对推动宪政最终在中国实现有什么具体的助力，而是因为它的意义恰在于“曲庸和寡”，因而不能不作为一个悲剧性的 gesture，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目睹大厦将倾时的绝望呼喊而被后人铭记。在这个意义上，它很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据国内茅海建教授考证，所谓“公车上书”实际并未发生过，只存在于历史传奇中）。

依愚见，《零八宪章》最醒目的特点有三：

第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首次集体表达他们对西方主流价值观（亦即所谓“普世价值观”）的理解与体认。芦某无学，还想不起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想得起来的不是五四时 “德先生”、“赛先生”的模糊口号，四十年代的“反饥饿、反内战”，57 年的“大鸣大放”，西单墙的“第五个现代化”，便是八九年青年学生对西方民主梦幻式的朦胧憧憬激发出来的诗样激情。而且，凡是“解放”后一切能冒充“民主”运动的群众表演，不是“明君虚怀纳谏”式的传统式“民主”，就免不了毛共“人民民主”气息，还从未见过有哪份群众宣言能如此全面、系统、精炼地表达国人对西方民主社会运作基本机制的理解。

第二，《宪章》中每句话，在西方都是连大老粗都视为理所当然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可言。在西方跟人谈这些，不论对象是何背景，都如同告诉人家“地球是圆的，不是方的”的一般无味。

第三，《宪章》的诉求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既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认同，也无法为草根民众理解，更将遭到当局的敌视与铁腕镇压，它甚至不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许多华人知识分子认可，寒竹先生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这就是我为何觉得《宪章》颇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康有为等人的 alleged 的献策，乃是救亡图存的最起码的措施，然而连那种最起码的步骤都既

不为慈禧太后接纳，也不为民间士绅集团支持甚至认可。如美国汉学家马士说的那样，戊戌变法是一个毫无群众基础的“倒置的金字塔”。当“戊戌六君子”被处决时，朝野都拍手称快。用传统标准来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乃是不折不扣地“顺天应人”。

《零八宪章》与它的区别，只在于维新派还有个有名无实的光绪皇帝的全力支持，而且开头还有慈禧太后“摸着石头过河”的半心半意的支持，而刘晓波等人连个空头皇帝的欣赏都没有，可谓“孤王半天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这在我看来才是《零八宪章》的最大的悲剧意义：要过了足足 168 年，中国的少数知识分子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西方民主社会的构建运作机制（还谈不上深入，基本上只是概念的理解，无从谈到对其操作艺术的掌握），而广大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知虽然在晚清和民国间有极大进步，在“解放”后又倒退到鸦片战争前的水平，连西方主流价值观在道义上的合理性与功利上的优越性都不承认，拒绝向人家学习，要坚持传统价值观一万年不变，以致《宪章》作者们为了照顾国人无比脆弱的自尊心，必须把它包上“普世价值观”糖衣。

然而若因为“普世价值观”是外来的，就该出于民族大义毅然拒绝，那请问咱们该坚持什么国货？是风水命理、麻衣神相、炼丹术、房中术、飞檐走壁金钟罩铁布衫外加耳朵认字意念折枝、无偿劳役、保甲连坐、枭首示众、五马分尸、诛灭九族、站笼夹棍、剥皮实草、三寸金莲、太监宫女、八股文、三跪九叩、封妻荫子、三妻四妾外带俏丫环……，是从苏联进口的邪教与中国造反实践相结合生出来的“阶级斗争”、“群众专政”、文字狱、大批判、批斗会、戴高帽、抹黑手、挂黑牌、“喷气式”、游街示众、层层划线站队、面对面批判、背靠背揭发、毒刑拷打、光腿跪在碎玻璃上小腿压上钢锭、在阴茎上捆上鞭炮或在阴户里插入鞭炮后燃放、向两大派群众发枪令他们互相残杀、让初一学生马悲鸣和高一学生王希哲彻底丧失人性，或参与打死逼死师长，或下令“凡火线临敌投降者一律枪决” ……，还是跑马圈地、化公为私、将暴力抢来的国家资源系统地化为私产卷逃国外、以坦克装甲车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剥夺世世代代的自由农的迁徙权利以及祖辈相传的土地，让他们世代永作固定在原位的农奴？

这些好东西，只怕最铁杆的忠党爱国壮士，也无法曲为之辩吧？但既然诸位要否定“普世价值观”，总得拿出个像样的国货来取代它吧？敢问那是什么？不就是只有“坚持党天下”这一条么？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它能保障我的利益，我当然要拥护它，推行“普世价值观”必然否定党天下，所以我当然要坚决反对。

这心理我完全能理解，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主思想的萌芽。我早反复说过了，民主制度就是社会各集团的和平争利机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举议员，为了自身利益拥护某个党派，正是西方公民的标准作法。因此，有此想法无足深责，相对于80年代的“义令智昏”的“民主”愤老中青们的智能水平来说，它甚至可以算成是个进步。

然而党天下和西方民主制有个本质差别：它不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远不是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法律的保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发财机会，相反，它专门以制度制造权利的不平等，使权贵能利用他们与普通公民之间巨大的“权利落差”疯狂吸纳社会财富，导致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酿成深重的社会危机，而这种背时社会又毫无化解社会危机的机制，只会将它积蓄下来，于是最终便只能以全国大乱、玉石俱焚来结束一度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唐虞盛世”，完成中国永恒循环的又一周期。

可悲的是今日中国竟然没有多少人能看到或是愿意承认这点。今日的中国非但没有志士，而且没有智者。而这就是它与80年代的最大区别。

八九“风波”过去快20年了，这20年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我党从宗教集团变成了单纯的世俗权力集团。如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根本不一样，统治集团不是什么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而是一个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中共革命完成的社会改革，只在于它彻底粉碎了官僚集团之外的一切民间社会，将所有的国家资源与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从而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官僚集团。

但在改革开放前，官僚集团拥有的权力并未直接兑换为金钱。因此，党内政策之争具有相当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所谓“路线斗争”颇像传统社会的“清浊流”之争。如文革鲜明展示的那样，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策略乃是抢占道义制高点，证明自己的主张更符合“圣贤”（马列）经典，而对方则是“名

教”（马列）叛徒。改革开放乃是邓小平那“浊流”（pragmatist） 以实力压倒“清流” 们（ideologues）的道义抵抗强制推行的。正因为在道义上心虚情怯，他才发明出“不争论”的高招来。

因此，虽然信奉的是邪教，当时党内仍然不乏志士，因对教义的不同理解而能产生意识形态分歧，这就是“姓社姓资”两派的来源，也是89年全党发生大分裂的根本原因。分歧双方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只是他们对它的理解完全不同。“姓社”派对改革的抵抗主要还是一种比较真诚的道义抵抗，比起纯粹出于捍卫私利的抵抗来说，它相对要容易克服得多。

如今我党可完全不是当年的宗教集团了。党内如今还具有超脱于个人利益的信念的人，也就只有那些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青，如李锐、何方那样的“两头真”。然而这些人已是风烛残年，在党内毫无影响。掌握了实权的乃是50、60、80年代的大学生，这些人统统是我党的负筛选机制精选出来的“有奶便是娘”之辈，除了金钱之外毫无信念。

这结果便是党内再也没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之分，只有清一色的“捞钱派”，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这就决定了2000年代与80年代的中国前途的基本区别：再也没有了和平改革的希望。

改革从来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其发动的前提就是统治集团内必须有实力雄厚的改革派，他们看到了现行制度的根本弊病，痛感“不能再率由旧章，必须从速改革，否则国将不国”，而成功的前提，则是在朝的改革派的主张得到在野社会精英的呼应与配合。80年代之所以是“新”中国的黄金时代，正在于党内出现了改革派，使得改革具备了发动前提。如果不是遭到以方励之为首的愚昧精英的颠覆，它本来完全可能成功。

如今的党中央可就完全不同了，再也没有了胡耀邦、赵紫阳那种为了国家民族推行改革的志士。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动改革，就只有全靠民间压力。但既得利益集团对改变现行制度的反抗，要比当年“姓社”派出于信仰的反抗暴烈得多。更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第二个变化，使得民间压力即使出现，也决不可能是建设性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个两极结构：党作为统治者属于一极，人民包括所有阶级和阶层属于另一极。在这种情况下，我党维护统治，除了武力威慑外，全靠对民众洗脑建立起来的盲目忠诚。当这洗脑在80年代末期因对外开放

失灵后，党便不可避免地变得极度孤立，完全只能靠枪杆子支持。就是这种恐惧，驱使邓小平作出了大屠杀的决定，以求一劳永逸地吓得百姓魂飞胆裂。

在此之后我党吸取了教训，效法传统社会官僚集团与士绅集团结成联盟的作法，将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纳入既得利益集团，结成了“权贵”与“精英”的联姻，使得知识分子成了官僚集团之下的第二等级。社会因而呈现了向传统社会某种程度的回归：社会等级变成“官—士—商——工—农”。其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君——臣—士——农—工—商”（破折号的长度相关于社会地位的差距），如今的“新”社会少了皇帝作为凌驾一切的最高仲裁，而商人的地位有了显著改善。

于此，社会发生了显著断裂：知识分子从原来的人民队伍中游离出来，扮演类似传统社会士绅集团的角色，变成了以权贵集团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外延部分与官僚后备池。其与传统士绅集团的区别在于，士绅集团是传统社会的民间领袖，在草根百姓中享有极大的权威，而现代知识分子则和官府一道与工农大众构成了社会的两极，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利益鸿沟。

这变化发生得非常自然，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89学运刺激出来的。一位化名为“我不理解西方”的中国听众在BBC上发表的《我看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把这心路历程说得清清楚楚了：

“我也理解那些在中国维权的人。只是这些人有一点没有想清楚，就是改变（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改变自己 才有可能。有时间不如多看看书，培训，找好工作，挣更多的钱。像香港电影《无间道》提到的一句话：‘人改变不了事情，只有事情改变人’。中国目前只有一切向前/向钱，发展才有前途。而目前的执政者，作到了，我非常感激。”

我相信这位发言者曾经参加过89学运，从自身的痛苦体验中发现“人无法改变制度，只能改变自己的境遇”。既然李禄、沈彤等人都没有改变制度，却巧妙地利用由此获得的政治资本，把自己成功地改变为亿万富翁，他们又胡不可改变自己去迎合那个制度，尽最大限度为自己谋求好处？两者都是同一逻辑，是不是？

不难看出，在这种社会中，除了少数信仰尚存或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外，唯一要求改变现状的只有被繁荣遗忘的族群——普罗大众。这或许就是异

议人士何清涟女士为何要在激赏“我们的英雄杨佳”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呼唤新时代的“大泽乡起义”吧。

可惜据本人这位前工人阶级积累几近一甲子的理性与感性知识，普罗大众彻底缺乏构建新社会的能力，却具有巨大的破坏能力。传统社会正是因为具有类似今日的结构断裂，使得这种巨大的破坏能量周期性地释放出来，从何女士激赏的“大泽乡起义”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带回石器时代。

这就是《零八宪章》的悲剧意义：尽管它每句话述说的都是一个常态社会的基本公民常识，然而却只会遭到大多数中国精英的排斥，也无法为普罗大众理解，无望变成他们的诉求。这道理简单之极：居住在北半球的人永远看不到澳洲人能看见的“南十字架星座”。连先知先觉如刘晓波辈，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都只能停留在概念水平，居住在中国的普罗大众又有什么希望somehow顿悟西方健康的生活方式，无师自通地设计出一个能工作的常态社会模式来？又有什么可能知道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向政府施压，逼着政府采取措施向常态社会逐渐过渡？他们能做到的，充其量无非是如杨佳那样用牛耳尖刀去“给说法”。就算是全体奋起抗暴，无非也就只能再谱写出一首“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七千哀诗”来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似乎可以说《零八宪章》乃是那“七千（或七万）哀诗”的前奏曲，而这就是它的历史意义。

2008年12月21日

难题在于“放下你的刀子”

如前文所说，《零八宪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老生常谈，平庸无奇”；第二印象则是“太脱离国情，缺乏可行性”，这是指它既不会得到当局的批准，也不会获得大多数国民特别是所谓精英们的认同，哪怕具备了这两个实施前提，它也意味着从根本上改造国家权力结构。如此急剧的改革必然引发动荡，陷入苏轼在《晁错论》中说的“能发不能收” 的失控困境。

因此，寒竹先生诽谤宪章作者们“要发动体制外革命”，虽然是我党文字狱正宗嫡传的诛心神功，毫无事实依据，倒也不是毫无道理。不过，正派人只会把它的缺乏可行性，理解为它本身并非一个具体的改革方案，只是提出了党国政改的长程努力目标，正如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发布的一系列上谕，虽然毫无实作可能（连合格的干部队伍都没有，推行什么新政？），但毕竟为国家指明了努力方向。套我党的行话来说，《宪章》给出的是改革的“最高纲领”。

那么，改革的最低纲领是什么？行宪，亦即要求党国领导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废除一切凌驾于国家根本大法之上的“潜规则”，先把中国改造为名副其实的宪政国家再说。最起码的改革措施是：

1）严格兑现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公民享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行舆论独立，取消党对舆论的管制。

2）严格执行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实行司法独立，取缔各级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那个社会团体对司法独立的干扰与破坏。

3）严格执行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规定的“议会主权制”（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国事咸决于议会，严禁社会团体中国共产党违宪弄权。

4）严格执行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款、第九十三条与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实行军队国家化，以全国人大为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机关，选举任命中央军

事委员会，决定一切涉及军事行动或部署的国策，并监督中央军事委员会实施这些决策。

5）敦促全国人大迅速制定有关立法，在人大内部建立相应的委员会，专门检察并审判政府以及社会团体中共的违宪行为。

这些应该是让中国转变为一个宪政国家必须采取的最起码的措施吧？请问中共有何理由拒绝？拒绝它们，就是拒绝在中国实行宪政，就是向全世界庄严声明：由中共自己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过是“能说不能做”的欺人之谈，而真正为党国政府奉行的天宪乃是“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也不会建立起一个为朝野凛遵无违的明规则来，永无希望将自己改造为文明法治国家，永远只会是个“谁的拳头大谁有理”的流氓国家、土匪山寨。

这才是中国的前途真正令人绝望之处。中国现在的问题，还不是什么民主化，而是文明化，也就是让朝野都学会照章办事的起码文明规矩，不能无法无天乱来一气，以实力取代法律权威，以暴力作为解决利害冲突的唯一手段。无论是执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朝野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是民间纠纷，都必须严格遵循公开的法律渠道去解决，不能使用杨佳的牛耳尖刀。

这应该是一个文明国家最起码的行为标准吧？就连水泊梁山那种土匪山寨，人家也有个从天而降的石碣，明文规定了谁是天罡星，谁是地煞星，为新老弟兄们排好了座次，这才能从此杜绝林教头式大火拼，在梁山上建立了和谐社会，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折腾了半个多世纪，至今还不能做到一个比较高档的土匪山寨能做的事？

然而这不幸就是可悲的现实。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乃至全国大多数民众，奉行的天宪只有一条潜规则，那就是：“强权即公理，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是朝野之间还是人民之间，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永远是解决一切利害冲突的最高法官。谁的拳头大谁有理，谁的拳头大谁是爷，赢家通吃，不服者一律铁拳伺候”。

一度活跃在《海纳百川》网站的爱党“思想家”兼才子“随便”先生曾用生动的文学比喻，将这“至尊潜规则”表述为所谓“狼羊律”。他说，强者与弱者之间，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狼”与“羊”的关系，“羊”们没有 “狼”能享受的任何权利，只有乖乖被“狼”吃的义务。据说，“狼”

这么做是为了“羊”们的根本利益，否则若让“羊”们无限繁殖，就要因食物短缺出现生存危机。因此，“羊”们必须为 “狼”们大慈大悲地维护生态平衡而满怀感激之心。据他说，此乃“宇宙运行规律”。

可怕的是，许多国人确实把这赤裸裸的丛林哲学当成了“宇宙运行规律”。本系列前文引用的那个 BBC 中国听众的心声就坦承了这一点。他其实是说：“狼”总要吃“羊”，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自己可以做的事，就是往“狼”群里钻，变成其中的一员，就算不能获得“吃羊权”，起码也要逃过被吃的命运。

这种想法在国内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有的大学教师就认为，农民作为二等公民的状况不能改变。如果取消这一条，让农民与城里人平等，让农民自由进城，自由择业，那城里的高楼大厦谁来建？在他们看来，这种以社会制度蓄意造成的不平等，反而是咱们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它确保了中国劳力将永远具有他国无法抗衡的廉价竞争优势，确保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一片狼藉之时仍能生生不已，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既然朝野都认同这“宇宙运行规律”，胡锦涛在 12 月 18 日发出“绝不按明规则办事，坚持信奉狼羊律”的庄严誓言也就毫不足怪了。他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是说，“开放”政策不会改变，政治改革则休想，以暴力作为解决党内外一切利害冲突的唯一手段的“中国特色”要永远坚持下去。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党中央纪检委那社会团体违宪非法抓捕陈良宇（美其名曰“双规”），就充分证明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将近 60 年后，仍然未脱当年的土匪本色（据说是“中国特色”），至今无法磨合出个西式文明规矩来，仍然必须以非法手段解决权力斗争。当然，比起毛共肉体消灭竞争对手的野蛮作法来，它也算是个伟大进步吧。但比起西方文明国家来，它仍然雄辩地证明，无论党国镀上了何等耀眼夺目的“物质文明”的赤金包装，它骨子里仍然是太平天国那种中古式的野蛮腐恶政权，而且无论怎样传代，第 N 代接班人的教育程度如何，那野蛮腐恶的“基因”都难以稀释。

当年我曾告诉那位爱党才子“随便”先生，他靠发扬“以文学比喻代替论证”的国学传统，来扮演新时代“爱党民间思想家”的角色，精神可嘉，却不幸和老前辈一样，忽略了类比对象的一个小小区别：自然界的狼羊是不会互相转化的，而人类社会的“狼羊”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凡受过小学教育的人都知道，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周期性爆发“狼羊大战”的“狼羊”转化史。

最近的例子见于杨佳那个水浒式传奇英雄：他生成了注定要被恶警作践的“羊”，而且终生也无望变成作践他人的“狼”，但他可以去买牛耳尖刀。他的武松作派（可不是说打虎，说的是杀张都监满门良贱）引起了巨大轰动，却没有几个人看到了胡锦涛解决陈良宇时显示出来的火拼王伦的林冲作派，其实这两者都是牛耳尖刀，后者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那把刀子”。从法律的角度看，两者或有程度之差，但并无实质区别，都是公开违宪。如果牛耳尖刀不但成了草民维护人权、讨回公道（“说法”）的唯一途径，而且竟然是国家元首除去竞争对手、巩固个人权威的唯一手段，那么这种国家到底是什么乱邦危邦，正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

还不仅此，举国上下齐齐信奉“狼羊律”，便彻底取消了政治改革的可能。须知建立民主国家的前提是建立法治国家，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是社会契约化，社会契约化的前提是朝野文明化，双方必须既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也有恪守协议的诚意与信义。在矛盾激化之时就更是如此。要“放下你的刀子”，前提是双方不但得一齐放下，而且得相信对方信守诺言，不会在自己转过身去之后立即捡起刀子，猛扑过来。如今无论朝野都唾弃“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都把诺言当成诱敌深入的谎言，把谈判当成麻痹对方斗志，为自己赢得调兵遣将的时间与空间的策略，有谁还敢先放下那把刀子？

这种烂污国情，决定了我党非但不会将民主恩赐给国民，就连他们内部磨合出个和平守法地解决政策分歧与利害冲突的文明规矩的可能性都不存在。我在旧作中多次呼吁，我党先在党内实行真正的（亦即西式）民主，效法日本自民党，允许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允许党内公开结派，提出自己的政纲公开竞选党魁，但我每次也都要指出，此策虽是我党确保自己不因内讧倾覆而祸延全国的唯一办法，但其可操作性约等于零，盖谁若率先唾弃“狼羊律”放下刀子，谁就是毅然自杀，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因此，我党早就骑在虎背上了，根本就下不来。之所以如此，全靠伟大领袖毛主席“野蛮国民之精神，打断国民之脊梁”，在掌权后以空前的强力为全民洗脑，全面否定、嘲弄、唾弃了人类得以结成社会的一切文明规矩与文明共识，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化作了凶猛动物，因此不但将 960 万平方公里变成了连梁山都不如的土匪山寨，其“和谐”只能以牛耳尖刀来维持，而且把国家民族一劳永逸地锁死在“此亦不敢和，彼亦不敢和”的“尖刀国教”中。在这威力无穷的国教面前，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可操作的最低政改纲领，即使是胡温有改革诚意也罢。

2008 年 12 月 22 日

明年可能是个骚乱年

《零八宪章》推出后，刘晓波旋即被捕。据博讯网披露的“北京内幕消息”说，刘晓波是胡锦涛亲自下令逮捕的，据说，胡认为：第十八款的要害在于其末句结论：“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因此，这已经不是什么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等“异议认识”，而是国家分裂的大原则问题！是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国家“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严重问题。胡锦涛最后作出结论说：所有签署者在事实上都犯下了叛国罪！需要严肃处理！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就什么天大笑话都能闹出来。

这世上的国家，无非是两种建构形式，一种是单一制，一种是联邦或邦联制。听胡总的意思，好像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单一制国家，谁要敢提出建立“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谁就是犯了叛国罪。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国家么？香港、澳门算什么事？台湾呢？世上哪有奉行“一国两制”的单一国家？自香港澳门回归那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是个联邦国家了（倒不是说它是共和国，它从来也就不是）。所以，党中央应该去把邓小平抓起来，这叛国罪首先是他犯下的。

刘晓波被捕，海内外大哗，上千人签名上书，呼吁当局释放刘晓波。中国又一次“震惊世界”。鬼子不懂中国事，对中共当局如此小题大作、过度反应大惑不解，说即使在中国实行该宪章，民主选举政府，那也肯定是中共执政，有什么必要铁腕镇压呢？

人鬼殊途，于兹可见一斑。鬼佬不知道：

第一，党天下不是能由人民选出来的，只能靠暴力维持。没错，我党以今日之声望，要变成民选执政党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但那并不保证我党世世代代统治中国，也不能保证我党全方位控制全民，而这才是我党的“最低纲领”。

第二，本系列前文已经指出了，我党不敢放下斯大林那把刀子。林副统帅的亲切教导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党的天宪。那“一切”不但包括金钱美女富贵荣华，甚至包括性命。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夫妇的悲惨下场，成了党魁们“心中永久的痛”，是他们驱之不去的永恒噩梦。

第三，我党并非传统昏君，自家有病自家知，时时刻刻感受到了社会的高张力，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中，而恐惧正是驱动铁腕镇压的主要动机。记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不敢肯定是否该书）正确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出现恐怖统治，乃是因为革命者被吓坏了。的确，套句鲁迅的话：fear（恐惧）与terror（恐怖）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恐怖之前或之后，总是要有恐惧跑来的。我党出自深重的不安全感，觉得《零八宪章》可能会为本来就已经是危机四伏的社会添乱，因此立即决定“将事故苗子扼杀在摇篮中”。这是他们的反应定式，从斯大林和毛泽东留下的字典里找不到别的词汇，两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病态的不安全感（paranoia and insecurity），其实都是典型的心理病例。

不过这次也倒不能说我党完全是自惊自吓。毕竟，现代党魁并非斯毛那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两个的病人。但中国与文明国家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政局的宽松程度反映了党魁的自信，党魁的自信又反比于他们感受到的危险。不幸的是，如今国内的局势实在没法提高他们的自信。

据《多维新闻网》对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愷的采访，2005 年光是中国官方公布的群体事件就达到 8 万 7 千起，今年可能以十万计。据这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美国教授说，“目前阶段在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的，没有哪个时期可以相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群体事件也比较多，例如那时农村人会起来抗税，但他们目标明确，就是抗税，也不管什么官商勾结腐败之类的，所要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对这空前的历史现象的出现原因，艾恺教授作了自己的分析。但他毕竟是鬼佬，难免雾里看花，并未指出根本原因何在。在我看来，这现象反映了传统社会与“新”社会的稳定要素构成的重大区别。

传统社会的稳定机制我已经在多篇旧作中剖析过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儒道释对全民的思想改造。儒教将家庭伦理外延到全社会规模，把无条件服从君上当成了天经地义，再用佛家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学说加工这原始教条，通

过大量的演义说部戏曲评书等民间文艺，灌注入每个子民的心田，彻底阉割了他们的反抗基因。此外，儒道释还谴责或否定人欲，提倡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尽量避免提升百姓的物质欲望，为此不惜压制工商业以及科技发明，以冻结社会发展换取社会稳定。这就是最有效的社会黏合软件。硬件则是形成官僚集团与士绅的联盟，用科举制度把人民中最有能量的分子不断吸纳入统治集团，使得“野无遗贤”，没有才俊去组织领导愚民造反。

这就是传统皇朝获得空前稳定的基本原因。在正常情况下，朝廷都是靠“教化”的“王道”保持子民的驯服温良，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使出武力镇压的“霸道”手段来，此所谓“王正霸奇，王主霸辅”，乃是传统皇朝的标准实践。

以传统模式来对照，立即就能洞见“新”社会缺了什么最要紧的物事：没有社会黏合软件。马列毛主义在国门打开后已经彻底破产，我党至今未能找到个合格的替代国教，于是新时代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便只能靠用金钱收买来代替“教化”，以“财道”来代替“王道”。

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实涵义：经济发展不再是单纯地谋求改善国民生活水平，而成了社会稳定的前提。本系列前文说的权贵与精英的联姻，也是完全建立在这前提上的。一旦失去这前提，则那婚姻立即破裂。本系列前文引用的那个 BBC 中国听众已经把这点说得明明白白了：他拥护共产党的唯一理由，是自己的工资在 20 年内增长了几百倍，夫妻两人的税前收入达到了 50 多万人民币。不难想见，一旦这好景不再，他的忠诚立即就会蒸发，盖那不是出自信仰，而是购物式的现实算计。

因此，这稳定是用钱买来的，它的维持全靠经济不断增长，这就是中国特色。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表示，中国明年 GDP 增长在 8%左右，是根据中国的生命线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充分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没有什么比这话更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基础是何等脆弱了。在西方，GDP 年增长率到达 8%已经是奇迹了，即使是 GDP 出现零增长或甚至负增长，也不会天下大乱，而在中国，8%的增长率才是中国的生命线！谁都想得出来，经济不会无限高速增长。正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长达 30 年，它才被全世界经济学家称为奇迹，既然是奇迹，当然就不是可以持续

的，否则也不叫奇迹了。那么，若中国有朝一日失去了高增长势头，又该怎么办？社会岂不是要土崩瓦解？

艾恺教授为中国社会如此缺乏耐受力大惑不解，他不知道，这是现代国人甚至比原始人老祖宗还要蠢造成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假定是两条：第一，经济可以无限高速发展。第二，人民的满意程度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

这两条基本假定都错了，第二条尤其大错特错：若真如此，则原始人老祖宗也不用提倡安贫乐道，把物质享受当成危及社会安定团结的洪水猛兽加以持续谴责了。谁都能想出来，若把公民的物质欲望无限制地刺激起来，又无法保证所有的人获得同等的满足机会，扩张的人欲就会转为内向，那时社会会处于何等可怕的状态，自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吊诡现象：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始野蛮性，中国经济在世界性金融海啸里将是最皮实、最抗震的，因此，中国经济绝无可能如草庵居士一直在预言的那样 “崩溃”。相反，我个人认为它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遭受的损失就算不是最小，也要比发达国家轻微。然而因为政治体制的野蛮腐恶性决定了它彻底缺乏“减压阀”和其他一切化解危机的设计，中国社会因而也就最缺乏对经济衰退打击的耐受力。从经济层面而言，华尔街打喷嚏，全世界就要害重伤风，而中国因其粗放性而顶多有点头疼脑热。然而从政治层面而言，华尔街打喷嚏，可能在中国社会引发地震。

形势的确十分严峻，据说光广东一省就有上万家出口企业倒闭，成千上万的民工失业返乡，国内学者指出，外出打工所得已占农民收入七成，这意味着农民收入骤减。除了农民工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也成了大问题。今年有 560 万大学生毕业，但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就业市场。这些都构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倘若经济状况再恶化下去，难免触发深重的社会危机。

北京已经敏感到了这危险，不惜斥重资救市，并决定实行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内需。然而这谈何容易！据路透社记者披露，中国家庭消费在 80 年代时曾占 GDP 近一半，去年却降为 35.3%，这是因为中国民众缺乏金融安全感，因此不能不把大部分收入存起来，准备花费在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上。所以，所谓“拉动内需”只能落实在基础设施建筑上，变成地方官的“面子工程”。除了创造有限的就业机会，它并不能有效地提升人民的消费力。

更糟糕的是，中央谋划的“产业结构调整”很可能加深社会危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公开向温家宝叫板，声称：“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发挥社会保障职能，妥善安置下岗失业工人，但决不能盲目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广东应对金融危机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要立足于科学发展，坚持摒弃高消耗、高污染项目，坚决不再回到传统发展老路上去。”“那种为了保速度而把本已淘汰的落后产能重扶上马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针对汪洋的公开抗命，北京《经济观察报》专门发表社论抨击，指出这不是个单纯的经济决策而是个政治决策：“这不仅是经济问题。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也是执政之本”。

我党执政以来，还从未见过这种诸侯公开驳斥朝廷、北京与地方公开论战的先例。它不仅表露了中央权威弱化到了何等地步，更提示拟议中的“经济结构转型”很可能变成官有企业趁机无情扫荡民有中小企业、独霸天下的恶变。倘若此，则势必为本来就严峻的就业危机雪上加霜，触发社会动荡。

实际上，社会动荡一直都在发生，只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介入，无法如“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罢工”、“二七罢工”一般获得相当规模罢了。但即使是纯粹自发的罢工，它也仍然呈现了不祥的燎原势头。据《万维网》披露，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蔓延到了湖南、广东、海南等地，此外还爆发了工人、教师甚至公安部门辅助工作人员的罢工活动。不难想象，当明年政府使尽浑身解数仍然无法“保八”时，社会动荡的规模会有多大。

其实杨佳事件已经再明白不过地宣示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危急的程度了。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滥杀无辜只会引起全社会异口同声的谴责，然而在中国杨佳却成了除暴安良的传奇英雄，不但受到海外异议人士的欢呼，而且竟然有许多国内知名人士诸如艾未未、茅于轼、杜光、于浩成、戴晴等人领头签发呼吁特赦他的公民建议书！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朝野的价值观已经二元背离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胡锦涛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批准处决杨佳，起到的实际作用只有一个：把杨佳做成了永生的草根英雄，用鬼话来说就是 martyrize 杨佳，为他实现了在作案前留下的心愿：“万古流芳”，让他的英雄事迹如水浒传奇一般，在草民中一代代流传下去。

然而要我党赦免杨佳是绝无可能的，杨佳代表的是对我党统治的公开挑战，我党岂能在这原则问题上退让，变相鼓励大众群起效法？他们深信的就是“退后一步就全完了”。不幸的是，社会也确实被他们改造成了这你死我活的烂样子。说起来我党也挺可怜的，完全成了杰佛逊说的那个倒霉蛋：死死地抓住了人民那饿狼不敢放手，直到力竭倒地。或许正如赵紫阳不幸而言中，中国已在 80 年代错过了政治改革的良机，无望再建成一个以和平手段化解社会危机的文明社会，在“钱道”玩不转之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只有靠赤裸裸的霸道来维持了。

当然我也多次指出过，“新”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是统治者相对于人民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现代科技不但使我党完全垄断了暴力手段，而且让它获得了空前的对民众的控制力。因此，暴力革命失去了可能性，随之也就失去了既往对统治者的威慑力——连拥有正规军的老蒋都不敢反攻大陆，杨佳的牛耳尖刀还能有什么希望？只要敢于并善于屠杀人民，我党就不会垮台。更何况党天下并非家天下，当国者并不必操心“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后事，只管图自己快活就是了。漫说国际国内都没有逼迫我党改革的压力，即使有，他们也不会放在心上。

因此，还是那句话：方今中国，改革无望，革命也无望，骚乱倒是大大有望，而明年可能就是个“骚乱年”。希望即将到来的动乱不要打破中共内部脆弱的权力平衡，触发大规模内讧，让中国陷入大灾难。

2008 年 12 月 24 日

当前的政改目标是化国家为“有规矩的土匪山寨”

《零八宪章》评论系列本已写完，却又看见网友转贴的所谓《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对《零八宪章》做出正式回应》，骨鲠在喉，不能不再来说几句多余的话。

我在跟帖中已经指出了，该文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证明了我指出的“《零八宪章》的悲剧意义在于其‘曲庸和寡’”：宪章罗列的一系列的“普世价值”，不过是文明社会的最起码共识，然而却竟然在中国成了惊世骇俗之言，不为政治各派接纳：“民主”革命派斥之为共党阴谋；毛左与“爱国”愤愤视为帝国主义分裂颠覆肢解中国的大阴谋；占知识分子大多数的“犬儒”们无动于衷；而自作聪明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们”如寒竹先生以及“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的记者们则认为那是孙文式的“体制外革命”。

这是何等悲剧！“曲庸”与“和寡”之间的强烈对比，不仅反映了今日中国与文明世界的巨大差距，更反映了中国人在过往一百年中倒退了有多远。一百年前的老祖宗还知道比起西方来，中国不过是个半开化国家，必须向文明世界学习，而今日中国变得比当年更野蛮百倍，却豪情万丈地俯视文明世界，顾盼自雄，真诚认定咱们的烂污野蛮制度比人家优越，以致宪章作者们不能不把西方主流价值观包上所谓“普世价值观”的糖衣，以照顾这种特殊国情。然而即使如此，就连据说是熟悉历史教训的浙江记者们，也引经据典地论证，谁若敢认同西方主流价值观，谁就是孙文式的祸国贼！

许多论者都注意到，《宪章》远离中国国情，缺乏可行性，然而竟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不是因为《宪章》太高超，而是国情太烂污腐恶。正因为举国昏昏若死，才反衬出了《宪章》作者们的“高标独调”。他们面对灭顶的愚昧狂潮，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信念，向世界证明 9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并不全是行尸走肉。可惜正因为国情民俗的烂污，就连这孤独的平庸无奇的呐喊，也注定要变成“天鹅之歌”式绝响，而这才是它最深刻、最令人断肠的悲剧意义所在。它在历史上的位置，也恰是这悲剧意义决定了的。

据浙江记者们说，百年历史已经证明，革命只能祸国，而改良才能救国，据说刘晓波是当代孙中山，而胡温才是康梁的继承人。前半截话倒是千真万

确，可笑的是后半截话，这些浑人竟然不会问自己一声：刘晓波辈的“革命”在哪里？胡温的“改良”又该向何处寻觅？ 89年以后，我党何时何地作过任何政治改良？《宪章》的目的不过是敦促中共进行政改，莫非连这也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

那么，中国到底有无改良必要？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应该是什么？这恐怕是每个改良主义者都得回答的问题吧？

我早就反复指出了，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咱们还不配享受的民主化，而是文明化。所谓政改，就是要逆转自辛亥以来的国家野蛮化的大趋势，废除“谁的拳头大谁有理”的“至尊潜规则”，建立朝野一体凛遵无违的明规则，实行国家政治生活文明化，将土匪山寨逐渐改造为文明国家。是否做到这点，就是野蛮与文明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拳治”的区别。

浙江记者们看到了革命在过往百年内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却看不到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革命引入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金钱、出美女，谁的拳头大谁是爷”的“狼羊律”，使得所谓“利益博弈”成了土匪式恃强抢夺，就此使国家成了永恒的乱邦危邦，“乱世” 与“治世”的区别只在于那危乱的显隐而已。而今日《宪章》作者之所以代表先进，胡温代表反动，也正在于前者呼吁结束暴力治国，化野蛮为文明，而后者择恶固执，坚持实行“枪杆子治国”的“狼羊律”。

回顾历史，这堕落的轨迹非常分明。晚清国人相对于今日国人的先进之处，正在于朝野一致认识到了西方宪政的先进，明白了文明国家必须是法治国家，而最大的法治就是实行宪政，必须建立一个朝野一致凛遵无违的明规则，用以规范和约束朝廷和臣民双方，让宪法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辛亥革命的千古之误，在于它腰斩了这良性进化，首先向国民演示了“枪杆子强过纸片子”，其次在于它在国家建立法律权威之前，便废除了皇家权威，使得枪杆子成了裁判一切政治分歧的唯一替代权威，国家分崩离析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即使如此，在孙文诸小丑发动的“二次革命”武装叛乱被荡平之后，老袁仍未抛弃宪政，他获得的权力都是《中华民国约法》赋予的。就连他后来称帝，也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制，而且严格履行了“立法手续”，起码做到了名实相副，就算是窃国，也是“有规矩的窃国”。继任的北洋军阀也在不同程度上

尽量尊重国会与《临时约法》，企图按文明规矩来。即使是手握实力的内阁总理段祺瑞与空心大总统黎元洪的“府院之争”，也曾按张国淦的建议“按规矩来”。就连布贩子曹锟贿选总统，其实也体现了对法律程序的尊重。只有孙文那天生的土匪暴徒，才会彻底无视法统，不但以巨额金钱收买议员南下，分裂国家，建立远远不足法定人数的“非常国会”，而且使用暴力毒打乃至暗杀手段，威迫议员“选举”他作“非常大总统”。

但即使是在国民党以党国取代民国，以所谓“训政”取代宪政之后，蒋介石还是听取了胡适的劝告，压下了胡汉民的反对，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明文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而“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委员名额以法律定之”，以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央政权必须由国民党包揽，而国民党的统治则通过由它指定的政府来实现。这虽然相对于民初是个倒退，但毕竟还是以明规则而非潜规则治国，并非挂羊头卖狗肉，可谓类似于水泊梁山的“有规矩的土匪山寨”。

等到中共上台，中国就彻底变成了“无规矩的土匪山寨”，完成了“名”与“实”的彻底背离，成了毫无明规则、只有潜规则的下三滥流氓国家。斯大林将他制定“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宪法” 的绝招传授给毛泽东，让后者仿照苏联榜样制定了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每句话都是弥天大谎。

这宪法沿袭到今日，便完全成了弱智笑话。我已经在本系列前文中说了，它和“斯大林宪法”的区别，在于其总纲之中竟然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些水火不相容的货色融为一炉，作为全民指导思想，在声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疯狂走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我看准确名称应该是“官家资本主义”，与朱元璋、洪秀全先后建立的“官有工商业”并无区别），使得党宪法从原来的“敢说不敢做”，变成了现在的“能说不能做”，彻底失去了一切可行性。

这才是最可怕的现实，最该革除的弊政，最起码的政改内容。如今国人奢谈“利益博弈”。没错，所谓政治，说到底就是利益博弈。然而同是博弈，文明人有文明人的博法，土匪有土匪的博法。哪怕就是真的赌场，也得有个规矩，若是以拳头为输赢的仲裁标准，赢了是我得，输了还是我得，那就连赌场都开不起来。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为各派势力提供了一个按统一规矩

进行和平博弈的平台。暴力革命之所以与民主化南辕北辙，恰在于它以暴力为唯一的规矩，使得和平博弈完全丧失了可能。

就算中国人发誓以民主为全民族大敌，起码也该制定个朝野一体凛遵的规矩出来吧？就算中国人对“法”的理解是“统治者对人民的单向管束”，丝毫没有约束政府的内容，那么，制定个“能说不能做”的“假规则”来管束全民，也只能导致实践中的无法无天，对党国毫无好处。这浅显道理，想来就是白痴也能理解吧？即使是从执政党的私利来说，真恶也要强过伪善，恶法强过无法，坏宪法强过假宪法（=无宪法），文革不是已经充分证明这点了么？若不是毛泽东以“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傲，敢于并善于打破一切党内外规矩，那么多党国元老又岂会惨死？

因此，“化无规矩的土匪山寨为有规矩的土匪山寨”，就是党国必须完成的最起码的政治改革。中共现在要做的，也就是向国民党的“训政”学习，仿照《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把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为反映真实国家权力结构与公民真实权利，具备起码的可操作性的真实法律。

具体的措施是：

一、删除总纲中那些弱智笑话，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拿下来，因为谁也没本事用那些互相冲突的主张指导自己，遑论治国。

二、删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以反映真实国情。我早在旧作中反复指出了，迄今中国实行的社会制度与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列变种在内）毫不相容，何况这规定使得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成了违宪地区。

三、删除“人民民主专政”那种丝毫不反映真实政治运作、具有浓厚土匪气息、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无从界定、更无从化为具体法律操作的邪说。

四、在宪法中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中共选出”的规定，此后即严格执行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规定的“议会主权制”（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国事咸决于议会，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实际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违宪作法。中共对国家的领导必须严格根据宪法规定，通过人大进行。

五、严格执行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款、第九十三条与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实行军队国家化，以全国人大为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机关，由人大选举任命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一切涉及军事的国策，并对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执行情况实行严格监督。

六、严格执行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实行司法独立，禁止各级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那个社会团体对司法独立的干扰与破坏。

七、制定详尽的新闻法，明细列出中共的一切忌讳，准确界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言论自由”，在此之后严格兑现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公民享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行舆论独立，取消党对舆论的管制。若有违反新闻法规定情事，须严格按法律办事，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裁决，严禁社会团体包括中共在内以及任何个人通过行政渠道干预。

八、在宪法中增订有关条例，在人大内部建立专职委员会，检察并审判政府以及一切政党的违宪行为。

如所周知，芦某乃是铁了心的反革命，上网来写下了大量反对暴力革命的文字，收在数十万言的《反革命书》文集中。我非但是个坚定不移的改良主义者，而且认定国家只能渐变，不能突变，政治改革的步骤不能严重脱离国民觉悟，目前中国能争取到的现实目标不是实行民主，而是实行开明专制。但和平演变不等于“和平恶变”，党国领导首先得表现出起码的改良意愿来，改良也才有发生的可能。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只知道一味反对暴力革命，却不去敦促中共改良，那国家就只能一天天烂下去，还能有什么希望？

以上诸条建议，非但不是“发动体制外的革命”的号召，甚至也不是要求民主化，只是要求社会文明化、契约化、党国专制的开明化。不完成这起码的改革，中国就永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流氓国家。只有从党国领导自己开始做起，建立起一个权责明确、既管束人民也管束政府的真正有效宪法来，国家也才能具备实行开明专制的起码前提。只有朝野都建立了明确的权责契约观念，都知道信守社会契约，中国才有望告别千年野蛮，自立于文明世界。

如果胡温连这最起码的改良措施都不愿、不敢或无力采取，那么中国就永远无望逃出乱治循环，目前取得的一切物质成就不但终将付诸东流，而且会使

得来日大乱更加可怕。晚清花费重金建立起来的新军没在外战中放过一枪，却成了内战主力，使得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切冷兵器内战相形失色，这悲剧未必不会在未来以更可怕的规模重演。如果民间动乱触发共党内讧，内讧导致内战甚至核内战，民族的大限也就到了。

2008 年 12 月 25 日

再谈恶法强过无法

前文贴出后，一位网友跟帖评论说：

> “模糊思维是个垃圾袋，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放，不会有相互冲突的问题，所以, 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放在一句话里，对模糊思维的中国人来说是 OK 的，是 PEACEFUL 的， 是 NO PROBLEM 的.。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把‘逻辑+实证’运用到政治问题上，（却把）挂羊头卖狗肉（当成） 是政治智慧，而不是思维病态。”

另一位网友认为那确实是政治智慧，他认为，将这些互相冲突的“理论”放在宪法总纲里，有助于实行社会多元化，避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容纳政治上各派和平共处，共存共荣。

我并不认为这么做能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原因我已经在《刀子》文中解释过了：

> “举国上下齐齐信奉‘狼羊律’，便彻底取消了政治改革的可能。须知建立民主国家的前提是建立法治国家，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是社会契约化，社会契约化的前提是朝野文明化，双方必须既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也有恪守协议的诚意与信义。”

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讲规矩，也就是是否实行法治，以法律而不是人或政府或社会团体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否严格实行法治，不但是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的区别，也是开明专制国家与野蛮专制国家的区别。因此，实行法治不但是建立民主国家的前提，也是建立开明专制的前提。做不到这点，则中国永远只能是个野蛮国家。你就是把共产党推倒了，也绝无可能建立起个文明政府来，遑论民主国家。

什么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就是最讲规矩，最讲信义，最明确签约各方的权力与责任的国家。它的整个运作机制就是全民都恪守社会契约，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百姓，都严格按照依据民意制定出来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法律办事。要让这种国家能够如意运转，根本前提就在于全民都具备高度的契约意识。这就叫契约社会。

可叹的是至今似乎没有多少人明白这简单道理，更看不出我之所以反对暴力革命，正是因为一切革命都与守法格格不入，都是对法律和权威的公开颠覆，其实是最有效的对全民野蛮化的训练，当全民都被革命卓有成效地化为无法无天的暴徒后，再想把社会建成讲规矩、守协议、知妥协的契约社会，便极度困难了。这就是为何中国过往百年中革命一次野蛮一次，最后人民彻底成了潜在的土匪的根本原因。

在这点上也显出了国共两党的区别。国民党以暴力夺权成功后，还制定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训政约法”，力图将中国改造为讲规矩的文明国家。而毛泽东则与历史上有过的一切造反派和革命乱党不同，在革命成功后并不想让国家转入正轨，而是将无法无天看成是必须永远保持的革命本色。若人民一旦变得安分守己，他便芒刺在背，觉得人民丧失了宝贵的革命热情，暮气沉沉了，要发动新的政治运动将他们刺激起来，恢复赤裸裸的兽性，据说这就叫“思想革命化”，其实也就是全民流氓土匪化。

由此不难看出，刻下中国最需要的政改，就是建立朝野的契约意识与守法观念，把中国逐渐改造为一个法治国家。而要做到这点，首先得从政府开始，树立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以它作为裁决一切政治冲突的标准，把中国建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宪政国家，让宪法取代共党、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暴力作为统治者，彻底结束“党大还是法大”的荒唐笑话。而要让中国变成宪政国家，首先必须修改宪法，使得它变成反映中国真实国情与真实政治结构、具备可操作性的真实法律。

这就是《山寨》文的主旨，我的意思是：既然卖狗肉，那就把狗头挂出来，哪怕是恶法，也要强过假法，因为后者只可能是无法。有部恶宪法，总比没有宪法要好得多。先拿这恶法规范朝野，建立它的权威，藉此养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守法意识，为建立法治国家铺下必备的社会软件，在此之后才谈得上进一步的改革，逐渐向民主社会过渡。

孙中山所谓“训政”，说到底应该是培养统治者与百姓的守法意识，建立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以法律取代个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只是这白痴太蠢笨，虽然喊出了那个口号，却不但搞勿灵清那到底该是什么内容，而且缘木求鱼，专门干相反的事，不知道君主立宪制才是唯一可行的训政之道，盖君威如同法律权威一样，乃是虚的精神权威，并不像党威与领袖威信那样，需要暴力

作后盾，因此在法律权威在全社会建立起来之前，乃是最好的过渡品。挟君威制定出来的“王法”用不着以赤裸裸的暴力作后盾，很容易就能在愚民中建立威信。这功效不是任何革命暴力可以起到的。

倘若无法用法律权威取代实在的暴力威慑，那中国社会就永远不可能从野蛮状态中脱出来。即使以最小的社会代价甚至是和平地推翻了共产党，那又便如何？无非是辛亥革命再来一遍罢了。中国可以再制定一部无比完美的宪法，但谁也不会执行，盖法律毫无权威，真正的权威还是枪杆子。于是在中共那最大的暴力权威垮台后，必然要出现以群暴易独暴的可怕局面，群雄并起，各以自己的枪杆子争做天下最大的权威。

执政党制定根本无法实行的假宪法，这种欺骗行为的确可以看成是有利于我党生存的“政治智慧”。的确，我党的生存前提从来就是欺骗。但时移世易，如今不比当年的辰光了。即使是从我党的角度来看，文明化也是生存前提。

我早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毛可以不讲规矩玩实力，邓也可以不讲规矩玩实力，但胡就不能这么做了，盖他的长处不在于实力而在于规矩。论实力，怎么也轮不到他来做皇帝。因此，他不能扬短避长，效法毛邓使用非法手段搞掉竞争对手，那样只会刺激他人仿效和他比赛实力，作法自毙，更何况这使得党永远有因内讧而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

所以，即使是为我党计，他也应该制定出个真实有效的有利于自己党章宪法来，处处强调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党带头慑服于党章宪法之下。这改革不但为国家民族必需，也为共党必需。党必须带头文明化，建立法律权威，在法律框架下进行权力斗争，在法律框架下解决朝野分歧。做不到这点，中国便永远只能是个毫无文明规矩的流氓国家，土匪山寨。

因此，共党的“政治智慧”，其实乃是误国害民害党的龟孙子兵法，它并不能起到整合所有政治势力的作用，反倒给毛左在未来发难、颠覆改革开放留下了充足借口。其实真正给我党构成致命危险的，不是自由知识分子，那些人的诉求根本得不到工农大众的真心拥护，而是毛左。光是毛留下的一系列极有针对性的教导，就足以让日后军内野心家利用来“吊民伐罪”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 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改革开放 30 年来，这段话一直日日夜夜地 haunt 着我，记得我曾在《张玉凤证言可信么》中讲过这心事，说我深信伟大领袖的洞察力，只希望这噩梦不要在我有生之年成真。王希哲闻言如获至宝，当即雀跃欢呼，似乎我的担忧为他增加了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也是笑话一则。

第一位网友说国人的模糊思维习惯使得他们看不出总纲的荒唐来，其实未必如此，是大众本能地知道宪法如我党的其他谎言一般，认不得真，它只反映了全民对宪法那“国家根本大法”的彻底无视，而中国人并不从来都如此，完全是我党全力推行凡几十年的“全民流氓化”系统工程结出的丰硕成果。

例如民初的政治文献包括《临时约法》在内，都是用半文不白的文字写的，按理说要比现代汉语模糊得多，但当时的政客们可一点都不含糊，对国家领袖是否违宪盯得非常之紧。例如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就是因为袁世凯违反了临时约法的规定，未经阁员副署便发表直隶都督任命。又如“大借款违宪”就是国民党反对袁世凯的主要借口，并成了孙黄发动“二次革命”武装叛乱的口实。此后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之争”，更是因为《临时约法》对总统与内阁的权责划分不明引起的，在争论中双方都以《临时约法》为依据，充分体现了对宪法的尊重。

然而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衔发布《公安六条》却赫然规定：

>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当时全国八亿人中竟然无一人问一声：第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何权利发布法律式的公告，令全民一体奉行？第二，这难道不是赤裸裸地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践踏？第三，所谓“依法惩办”，到底是“依”什么“法”？连部刑法都没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在我党领导下，中国在野蛮化、流氓化的道路上滑了多远。倘若时至今日还不结束这种龟孙子兵法，则中国永远无望变成一个文明国家。

至于第二位网友说的容纳毛左“咸与维新”，我认为多元化当然应该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基本原则，但这儿有两个问题：

第一，文明国家不可能包容对体制的颠覆者。如果毛主义者愿意像欧洲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以和平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不用暴力将自己的政纲强加在别人头上，则他们当然应该拥有自己的议会席位。但毛思想的灵魂就是暴力革命，处处反对调和、妥协、改良，与“议会道路”势不两立。如果他们这么做就是对毛思想的背叛，恐怕再不能称为毛主义者了。若他们不放弃毛的基本思想，则可以干的事就是上山下乡，武装工农，组织发动他们起来推翻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

第二，咸与维新的道路在民初实验过两次，第一次是袁世凯，最后以“二次革命”告终，第二次是段祺瑞，但南方革命军阀始终拒绝参与，形成事实上的南北朝。这教训是，光是一方有妥协意愿，那剃头挑子的另一头是热不起来的。

因此，我实在无法设想怎么能把从本质上反对宪政的毛分子纳入宪政，把本质上与任何一种宪法格格不入的毛思想采入宪法总纲。最合适的处理方法，就是根本不提这些烂事，事实上也没有哪个执政党有权利为国民制定指导思想。不提这些烂事，并不意味着堵死了毛左复辟毛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希望。他们完全可以在党内竞选（尽管上面已经说过了，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争取以合法手段掌握党权，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营，再建人民公社，再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再来一次大跃进，全民大战钢铁，再度实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再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再次发动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度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只要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来，我根本不在乎。

2008 年 12 月 26 日

含泪请求胡温走出恐惧[1]

这文字早就想写了，因为《零八宪章》反响寥寥，不免担心签署者难耐寂寞，急功近利，授我党以镇压把柄，招来不必要牺牲，又怕海外那干唯恐国内不乱的野心家们煽动撩拨之，引来我党镇压，使得刚刚有点松动的局面再度冻死，所以早就想写此文为我党做点心理治疗，庶几令领袖们心态稍微恢复正常。

前两天写《文明的优劣与种族的优劣》，我论证了中华文明是一种已基本被淘汰的劣等文明，而中华民族在心理素质上是一种劣等民族，其特点是因为疑神疑鬼，专门自残自伤，举世并无二例。该文贴出后，有的网友觉得"劣等民族"不恰当，建议改为"病态民族"，我觉得所见似有理，拟请政治局常委们圈阅后，发文公告全国，盖"劣等民族"容易给人一种"天生如此，无法可想"的印象，而"病态民族"毕竟还是有痊愈希望的。

在那文章里我指出，敝民族的国症，在精神病学上唤作 "妄想型人格障碍"，又译"偏执型人格障碍"，英文是 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它的特点是持续性偏执妄想，无所不在的猜疑以及普遍的不信任他人。患者缺乏自信，对外界反应过分敏感；对遭受的挫折和失败过分敏感；具有坚持记仇的倾向，拒绝原谅受过的侮辱、伤害或轻视；易于感到被人轻视；多疑，具有将他人中性或友好的行动误解为敌意或傲慢的扭曲感受的普遍倾向，常以警觉的目光去审视周围环境，从中寻找线索与迹象来证实自己的偏见或成见，专门以无根据的阴谋理论去解释身边乃至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把这当成用以想事并待人接物的世界观与人生方式。此外，患者还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具有过分的自我重要感，表现为一种坚持以自己为权威，好斗并顽固坚持偏离实际情形的个人"权利"的倾向。

[1] 因为写了《重释"民主恩赐"论》，我一直备受"民运人士"侮辱，说我"跪求明主恩赐"。为了成全他们，特地在此效余秋雨肉麻态，以此题目撩拨之。

只要在中文网上随便走一圈，立即就能看出此乃敝民族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无论左中右，是反共的，拥共的，不反不拥的，爱国的，卖国的，不爱不卖的，统统如此，概莫能外。这个诊断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判断。

但我那篇文章还没写完，所以还没来得及指出，这国症主要是我党领袖传染给全民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先害上了这毛病，然后动用国家宣传机器，把个人的荒诞妄想与病态反射当成宗教信条，强力灌注到全民头脑中，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这才造出十几亿疯子来。

但凡稍微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言行的同志，若是有点洞察力，立刻就能看出支配他老人家一切行为的最主要心理是恐惧。他给人最强烈的印象，便是对自己的事业彻底缺乏必胜信念，因而终生生活在恐惧中，被想象中的牛鬼蛇神团团围住，坚信自己的政权一定会被他们推翻，因此如故李慎之老说的那样，“以小民为敌国”，采取一切措施去揭露并消灭各种各样的假想敌。这种恐惧心态越老越甚，完成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泛化深化过程，亦即先从外围小民开始，越整越多，最后整到最内圈中去，把自己完全搞成了孤家寡人，唯一能够有三分信任的大概只有太太和侄子，顶多再加上个春桥和文元。

早在 50 年代，伟大领袖此疾就已经很严重了，1955 年，他在《人民被日报》上公布了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和日记，在编者按中危言耸听地说什么：

> “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便成了建“国”以后他心理疾患第一次大发作的牺牲品，并由此株连到无数“肃反”牺牲者头上去，虚构出来的危险又反过来吓坏了他。所谓“反右斗争”也如此：本来是他的心理疾患使得“鸣放”成了“引蛇出洞”，而引出来的“蛇”又吓坏了他，以致他修改了据说原来颇开明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亦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加上这些危言耸听的话：

> “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此后他又在全国宣传会议上强调：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60 年代他这疾患就更加严重，开始“由表及里”，锋芒对着自己人了：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到了 1964 年 6 月 8 日，形势便在病人眼中变得极度黑暗：

“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到起草《五一六通知》时，就连中央也出了赫鲁晓夫了：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到了 1966 年初，伟大领袖便开始担心政变，据敬爱的林副统帅在是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林副接着大谈古今中外政变史，证明伟大领袖并不是犯病，而是作了有充分历史现实依据的伟大战略部署，并向全党大声疾呼：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 16 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 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

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语，正常人一望即知乃是典型疯话，然而伟大领袖却非常赞赏，将之印发全党，作为文革动员的总纲领。毛还钦点陈伯达进驻《人民被日报》，由他亲自执笔，把林副那个讲话写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以疯子的被迫害妄想吹响了文革进军号。

只是毛的心思揣摩得最好、用得最活的林副统帅却万万没想到，他为了论证毛防范彭罗陆杨发动政变的正常性，引用了大量史事，却引起了病人更大的疑心，对敬爱的江阿姨说：

“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可见老人家真是病入膏肓：林副好心出来论证伟大领袖不是无缘无故害疑心病，反而成了专门研究古代政变史，因此居心叵测的罪证！“伴君如伴虎”的原因，乃在于那君王是个严重的精神病人。

其实但凡心智有三分正常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政权并不是那么容易推翻的。如果毛政权如此弱不禁风，那它早就在大饥荒中垮掉了。可就连那最危急的关头，老蒋也没敢反攻大陆，这还不够说明问题？老蒋再没用，好歹也控制了一个小国（解放区？）的资源，手下也有几十万雄兵吧？连他都不敢动弹，国内就算真有“阶级敌人”，无拳无勇，怎么个颠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法？

不幸的是，这些疯话和病态反射竟被当成最重要的宗教教义，以国家宣传机器强力灌入全民头脑，变成了全民用以想事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以“阶级斗争警惕性与革命坚定性”作为筛选标准提拔上去的我党干部就更是如此，因此导致了 1989 年毫无必要的大屠杀，使得民族元气遭受了几乎不可能完全修复的严重创伤。

如今还有人为那大屠杀辩护，认为它与文革一样，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却看不出那完全是邓小平、李鹏的妄想型人格失常大发作。早在 1986 年邓小平就因为 86 学运杀气腾腾地警告过：“我们不怕流血。”而李鹏

在宣布戒严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更是歇斯底里，仿佛世界末日已临，共产党马上就会被推翻一般，让人看了那电视真不知道今夕何夕，斯人何人，不知道是哪个疯人院里跑出来的，怎么又会当上大国宰相。

说到底，我党从上台那天起就不曾正常过，时时处处以己度人，始终把已被彻底原子化并被编入严密监控网络的人民，看成是当年挖空心思颠覆国府的共产党人。据说 70 年代末闹“西单民主墙”那阵子，陈云坚决反对把言论自由恩赐给人民，说当初共产党就是利用民国国民享有的高度言论自由推翻蒋介石的，所以，共产党如果这么做，就是自取灭亡。

这消息是否可靠当然无从确定，但不管陈云是否说过此话，它的确是我党的行动指南。我党的基本假设就是“退一步全完了”，决不能把它剥夺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归还给人民，否则必然引发链式反应，最后的结局就是共党被推翻，全国陷入大乱。这不但是我党的坚定信条，而且居然成了若干“自由知识分子”的共识。这些同志连起码的人类常识都没有，陈云说的当然是事实：我党的确把“民主自由”当成了颠覆国府的巧妙手段。但只有蠢人才会以为肚子饱了，乃是因为吃下的最后一片饼干。

我早就反复教育过那群革命壮士们了，要以革命颠覆一个政权，先得有我党的“三大法宝”，亦即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纪律如钢的列宁党，拥有一支强大武力，还得拥有苏联那样的大后方。如今无论是国内外，哪有这些名堂？我党不但控制了一切资源，垄断了所有暴力手段，而且如今在世界上也算是个军事强国了。就连老美都不敢去打，谁还能有本事推翻之？就靠何清涟女士呼唤的杨佳的牛耳尖刀，大泽乡的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这能是正常人说出来的话么？

可惜不但朝廷不正常，在野的反对派也不正常，说是没有革命的威胁，既得利益集团又岂会让步？

可他们就不会想想，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基辛格在《核武器和对外政策》中说：“只有在被威胁者相信威胁者有决心也有能力将威胁付诸实施时，威胁才会奏效。”这话我反复引用过，用来教育我党停止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吓，因为人家不相信我党真敢这么干，空洞的威胁只会适得其反，帮阿扁拉选票，却不料在野革命家之蠢也和我党不相上下。

其实这事明摆着，你要用革命威胁我党，起码得有干革命的可能吧？请问您的“三大法宝”在哪儿啊？口里没有毒牙，却在印堂上贴上“蝮蛇”字样，去撩拨本来就疑神疑鬼、以为党国危在旦夕的疯子，那还能有好事？柴玲那疯婆娘当年拒绝妥协，胡说什么：“现在只有人民起来和那法西斯政府较量了……。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哭科）。”明眼人一望即知，这完全是在机械背诵党电影上的台词。她既无相应计划，更无实际行动，其实连自己都不相信形势真有那么严重，无非是以此耸动国外视听罢了。请问，此类梦话吓住了我党没有？逼着我党让步了没有？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我党以及屠杀的辩护者们用来证明“不杀政府就会垮台”。

总而言之，对朝廷，我的劝告是，迅速走出恐惧，抛弃那“退一步就全完了”的疯子假设，恢复正常心态，只有心态正常才能恢复正常理智，实行理性治国。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治此国症，全靠敬爱的胡温以身作则，先己后人，实行“情为民所系，病为民所医”，治好自己后再垂范全民，推向全国，蔚成风气，则敝民族庶几有望焉。

不容否认，因为我党顽固拒绝政改（“折腾”？），社会危机积累到今日已经极度严重，更因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所谓“群体事件”发作必然越来越频繁。但只要我党不窝里反起来，则哪怕再乱党天下也垮不了，用不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动不动过度反应，连国内学者发起签署《零八宪章》那种绝对无害，甚至也不能引起公众注意的事，都要如临大敌，让人笑掉大牙。

我党须知，既然是执政党，与人民冲突就是份内事。漫说是靠枪杆子坐天下的土匪党，就是西方民选政府也有这问题。若我党被恐惧心理攫住，坚信“退一步就全完了”，只知道以铁腕镇压之不变去应万变，矛盾就会越积越深，最终酿成无法解决的社会冲突。若是用妄想型人格失常的思维定式去“抓阶级敌人”，把维护自己基本权益的民众当成蓄意推翻共党的政治势力，加以疯狂镇压，那就更是只会雪上加霜。

我早在旧作中反复指出，即使是我党彻底失去了民心，只要内部不乱，紧握枪杆子，则也不可能垮台，完全不必自惊自吓，因病态恐惧而施暴政。何况现在国内的老百姓已经是够理性、够通情达理的了，大多数人都不愿国家陷入动乱，我党的恐惧实在没有来由。建议政治局印发《南方周末》前段对单光鼐先生的采访。单先生在分析了近年的群体事件后指出：

> “这些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大都没有既定的预谋，矛头也大多是指向企业、地方权势阶层和地方政府的不当之处，没有指向中央政府，更很少质疑执政党的领导权威。”

的确如此，老百姓是活人，有自己的权益要维护，此乃天下最自然不过、最正当的行为。只有疯子才会把这种正常行为当成是颠覆政府的行为，动辄宣布“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企图颠覆国家政权”，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如此缺乏自信，连我这局外人都忍不住臊得慌。

其实胡温若不是那么蠢，就该看出，我党若想长期平安执政，光靠革命两手是不行的，首先得拿掉那个“金盾”，让百姓的怨气有个溢洪道。当年英国独抗纳粹，在国家的生死关头不得不实行新闻检查，以免失败主义思潮泛滥，但人家仍然知道必须让民众发泄怨气，为此组织了一批“秀才”，创作了各种各样讽刺政府的笑话，再让民间艺人到酒吧中去演出。如此则既能使百姓因艰难的战时生活产生的怨气有了个出口，又不至于影响全国士气。这种大智慧，请问中国人有么？

何况在互联网时代，想把国家做成毛式密封罐头已无可能。现在国内网上其实已经很开放了，什么言论都有，请问我党的统治是否动摇了丝毫？怕什么怕涅？真 TND 狗肉上不了席面，便再传几代，烧成灰也脱不了那窃国穷措大模样！而且还一代不如一代，敬爱的江总当政时，对互联网还没有胡紧套管得严，出国访问遇到示威者喊口号还不失政治家气度，哪像温家宝那小妇样！让人扔了个鞋子就骂“卑鄙”，而且还是在剑桥骂的！让我这局外人都忍不住为政府臊得慌。

记得《燕山夜话》上有篇《放下即是实地》，说有个盲人过桥，一脚踩空掉了下去，赶快死死地抓住桥梁，但又没法爬上去，因此狼狈万状。有人路过看见，便大叫曰：放手！放手！放下即是实地！那盲人不信，仍然死死地抓住桥梁，直到力竭掉了下去，这才发现下面是干涸的河床，离开他的脚还不到半尺。

这就是我党的绝妙画像。如果不放手，死死抓住“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以为那就是定海神针，则社会危机只会被储蓄起来，日甚一日，最后当天灾人祸降临、党内狗咬狗大规模爆发时便来个总爆发。政府及早放手，结束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国家紧急状态”，从社会集团利害冲突中拔出来，扮演

比较超脱的角色，才是常态国家的治国之道。现在国内有人主张建立独立于政府、超脱于政治的第三方公民调解机构，我看很值得研究试行。

更重要的当然还是说过几万次的老话：只有实行舆论独立，司法独立，党国才能有点痊愈希望，否则就算我党不被推翻，百姓迟早也要十停被毒死九停，剩下来的那一停还全都有后遗症。

我对在野异议人士（不包括那些毛共余孽）的建议是，必须牢牢记住我党患有严重心理疾障这个最大的国情，对精神病患者要心怀慈悲，处处避免刺激患者。对宪章签署者们来说，必须耐得住寂寞。请记住，一个愚昧至极的国家是不可能改造于旦夕的，只能滴水穿石，不问收获，但事耕耘。《零八宪章》在当前只可能是个 pure gesture，只能是荒野里的孤独呼喊，其唯一的意义就是留在历史上，让几代后的后人感念。千万不要受国外那群不怀好意、唯恐共党不杀人的毛共余孽挑唆，千万不要理睬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丑类，授我党以镇压借口，使诸位的努力反而给政局打上新的死结。

含泪请求胡温约束部下，停止出乖露丑

刚才拜读了《零八宪章》签署人"波斯小昭"的《小昭"喝茶"第一回》，惊喜交加，爱不忍释，来回看了足足七八遍，深为国内当代小青年的智力、见识与勇气折服，更由衷怜悯那些奉命与小昭"谈话"的皮夹克们，忍不住要再来劝劝胡温二位，趁早结束这种蠢事丑事臭事。

两位须牢牢记住的第一个简单事实是，两位不过是个 50-60 年代的积极分子，大脑经过我党几十年的偏枯炮制，身居毛共统治的最严重的智能受害者之列，因此不但彻底缺乏起码的文明常识，而且连如今的小青年是什么水平都茫然无知，更不知道我党的教义早已破产，根本就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理论去和现代青年精英较量。若连藏拙遮丑之道都不懂，要逼部下去跟其见识根本不是尔等可以梦见的精英们"谈话"，那就必然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自讨苦吃，只能起到出乖露丑的作用，什么鸟意思都没有。

两位须牢牢记住的第二个简单事实是，贵党的最大困境，就是无法从理论上驳倒"普世价值观"，甚至连这么做都不敢，还要被迫把其中的部分内容写在宪法总纲里。例如"普世价值观"最起码的一条，就是小昭指出的"主权在民，公权民授"，两位或是任何一位党内党外理论家（包括在贵党头牌理论刊物上发表政论的樊弓教授）敢撰文反驳么？连这条都做不到，请问诸位究竟有何道义理由镇压零八宪章运动？

小昭和那位皮夹克的交锋已经将这点揭示得昭如日月了：

> "'我就想要选票，真正的选票。'我接着说，'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国民的，我们有权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意或反驳别人的观点。政府应该是为民众服务的，公权应该来自民授。'"

而皮夹克只能这么回答：

> "这些话都没有错，我也赞同民主的呀。但是我们不能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现在中国的现实不是那样，你

既然生活在这个现实中，就要遵守现实的游戏规则，如果你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对你没有好处。”

换两位去，能有别样答案么？两位敢说这主张是错误的，这要求不合理、不合法么？既然不敢说，那还能给人家罗织什么罪名？公安局还有什么法律依据进行这种“谈话”？剩下来能做的，也就只有像那位皮夹克一样，指责对方违反了游戏规则不是？

但小昭马上就作出了响亮回答：

“我没违反你们的游戏规则。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两大原则，第一不违反国家法律，第二不违反社会公德。我以在 08 上签名的形式来表达对某种观点的同意，这是我的权利。”

着啊！诸位公开的游戏规则，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么？难道《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不是严格按照该规则规定，行使它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言论自由？请问这又触犯了刑法的哪一条？

这一点不但那皮夹克不敢否认，而且还说出了真话：

“你是有这个权利。但是 08 宪章的事情很严重，不是你想像的只是一个观点的问题。政府已经定性了，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的政治事件。”

所以，诸位的所谓“游戏规则”，乃是背离宪法、绝对不敢公诸于世、只能偷偷摸摸实行的“潜规则”。这“政府已经定性”就是最大的笑话。

任何一个非白痴的文明人都知道，政府乃是行政机构，根本无权撇开司法机构给某个社会活动定性，零八宪章运动是什么性质，犯不犯法，须由司法系统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作出判断，轮得到政府越权非法“定性”，并指挥公安机关骚扰迫害守法公民么？这好像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吧？请问其中有哪一条向中共中央那社会团体、国务院那政府机构授予了这种权力？某位司法部门的头头前些天才信誓旦旦地对西方媒体说，中国的司法机构是独立的，两位既然敢违反宪法、越过司法机构、践踏司法程序、通过黑箱操作，给守法公民胡乱“定性”，为何不敢公开出来否认那个官员的证言，告诉世界，中国的司法并不独立，决不受宪法约束，而是只听两位的任意指挥？

更何况那“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及“定性”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用语，根本不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文明用语，从不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任何法律。而贵党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决议就已宣布停止“阶级斗争”，难道两位胆敢背叛那决议，再度在中华大地上兴起阶级斗争冤狱？

这的确是如假包换的冤狱，请看那位皮夹克的论证：

> “08 宪章说要实行多党制，这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它要实行三权分立，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原来，《零八宪章》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它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种文革式罗织入罪的拙劣手段当年可能有效，如今就连个小女孩都无法“忽悠”了，人家答得清清楚楚：

> “‘个体的公民不可能违宪，只有国家机关才能违宪。徐友渔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小昭后注：也许我的记忆有误，以前看过一篇关于‘违宪主体’的文章，忘记是不是徐友渔写的了。）
>
> ‘而且，’我补充道，‘《08 宪章》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仅仅是一种倡导，提出一些主张。它不是宪法。宪 法的修改是有一定程序的，要经过全国人大超过 2/3 的代表同意才可以修改的。’
>
> 谁要是把《08 宪 章》当成了宪法，那肯定脑子进水了，我深表同情。”

的确，除了脑子进水的不幸伤残者，谁都能明白，《零八宪章》不过是一群公民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提出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那是“言”而不是“行”，世上没有以言治罪的文明国家。真正以行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是那个毫无权力、毫无能量的弱势群体，而是批准开办三资企业、复活私有制的“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将国有企业大量赠送给私人（美其名曰“改制”）的朱镕基，是违反马列原教旨允许资本家入党的党中央，是将大批国民财富卷逃到西方的党国高官。两位怎么不敢去法办那些名副其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却要去捏毫无抵抗能力的软柿子？

更何况如果公民提政改建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贵党在作此“定性”前，起码得先制定个“言论自由法”，明文规定“凡是胆敢建言改革既有

社会制度的公民一律作为犯罪处理”，并具体规定刑期，这才能执法有据吧？难道两位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连这起码的文明常识都不懂？

那两位秘密警察理屈词穷，只能使出最后一招来，说《零八宪章》是刘晓波起草的，而刘晓波不但是“六四黑手”，还与西方反华势力有勾结，因此之故，哪怕《零八宪章》毫无反党反社会主义内容（NND，典型的模糊思维，那“反”到底如何界定？是言论还是行动？该翻译成什么准确严密的法律用语？反对党的九大政治报告算不算反党？反对林副主席呢？“党”到底是什么东西？由谁代表？是不是“反党”，该由谁说了算？是不是“谁把持了党中央谁就是党”？就算如此吧，那前后把持党中央的人如果政策水火不容时又该听谁的？到底是打倒邓小平的毛泽东是党，还是在毛死后全面翻案的邓小平是党？），只要是他起草的，也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纲领”，而所有的签署者当然也就成了从犯。

请两位看看，这种冤狱炮制法，是否弱智到了出格的地步？就算刘晓波真是两位说的那种人吧（虚拟语气，纯属假设），难道这就是给《零八宪章》及其签署者们的“定性”依据？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经历、职业、人格等等究竟有何鸟相干？莫非正确的话语从“有前科的罪犯”嘴里说出来，就是犯罪话语，别人就不能认同，否则便成了罪犯？这像是正常成年人的逻辑么？敢情党国混到今天，还要坚持以人株连言论，更株连认同那言论的其他人？两位身为世界第三大国（地理大国以及经济大国）的最高领袖，竟然指使部下堂而皇之闹出这种笑话来，让我这民族自尊心超强的海外赤佬的脸往哪儿摆？

小昭虽然指出了公民只可能触犯刑律，不存在什么违宪问题，盖宪法本来就是为约束政府而制定的，而且也只有国家机构（含司法机构）有违宪能力，却没有告诉那两位文明盲，是否违宪也不是他们甚至是胡温可以说了算的。在西方，国家机构是否违宪，须由宪法法院判决。在中国则可由人大常委会议决。她更忘记向那两位秘密警察指出，作为受害者，她有充分权利认定，她和其他人遭到的非法骚扰就是司法机构的严重违宪行为。

据此，本人在此建议，人大常委会立即调查各地公安部门非法迫害骚扰签署《零八宪章》的守法公民们的严重违宪行为，并将调查与处理结果向全国人民通报。

胡温两位必须牢牢记住的第三个简单事实是，因为深受党文化毒害，所以两位以及同僚们的智力比较低下，从不知道在作出某个决定之前，必须先在内部论证一下“必要性”与“可行性”，否则就只能干出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的惊天动地的蠢事来。这次对《零八宪章》的镇压就是最新演示。

先说必要性。诸位蠢到看不出来，《零八宪章》不过是集中列举了“普世价值观”，为国民指出了一个远期努力前景，并不是什么行动纲领，毫无煽情话语，完全是一个原则性的冷静的理智的东西。正如小昭所说：

> “它对我而言太简单了，很多东西本来就存在于我的脑子里。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都是网上很多人说过的，而且有些内容我们宪法里面本 来就有的。总之我觉得，08宪章的内容是陈旧的，都是大家讨论过无数遍的；但它把这些内容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倡导性的文件公开发布，无论是谁，只要你同意它的主张，都可以签名，这种形式是新的。”

所以，它的出现与存在绝对不会引起什么社会动乱，只有民意调查的意义，唯一的作用就是看看中国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人认同这些原则，跟诸位入骨的担忧有什么鸟相干？再说，它如果有什么感召力，也只可能是对知识分子，眼下国内知识分子早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奉行实用主义的“犬儒”。两位就是批准《人民被日报》刊登该文件，并组织各单位学习，我也敢断言大众毫无兴趣，有什么必要去镇压这种毫无危害的理性文字呢？难道两位玩弄了百姓一世，至今还不知道愚民只有肾上腺，只会被煽情的感性口号“雷倒”，对冷冰冰的理智话语毫无兴趣？

再说可行性。两位怎么就会蠢到不先问一声自己：我这么干，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起到什么作用，能否起到预期效果？

如果是毛泽东当国，他当然不必问这些问题，因为他口含天宪，为所欲为，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将来也照样有理。漫说在他治下绝不会有人敢搞此类活动，就算是真有，统统抓起来毙了就是了，哪还跟你讲什么违宪不违宪，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拿出《宪法》来自卫都毫无用处不是？

可惜啊，今非昔比，改革开放极大地弱化了我党对百姓的控制力，我党已是不良不娼，良不足以作文明人，娼不足以作毛泽东。这就是中国眼下的国情，两位切切不可忘记，因此，这一问便是省不得也，哥哥！

若这么一问，则不必待出乖露丑而后果立知。诸位指令的这种“喝茶”活动，无非是要达到震慑签署者的目的，最好能诱导出个悔过启事来，也就是当年安子文等人在国民党报纸上刊登的“子文等因年幼无知”之类的东西，是也不是？

可惜就算真达到这目的，那也什么鸟意思都没有。盖两位面临的是个两难：若不痛下杀手，杀一儆百，则绝对不会起到震慑作用；但若痛下杀手，则必然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弹，两位断断不敢。形格势禁之下，两位也就只能不良不娼，不痛不痒地来这么一下，却蠢到看不出这非但起不到震慑作用，而且只能在公众媒体上充分暴露我党的光辉形象，让党国官员出来扮演党电影上那些愚蠢的国民党官员，被机智勇敢的革命志士驳得体无完肤。

的确，那位“皮夹克”扮演得炉火纯青，我看该得“百花奖”或是“金鸡奖”：

> “‘你这样做是很幼稚的，签个名就能改变什么吗？一点用处都没有，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看来你在政治上还不成熟。’皮夹克说。
>
> ‘政治上不成熟’，这个句子我从小在小说里看惯了，没想过有一天会放到我自己身上。嗯，按照党国的标准，我确实政治上不成熟，而且永远不会成熟。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如果谁‘政治上成熟’了，基本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人性，变成了一台冷血机器。”

据党神话，当年列宁在喀山闹学运时，逮捕他的那个警官劝告道：“小伙子，你这是干嘛呢？要知道，你面前是一堵墙啊！”列宁毅然答道：“是的，是一堵墙，不过是一堵朽墙，一推就会倒的。”

请问这对话与皮夹克和小昭的有何不同？不都是劝告对方：“我们也知道这制度不合理，你是对的。不过反正这现状谁也改变不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同流合污算了。”

难道党国竟然堕落到必须用个人利害去威胁劝导青年放弃自己的信仰的地步了么？但如果不是这么做，请问他们还能怎样从道义上驳倒《零八宪章》，让签署者心悦诚服地认识到自己确实错了，党是对的？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因此，说来说去又绕回到我提醒两位的第二个事实：两位最大的苦恼，乃是名不正言不顺，名必不可言，言必不可行，说的决不敢是做的，做的决不会是说的。不敢否认“主权在民，公权民授”，要伪装成“人民政府”，却又舍不得放弃党天下，实行“谁的拳头大谁有理”的真实“隐性宪法”，但哪怕是在私下审判中，党国官员也决不敢把这见不得人的东西亮出来，这还能有什么说服争取青年的希望？

既然不能说服，那就只有压服。可我早就在前面告诉诸位了，民诚畏死，大可以死惧之。这种事，摊在毛泽东手上不过是小菜一碟：把刘晓波割断气管枪毙了，把其他所有人全部抓起来，无限期劳改，则大众必然噤若寒蝉。可惜今日之域中再不是昔日鬼魅世界，这种事，便借两位一个胆子也断断不敢做出来。既无法说服，也无法压服，当然唯一的明智办法便是干脆搁置不问。不此之图，却要去不痛不痒地骚扰志士们，那除了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出乖露丑之外，还能有什么好事？

2009 年 3 月 19 日

西方已经丧失对国人的吸引力

一、中国确实出现了难以思议的经济奇迹

2000 年以前，我几乎每年都回国，但自 2001 年马悲鸣在网上揭了我的真身后，我就再没回过国，至今已有 9 年。但我太太还是经常回去。再加上我至今还与当年的工人哥们保持联系，所以对国内情况还有点支离破碎的了解。

据我 2000 年的现场观察，国人生活虽然比我出国时是极大地改善了，但以西方标准来看还算比较贫困。可就在过去五六年里突然上了个大台阶，论衣、住、行，白领阶层的平均生活水准就算还赶不上美国，恐怕已经赶上甚至超过欧洲的中等国家了。食就更不用说了，花样多极，价廉物美，唯一的缺陷就是有中毒危险。

因为历史原因，我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大学同学都算高薪吧，年薪估计在 30 万以上，都有车有房，而且还不是一所房产，居住面积都很大，最小也是百多平米，大概高于欧洲平均水平，低于美国水平，装修豪华。中学同学和工人兄弟丐帮居多，但也不是活不下去。只要不生病，吃低保也能度日，生活水平比 80 年代的平均水平高多了。退休工人一般都还能保证温饱，甚至可以到近处旅游。比较苦的是还没来得及退休，又因“改制”落入资本家（也就是原来的厂长）手里的那些穷兄弟（朱镕基干的烂事），据说每月 400 多元，比较水深火热一些。但同是工人，待遇也不一样，若在国家保下来的所谓重点“国企”中，则即使是工人收入也可以很高，照样买车买房。

前些天我才在网上看到一则国内新闻，谓云南某县一个恶警倒车时撞了一家人的车，双方吵起来，那警察就开枪把对方打死了。这则消息引我注意的是，那是云南那个落后省份的一个县城（或地辖市吧，记不清了），打死的不过是个普通职工，可人家也有私车了。连那不毛之地都如此，内地还用说么？

中国的腾飞，光从港人的态度变化都能看出来。港人多是从大陆逃过去的，原来非常鄙视大陆“表叔”。90 年代初，港人怕回归怕进骨髓里去。但这些年态度完全变了。据我认识的一位港人说，他们不但不再歧视大陆“表

叔”，而且奉承都还来不及，盖表叔们一个个财大气粗，挥金如土，构成了港人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之故，学普通话竟然成了时髦。

农村当然不如城市，但比起当年来也是不可同年而语。除了靠经济作物、副业致富外，农村的主要收入似乎是来自外出打工，因此可能会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但这只增加了社会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摧毁国民经济。

总之，中国确实出现了 20 年前甚至 10 年前不敢想象的经济奇迹，虽然贫富悬殊跃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全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套马克思的话来说，即使是贫民，也是“相对贫困化”而非“绝对贫困化”。盼望中国爆发革命的同志可以死心了。

二、经济奇迹出现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很简单：外国资本＋苦吃苦做＋贱卖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贱卖人力资源与苦吃苦做有重合，但问题不是太大）。中国人乃是天下第一能苦吃苦做、勤俭发家的民族。过去之所以没发，乃是要么战乱不停没法发，要么政府一直不准发。等到政府稍微松绑，又处在祥和的国际环境下，大量的国际资本潮水般涌进来，四美俱，二难并，再不发就没天理了。

中国的发家史更加反衬出毛共乃至传统帝王的可恨。我早在 90 年代就说过了：中国乃是一匹神骏，之所以一穷二白，全是因为历代统治者把那千里马死死地捆住了。一旦放开（还不是完全放开），立刻就创造出举世瞩目（那阵还没震惊世界涅）的经济奇迹来。要知道这点其实不用等到改革开放，看看那些南洋华侨老前辈就够了，人家上岸那阵谁不是两手空空？到后来一个个成了巨富，甚至控制了所在国的经济命脉，以致招来排华浪潮。

有的同志说中国发起来是靠掠夺资源，此话不假。可光是掠夺资源，不靠民工苦吃苦做，能发起来么？印度的环境破坏可能不亚于中国，他们也发了，但到中国的程度了么？其实，所谓发展经济，不就是把资源化为财富么？所谓“掠夺”该怎么定量判断？我看“廉价出卖资源”恐怕还更准确些。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要有点起码的良心，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可以收场了。没有帝国主义发动的“货币战争”与“经济侵

略”，国人就是再能苦吃苦做，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寨的“人造平原”和林县的“红旗渠”还摆在那里呢。

三、生态危机

经济起飞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不容否认的。我不完全同意老金将之与欧洲工业化时代相类比。这里有几个区别：

第一，欧洲当年破坏生态是出于无知，而咱们可不能说这话，早有足够的前车之鉴了。破坏生态是出于政治考虑，亦即以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来维持国家安定。比起政权存亡来，生态不值一提。

第二，人家破坏生态是靠一小撮资本家的分散的个人努力，咱们是靠“举国体制”，两者的广度、深度与力度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人家有民主制度提供的改错机制，当多数百姓认识到祸害时就能立法保护环境，以重罚杜绝污染，整治环境，让青山复绿，河水变清（圣人出的征兆？），而咱们可没这指望，就算是统治者有了足够环保意识，如今极度弱化的中央权威也遏制不住诸侯乃至百姓的疯狂逐利。再说经济发展已经成了我党的生命线，幸福线，在百姓习惯了高消费后，要关掉大批污染严重的企业，势必造成社会动荡。

第四，东西方对生命价值与生活品质的要求不同，人家的污染远远没达到咱们的水平便朝野哗然，而咱们的耐受力要高得多，举国尽是毒物照吃不误。

第五，人家的人口压力没这么大，过去的污染不是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进行的，与咱们是两回事。

因此，即使从现在开始厉行整治，咱们造成的生态破坏也恐怕难以完全修复。东西德合并后，西德关闭了原东德的所有工厂，斥重金整治环境。东德就那么大点，西德还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人家还说几十年都无法恢复原样，何况是中国？

不过人民愿意，诸位管得着么？连食物都变成高风险物品，跟恐怖分子携带的钉子炸弹也差不多了，进食活动都成了俄国左轮枪游戏[1]一般的冒险行径，敢问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如此？国人还不是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区区生态又何足道哉？

四、潜在的资源危机

中国历来是浪费大国，资源小国，那点极有限的资源迟早要卖完是不用说的。不过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连真正地大物博的美国都有此潜在危机。我已经说过了，此乃美国模式决定的远忧。中国人那么多，根本不适合走美式消费主义的道路。如果人均车数达到美国水平，真无法想象上哪儿去找足够的石油来喂饱 13 亿小车。在国人习惯了高消费之后，好日子难乎为继将是政府最大的噩梦。不过要试图阻止国人在美国人开辟的消费主义大道上迅跑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个无解的难题。

五、西方业已失去对国人的吸引力

自辛亥乱党开始，历时一个多世纪的普遍误会，便是中国人渴求民主。天下再没比这离真相更遥远的神话了。国人从来就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从未渴求过什么民主。举国无几人能有“权利”概念，离开这还有什么民主可言？

过去国人对西方充满艳羡，并不是如我辈一般，是出自理解的钦羡，而是羡慕人家钱多，日子好过，错把这当成了民主制度的产物。我早就在一系列旧作里澄清过这误会了，反复告诉大家致富靠的是走资，与民主制度没什么直接关系。民主制度只是提供了一个各阶层、各集团和平分赃的谈判桌，能够化解社会危机，使得社会长治久安。如此而已。

正因为是错相思，因此当国人发现在烂污制度下也能迅速发财，甚至比“老欧洲”还富时，当然就要把当初的艳羡化为鄙视。不仅如此，多数国人对西方主流价值观（亦即所谓“普世价值观”）的拒绝也是真诚的，在可预见的

[1] 俄国左轮枪游戏是老毛子发明的野蛮游戏：在左轮枪弹仓里只装一粒子弹，转动左轮后待其停下来后，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这跟轮盘赌一样，不过赌的是自己的性命：赌徒有 1/6 的机会丧生。

将来没有认同的希望。这原因我也早说过了：国人的幸福要素与鬼子不一样，西方生活方式并不能满足国人的幸福要求。

那么，国人的幸福要素是什么？我已经在《“霸道乐土”就是咱们的“太平盛世”》中讲过了：

“咱们的‘理想国’包括如下要素：

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不一定是现代极权政府）。

二、政府以“霸道”治国（亦即“强化 X 产阶级专政”），不仅扫荡了一切反对势力，实现了国内持久和平，而且不受西方司法程序以及人权保障的约束，铁腕镇压扫除土匪，严惩刑事犯罪，强化社会治安，甚至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果敢屠民，造出“夜不必闭户，道不敢拾遗”的良好社会秩序（据说日本人当初在台湾抓住小偷就枪毙，真个实现了“道不拾遗”）。

三、政府穷兵黩武，建立傲视全球的武装力量，重建“犯汉天威，虽远必诛”的国威；强力动用自然资源与民力，建设“为国增光”的重大面子工程，使得全民觉得无比熨贴。

四、国民生产总值、科技发明以及文化事业在统计数字上居于世界前茅。

五、政府搜刮人民的力度再大也没关系，但官员必须廉洁，刮钱必须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古训。

六、百姓能吃饱肚子，以便鼓腹而歌，歌颂唐虞盛世。”

这当然是所谓“最高纲领”，并非最低期望值。因此，即使社会治安一塌糊涂、贪腐严重也没太大关系。这两条从来是咱们的生活方式。除了极短的例外时段，不能想象没有土匪的中国，更不能想象没有贪官污吏的朝代。但若政府做不到第二条规定的果敢屠民，就会被人民看不起。说白了，“一个不敢屠杀百姓的政府在中国人民眼中就是该备受鄙视的懦弱政府。”

这些幸福构成要件，与所谓“普世价值观”能捏到一块去么？You tell me.

除了幸福观不同外，国人的荣辱观和其他价值观也与西方格格不入，这也是讲过多次的老话了，最主要的有两条：

第一，把不择手段谋求成功的龟孙子兵法看成大智慧，把敢于并善于打破游戏规则、“出奇制胜”的烂仔看成是大英雄。与西方赖以立国的诚信与契约精神格格不入。痞子蔡不过是最新表演罢了，这优秀传统并不自今日始，也不

自 1949 年始。比起国父孙中山先生来，痞子蔡不过是小菜一碟，他搅的不过是个拍卖会罢了，国父同志搅的可是一个国家，然而至今国人对国父仍然颂声不绝。

第二，对权势的崇拜、羡慕与趋附如水之就下，已经构成了国民的本能，国民天然排斥“所有的人都生而具有同等权利”的西方民主理论的柱石观念。老金已经讲过了：他们学校的老师就认为农民做二等公民是天然合理的，否则城里的高楼大厦谁来建？商人们也并不痛恨官府的敲诈勒索，因为那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有趣的是，吴思先生揭示了潜规则这社会运转的真正杠杆，但大众并不对它反感，而是把它当成了天经地义以及必须迅速学习、掌握、精通、运用的龟孙子兵法，我记得毕时圆的归国观感中就曾说过某人曾引用吴思的书对他进行再教育。这大概是吴思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与此一致。已经说过，我回国时与老同学或朋友聚会，最觉得难堪的就是他们对酒店侍女无比粗暴凶狠的态度，可谓穷凶极恶，就连党电影里的黄世仁、南霸天恐怕也不过如此。而那些侍者也就低眉顺眼逆来顺受。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日式饭店，侍女跪着上菜，我实在受不了，说道：小姐，您能不能站起来？您这么做我吃不下去，不然我也得跪着了。此话一出，哄堂大乐，老同学们都说我出国出傻了。我忿然作色道：人家也是人，你们怎么能把人不当人糟蹋？大家嘿然无语。过后跟我说，芦笛啊，你们那套西洋绅士把戏在这儿行不通。你不知道，你要是不把威风使出来，她就要爬到你头上去了，接着就跟我讲了许多家里请的保姆怎么怎么“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必须临之以威的故事。我想那大概是真的吧。优质服务必须用野蛮的态度来换取。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多数国人不会接受“普世价值观”，它与国人信受奉行的那套实在是水火不相容。

同样地，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如台湾一样，因经济繁荣而和平长入民主。相反，在目前这种烂污国情下，真要实行民主制度，则一定造成巨大的灾难。理由我早说过了，实行民主的主观条件有两条：一是公民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既知道捍卫和行使自己的权利，也知道尊重他人的同等权利。二是具有高度的契约精神，能严格遵守游戏规矩。民主是绅士而不是痞子的游戏。如民国经验昭示的那样，参与游戏的只要有一方不按规矩胡来，民主实验就必然破产。如

今整个社会成了个奖伪罚诚、奖痞子罚绅士的烂污社会，还有什么鸟的希望走西方的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一直是中国的学习仿效榜样，先是学西方的文明精华，后是学西方的谬种怪胎。真正抛开西方模式走自己的路，大概始于改革开放。这结果就是将两家的烂污融为一炉，也算是创新吧。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越富就越野蛮，离文明化的希望就越远。所谓“文明化”的重点我也反复说过了：那就是凡事严格按规矩来，一开头哪怕是烂规矩都行，但必须是明规则，决不能是潜规则。可叹的是，就连居留西方多年的知识分子也未必能明白这点。例如小衲同志一直在叫卖他的“和稀泥”伟大理论。上次巴黎法庭严格依法办事，驳回野鸡诉讼方的非法擅权要求，竟然被他认为是胶柱鼓瑟，应该和稀泥才是。连他都尚且如此，无缘濡染西方文明实践的国人尚有望乎？

六、社会危机相当严重

生产力进步当然是社会进步，然而中国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还不光是说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更是说国人的素质太差，恐怕难以承载突如其来的暴富。

楼下转贴了某位孙立平先生的文字，谓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我很同意这种评估，只是觉得“溃败”改为“溃烂”比较合适。准确来说，那就是财富与素质的发展背道而驰：财富越多，日子越好过，国人越发痞子化，越发不具备转入常态社会的主观必要条件。这也倒罢了。问题在于国人的欲望被消费主义极大地刺激起来之后，一旦繁荣局面不能持续，政府就将遇到大麻烦。一个国民把不择手段的龟孙子兵法奉为绝顶大智慧、毫无自我约束的烂污国家，乃是世上最可怕的潜在的乱邦危邦，看出这点来并不需要什么远见卓识。

2009 年 3 月 7 日

国人眼下能指望的最佳制度

一、天下并不是只有一种生活方式

网友老金转述了韩寒的“理想国”蓝图，大家都不同意，这再自然不过——大家都生活在西方健康的社会环境中，都接受了“普世价值观”，回首神州，但见一片污浊。出于对故国的感情，当然盼望国人也能生活在类似的健康社会中。如果不是这么想，反倒是凉薄之辈了。

勿过，我能理解老金和小韩的心思，如果在国内，我也只会有类似要求。其实自俄罗斯开始显示倒退迹象来，我就一直在想这问题，越想越觉得天下并不是只有一种活法，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有健康的活法。你若嫌大家活得不干净，把百姓煽动起来换个活法，只会活得比原来更糟糕。中国自辛亥以来的折腾史，不就是这简单道理的反复证明么？比起来，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走回头路，应该算是林副统帅说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了——毕竟，人家无论是“天鹅绒革命”还是“天鹅绒复辟”，都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如中国一般杀到血流漂杵。

前段看电视，记者从西到东横跨整个俄国，沿途采访各色人等。给我的感觉是：钟摆又大幅度地摆回去了，俄罗斯民族的下流劣根性再度顽强地表现自己，那个所谓“民主国家”跟大家在西方见到的完全是两回事。这证明了 17 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洛克强调民族传统在变革社会制度中的重要性是何等英明。倘若社会制度的变革超越了民智水平，则社会绝无可能达到稳定点，一定会向旧的生活方式回落，直到重新取得平衡为止。可笑的是晚生两个世纪的马克思还没这点见识，这才会提出“唯物史观”来蛊惑落后国家的愚民与更愚昧的知青。

据那电视采访，如今的俄罗斯的民情与中国也差不多，“民族主义”成了时代最强音。接受采访的大学生们都表示，俄国现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过去的超级大国地位，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乃是后一步的事，空洞的原则并不能代替实惠，云云。据记者调查，俄国仍有少数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

分子在活动，但他们并无市场，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处境也差不多，同样是“曲庸和寡”，形单影只。

前段俄国举行的民意测验证实了那电视采访，斯大林那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民侩子手竟然成了声望第二高的历史人物。据说他本来名列第一，后因组织调查的人做了许多工作，这才改成了第二。这种“民调”也只有那下烂国家才会干——调查者岂能干扰受试者的自由意愿？如此做出来的调查还有什么客观性可言？

俄国人拥有的言论自由恐怕还不如中国。据那部电视系列片披露，莫斯科有个异议人士专门在博客上抨击政府，没多久这位仁兄就被暗杀了。另据报纸报道，去年年底有位波罗的海国家（是哪一国记不住了，反正不是立陶宛就是拉脱维亚）的作家锒铛入狱，判的刑期还相当长，唯一罪状就是他在报纸上发布预言，说该国经济即将崩溃。这些烂事若发生在西方，肯定要引起大哗，被害者还可能如马丁·路德·金一样名垂千古。然而英勇的前苏联人民却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丝毫没有在意。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涅？说明世上有些民族喜欢统治者来屠杀自己，“屠民治国论”的信奉者并不限于中国。无论是英勇的中国人民，还是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似乎都同意“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统治者杀害一部分人民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杀人不是看他是否犯了死罪，而是看治国是否需要”的伟大真理。

由此可见，所谓“普世价值观”，就连在 “民主国家”俄国也行不通，这世上就是有许多人认为自己的福利远比他人的性命重要（此乃屠民治国论的出发前提）。既然如此，那推论就是：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按照西方的健康标准过日子，有的民族就是要在泥地里打滚。这是传统决定的，与生产力发展基本无关——光荣革命时代的英国不必说，美国独立时也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论生产力水平根本不能与今日中国或俄国相提并论，然而彼此信奉的价值观却天差地别。由此又可导出：经济的发展未必会使得一个民族彻底改变生活方式，信奉一种在西方人眼中更健康、更正常、更富于人性的价值观。

二、文明社会是一种“单子社会”

所谓“单子理论”乃是 17 世纪德国大数学家兼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哲学理论。马恩批判的“形而上学”就是针对莱布尼茨学派。老莱子认为，客观世界呈现出来的万事万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其实是表象的，以为它们互相作用乃是人类的错觉。例如全世界的钟到点都会自鸣，但你若以为伦敦大本钟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钟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那就大错特错了。据他说，客观世界也就是由这种事先上好发条、定好时间的无数“钟表”组成。它们称为“单子”，彼此并无联系，其外表的和谐一致乃是由原来固有的内在程序决定了的。

这当然是荒诞不经的 P 话，但可以借用来描述文明社会。在我看来，文明世界的和谐也是靠社会成员们事先确立的固有的内在程序决定了的，法律的威胁当然有作用，但主要还靠“单子”们的自我约束，并非单子之间的互动使然。

某网友发表过一篇访日观感，介绍：

> “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陪着朋友，推着两辆分别载着小孩的小车逛街。要就餐时，如前所述，日本的店堂一般较小，将推车放到店堂内将会造成拥挤不便。朋友也曾是位纽约客，见我有些不知所措，笑笑说，‘把车留在门口，没问题。这不是纽约。’更使我惊奇的是，因店堂里较热，他把御寒的外衣与背包就往童车上一扔，泰然地进店了。这店门是木制的，在里面根本无法照看门外的车物。朋友见我疑虑的眼神， 还是若无其事地说，‘没事，这儿不是纽约。’ 餐后，果然啥事也没有。
>
> 在其他公共场所，如小孩游戏的地方，人们也就把随身的衣物放在门口的 开放衣架里，既没有锁，也没门。人来人往的从没人丢了什么东西。在大 的综合商场中的小孩游乐处，他们也总是把衣物往推车上一扔，将推车随 便往柜台边一靠就放心与孩子们疯玩去了。我想，一百户游客中若有一人 遗失了东西，这百户游客就不会有一个会放心地随意放置自己的物品了吧。 人们能这样安心地乱放随身物品，对社会的治安该有多大的信心，是不用 我多加称道的了。纽约啊，纽约，要我怎么说才好啊。”

的确，只要有一个人不遵守游戏规则，拿走了别人的东西，这风俗立刻就要被打破，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文明世界中大概也就只有日本人有这淳厚风俗，不过靠单子们的自制来维持社会的和谐运转乃是文明世界的通则。已经反复强调过了，民主制度要能运转，前提是参与游戏的各方对规则凛遵无违。这跟开赌场毫无二致，只要有一方不肯愿赌服输，则游戏立即破产，再也无法玩下去。

这是从国家的运转来说，小事又何尝不这样？西方为何没有毒食品的烂事？我看主要靠单子们的自我约束。食品商们真要发动竞相投毒的人民战争，再强大的法律也约束不住，何况民主国家根本不是中国那种警察国家，其镇压力恐怕还不到中国的万分之一。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商人们心中的那个不可逾越的底线，而中国人缺的就是那底线。

这就是中国文明化的最大障碍。自辛亥以来，中国人折腾了将近 100 年，越折腾离开文明越远，我看主要作用机制就在于这个底线被打破得越来越完全彻底，全社会建立了一种“反向博弈”，专门把不守规矩、毫无底线、毫无自我约束的烂污分子选拔出来，捧成“国父”，尊为“导师”、“领袖”，还要把痞子们的“超限战”经验奉为国教经典，以国家宣传机器强力为全民洗脑，使得全国人民都变成毫无起码自我约束的痞子，这大概就是共党统治中国造成的最大、最难以逆转的灾难。

如所周知，十月革命爆发后，立即引起了文明世界的普遍敌视，英法等国都进行了武装干涉。歪？盖布党和纳粹一样，信奉的是“强权即公理”的狼羊律，公开提倡以暴力践踏文明规则，以暴力掠夺一切国家资源与社会财富，坚决反对以和平协商的妥协方式解决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冲突，实行“赢家通吃，不服者一律铁拳伺候” 。这种反文明逆流当然要引来文明世界的一致敌视，人家本能地知道，若令其得逞，势必要颠覆文明世界，使得人类丧失结成文明社会的起码基础，从此只能在险恶的丛林中过暗无天日的日子。

这不幸就是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事，也是毛共留给现代中国的最大文化负遗产。现代中共已基本背叛马列，继承的衣钵也就只有这一个，因此至今还是那个丛林党，无论在党内外都以暴力作为解决利害冲突的唯一手段或起码是终极手段。上行下效，全国人民当然也就要以诡道解决利害冲突，实行“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在我看来就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也是我认为中国不会走上台湾和平演变之路的基本原因——台湾没有遭受过全民痞子化的劫难。凡是经受过共祸的国家，民主化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比一般专制国家和平长入民主国家难多了。货真价实的民主制度可以在希特勒之乡、东条英机之乡、佛朗哥之乡、二蒋的第二故乡建立，但恐怕不会轻易地在列宁之乡、毛泽东之乡建立。相反，经过我党的教育，如果日后中国再度进行共和国实验，引来的灾难恐怕要令民国实验破产悲剧瞠乎其后。

光是《海纳百川》网站的民主实验就充分提示了这一点。当初我和老狼老非提出，以西方式“明争”取代东方式“暗斗”，以光明正大的民主争利方式，划定各人的股份。对方也同意了，但等到他们发现自己的股权不足以控制网站，立即就吹灯拔蜡掀桌子，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优势将所有的帖子洗劫一空，连服务器都抢走了，然后拉闸断电，让网站沉没，与此同时趁机开张《新海川》，把所有的访客都拉过去。等我辈从水底挣扎出来，向大众募捐买服务器，人家还要使出绝后计来，在公开宣布退出海纳百川俱乐部之后，又以该俱乐部的名义在网上发公告，造谣说我们盗用该俱乐部的名义非法集资，触犯了美国法律！

请注意，这些人都是海外“民主”精英，文化水平起码在大学以上，在海外蒙受了多年西方文明的糖衣炮弹，而且大部分人在我扫荡伪民运前还是芦粉，主谋的魏碑还曾是我的“铁哥们”，争的不过是个毫无盈利、只能往里不断扔钱赔功夫的烂网站，可人家就是什么没底线的下作烂事都有本事干出来，那么狠毒，那么斩尽杀绝，那么不顾旧情，至今令人思之不寒而栗。更绝的是，多年后我早已心平气和，只是纯粹出于好奇，特地到魏碑的多维博客去问他：对朋友搞这种阴谋暗算，事前瞒得如此之紧，下手如此之毒辣，在事后是否曾有过瞬时性的星点内疚？他还急赤白脸破口大骂，骂我是祥林嫂＋窦娥。弄到最后似乎还是他是受害人，我是施害者！

从这个例子不难想见，中国真要实行民主，那还了得？那绝对只会变成高效逆向筛选，把烂仔捧上台，让正人君子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好在国人现在并无这种要求，《零八宪章》遭到的冷遇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由此看来，民主并非现实危险。

三、我们的功利主义与他们的功利主义

我历来提倡写作时作基于事实与逻辑的智力批判与功利分析，反对使用良心作为论据，理由已经解释过多次：

1）过往 170 年中国反复遭受的不是奸臣祸国，汉奸祸国，小人祸国，“犬儒”祸国，而是“清流”祸国，“良心”祸国。前人少的不是热血与正气，而是脑子。愚昧因为有良心的支撑就变得格外理直气壮，最后化为邪恶。

2）使用“良心论证”有“道德讹诈”之嫌，亦即将论敌打成天良丧尽之辈，将自己装扮成“中国良心”，乃是毛共嫡传功夫，与西方自由主义精神冰炭不同炉。

3）“良心”、“正义”言人人殊，爱国愤青又何尝不是出自“民族大义”？若在这问题上纠缠，可以争论到世界末日。

4）国人的良心犹如《说唐》上的神马“呼雷豹”头上的那撮毛，早已被反复揪了 170 年，至今已经寸草不留，再揪也没有什么鸟用处。人家现在讲究的是“利益博弈”，对良心毫无兴趣。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才在推销西方生活方式时，着重指出其功利合理性，反复告诉读者，真正的大智慧不是中国人擅长的鼠目寸光，杀鸡取蛋，有力者独霸财源，不许无力者染指。这样只能招致社会周期性动乱，大乱来时全社会玉石俱焚，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必须实行伟大领袖的教导：“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学西方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利害冲突，实行机会均等，利益均沾。

此外我更指出，所谓道德，其实也是功利设计，其出发点与判断标准都落实到功利，靠自我约束欲望而体现，其原则就是铁木网友指出的，在为欲望驱动做某件事前先想想：如果全社会都这么干，其功利后果会如何。国人正是不会这么想，以为做毒食品骗钱乃是大智慧，最后全社会都这么干，连自己也给坑进去，世上再没比这种毒杀自己的民族更愚蠢的人了。这种“反向单子社会”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不顾别人去实现“自家利益最大化”，总体效果则是全民利益的最大损失，也就是“共产恶魔”网友说的交易成本最大化。

我原来以为，这种论述方式符合中国的烂污国情，应该远比民运人士的良心秀有效。然而老金那天转述的同事的英明教导却使我大吃一惊，错愕几不能言。

据那位曾经留学西方的“高级知识分子”说，不用担心痞子蔡这么瞎搞会让国际社会避中国人如蛇蝎，从此实行“华人与狗不得参加拍卖”，因为国人如今财大气粗，乃是国际拍卖会的大买主，顾客即上帝，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人家不敢抵制，只会忍气巴结。而且，中国应该向美国黑人学习，发挥“种族优势”，死捏西方自由主义者“政治正确”的死穴，就是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横着来，如果人家抗议就指责对方种族歧视。

我看后几乎身心崩溃：做梦也没想到国人的功利分析会如此进行！而且，您还不能说那位留过学的高知作出的冷静分析无道理。人家可真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确如他说，西方绝不会因为痞子蔡捣乱就此禁止国人入场，哪怕国人不是拍卖商的上帝也如此——谁也没那胆量禁止中国人入场，“种族歧视”的帽子在西方可是能压死人的。

看来“汰优存劣”的生存竞争不但要在国内轰轰烈烈地进行下去，而且还有蔓延到国际社会上来，污染整个文明世界的危险。前者也倒罢了，反正我又不住在国内，顶多“拼死吃河豚”，冒险吃点国内来客带来的食物礼品罢了。后一前景可是让我不寒而栗，真要呼唤何新他夫复何言了也（翻译：何新说“我夫复何言”，意思是他丈夫答复了何言）。

最令人绝望的是，这表明无论讲良心还是讲功利，都无法使国人上进，看来在泥地里打滚乃是咱们的宿命。

四、我心目中的中国最佳制度

所谓“最佳制度”当然不是世界上的最佳制度，而是中国人配享有的道义与功利上的最合理的制度。所谓“合理”当然是用“普世价值观”作标准，也就是以全民利益为标准。它并非“最适制度”。所谓“最适制度”乃是就可操作性而言，指的是该制度最符合国情民俗，能够顺利运转。专制制度历来是中国的最适制度，因为更好的制度无法在中国运作，若要勉强推行，社会就会逸出既有轨道，“走向反面”，弄得比原来还不如。现代专制制度之所以不再是

最适制度，其原因我早反复说过了，那是西方先进文明的流入，使得“可遗传专制制度”（也就是帝制）再也无法实行，而非遗传专制制度必因权威逐代递减而搞不下去，最终土崩瓦解。

中国的尴尬，乃是失去了最适制度，而且折腾了 170 年上下求索，至今尚未找到。因此只能根据眼下的国情民俗，找出一个相对来说最佳的制度来，它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不是最有可行性，因而并非最适制度，甚至不是较适制度，但是按西方标准来看（也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观”），它是现行国情下能争取到的最好的制度。

这种最佳制度只能说是开明专制的初级阶段，所谓高级阶段，就是香港或二蒋时的台湾那种“不民主的自由社会”，国人眼下还不配享受那种政治奢侈，能否实现初阶开明专制也在未定之天，还得靠我党进一步弱化或改恶从善，以及人民的配合，两者缺一不可。

该制度的要点如下：

1）当国者彻底摆脱窃国者的持续恐惧心理，放弃“以小民为敌国”的思维定式，与“屠民治国”的罪恶理论与实践彻底决裂，停止把敢于维护自己的权益的百姓当成敌人铁腕镇压整肃的山大王国策，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换。朝野逐渐磨合出一条和平解决利害冲突、化解社会危机的途径来。

2）党内也要迅速摸索出一个和平解决权力斗争，预防大规模内讧的途径来，彻底放弃“枪指挥党”，以暴力清洗竞争对手的土匪作法。

3）实行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就早已作出的“停止以言治罪”的诺言，严格按照宪法行事，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哪怕仅仅是保障网络言论自由都是好的。

4）明文规定各级干部每年的合法贪污指标，超标后才予以惩罚。

5）在实行按阶级或阶层对于稳定社会的重要性分配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让无力危及社会安定的工农大众分享点残羹剩饭，不要让人家活不下去。

这在我看来就是眼下国人能争取到的最佳社会制度，其他的起码措施如司法独立、舆论独立等等则连提都不敢提，情知我党绝不会理睬。即使要求如此之低，我党还是不大可能听取。

2009 年 3 月 9 日

专制制度至今仍是中国的最适制度么？

西方政治学的一句流行话语，便是“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制度”，这就是袁世凯的顾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的理由。然而就本人极度有限的阅读所及，这所谓“最佳制度”与“最适制度”似乎并无明晰界定，我也是最近才想这个问题。

很明显，所谓“最佳”和“最适”，都是比较而言的相对用语。是不是最佳制度，得先固定了所在国家再说。在欧美，与其曾经实行过的所有制度比起来，民主制度当然是最佳制度。这里的所谓“最佳”，我的理解是“道义上与功利上都最合理”。

所谓“道义”的标准，当然是“普世价值观”规定的。而所谓“功利”则是从技术设计的角度来评估。社会制度不过是一种应用设计，并不是类似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的体现。不仅如此，它与工程技术还有着本质差别。

如所周知，工程技术设计如果违反了自然科学的定律，就绝对不会运转，能运转的则一定符合客观规律。然而社会制度的设计却未必如此，盖社会科学中除了极少数由人性决定的原理（例如“权力导致腐败”的阿奇顿定律）外，并没有类似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普适定律。因此，同样的社会制度，在甲国可以运转自如，在乙国就连启动都不可能。此外，哪怕是赤柬那种违反人性到了系统毁灭文明、甚至实行种族灭绝（genocide）的烂制度，都不但能运转，而且竟然还是“你不打，它就不倒”。若不是越南人打进去，可能至今还存在，正如若不是清军攻进四川，同样实行种族灭绝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也不会轻易垮台一般。这些现象根本就不存在于工程技术之中，后者既没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之别，也不可能造出违反自然规律运转的机器来。

那么，制度设计的功利合理性应该如何评估？我看主要是个运转问题，这包括了两方面：能否顺利投入运转，以及能否持续运转下去，也就是那机器是否能开起来，开起来后又是否能长期运转下去，不会中途烧毁。第一个问题说的是可行性，其限制因素是民族传统以及民智水平。第二个问题则是指社会的稳定性，影响它的主要因素是系统的内耗水平。

如果只考虑第一个问题，则专制制度显然具有极大的功利优势，这原因也说过了：它只需要少数人即可操作，不像民主制度的运转需要全民介入，不但取决于参与竞争的各政党恪守游戏规则，而且有赖于“社会单子”们靠既有的内在程序实行本能配合。如民国实验昭示的那样，这两个前提不满足，则民主机器就根本开动不起来。专制制度就没有此类难题，它不过是少数人的游戏，不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自动配合。其开动与运转乃是由少数人利用人性中的原始的动物性，诸如恐惧、胆怯、贪婪、残暴、以损人利己迅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等等，以胡萝卜加大棒的革命两手迫使或诱使大多数人服从。因此，它的启动根本不需要提升民智与道德水平。这就是为何连赤柬那种烂制度都能轰然启动，而且竟然在相当长的时段内都不曾自动烧毁。

功利合理的第二个指标则是系统的稳定性，也就是我党说的“和谐”。它反映的是系统的“内耗因数”，亦即一个社会的能量有多大比例用于内耗。所谓“内耗”，也就是人类私欲决定的社会成员内部的利害冲突，它的显性表现是暴力冲突，而隐性表现则是精神对抗，亦即“敢怒不敢打”或甚至“敢怒不敢言”。内耗越大的社会，则健康度也就越低，其历史峰值就是文革时期的毛共社会，彼时全民都把几乎全部精力投入波澜壮阔、轰轰烈烈、酣畅淋漓的内斗，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病态社会。社会的内耗因数越高，也就越无法持续运转，此所以就连我党都受不了那折腾，要在毛死后赶快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接着又在三中全会上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掠夺大自然上去。由此可见，一个由正常人治理的社会，总要设法降低内耗，其操作方式有两种：东方式与西方式。

东方式大家都熟悉。老祖宗看到了内耗是人欲引起的，因此“抓纲治国”，“正本清源”，实行革命的两手，一手是以儒道释对人欲实行综合治理，儒家告诉你人欲是万恶之源，是世上最可耻的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必须“存天理灭人欲”，斗私批修，灭资兴无，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把自己改造成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道家告诉你“是非成败转头空”，追名逐利什么意思都没有，反而有害于养生，“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空忙”；释家则告诉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千世界不过是你的主观幻觉。而且，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什么都是前世

注定了的，追名逐利非但徒劳无益，而且若伤阴薄德还会引来报应。但若你做忠臣孝子，则来世必有福报。另一手则是法家的“霹雳手段”，专门以无比残暴的手段诸如凌迟、腰斩、枭首示众、灭族等酷刑，惩罚那些胆敢大逆不道、以下犯上的逆子叛徒反臣，以此吓阻效尤。

在此，所谓“正逆”，也就是“上下”，其实也就是拳头大小。拳头大的就是“上”，小的就是“下”，弱者绝对服从强者就是“正”，就是“道”，胆敢反抗就是“逆”，就是“不道”，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等同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民谚所谓“官大一级，如同父母”就非常准确地道出了这种“伦理政治学”的精要。

这一套结合起来，便塑造了国民逆来顺受、不管权贵如何欺凌折辱都甘之如饴的人生态度，从根本上骟掉了百姓的反抗基因，消除了动乱苗子，取消了“作用力必然引来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的力学定律，使得官府对百姓的压迫剥削[1]基本成了单向施暴，并不会引来反弹，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内耗。考虑到古代官府无法垄断冷兵器那唯一的暴力手段，由此决定了百姓造反之容易，而传统社会还能显示出惊人的稳定性，就更加彰显了这种设计之成功。如秦二世而亡表明的，它主要靠儒道释的洗脑（当然释家是后来引入的，但它以宿命论和因果报应说极大地增加了儒教说服力），而不是法家的“霹雳手段”。这种洗脑之成功，常常令后人瞠目结舌。

我记得明代（或清代，记不住了）有部章回小说，以唐朝著名忠臣张巡守孤城抵抗安禄山、史思明叛军的史事为故事背景。上面说，城内缺粮，军士饿得无法作战，张巡乃决定杀了他的爱妾，把她煮了犒劳三军，但又不忍下手。结果那深明大义的爱妾得知了老爷的心事，便毅然自杀了。张巡于是便把她烹了，三军享了一顿鲜肥之后（NND，一个女人，哪怕肥如杨玉环，也喂不饱三军啊？杀头水牛恐怕都不够，大象还差不多，最好是鲸，当然那取决于人数），得知吃的是太守的爱妾，人人感奋，出力死战，云云。

这小说我是青年时代看的，现在连名字都记不住了，当时只觉得毛骨悚然。那阵子正是文革，无法找到《新唐书》，因此也无法去考证那事到底是真是假。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表达的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它既然能把张

[1] 所谓“压迫”和“剥削”我已经在旧作中作过定义。“压迫”就是强者恃强剥夺弱者的基本权利，而“剥削”则是强者以暴力为后盾与弱者进行不等价交换。

巡以及那“深明大义”的爱妾树为全社会学习的道德楷模，当然也就说明其中的“天理大义”是人人认可的。这说明后天洗脑能够何等地扭曲人的自然属性。

这种消除内耗的方式固然有效，但它有两个缺陷：第一，靠安贫乐道的禁欲主义消除内耗，必然使得社会失去生机，生产力发展被冻结。第二，消除反抗而不消除压迫剥削，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单向流动，到最后便会使得贫者实在无法生存，不得不突破洗脑的束缚，回归原始兽性，揭竿而起，大抢大烧大杀一气。由此决定了社会长期的静止凝固态与动乱交替出现，造出了中国特有的乱治循环。

所谓“西方式”，说的是现代民主制度。它降低内耗的方式乃是疏导人欲，使之尽量向自然界扩张而不向社会内部释放，为此将发财机会向全体社会成员同等开放，强调“机会均等，费厄泼赖”，使得大家都有发财希望，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从大自然中榨取财富上去。在分配社会财富时，使用议会民主作为社会的“粗调节”，而将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斗争（包括罢工与其他形式的劳资冲突）纳入法律轨道，作为社会的“细调节”。政府一般只介入“粗调”，不介入“细调”，顶多只在影响全社会的大罢工发生时充当中立调解人。总之，它的基本原则是“疏导”而不是“堵塞”。这样就既能保持生产力发展的势头，又能及时化解社会内部的利害冲突，避免了单向堵塞必然造成的社会危机积压。

至此可以给出“最适制度”的定义：因为处在民族传统以及民智水平的下限内，又具有最低的内耗因数，因而具有功利上的合理性，能够启动并持续运转的社会制度，就是该民族的最适制度。它在功利上是最合理的，但道义上未必合理。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帝制虽然有上述弊病，但毕竟是古人最适生活方式，其“和谐”可以至少维持上百年。如果不遇到重大天灾或外患，这种社会的内耗一般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才能积累到烧毁程度，应该说是非常稳定了。

据此定义，则民主制度眼下并非中国最适制度：它虽然在道义上合理，但因民智民德的极度低下而缺乏功利上的可行性，根本就无法开动，若勉强开动，必然要“以群暴易独暴”，比原来的专制更糟糕。

这还不光是中国一家的问题，似乎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难题。记得老金说过，巴基斯坦就曾几次试图开动民主机器又以军事政变关闭之，反复在“民主”（群暴）和专制（独暴）中往返振荡：专制搞到一定时间便无法维持运转而烧毁，国家开始试行民主，但社会治安随之瓦解，群暴出现，于是某个军头便“顺天应人”，以独暴易群暴，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直到因贪污腐化被推翻，再次进入群暴的短暂过渡阶段。

既然民主制度并非眼下中国的最适制度，那现行专制制度是不是？我看未必。

传统专制制度之所以从最适突变为不适，乃是因为西方文明的流入彻底瓦解了儒道释提供的稳定软件。论韬略与实力，袁世凯不下于任何一个开国君主，可他就是做不了皇帝，那原因非常简单：北洋部将再不相信“天命论”，转而信奉“民国人人可作总统”，因此绝不让老上司独霸茅坑，再搞“家天下”。

现代专制之所以能取代旧式的“家天下”，而且维持至今，主要还是靠从苏联学来的威力无穷的人民控制术，亦即以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权力集团作为骨干，去建立“党天下”，将人民织入无比严密的组织网络中，置于全党的密切监控之下，再垄断了国家的重要资源与暴力手段，使得人民完全失去反抗能力。论对人民的控制，它远远超过了旧式专制，后者主要是宗教式的精神控制，不是由一个庞大集团进行的严密组织控制。

这一套当然有神效，巴基斯坦那些国家之所以发生周期性的“独暴—群暴”振荡，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搞党天下。但光有这一套也未必能使得现代专制成为现代中国的最适制度。与旧式专制相比，现代专制最缺乏的就是稳定软件，而且至今找不到永久性代用品。在党天下中，皇位永远是开放的，永远处在野心家们的觊觎之中，党皇永远缺乏不容置疑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永远有受到挑战甚至被推翻的危险，永远必须动用暴力去清洗竞争对手，以此立威。这个问题随着传代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说的“权威逐代递减律”，它是社会的不稳定性的最主要来源。

胖胖熊网友对此提出了高水平质疑。他说，苏联经验提示，党内权力斗争仍然可以以非暴力方式进行。自勃列日涅夫始，苏共内部就不曾再大杀大砍。由此看来，我党内部也能磨合出个和平解决权力斗争的方式来，不一定会引发

大规模内讧。至于权威逐代递减现象，在毛——邓——江之间倒是很明显，但在江与胡之间就不甚明显了，因此，中央权威也未必会弱化到无法控制全局的地步。

关于第一条质疑，我的感觉是，既然党皇的位置是开放的，又不能光明正大地通过民主竞选获取，那就必然会有夺位与反夺位的阴谋暴力斗争。苏联那个短时段内的平安无事似不足以作为证明。相反，它是各巨头之间达成暂时平衡的结果。正因为此，它才成了人类历史上难得见到的奇观：第一书记们连连寿终正寝——刚上任的第一书记才给前任颤巍巍地送过丧，转眼就咽了气。直到老家伙都死绝了，才轮到下一代的戈尔巴乔夫。可惜因为他是下一代，因此始终玩不转。党内死硬派的抵制甚至到了半公开的地步。我听毛子朋友说，保守派为了羞辱他，故意在某个重大庆典（记不得是什么场合了）让所有商店的食物架空空如也，引起百姓的极大不满，后来更直接搞政变把他抓起来。若他是卫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人，就不至于落魄到如此地步。

江泽民与胡锦涛又如何？老江动用暴力清洗陈希同，小胡动用暴力清洗陈良宇，两人都无法如老邓一般，发句话就可以轻易罢免华国锋、胡耀邦与赵紫阳，而是非得把对方“做”成罪犯不可（老邓关老赵是惩罚，不是为了搞掉竞争对手）。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权威的弱化使得权力斗争更不可能循和平方式解决？

关于第二条质疑，我觉得阿熊说的颇有道理，这权威弱化曲线可能是指数曲线而非直线，因此弱化到一定程度就趋向于与横轴平行，不会再恶化下去了。但即使如此，也必须看到这儿有个内在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党皇没有传统帝王那种与生俱来的权威，必须靠下面的死党支持才能坐稳位子。因此，下一代党皇在当国前就得党内广为结党营私，但这么做又必然招致现任党皇的忌讳。若不这么干，则他必须熬到 60 岁左右才能接班。上任后也只有 10 年左右的光阴来培植私人势力。这种皇帝到底有什么权威与实力，我还真难想象出来。

另一个问题我也在旧作中说过了，那就是党皇与传统帝王不同，不敢真的得罪诸侯们，盖这些人是他的权力基础，如果得罪的人太多，则人家就可以联合起来发动宫廷政变，把他选下来。传统帝王则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他哪怕把

所有的督抚杀光了，也不必担心天下大乱，盖他是靠天威做皇帝，不是靠臣下拥戴。

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就使得官僚集团获得空前的控制百姓的能力，而党皇则基本没有控制他们的能力。换言之，党具有空前强大的统治能力，却不能控制它自己，因而毫无自我完善能力，只会江河日下，一天天烂下去，不知伊于胡底。烂到一定程度无非是两种结局，要么国家逐渐解体（这大概是最理想的吧），要么遇到重大天灾人祸，触发积累的社会危机，党内特别是军内的某个野心家崛起，大规模内讧爆发，触发全面内战甚至核内战。

总而言之，我的感觉是，现行专制制度的内耗因数非常之高，比传统帝制高多了，比西方民主制度就更不必说了。国家把大量资源与能量花在监控百姓、维持表面的社会稳定上，但这只暂时防止了显性内耗，无从疏导缓解隐形内耗，增加了系统内的张力（tension）。这种背时机器要持续运转上百年而不烧毁，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是很高。但除此之外，中国还没能找到一个堪与传统帝制相比的最适制度。因此，自辛亥以来至今，中国一直是个未能生活在最适社会制度之下的国家，套斯大林当年对中共的指示来说，是“处在两个最适制度之间”（原话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

2009 年 3 月 12 日

权贵资本主义的建构原理与持续运作前提

方鸿渐网友光临赐教，提出了六四后我党的政经战略。这问题我记得老金谈过，讲得还很完备，就是著名的“金九点”，令我受益不浅。加上我自己的体会，简短截说是这么几条：

一、在保持毛共式极权制度的主体、坚持对国家资源的垄断的前提下，有限放松对人民的捆绑，赋予人民以有限的经济自由，以释放民众的创业精神使经济获得活力，避免苏式社会主义缺乏生机的弊病。这就是现行制度下的资本主义成份，亦即承认并利用人类贪欲，允许它自然化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国民经济的起死回生全靠这条。用马列的术语来说，就是部分去除了国家政权对生产力的强大的人为压制作用，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二、利用极权政体对资源的垄断，向外廉价甚至零价甩卖资源；利用极权制度对人民基本权利的剥夺，以“低人权优势”在国际社会形成所向披靡的竞争力，大量吸纳外国资金与技术，“借鸡生蛋”。这战略赋予了现行制度的买办资本主义特点。

事实证明，以上两大改革是成功的，证明了极权制度下也能出现生动、主动、活泼的高经济成长，它与斯大林动用国家暴力人为提升生产力的人为经济的运作机制不同，后者主要靠狂热信仰导致的民众献身精神与恐怖统治造成的普遍恐惧相结合，当献身精神磨耗殆尽之后，便只能靠恐惧与惯性为驱动力，使得国民经济堕落为毫无主动精神的劳改经济，陷入不死不活状态，而极权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动力是人类贪欲，与民主资本主义并无两样，由此获得了生机。

三、坚持毛共遗留下来的等级社会结构，但实行政治贵族向经济贵族的转化；在按权力分配财富的前提下，实行按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能量的高低分配财富，重点收买能组织民众呼风唤雨的知识分子阶层；借鉴传统科举制度，有限开放政权，吸纳民间才俊加入统治集团。这战略赋予了现行制度以权贵资本主义特点，其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不实行机会均等，公平竞

争，费厄泼赖，因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无法化解，积累下来形成社会危机。

四、坚持极权制度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坚持剥夺公民的政治自由，拒绝用西式民主实行社会财富再分配，解决各阶级的利害冲突，代之以传统的“为民做主”的中央体恤民艰，以单向皇恩“扶危救困”，企图藉此缓解社会危机。

五、坚持极权制度对舆论的垄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效法前苏联，以奥运和宇航等形象工程提升国民的民族虚荣心与自豪感，强化他们对政权的认同。这一战略赋予了社会以醒目的法西斯主义特点，但它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的最大隐忧，是制造出米洛舍维奇那样的“内向法西斯主义”来；放弃毛时代的禁欲主义，去除原有的对言论的清教徒管制，将百姓的兴趣从政治上引导到声色狗马吃喝玩乐上来，使得百姓从奉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生活方式转变为美式消费主义信徒，使得青年一代“犬儒”化。

在我看来，这就是我党在六四后一直在构建的新式等级社会。它的理想模式是：根据原来的权力占有量与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力，划分新的社会等级，按照这等级分配社会财富，并由中央扮演传统明君，在某个社会矛盾极度尖锐时，有针对性地自上而下地施恩，以此缓解该矛盾（最典型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出台）。通过选拔吸纳底层才俊进入权势集团，保持一定程度内的“上下层对流”，将民间野心家们纳入体制内的上升轨道；通过经济繁荣普遍改善全民生活（当然是有层次的富裕化），一则消除百姓因活不下去而铤而走险的可能，再则为有志者开放多种出路，使得他们有了政治领域外的成功希望，由此获得一种内在稳定性。

这种新型等级社会与毛共社会的差别在于，毛共社会是个由奴隶主和奴隶组成的两极社会，草根民众不管是工农兵学商的哪一行，其实都是卖身给国家的奴隶，除了心理社会地位（亦即主观认定的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区别外，实际上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并无显著差异。而新等级社会则是一个多级宝塔，工农作为最没有能量影响社会稳定的阶层，名至实归地给压倒了最底层，而所谓精英阶层则被提携起来，在经济繁荣的大饼中分到了比较大的一份。

有利于这种社会的稳定性的条件如下：

一、人民没有革命可能。这还不是方鸿渐网友认定的是核武器取消了这种可能。其实哪怕只有常规武器，人民也绝无可能推翻垄断了一切暴力手段（冷

兵器已经不再是暴力手段）的极权政体。我已在旧作中反复宣讲过这一人类常识。国人之所以有这种持续错觉，是因为不知道辛亥之所以能爆发，是因为满清未能控制军队，而共党获胜一是靠苏联援助，二是靠国府四分五裂，不能如意控制军队，更不能控制人民。国民党乃是浮在社会上层的“飘汤油”，与列宁发明的层层控制了群众的“动员型政党”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共党社会中，即使有一千个黄巢也无所用武，盖他们既无造反所需的经济资源，亦无组织群众的可能。

二、外来干涉可以排除。世界早就进入了后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实力也非昔日可比，别说是武力干涉，就连经济制裁都不可能。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陷入经济困境的西方如今只盼中国老大哥拉一把，还敢杯葛中共？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共采取的绥靖主义态度越来越明显。中共政府悍然干涉法国内政，因萨科奇会见达赖而悍然取消峰会，英国德国等强国都噤若寒蝉。

三、大部分知识分子因进入或有望进入统治集团而心满意足，成了维持现状派。

不利条件是：

一、缺乏传统社会的粘合软件，统治阶级是靠“利”而不是“义”粘结在一起的，百姓的拥戴也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非孔教的“天理大义”，这与传统社会臣民根据孔教教义死心塌地效忠皇帝、无条件服从官府完全是两回事。

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钱买来的，它的维持的前提是经济持续增长。但经济发展势头不可能长盛不衰，随着资源的耗竭（包括国外的资源）后，经济成长势必趋于停滞。即使资源没有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也类似指数曲线，到一定程度速度必然变慢。而国民的消费欲望已经被刺激起来了，再不是过去那个知足常乐的民族，此时知识分子的心满意足就可能化为满腹怨气。

三、国外信息的流入，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突破了我党的信息黑洞。所谓“稳定”指的就是人心安定。然而如邓玉娇案显示的，社会的阴暗面会被草根百姓捅到网上去，引起轩然大波。在这种情况下，若某个地区失控，而全国又因经济危机处于民怨沸腾之中，则局部骚乱的消息很可能迅速传遍全国，引起全国骚乱。

以上不利条件中，即使第二第三条同时满足，党国政府仍然不会垮台，这原因我已经说过了：朝野实力对比绝对不利于百姓，人民 stand no chance，只要共党内部精诚团结，果敢屠民，枪打出头鸟，杀一儆百，则其他人就会被慑服。因此，共党维持统治的充分必要条件乃是内部团结，而这正是上述第一条决定的党国死穴，它构成了党国大规模内讧的主观必要条件。

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实行党内民主（西式民主，不是所谓“民主集中制”），以“数人头”代替“动拳头”，以内部实行民主来确保对外极权统治的可持续性。但共党不可能完成这种和平改造，其原因我也说过了：谁也不敢这么干，谁先放下刀子，谁就会被同志在背后捅刀子，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党领袖只会以斯大林、毛泽东的传统手段解决党内权力斗争，以法外惩罚机构“纪检委员会”（亦即现代东西厂、锦衣卫）实行非法“双规”，做翻竞争对手，以暴力手段代替孔教的“天命论”，在党内建立威信。这是孔教崩溃后领袖们建立权威的唯一办法。但这非常险恶，后患无穷，迟早要弄出大祸来。

由此可见，方鸿渐网友提出的探索前提其实不存在：

“如果和平分赃机制竟然可以在统治者内部达成，那么其他外面的人还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扩展权利？”

而他指出的努力方向似乎也没用：

“舍此之外，就只能是去指出以上的这种战略思维的基本假设的漏洞，从而指出这种思维实际上行不通。其余都 是空谈，当局不会有丝毫动摇的。从他们的利益立场上来说，他们也比较容易接受这套理论，相信种种的政治改革建议都是在谋他们的‘皮’，虽然你磨破了嘴皮告诉他那根本不是要他的皮，更不会要他的命。”

这些年来我写的有关国情的政论，无一不是从客观的利弊分析的角度告诉我党，现行体制行不通，起码得在党内实行民主，否则我党将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不知何时爆炸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要陪着上西天，谁也捞不到任何好处。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方先生以为共党即使不能喻之以义，动之以情，起码可以晓之以利害，可惜胡温并非传统帝

王，任期是有限的，又不能传给子孙后代，他们只要确保生前安富尊荣就行了，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即使胡温听进去也白搭。要发动这种改革，领袖必须至少具备邓小平的实力，连赵紫阳都坦率承认邓小平是唯一一个能发起推动政改、把中国领上正道的党魁，连他自己都不行，因为他没有老邓的实力。紫阳尚且如此，而况共青团员胡锦涛？随着党中央的权威逐代递减，出现领导全党进行这种伤筋动骨的高风险改造手术的党魁的希望就越发渺茫。

综上所述，我认为方先生的建议似无可行性。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2009 年 6 月 4 日

也谈我党政改的压力与动力

网友将陈沅森先生的大作转贴过来，我看了一遍，如我理解不错，他的基本假定是，何频先生说的“中共政改外部没有压力，内部没有动力”不成立，国际上有压力，党内也有动力，唯一妨碍当政者实行政改的，只是出于对“秋后算账”的深刻恐惧。因此，咱们必须对症下药，每个人都签署他拟出的“宪章”，保证自己绝不与共党为敌，对中共既往罪行决不追究，则中共也就会破除那恐惧心结，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改了。

这就是我的理解，不知道说对了没有，还请陈先生指正，谢谢。

若我理解不错，则恕我不能同意。我没有看过何频先生的文章，也不知道陈先生提到的何频开出的“2021 年”之类的时间表是怎么推算出来的，但我同意“中共政改内部没有动力，外部没有压力”的说法，认为这是对国情实事求是的评估。而且，我不认为妨碍中共政改的主要障碍是恐惧心理，更不认为签订一份卖身契即可破除之，遑论促使中共实行民主改革。

先看陈先生的第一个假定：外部有压力。

陈先生认为国际文明世界讨厌专制国家，因此当然有压力，而这似乎就能视为对改革的一种助力。我认为，不能这么理解所谓“压力”。实际上，文明世界对野蛮国家的道义谴责，反而常常是后者赖以巩固内部团结、度过危机的强大助力，毛泽东就最善于此道，兵法所谓“哀兵必胜”。

我曾写过篇《“以夷制华”论》，说的就是这猫腻：但凡我党内部危机重重之时，毛泽东就必然要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引向外部，造成一种“以一国敌天下”的悲情气氛，让他从容化险为夷。其最漂亮的表演，就是将全党投入 “反修防修”圣战，不但把大跃进的灾难轻而易举地归咎于“苏修卡脖子”和“帝修反反华大合唱”，而且使得他成为圣教的唯一捍卫者与继承者，在全党心目中成了“全世界人民”的热爱对象。

现代中共也很精通这一手，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就完全是为此设计的。因此，将文明世界对中国的道义谴责视为改革助力，似乎南辕北辙。

依愚见，能推动国家改革的外部压力，不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谴责，而是中外生活方式的差距。这差距有着多方面的内容：经济军事实力，国民生活水平，社会制度以及文明程度，等等。这其中最显眼直观的区别是前两项，中国历史上两次改革大潮都是因此触发的。

晚清之所以发动大规模改革，根本原因是拳乱使得清廷几乎亡国，老佛爷终于意识到，东西方军事经济实力实有天壤之别，不效法西方实行全面改革，我大清（其实也就是中国）就不可能在国际环境中生存下去。而邓小平的改革也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外经济军事实力与国民生活水平的天壤之别，而八九“风波”之所以出现，则是因为人民从打开的一隙门缝中，瞥见了中外人民生活水平的天差地别。

犹记 80 年代初，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反映日本人民普通生活的纪录片，题目忘记了，只记得影片开头的题词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那电影对深锢于密封罐头内的井蛙们的震撼作用简直无从描述。我厂的老弟兄们来找我聊天，必要说到那部电影，惊呼：老芦，你看了那部电影没有？上面有个普通的日本人家，大彩电就那么白白开着，全家人只顾埋头吃早饭，没人去看上一眼！那么值钱的东西，就这么白白开着哪！日本人真 TMD 有钱！

这就是能推动中国改革的最强大的外部压力。如今这压力是再也没有了。中国过去 30 年内发生的经济奇迹，使得国人可以不必再羡慕小日本，可以居高临下地傲视“老欧洲”，甚至可以怜悯陷入经济危机的老美了。咱们有足够的自豪理由，不必再去学习他人了。他山之石不复是攻错之器，而是变成了攻错的对象。

再看陈先生的第二个假定：内部有动力。

所谓“改革”，其实就是“试图建立西式政治和／或经济乃至文化制度”。离开这一条，根本也就无所谓改革，不是只有祖传的造反作乱，就是顶多有点王安石式的“兴利除弊”，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出更多的弊端来。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改革的灵感与内部动力，都是外来文明冲击引出来的。改革的内部动力产生于中外比较，而改革的蓝图则是西方模式，两者都与人民斗争毫不相干。在东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之前，中国人民斗争了两千年，从未斗争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来。“改革与新思维”完全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直接结果，这是任何一个知道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的。

这也就是我党改革的基本动力与蓝图来源。中共内部有改革动力，乃是 70 年代末的事。其时党内的改革派看到了东西方差距，区别只在于看到的层次深浅有别。邓小平看到的只是经济军事实力与国民富裕程度的差距，而赵紫阳则还看到了社会制度的差距，两人都因此产生了改革愿望。老邓只想改革经济制度，有限地引入西方发明的资本主义，而老赵则在此之外还想以西方政治制度作模本，进行政改。这就是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唯一作数、唯一起作用的力量。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前苏联，盖我早说过了，社会进步主要是靠自上而下的改革（说白了也就是统治者的恩赐）实现的。人民起到的作用不是可以忽略不计，便是帮倒忙甚至开倒车。

国人的一个传统误区，乃是朴素的民粹主义，几乎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没谁愿意承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听任统治者任意宰割的一堆肉”。因此，许多人误把人民的普遍不满视为改革的动力，以为 89 年民间普遍出现不满空气，不是因为看到日本普通民居内白白播放的大彩电，而是因为渴求民主制度，从而构成了逼迫统治集团不得不改革的民意压力，是中国的前途所在，等等。这种幼稚园的理解，与真实图景相差何止以道里计。它其实是倒果为因，把改革引出来的不满，反转为改革的动因。常智者应能理解：若不是老邓老赵折腾，中国人民一定会如北韩人民那样海皮，因为不可能看到普通日本民居内的大彩电。

现在的基本国情是，中外经济军事实力与国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已基本消除，这些方面的国际压力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东西方差距，只是社会制度与文明程度上的，而这并非显而易见，没有“硬指标”，不能量化，不像普通日本民居的 24 寸大彩电那样直观、通俗、富有说服力，只给少数人讲可以，无法使全国人民都知道。统治集团完全可以忽略之。因此，改革的客观前提业已丧失。

从主观前提来说，改革要能发生，统治集团内部必须有一批志士，而这主观前提也已经消亡。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毛共虽然作恶累累，专搞“志士祸国”，但它毕竟富集了一群不计个人得失，为了某种信念献身的志士。在发生信念转化后，一部分党官便会转变为以全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派。这就是 80 年代党内出现“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的主观前提。

然而现代中共完全由一批毫无政治信念与献身精神的“犬儒”把持，这些人的行为动机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全民利益最大化”，而这就是“犬儒”与“志士”最本质的区别。这些人就算看到了东西方社会制度与文明程度的差距，承认中国在这些方面仍有学习西方的必要，也绝对只会停留在“理性认识”上，绝不会化为行动，盖对他们来说，维持既有的官僚社会体制，远比学习西方改造社会的好处更大。这不是如陈先生所设想的那样，是出于恐惧的消极避祸，而是出于攫取更多利益的积极进取心理。以为大众自动签订卖身契即能填满他们的欲壑，未免过于天真。

陈先生看到了中共内部有一批“两头真”，便误以为那些人是改革的动力。这些人的存在当然不容否认。他们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志士，奋斗一生，人之将死，才发现自己当初找错了信仰，于是又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疯狂，扑在新发现的信念上，盖这些人没有信念便无法活下去，与他们的后代完全是两种动物。要说当今中国还有能看到东西方社会制度与文明程度区别、并愿意为弥补这差距而为之献身的志士，我看也就只有这群人。不幸的是，他们的发现未免太迟太迟了些，是在自己再也不是“当权派”时才姗姗作出的。如今他们可做的，也就只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已。除了陈先生，谁也不会以为，几个过气耆宿垂死前的大彻大悟竟能推动中共改革。如今中共当家的人中，再也没有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分，有的顶多是策略争论。胡总“不折腾”一语已经道破了天机，在此之后还要做梦，只怕过于一厢情愿。

“个人利益最大化”不仅是中共当权派的行为动机，也是大部分文化界、学术界以及企业界精英的行为动机。这些人才是能改变社会，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的指导哲学其实是西谚“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有如去发动或推动某种风险难测、成败未知的政治改革，不如最大限度地 exploit 既有制度，为自己谋求最多最大的好处。用《西游记》上的谚语来说便是：“谁愿意‘现钟不打打铸钟’？”

这就是改革难以逾越的主观障碍：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集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认定，既有体制不仅有可能在未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物质利益，也能使得国家更加强大，那么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有改革的内部动力。同样地，如果该集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认定，现行“潜规则”虽然不合理，但它能让自己获得在公

平竞争的干净制度下无法获得的利益，那么那些潜规则就绝不会被废除。而这不幸就是今日中国的基本国情。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部分中国知青（通作“知识分子”，误）都认同这一光辉教导，区别只在于各有各的目的。在志士，那是“国家繁荣富强”；在“犬儒”，那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现行体制既能使得国家日益繁荣富强，又为每个精英都提供了发财的希望，那他们又怎会还为认为有必要去改造现体制，去从事某种成败难测、后果未知的冒险呢？

过去国人钟情于“民主”，无非是误以为那是制造普通日本民居内大彩电必需的一种技术软件，如今他们才发现，专制制度不但照样能使家家户户都有大彩电，而且还能空前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而从事民主改革的前苏联以及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反倒陷入灾难中，这民主手段还要来何用？

相对于传统帝制，现代专制社会还有个更不利于改革的弊病，那就是它是所谓“非遗传专制”。说白了，党天下与家天下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前者无法传给后代。这个弊病决定了统治者绝无可能高瞻远瞩，为了子孙的利益而发动改革。因此，当慈禧终于认识到不改革她家大清的衣钵就无法传下去之后，她便会毅然决定发动改革，因为中国也就是爱新觉罗家的家业，她若把家业折腾光了，后代便无法享受那遗产。这问题对党皇根本就不存在，他只要保证自己在世时能安富尊荣即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折腾”方为上上策。

综上所述，我认为，陈先生赖以立论的两个前提无法成立。目前的基本国情是，国际上没有改革的压力，党内乃至国内没有改革的动力。

至于陈先生把我党不想改革的主观原因归结于恐惧心理，我认为倒也不错，只是失于片面，最主要的动因前面已经说了，还是“积极进取”心理而不是出于恐惧的消极防御。后者当然存在，但这种恐惧心理我看未必是怕杀头抄家，而是怕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政局失控。这种考虑并非杞忧。从极权制度转为民主制度，等于全面拆毁既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制度，重新另建一套，实行权力与财富再分配，造成各利益集团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激化甚至引爆社会矛盾，确实是一种高风险事业，岂是简单的暴民报复可以涵盖的？陈先生将我党的入骨恐惧归结于对“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担忧，

甚至将我党贪官外逃归结于对“秋后算账”的恐惧，窃以为有直线思维之嫌。他据此开出的“卖身契”药方因而也就毫不对症，只能让公民白白自动丧失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绝不会换来我党的相应让步。

陈先生认定党内军内不会发生内讧，我看也未必，窃以为不能以毛共的情势去刻舟求剑，推想未来的光景，必须引入“权威逐代递减”的参数变化。我党历来强调对枪杆子的绝对控制，但到底谁是“党”的代表却构成了内讧的潜在根源，即使是在毛时代也有这个问题，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就是最经典的例子。据此不难想象，当未来的党皇的权威弱化到不足以镇住全局，党内因而分裂成两个或多个互不相下的实力集团时，则枪杆子发生分裂也就是不难想象的事。

换言之，列宁式“以党控枪”，与西方文明世界实行的“以国控枪”是两回事，前者的死穴是永远有“到底谁代表党”的问题。除非在党内实行西式民主（也就是真正的民主），使得党魁在党内获得不容置疑的合法性，这个死穴就绝无可能消除。于是当“党代表”出现合法性危机时，党内爆发武力内讧的前景似乎也就是必然的。当然，这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并非好事。尤其是蒙上帝的诅咒，中国早就有了核武器，党内大规模内讧导致核内战便永远是悬在全民头上的达摩老祖剑。对此恐怖前景，我已经在《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了世界的龙头老大》的政治幻想小说中描述过了。

2009 年 7 月 4 日

通钢事件发送的可怕信号：只有暴力才能迫使官府屈服

7 月 24 日，因民企建龙集团参股重组国企通钢集团，吉林省通化市爆发骚乱，愤怒的通钢工人先将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扣为人质，继而毒打致死，直至政府屈服，先由通化电视台反复播放公告，声称“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希望广大职工保持克制，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尽快撤离”，后由吉林省国资委下发正式文件，发誓“经认真研究并报请省政府同意，决定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通钢工人听到官府屈服的消息后，才逐渐散去，事态得以平息。

这意味着什么呢？恐怕白吃都能明白。

政府是告诉弱势群体，政府吃硬不吃软，不来真格的，不打死人闹出大乱子来，则无论尔等要求是否合理，政府都绝不会理睬。官府只懂暴力一门语言，只有它才是百姓和官府交流的唯一工具，不是政府动用暴力迫使百姓屈服，便是百姓动用暴力迫使官府屈服，“中间道路是木有的”！

不仅如此，官府的屈服还未必靠得住。君不见同一个吉林国资委，在骚乱高潮时可以宣布“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但等骚乱平息后，27 日便发布消息称，“该事件是极少数担心既得利益和别有用心者制造的一起严重的群访事件”。连白吃都知道，但凡政府使用这“极少数人”的阴森森话语，那就等于是为事件定了“反革命暴乱”的性，接之而来的便是暴力镇压。待到枪打出头鸟之后，谁还敢再记得国资委当初“永不翻案”的神圣誓言？到时候政府想怎么办还不是该怎么办，无组织无器械无训练的暴民的自发暴力，岂是政府暴力的对手？于是我党又成功地摆平了一桩骚乱事件。

但问题是：这能是治国之道么？朝野之间的“对话”只能是暴力语言，这算是什么土匪国家？除了秦朝那个短短的时代，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这么烂污过？

无论古今中外，哪怕是所谓“封建皇朝”也罢，官府好歹还在民事冲突中扮演居中裁判或调停的第三者。当年林则徐处理云南回汉互杀事件，就曾反对某些官员提出的“护汉杀回”，主张“只分良莠，不辨汉回”，并在奏折中强调，处理时一定要使回汉双方都觉得官府没有偏袒一方。这就是传统社会处理民间族群冲突采取的典型立场——不偏不倚，秉公行事。

即使是百姓与地方官府发生冲突，仍然可有朝廷作为超脱的第三者出来裁判。著名的杨乃武案件被平反，大批高级地方官被惩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民国时代“民告官”胜诉的案例就更不用说了。虽然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是官僚社会，但过去的官僚未必都是大富豪，治下的百姓未必是其雇员或是他的三亲六戚的雇员。

而今我党却造出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其他国家也从未见过的独一无二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再也不扮演第三者，而是成了不折不扣的资方代理人，劳资矛盾也就是官民矛盾，中国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本家的乐园，不但是外国资本家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国资本家的乐园，萧功秦教授在《急诊室效应与大国之难》一文中说：

> “一个生意人曾对笔者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员是历史上最好的官员，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现在官员想的都是招商引资，想的是把企业拉过去发展当地的经济，他说共产党执政之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能够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是多么好的事情。整个行政部门完全动员起来了，要见一个县委书记，当天就可以见。笔者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台商跟我说，中共搞起经济来，也像野战军一样，联合办公，图章一气敲过来，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见的，怪不得经济发展这么快。
>
> 这当然也是两面刃。因为高效率的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谈判地位很低。权力很大，效率很高，干好事容易，制度跟不上的时候，人皆有之的幽暗面、自私心就有很大空间自行其是。但还是有机会保证效率的同时限制其负面效应。比如资产评估权，如果能够公开，可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明明是 3000 万的矿山，你 100 万就卖给人了，如果是一个比较公开的环境，根本拿不出这个方案来。现实中却“大呼隆”，一下子开放资产评估权，马上就造成大量的腐败。一窝蜂，不这么干的倒成了傻瓜。

几年以前，笔者碰到一个大老板，他说，我都不好意思，国有资产评估然后卖给我们，实在太便宜了。他拿到这些好处，当然要分给那些官员。当时的决策显然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必然要走到这条路上来。当时有机会做得更好，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大跃进’，不要一下子铺开来。”

我知道的情况可比他说的严重得多，哪有什么“老百姓的谈判地位很低”的好事？我原来在的那家厂子“改制”，政府直接就把工厂送给原来的厂长，从头到尾工人毫无发言权，遑论参与谈判。在《闲话“朱镕基神话”》（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616421 ）中，我还严厉批评了主持“改制”的朱镕基，告诉政客们不能把国家当成企业经营。我给朱的定谳是：

“他不是个政治家而是个经济动物，不是个国务家而是个企业家，可担任的最高职务便是计委主任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第一，朱没有尽己所能减轻人民的苦痛，他根本也就不关心人民死活，因为钱迷心窍，毫无必要地制造并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第二，在转型过程中，朱最大限度地默许、纵容甚至推动了社会不公的出现。老朱确实推动中国实行了私有化，可惜是烂污私有化。中国也确实进入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可惜那是类似南美的烂污资本主义，后患无穷。老马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恰是中国恶性走资的最逼真写照。”

朱镕基和现在的当道者们的区别，只在于朱是个所谓“清官”，自己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只是“为艺术而艺术”地坑害百姓，属于“自发的”资本家的护院家丁，而现在的当道者则是“自觉的”资本家打手，毫不含糊地自觉捍卫资本家利益，不容许任何人挑战，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用枪杆子，这就是我党的施政方针。为此，我党以“镇暴”为“治国”，在骚乱爆发前消灭一切“事故苗子”，在事后毫不留情地镇压之，永远只会把一切动乱当成是“境外敌对势力”或是“一小撮阶级敌人”颠覆中共政权的阴谋，绝无勇气承认那是社会弊病乃至社会危机的表现，更不敢承认社会上之所以出现“群体事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我党罔顾弱势群体的利益，直接就把他们视若无物。普通百姓根本就没有可能正常表达自己意愿，通过合法渠道与政府（也就是资方代理人）谈判，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人家给逼得无路可走，忍无可忍，最后当然

只能诉诸暴力。因此，说到底，我党才是当今中国社会上最大的动乱苗子与震源。

就拿通钢那规模如此之大的骚乱来说吧。我不知道前因后果如何，也不知道陈国军是否无辜受害的牺牲品，我甚至能同意，通钢重组后，效益可能会较前有大幅度提升，但这些都是次要问题。我知道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重工业集团，它的产权重组必然要涉及到大量工人的基本福利乃至生计。因此，工人当然有权利过问厂子前途，捍卫他们的合法利益。如果在西方文明世界，哪怕是国企也罢，工会都可以与资方谈判。如果资方不让步可以举行罢工，直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中国那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能享受类似权利，在厂方作出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决定时有一定发言权，那又岂会被“极少数人”煽动起来，大规模犯罪？这乱子不是我党酿造的，还能赖到谁的头上去？

总而言之，中国国情最令人担忧的就是：作为资方代理集团，我党似乎吃定了弱势集团，认定它是一头可以永远靠暴力摁住的饿狼，奉行的是“棒头出孝子，枪下出顺民”的“枪杆子里面保政权”哲学。百姓表示自己正当诉求的一切和平方式都被铁腕禁止，朝野双方唯一的“对话”方式便是暴力，这就必然导致“官逼民反”，最后逼得弱势集团使用官方唯一能听懂的语言来“说服”官方。

这是何等背时恐怖的景象！已有文明史达两三千年的中国人，而今的统治集团怎么会如此彻底丧失政治智慧，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可惜这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无论在哪个方面，我党都在奉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而且还天才地、创造性地将其发展为“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唯一形式”。无论是对付汉族普罗大众，还是对付边疆少数民族，我党都只会用这门“语言”与对方“谈判”。前段发生在新疆的暴乱，论本质与通钢事件并无差别，我党的应对也一模一样：通钢“群体事件”是极少数人旨在颠覆政权的破坏捣乱，而维族或藏族的闹事则是旨在“分裂国家”的“恐怖主义犯罪”。这最终的结果，便只能是官逼民反，害得人家原来不想颠覆的也要颠覆了，不想独立分裂的也要分裂独立了，原来不想搞恐怖活动的也要搞了。《廿四史》上白痴君王不罕见，this 白痴的统治者倒也少见。

最令人纳闷的，乃是海外所谓“民运人士”也竟然会认同我党的“狼羊律”治国哲学。如所周知，“上书房民运”领袖、“军（野）鸡章京”胡安宁先生以他献给“摄政王”的“放台独，拖藏独，灭疆独”九字真言驰名全网，而我党似乎也就正按这国策行事，准备拖死只追求真正自治、愿意与北京谈判解决问题的达赖喇嘛，换上以暴力追求西藏独立的“藏青帮”，把同样追求高度自治、愿意与北京谈判解决问题的热比娅老太太等人打成本拉登式的回教极端分子与恐怖分子。此策当然可以苟安于一时，但若我党发生内讧，或是碰上了重大天灾人祸，则神州大地一定会化为修罗场。

当然这不在我党的考虑范围内。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家最后是否会分裂，甚至也不是政权最终是否会被推翻，而是确保统治新疆、西藏、内地的庞大的资本家集团如何在眼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实现前提当然是持续剥夺弱势集团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为此，他们当然不会恩赐给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权，也绝不会将公民的基本权利恩赐给内地普罗大众，只会反复捏造“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别有用心”之类足有 60 岁的陈旧罪名，以此作为使用暴力的借口，“雄辩地”“说服”各族百姓，只要这些蠢动的饿狼能在自己生前给牢牢摁住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就是我为何要在去年年底预言“明年可能是个骚乱年”，看来这预言将逐年兑现下去，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2009 年 8 月 1 日

海外遥望家国剧变

我有十年没回国了，但一直通过媒体特别是因特网关注国情，太太也时时返乡，因此对国内十年来发生的剧变有点支离破碎的印象。拉杂写在下面，还请国内读者增补纠正。

一、生活水平

城市居民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我对农村情况不了解，以下说的全是城市居民。

衣：

穿着光鲜华美，中低档次的服装花样繁多，价格适宜，大概与西方差不多。年轻人追逐名牌成风，价格大概比西方还贵，是以小留们出国后竞相抢购名牌时装，理由是比国内便宜。

食：

花样繁多，远远超过国外。与国外的区别是，超市有活鱼出售。价钱相对便宜。烹调名堂之多就更不用说了——吃从来是中国人唯一悉心钻研并可以传授、具有可持续发展潜能的例外学科。唯一的缺点是假货太多。但国人心态皮实，根本不当回事。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芦太回去就多次买到假货，例如烂肉做的假火腿、二氧化硫漂白的木耳等等，还曾因吃了这种假货上吐下泻卧病数日。不过许多国人也炼出了火眼金睛，能及时识破。海外赤佬就很笨，只有上当的份。

住：

平均居住面积似乎已经超过欧洲，正在接近美国。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房产，许多人（不是个别人）还有不止一处。装修豪华恶俗。为了提供如此之多的居住面积，全国急剧地城市化了。如今的省城的面积已经等于或甚至大于伦敦、纽约那种大都市，地级市大于毛时代的省城，县城面积接近或等于毛时代的中级城市。不管是哪一级的城市，都在如同恶性肿瘤似的疯狂扩张，城市似乎已经不再有过去的“城乡结合部”。若要看到农田，起码要驱车上百公里。

无论是哪一级的城市，国人都以建筑恶俗丑陋的摩天大楼为自豪，似乎那就是现代化的最直接表征。中国处处是曼哈顿，个个城市一模一样，毫无个性特色，去过一个城市就等于去过所有的城市。过去中国的城市分两类：租界类：天津、青岛、汉口、上海，建筑风格是西洋外来的，但各有各的特色。古城类：北京、西安、成都、武昌，虽然基本格局雷同——都是棋盘格子，但毕竟仍有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如今这分界已彻底打破。即使远至乌鲁木齐，您也别指望看到什么异国情调或是地方风情，那城市与内地所有的城市一模一样，只有规模的区别，毫无外表差异。

这就是我不想回乡的缘故——记忆中那个温馨无限、风景全国甚至全世界第一的小城已经灰飞烟灭，所有记忆中的美景都已被狰狞恶俗的玻璃钢蒙面的水泥怪兽吞噬。此所以我每每看到万润南兄怀乡时就禁不住摇头叹息：他自 89 年仓惶去国后就再没回去，因此一直生活在记忆中，不知道他的家乡早就化为乌有了。不回去远远强过回去——不回去，那记忆还永远新鲜，回去后看到那些 concrete，连记忆都要被破坏无遗。

我说这话可是有充分依据 D。例如山城重庆吧。那城市在我记忆中相当之美（虽然仍远远、远远不及我的家乡）。记得在黄昏时分华灯初放时凭高眺望，江面上传来悠扬的轮船汽笛声，脚下万家灯火层层叠叠，如百宝楼台一般，令人神迷心醉。可 2001 年我回去看，山城居然 TMD 消失不见了！Can you believe it？！歪？因为全 TMD 是摩天大楼，高度远远高出原来的山丘，因此一比衬，地基的起伏不平就给泯灭了。原有的山城的轮廓线（鬼话所谓 skyline）完全被摩天楼的 skyline 取代，让你觉得那个城市并不是建在山上而是在平地上，跟其他城市的区别，也就只是建在江边上而已。它和武汉一样是江城（这点倒没法改变，thank God），但不再是山城了。

那么，政府保留下来的风景区又如何？千万别去，否则会毁了你的美好回忆。我太太上次回去特地去寻梦，上那些魂牵梦萦的风景区走了一圈，回来后大叹晦气，说真不该去。过去那些古刹名山，全 TMD 成了游乐场。当然，庙宇仍在，菩萨仍在，然而多出了大量的伪劣假冒假古迹，还被大量的西式商场与游乐场包围，完全成了购物中心。

简言之，建议所有像老万那样害了怀乡病又无法回国的同志前往曼哈顿旅游观光，那就是诸位的家乡。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海外赤佬才会有的感觉。国人对此巨变心花怒放而且极度自豪。他们虽多是爱国者，其实比我辈汉奸更崇洋媚外，丝毫不知道珍惜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西方恶俗的资本主义景观彻底扫荡了传统人文景观，在他们看来不是文化毁灭而是伟大的社会进步。所以奉劝诸位一定要跟着他们衷心赞美那 literally 改天换地的奇迹，否则定会被他们理解为不想让他们过好日子的嫉妒心理。而且，我辈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看到的是突变，他们看到的是渐变，因此并无我辈的震撼感。

行：

首先是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极大地改善了。我在旧作中说，东北铁路网至今是全国最密集的。此话已经过时。请诸位去查网上的全国铁路图，津浦线一带的铁路网之密集似乎超过了东北地区。我出国时全国无一条高速公路，现在高速公路和国道纵横全国，四通八达。

其次是私家车辆的极大普及，我最后一次回国是 2001 年，那时私车还很少。直到 2002 年，我家才有人开始买车，还是国产车（记不住牌子了，反正是经济车）。但就在过去七八年中，all of a sudden，城市居民一夜醒来，基本上都成了有车阶级，而且好车的比例似乎还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当真是令人咄咄称奇的奇迹。

前段我在网上看到云南某县一个恶警因为倒车撞了某居民的车，人家出来跟他理论时，他竟然开枪杀人。那消息最令我惊诧的是，那是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小县城，而云南在我心目中历来是化外不毛之地，然而就连那种地方的小员工居然也有了私车！

又如昨前天重庆发大水，网友转贴的照片中就有个停车场被淹的照片，此类建筑在本世纪初还根本没有，可见现在车辆已经多到需要西式立体停车场了。

小衲说青岛的交通还行。这和我的家乡似乎是两回事。听太太说，家乡现在的车辆比国外还拥挤。唯一畅通时是逢年过节，盖现在的人过节是开车往乡下跑，而所谓乡下起码也是离城百公里以外。

除了衣食住行，反映民生水平的还有别的东西，例如电讯。我的感觉是城市电讯水平似乎比国外还发达，人手一个手机，而且手机功能俱全，可以拍照

摄像，这似乎比国外还先进。手提电脑也非常之发达，连民工都玩这玩意，不过他们多半是用来看视频，其实是拿来当电视或电话用。

总而言之，就城市而言，老邓在改革开放之初定下的“两步走”的目标已经实现，城市中国已经构成了发达国家的一员。这是我党上台后许下的无数宏愿中唯一实现的一次。

农村情况我不了解，但似乎也极大地改善了。前段在《凯迪》网上看见有人贴出云南农村的照片，到处是洋楼。即使那些照片是沿公路拍摄的，并无普遍代表性，那也很了不起了——当年全国奉养的大寨也绝无那水平的百分之一。

二、贫富差距

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当然非常之大。高薪阶层的大概是国企老总和大型民企资本家，其次是所谓“公务员”也就是官僚，以及大学教授和专业人士们。我的同学在国内者如今年薪约在 20 万-30 万这个档次上，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正因为此，现在待嫁姑娘们对未婚夫婿的期待要么是考公务员，要么是考研。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准确说来是“唯有做官高”。因此考公务员是首选，退而求其次则是做高薪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高知”，高的是薪水而不是知识）。公务员不但是铁饭碗，而且是人上人。

一般工薪阶层的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了。模糊印象中似乎是大型国企和外企的待遇最高最稳定。最差的大概是民工。所谓“民工”也就是农民进城打工。它其实是个大杂烩。最低下者大概是捡垃圾的，高档者则是各种包工头。那些人虽然土，但并不穷。前天我在凯迪上看到一个律师抱怨某个民工赖了他的律师费，那官司也是涉及几十万的债务官司，可见这些人也相当有钱。

总而言之，如小衲所说，即使是城市的低收入者，多数似乎也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不是如同“民运”人士们宣传的那样，挣扎在死亡线上，随时准备揭竿而起。即使是穷，现在的“穷”也和过去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上了一个大台阶，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穷了。盖现代城市居民的支出比较多。例如月薪 1000-1500 元，如果按过去的生活方式，只会主要用于衣食。如果这收入全部用于衣

食，则该人可以过的相当好。但问题是他还必须购房、交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如果结婚还要考虑孩子的学费。这些支出都是过去没有的，但一加起来就不得了，根本活不下去或是活得相当紧张。

当然生活相当困难的还是有的。我在旧作中说过了。我厂当年的一对青工夫妇，后来落魄到连电费与自来水费都出不起，连洗菜都只能拿到受严重污染的池塘河沟里去。但这种情况似乎不是太多。关键还是看年龄。那对青工夫妇的苦难遭遇，主要是因为厂子被政府送给原来的厂长后失了业造成的。而我那些哥们中年龄比较大的则逃过了这不幸。盖他们在此前已经退休，于是便由国家社保局承担养活，成了所谓“低保人员”。他们的房子是原来厂里分的，不必交房租或分期付款养房，因此一点退休金用来吃喝也完全能活下去。除此之外还能去搞点廉价旅游，在附近走走。据我太太说，一个个都还活得相当海皮。

总而言之，就我个人在万里之外的道听途说，感觉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的城市居民已经过上了发达国家的日子，即使是穷人也只是相对而言，并没有到民不聊生、必须揭竿而起的地步。

再说一遍：这是万里之外的道听途说，很可能谬以千里，竭诚欢迎国内网友炮轰火烧油炸。

三、生态环境

上面已经说过，我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数次回国，后来就再没回去了。当时的污染已到了恐怖状态，北京城从来见不到蓝天丽日，永远处于不阴不晴的第三态，头上是望不透的肮脏浑浊的天空，阳光却又能透下来，证明那并非阴天。城里动辄大雾弥漫。这完全是工业污染造成的，盖干燥的华北不是水汽蒸蒸的南国，过去从来不会下雾。1999 年，为了纪念“建国”50 周年，政府在一个多月前便关闭了京郊所有的工厂，还使用人工降雨，总算人为造出了短暂的蓝天。“国庆”过后我回家，当飞机徐徐滑入跑道时，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旅伴惊呼道：“啊！远处有山！我在首都机场坐过无数次飞机，看到远处的山还是第一次！”可见空气是何等污浊。

另外一个问题是北京市的沙漠化更加严重了，动辄飞沙走石，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这俩问题还不限于北国。敝乡历来是丽日蓝天明山净水，过去风里从无沙子，乃是道道地地的“清风”，当然不一定是“徐来”，也常常是“疾来”，但那风绝对是干净的，并不夹带尘埃。可在 90 年代末天空也成了不阴不晴的第三态（当然没北京那么严重，北京是我所居住过的城市中最讨厌的一个，倒不是说人而是说地方。那地方真是烂地方，应该由联合国明令通告世界该地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且当年纯洁的清风也有点类似北京的尘暴了。令我说不出的沮丧。

这情况似乎得到了极大改善。据小衲说，如今北京也能见到蓝天了。这和我家乡的进步一致。听拙荆汇报，家乡的天空又恢复了往日模样，只是地面还是那无比丑陋狰狞的石屎森林。可见改天容易换地难。污染的天空可以恢复原状，被高楼污染的大地却再也无法重光了，又何其痛也！我赶快追问清风是否恢复原来的纯洁，答曰，还是那样，风乍起，吹得人人灰头土脸。

不管咋说，这应该是极大进步吧。网友说，蓝天并不等于空气质量好，但起码比不阴不晴的脏天的空气质量好得多吧？只是江湖河流的污染还非常严重，淡水鱼虾也没人敢吃，甚至无法如当年一样，跟随毛主席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自来水也不能作为饮用水。我过去回乡，乡亲们家家弄了个净化器，要不就是买瓶装水。我至今还记得那广告：“太子水，上帝喝的水。”据拙荆说，水质污染仍然是严重问题，至今无改善模样。倒是 58 年大炼钢铁砍秃的童山有的还栽上了树。这也算一个可喜的进步吧。

四、国民心态

某网友说，他“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回去几天就想回来，到了美国反而有了“回家”感。这小子令我惊奇的是：他怎么到现在才会有这种感觉？我每次回国前都非常雀跃，急着回到那日思夜想的家国去。但每次回去后都觉得与周遭环境乃至亲友扞格不入，觉得自己冒昧闯入了一场没有我的角色的戏剧，说不出的难受。于是反而盼着“回国”，也就是回外国。待到出了飞机场，听到客客气气的洋腔洋调，竟会觉得无比亲切，这才如释重负，从心底浮上了“总算到家了”的感觉。

我也曾琢磨这种感觉是怎么产生的，结论是因素很多。首先是自己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早就脱离了国内同胞的生活环境，无法切入。人家关心的事你莫名其妙，你关心的事人家也觉得莫名其妙。人家在忙活什么，高兴什么，忧愁什么，着急什么，根本就没你这不知哪儿夹进来的过客的什么事，你根本就无法理解，无从过问，正如旅客无法介入客店老板一家的日常生活一般。

其次是彼此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有了很大的差别。出国前，我和兄姐们心意相通到了根本就不需要语言的地步：一个手势，一个神情，一个眼色便知道对方的意思，跟连体胎也差不多了。但后来我回去后却在不同程度上觉得他们成了陌生人。90 年代那阵子商品经济大潮最烈之时尤其如此。我过去无比珍视的亲情，认为是丝毫不可动摇不能腐蚀的亲情，似乎也有了微妙的裂痕。那阵子国内的人对金钱的重视，让我实在是无法适应。当然我家或许是最好的了，可亲情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微妙的影响，再没过去那么完美无缺了。

还有一条就是实在无法忍受国内那些乌烟瘴气。这点我已经说过了。我回国去与先父送终，在医院的耳闻目睹，让我觉得神话中的地狱恐怕也不过如此，党神话中刘文彩的收租院就更是小巫见大巫。这感慨已经写在小说《虎子的天空》与《满纸荒唐言》中了。那阵子的医院三天一结账，交不出钱来立马拔针管赶出病房去。那么决绝，那么狠辣，让你看了不由得从头到脚打冷噤。先父害的是绝症，本来根本也就无所谓医疗了，无非是尽量维持生命，减轻痛苦。但那些白衣魔鬼为了创收，三天两头开外国进口的治疗癌症的贵重药物，到最后大家实在扛不住了，只好去找关系，不是求大夫治病救人，而是求大夫不要再死宰我们了。但尽管找了主任大夫送了礼，他也多次关照过，然而那主治大夫根本就不理睬，照样死开贵重药物。我还真无法想象世上有比那些禽兽更丧尽天良的东西。

此外就是国人的势利。这我也写在旧作里了。医院里的护工根本就不是人，谁都可以欺负。饭店的侍者也是这样，谁都可以喝斥，令我时时难堪甚至愤怒。当然某网友说他没有遇见这种情况。但愿这下烂毛病已经开始痊愈了吧。要么是他回去的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注意到，又或者是他家大人是高知教授，住在所谓高干病房里，因此那儿的护工的待遇要比普通病房文明得多。

总而言之，我的感觉是，如今为朝野共同信奉的事实上的国教，跟晚清时也差不多，仍然是严复《天演论》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胜利者必然是优秀者，失败者就是窳劣者，理当被淘汰，并不值得同情。用爱党网友阿随的话来说就是，羊生下来就是给狼吃的，狼吃羊其实对羊有好处，因为它避免了羊群过度繁殖，破坏了生态平衡。

现代国人与晚清先贤的区别，只在于晚清先贤用它来解释国际竞争，这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确实有相当高的吻合率。他们的用心是唤醒国人的危机感，推动自强运动，其实是相当必要的。而且，先贤并不将它用于国内。在国内搞的还是孔孟那一套，虽然也谈不上什么人道主义，但毕竟不是赤裸裸的“狼道主义”。

现代国人则不但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国际关系，而且用它来处理国内的阶级关系与人际关系。在这点上，官方和许多识字分子的认识高度一致，都认定以下三个恒等式：社会进步＝汰弱留强，同情弱者＝保护落后，公正＝效率低下。前段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将这点说的非常清楚，他认为国内出口行业遭受的经济危机对中小业主的打击是难得的崛起机遇，是“腾笼换鸟”的千古良机，声称“广东决不保护落后生产力”，这其实是朱镕基的思路，即用管理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只看到企业效率，无视民间疾苦。

这是官方的公开言行，百姓又如何？似乎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前些天某网友对通钢事件的评论似乎就有这种倾向。另一位网友也说，他“几次回去看到媒体学校都在鼓吹这种论调，教唆蛊惑年轻人，说比他们老的那辈下岗人是自己不努力懒惰，所以他们贫困可耻不值得可怜，官方没明说，但至少默认和鼓励这种冷血自私的混帐想法”。其实我 90 年代回国就有知识分子跟我说，朱镕基搞那套是应该的，国家就是应该无情扔掉那些包袱。

我是大学 77 级的，那届学生的特点是老少同堂，年龄差别高达 14 岁。有位老同学是老河那样的“烂菜帮”，好像是 57 年生的。她告诉我，每逢老同学聚会，她都把儿子带去，用老同学来作活教材。当中学同学聚会时，她回来后便告诉孩子：看见了吗？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只有做丐帮的命。大学同学聚会后她也要及时教育孩子：看见了吗？如果你好好学习，将来就能和妈妈的同学们一样，工作轻松还能赚大钱。

这种心态的产生我觉得是必然的：一方面，为了打破大锅饭，官方以相当粗暴无情突兀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的竞争观念引入民间；另一方面，贫富急剧分化与新的等级社会的迅速出现，也为全民作了“优胜劣败”的正反两方面的强化示范。似乎可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我党用实际行动注入百姓灵魂中去的。它比当年毛共的洗脑还有效。

当然，说这是全民信奉的国教，有可能夸张了。一位网友就说，他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尚未形成思潮。但我觉得这并非个别现象。实际上，爱国者们的帖子全是这个调调，不但用“狼羊律”来分析国际问题，而且用它来看待国内社会问题。前天我在凯迪上看到一位律师上贴抱怨某农民客户赖掉了他的律师费，使用了“中国农民的真面目”之类的副标题（并非原话，大意如此），引起了许多共鸣，都说农民其实不是好东西，不能同情。

这就是令我担心的地方。某网友说：

> “再说对外关系上。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是否具备了做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公民的各种条件呢？过去国力不强时，没有办法，只好不出头，照着别人定的规则做。现在国力强了，能够参与制定规则了。还会愿意照别人的规则做吗，或者制定出更好的规则吗？我想这是很多国家都可能有的疑虑。但有些做法似乎不是在消除，而是在增强这样的疑虑。”

这也是我的忧虑。如所周知，社会达尔文主义乃是法西斯主义的“科学执政基础”，其特点就是信奉“强权即公理”。而这恰是大多数爱国愤青的坚定共识。他们认为游戏规则都是强者制定的，根本没有什么是非可言，谁的拳头大，真理就在谁的手里。因此，不能说他这不祥之感毫无道理，特别是中国今日因为空前富强，国民极度自信乃至自傲，就更有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可能，最后遭到国际文明社会的联手膺惩。

当然，我也说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引出大乱子的可能性毕竟很小——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从来是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君不见今日中国国力空前强大，中共还拉都拉不住地要急切地把藏南领土送给印度？中国即使走上法西斯道路，也只会是米洛舍维奇那种内向型法西斯道路。我担忧的是，大多数国人，包括那些民运垃圾或亲民运垃圾如胡安宁、安魂曲、方应看等人在内，都

把少数民族当成了那只该让汉族尽情享用的小羊，这必然要在将来引出大祸患来。

即使不引出大乱子来，如果这事实国教真的主宰了大多数国民，那中国就没有可能走上民主道路。“优胜劣败”的 conviction，只会导致国民否定“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等现代民主理论的基本公设，认定等级社会才符合“宇宙运行规律”。

另外一个隐忧是，国人把厚黑学当成了人生最高智慧，这种价值观也足以令人担忧。只要注意一下畅销书，立即就能发现这种趋势。例如易中天先生写的《品三国》卖成了天价，而他写的介绍美国民主制度的著作似乎无人问津。读者的这种选择令我觉得很不舒服。说实在的，我对易中天先生的评价不错，但《品三国》我实在看不下去，盖那完全是钩沉发挥古人的阴谋诡计与深沉心术，极大地投合了如今在国人中最走红的“利益博弈”理论。中国古代什么都缺，唯一不缺的就是这套东西，实在不需要人再来叫卖了。

这也是欺世盗名的宋鸿兵（据他的高中同学揭发，他根本不是什么金融业内人士，本科学的是教育，留美拿了个教育和计算机硕士，在房利美当过程序员，与从事金融业完全是两回事）何以会因为那本《货币战争》烂书暴得大名——它投合了国人喜欢作阴暗心理分析的倾向。如果一个国家有相当比例的“精英”热衷于钻研此类卑下心术，则这个国家绝对不会有什么光明前途。

国人心态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因为经济空前繁荣而获得了空前的自信与自豪，觉得中国再也没有必要学习西方了，转而去崇拜莫须有的“传统文化”，认定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我最近经常在国内网站潜水，发现连某些出过国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有位自称曾经负笈西方、学贯中西、大彻大悟的网人，说出来的那些话让人不知今夕何夕，绝对就是我上面列举的那些：狼羊律是宇宙运行规律，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本质都是一回事，民主其实是欺骗，而且只能带来灾难，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乃是人类智慧顶峰，等等，而且他的 followers 还不是一般的多。

这就是我为何说芦文是为小众写的，中国人大规模启蒙的时代已经错过了。那就是 80 年代，其时举国认定西方是中国的学习榜样。可惜那阵子谁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什么样子，却让柴玲、吾尔开希那些烂仔一劳永逸地砸了西方文化特别是民主的招牌。如果芦文在 80 年代推出，我敢说一定会引起巨大轰

动，然而现在却只会遭到大众唾弃。此无他，它与国人虚矫心态不兼容。国人本来追求的就是西式物质繁荣，至于制度文化上的差异，大众看不见也不会在乎。

某网友指出，国人并不见得愚蠢，只是没有发表机会。我倒认为，现在国内网络的发表机会是过去不能想象的，什么话都能见到。但大多数异议人士只是感性发泄，无论是左愤还是右愤，其实都对他们信仰的东西毫无认知。国学崇拜者就更别提了——他们崇拜的不过是自己的梦象，从来也就不曾存在过。当然确有不少在 80 年代或 90 年代根本无法梦见的青年才俊，令我不能不暗自佩服——别说我在他们的年龄绝无可能有那见识，就是出国前也未必有那水平。可惜我不能不承认，这些人虽然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一批冒出来的先知先觉，可惜不过仍然在知识分子里还是小众。我不认为他们的存在真能对社会发展 makes a great difference。

五、关于“齐飞佯谬”

这“佯谬”翻译得真 TMD 糟，就是英文的 paradox，现在译为“悖论”，也就是“貌似矛盾但其实不矛盾”的意思。这词多用于物理学，齐飞网友是物理高手，当然没有误解问题，我这解释是为文科同志考虑。

齐飞佯谬的正规表述是：

> “国内的情况有点诡异，大多数城市里有稳定工作的人似乎不怎么觉得存在社会危机，除了对腐败有所不满 外，基本上都在埋头挣钱过日子，对未来还是很抱希望的。但有时候看到一些学者或记者调查研究的文章，又让人感觉到社会问题非常严重，似乎那火山随时会爆 发。所以说‘两个中国’的说法是很准确很形象的。”

这感觉大概许多人都有吧？也就是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为何还有秦晖、王力雄等先知先觉出来大声疾呼社会危机严重？

我的感觉是，那个社会的组建方式非常病态，非常畸形，因此尽管它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内里的骨子仍然很烂很糟糕。有识之士看到深层的腐烂，

当然要觉得不安，而一般同志只看到华丽的外表，因此觉得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个人认为，当今的社会的构建有以下烂污特点：

第一，严格实行按权力分配财富，因此达到了全民腐败的理想境界。

一切按权力实行分配，乃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其分配内容囊括了一切，不但是经济收入、物质享受等等，甚至包括了信息的占有权。毛社会也如此，只有高干出差才能坐软卧，看《大参考》，住高级宾馆等等。但当时的社会普遍很穷，一般民众不知道高干的特权享受，也毫无权利观念，并不认为统治集团剥夺公民的权利有什么不合理，因此并不构成社会危机。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那样，由于三大硬件和八大软件的效应，毛共社会虽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却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社会。

后毛共社会与毛共社会的最突出的区别，是引入了私有制，而又在这过程中实行按权力分配财富，“人为合成”了社会的贫富两极。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是费厄泼赖的竞争形成的，而咱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党各级官员动用权力人为制造的。我看过份资料，谓资本主义国家平均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自然产生一个亿万富翁，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短短 20 年内就产生了世界一流的亿万富翁，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如所周知，美国历史上的摩根财团、福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大资本家都是靠自己的本事发起来的，而现在中国堪与他们比肩的富豪有的是，可从未听说过那些人如摩根、福特、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一般，有什么过人的本事或是对社会做出了类似的贡献。

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我原来在的那个厂子也出过个亿万富翁。此人是个老转，初中文化（还是文革中的初中），毫无本事，其唯一的贡献就是把原来还能混下去的工厂偷到要垮的地步，于是上级就将厂子作价两三百万卖给了他。他买下来后并不生产，而是出售地皮、厂房与设备，光是地皮就卖了上亿。就这样，我党动用权力，一举制造了一个亿万富翁和几百个生活毫无保障的平民。一位网友也作过类似介绍。另一位网友也介绍了某个大企业是怎么严格按地位分配股权的。可见这种烂污私有化非常普遍。这烂污过程至今还在延续，通钢事件就是最新演示。

一个社会的统治集团竟然动用政治权力有意人为制造贫富分化，这种社会难道还不是腐恶社会？这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先例。

更可怕的是这“权力”从政治领域里泛化渗透入一切领域，从而造成了全民腐败。这趋势其实发轫于毛社会，当时就连售货员都能“大权在握”，刁难侮辱虐待顾客。这在历史上也是一种创新。广大群众学着“掌权用权”，也就是及时发现自己的行业能提供的一切拿捏别人的优势所在，充分利用那“权力”为自己谋求好处，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勃兴，使得如今的售货员成了人下人，再也没有拿捏别人的“权力”了。然而这概念却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推行，过去是琢磨怎么用自己的职业刁难他人，现在是琢磨怎么用自己的职业创收，于是所有的事业单位都成了大生意：开学校不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生方想法地用出售教材、开班等等为教员创收；开医院不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如何逮住每一个病人“小病大治”、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榨取他/她的钱财；就连矿山的安全保护都成了有关人员的生财之道。前段在网上看到一份国有矿山矿工写的帖子，说负责检查矿山操作安全规范的人员把他们的权力卓有成效地化为“合法伤害权”，利用那行业敲诈勒索，以贿赂量作为“安全生产”的指标，读来令人发指，但非常可信，盖这是全民思维行事方式。既然连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都这么干，难道能指望矿山安全干部例外不成？

这种全民腐败在中国历史上从无先例。吴思先生在《潜规则》、《血酬律》中揭示的“合法伤害权”，过去也就只适用于衙门胥吏，并非全民从事的人民战争。传统社会历来是腐败社会，但腐败只限于官场，并不会渗透入一切领域特别是学术界。可如今“合法创收”竟然成了全民富起来的金光大道，所有的行业都踊跃投入，这就令人不寒而栗了。

早在 80 年代末，我回去为先母送终时，就跟一位大夫说，全世界的医院都是一种慈善机构，目的是治病救人而不是追求暴利。你们既然把这当成大生意做，何不把医院统统改为高级宾馆？90 年代末我回去为先父送终，发现医院的生意做得更大更红火了。我家的经历就不说了。我上一位老同学家去玩，他两口子都是主任大夫，家里摆满了病人送来的礼物。据他自己说，他平时根本不开伙，一日三餐都让病人家属包养了，据说那叫“应酬”。从某网友介绍似乎可以看出，又是 10 年过去了，医院那大生意还在方兴未艾，红火着呢。

学术界似乎也是这样，卖教材收回扣，也就只是中小学教员的小打小闹。“高知”们可看不上这种小儿科。据网友介绍，郎咸平演讲一次就是十几万的报酬。那天在《天涯》的《煮酒论史》上看网友讨论如今中国怎么会没有民国那些大学问家，七嘴八舌说了很多原因。我看最主要的一条还是如今的人财迷心窍，有谁会沉得下心来，如王国维那样去做学问？过去是“学而优则仕”，如今是“学而优则富”，稍微有了点名声，立刻就要去把它兑换为滚滚财源。这还能出大学问家或大科学家？

腐败既然成了全民生活方式，那就是无从根治或起码是难以根治的了。国家再设置什么廉政机构也是白搭，反而为官员开辟了财源。前段见《多维》文章，谓今日之纪检委员会成了明代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锦衣卫与东西厂。这话并不夸张。我有位同学的先生就是纪检会的官员，她嫁给那人后立即便从县城调到了省城，而且成了最早的有车阶级（当然是公车而非私车。我一位中学同学当了区委书记，配置了专车和司机，其实衙门离他家也就百来米，上班照样车来车往，盖那是一种身份的表现）。

第二，等级社会的外在标志变得非常明显，连盲人都不至于错过。

如上所述，按斯大林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本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但该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在不同程度上剥夺公民权利。缺乏权利意识的百姓一般看不到这些。从剥夺公民权利而言，现代的等级社会其实比过去要平等得多（当然只是相对而言），但它的不平等集中表现在按权力分配社会财富与地位上，于是便变得非常醒目。

恶化了这个问题的是国民的普遍势利心态。毛时代官方欺骗宣传还很有效，文革造反更使得老当们心惊胆颤，不敢作威作福，现在则完全撕下了一切伪装，从伪君子变成了真小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行赤裸裸的见人下菜碟。网友转贴的某位先生的归国观感就说：

> “上饭店吃饭，从进门到电梯，到包间，一路上都有服务员驻足问安，‘您好！’‘谢谢光临！’‘专为领导服务！’‘专为老板服务！’等等，不一而足，让人听了舒服。”

我觉得此乃大实话，从虚伪的“为人民服务”变成了真诚的“专为领导服务”与“专为老板服务”，也算是个社会进步吧。

但问题在于，70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可都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欺骗宣传中长大的。如今政府从伪君子变成了真小人，他们可不会认为那是社会进步，只会认为是社会倒退。这就是毛左大量涌现的原因。有位国内网友跟我说，他过去很喜欢芦文，但现在国内的情况让他觉得我对毛的评价有失客观。毛泽东不是治国白痴，也不是瞎折腾，他是真心为了人民当家作主，是个伟大的平民政治家，云云。

我无话可说，只好请他去看我纪念五一六通知的长文，告诉他我从来也没认为毛是个毫无信念的政客，反倒一直告诉大家毛是个狂热偏执的理想主义者，而他给人民带来的最大灾难，恰是他想让百姓用暴力手段去“当家作主”。如果中国没出过那种民粹主义政治家，则今日也未必会有这种赤裸裸的“专为领导服务”、“专为老板服务”的官僚社会。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走向反面”。

与全民腐败一样，这森严的等级也渗透到了一切领域，包括学术界在内。用网友金唢呐生动的描绘来说便是，中国乃是一层层爬满了猢狲的大树，上面的猴子看下来全是“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屁股”，下面的猴子看上去则是红屁股汇成的红海洋。

有趣的是，老金介绍国情的文章引起了下面的猴子的愤怒反弹。有的国内网友就说，老金是个大学阀（当然没用那话，这是我自己用的表述），屁股决定脑袋，从自己的地位看社会，自然要美化现实。其实老金已经说清楚了，“学阀”们把研究生当会说话的工具，无情驱策利用之，而研究生们出国后还来信感谢老师的严格要求。其实那感谢未必是真心的，那位愤怒抨击老金的网友似乎就是学界的底层劳力。但问题是，整个国家都是如此建构的，学界岂能例外？你要靠个人操守去与潮流相抗，最后只会按吴思说的“清官淘汰律”那样，得罪所有的人，自己被淘汰出局。我要是留在国内，大概也要像老同学们那样，变成了学阀吧。

第三，社会缺乏化解危机的手段。

这个问题也反复说过。江总所谓“稳定”，胡温所谓“和谐”，使的都是传统帝王的“消防”手段，了无新意，就连胡温对地方大吏实行的“问责制”，也是原模原样抄袭传统帝王。我已经在《漫话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中介绍过，过去朝廷对封疆大吏的要求只有两条：完粮纳税与维护治

安。一旦地方发生暴乱，则方面大员不是杀头就是充军，传统“问责制”可是比如今结棍多了。

这种“稳定”“和谐”，似乎可以更准确地称为“消防心态”，其实质是把人民看成潜在的敌人，把防止他们的反对或甚至武力反抗当成了治国首要鹄的。这防止的方法则是革命的两手，软的那一手是由政府扮演体恤下情的包青天，对弱势集团单向施恩，改善他们的境遇，避免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硬的那手则是剥夺他们和平抗争的一切权利，将所有的抗议行为都定为非法，一旦逾越这界限，立即铁腕打击。

如所周知，西方民主社会之所以能有效化解社会危机，乃是人家治国的思路完全不同，他们不把“反对”等同于“敌意颠覆”，而是将它程序化与制度化，变成化解社会矛盾、达成各派利益平衡的基本杠杆。所谓社会矛盾，也就是全民分赃不均引起的冲突。它之所以产生，说到底就是某个或某些阶层或集团觉得分配不公，起来争吃打闹，直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于是社会矛盾也就暂时化解了。

中国的治国之道则与此截然相反，谁胆敢抗争，谁就是大逆不道的阶级敌人，就一定要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予以无情镇压。弱势集团改善境遇的唯一指望，是朝廷单向施恩，决无可能是通过双向谈判争来的。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只在于传统社会还容许百姓和平请愿，而现代官府连这都要看成是造反，以致人民居然发明了“散步”这种和平示威手段，这在世界史上大概还是独一份吧，在“人民国家”居然会有这种烂事，其讽刺意味大过了前苏联所有政治笑话的总和。

这结果，就是取消了百姓通过合法抗争手段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一切手段，使得制造社会矛盾的社会弊病无从根治，矛盾只能积累而不能化解。这种背时治国手段，使得“群体事件”成了百姓实现诉求的常规手段，让国家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邦乱邦，反过去更强化了统治集团的恐惧心理，使他们更不敢放手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

另一方面，人民和统治者的潜在敌对状态，也使得统治集团的“阶级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成了历史上捍卫自身利益意识最明确、最自觉、最主动的统治者。据中国广播网 6 月 17 日披露，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却被开发商建了 12 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

当记者前往采访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逯军居然拔掉了采访机话筒，质问记者：“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类似地，戴秉国最近在美国发表的谈话，也特别强调了统治集团自觉捍卫其利益的坚强决心。他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由此可见，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最重要的还是维护那烂污制度一万年不走样。和这比起来，连国家主权、领土乃至国家利益都是可以牺牲的。

最令人无奈的是，这种烂污治国之道竟然获得广大海外华人的衷心拥护。就连在本坛都这样。每逢国内出了“群体事件”，“法制派”们便出来援引西方镇压暴乱的例子，给我党打气，要求他们出重手镇压，却看不到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百姓维权的合法手段，百姓只有乖乖做顺民一条路，更看不到“按狼”不可能是永久的，历史上除了秦朝那个短短的时代，从无哪个帝王光用革命的硬的那一手来求长治久安。

第四、“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成了维持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此乃老邓的治国思路，也就是用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的百姓普遍富裕来缓解社会危机，维护统治，古话所谓“买静求安”。

30 年来的经验证明，这治国之道确有神效，最强烈的对照是苏东的政治改革之路。中国最不稳定的时代乃是“风波”以后。90 年代初我回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骂娘。那时若有外敌入侵，我看人民必然起来配合，中共立刻垮台。但经过这些年来的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据说是已经进入唐虞盛世了。

这也不难理解。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乃是外来货，中国人对它没有什么理解，略有所知的人也认为那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过去一个半世纪先贤追求的就是“民富国强”，如今大多数城市居民总算过上了海皮日子，当然要感到极大的心满意足。此外，中央政府拥有了空前的财力，也可以用施恩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救济弱势集团，以防他们活不下去，揭竿而起。于是经济繁荣的规模效应便使得大多数百姓生活水平获得了改善，贫困化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但这思路的潜在前提是两个：第一，国民经济可以无限发展。第二，人民有口饭吃就不会起来造反。

这两个前提我看都值得推敲。

关于第一条我已经说过了，那其实是美国道路，未必适用于中国那种资源小国，人口大国。当资源消耗殆尽之后，发展就会停滞下来，甚至大幅度衰退。如果要继续学美国，就只能对外输出资本，让外国普罗大众为本国资本家打工，但要完成从“世界打工仔”到“世界大雇主”的转变，其难度恐怕要远远大于个人发生此类转变，就算能完成这转变，也必然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而在此前能否维持社会稳定还在未定之天。

第二条我也说过了，不平心理的出现，有如说是与经济增长有关，莫如说是与分配有关。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对不平心态发生的基本原因的深入观察。毛时代公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解放前”极大地下降了。国民党蒋匪帮说毛共掌权后“富者成了赤贫，贫者更穷”，不是所谓“反共八股”，而是事实陈述。但那时大家都心满意足，即使是在大饥荒中也不曾有过大规模的揭竿而起，比起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完全是两回事。那阵子大概是我党当国以来最丧失民心的时代。

因此，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把经济发展当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手段，使得国家的稳定变得非常脆弱（vulnerable），缺乏对经济危机打击的承受力。同样程度的经济萧条或衰退，西方人可能处变不惊，而在中国就完全可能引出动乱。

第五、社会发生了严重断裂。

这也说过了，识字分子完全成了逐利动物，被官方的高官厚禄收买，既没有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道关怀，又彻底丧失了传统士大夫悲天悯人的仁义传统，对弱势集团普罗大众的遭遇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苦难。只有个别优秀知识分子如秦晖、王力雄等人才看到了深重的潜在的危机（请注意那是潜在的，并没有到外显的程度），于是出来大声疾呼，这就是苏轼说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过那“暖”字必须改成“冷”字，也就是他说的：

>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

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故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以上就是我对“齐飞佯谬”的解释，其核心是：中国建构社会的方式很不正常，缺乏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设计；国人的心态很不正常，朝野都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正义”。这种国家的统治集团当然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但它的稳定是建筑在持续经济增长，国民生活不断改善之上的，一旦这前提不复存在，则社会难免大乱，而因为国人心态失常，那将是很残酷无情的悲剧。

2009 年 8 月 10 日

关于未来中国走向的一点再思考

本区承蒙多位国内先进光临，为我等孤陋寡闻的海外赤佬介绍国情，写的文章精彩纷呈而且发人深思，用鬼话来说便是 intellectually provocative ，堪称本区成立以来的空前盛况。老金和老看的大作我都反复看过几遍，涉及面之广，谈到的问题之多之复杂，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消化。我只能在此说点初步的读后感。我辈远在万里之外，对国情十分隔膜，难免谬以千里，还望诸位先进不吝金砖。

一、关于“权威逐代递减律”

老金已经说了，此律有两个版本：芦本与唐（德刚）本。芦本认为，因为缺乏“天命论”，现代专制制度的致命缺陷是中央政权随传代而逐代递减，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事实上的藩镇割据，某个野心家便会起来发难，挑战中央政府，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因为我党独霸了全国资源并建立了空前严密的控制人民的手段，以及靠科技进步完全垄断了暴力，暴力革命不可能发生，但中共一定会垮于内讧。

唐本我在旧作中介绍过，他也观察到了权威逐代递减的现象，但不知其所以然，没有看出那是“天命论”被破除使然。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央权威的弱化最终将导致中国实现民主化，但他毫未解释原理何在，没有作出任何推导，便扔出了这个想当然的结论，未能意识到那其实是个未经论证的假设。

我认为唐说不能成立，基本理由是，弱化的只是中央相对于地方的权威，并不是官僚集团控制人民的能力。它的表现是，地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敢于抵制甚至公开反抗中央的命令（前段汪洋公开向温家宝叫板，宣称“广东不保护落后生产力”便是例证），但这并不是说我党对人民的控制弱化了，更不是说权贵集团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将人民被剥夺的权利归还给人民，而做不到这一点，建立民主社会就只会是空谈。

换言之，建立民主社会的前提，是我党对人民控制的逐渐弱化。但“权威逐代递减”弱化的并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中央对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控制。事涉官僚集团利益时，下面必然明争暗顶，使得中央“号令不出中南海”。但一旦事涉镇压人民，则全党高度一致，雷厉风行，充分发挥出“举国体制”的高效益来。这种选择性弱化对人民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那就是取消了自上而下进行政改的可能。即使上面出了明君，其政策无论原初动机如何，到了下头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充分发挥出“尺蠖效应”来。

因此，这种弱化，充其量只能导致我党大规模内讧，引发天下大乱。若真是那样，则一定又是“大乱出大治”（本人和革命派的基本分歧就是认为大乱只会出专制，绝无可能出民主，这已经在《反革命书》中反复论证过了，此处不赘），由一个毛泽东式强人以暴力统一全国，将近现代史重演一遍，再度倒回到毛时代，那又有何乐趣？

老金对芦说提出质疑。他指出：

第一，递减不是无限的，只表现到第三代，此后便不再呈现明显的递减。

我同意。的确，权杖从江泽民传到胡锦涛手上，并未发生明显的权威流失。因此，看来递减曲线是个指数曲线，到第三代后便与横轴基本平行了，权威的负增量不是很明显。

现在的问题是，既有的中央权威是否能保证在国家出现严重动荡之时镇住全局，箍住桶板？敬爱的郭老诗曰：“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作太平天子没什么了不起，真正考验权威的时刻，是局面动荡不安之时（倒还不一定是真的发生动乱）、以老邓那种第二代的铁血人物，摆平个“六四”还挣得五痨七伤，党内出现了严重分裂，几乎失控，将来再出个大规模的示威（这种可能性总不能彻底排除吧）又该怎么办？

第二，权威递减并不限于政权机关，同样发生在军界，因此，我担忧的军界强人夺权不可能发生。

我的确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也完全同意，现在的军队彻底烂透了，比北洋水师还腐败，毫无战斗力。但我仍然觉得，世上唯一不会被腐蚀的是权力欲与野心。不管时代怎么变，野心家永远不会绝种断根。我党历来实行“枪杆子里面出法统，出正义，出真理”的土匪哲学，说难听点便是“拳大即为爷”，中

央的权威也就是“拳威”。一旦这威力弱化到一定程度，则无异于殷勤邀请野心家们去问鼎之轻重。

事实上，无论是第三代还是第四代都遇到了这种麻烦，而这种事在第一代，第二代时根本就没出过。第一代就不用说了，第二代老邓其实是“篡位”爬上去的，用马悲鸣的话来说是“小拿大”，而且他上去之后彻底背叛伟大领袖的教导，疯狂走资，可从未有人胆敢质疑他的权威，遑论向他挑战，说明实力才是“合法性”。到第三代可就没那么轻松了，江总非得使出锦衣卫的非常手段来，才能摆平桀骜不驯的陈希同。即使如此，还得经过大老点头。第四代做翻陈良宇走的也是那条路，同样靠锦衣卫，同样得经过大老点头。

很难设想第五代第六代不会遇到类似麻烦。如果天下一直太平无事，倒还可以勉强应付。如果局势有点动荡（例如“八九风波”），能靠锦衣卫轻易摆平么？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吧？如果挑战者逃过锦衣卫秘密抓捕，铤而走险，效法国焘同志另立中央，那岂不是只有开战才能解决此类权力斗争？军队腐败不假，然而那是打内战，北洋腐败成那样子，在内战中还不是照样威风凛凛？两边都烂成一样，腐败还能影响什么战斗力？

第三，现代人都实际得很，中国是个没有志士的国家，不可能再有过去那种为糟蹋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因此，暴力革命无爆发可能，中国能这样隆隆混下去，长治久安（注，“隆隆”跟“海皮”一样，是芦太的洋泾浜英语，意为 long, long ）。

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意老金。我也反复论述过现代革命家都是“口头革命派”，是梁启超当年笑话的“远距离革命家”。而且，中共对人民的控制的严密史无前例，即使有志士，也没有可能去把人民组织起来。因此，中国只会有自发骚乱，可为我党轻易荡平，不会有有组织的革命发生。这是基本大势，不容置疑。

但我不认为国家就会这么“隆隆”地长治久安下去。而这恰恰是权威逐代递减造成的。斯大林模式造出了一个权势空前的官僚集团，这集团提供了社会体制的稳定性与保守性。即使是第一代强人也未必斗得过这百头凶龙，伟大领袖死后尸骨未寒，亲信、爱妻和贤侄立即沦为阶下囚，长达十年的文革便以老干部资反路线全面走向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走向全面崩溃告终。

连伟大领袖都如此，何况是权威极大弱化了的继承人？赵紫阳在其生前发表的谈话中坦承，要搞让官僚集团失去权位、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连他都不行，因为“我没有实力”，只有老邓才有那能耐。个人觉得这是大实话。这就是说，能真正改变中国前进方向的领袖也就是第一代与第二代，第三第四代只不过是官僚集团的代理人，只能在人家划定的框架内小打小闹，绝无可能做出实质性改革。

这就是说，权威逐代递减，使得国家不可能产生不顾官僚集团反对一意孤行的传统式明君，任何旨在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都没有了可能。这就是现代专制国家与传统帝制的根本区别。套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民众的大联合》中的名言来说便是：“天下者，官僚之天下；国家者，官僚之国家。官僚不说，谁敢说？！官僚不做，谁敢做？！”

说白了，中国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再改也不可能伤筋动骨，触犯官僚集团的利益。敬爱的锦涛同志上次在讲话中已将这说得再清楚不过：既不走回头路，也绝不搞西方那套，这就是他对官僚集团发出的神圣誓言。这也很好理解：无论是搞毛左那套，还是搞西方那套，都必然伤害到官僚集团的利益，没谁会同意他这么做。他要真敢改动现有政治格局，打乱现有利益分配方式，则他的总书记也就做到头了。

既然改革已经结束，将来的政治格局只会率由旧章，那么社会矛盾恐怕要逐渐积累起来。一个国家若不建立不同利益集团和平争利的谈判平台，只靠革命的软硬两手维持，则一旦经济发展停滞下来，或是出了什么重大天灾人祸，那积压下来的矛盾就势必爆发出来。而前面已经说过了，弱化了的中央作太平天子倒容易，遇到乱局可就麻烦了。到时要靠官僚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认同感，齐心合力对付危机，似乎过于简化了人性。苏联之所以解体，其实并非戈尔巴乔夫本意，我看主要是他缺乏权威造成的，野心家叶利钦瞅准了机会，公开推翻了他。有谁能说到时中国不会出个那种人物？无论是陈希同还是陈良宇，若遇到乱局，岂还会乖乖俯首就擒？

综上所述，窃以为，权威逐代递减虽然在细节上有修正余地，但基本立论仍能成立。它确实是现代专制制度的死穴，由于缺乏天命论，现代专制制度无法像传统帝制那样，平安无事地隆隆传下去，一直传递几百年。而且，它是一个死套子，套进去便出不来，盖它从根本上取消了大刀阔斧改革现行制度的明

君出现的可能，使得官僚集团成了一个毫无抗衡制约势力的独霸天下的巨无霸，极大地限制了国家制度的改革弹性与应变活力。

二、新时代的“潜规则”

自吴思先生《潜规则》、《血酬律》两本书出版后，“潜规则”一词成了大陆民间的标准政治术语，用它来指代“新”社会中权贵们以权谋私的非法行为。然而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新”、“旧”社会的“潜规则”有着本质差异，而这正是“新”社会无法长治久安的又一个内在设计缺陷。

看客网友将这点看得非常清楚，他说：

> “在一个不久前‘均贫富’的国家搞私有制，如果不说清搞私有制的理由就没法制定规则，在无规则的情况下硬干，只有执政团队是由一批有着相同信念，肯为国家前途无私献身的志士组成才是有可能成功的。因为这是利益格局的大重组。当时的邓、赵、胡缺的就是这样的团队。赎买换来的‘改革’有今天这样贿赂公行、道德沦丧的结局没啥奇怪的。反思这段历史，前共产党国家真正成功的转型方式可能还是东欧方式。
>
> 今天的‘按权力分配财富’是不仅有中国特色，还有时代特色。这个时代凭借权力获得不义之财与以前的情景不同，以前的待遇、等级是有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享受特权的人享受得“理所当然”。今天的权钱转换不为现行的法律甚至他们自己的党纪所容。这样的转换得不到惩罚的话，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因而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民众养不起。
>
> 这种权钱转换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用这种钱无法形成摩根财团、通用集团、松下公司这样的工业、金融实体。这种实体必须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才有其组织、专业队伍和技术积累。首先是靠抢发家的人不敢把财产摆在明处，芦先生说的那个买厂子的迅速的兑现就是这个缘故，其次是拿惯快钱的人对办企业逐步扩大的过程感觉不过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中多数人没有搞好一个企业的本事。 ”

此话正中窍要。窃以为，吴思没有把“潜规则” 真正说明白（当然他在国内也不可能说明白），大众遂用今日中共官场行事方式去类推，以为那同样是

不可告人的暗中交易，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吴思所谓“潜规则”，在传统社会是公开的，当时称为“陋规”，其实也就是不成文法，同样是“王法”，与其他“王法”的区别，只是没有形诸文字而已，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偷偷摸摸的勾当。

我在《漫话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中解释过，传统社会的组织相当原始简单，国家不给官员发行政经费和工资，而是实行“政治承包制”，亦即将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包给他们，要他们利用权力去向百姓刮钱，刮来的钱在交足赋税之后，剩余的归自己，作为行政费用以及本人的薪金。朝廷对他们的要求只有“完粮纳税”与“维持治安”两条。只要尽到这两个责任，则他们利用权力为自己捞了多少钱，朝廷一般并不过问。此乃整个政治制度的组织运转方式，为大众熟知，不是什么潜藏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称为“潜规则”似有误导作用。事实上，朝廷还特地把富庶地方当成“肥缺”，奖赏给那些邀了天眷的官员。它之所以是弊端，乃是因为朝廷只规定上缴给朝廷的税额，却不规定官员创收定额，明确划定行政经费与官员个人收入的比例。

因此，传统社会实际上实行的是“模糊治国”，贪腐与清廉根本就无从界定。向百姓刮钱，既是官员的职责，也是他们的权力，无论是公用还是私用，都靠官员自己去刮。官员个人收入该是多少，朝廷并无明文规定，由官员自己凭良心决定。实行这种模糊治国，使得惩治贪腐有了很大的随意性，没有什么明确标准，因为官员的合法收入根本也就是说不清的，自然也就没有现代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之说。因为并无可以比较的参考系，而国人又缺乏政治设计能力与想象力，所以并没有人觉得这种制度设计实在太原始粗陋，更无人觉得它不合法。

中共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却与此完全不同。它与传统社会相似之处，只在于同样有一个 all-powerful 的官僚集团骑在百姓头上，拥有无从制约的合法伤害权。但财务税收制度却是从西方引入的，无论是行政费用，还是干部薪金，都由国家编入预算，统一发给，根本不需要官员自己利用权力去找米下锅。因此，官员是否贪腐，有明确的判定标准：凡是多于薪金的收入必是贪污所得。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第一个重大区别：传统社会中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必须按“陋规” 维持正常办公并养活自己。因此，是否实行所谓

“潜规则”并不是判别贪腐的依据，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凡是实行“潜规则”的官员统统是贪官。至少在理论上为党纪国法不容。

这就是看客先生观察到的政府官员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原因，那其实是做贼心虚的表现。这种心理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新”社会继承甚至倍增了“旧”官府的“合法伤害权”，却不幸放弃了传统社会的模糊治国，引入了西式财经制度，使得所有动用这合法伤害权的官员都成了为党纪国法不容的罪犯。

“新”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第二个重大区别，是前者的官定意识形态与实际的社会制度针锋相对，使得所谓“潜规则”实际上成了“逆规则”，官方的“言”与“行”尖锐对立到了互相否定的荒谬地步，蔚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如所周知，传统社会的官定意识形态是儒教，它也就是社会的组织原则，因此社会制度与主流价值观完全一致。全社会都信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国教完全忽略了百姓的基本权利，强调的是臣民对朝廷和官府，儿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仁爱。社会的粘合与运行软件与其硬件完全匹配，甚至可以说硬件是根据软件的规定制造出来的。因此，官府使用合法伤害权压榨剥削人民，只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毫无权利观念的百姓被捉将官里去三推六问，毒刑拷打，也只会自认倒霉，绝不会怀疑青天大老爷没有权利这么干。

“新”社会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官定意识形态每句话都是对我党施政实践的有力驳斥与无情否定。如我在评论《零八宪章》的系列文章中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只有“党的领导”这条作数，其他无一条不被我党无情践踏：冒充“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却是权贵资本主义，动用国家权力实行烂污私有化，人为制造官僚资产阶级；号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却允许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资本家加入执政党；规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却将工人阶级打入社会最底层；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却是中共政治局；规定司法独立，却让社会团体中共操控司法；赋予人民一系列基本权利，谁敢行使它们却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犯罪”，政府还处心积虑压低人权，将它化为国际竞争的巨大优势……。最可

笑的，还是把水火不相容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融为一炉，写入宪法总纲，当成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在人类历史上还真没见过这种言行处处对立、自我否定的荒谬立国方式，这是传统社会根本不足以比拟于万一的。如今实际上的治国之道，不但是法律和道德没有明确规定的“潜规则”，而且完全就是与官定法律和道德相反的“逆规则”。执政党的实践，不但为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不容，而且为他们自己制定的党纪国法不容。这还不是说个别官员贪污的问题（这儿说的不是汉语的“个别”，而是英文的 individual，没有前者“极少数”的涵义），而是说整个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官定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简言之，那个奇特的社会根本没有“王法”，全靠朝野的某种默契在运行，那就是“强权即公理，拳大即为爷”。这与国内不守交通规则胡乱开车都还不同——国内开车虽是乱来，可至少没有开到对面的逆行道上去吧？这种连个起码规矩都没有的低等土匪山寨，要长治久安，隆隆地维持下去，实在是超出了我的贫乏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当然，老金已经说了，咱们的优秀传统就是模糊治国，稀里糊涂不但是本区副统帅的网名，而且是敝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一传统在新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就是最佳示范。最搞笑的还是影片《建国大业》竟然由众多的外籍明星出演，而那些外籍影星还毫不迟疑地自称中国人，以致国内网人最近在《凯迪网》推出文章，含泪请求他们停止自称中国人，说“你们可以侮辱我们的贫困和卑微，但不能侮辱我们的智商”。所以，如此稀里糊涂地混下去，似乎也无不可。

但问题在于，传统社会并不是一切模糊，该清楚的绝不含糊。大儒曾国藩把这点讲得很清楚：

>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 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因此，传统社会并不是如现在这样毫无明规则的烂污社会，每个人都给编织在伦理宗法网络中，属于某个等级，就享有什么样的身份，能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谁若擅越雷池一步，谁就会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规则明确到这种地步：长辈不说话，小辈就不能开口；长辈没吃完饭，小辈就不能离席。圣贤的

教导以及据之制定的一系列“礼教”明规则，为全社会共同真诚信奉，绝非我党的宪法，是制定出来专门让统治者践踏的。

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有无明确的游戏规则，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哪怕是个高档点的土匪山寨如梁山泊，或是有组织犯罪的黑社会，也有明确无误的行事规矩，所有成员必须一体凛遵。这是任何一种社会包括黑社会持续运转的前提。没有这规则就无稳定性可言。

固若金汤的苏联帝国为何会在旦夕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垮掉，一直是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前天某网友介绍了复杂性与自组织理论，说该理论可以解释这现象。老芦无学，对该理论一无所知。但在我看来，苏联帝国之所以发生那种无从预想的剧变，似乎是它的社会设计内在缺陷决定的，就是这些缺陷使得社会缺乏稳定性。因此对一个设计合理的国家不会有什么重大影响的偶然因素，却能让那个庞然大物忽喇喇如大厦倾。

这根本的设计缺陷当然很多。逆天行事，否定私欲，剥夺人民的创业自由，使得社会缺乏生机，毫无可持续增长势头，最终陷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就是谁都看得见的一条。老邓的改革也就只去除了这条缺陷。但同样重要的两个缺陷他却没看到，也常为大众忽略。

第一条就是 “权威逐代递减律”。已经在前面提到了，苏联“民主化”并不是因为毛子人民突然悉数害上了民主相思病，那是西方媒体捏造出来的神话。毛子那种下烂民族至今也不知道民主是怎么回事。俄罗斯至今是个专制国家，公民根本享受不到西方的自由。苏东之所以发生巨变，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不满于社会缺乏活力，效法西方改革，却又没有相应权威去实行那种根本性改造，因而先被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后被叶利钦联合各加盟共和国党魁夺权罢官。事态之所以急转直下，使得“联邦”在旦夕间瓦解，乃是因为无论戈尔巴乔夫也好，保守派也好，都没有足够权威镇住全局。

第二条我看则是上面说的逆规则，苏联宪法同样是制定出来被执政党无情践踏的，整个国家都建在一个无耻谎言之上。领袖们据说是无产者，却是骄奢淫逸的奴隶主，而据说是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则沦为奴隶，连在沙皇时代能享受的基本人权都被无情剥夺了。所有的人说的都和做的完全相反，社会完全靠欺骗与暴力维持，因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有铁血强人才能压住阵脚。当领袖权威极度弱化，高层发生严重的权力斗争冲突时，社会就会轻易解体。

反观其他稳定社会，都不存在这两条设计缺陷。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还是西方文明社会，都是高度稳定的。

传统社会信奉天命论，不存在帝王权威逐代弱化的问题，而且，它的软件与硬件高度匹配。虽然压制人欲违反了正常人性，但毕竟“冠履”的分野清清楚楚。帽子理直气壮地做帽子，鞋子安分守己地做鞋子，双方都认定那是天然合理的，从来没人硬要把鞋子说成帽子，帽子说成鞋子，更没有帽子冒充鞋子的咄咄怪事，因为根本没有这么做的必要。

因此，现代人可以指责儒教违反正常人性，但无法指责它是欺骗麻醉人民的谎言，也不能指责统治集团欺骗愚弄了人民，盖“平等”从来不是儒教的主张。儒教与民主理论的区别，只在于建立理论的原初公设（assumption）不同而已，并不是如共党那样，自相矛盾到了这种地步：一面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普世价值观，不但冒充人民政权，而且不得不以普世价值观作为制定宪法的潜在依据，装模作样地规定了公民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一方面却又组织“秀才”写批判文章，硬把普世价值观说成是帝国主义颠覆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阴谋诡计。

西方文明社会也同样没有这两个问题，无论是总统还是首相，都是民选出来的，其权力由法律明确规定，上任那天就有了与前任一模一样的权威，绝无逐代递减的怪事。人家信奉的政治理论也就是人家制定宪法的依据，而那宪法可不是编出来嘲弄百姓的，纸上写的每条公民权利都在现实中十足兑现。西方的整个立国原则，就是处处反对小衲同志热心提倡的“和稀泥”，将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全部程序化，制度化，使得一切都有章可循，井井有条，从而具备了高度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一个系统要能隆隆持续运转，前提是有一套明确、自洽的运行规则。这就是规范系统与混沌系统的区别。所谓蝴蝶效应只发生在混沌系统中，不会发生在严格遵守牛顿力学的太阳系星体运动中。此所以人类能发射宇宙飞船飞到火星上去，什么都是明确的，没有“测不准”一说。而西方文明社会乃至中国传统社会与中国现行烂污社会的区别，也就是规范系统与混沌系统的区别。传统社会若不是人口严重超载，再遇到重大天灾或/和外患，则千万双蝴蝶翅膀也不会煽起让朝廷倾覆的大风暴来。现代烂污社会可就难说了。重庆

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贵州德江事件等等，全是很小的事引发的。这在规范国家根本就不能想象。

当然，这些局部的自发骚乱并不足以颠覆政权，引起全国大乱。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诱因与事件的规模绝对不成比例，它提示了社会结构的混沌程度对偶然诱因的放大作用，由此产生了系统的不稳定性。不难想象，当国家遇到重大事故（例如严重的天灾，严重的经济危机，等等），就有可能诱发中央内讧，那表面上有烈火烹油之盛的“太平盛世”完全可能像苏联那样在旦夕间垮掉。

更何况我党偷偷摸摸地背叛马列主义毛思想，使得一切都名不正言不顺，无论干什么都心虚情怯，理不直气不壮，使得所有的人都如看客网友观察到的那样，产生深重的不安全感：“公仆”们违反党纪国法偷盗国家财产，一有风吹草动就想往国外逃：中小业主因为私有制仍为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容，不知道哪天就会被政府翻脸清算；普罗大众就更是毫无规划前途的可能，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追求的就是“活着”……

这些说起来都还是小事。严重的是，毛泽东思想并没让人忘却，而当局如今搞的这套，一定会在将来被毛式野心家当成死穴猛捏。据《博讯》报道，前两天 500 名官员和学者就通钢事件上书中央，声援“通钢工人兄弟的正义斗争”，发誓“为捍卫和壮大国有制的通钢奋斗到底”，并声称：

> “宪法规定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并继续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捍卫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长期艰苦 奋斗，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工人阶级用长期艰辛劳动建立起来的国有经济，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恢复工人阶级和广大 人民的国家主人地位，维护确认和保障上述成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尊严和权威，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十分迫切、关乎全局的重大任务。”

和平时期尚且如此，而况大局出现动荡之时？我党已经遭受意识形态的全面破产，而这绝不是“爱国教”可以替代的。那玩意只能煽起国人的仇外情绪，并不能消除全面实行“逆规则”制造出来的无数内政尴尬。例如未来的野心家起来讨伐中央的“无产阶级叛徒”们，援引伟大领袖毛主席留下的一系列教导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出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檄文来流布全

国，请问敬爱的党中央将以何辞对之，又该怎么在《两报一刊》上发表社论，将其批倒批臭，在全国人民中肃清流毒？

三、前景展望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列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那其实就是坦承，所谓"人类最高智慧"辩证法其实没有预见能力，而偶然也未必是必然的表现。我非马列主义者，却也不是算命先生，因为我并非必然论者，深信偶然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并不下于必然因素，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未来是 unpredictable 的。咱们虽然可以找出现实中决定未来发展趋势的必然因素，但据此作出的预言未必不会被偶然事件打破。我想，或许这就是老金观察到的"中国的事，难说"的原因吧。

那么，影响中国发展的必然因素有哪些？上文其实已经说了，这儿再结合它们对外来中国发展的作用加以检讨。

第一个必然因素就是权威逐代递减律。它决定了中国已无实质性政改的可能，统治集团还政于民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这儿所谓"实质性政改"，所谓"还政于民"，指的是统治集团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恩赐给人民。它只可能自上而下地进行，亦即党魁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强制推行一系列削减官僚集团权势的改革措施。不幸的是，权威逐代递减律决定了第三代、第四代领袖即使有心，也没有第一代雄主或传统帝王的权威，能压下官僚集团的反抗。因此，苏式极权制度具有强烈的自锁性质，钻进去就无法解套，只能维持，不能从根本上改建。

苏联的历史就昭示了这一点。要实行伤筋动骨的政治大手术，改建利益分配格局，唯一能胜任的领袖只有斯大林，连赫鲁晓夫那第二代领袖都没本事。老赫不过是做了点起码的经济改革，因为触犯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就被宫廷政变搞了下去。继任的勃列日涅夫吸取了教训，只当维持会长，绝不轻举妄动，因此得以隆隆统治，死在任上。待到戈尔巴乔夫想改革，又被保守派推翻，最终招致苏联解体。叶利钦虽在表面上取得了成功，但那其实是靠冲突双方都没有足够权威压住全局，党内严重分裂，全党全民处于高度的思想混乱之中，他

才得以靠纯粹的个人意志与赌徒魄力侥幸胜出。那其实是险胜，并没有什么必然因素在内，缺乏可重复性。

苏联的教训为中共充分记取了，那就是，在一个极权国家中，如果领袖不具备能始终镇住全局的绝对权威，就贸然启动政治改革，那就很可能引出无法控制的雪崩反应，最后导致执政党垮台。老邓的高明也就在这点上。他知道改革只能在维持党天下的前提下进行，否则会失控。赵紫阳说，只有邓才有足够实力启动政治改革。我则觉得，即使是老邓出来作戈尔巴乔夫，凭他雄厚的实力、铁血性格与泼皮气质，虽然有可能压住全局，最终险胜，但也必然是险象环生。只有毛泽东那种第一代枭雄才能胜任这种重塑国家机器的大改革，。

老邓的跛足改革给后继党魁留下的教训，便是只能做勃列日涅夫，决不能做戈尔巴乔夫。这就是为何小胡转正时我出来告诉大家，他只会是个勃列日涅夫式庸主，绝无可能是安魂曲等人一厢情愿预言的戈尔巴乔夫。其实不管是谁上去都别无选择：作勃列日涅夫式的维持会长，则国家不会大乱，自己也能安富尊荣终老。作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家，则国家可能崩解，自己难免身死人手为天下笑。除非是圣人，谁愿意自杀？

所以，因为没有化解危机的机制，积重难返，那种烂污制度只能维持，不能改造，维持则能尽可能将动乱往后推，隆隆地统治下去，起码自己任上没问题，而改革则只能让动乱提前发作，连自己的平安都难保证。反正那是党天下，不是家天下，杰弗逊的“放狼难题”其实不能用在这里，盖那不是一个人按住恶狼，而是一代接一代地按，前任不会因为担忧后任被狼吃了，就去想出个和平放狼之计来并冒险推行，只会“击鼓传花”，只要定时炸弹不在自己手上爆炸就行。

当然，也不能说那种制度一点化解危机的能力都没有。如果弱势群体受损实在严重，怨气冲天，则我党会以冯驩代孟尝君烧毁借据的市恩方式来缓解民怨，也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消防的方式来解除燃眉之急。那原则是，只能由党扮演旧式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居高临下地施恩，绝不容许弱势群体与权势集团平起平坐，靠平等谈判解决利害冲突。

如老金介绍的那样，这当然有效，尤其在政府变得极大富裕之后，市恩并非难事，因而能延长我党统治的隆隆性（应该是 length，不能再是 long, long，但反正是洋泾浜），但我仍然觉得那并非根本解决办法，再计入“尺蠖效

应”，它的效果就更有限了。最大的问题还是政府永远是冲突的一方，无法如同西方民主政府那样扮演中立超脱的角色，因而始终是民怨的焦点。

权威逐代递减的另一效应已经在上文探讨过了，那就是它使得政局始终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在太平年月倒不会显示出来，但国家经受重大震荡之时，我党内部就有可能爆发内讧，如苏联那样迅速垮掉。

第二个必然因素就是我说的逆规则的腐蚀效应。它彻底败坏了全民心术，使得国家完全成了个毫无起码规矩的土匪山寨， “狼羊律”成了事实上的国教， “讲力不讲理，用诈不用德”成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如果说权威逐代递减律取消了中共还政于民的可能，那么，逆规则对全民素质的败坏便取消了自下而上和平演变的可能。它决定了即使中共垮台，国家也不会有什么光明前途。这大概是中共统治造下的最大的孽。

这道理已经反复说过了。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这儿所谓“品德”，就是全民恪守游戏规则的基本德行。专制是痞子的游戏，玩的就是不守规则；民主是绅士的游戏，玩的就是规则。只要参加的任何一方不守规则，民主游戏就绝无可能玩下去。孙大炮之所以是戕贼民主的国贼，就是他带头以土匪暴力手段践踏共和游戏规则，使得枪杆子首次名正言顺地取代传统的“天命”，成了领袖合法性来源。这下流教义经过我党几十年的反复强化，便使得无耻践踏游戏规则成了国人心目中的大智慧，而恪守规则者却变成了东郭先生，被毒蛇咬死的农夫，甚至是宋襄公式的蠢猪。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去除了中共这个政治势力，让人民自己选择领袖，国人也缺乏必要的主观素质去组织一个健康的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吴耐的设想太过于乐观。他的基本假定，是人们都是理性的，会顾及长远利益，避免只求眼前利益，干出伤害全民包括自己在内的蠢事来。这基本假定是从英国的和平演变模式中提取出来的，那在该国确实成立。可惜有如说英美模式是人类的常态，莫如说它是个例外，起码国人特别缺乏这种理性。

其实老狼那海盗分金博弈已经讲清了这个问题。这还不只是诸位提出的信息是否隔绝的问题，而是贪欲本身就与理智矛盾。如果海盗们有正常的理智，就该均分那 100 枚金币，然而每个人都想独占，因此最可能的结果还是自相残

杀，最后全都死了，即使剩下个把幸存者，也没本事一人把船开回去，最后只会死在海上，于是谁也得不到那些钱，哪会如作者设想的那样文质彬彬地搞博弈，花尽心思智胜对方，而且从头到尾都严守游戏规则，哪怕最后只剩两个人，其中一个也会根据投票结果自行投海？说到底，人的理性并不是纯粹的，随时随地受到感情的干扰，冲动性决策是常态而非变态。对于某个民族来说，该民族的理性就更受传统心态与价值观的制约，而敢于并善于自伤似乎恰是敝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

咱们别的也不用说，看看毒食品事件就够了。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某位网友评论道：

> “厚黑学并不是多么高深复杂的东西，只要大脑没有问题，谁都能掌握。大家都掌握了，大家都没有优势，最后导致全民交易成本最大化，并且出现了目前这种互相下毒的局面。卖奶粉的绝不喝奶粉，卖猪肉的绝不吃猪肉，卖蔬菜的只吃自家单独生产的无毒蔬菜。谁都觉得自己最聪明，自己占了便宜，其实大家都是厚黑学的受害者。”

这本来是粗浅的人类常识，可偏偏国人就是没有，您说到底是什么缘故？是不是咱们建立了民主制度，这些东西就能根除了？我看未必。如果西方也搞起这套来，那政府根本就没辙。哪怕法治再严明，司法机构也绝无可能镇压轰轰烈烈的全民战争。人家之所以不搞这套，我看还是出自理性导致的自我约束，知道并不光是我会骗人，人家也会骗我，如果大家都做假货坑人，必然要使得全民交易成本最大化，最后自己非但赚不到钱，还有被毒死毒残的风险。可国人偏偏就缺乏这点理性。您说怪不怪？

这还不是毛共统治的结果，咱们历来如此。当年李闯进攻北京，崇祯急招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关勤王，需要 100 万两饷银，国库里却只有 40 万。崇祯急得要死，动员官员们捐金助饷，大臣们立即争相哭穷，纷纷在门上贴“吉宅急售”，装出穷到活不下去必须卖房的可怜模样。皇帝无奈，只好请国丈周奎为皇亲国戚作个表率，带头捐赠十万两银子出来，但周国丈只肯拿出一万两来。皇帝要他捐两万，他宁死不捐。周皇后悄悄给了她爹五千两，却被他干没了两千，只捐出去三千。等到李闯破了城，刘宗敏将所有的降官拷夹起来，日日夜夜以毒刑“追赃”，光从周奎家就追出银子 50 多万两。

这就叫“望乡台上打莲花落”，乃是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要指望未来的商人们如当年英国的资产阶级那样，不走邪道走正道，不仅本阶级一致主动抵制诱人的潜规则，搞西式公平竞争，而且还能精诚团结，抵制官府的威胁利诱，逼迫官府停止以权力介入经济运作，只怕太脱离国情民俗了些。

第三个必然因素就是苏式极权制度彻底粉碎了原有的民间社会，使得社会“原子化”，所有的公民都成了一种“单体”，悉数编织入唯一的社会网络——党组织的操控网中。这种社会要向民主社会转型相当困难。而且，这种社会没有“水密舱”，只有万能的党作为唯一的船壳，一旦破裂就会很快沉没。到时吮吸我党狼奶长大的十几亿凶猛动物一下子失去约束给放出来，那情景当真不堪设想。

考虑到这些必然因素，我对未来中国前景的展望不能不涂上厚重的悲观色彩。总的感觉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社会没有实现向民主转型的可能，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民主恩赐，还是自下而上的和平民主革命乃至暴力革命，都没有发生可能。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我党就能稳住阵脚。但若经济增长减缓，则各地自发骚乱发生率可能会升高，但这并不会导致大局失控。能改变中国走向的，还是我党这个决定性因素。只要我党精诚团结，敢于并善于杀一儆百，则不管怎么乱，我党都能隆隆地统治下去。但因为中央权威已经极大弱化，所以始终有外因诱发大规模党内内讧的可能。若遇到严重影响全民生活水平的重大经济危机，这种风险就更高。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前景，但由于系统缺乏稳定机制，我党再太平统治四五十年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党是否垮台，中国都不大可能顺利实现文明化，遑论民主转型。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一个脱离中国 20 多年的海外赤佬在万里之外的管窥蠡测，很可能是一片胡言。说错之处，还请国内大贤痛加修理。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我巴不得自己的悲观估计彻底落空。

2009 年 8 月 22 日

试论中国对文明世界的挑战

一、“文明”的标准

所谓“文明”有多方面的涵义，主要指的是“文化成就”与“生活方式”。评判文化成就的高低使用的是美学标准（亦即复杂度、精巧度、完备度、深度等等），而评判生活方式则是看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两者都是主观价值判断。咱们现在的讨论重点与文化成就无关，说的还是生活方式，例如日本的文化成就比不上欧美，但你决不能说日本不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相反，如果即兴网友的东京见闻具有代表性，则我看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比欧美文明多了。

判别生活方式是否文明，最主要的标准，我觉得是看社会的主体信奉的是什么价值观。如所周知，西方信奉的是所谓“普世价值观”。它的内容很多，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社会成员严格遵循机会均等、费厄泼赖的游戏规则去逐利，根据同一原则和平解决利害冲突”。

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就在这条上。所谓野蛮社会，一定要否认社会全体成员享有均等的成功机会，一定要实行“强权即公理”的 “狼羊律”，用暴力剥夺一部分人的机会，以暴力裁决利害冲突，一定要践踏或扭曲游戏规则以确保竞争的不公平。反过来，若能遵循上述文明原则，则文化成就低下也没关系，照样是文明国家。做不到这条，则哪怕文化成就再高如纳粹、苏联者，也是野蛮国家。这道理很简单：所谓“文明”就是“远离丛林”，实行丛林哲学的国家当然只能是野蛮国家。

以此标准来衡量，则现代中国乃是不折不扣的野蛮国家。更严重的是，这个野蛮国家已经对文明世界构成了严峻挑战，具有腐蚀、败坏甚至颠覆文明生活方式的潜在危险。因此，国人现在的任务，还不仅是怎么让祖国逐渐脱去野蛮气息，开始文明化，更要考虑如何防止那野蛮浪潮祸延全球。秦晖教授首先提出了“世界中国化”的前景。窃以为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大众的重视。吾爱吾

国，吾更爱文明，我只希望中国文明化（也就是西化），绝不愿意看见既有文明被中国破坏。但这只是我的主观愿望，至于“世界中国化”的前景有多少现实依据，是否杞忧，如果确实有这种危险，又能否防止等等问题，则尚待大家冷静理智地探索。

二、时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历史

人活在世间，总难免要接受许多“不证自明”的命题，构成思维定式，作为思考时依据的“定律”，如同解数理化习题时使用已知定律作推理前提一般，却从来不会或很少去想那“定律”是否成立。这“历史潮流”就是最常见的伪定律。

所谓“历史潮流”，意思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遵循某个必然规律，必将到达某个预定的光明归宿。东西方都有此“革命乐观主义”信仰。马列邪教自不待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坚信的“大同世界”也不必说，就连亨廷顿的“第三波”也是这种胡言乱语，只是据说此公临死前终于悟出了“普世价值观”未必普适，也不知是否真假。即使如此，西方信奉“大同世界”的人并不少，都认定文明一定会战胜野蛮，先进会战胜落后，全世界最后会奉行统一的价值观亦即普世价值观，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缺乏证据的宗教信仰，未必经得起验算。无论中外，历史上都多次发生大幅度逆流的情况。如所周知，日耳曼等蛮族的入侵倾覆了西罗马帝国，使得欧洲在经历了灿烂的经典文明之后，堕入长达将近千年的政教合一的黑暗时代。此后虽经文艺复兴打破了坚冰，开始进化，但在上世纪初又出现纳粹与苏俄的黑暗统治，几乎摧毁了整个文明世界。纳粹虽被摧毁，苏俄却不但屹立不倒，还把灾难扩散到其他国家去。哪怕是在“苏东波”发生之后，那下烂国家虽然一度改邪归正，可惜好景不长，又显示出走回头路模样。

中国也曾多次经历文明的逆转，最先是秦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历史上唯一的学术繁荣时期。后来又是蒙古人的入侵和朱元璋的上台，不但造成文明的大幅度倒退，而且建立了一种更加荒悖、更无生机与改良余地的小农专制政体。最严重的还是自辛亥以来发生的持续倒退，最终使得国家堕入了史无前例的黑暗

深渊，直到 30 年前才初步从无边的黑暗中拔出来，但折腾至今仍未找到一种比较干净、体面、合理的生活方式。

这是从纵的维度来看，从横的维度来看，就算中国确有改造潜能，我也实在无法想象人口占相当比例的穆斯林们会接受“普世价值观”。别的不说，老美改造阿富汗好多年了吧，成效如何啊？只怕是越改造越糟糕。那么诸位又有何依据相信将来回回世界会走上西方的道路？

这些历史事实根本就不是“历史潮流”的信奉者可以解释的，也不是变相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的。例如西方颇流行过一阵子“汉堡包”论，那意思是说，如果吃得起汉堡包的人构成了社会主体，则该社会就会自发进入民主。中国的经济奇迹证伪了这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豪断。如今中国的富庶程度，绝不是北美独立时可以比拟的，更不是英国光荣革命时代可以想象的。但今日中国距民主不仅比那时的英美更遥远，恐怕连 13 世纪初的英国都不如——起码提出《大宪章》的贵族就开始有了人权思想萌芽了吧？不知我党权贵的觉悟能否跟人家相比？

因此，我的感觉是：1）没有什么历史潮流决定人类社会的演进方向。2）人类不像是有共同归宿的样子。“大同世界”，不管是孔教徒的朦胧幻景，是马列的相当明确的蓝图，还是亨廷顿的民主世界，都是一种宗教幻想，没有足够的支持线索。3）人类的未来未必是光明的，起码不是所有民族的未来都是光明的。先进未必战胜落后，文明也不一定战胜野蛮。

三、文明与野蛮的较量

因为人类发展的不均一性，更因为西方文明内在的扩张性，使得东西方在近代发生了碰撞。虽然西方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均一，但仍可大致看成是文明与野蛮的互动。文明对付野蛮有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价值观侵略”的糖衣炮弹，一手则是武力征服，以老金的生动表述来说便是“骟”了乱尥蹄子的野马。

“价值观侵略”见于西方文明对中国千年生活方式的轻易瓦解。国共两党的洗脑教育给学童造成的一个持久智能创伤，便是列宁发明的“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理论”，我已经在旧作里多次指出这点了。没说的是，就连国民党人乃

至海外史学家唐德刚等肤浅之辈，也竟然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反帝史观”，以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天下更没有比这更弱智的解释了。

其实我已在《专制制度至今仍是中国的最适制度么？》中讲过了，帝国主义当然对中国实行了武力侵略，但那并非真正的灾难根源。西方列强给中国造成的最大灾难，还是它们带来的先进价值观。就是它轻而易举地瓦解了中国赖以立国、赖以维持社会长期运转的稳定软件，使得中国从此失去最适生活方式，陷入无休止的混乱之中。

如所周知，古代中国官府无法垄断非常容易制造的冷兵器，对百姓毫无严密的组织控制，其行政机构极为简单，一个县也就几个衙役，不但没有什么中宣部、公安部、国安部、庞大的武警与网警，其镇压机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官府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用不着担忧民心不稳，不必如我党干部一般，成日家战战兢兢，把维护社会稳定当成最大的职责，然而一个朝代动辄就能延续两三百年，靠的完全是百姓把官府当成祖宗供奉（这就是孔教的核心教义）。一旦这精神柱石被鬼子的“平等”观消融，大众发现官府原来并非不可背叛的祖宗，则国家立刻便是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油将尽，陷入内乱之中。光是“人人可作总统”的简单信念，就使得若在古代必然做了皇帝的袁世凯好梦难圆，更使得此后的独裁者再也不敢打出皇帝的名号来。由此可见“观念侵略”的威力。光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白痴唯物史观的有力证伪。

愚以为，此类文明侵略是一把两面刃，一方面为具有巨大惰性、缺乏应变智能并善于自欺欺人、妄自尊大的民族引发了无休止的内乱与战祸，另一方面也好歹带来一些零星的良好影响。那些鼓吹“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爱国白痴不知道，如果不是鬼子打进来，咱们非但没有如今学校里开设的一切学科（文史除外），没有鬼子带进来的艺术、文体项目（包括“跳房子”、“跳绳”、“跳皮筋”一类儿童游戏），而且至今还在玩八股文，考科举，实行一夫多妻，蓄奴纳婢，而县太爷、知府则一身数任，兼充侦探、公诉、陪审团和法官，以站笼、夹棍、笞刑、跪烧红的铁链、钉竹签等酷刑逼出来的供词结案，以大辟、腰斩、凌迟、灭族等惨绝人寰的手段“明正典刑”。如今中国再野蛮，好歹还是忍痛放弃这些优秀民族传统了吧？光是政府被迫接受“无罪推定”的西式价值观，就是靠本民族再进化两千年也不会自发获得的伟大进步。

武力征服的那一手，在 19 世纪以前主要表现为英法征服第三世界，在 20 世纪则是英美武力抵抗德、日、苏等野蛮国家的挑战。后者信奉的意识形态虽然不一样，但对文明世界的挑战非常相似，都是不承认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要以暴力撕毁之，重建丛林“新秩序”。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吉凶难卜。为了击败纳粹的挑战，文明世界不得不联合另一个魔鬼苏联去共同对付之。不难想象，如果德、意、日、苏按原设想结成了四国轴心，则鹿死谁手正未可知。光是文明世界遭受的巨大风险，就足以提示“文明必定战胜野蛮”的乐观主义并无来由。

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提示，文明和野蛮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本质上是伟大领袖说的“对抗性矛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价值观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不可能既承认人生而平等，具有同等权利，又认定人生而不平等，必须按权势分配社会财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冲突成份在内，但最根本的冲突还是价值观的冲突。德国和日本在被文明国家骟后（＝善后）接受了文明价值观，恪守游戏规则，获得的财富绝非当年可以梦见的。要论“征服世界”，日本人在 80 年代还庶几近之，日产家电、汽车起到了“大和魂”从未起到的作用。但这两国并未因此遭到其他文明国家的嫉妒和绞杀。光是这个事实就足以驳倒马列的市侩“唯利政治观”。

明白这个道理，则不难看出，如果中国不实行文明化，则她与文明国家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仍然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这种冲突既可以表现为战争，又可以表现为和平较量。前者可以立即排除，盖我党再蠢也没有那个胆量（勇气从来不是敝民族的优点），需要考虑的则是和平腐蚀。

四、西方不可能改造中国

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西方已经对中国失去了吸引力》中指出了。东西方最大的区别，也就是是否接受“普世价值观”。过去中国人向往西方生活方式，并不是出于对人家奉行的价值观的理解和赞赏，而是出于对人家物质生活水平的艳羡，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投入社会改革，则是为了圆“富国强兵”的世纪梦。当中国极大地富裕起来、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之后，西

方的榜样自然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如果说过去中国人还会出于艳羡，朦胧地认同西方价值观，则如今的国人只会居高临下，鄙视在金融危机中风雨飘摇的美国和苟延残喘的“老欧洲”了。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敢正视现实，就不能不承认，自鸦片战争以来的 170 年内，中国人反复证明了自己毫无按照西方模式改造自己野蛮生活方式的能力。即使在承认西方比中国先进、立志效法西方进行改革的晚清和民国期间，中国都非但没有能力完成西式改造，而且越折腾离西方价值观越遥远，那么，在如今中国靠自己独特的烂污体制成了国际社会的暴发户之后，又岂会低首下心承认自己不如人，必须向西方学习？我看大家可以死心了。

上文已经说过，文明对野蛮的征服无非是两手：价值观的软性征服与武力征服。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流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颠覆性变化，使得帝制再也无法建立起来，同时也或多或少使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变得文明了些（例如“无罪推定”的引入就算是再不彻底，毕竟结束了传统官府暗无天日的“三推六问”），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国永失最适生活方式，使得中国社会永久失去了稳定机制。正如一部近现代史表明的，这些变化只引出了社会动乱，并不能推动中国发生良性社会改变，促使西方价值观的普及。我看不出有什么迹象提示，在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极大地削弱之后，中国还能靠自身努力完成文明化。

武力征服则可以立即排除。即使是对不堪一击的清帝国与中华民国，所谓“帝国主义列强”也从未打过这种主意。文明国家诸如英美法不必说，就连烂污帝国主义国家俄国／苏联和日本也从未计划全面征服中国，想的不过是鲸吞蚕食中国的部分领土，在剩余部分建立起傀儡政权来罢了。如今世界早就进入了后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国力又空前强大，这种可能就更不存在了。

在这种情况下，武力征服只可能发生于中国效法德国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形下，然而这前景立即就可以根据中华民族的怯懦天性排除。由此可见，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外战争不会爆发，自然也就不会有文明对野蛮的武力征服。

这结论就是：世界改变不了中国，“普世价值观”不是普适的。

五、中国可以并且已经改变了世界

在过去 30 年中，中国充分发挥了“低人权优势”和“极权体制优势”，利用西方资本家贪得无厌的发财心理，大量吸纳西方资本与技术，获得了经济起飞所需的第一桶金与“现代化”必备的 know-how，从原来的一穷二白弱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三经济实体，这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世界的面貌。

中国的榜样对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野蛮国家的感召力是不用说的。前段在电视上看西方记者对俄罗斯知识青年们的采访，发言者一致认为，民主自由乃是后一步的事，俄国的当务之急是像中国那样在经济上迅速繁荣起来，恢复过去的超级大国地位，云云。

请注意，与欧洲文明国家不同，俄国那野蛮国家的国民从来是种族主义者，对中国人历来充满鄙视。俄国民间有许多侮辱中国人的笑话，就连“亚洲”这个词在俄语中都含有贬义。当初斯大林接见中共代表团时曾说“我也是亚洲人”，我党官员竟然蠢到不知那其实是斯大林纡尊降贵、故作高姿态的安抚行为。俄国人有此传统毫不足奇，盖那国家介于欧亚之间，曾被蒙古人统治了几百年，本国并无原生文化，一点文明完全是从欧洲引入的。如所周知，世上最势利的人不是真正的贵族，而是向上爬的暴发户，迫害少数民族最烈的苏联人不是正宗的俄罗斯人，而是斯大林那个格鲁吉亚人。由于这特殊的历史背景，老毛子当然会看不起亚洲人特别是中国邻居。

然而就连历来鄙视中国人的老毛子都情不自禁地以中国为效法榜样，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中国人不但自己成功地拒绝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使得俄国人民开始抛弃或起码是怀疑过去已经认同了的西方价值观。

我常常想，如果苏联撑到现在还没垮杆，那么在目睹中国发生的经济奇迹后，苏联人民乃至东欧人民大概也就不会起来造反了，起码改革家们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不难想见，类似的榜样效应还会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而正是这些野蛮国家构成了世界的大部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该对世界有较大贡献。”他的梦想果然在今日开始实现了。

中国对文明世界的影响，我认为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上，首先是掏空了人家的实业，使得英美在不同程度上变成了“夏洛克之邦”（关于此公的 CV，请看莎士比亚著《威尼斯商人》）。这倒不是如某些民主愤愤所说的那样，是中国深谋远虑颠覆西方的大阴谋——便借邓小平一个脑子，他也想不到改革开

放竟然会引出如此深远的后果。他的精明只在于吃准了人性的弱点，认定西方资本家的发财欲望一定会压倒力薄儒们的道义感，文明世界对野蛮制度的天然憎恶，并不能妨碍资本家为了发财向野蛮国家源源注入金钱和技术。实践证明他的这一认识是何等英明，就连六四大屠杀都没能遏制资本家的贪欲，将来就更不可能了。

总之，西方之所以出现产业空洞化，乃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两厢情愿的事，谁也怪不了谁。如秦晖所说，西方国家中"农会赶跑圈地者，工会吓走投资家，环保人士让工业家破产"，资本家早就受够了煎熬，乍见到中国那块硕鼠的乐土，岂能不心花怒放？当然要纷纷将工厂迁移到工资和资源成本极度低廉、环保成本为零的资本家天堂里去，让本国变成个只有所谓"金融产业" 在买空卖空的泥足巨人纸老虎。等到炒钱炒出大难来，这才发现从中国挣来的钱其实并非恒定财富，不过是一些抽象符号而已，在金融危机中不免烟消云散，只留下中国成了"全球化"的唯一受益人。此乃西方资本家因聪明过度、贪婪过度而作法自毙，须怨不得谁。

如形势已经昭示了的，世界金融海啸，对中国的打击最小，对西方的打击则非常沉重，而且，中国可以轻易复苏，而西方却在近期内毫无指望复苏。这道理并不需要懂经济学就能想过来：西方在中国留下的是工厂、设备和技术，捞回国去的不过是一堆票子。这些票子可以在股票市场上瞬间内化为乌有，而留在中国的工厂、设备和技术可是不会消散的实物。因此，中国面临的无非是产能过剩，而极权政府从来不缺乏以大规模工程人为制造内需的权力。西方短缺的可是票子。没了票子，哪来资本再去中国投资？又哪来资本重振本国的实业？

即使是西方有钱重振实业，也很难做到这一点，这里面的妨碍因素很多：首先，西方的自由生活方式使得政府无权压下资本家的贪欲，禁止他们去具有低人权成本优势的国家投资，逆转本国产业空洞化的大趋势。其次，民主政府无权压制选民的人权，降低"人权成本"，使得本国具备竞争优势。第三，政府无权无视实情，人为规定对本国有利的汇率。第四，实业所需的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和技工）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培训出来，而西方有些国家已经把这些名堂丢得差不多了，绝非想重振就能重振。

举英国为例。如所周知，毛纺、造船、航空工业历来是英国的传统强项，当年英国毛毯和呢料风靡全球，记得我家当年就有英国毛毯和西装。而铁达尼就是英国建造的。直到 50 年代，英国的航空工业还非常先进，劳斯莱斯公司制造的斯佩发动机全球闻名。该国不但发明了喷气式飞机，而且还是最先制造出大型喷气客机的国家之一，甚至和法国合作制造了第一批超音速客机“协和式飞机”。但现在这些实业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如今夏洛克们连怎么造船都不知道，早就在实行“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保留下来的只有点军事造船工业。航空工业也如此，民用飞机制造业因为竞争不过老美，早就出售了本国的公务飞机产业，停止开发干线和支线飞机，仅保留了在空中客车公司的业务，直升机业务也与意大利合并，只在军事航空工业方面还保留了相当实力。至于毛纺业早就成了昨天的童话了。如今全国是否还有家毛纺厂，我高度怀疑。

您说，在自废武功后要重振实业，有那么容易么？No way！

因此，与爱国阴谋论专家们的弱智猜想恰恰相反，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什么“货币战争”，而是利欲熏心的西方资本家推行的“全球化”作法自毙淹死了自己。如今中国小牛已被西方奶牛养大，吮吸着西方普罗大众的血汗成长起来的中国壮牛可以断奶了，而西方老奶牛如同汉成帝一般，面临着“精尽而亡”的危险。更严重的是，迄今还看不出西方该怎么才能从这自造的灾难中拔身出来。

简言之，“全球化”为中国和西方文明世界提供了一个和平竞争的平台，中国借低人权成本轻易地在这场竞争中胜出。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当“人权”这个政治概念翻译为经济术语、兑换为“成本”之后，竟会变成令西方倒下去的死穴。如果西方还想在相同条件下与中国竞争，我看只有降低本国人权成本一条路，起码要采取如下两条重大措施：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贸易自由，提升政府管制金融资本流动的权力。其实在金融海啸爆发后，欧美都已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这一措施，纷纷将私人银行国有化。英国首相布朗更多次强调以后要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管理。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文明生活方式，压制工会要求提高工资和罢工的权利，压制环保人士对国策制定的干预。

但西方国家的困境在于，政府是民选的，而老百姓从来不顾大局。因此，要做到第一条或许还有可能，要把工会、农会和环保组织置于政府铁腕控制下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因此，在可预见将来，西方无法逆转对中国具有的竞争劣势。剩下来唯一可做的，就是推倒“全球化”，重建关税壁垒，起码必须将贸易限于文明世界之内，恢复冷战时代对野蛮国家的禁运政策。

但就连这条都不可能做到。原因很简单：西方老奶牛尽管面临精尽而亡的危险，却已经吸毒成瘾了，在货币业已贬值的情况下，不向中国进口廉价商品更要雪上加霜，何况还指望中国那大财东为西方注资救命？先总设计师看得一点都不错：所谓“道义”，所谓“良知”不是没有限度的，“义大利”只是个例，“利大义”才是常例。前段中国因萨科奇会见达赖而断然拒绝出席中欧峰会，对中国政府悍然干涉法国内政，压制法国总统权利的野蛮行为，英国德国等欧洲强国竟然不敢置一词，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文明世界有何等脆弱。

在前段网友讨论“停滞才是硬道理”时，某网友说了句至理名言：

> “我觉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没打中要害。资本主义互相胁迫而无法停止的物欲，消费致死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可怕的。我真觉得人类没准很快就会把自己玩完了。”

确实如此。人类的难题在于，物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压制它就会造出中式弊病来，而放任它就会制造出西式弊病来。西方之所以把自己吊死在中国那枯木朽株上而无法自解，恰是物欲使然，举国上下都想不劳而获，让亚非拉负责流血流汗，自己拿轻松快钱，这还能有好事么？

2009 年 4 月 22 日

“低人权”到底是不是优势？

适才闲得无聊，去《自由中国论坛》转了一圈，看到不锈钢老鼠转了个弱智帖，掀起了热烈讨论，当真令人啼笑皆非，又想起过去笑话安魂曲时写的歪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呆鸟。夜来聒噪声，疗愚何时了？”

那个帖子大骂秦晖教授，说他的“低人权优势”说乃是宣扬“奴役思想”，刘荻女士竟特特将那弱智帖转了过去，并进一步质疑秦晖教授的“低人权优势说”，势如破竹地问道：低人权和经济发展有什么正相关？有什么统计数据支持？如果说此说成立，则 30 年前中国的人权状况更糟糕，为何经济不能发展？

您说这些人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怎么就会，唔，怎么就会，嗯，这么，嗯，那个，唔，这个，那么、那么笨？秦教授不过是指出了一个连白痴都能看到的事实，他并不赞成这个事实，相反，但凡长了个脑袋的人都看得出来，他谴责这一事实。为此就斩杀报坏消息的信使的脑袋，骂人家“带功讲课”，有什么“奴役思想”（文盲啊，什么叫“奴役思想”？这是中国人说的话么？），这都哪跟哪啊？挨得上么？

那不锈钢老鼠更有趣，敢情脑袋也是不锈钢作的啊？小衲效法徐寅生同志谈《怎样打乒乓球》，提倡辩证法，处处反对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时时批我“直线思维”，建议侬去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孤立静止片面”的不锈钢直线脑袋：比较 30 年前后，竟然会完全无视两个系统中最大的条件差别——是否对外开放，却有那本事只把人权孤零零地拎出来，用“归谬法”一举粉碎是人都看得见的事实，硬要说秦晖此说不过是个“猜想”！

是人都该知道，所谓“优势”，乃是个相对用语，是比较出来的。中国享有的低人权优势，是说中国这个经济实体在国际竞争中享有的低成本优势，而这种低成本乃是靠权贵粗暴压制人权人为造成的，最主要的就是靠低工资、低福利或甚至无福利、零环保成本以及廉价甩卖原材料极大地降低了资本家的投入，提升了中国的竞争优势，使得中国成了世界资本家的乐园，他们在中国获得的超额暴利，在扣除了腐败成本之后，仍远远高于在本国获得的利润。刘荻

只看到了在中国投资多出了行贿的腐败成本，却看不到其他的低成本。如此高聚焦隧道眼，我只在马悲鸣那儿见过。

秦晖早就解释过了：在西方，工会势力和环保势力都是惹不起的，罢工吓跑资本家，农会吓跑圈地人，污染罚款让工厂主倾家荡产。西方国家的政府是全民的政府，不是中国政府那种全世界资本家的劲走狗与护院家丁。普罗大众拥有更多的选票，当然要比资本家具有更大的国事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当然要对中国趋之若鹜，“低人权成本优势”使得中国成了个吸纳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强大黑洞，将发达国家的实业的硬件软件统统吸了进去，把人家的实业都掏空了，工厂统统搬到了中国去，以致英美资本家都不务正业去炒钱，搞所谓“金融产业”，这才弄出个世界金融危机来。

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了，“全球化”的受益人是西方资本家和中国政府，中国普罗大众也顺带沾了光，受害人则是西方的普罗大众以及中国人的后世子孙（资源木有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说这话时，世界金融危机尚未爆发。现在看来，全球化的唯一受益人只有中国一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资本家交出的是实业，换来的是一堆票子。前者长存于中国，后者则在金融海啸中灰飞烟灭。所以，不是宋鸿兵弱智猜想的西方靠“货币战争”毁灭了中国，而是中国靠“低人权优势”淘空了西方。白鬼子如同吕布吕大爷一般，让貂蝉和醇酒淘虚了身子：）

这就是中国经济起飞的秘诀。经济发展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资本，二是劳动力，两者缺一不可。马克思那白痴（对了，我在《天涯》见人打架时使用“小白”代替“白痴”，确实比较文明，我以后也见贤思齐吧），马克思那老白看不到前者，推出所谓“劳动价值”论，把财富完全看成是劳动力创造的，堪称全世界隧道眼鼻祖。这谬论已为毛共彻底证伪：没有原始资本，再怎么敲骨吸髓经济也难得起飞。

更何况毛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治国白痴，60 年代以前搞“大跃进”自毁经济，使得国民经济遭到并不亚于核战争的毁灭性打击。60 年代以后则对建设彻底丧失兴趣，专注于窝里斗的“阶级斗争”去了，工人不上班全日制干革命，七斗八斗，斗得国民经济都到了崩溃边缘，还谈什么经济发展？如果光看人权状况不看其他，则赤柬乃是自有人类以来人权状况最糟糕的国家，莫非那也是什么“低人权优势”不成？

总之，低人权是不是优势，要看国家是否纳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是否能自由接纳西方资本，劳动力价值是否能在国际市场上兑现。否则哪怕毛泽东如斯大林一般，以建设为主业，杀人为副业，而且确有老斯的出类拔萃的治国能力也罢，只要闭关锁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则中国人就是再如何“勤劳勇敢”，也绝无可能获得经济起飞必须的原始资本，劳动人民就是再累断脊梁也不可能造出今日的经济奇迹来。饮水思源，13 亿中国人应该集体给西方资本家写封感谢信。

当然，除了感谢资本家之外，还必须感谢西方的普罗大众。在我谈经济（不敢说是经济学，只敢说是经济，盖我是完全彻底的经济学外行）的旧作中，我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线与幸福线就是市场需求，一旦需求枯竭，则整个体系立即停止运转。于此出现两难：如果不许资本家刮普罗大众，则经济立即失去活力，但如果让资本家刮得太狠，则人民购买力萎缩，势必造成生产过剩。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引入了“良知参数”，最低工资的设立和社会保障福利措施的完善，为社会人为设置了一个“消费下限”，确保了人民的购买力不会下降到危险水平，虽然引出了所谓“滞涨”，但有效防止了 20-30 年代生产过剩大萧条的再度发生。

托“全球化”的福，中国过去一直避免了这两难问题。西方不但为中国提供了原始资本，而且还提供消费市场（也就是郎咸平那小白危言耸听大叫大嚷的芭比娃娃的“六大块”或“七大块”只有一块在中国），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必效法西方政府人为设置消费下限，不必管人民有无消费能力，照样不必担忧出现生产过剩，造出产品来不愁人民买不起。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鬼子送上前，代我们吃代我们穿，咱们只需埋头生产就是了。世上上哪儿找这种两头都承包的好事去？此所以咱们在感谢西方资本家的同时，也该感谢西方的消费大众，前者为咱们提供资本与技术，后者帮咱们解决需求问题，以日益增长的（外）国民需求刺激咱们的经济蒸蒸日上。

可惜好景不长，吕布吕大爷酒色过度，淘虚了身子，从中国挣来的票子烂在股票市场上，再没钱买中国的廉价货了。好在中国小牛已被西方奶牛喂成壮牛，有了坚实的实业设备与技术，再不必靠西方资本输血“催谷”了。剩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效法西方在经济中引入“良知参数”，允许中国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马列式伪劣假冒），改革分配制度，使得社会财富不要

基本流入权贵和知识分子囊中，让普罗大众也能分点润，真正提升全民的消费能力。如果说过去还可以鼓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现在绝对是“让全民都富起来”的时刻了。不搞均富的国家，还有什么脸冒充社会主义？！

前些天小 P 转了份孙立平先生的文章来，我觉得颇有点意思。他认为，30 年代美国出现的生产过程危机，耐用消费品卖不出去造成的。所谓“耐用消费品”，指的是汽车、住房、家电等。中国现在正在过美国 80 年前过的那个坎，即将进入所谓“耐用品消费阶段”。而要过这个坎，必须具备五方面的条件：1）城市化到达相当规模。2）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发达。3）完善的消费信用制度。4）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5）相当程度的均贫富。

对孙先生所谓“30 年代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生产过剩”一说，我持保留态度。据我的道听途说，当时美国汽车已经相当普及了，第一家汽车电影院乃是 1933 年问世的，次年即在宾州和德州等地相继出现。如果汽车没有普及到相当水平，则这种电影院根本不会有市场。我记得文革中读禁书，看文革前的《译文》杂志，上面有篇小说是讲 30 年代大萧条的。一对老夫妻因为失业活不下去，便打扮起来，开着汽车去投河自杀（把车开进河里去）。那阵子敝乡全城高干拥有的小车，加起来恐怕也不到 10 部吧。本人乃是响当当的穷小子，土包子，实在无法理解这种怪事，怎么也想不通，暗自纳闷道：NND，有小车还要去自杀么？活不下去，为何不卖了那部车？

这当然是小说家言，但那是发表在美国的小说，若完全脱离现实、向壁虚构是不可能出版的，所以应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若以汽车、家电等作为耐用消费品的指标，则 80 年前的美国恐怕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若以住房为指标，则美国今日仍然有许多无房户，否则也不至于引起次贷危机了。

但即使如此，我仍然认为孙先生此说很有参考价值，那五个条件的确是欧美的社会转型标志，其实也就是社会发展的美国道路，整个发达世界都是跟在老美屁股后头，亦步亦趋屁颠屁颠地走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金光大道。但这条路是否适用于中国，本人颇为怀疑。例如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为 55%-80%，如果中国要效法，则 13 亿人当拥有 7-10 亿部汽车，势必吸干全国甚至外国的石油。即使能源有保证，光是废气造成的污染就是巨大的生态灾难。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恐怕还是得向两个方向努力：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均富以缓解社会危机，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以解决生存危机，一句话：停止劫贫济富与竭泽而渔。当然，这些实际问题超出了云集在《自由中国论坛》那些的“民主不锈钢头壳”的理解能力。他们只懂一件事：“反奴役”。

2009 年 5 月 4 日

从谷歌事件看文明世界日薄西山

前段谷歌从中国撤退，构成了当时最大的新闻。老实说，这轰动效应本身就让我觉得非常悲哀——一家美国公司从中国撤出，竟然造成这么大的轰动，使得反共阵营一片雀跃，好像给他们带来了一线胜利的曙光，这种事，搁十年前，能想像么？

犹记十年前，美国人吃错了药，不在这儿炸中国使馆，为民除害，为我出气，却跑去把南斯拉夫的使馆炸了。当时美国某电视台（记不得是哪家了，似乎是CNN，但不敢肯定）邀集各界人士讨论。出席该讨论会上的有个爱国壮士李希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作者之一），大骂美帝国主义，骂得某美国教授火起，便说，当今之世，美国没有中国可以，中国没有美国不行。此话在当时乃是难堪的大实话，即使爱国如李希光者，也无话反驳，只得讪讪地住了嘴。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若再举行此类座谈，只怕主客之势倒转，要轮到中国教授来对美国佬说这种话了。所以，中国还真是和平撅起了。

母国（不算祖国罢）撅起，我这海外赤佬应该与有荣焉——本人并非安宝宝，声称自己是“爱（美）国贼”，这辈子盼的不就是这个么？然而无奈的是，这大好消息却让我肝颤胆寒，不寒而栗，想起秦晖教授“世界中国化”的不祥预言来。

国内领导同志似乎也信心满满，浩气如虹。前些天在网上看见，某位领导（忘记是谁了）宣称要向国外输出中国的价值观，让我懊丧欲死——敢情这共祸还真逃不脱，跑到天涯海角还得让人追着来“输出”？若是归化国真成了国内那乌烟瘴气样，我岂不是只有蹈海而死？

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确实在向外输出价值观，谷歌这事不就是价值观冲突引起来的么？中国把“政府有权剥夺公民的知情权”的价值观强加给了谷歌、雅虎等公司，作为进入中国的条件。谷歌和雅虎都同意了，这才能在中国开业。只是因为中国政府还不满足，还要去输出“政府有权剥夺公民隐私权，窥探私人通信”，使用黑客手段把这价值观强加给谷歌，谷歌才受不了了，要走了。

因此，谷歌与雅虎的区别，说起来也很可怜：雅虎完全接受后面这一条，甚至向中国政府提供异议人士的通信内容，导致师涛被重判，而谷歌本已同意中国政府有权管制资讯，只是实难同意中国政府有权窥探公民隐私。区别也就只在这点上而已。就连这最后的底线，谷歌能否最后守住，也还在未定之天。

这说明了什么？道义在金钱面前的脆弱。普世价值观再崇高，也抵挡不住银弹攻势。自由世界不怕苏联的核弹，但在我党的糖衣炮弹面前只能乖乖投降。朱学勤那《引无数老鼠竞折腰》就说了这个浅显道理，只是他没用大白话说穿而已。

其实列宁早就发现这点了。还在西方文明世界封锁苏俄时，他便断言，甭看帝国主义跟咱们貌似势不两立，贪婪是资本家的本性，因此他们迟早要来和我们做生意，帮助我们把国家弄得强大起来。老邓之所以在中国翅膀未硬前，便敢冒全世界之大不韪血洗北京城，也无非是吃透了西方的道义高调是假的，再"义薄云天"，最后还是得为铜臭弯腰钻狗洞，虽则可能是掩着鼻。

说到底，共产党人，无论是当年的真诚的列宁斯大林主义者，还是现在的权贵资产阶级，骨子里都是"人性恶"论者，坚信的是韩非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便阐明了的那套伟大真理，认定这世上只有实力，没有道义。信奉普世价值观不过是装逼，世上没有不可威胁利诱之人，nobody can ever be incorruptible。这其实是咱们的"普国价值观"，我不止一次见到国人痛斥道德之虚伪，最常见的论证便是："给你百万美元，让你抛弃生死与共的发妻，你一定会照办。"这里隐含的"几何公理"，便是"没有人是不可收买的"。

近年的事例似乎一再证明这"几何公理"确实成立，雅虎不论，法兰克福书市的东道主们，不都是为铜臭竞折腰的主么？如果不是利益无关者的抗议，为我党蓄意排斥的异议人士又岂有上那儿亮相的份儿？

说来可笑，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怕中国被腐朽垂死糜烂的西方生活方式毒化。如今攻守之势却完全倒转，正如他老人家在《别了，司徒雷登》上说的那样："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只需将其中的"杀"字改为"腐蚀"即可。"化尸粉"在咱们手上，不在他们手上，他们有的只是洗衣粉，所以，他们烂不了我们，我们却要烂掉他们。

这不是危言耸听。前些天在《猫眼看人》上看到，一位爱国愤青从美国某论坛上转贴了美国读者对武汉高铁修通的评论。高铁如此之快地修成，给鬼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若干人从中发现了权贵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的直接就说，他们没有工会破坏捣乱。这难道不是中国有效地向外输出了价值观的明证？可怕的是，咱们输出的糜烂，已经不再限于资本家大款们，而是开始向草根扩散了。

另外一个帖子更令我丧气。那是个从美国回去的海龟写的。据他说，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日子远比美国的好过。北京的中产阶级每人年薪在50万元左右，而成都的大致在30万元，除了空气质量外，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比美国强。

这当然是好事，凡是华人都该为母国出现的奇迹感到高兴，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位作者说，他认为，在中国保持6-7亿低收入人口是绝对必要的，这才能保障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否则“打一炮都要一千元”（或许是一百元，记不住了），那年薪就是上百万也不够花！

这就是说，必须动用国家暴力，人为制造制度上的不平等，确保有一半以上的公民收入微薄，不得不为精英们出大力流大汗，创造社会财富，使得他们能过上超过美国中产阶级的的幸福生活，这“幸福”甚至包括廉价嫖娼在内！

我相信这代表了广大精英的心声，起码是相当一部分精英的心声。老金他们学校的那位经济学家不也这么说过？

由此可见，老金说的国人普遍视民主为蛇蝎并非夸大其词，起码相当一部分精英这么看，民主了，自由了，平等了，土地私有了，谁还来城里为你盖摩天楼，谁还为你当保姆？而低人权优势一旦丧失，中国还能有什么国际竞争力？

由此不难看出当局为何敢重判刘晓波：第一，他们吃准了鬼子为了钱不敢作声，顶多只是不疼不痒地咋呼两声，但经济制裁之类的凶器是再也没本事亮出来了。第二，他们吃准了“民心所向”，知道大部分或起码是相当大的比例的精英出于自家利益反对“普世价值观”，因此无论他们怎么胡作非为，都不会引起国内舆论民情强烈反弹。

我看我党的估计也没错到哪里去。我在《社会稳定解析》的旧作中说过，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社会稳定起到的作用并不均等，最没用的是工农大众，能量最大的是知识份子和富人。如果中产阶级以上都是保守派，社会结构就不会

发生剧变。现在的情况看来就是如此。如今的中国与文明化与民主化的距离，似乎比30年前还更遥远。

尤可笑者，还是朱学勤指出的那个事实：我党说得一点都不错，帝国主义乃是他们自己的掘墓人，西方资本家最拿手的是挖坑自卖，如今陷在坑里，连个挣扎出去的招都想不出来，还要被郎咸平、宋鸿兵一类小白诬为阴谋家与“货币战争贩子”。

老实说，我这感觉是看了网友转来的Schiff的讲话后才有的。Schiff认为，美国梦变味了。过去大家坚信，你只要苦吃苦做，生活就会好，房子会有的，汽车也会有的，而现在大家认为，你只要投机倒把就能发大财，根本不用工作。是什么使得美国梦变了味？从中国潮水一般涌来的廉价商品以及靠借钱支撑的第三产业。当美国再没钱过这种便宜日子之后，变味的美国梦自然要破灭。

可惜他没指出，这灾难本是全球化造成的。美国资本家贪图挣快钱大钱，垂涎中国的廉价人力物力资源，一窝蜂涌到那儿去投资，给中国带去了先进设备、厂房与成套技术，换来的却不过是一堆票子。等到金融危机来了，那票子便灰飞烟灭（用鬼话来说便是meltdown）。因此，美中经济交流，其实是不等价的，中国用一堆纸（还是老美自己印的花纸），换来了人家实实在在的干货，淘空了瑞大爷的身子。

Schiff开出来的处方，似乎是回到产业时代去，把一个以炒钱为主业的国家重新变为世界工厂。这谈何容易？如果美国可以专注于产能，那当初美国的工厂又何必纷纷搬迁到第三世界去？过去留不住，现在资金紧缺，反而能留住了？只要中国保持低人权优势，继续倾销廉价人力物力资源，那地方就一定会是吸引力强大到无从抵抗的国际资本黑洞。要逆转产能空洞化，除非把美国建成个中式封闭国家，实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路线，高筑关税壁垒，严禁资本流出与廉价商品输入，并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取消工会，使得本国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漫说这根本就做不到，就算做到了，美国也就不再是美国了，真正被中国输出的烂污价值观改造了。

以上所说，或许过于悲观，这也是我的悲观天性使然。本人乃是绝对而非相对的经济学外行。因此，巴不得内行们出来痛驳，给我，也给大家画出一幅有点亮色的前景来。

2010年2月4日

东风压倒西风有无可能

一、做花刺子模国信使是我的固有冲动

花刺子模国信使的故事大家想来都熟悉，据说该国国王听不得坏消息，专砍报坏消息的信使的脑袋。其实恨听坏消息，把“期待”当成“观察”，是人性通常的弱点，是人都难免，只是专制君主更严重，也更容易受害，因为部下怕做花刺子模国信使，报喜不报忧。

我年轻时，心想事必不成，没有一桩努力不落空。如此折腾多了，便失去了自欺能力，养成了直面现实的习惯，甚至连性格都变得悲观了，凡事专看倒楣那面，而且不惮把它说出来，明知要扫众人的兴也在所不计。

之所以要说明这点，是因为有网友似乎认为我受了老金那“伪象牙塔”中人的误导。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老金的文章当然使我受益匪浅，特别是他对中国学术界的介绍真让我长了见识。但第一，本区并不是我了解国情的唯一来源，国内论坛才是我主要访问的地方。第二，我的某些悲观想法早就形成了，例如我贴出《西方已经对国人失去感召力》早在他贴出《西方的和平演变到此为止》之前。

其实我的悲观想法还可追溯得更早。金融危机刚发生，我就断言“西方金融危机必将极大地boost国人的自信”。此后我又预言中国将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受害最小。这些都有旧帖可查，都跟老金毫无关系，而是我作花刺子模国信使的强烈冲动使然。

之所以要说明这点，是不想让老金为我背黑锅。我就是胡平笑话的那种没品味的人，在孔雀开屏时专门去看难看的屁股。

二、国情

不管喜欢不喜欢，只要敢正视现实，似乎都必须承认，改革开放30年功夫，中国出现了天翻地覆的经济奇迹，实现了或许是世界史上最宏伟壮丽的经济起飞。

咱们多的也不用说，去网上找个地图网站（最好是铁道部的），看看中原到长江中下游平原那带的铁路网与高速公路网的密度就够了。我出国前，东北是全国铁路网最密集的地域，“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30年，似乎也就只在西南和西北修了三四条铁路，中原和华东还是“旧”社会的格局。弹指30年过去，旧貌换新颜，海外方七日，国内已千年，那一带的铁路网密度似乎还超过了东北，更多出了无数高速公路。那天在电视上看到杭州湾跨海大桥（google地图上有，能放大到足以看见桥面上的汽车），那工程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跨距或许是世界第一吧，而且是在杭州湾上建起来的，而钱塘潮是出了名的，“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这是基建，生产力便如何？去年中国生产了一千三百多万辆汽车，一跃而为世界第一汽车大国，日本只生产了800多万，而老美500多万。这在30年前能想像么？那阵子咱们除了老修帮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能造几部“红旗”轿车给首长用之外，便只有上海用手工业方式制造出来的“上海”牌轿车，此外便是程世清在江西搞出来的“起宏图”一类土法“草泥马”。

民生又如何？说来可笑，我是在言情网站上作的调查。例如国内有个《易读》网站，上面有个《情感》分坛，专登饮食男女的屁话。有许多是小说，而且是色情小说。但只要你忽略那些男欢女爱，专注于衣食住行，同样能看出国人物质生活确实上了个天大的台阶。至少在城市，中产阶级与欧美已无太大差异，城市中国堪称发达国家了（当然不包括农村中国）。

就连所谓“右派网站”都能看出门道来。如今国人的牢骚与不满，跟我们那阵完全不是一种性质，起码所谓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比咱们那阵子小到不可胜计。我们那阵子大概不是90%，起码也是85%，一年顶多也就缝上一套新衣服（还是请私人裁缝，不是去买，那更贵），其他全花在糊口上，还吃得贼差，以致我在国内患了“神经衰弱”，看书超过几小时就睡不好，疲惫不堪。等到了国外后，才发现原来是营养太TMD差。如果有充足动物蛋白摄入，接连看12小时的书都一点没事。我现在垂垂老矣，可我看书的时间要远远长过20多岁时，每天睁着眼的时间基本都花在看书

上，要在过去早累死了。有时不禁为自己惋惜：如果我青少年时代有足够营养，说不定我现在的记性也不会那么差。

如今国内的人抱怨的是什么呢？油价高与买房难。这是我们当年敢梦想的么？油价跟咱们这些步行族有何相干？我当年算是“工人贵族”吧，骑的是锰钢永久13型，在全厂拔头份儿，全厂职工中有车的似乎还不过半。几十年后回忆往事，还引起贫协主席老肚子的极大愤懑。买房更是闻所未闻。过来人都知道，分到个十多平米的房间的难度，要远远超过找到对象。我知道的许多老工人都是结婚多年后还分居在单身宿舍中，周末带上结婚证去菜花地里浪漫野合，孩子生下来后在单身宿舍带到四五岁，乃是不折不扣在监牢里长大的 “小萝卜头”（参见《红岩》）。

以上说的是城市，农村当然没法跟城市比，可也差不到哪儿去。我在《猫眼》看到有位律师抱怨他帮农民打官司，让农民赖了帐，那居然是涉及上百万的生意。还有人贴出云南的农村照片，全TMD洋房。就算那都在高速公路边吧，那也非常了不起了。连云南都如此，发达的沿海地域还用说么？

某位网友上次回国，受到极大震撼，他的亲友过的日子似乎比他的还滋润。人家是德国教授，德国生活水平在欧洲一流，起码比英国意大利富多了。师爷先生如此，那欧洲穷国的教授自然就更没法比了。他受震撼的另一原因是，他接触到的人都一律拥共，盛赞胡温，连他都给“赤化”了，以致惊呼像老金那种白乌鸦实在罕见（有趣的是，老金在咱们这“白孔雀园”里却又成了把“期待”当“观察”的黑乌鸦）。当然，他接触的都是高知辈，不是普罗大众，但起码这一拨人对现状是深为满意的，而这拨人在社会稳定中占的“社会能量比”（也就是能量除以人口数）应该属于高档。

我不是在这儿粉饰太平。国内社会矛盾重重，权贵任意鱼肉百姓，全民发生溃烂，齐齐进入道德真空状态（详见网友转来的那个各地网友争说道德溃烂的帖子），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同样不容否认的是，起码富人、公务员、国企白领、上层知识份子等代表的社会上层是维持现状派。权贵们并没把所有的社会财富都集中在自己手上，而是按各阶级阶层的“社会能量比梯度”作了分配（这是从著名的“金九点”中获得的教益，不过我坚信那是事实而非期待，为我家亲属的待遇证实）。这与第三世界（例如南美）常见的寡头专制还不一

样，那儿的社会财富集中在一小撮权贵手中。不能不承认，中式权贵资本主义要比南美权贵资本主义要更稳定到不可胜计。

社会不稳，说到底，是“高社会能量比阶层”心态普遍失衡，89年就是这么回事。如今社会上层可能仍然缺乏安全感与稳定感，因而不乏向外移民者，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愿意再来一次翻烧饼。即使是80后的困顿者也未必有这决心。所以，我认为老金说的15年内无大变化是相当准确的估计，我可以再为他加个十年，尽管那只是educated guess，拿不出过硬证据来。

三、民俗

老金那喜鹊（黑白相间的乌鸦自然只能是喜鹊）说的有句话很重要，不知道同志们是否错过了。他说，现在当家的人，不是土八路那些没见过世面的痞子，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多次出国的人。而越是海龟，反对“普世价值观”也就越坚定。我深信他这观察是正确的，并非“期待”。对大多数国产知识份子而言，“普国价值观”要远比“普世价值观”有吸引力。

这毫不足奇，甚至是必然的——极权国家教育出来的人必然要相信“狼羊律”，彻底缺乏人道情怀，这才是东西方最大的差异。公民缺乏人道情怀，乃是所有极权以及后极权国家的通病，改变社会制度并不能立即纠正这心态发育缺陷。而“狼羊律”与民主自由不兼容，这就是俄国至今是个民主其外、专制其中的烂国家的根本原因所在。制度不过是个外表，瓤子才是重要的，而所谓瓤子，就是百姓的公民觉悟与人道情怀的有无。我看这才是东西方最大的区别。

所以，我深信，相当大的比例的中国知识份子确实视民主为蛇蝎，无论是老金他们学校里的那位经济学家，还是在网上谈归国观感的那位海归，说的都是心里话。他们确实认定，就是应该保持制度上的不平等，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制造贫民，使得一部分公民作为人下人苦吃苦做，确保经济蒸蒸日上，让他们能过海皮日子。李银河那博文其实说出了许多识字分子的真实心声。即使收入较低的右愤对现实不满，渴望改变现状，那也不过是一种嫉恨心理，并不真是出自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更不是出自“人生而平等”的公民觉悟。

当然，不能说所有国人视民主如蛇蝎都出自自私心理，更多的恐怕还是牢不可破的大一统观念使然。中国人中最常见的一种心理错位，是草根百姓居然会以帝王的眼光来看待幅员，以“金瓯缺”为人生最大憾事，因此生怕实行民主会导致国家崩解。不幸的是，这类悲剧已经由“苏东波”为全民充分演示过了，而我党非常聪明地利用这可怕前景去吓唬百姓，收到了极为满意的效果。

90年代我就在《华夏文摘》上撰文说，中国人民乃至苏联人民有个普遍的误会，便是把“民主”等同于“富裕”。他们盼望的其实是致富，却错相思为“民主”。其实民主并不会致富，真能致富的是走资。这话说了又说，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如今中国的识字分子总算醒水了，发现原来不用实行民主便能致富，而且比民主国家诸如俄罗斯、印度等国还快，他们当然要对民主丧失热情。

说到底，从辛亥革命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识字分子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都从未有过真正的民主渴求，有的只是改变现状以富国强兵的渴求。现在这个目标基本上已经达到。在这种情况下还认为他们仍有西化愿望，我认为是一种期待而非观察。

其实在公民普遍笃信狼羊律的国家，不实行民主恐怕反而是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After all，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冥冥之中有什么“客观规律”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也没有任何证据提示国人可以像鬼子那样，采用一种比较decent的生活方式。第三世界国家倒是在在提示其反面，至少我不认为回回国家有可能民主化。兴许，眼前这烂污生活方式便是敝民族能达到的最高点。若不满足，还要折腾，恐怕要掉得更低也未可知。

四、邓小平为列宁斯大林成功解套

苏式社会主义乃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发明，其最大的特点，是统治集团“以小民为敌国”（故李慎之老语），为此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把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权力、权威与资源控制在统治集团手里，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自由与能量。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未见过如此反动的社会组织模式。

从“社会力学” 原理来分析，这种社会模式构建是一种超稳定结构，人民起来推翻统治者的可能性为零。这本是任何一个长了脑袋的正常人都能看出的事实——人民根本就没有组织起来的可能，又被剥夺了一切现代暴力手段，完全成了由统治集团任意宰割的羔羊，还怎么去推翻统治者，或是以暴力抗争吓得统治者让步？这就是为何北韩半国人民成了饿殍，赤柬几乎一半人民被杀光，人民仍然只能延颈受死，把逃脱性命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竞相歌颂伟大领袖上。

但这个超稳定结构只是为了根除人民革命的可能而设计出来的，它把统治者与人民的实力比例增到了无穷大（因为分母趋近于零），虽然完美地达到了原设计目的，但也引出了无穷弊病，而这本是白痴也看得出来的——你把人民的全部能量都剥夺了，安全当然绝对安全，但也制造出了一个冻结了的静止社会，其中只有一个或一小撮最高统治者还有点生机与活力，全社会的动力与首创精神（originality and initiatives）也就来自于一到十来个人，全社会就只能靠那一到十来个人“魏武挥鞭”，驱赶全民前进。

这最终结果，就是老金说的“五大致”——致死、致穷、致愚、致痞、致奴。一个奴隶国家只有一到十来名奴隶总管（鬼话所谓slave-drivers）作为全社会的发动机，还能有什么其他结果？

不言而喻，这种超野蛮国家当然要在与自由国家的和平竞赛中败下阵来，这便构成了此类国家的内部不稳来源。现代极权国家没有“天命论”，由此造成权威逐代递减。因此，当第一二代铁血强人死去后，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矛盾”，便必然构成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借口，由此导致所谓“改革派”出现。改革派与保守派缠斗，便有可能倾覆原体制，苏东剧变便是如此引发的。

总而言之，列宁斯大林设计的邪恶社会，彻底取消了百姓造反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超稳定的，然而因为社会缺乏生机、缺乏和平化解社会危机、尤其是和平解决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制度设计，它又是不稳定的。人民作为潜在的敌人倒是被彻底镇压下去了，用文革语言来说便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若要乱说乱动，立即镇压！”但如何镇压统治集团内部潜在的敌人却成了个致命难题。无论是列宁，是斯大林，是毛泽东，是波尔布特，都没能解决这难题。迄今为止，有点有限成功的，还是慈父领袖以及卡斯

特罗同志，不过那也只是so far so good，如同一位跳摩天楼的同志在下落过程中的喃喃自语。

这就是我为何要反复告诉大家，共产党不可能被所谓“全民起义”（这完全是心智失常者如徐水良者的梦呓）推翻，只可能垮于内讧。

老邓同志是把苏式发明领出“社会毫无生机”困境的第一人（凭这点，似乎可以说，他比斯大林、毛泽东要高得多，应该在所谓“国际共运”史上留名）。他保留了苏式国家的基本权力分配方式，却将经济自由极度有限地恩赐给人民，于是既保持了党对人民的全面压倒性优势，使得人民仍然毫无反抗可能，又允许人民在安全领域里发挥他们的能量，使得社会恢复了经济活力，从而消除了苏式国家的对外生存危机，赢得了与文明世界的和平竞争，杜绝了党内改革派的产生根据。

不容否认，老邓的改革向列宁斯大林发明的僵尸口中度了活气，极大地延长了那个逆天行事的artifact的寿命。不过，他仍未解决权威逐代递减的问题（这其实是不可能解决的），更未能设计和平解决党内权力斗争的制度设计，使得接班人只能用非法手段整肃政敌，遑论和平化解社会危机。因此，虽然对外生存危机基本解决了，改革派也被消弭于无形，但在骨子里，党中央仍然是那个具有大火拼潜在可能的土匪山寨。富倒是富了，可惜有点贼样。而我党以大规模内讧连累全国陷于血光之灾的阴影，便永远悬在全民头上。

五、“世界中国化”的准确解读

本人丝毫不懂经济学，奥地利学派那些说道，我看上去“好像山羊看广告”（马雅可夫斯基诗句）。我知道的就是，西方伪经济学家对中国奇迹采用了“三不主义”——不承认，不相信，不解释，盖中国奇迹直接否定了他们的立论基本依据：经济繁荣以自由为前提。一个奉行以国家权力大规模干预经济、公民缺乏自由的半极权国家竟然会出现高经济增长的奇迹，这现象完全处于他们的理解力之外。

在这点上，右派（conservatives）的态度颇有点像当年的我党，口口声声“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这十多年来，我从西方媒体上见到的，从来是对中国经

济的悲观预言。可到今天为止，那“崩溃”仍然如我党当年允诺咱们的“共产主义天堂”一样，已经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而所谓地平线就是天边的一条线，你越向它走，它离你也就越远。

在我这丝毫不懂伪经济学的人看来，这奇迹丝毫不难懂。我已经在《低人权是优势么》中解释过了，那正是西方的右派而非左派（liberals）玉成的。如果在一个封闭系统里，低人权当然不是优势，再压榨百姓也发不起来，只会越榨越乾，使得全民都成了“乾人”（老四川话，意为“穷人”）。然而在所谓“全球化”的大系统里，低人权当然就要如同任我行的“吸星大法”一样，把国际资本统统吸进去。

自然害怕真空，资本害怕低人权，看见就要去疯狂地填补之。而这“全球化”最卖力的鼓吹者，不是代表本国普罗大众的力薄儒，而是代表资本家的啃啬无底。我记得90年代初美国电视曾播放过对华尔街某大款的采访，其时他们正在代中国发行债券（还是卖给中国债券，记不得了）。那记者是左派（记者一般都是左派），说中国人权那么糟糕，你们还这么干，不是鼓励独裁者们么？那大款巧言伪说了一通，大意是只有engage，才是有效地推进中国进步的手段，云云。其实我早说了，在西方，反共最坚定的，不是我党骂的资产阶级，而是力薄儒们，此所以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喜欢西方的右派而不是左派。这也不在话下。

我觉得，中国奇迹的出现，证明了古典经济学所谓“劳动价值论”确有一定道理，只是劳动与资本两者都创造财富，马克思只看到劳动看不到资本是完全错误的。前段跟朋友聊天，他说，他看到的最言之成理的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乃是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以前都给束缚在黄土地上，被迫从事原始农业。如所周知，原始农业是最无法创造财富的背时行当，当然毛中国就永远无望发起来。老邓解除了对农民的无理捆绑（尽管只是部分地），使得他们有可能从事其他行业，当大量资本流入中国后，这全球最庞大的劳动大军和西方资本结合起来，当然要“金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了。

确乎如此，但要做到“金民团结”，前提是那“金”愿意来拥抱“民”，也就是“民”必须是个引动资本家色心的美人。对资本家来说，当然是工人越听话越廉价越好，也就是工人的人权越低越好，既然在本国找不到这种美人，

那当然要跑到隔壁去求爱，哪怕那滥交最后导致美欧各个瑞大叔被淘空身子，轰然倒地，他们也在所不顾。

秦晖教授曾提出“世界中国化”的可能。个人认为，得看那“世界”何所指。对第三烂污世界来说，中国必将成为他们的光辉旗帜，坚定了那些烂污国家坚持“举国烂污体制”的决心，但文明世界绝无可能被中国化，原因我也早就说过了：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有哪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愿意放弃自己争来的人权，听任资本家卷土重来，重温19世纪血腥资本主义的美梦？又有哪个民主国家的人民会选出个对百姓毫不负责却有巨大权力的政府来？

但这不是说文明世界不会受到东方冲击。只要“全球化”的政策维持下去，东西方就只能处在不平等的竞争平台上。西方的高人权导致高成本，使得西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由此导致西方产能空洞化，资本家纷纷跑到烂污国家去实行“金民结合”，造成本国工人大批失业，国家入不敷出，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社会主义改造，掉回头去重新走资。

这趋势早从70年代后期便开始了。70年代以前，欧洲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当成功，就连美国也如此。我看过部电视文献片，讲的是当年美国钢铁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乐园：工人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雇佣制度，不仅工人，而且连家属都享受全部医疗保险，子女教育还有津贴，那福利制度之完备，绝非苏式“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可以梦见的。然而好景不长，待到日本南韩崛起后，美国钢铁工业无法与之竞争，营销一落千丈，到最后只有关闭了事，工厂的全套设备都在80年代当成废钢铁卖给了中国，那些曾在“局部社会主义”天堂里当家做主的工人老大哥们全体失业。

英国更是如此，因为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撒切尔夫人上去后便疯狂走资，大量拍卖国有企业，打压工会，削减国民福利。老金已经在他的大作里介绍过了。这一套甚至被工党那个社会主义政党继承下来。英国原来全民教育免费，不但免学杂费，连书籍纸张什么的都由国家承包。上大学也都能得到国家资助，并不需要考取奖学金。倘若政府资助不足以覆盖全部支出，学生还能向银行申请低息贷款，在毕业若干年后分期偿还。可惜这一套却被工党废除了，据说现在大学生都得自费，以致有的女学生为上学而卖淫，跟中国也差不多了，区别只在于义务教育仍然全免费。

最严重的，还是高劳力密度的基础工业外迁造成的失业问题。西方应对东方挑战的基本手段，无非是靠智力优势去弥补，“抓高放低”，扔掉基本产业，抓住高科技和金融“产业”，以输出新时代的“鸦片”，去逆转中国“茶叶”涌入造成的白银外流，并依靠大量涌入的外来廉价商品，建起空前庞大的第三产业来，以此吸纳劳动力。这在英国表现得最明显，除了一点国防工业外，英国人把工业基本都扔掉了，靠的基本是“无烟产业”，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堕落成了“夏洛克之邦”。

然而这一套其实是饮鸩止渴，当金融“产业”融化于旦夕之间后，国家再没钱买东方来的廉价产品，随之而来的便是第三产业的萧条以及大量雇员失业。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看不出这背时趋势逆转的迹象。许多同志信心满满，认为欧美可以轻易重建产能。我已经在前文中说过了，这不大可能。最能吸纳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的产业，还是那些高劳力密度的基础工业。高科技也好，金融业也好，吸纳不了几个人，那本来就是一小撮高智商份子的活儿，“正态分布”决定了它不可能普及到全民水平。在失去工业后，吸纳劳力的任务就完全落在第三产业之上，靠为东方当代理商来解决就业问题。这不就是自80年代一直在干的事儿么？除此之外，谁还能想得出克制东方低人权威胁的高招来？但它成功了没有？冰岛的沉没就是警世钟。

六、一个悲观的半力薄儒[1]的心声

我将自己定位为“半力薄儒”，其实也不准确，应该是0.75个力薄儒。如所周知，“自由主义”这个词在西方非常含混，包括了政治上的左右两派。左派在政治上文化上鼓吹自由主义、容忍否定传统的特立独行；而右派则鼓吹保守主义，坚持传统价值观念。在经济上则反过来，左派鼓吹国家干预，劫富济贫；右派则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劫富济贫，主张“小政府，大社会”。

[1] “力薄儒”是网友对英文 liberal 的戏译。英文 liberals 意为“自由主义者”，即西方左派。与之相对立的右派则称为 conservatives，意为“保守主义者”。

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标准的左派，痛恨道德批判。但在经济上，我并不完全赞同左派主张。一个国家如果搞成60-70年代的英国那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全国被恶霸工会劫持，则无异于当年被罢工胜利的工人劫持的安源煤矿（请参考拙作《刘少奇是怎么当上工贼的》中引用的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主席的有关介绍）。即使是在保守派的大本营美国，工会也是惹不起的恶霸。我记得有人转来个位华人工程师的帖子，其中介绍的美国汽车工人当家做主的威风，简直跟党神话虚构的刘文彩也差不多了。

个人认为，“平均”与“效率”其实是不兼容的。人类好逸恶劳的天性不可逆转，因此，社会主义与“低效率”、社会主义国家与“懒汉的天堂”似乎是同义语。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或以劫富济贫的方式实行高福利制度的国家，其效率必然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右派当然有一定道理。

但问题在于，科学原理只能使用在自然界中，不能用于社会。所谓“社会科学”其实是一种结合了“善”（=人道主义）与功利考虑的技术。我在旧作中说过，从优生学的角度来看，纳粹“科学毁灭”本族的智障人士与精神病患者完全是合理的。纳粹搞的那套，如择优交配，去除劣种等等，其实广泛用于动植物选种。但拿来在人类社会中使用，那就是禽兽或魔鬼才干得出来的罪恶勾当了。

在一定程度上，右派的主张也有这问题。例如从经济效益的单纯眼光来看，当然不该规定最低工资，也不该规定固定工资，而应使劳动力成本因应销售情况自由浮动。经理更该具有卸磨杀驴的绝对权力，随时把那些年老力衰，无法适应新技术的老工人一脚踢出门去，招募精力充沛、脑袋灵活的年轻人来代替他们。这才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是不是？然而社会如果真的如此“科学管理”，则人味也就不多了。

又如根据右派的“公平观”，遗产税根本就不公平，既然公平指的是机会而不是结果，那劫贫济富，把富人的心血积累抢来照顾贫民，岂不成了共产匪徒？

但这其实是强辩，盖你既然承认“均等的必须是机会，不能是结果”，那你就有道义责任确保大众确实享有同等的机会，使得竞争者们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是不是？既然如此，你也就必须保证，除了先天禀赋的歧异之外，所

有竞争者都必须享有获得后天赋予的竞争能力的同等机会。换言之，他们都能享有受教育的同等机会，至于愿不愿利用这机会，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这就决定了政府为全民提供免费教育的责任。不去抢富户，请问这钱从哪里来？

西方的社会主义改造，我看有几点绝对不能否定：第一，全民免费教育。第二，全民免费医疗。第三，确保最穷者不至于冻饿而死的最低限度的全民退休制度。在我看来，这是西方文明进化的最大成果，体现了人与野兽的本质区别。如果为了效率就取消这些社会主义制度，我认为是道德上的极大堕落。

其实，繁荣与否，在我看来并不是很重要。为了无穷尽的物质享受抛掉起码的人道主义情怀，乃是一种最不值得的堕落。而来自中国的威胁确有引发并恶化这种堕落的可能。虽然文明世界不可能中国化，变成中国那种低人权烂污国家，但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苗子确因中国威胁出现了生存危机。

说到底，社会主义与高效率的矛盾，决定了它竞争不过具有低人权优势的烂污国家。因此只能在一个封闭系统里搞。可惜“自从全球化这个怪物问世以来，世界上的事就连在一起了，你想分也分不开”（经本人轻度篡改的毛主席语录）。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中国特权阶级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埋葬的不是资本主义，恰是正版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也算是为最痛恨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报了仇罢。

2010年2月7日

只有中国能够救野蛮资本主义

我认为，所谓“社会科学”不是科学，而是政治，而所谓政治，也就是“大众争利”。社会科学家们的共同误区，是用自然科学的定律去类推人类社会，以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运动也有一套所谓“客观规律”。就算这套“客观规律”果然存在吧，那又便如何？要让人类遵守它，无非是两种手段：以国家暴力逼迫人民遵守，或是靠人民自愿去遵守。前者就是苏式社会主义国家干的事，后果有目共睹，而后者则绝无实行可能——有哪个民主国家的普罗大众会自愿服从右派（conservatives，保守派）伪经济学家揭示的伪经济学规律？既然毫无实作可能，诸位还来什么劲？利之所在，不是理性说服可以解决争论的。自然科学能够达成共识，乃是因为它不涉及人们的利益。

所以，诸位这套“客观规律”，我看只能去向极权国家兜售，这就是我为何说“兴许中国才是右派经济学家的乐园”，因为那儿并不需要说服人民，只需动用国家暴力强制推行就是了。

此话一出，某网友以为我犯了糊涂，正色告诉我，中国实行的正是权力干预经济，怎么可能成为conservatives的天堂？这小子记性太差，忘记了他过去犯的糊涂。记得我在旧作中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欧洲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把资本从权力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迫使权力从经济领域里退出。这家伙当即欢呼，说我终于接受了右派的信仰。我哭笑不得，因告诉他，同样是权力介入经济，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权力介入经济是为了劫贫济富，而西方权力介入经济是为了劫富济贫。

以上所说，其实指出了右派经济学的内在悖论：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其主张却只能在用国家权力压服力薄儒（liberals，自由主义者）与普罗大众的抵抗后，才能在全社会推行，这种自我否定的理论，难道还不是伪科学？

那位网友还现身说法，讲述了他如何从力薄儒变成保守派。我的经历恰好相反，我在国内时是死硬右派，出国后视野开阔了，反而变成了3/4个力薄儒。我大概是国内认识到社会主义行不通的第一拨人吧，早在70年代初期便看透了

马恩空想社会主义的荒唐，后来痛斥高寒那斯大林主义者，写的文字其实就是当年的思索心得。

但出国后，我对西方文明社会的实际发展史与现在的运作方式有了点肤浅认识，这才意识到，作为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没有可行性；但作为经济政策，它是对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调节机制。一个稳定的文明社会，必须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驱动引擎，以社会主义政策（不是指公有制）作为刹车，也就是以“利”作为社会发展动力，以“义”缓和社会矛盾。平时是“利大义”，但社会矛盾严重时则实行“义大利”。一个长治久安的正常社会，既不能缺少资本家的乏走狗，也不能少了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后者的存在，不是一个简单的道义需要，同样有着功利效用。它不但能防止社会矛盾在积累为爆炸性危机前即能及时化解之，而且通过基本的公民福利保障，为内需设定了一个最低安全线，使得30年代那种使得国民经济彻底崩溃的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永不再现。

正因为有这点对西方近代政治经济沿革的肤浅了解，我才会说出“兴许中国才是右派经济学家的乐园”的貌似荒谬的话来，盖如今中国实行的“野蛮资本主义”（秦晖教授语）与18-20世纪初的血腥资本主义颇有相似处。

右派同志们有所不知，他们看到的资本主义，是现代的人道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并非如此。据我一点道听途说，欧美的社会发展在近代经历了两个巨变。

第一个巨变，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在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相继取得胜利，推翻了权贵对资本的控制，迎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为小诚讴歌的美国立国的那个时代，的确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然而那也是与现今中国颇为相似的时代：工人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没有法定最低工资，没有法定最小雇佣年龄，没有法定最高工作时间，资本家或经理拥有随时解雇工人的不容置疑的权力，政府不得干涉。这就是当时的经济学为何被后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

这结果便是遍布欧洲的血汗工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大背景下问世的。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非捏造，确为事实。当时英国不但大量雇佣廉价童工，让他们在危险或有害的环境里从事繁重劳动，每日工作十几小时，使得他们在发育成人之前，便如苍蝇一般纷纷死去，而且大量雇佣廉价劳

力，从事毫无人身安全保障的强体力劳动。《历史》频道（还是《发现》频道？记不得了）上曾介绍过英国某条铁路的建筑过程，那铁道有个很长的隧道。它的开凿方式，跟毛时代“铁道兵”用的也差不多，全靠低薪雇佣大量苦力（鬼子解说员直接就用了coolie 这个词），“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工人工资极低，劳动条件极为恶劣，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工伤事故不断，死人如麻，而死者家属毫无赔偿。

美国便如何？著名的大陆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就是动用大量中国苦力建成的。老美自己承认，没有中国苦力，那条铁路根本不可能建成。他们也承认，白人都不想干那种粗活重活，嫌报酬不高，而雇佣中国苦力不但比雇佣白人省钱，而且苦力们勤劳苦干，极守纪律，知足常乐，学习技术的能力也很强，乃是最理想的劳力。然而等到大铁路修成，老美便立即卸磨杀驴，通过了排华法案。



这就是右派心目中的古典黄金时代，建议这些同志去读读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乔治·奥威尔的The Road to Wigan Pier，以及杰克·伦敦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原来是个洗衣匠，那工作强度大到连他那壮汉都受不了。他发愤学文化当作家，就是因为发现他顶多只能干上十多年，等到体力被无情榨乾，就会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届时两手空空，只能流落街头，如那些老前辈们一样冻饿而死。

这就是我为何说在某个意义上，现代中国是右派伪经济学家们的乐园。前段爆出的山西黑煤窟的惨事，在欧洲血腥资本主义时代实在是屡见不鲜。好在政府前段似乎通过了劳工法，对劳工的起码福利作了规定，使得港澳台那些丧天良的资本家再不能为所欲为了。90年代港商在深圳开设的塑料花工厂，为防止工人在上班时间私自出外，竟然焊死车间所有窗户，锁上车间大门。不幸车

间内发生火灾，女工们无法逃出，被活活烧死在里面。类似地，某位女工在某外商投资的烂厂中打工，因什么轻微过错，那外商（似乎也是烂港商，要不就是台商）竟然将她锁在狗窝前示众。这些烂事现在恐怕不至于再发生了吧。但即使如此，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仍然带有浓厚的血腥气，似乎仍无对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等的法律规定，厂主仍有无条件解雇权。

“利益最大化”乃是人的本能，要指望资本家靠道德修养约束自己，当然也有个别可能，但绝不可能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由制度管束，而制度要起作用，当然只能靠国家干预。工人会耍奸使滑，资本家又何尝不会？如果没有法律的严格管束，资本家当然只会拼命压低工人工资。即使有法律管束，他们也照样挖空心思逃避。我知道的一家咖啡馆从来不长期雇人，盖法律规定每年必须按通货膨胀指数给雇员加工资，于是待到工人刚要干满一年，他们就把人家裁了，重新雇用新手。这在低技术含量的企业里，似乎是普遍实践。这种烂事，恰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除此之外，尚有大规模的污染，“市场看不见的手”只管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利润，花钱控制工厂的排污量当然违反了那“客观规律”，这结果便是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全靠“市场外看得见的那只手”迫使国家动用权力干预经济，欧洲才又重新变成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美国因为幅员广大，这问题倒没有欧洲突出，然而市场外那看得见的手仍然通过了保护生态的立法。

这也是中国吸引欧美资本家的一个重大原因：那儿没有强迫“市场贪婪之手”缩回去的压力，所以他们只需考虑经济效益，不必考虑生态环境。

欧美进化的第二个重大突破，则是从19世纪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工人运动）取得的伟大胜利。这一运动在20世纪初基本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迎来了人道的资本主义。此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将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的重轭下解放出来，使得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但随之也出现大量社会矛盾。社会主义运动则使得普罗大众从资本家的重轭下解放出来，让实行“利大义”的自由资本主义获得了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社会危机，使得资本主义长了一副人道面孔。

毋庸置疑，人道资本主义当然没有血腥资本主义的效率高，这就是西方如今竞争不过东方的根本原因所在。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只能起到辅助调节作用，决不能本末倒置，也就是只能实行“资本主义为主，社会主义为辅”。如

果社会主义搞过头，甚至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必然要变成懒汉乐园，如60-70年代的英国一般：政府以征收重税确保社会福利，使得资本家丧失投资热情，工人丧失劳动积极性，因此全国入不敷出，只能搞赤字预算，政府负债累累。国家更被工人阶级劫持，恶霸工会成了超级国会，政府一旦得罪之，立即就得下台，真正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更不幸的是，正如国内作家辛子陵指出的，资产阶级才是先进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代表，无产阶级恰是其敌人。从诞生那天起，无产阶级就是先进技术的天敌，因为使用高效新技术意味着工人大量失业。因此，工人阶级其实是社会上最保守的势力。他没指出的是，无产阶级也是高效益的天敌。英国70年代后期的工人运动，完全是政府要关闭负债累累的矿井引发的。如果撒切尔夫人像她懦弱的前任一样，向恶霸工会投降，那么，那些背时矿井或许会开到今天，而政府不知道得往里面投进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这其实构成了一种煤矿工人对全民的无理剥削。所以，与我党的宣传相反，工人阶级非常自私，丝毫不顾大局，与资产阶级的本性毫无实质区别，动辄以不顾大局的罢工使全民受害。90年代那阵子，就连救护车的工作人员都竟然罢工，逼得政府不得不雇佣出租车司机去开救护车，然而那些人只会开车，不会救人，使得许多危重病人死在半道上。您说这混帐不混帐？

所以，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既不能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样，由资本家一手遮天，也不能如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谁都不能独霸国家，必须实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在各阶级的无穷吵闹与妥协中求得一种动态平衡。当社会矛盾重重时，政府便压资本家向工人阶级作点让步；当社会缺乏经济活力时，政府便压工人阶级向资本家作点让步，实行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主席的教导：“执行政策就像开飞机，左一下右一下地来。”而要实行这种左右摇摆，当然只有靠政府来“开飞机”。国家对经济政策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但国家对文化思想学术等等则无权干预。这就是我为何自称3/4的力薄儒——在文化上，我是个100%的liberal，但在经济上，我只是一半。所谓左右摇摆，只能是经济上的，决不能推广到文化、思想、教育等其他方面。

但在经济上不管怎样摇摆，个人认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取得的全民免费义务教育、全民医疗保险、最低限度的全民养老制度，是不能让步的底线。其理由我已经在另文中讲述过，不想在此重复。此外还有最低工资、最高工时、最低雇佣年龄等工人运动成果也不能放弃。窃以为，离开这几条，则难免要出现返祖现象，回归到古典资本主义那血腥时代去，而资本主义便再无人道可言。

可惜这人道资本主义如今又面临着中国野蛮资本主义的威胁。现在资本家的天堂，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中国，那儿工人毫无权利可言，只有单向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营资本家，对工人都毫无责任，而工人对他们则有不容规避的责任。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如今就连对中产阶级而言，医保与子女教育都成了难以承受之重，莫非那也是应该的？

如上所述，野蛮资本主义具有人道资本主义没有的高效率，能为资本家带来超高利润，因此，它必然在与后者的和平竞赛中轻松胜出，其机制是两条：一曰低人权导致的低成本赋予的产品竞争力，二曰超高利润对全球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因而也就是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这两条都是通过万能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并非某个“世界政府”动用权力使然。这两条结合在一起，便使得西方实业发生难以逆转的萎缩。

我已在《日薄西山》文中指出了来自中国的这一严峻挑战，迄未见到右派们正面回答该如何应对这一严峻挑战。如果我理解不错，本区的右派经济学家们的锦囊妙计似乎是，去除欧美工人运动赋予现代资本主义的人道气息，回归到古典黄金时代去。假定这妙计真的奏效（那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说了，力薄儒是不可战胜的），那在我看来乃是世界最大的噩梦，也是中国对世界作的最大的孽。敝人忝为华人，雅不愿看见母国竟以一国之力逆转世界文明进步。如果这妙计不奏效，则文明世界只能坐待瘓毙，当经济困顿到一定时刻便爆发普遍骚乱。Either way，文明世界似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解决这问题的双赢之道，似乎还是中国同时完成两大战役，一曰资产阶级革命，二曰社会主义革命，前者将权力与资本全面脱钩，后者则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使得工人从会说话的工具升为享受基本人权的公民（请注意，这儿说的“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改造）。这当然会失去原有的高增长率，但它必然通过解放民营资本家的创业精神而得到补偿，而工人阶级在获得解放

后，内需也必然极大提高，使得产能过剩的危机得以化解，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如果这种良性变化发生了，则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要从中获益。

2010 年 2 月 9 日

含泪请求中国政府停止侮辱中国护照

11 月 3 日，中国公民冯正虎回国，在抵达上海机场后不但第八次被拒入境，边检人员和警察还用了一个多小时暴力制服了他的反抗，把他强行绑架到飞机上，遣送回东京。他不得已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入境审查大厅内，就在那儿的长凳上过夜。为了表示回国的决心，他声明放弃日本签证，谢绝了联合国让他申请难民的建议，就这么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一直坚持下来。

这消息让我这深知我党把戏的同志都跌破了眼镜。太平洋再深也有底，我党的无赖没底，竟然连“事实上的开除国籍”的烂事都有本事干出来。须知我党可以开除谁的党籍、学籍、公职等等，但绝无可能开除某位土著公民与生俱来的国籍。这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观”，而是连白吃都知道的人类常识：国籍并不是某个执政党、某个政府、某个机构可以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本人不放弃，那就谁也无权夺走。在这点上，它比性命还结棍，我党可以剥夺某个公民的性命——刑法上不就有死刑么？但不可能剥夺某个公民的国籍，因为刑法上并无“开除国籍”的惩罚，也不可能加入此类惩罚，那理由简单到连我都不好意思解释：既然是刑法上开列的惩罚，那受罚者当然是罪犯。你开除了人家的国籍，把人家驱逐出境，岂不成了出口罪犯？莫非这就是“负责任的大国”干出来的事？

既然不能开除人家的国籍，那就不能剥夺人家回国的权利，否则就是制造“中国公民无权在本国内居住”的天字第一号智力笑话，敬爱的党中央何以连这点人类常识都没有？

动用纳税人的钱，使用暴力绑架的非法手段，强行将本国公民驱赶出境，不许人家回来，逼得联合国出于人道理由不得不建议受害者申请难民身份，这是不是动用纳税人的钱人为制造政治难民、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这是不是为伟大祖国丢脸？莫非这就是“权为民所用”的表现？

更何况这档子烂事从头到尾都是黑箱操作，官员们连个为何要拒绝冯先生入境的理由都说不出来。即使是苏秦张仪转世，谅他们也没本事解释这不可能解释的怪诞举措——冯先生若是在国内犯了法，那中国政府的责任就是把他抓

回去绳之以法；若是没犯法，那中国政府的责任就是保护他的行动自由，岂能非但不许他回到祖国，而且还要动用暴力把他赶出国去？

冯先生拿的是中国护照，封面上印着烫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那可不是装饰，而是中国政府对护照持有者的庄严承诺。凡是西方公民都知道，通过发给公民护照，政府也就做出了庄严承诺：无论他们走到天涯海角，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保护。保护侨民乃是任何一个文明政府的责任，西方政府甚至可以为此发动战争，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都是这么打起来的。而美国之所以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德国潜水艇击沉了英国邮船“卢西塔尼亚”号，使得数百美国旅客遇难。这些当然只是战争的导火索，但它们也同样反映了西方政府保护侨民的责任心。

中国政府据说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那所谓“负责任”，当然首先是对本国公民负责任，这也包括保护海外公民的安全、幸福和自由不受非法侵犯。而今中国政府却反文明之道而行之，带头侮辱中国护照以及其上的庄严国徽，带头侵犯护照持有人的人身安全，非法剥夺人家的行动自由，如此敢于和善于侮辱自己的政府，还恬恬然不知受辱，老芦无知，还真不知道世界史上有第二例。

看看冯先生，其他被我党慷慨遗忘与无视的海外侨民大可告慰。

2009 年 2 月 14 日，中国货船“新星号”在俄罗斯纳霍德卡港外遭到俄边防军“海岸”号军舰炮击。在返港途中，货轮因遭受重创而沉没，7 名中国船员失踪（“丧生”的同义语）。外国军舰击沉中国货轮，中国政府却甘之如饴，只敢要求俄方协助全力搜寻失踪的人员，尽快地查明原因，却无只言片语谴责俄方放肆践踏国际公法的罪行，遑论要求惩办祸首并对受害人及其家属作出谢罪与赔偿。连道歉赔偿的要求都是租赁该船的香港吉瑞祥船坞有限公司提出的，堪称开创了世界外交史上之光辉先例。

2009 年 6 月 18 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将集中销毁价值高达 20 亿美元的中国“走私”商品，并要求莫斯科市尽快关闭切尔基佐沃市场。俄罗斯中国浙江同乡会会长倪吉祥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表示，此举对中国公民造成的损失根本不止 20 亿元，而是涉及到 6000 个集装箱，每箱货物价在 50 万到 100 万美元之间（也就是总损失在 30 亿-60 亿元之间），“这次华商的损失是空前的。有人跳楼，有人自杀，这么多人倾家荡产，可至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华商跳

楼的跳楼，自杀的自杀，然而中国政府却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不说发个抗议照会，连表示关切的姿态都不曾作出一个来。

那位看官说了，冯先生既没被人打下冰海去去挣命，又不曾因财产被抢夺而跳楼，不过是在候机厅里餐过客之香风，饮机场人员代他购来的甜露而已，这算得了什么？为何还说比起他来，“新星号”船员和居俄华商差堪告慰？

我这么说，是因为在那两次不幸事件中，视中国政府对海外公民的保护如无物、放肆践踏中国国威的施暴者，毕竟是异族老毛子，并非中国人，更不是中国政府，而侮辱冯先生手持的中国护照上的国徽的人，恰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连自己的国徽都不尊重，肆意践踏对公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指使边防人员带头侵犯中国公民的人身，使用暴力强暴中国公民意愿，剥夺中国公民的回国自由，将冯先生强行搬运上飞机，并当着日本飞机上的乘务员和外国乘客的面，在机舱里长期扭打拉扯，制服冯先生的反抗，直到他精疲力竭无力挣扎为止。这些代表中国政府的好同志亲力亲为，言传身教，为异族作出了怎样欺负中国公民的光辉示范。这当然比默认外国政府欺压杀害本国公民更混账，更令海外华人心寒齿冷。

上次国庆大阅兵，许多海外华人在网上自称看后激动得几天几夜都没睡着，那意思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祖国或母国的强大了，以后侨民或华裔再不会受异族欺侮了。在我这 cynical 之人看来，这些天真同志未免太自我膨胀，自作多情了些，不知道热脸未必能贴上我党的冷屁股。连白吃大概都想得过来：那强大的武力就算有用，也是拿来“平叛”“镇暴”，防“家贼”而不防外贼的，要不为何不敢对北极熊亮出干货来？

任何一个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只要智力正常，都该看出我党所谓对美作出的强硬姿态，其实不是出口而是内销。斯大林发明的国家模式的运转前提之一，是树立国外假想敌。这也倒罢了，我还是能充分理解并体谅党国领导的苦衷的。但既然要树假想敌，何不选上百般欺负华人、羞辱中国的俄罗斯，而要“远攻近交”，违反地缘政治的常识去跟无害于中国的老美过不去？莫非我党也懂小留那手，知道“避实击虚”，跟老美叫阵非常安全，但决不能跟流氓政府过不去？

据自由亚洲电台前几天报道，索马里海盗发言人表示同意接受三百五十万美元赎金，释放上月中被劫持的中国货轮“德新海”包括二十五名船员。官办

《中国日报》与香港《凤凰网》都报道了这一消息，然而此后中国政府却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提示中共已经接受了这一要求，可能业已付钱。只是因为大阅兵刚过，而且事发后政府还大张旗鼓地出动海军去援救，如今却乖乖接受绑匪讹诈，花钱赎票，面子上下不来，所以只好使出消声的惯技来，指望国人再次发生选择性遗忘，忘记国防部在事发时拍紫了的胸脯，以及据说是早已全速开去营救的中国军舰。

其实窃以为，比起上述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来，中国政府肯掏钱为子民赎身，乃是翻天覆地的伟大进步，应该大肆宣传才对，怎么反倒引以为耻，秘而不宣涅？看来领导那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我党领导人的荣辱观比较别致。在他们看来，关心本国公民的安危是耻辱，迫害或默许异族迫害本国公民反倒是光荣。这种独特的荣辱观若不改变，则中国哪怕就是作了世界的龙头老大，当中国公民，拿中国护照仍然是一种耻辱，永远与光荣无缘。

2009 年 11 月 26 日

“负责任的大国”政府缘何效法绑匪？

冯正虎先生滞留东京机场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每过一天，都是对党国政府的无情羞辱。就连我这个对蠢党之蠢动见惯不惊的老同志，都为党国政府此番出类拔萃之蠢，羞愧到恨无地缝可入。

本来，我党干蠢事烂事恶事本是常规操作，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无论我党做出什么事来，都难得让我这曾经沧海之人拍案惊奇一回。不过处理冯先生这档子烂事实在是蠢到出了格，构成了国际外交史上的空前丑闻，令我忍无可忍，不得不智叟移山，教育我党，为我党再次疗愚。

这事的出格之处在哪儿呢？过去我党无论干出什么丑事蠢事恶事烂事，总还是能巧言伪说，文过饰非的。例如全民砸锅化铁炼“土钢”，可以说成是“好心办坏事”、“交学费”、“焕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饥荒可以说成是“苏修卡脖子”、“特大自然灾害”；六四大屠杀可以造谣说是“一小撮暴徒发动反革命暴乱”，等等，等等。

看多了这种表演，我有时忍不住要想，这世上无论是什么烂事，总有无耻之徒舌灿金莲，发明出种种无耻说道来为之狡辩。似乎可以说，世上没有能洗白的煤炭，但也没有无法喷涂成白色的煤炭。例如斯大林 30 年代的大清洗把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基本干掉了，这烂事本来是共产党人或亲共人士根本无法为之辩护的，然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有本事在《斯大林时代》里振振有词地说，二战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都有大量的第五纵队和卖国贼，唯独苏联没有，由此可见斯大林的大清洗是非常及时的，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如今这事却打破了 “喷涂”原理。合全中宣部之力，谅他们也没本事把这蠢事喷涂成白色的，给出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事情明摆着：冯先生若是犯了法，那中国政府把他赶出来，就是玩法渎职，轻纵罪犯，污染国际治安环境；若是没犯法，则中国政府使出绑匪手段来将他强行绑架上飞机，送出国境就是恐怖主义犯罪。这道理就那么简单，迟钝愚笨如中南海诸公，恐怕也能明白吧？

笑话还不止此。“国庆”大阅兵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政府拥有几百万雄兵，手握最先进的武器，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更具有以最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国安、公安等情治机构，排山倒海不足以喻其势，投鞭断流不足以喻其气。与这庞然大物相比，区区屁民如冯先生者，连泰山前的蚂蚁都不如。

然而如此强大的党国政府，如今却竟然公开向世界宣告，它不过是一个虚弱透顶、怯懦入骨、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纸老虎，集全国强大武力、警力、宣传力乃至全体智囊的智力，一切合法手段都穷尽了，仍然奈何不了一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唯一武器的守法公民。智穷力竭，无计可施，狗急跳墙，人急耍赖，情急之下，不得不使出流氓的无赖招数来，连起码的面子都不要，起码的体统都不讲，动用恐怖分子的暴力手段，把他绑架出境，顾头不顾腚，只顾推出国门了事，却连起码的遮丑说辞都想不出来！

呜呼哀哉！这也配叫政府，“负责任的大国”政府！

我也深知并体谅党国领袖的难处：诸位的“宪法”乃是骗人的。一旦屁民要较起真来，含泪请求政府履行对公民白纸黑字立下的庄严承诺，那自然如同开了假支票让对方找上门来一般，说不出地难堪，又无从发作。更何况若他人群起效法，纷纷上门索债，那又该如何抵挡？当然只能扭住债主的胳臂推出门外，以绝后患，而求耳根清静。

这么干当然也有效，但前提是对方必须合作。过去这从前苏联学来的下流招数之所以有效，乃是受害人自认晦气，干脆就在国外居留算了。西方国家政府要和中国做大买卖，也就对此流氓行径眼开眼闭。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党便自以为得计，干出瘾头来了，发给公民护照，竟然是如蛇头一般，把他们骗出国境，然后逼迫他们在国外当难民。这种痞子骗子无赖的行径，就连前苏联那种流氓国家也不曾干过。

可惜如今冯先生立志要作公民不当难民，滞留在两国之间的“飞地”上要求回国，这事就变成个扔不掉、拿不得的烫山芋了。联合国为解决此事，建议冯先生申请难民身份，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种侮辱。全靠中南海诸公惊天动地的愚蠢，这才看不出其中的涵义来：方今之世，没有哪个文明国家还有政治犯、思想犯。如今联合国竟然建议中国公民申请政治难民身份，那就意味着中国国内有严重的政治迫害，因此公民只要得罪了政府，哪怕再遵纪守法，就连最起码的公民权利都会被非法剥夺，以致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

竟无一己立锥之地。可笑可悲可耻的是，对这一严重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侮辱，中国政府竟然也就默认了！这不是公开通告全世界，中国政府毫无自爱之心，丝毫不拿中国国际威望当回事么？

更糟糕的是，事件还有越闹越大的趋势。顷见《美国之音》报道，日本政府边境管理部门日前开始敦促滞留日本成田机场的中国公民冯正虎进入日本，不过并没有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离开入境管制区。

冯先生当然巴不得离开入境管制区，越快越好——谁会愿意住在那种连起码舒适安宁都没有保证的地方？他呆在那儿的唯一目的，就是离开入境管制区，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这才是合理合法合情的解决办法。如果日本当局效法中共，使用武力强制他入境，必然要在那民主国家引起大哗，使得这丑闻家喻户晓，让中国政府再次大大地丢脸。莫非侮辱自己也会上瘾不成？蠢到这种匪夷所思的地步，实在是超出了我贫弱的想象力与理解力。

鉴于领袖们的低下智力，再对诸位悄悄重复一遍：这种事，既然连“中宣喷涂部”都无法想出个体面说辞来，那就是说，即使以我党的超低标准，它也是见不得人的流氓烂污事体。要干只能偷偷干，掩耳盗铃的指望是别人听不见。一旦闹得全球皆知后，那就是在我党的脸上喷黑漆了。越拖下去，闹得越厉害，知道的人越多，则黑漆喷涂得也就越丰厚。因此，唯一明智的收场策略，就是悄悄认栽，把冯先生接回去，同时严惩连累政府出丑的小特务们，告诉他们以后若是人回来了，就不要再动用绑匪手段把人绑架上飞机。万一对方不堪迫害要维权到底，那就得不偿失了。

2009 年 12 月 8 日

我党的面子与冯正虎先生的撤退战略

——兼评胡平《孤胆英雄冯正虎》一文

网友将胡平先生《孤胆英雄冯正虎》一文转贴到本区，引发了网友争论，我于是打开看了该文。第一段忒有趣，说 11 月 26 日记者在外交部例行招待会上询问冯正虎被阻入境一事，发言人秦刚答："中国有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有关问题。我建议你向相关主管部门询问。"

于是便赶快去网上学习有关法律，但见 1985 年 11 月 2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总则第一条赫然便是：

"第一条　为保障中国公民出入中国国境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促进国际交往，特制定本法。"

而 1994 年 7 月 13 日国务院批准修订，1994 年 7 月 15 日由公安部、外交部、交通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的第十五条则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边防检查站有权阻止出境、入境：

（一）　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其他出境入境证件的；

（二）　持用无效护照或者其他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

（三）　持有伪造、涂改的护照、证件或者冒用他人护照、证件的；

（四）　拒绝交验证件的。"

很明显，这四条冯先生哪条都占不着，那么，他出入中国国境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为何得不到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的保障？莫非秦刚先生此答，是向中外记者委婉暗示，"有关部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以及实施细则，这法律责任只能由"相关主管部门"而不能由外交部承担，敲锣卖糖，各管一行，暴力绑架公民出境不在外交部的业务范围内，

那是“有关部门”的事，请诸位认准犯罪嫌疑对象，勿要牵丝攀藤，连累无辜？

秦刚先生此答，昭示了我在《“负责任的大国”缘何效法绑匪》一文中指出的尴尬：暴力绑架冯正虎先生出境这事干得实在太蠢太烂，哪怕是苏秦张仪复生，都没本事想出个无耻说道来为之狡辩，完全是我党毫无来由毫无必要地羞辱自己，蓄意跟自己过不去。其实现在大多数百姓都是犬儒，我党的统治还是相当稳固的，少数维权人士并不至于动摇大局。我党若有点起码自信，就不该怕成这样，连个区区屁民都不敢留在国内，要以绑匪的暴力手段把人家扔出国来，适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自己的野蛮、愚蠢与胆怯。这种事干得越多，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就越糟糕。所以，为党国政府面子计，这种蠢事以后还是别干的好，整个得不偿失。

可惜有的网友竟然看不出这说得无比明白的意思，还以为我是刻薄讽刺。其实我早说过了，本人是布衣帝王师，专为我党疗愚，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哪件事做蠢了，以后不要再这么干。这完全是为我党着想，哪是跟他们过不去？蠢党领袖们本是智力残疾，刻薄嘲笑残废有失人道主义精神。老芦人生已近终点，尚有无数锦绣文章要写，写时评毫无传世价值，若不是我党蠢到无情羞辱自己，让我忍无可忍，我吃饱了撑昏了，会去轻易为党国忍痛牺牲有限的生命？

有的网友认为海外民运人士又想炒作冯先生，捧着他去做英雄，断了他的后路。这也未必是诛心之论。如所周知，海外民运早成了一种职业。干这行的人当然要显示出敬业精神来，最怕的就是国内太平无事，令他们贻尸位素餐之讥。最好的就是国内源源不断不断地涌现出高智晟、杨佳那种“我们的英雄”来，以彰显“职业革命家”们的业绩。海外赤佬见多了这种表演，见到胡先生的文字，引起条件反射式的恶心也毫不足奇。

老实说，我最怕的就是一桩人道主义救援活动被他们掺合进来，弄成了政治斗争，彻底变质走味，反而失去了解决希望。2004 年间，丁子霖教授被拘留，网人安田发起写公开信营救，我本来签了名，但那事却被民运人士迅即接管了，让我说不出地恶心，更担心倒共政客们的卷入反而连累丁教授。但我既已同意签名，便再也无法撤回。幸亏丁教授很快就被释放了，免去了我的良心负担。

后来蒋彦永大夫上书被捕，政客们又发起公开信营救。我鉴于前车，当即写了份《恭请政客们退出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无奈人家根本不理。过后我想想也是：我岂能剥夺人家显示业务成绩的机会？坏人衣饭，如杀人父母，人家既然干上了这行，总得活下去吧？

不过这种活法，也真是有点那个。

2003 年间，因刘荻被公安非法拘留事，海外民运人士与国内异议人士一道，在网上发布了《愿陪刘荻坐牢》的公开信，领衔签名的好像就是胡平先生，此外还有高寒、茉莉等人。此后不久，在该公开信上签名的国内网人杜导斌果然被抓进去了。我悲愤万分，遂写出《营救刘荻、杜导斌的有效方案》，建议那些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海外“民主”、“人权”大腕秀星们纠集上一夥记者，约齐于某日飞回中国，同时在机场闯关，要求当局把自己关押起来，以实现“陪刘荻坐牢”的誓言。在那文章中，我向秀星们保证，此举绝对无惊无险，绝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盖中共绝不敢不顾全世界舆论把他们一网打尽，只会拒绝他们入境。如此一来即能吸引世界舆论对刘荻案的注意，造成他们难以承受的压力，促成刘荻的释放。

这建议贴到了《万维》、《博讯》、《海纳百川》等网站，秀星们绝无看不见之理。事实上，参与签名的民主秀星们有好几个就日日在海川出没，然而老芦贴出那帖子来后，除了遭到他们的粉丝的无量侮辱之外，正主竟然无一人敢出来搭腔，遑论接受我那建议，同意集体回国闯关，以此向我党施压。勿过，the silence is deafening，秀星们不敢回答，响亮地宣告了他们“愿陪刘荻坐牢”乃是在天下人面前发假誓。在那假誓把国内人士骗进了大牢之后，他们仍能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拔一毛以援已溺，不为也”！

这就是我看到胡先生文中“至于冯正虎本人，早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说过坚持一年两年没问题”一语，心中颇不是滋味的原因。窃以为，在这种时候披露此类信息，实在有失厚道。或许我这人心理阴暗，不过那话怎么看怎么像提醒冯先生他作过的承诺。胡先生纵无断了冯先生退路之心，起码也会给人家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这段话就更不像话了：

> “很明显，这事越拖下去越对中国政府不利。假如拖到明年三月都不解决，到那时举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 温家宝总理出面举行记者

招待会，如果再有记者问到冯正虎事件，温家宝还能象秦刚那样打太极拳，说什么‘有关部门正在根据有关规定处理有关问题’，叫人家去‘向相关主管部门询问’吗？如此说来，我们有理由对冯正虎事件抱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这分明是为冯先生制定战略规划，要他坚持到明年三月去，以求得事件圆满解决。请问胡先生哪来的这种规划他人人生的权利？难道为了实现您那“谨慎的乐观”，冯先生就得在长椅上熬到明年三月间，好等不识趣的记者去向温家宝问那问题？如果没人询问，或是温家宝顾左右而言他，难道冯先生就只能再熬下去，熬满你给人家指定的“一年两年”不成？

在《博讯》最近播发的专访中，冯先生似已微露撤退之意。我个人觉得，冯先生是撤是守，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旁人可以同情，可以声援，可以资助，可以抨击政府，可以劝告敦促政府放弃这种野蛮做法。但任何一个有点责任伦理观念的人，都既不可以劝守，亦不可劝撤，更不可代人家预定坚守日程。胡先生若想获得“谨慎的乐观”成果，不妨亲力亲为，也去闯一回关，也让国安边防人员暴力绑架出境，再在纽约机场入境处坚持下来，那就爱坚持多久都随他的意。

据《博讯》的专访，冯先生向采访人王宁表示：“聖誕節要在這裡過，元旦還未定。” 他還說：“如果我要進入日本，就是決定再次進攻了。”“拿着機票再次回國回家，而且這次要取消所有的簽證。”

如果冯先生有撤退考虑，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撤退战略（exit strategy）。如所周知，我党的面子大于天。如今冯先生已经引起了舆论注意，又是滞留在东京机场。我党即使因我的哼哼教诲发现此事干得太蠢，那也碍于面子无法下台，不可能主动采取措施去请冯先生回国。如果我党狗急跳墙，真如胡先生打听到的那样“据说当局已经向冯正虎的家人施加压力，甚至有国安部的人提出假装游客给冯正虎送吃的机会，让他得病抢救而自动离开机场。”那就得不偿失了。维权当然重要，但犯不上把自己的性命贴进去。

依愚见，若冯先生真在圣诞或元旦过后进入日本，此后再作第九次回国，则可以为我党搭个下台的台阶。到时我党有可能采取低调处理的方式，悄没声儿地让他入境了事。这说起来也没什么丢脸的，因为这次冯先生被拒入境的唯

一“理由”便是“上级指示这次还不能让你入境”，那上级下次指示可以入境不就行了么？

如果下次我党还是胡来，则冯先生可以跟他们说：你们这次再把我赶出去，我就要去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九次被拒入境，在东京机场的飞地滞留 X 天，绝对史无前例，完全可以进入该书，成了我党无法抹掉的永恒耻辱，那么做是不是太得不偿失？当然这只能是威胁，若真的兑现，则我党必然恼羞成怒，更不会让他入境了。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个人想法，目的是为了打破这僵局，找到一条让我党不失面子让步的途径，仅供冯先生参考，绝无为冯先生规划人生的狂妄与僭越。至于最后到底是撤是守，当然取决于冯先生的自由决定。我只想跟冯先生说，无论您是守是撤，至今为止，您干的一切已经足够了。作为一个同样可能终生无法归国的独立知识分子，我感激你的维权努力！

2009 年 12 月 13 日

刘晓波的悲剧

刘晓波被判刑前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刘晓波次日就要审判了，他估计会判得很重，盖中央指望以此杀一儆百，吓阻国内异议人士，否则他们就有可能组党。他估计，中共在重判刘晓波之后，关押上一段时间之后，便会把他放逐出来，使得他在“海外民运化粪池”里自动融化，彻底失去影响力。

这位朋友消息灵通，很有洞察力，他的话我不能不信。次日特地上网，果然不出他所料，刘晓波给判了 11 年，顿时只觉说不出的悲伤和沮丧，这些天来什么心思都没有，觉得中国真是个被上帝诅咒过的国家，永远在那既定轨道上运行，一点改弦易辙的指望都没有。

后来就看到了判决书，佩服到五体投地。我过去总认为无论中共做出什么事来，我都不会惊讶，不料拜读了那伟大的历史文献，这才发现自己过去严重低估了我党脸皮厚度——竟然连这种不要脸的弱智玩意，他们都有本事在全世界面前亮出来！

据说，刘晓波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全部证据是两条，一是《零八宪章》，二是刘在境外网站上发表的六篇文章。这种白痴玩意都有本事拿出来现世，令人不能不佩服我党果然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没有脸皮一说。

如果说《零八宪章》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这就是个涉及到一万人以上的集团犯罪。就算刘晓波是集团军司令，那起码也得把所有的从犯都抓起来，作为一个叛国大案来审讯，以查明各人的犯罪性质与程度并作相应判决吧？只审判刘晓波，余人不问，岂非玩法轻纵了那一万多名叛国罪犯？这就是党国的法律尊严？

那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的“罪证”更是令人笑掉大牙。我做梦也没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竟然能管到境外去！文章既然发表在境外网站，那么，它是否犯法，当然只能由网站所在国判定，岂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悍然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强行代替其他国家操刀执法？“境外犯罪境内

审”，党国政府发明的这新时代的“治外法权”，是不是也太特别了些？这一套，就连当年的英法帝国主义者也没干过吧？莫非今日中国真是成了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可以任意侵犯别国的司法主权？

尤可笑者，判决书还承认，刘晓波那些文章是从 2005 年以来开始发表的。那就是说，这叛国犯罪行为持续了三年之久。那为什么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要包庇他持续犯罪，既不立即制止，甚至也不加以警告，而要无所事事，坐视他猖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达三年之久？包庇犯罪，本身就是犯罪，可见公安局乃至公安部才是包庇纵容刘晓波犯罪的幕后黑手，才应该被抓到被告席上去。

还不止此。如所周知，我党动用大批民脂民膏搞所谓“金盾工程”，把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严丝合缝地密封起来，连电子都没法穿透那网上柏林墙。刘晓波的文章发表在海外，国内网民根本就看不见，那还有什么“煽动”一说？那几篇文章的总点击率最低为 57，最高 748。阅读者只会是海外华人，并非中国公民，就算是中国公民，就那么几个人，还都在海外，怎么个颠覆中国政府法？连这都算犯罪，那在梦里批评共党也是犯罪了。我党是不是还该投入重金，研发“梦幻监测工程”，好把每个公民梦中的反动言行都及时记录下来，必要时用作法庭审判依据？

如果向境外网站投稿算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我党为何还要提供经费，让居住在境内的前“民运”垃圾胡安宁在境外开办网站，四处剽窃批评我党的文章，在该网站大量刊登并提上导读呢？那罪行是不是比向境外网站投稿更严重万倍？

当然，胡安宁这次大概是接到指示，除了刊登判决书之外，便是登出《北京日报》在六四后不久发表的所谓刘晓波的反革命言论，还特地把日期抹掉，企图让读者以为那是刘最近的言论，使得我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更像回事些，却不敢转载声援刘晓波的只言片语。不容否认，胡确实为我党正面宣传此案作了密切配合。但他在此之前犯下的严重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总不能因此就一笔勾销吧？

总而言之，我党这次出的丑，堪称新时代《笑林广记》之最。无耻和弱智都是我党的行事常规，在一般情况下绝不会使我惊奇，但这次中共居然脸皮厚

到如此地步，敢把这白痴判决书公诸于世，却不能不令我倍感绝望。这涵义连盲人都能看出来：如今我党是有恃无恐，再不把文明世界放在眼里了。

刘晓波判刑如此之重，堪比魏京生。但魏京生好歹还有个什么“出卖国家机密情报”的借口，而且政府始终没敢把那判决书亮出来。那还是在铁血强人邓小平当国之时。如今胡锦涛不过是个积极分子出身，刘晓波的言行中根本就抓不到什么把柄，但胡就是不但敢重判刘晓波，还居然敢把那白痴判决书公诸于世。他敢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其魄力堪比老邓，而是国力今非昔比，中国已非昔日之吴下阿蒙了。过去中国必须仰赖西方的金钱和技术，因此行事不能不有所顾忌，如今据说中国成了救世主，西方正翘首盼望中国广撒金子，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既然如此，党国政府还有什么可忌讳的？

这就是第一个令人绝望之处——再也没有管束那个无法无天的流氓政府的国际压力了。

第二个令人绝望之处，乃是中共通过此举，向全世界明确无误地宣布了他们绝不会允许体制内的反对派出现。判决书说得明明白白：“反对＝颠覆＝犯罪”。中国人只能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当奴才，要么做响马。谁若想向刘晓波那样走出第三条路来，坚持做体制内的反对派，谁就是罪犯，就要遭到“人民民主专政”铁拳的无情痛击。

这才是最令人悲哀之处。我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中国人只会走极端，不是当奴才，就是作响马。不是逆来顺受，俯首帖耳，听任暴君宰割，就是扯旗造反，试图推翻暴君，却从来不知道，无论是当奴才，还是做响马，社会都不会因此前进一毫微米，反而只会倒退。要想建立一个常态社会，就必须在政府之外有个“忠诚的反对派”（也就是体制内的反对派）。没有这种拮抗机制，则社会只会一天天烂下去，不知伊于胡底。

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就连传统社会的君王都知道这浅显道理，为此特地设置御史台，构成古典的体制内反对机制。尽管那设计的作用与效果非常有限，但毕竟还是说明古人有点起码的政治智慧。

中共却连传统帝王都不如，专门提拔奖励无耻拍马的佞臣，专门整肃直言敢谏之士，就连刘宾雁那种拥护共党领导、相信社会主义的现代御史都容不得，要把他放逐出国，连死后都不许埋骨乡梓。中共更把阿谀奉承统治者当成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谁若是敢批评我党，不管动机如何，统统都是犯了叛

国罪，都要以大牢伺候。通过刘晓波案，我党已经把这基本国策再次说得清清楚楚了。

这是何等可怕的前景！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毫无起码约束，为所欲为，只许人民规规矩矩，不许人民乱说乱动，若要乱说乱动，坚决镇压。这种毫无刹车的国家会开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恐怕就连白吃也能想得出来吧？

本区网友正在争论这道义与功利的问题，却没看到这两者根本就不是对立的。所谓道义，说到底就是全民的功利所在。我反对的，乃是如伪民运良心家们那样，把道义从功利中剥离出来，使之变成一种超越于功利存在的绝对实体，当成一种政治斗争武器，并不是认为可以只讲个人的功利，不顾全民的功利（亦即道义）。脱离了全民功利考虑的言行就无所谓道义，而民运良心家们的绝活，正是要求人民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去为他们主观制定的“道义原则”作牺牲。但不能因为有这些骗子良心家们的存在，就否定出自全民功利考虑的正义行为。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刘晓波坚持在国内当体制内的反对派，试图首次在中国走出响马与奴才之外的第三条路来，当然是功利上的极大失策，但从全民的角度来看则代表着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现在中共悍然再次宣布此路不通，中国公民若不是奴才，就只能是敌人。在取消自我完善的一切可能之后，这种烂污社会还有什么痊愈希望，还有什么长治久安的可能？于是医治社会病态的唯一希望，便是大家集体做响马，再来一次翻烧饼，再使社会来一次大倒退。功利家们为何就看不到这彰明较著的恶果呢？

这就是刘晓波的悲剧所在：在人山人海的奴才与响马大军中，他代表道道地地的“一小撮”特立独行之士，势必遭到朝野的两面夹击，其遭遇正如当年俄国十月革命前的立宪民主党人与进步党人一般，因为试图在体制内推进民主改革，最后是既得罪沙皇，又被激进革命乱党蛊惑下的愚民最终无情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的确，在一个愚昧的国家，刘晓波这么干，只能两面不讨好。《零八宪章》固然是我党的眼中钉，但它同时也被海外响马们痛加抨击。以《大纪元》为喉舌的法轮功宗教政治党人，以及何清涟乃至高寒那群形形色色的草寇，一直在辱骂《零八宪章》，污蔑刘晓波是共特。

因此，说到底，刘晓波的悲剧，其实是民族的悲剧。它响亮地宣布了“改良主义行不通”，而这是朝廷与草寇联合作出的英明决定。中国的事，从来就是糟在这两大势力手上，不是毁于朝廷，就是毁于草寇。晚清是朝廷要改良，草寇不许改良，八六年、八九年也这样。但六四以后则是朝廷坚决不许改良，草寇则历来不许改良，倒也没什么立场变化。

正因为此，刘晓波被重判反而是草寇们的盛大节日。要知道这一点，只需在 Google 里打入“刘晓波革命”的字样，立刻就能看到草寇们的鸦鸣雀噪：

“重判刘晓波是民主革命的反面动员令”

“和解破裂，革命将起——中共重判刘晓波博士将引发时局动荡”

“刘晓波和 08 宪章：幻想的破灭……这一次，《08 宪章》和刘晓波的最大意义，正在于宣告《08 宪章》和刘晓波余杰们那种鼓吹和解合作、反对革命的政策和路线的又一次大破灭。”

“‘11 年’，是《零八宪章》的悲哀，是刘晓波们的失败。刘晓波们应清醒了！”

看着这些意淫昏话，我不禁要觉得疑惑：刘晓波为这种愚民牺牲，是不是也太不值得了些？革命？革甚鸟命！时局动荡？动甚鸟荡！诸位的屁股还让海风吹着呢，哪来的金钱去造反？有谁会听你们的？如今大陆知识分子全是利欲熏心的奴才，人家忙着搂钱还来不及呢，顾得上管这些不相干的事？而没他们的组织领导，工农大众不过是一堆肉而已。

这就是第三个绝望之处：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之路更走不通。在旧中国，人民好歹还有当奴才或作响马两种选择，如今却只剩下了当奴才一种。而这必将使得我党更加有恃无恐，毫无顾忌，于是政权就只会一天天烂下去，一直烂到党内内讧大规模爆发，将中国再度投入血海而后快。

最后想说的是，胡紧套看来是铁了心了。从我党的私利来看，老邓的确没有选错人，积极分子历来比高干子弟更左更可怕。在他手上，我党绝不会放松控制，只会王小二过年，一年紧似一年，而这确实能保证政权稳定。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统治者是否具有足够的镇压意志，对政权是否垮台常常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 1991 年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发动者们有胡锦涛的镇压意志，叶利钦就只会乖乖授首，而苏东帝国也就不会土崩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运领袖有谁想把此事闹大，建议他们这就前往中国，陪刘晓波一道坐牢。据我模糊记忆，民运领袖中颇有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既然国内都有人去投案愿和刘晓波一道坐牢，那签过名的民运领袖们就更该如此了。若是只敢作隔岸煽火的“远距离革命家”，那最好从此把“道义”二字收起来。

呜呼！

2009年12月28日

韩峰日记与雷锋日记

最近国内网上又爆“日记门”，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同志的日记被人贴在网上，成了满城争说的蔡中郎。若以“香艳日记”输入谷歌，可得将近一千万条结果，当真是盛况空前。适才见《猫眼》有人以雷锋日记对比批判韩峰日记，殊不以为然，因作此文以辩。

要说的话，有许多网友都已经说过了，韩峰是个好同志，我党的好党员，党国的好干部：人家并不贪得无厌，小富即安，年薪20万即感满足；大概也就只收了5万元的贿（反正我见到的日记中只披露了此数）；本人情趣高雅，喜欢摄影，并不涉足花街柳巷，更不曾强迫修脚女提供特殊服务；对老父、妻儿都不乏亲情与关怀；情妇只有5、6人，就欢呼自己交了桃花运，而且只是送点手机，MP4等小玩意，并不是送房送车；去换手机（还是换什么来着，记不得了），还老老老实实地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而且敬业敬职，在日记中表露了对该年超额完成任务的由衷喜悦；还是个才子官员，报告什么的都是自己写，一早上便能写出五页来。我最佩服的是，他还颇懂电脑，软件什么的都是自己装，而自己摆弄了一晚上，便能掌握photoshop的操作，老芦可没这本事。这种官员，上哪儿找去？在大陆官场中可算白乌鸦了。

当然，韩峰同志毕竟纳了贿，也与5、6名女性有染，但那又怎么样？他收受的那点贿赂，和正常水平比起来，简直只能算困难补助。而那些婚外性关系似乎只能称为才子的风流韵事。有的网友说，韩峰射出的不是精子而是权力，我看不出这点来。虽然该干部“干”的是“部”下，但不能就此认定那些女人是冲他的权力去的，起码从日记中看不出权色交易来。韩同志虽然据说年过五旬，然而驻颜有术，颇有点眉清目秀的书生样，而且感情细腻，温柔体贴，床上功夫超强，竟能熬战通宵而不射，令芦某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种男人讨女人喜欢是必然的。如今大陆两性关系那么乱，韩局长日日与部下相处，日久情生几乎是必然的。为什么干了部下就一定是靠权势壮阳涅？

最难得的还是，韩同志并不在日记中装成另外一个人。而这就是韩峰日记与雷锋日记的本质区别。

雷锋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伪君子，不放过一切表演机会往上爬，连日记这种完全属于个人的隐私文件，都能拿来作登龙术。他不但在日记中捏造各种“好人好事”，而且大量抄袭他人的文字，用来为自己贴金。这伪君子被捧为新时代的圣人之后，极大地败坏了党风民风，哺育出了整整几代伪君子。就连老芦这种比较本真的同志，当年也曾写过这种日记，“忘记”在课桌上，迫不及待地等人翻阅。

最混帐的还是，雷锋日记中只卖弄他大公无私的思想觉悟，却从来不提他的本职工作，从来不提他学习业务的心得体会。身为战士，却不务正业，专门去火车站、火车上、工厂里“做好事”。这种战士要来有何用？他的本行到底是国防运输，还是冒充社会工作者？这邪风吹遍全国后，使得大众不务正业，纷纷去冒充教会慈善人员，使得“做好事”成了新式科举，造成了全社会敬业精神的彻底沦亡，致使当局不得不表彰那些尽了起码本分的营业员。若有哪位售货员例外地长的不是晚娘脸，那她就一定是“先进工作者”、“劳模”。端的是滑天下之大稽。环视全球，未见荒谬有甚于此者。

相比之下，韩峰同志毫不矫揉造作，至少在单独面对自己时是诚实的。他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而不是为发表用的，更不是为了欺骗党国，巧取名声，借此飞黄腾达。惟其如此，我们才能通过那要言不繁的记录，窥见一个真实的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看到雷锋那张浓妆艳抹到恶心地步的假面具。

有鉴于此，本人特向敬爱的党中央建议，请胡锦涛、温家宝和其他党国要员挥毫题词，大书“向韩峰同志学习”，将韩峰同志钦定为新时代的圣人，将《韩峰日记》印刷七千万册，每位党员人手一册，定为新时代的官箴，取代“八荣八耻”的假大空废话，作为“共产党员先进的性教育”的重点内容，定为公务员考试必考内容，努力在全国造出7千万个韩峰同志来，这才是改善党风吏治的现实可行的努力目标。我深信，韩峰同志将是我党树立起来的唯一真实可信的英雄模范人物，而做到这一点，乃是我党放下面具，开动机器的第一步。

2010 年 3 月 8 日

我看人民币升值

看了网友转来郎咸平郎小白的阴谋论，只觉得怒火腾腾：这位“经济学大腕”唱的不过是那个冒充经济学家的编程员宋鸿兵、国防部乔良少将等小白一直在唱的“天下围攻人民币”的仇外阴谋论滥调，无端装出一副受尽西方（特别是美国）迫害挤兑的楚楚可怜的无辜受害人的模样来，中共及其御用文人、武人为了欺骗国民，转移大众对内政的不满，连起码良心都不要了。

上次批驳郎小白那“芭比娃娃七大块（六大块？记不得了）”的绝对外行论调时，我就讲过了，没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迫害”和“挤兑”，就绝不会有中国的经济奇迹。如果老邓坚持走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让帝国主义长驱直入，发动“经济侵略”，中国怎么可能有举世无双的经济起飞？全靠老邓崇洋媚外作买办，靠“低人权优势”形成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经济黑洞，从西方吸来了靠咱们自己苦吃苦做绝对无法积累起来的原始资本与成套技术。这完全是“当现成爹”的“借腹怀胎”之计——未经片刻十月怀胎之苦，便生出了个金娃娃。中国以西方产业空洞化为代价，换来了自家经济起飞，就算不知道感恩，最起码也不能血口喷人，反咬那只喂养你的手吧？

而且，无论是郎小白，还是宋小白，都在西方呆过，并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国内愤青，都该知道西方国家并不是中国那种极权国家，政府根本不可能把资本家无组织无纪律的布朗运动式的趋利行为组织起来，并予以协调指挥，将它化为任意打人的大棒，发动一场预先作了周密部署的“货币战争”或“经济围剿”。别的不用说，眼下这谷歌的事就放在那儿，谷歌撤了，微软和雅虎仍然留在中国，既然美国政府是发动“货币战争”、“经济围剿”的总司令部，为何不对抗命的公司军法从事？起码要动用权力迫使他们采取点行动，策应谷歌发动的“攻势”吧？

所以，只有心理阴暗、猜疑成狂的土包子，才会以为美国政府也和中国政府一样，把所有的大企业和银行都攥在自家手里，可以把国民经济化为灭门凶

器，任意发动“经济战争”，迫使敌国屈服。这世上，只有中国、俄罗斯、欧佩克那些烂国家有此能力。这点最起码的人类常识，随便哪个在西方呆过的人都该知道。宋鸿兵和郎咸平明明知道这些，还要造谣惑众，当真是为了自家荣华富贵，什么脸皮都不要了。

最奇怪的是，据郎小白说，日本人就是这么栽在老美手下的，这真是“大路上说话，茅房里插嘴”，“买的也愿，卖的也愿，唯有挑扁担的脚夫愤愤不平”，苦主日本人没出声，反倒是八万竿子打不着的郎国师代人家打抱不平，不知道这是何高明道理？您是不是在梦幻里出现错觉，认为您当的不是中国的国师爷，而是日本的？

据日本人自己说，他们搞垮了自家经济，那原因和美国后来的次贷危机差不多，都是栽在房地产的大泡泡上。如果那是老美捣鬼，请问后来美国连累了全世界的次贷危机又是谁捣的鬼？是中国，是俄罗斯，还是中东恐怖分子？要么真如《了望》上的某个超级白痴说的那样，那是美国为了坑害中国而毅然决然引发的“金融自爆”？

美国压人民币升值不假，他们过去压日圆升值也不假，那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大阴谋，也不是见不得穷人吃顿饱饭的嫉妒心理，而是根据文明世界信奉的“机会均等、费厄泼赖（fair play）”的自由经济原则。中国既然加入了WTO，就有义务按照共同的规则玩游戏，不能靠自己的需要人为规定汇率，而应该像其他成员国一样让汇率随经济状况自由浮动。过去中国长期人为压低汇率，借此造成“低人权优势”，其实是向国际市场大量倾销（dumping）廉价劳力和资源。反倾销一向是国际标准实践，人家忍耐了这么久，已经是人间奇迹了。咱们的倾销使得美国人能长期维持廉价消费，助长了美国举国错觉，以致他们长期无视自家经济结构缺陷，终于堕入深渊，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只好求中国不要再拆这种烂污，这也是最起码的吧？谈得上无理迫害么？

其实人民币升值完全是合理的。中国政府长期隐瞒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借此造成劳动力廉价的国际竞争优势，虽然是咱们“吸星大法”邪派武功的发力点，也确实见了神效，把国际资本统统吸了过来，但这对中国百姓很不公平。靠牺牲百姓福祉去谋求国家经济增长，在过去缺乏原始资本时，这么做还说得过去，甚至可以说是应该的。但在国家极大富裕之后，还要这么干，就有对不起人民之嫌了。别的不说，人民币升值后，国人无论是买洋货，还是出国

旅游，都要比过去轻松得多吧？反过来，我等海外赤佬日后返乡，就再也没法靠人为制造的不公汇率充大款了。这等于缩小了国内外生活水平差距，降低了国外资本家对中国劳动人民的剥削，愤青们还有什么愤愤不平的？上次我在大峡谷遇到一位同胞，听他说只需两万人民币便能上那儿去旅游。人民币升值后，这价格必然跌落。愤青们有那功夫生蠢气，不如去抢购廉价机票，也好兴旺国家的民航业与旅游业：）

人民币升值，当然会打击中国的出口业，但正如钱文军先生指出的，它同样也给中国挺进海外投资市场带来了空前的机会，起码国内大款们可以倾巢出动到美国抄底，用坚挺的人民币大量收购廉价物业，乃至资金短缺濒于倒闭的其他企业。如果形势倒过来，是老美挟坚挺的美元到中国大量收购物业企业，那国人岂不是更要跳到天上去？一个心理变态的民族，无论旁人怎么做，自己都永远是吃亏受害者，唉！

这可不是我胡乱污蔑。前些天我在《猫眼》上看到某位居美爱国志士的文章，她给出了多种中国产品在美国超市的价格，说那些商品价格实在低得不合理，还附上了照片作为证明，为美国人对中国人惨无人道的剥削而愤愤不平。我当时就想：价格低，乃是因为人民币严重偏离了合理兑换率，这剥削是中国政府蓄意造成的，好像赖不到美国人头上去。如今美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减轻一点对中国人民的惨无人道的剥削，那不是替天行道、解民倒悬么？怎么却又成了“天下围攻人民币”的大阴谋了？

其实我看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打击可能会更严重。最起码的，他们再没法靠从中国潮水般涌来的廉价商品维持虚假的经济繁荣了。中产阶级以下必受沉重打击，起码无法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准。在经济普遍萧条的情况下物价再上涨，对普通家庭特别是失了业的人家来说，必然是雪上加霜。老美指望以此刺激被中国掏空的本国制造业复兴，我看也未必能行。自废武功容易，要恢复就难了，起码无法立竿见影，因此势必推迟复苏。如果美国人民也像国人那样，个个害了被迫害狂，只怕要怀疑奥巴马是被共产党收买了的卖国贼。

总而言之，在我这经济学的绝对外行看来（虽然我这绝对外行比郎咸平那小白似乎更内行些，这倒不是因为他缺乏专业知识，而是因为他缺乏别的东西，如果不是缺乏良知，便是缺乏常识和智能），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最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出口业。但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口业本来就处于萧条

之中了。这趋势已经基本饱和，不可能再大幅度降低了。而且，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怎么也不能把国外需求当成发展经济的主要推力。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不是用本国人民的血汗去为外国人民提供廉价优质消费品。中国政府应该把人民币升值化为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内需的契机，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取代“制造看上去风光的GDP”的战略目标。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的对口专业。至于煽动无知愚民仇外恐外，毫无必要地毒化对中国国家利益生死攸关的中外关系，那种小妇勾当，我看还是收起来比较光彩些。

2010 年 3 月 29 日

中国缺的正是“唱衰”

那天胡棋源网友转了孙立平先生论国内正在加速溃败文字来，因为那文字早被转贴到本区，网友业已讨论过，所以没人回帖。小胡不知就里，上贴问大家为何不发言，唐好色网友乃代表本区公民发言，说没人回帖是因为那是老掉牙的唱衰，两人于是争辩了一通。

对国人抨击国内生态灾难的文字，唐好色网友也不以为然，认为三峡大坝就是该建，而“权威政权还是有点优势的”（其实通用的是“威权政体”或“威权制度”），其论据便是“中国的能源政策相对合理，在建水电站和核电站，已经计划建100多座．于此相对，美国已经因为集体恐惧而几十年没建核电站了．全球暖化问题已经吵了10多年，美国现在才又开始考虑重新建．结果多年来，火电成了default．这实在糟糕．”他进而认为，王维洛反对三峡工程，也是类似的无理性的恐惧。至于人家列举出来的那些充分证据，唐先生照例是视而不见。而举世闻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是否与苏联人民没有“唱衰”权有关，当然也不会在他的视野中。

如果上述看法只限于唐网那类汉学家倒也没关系，但问题是唐网那种大无畏气魄在大陆知青中并不罕见，方舟子便是代表。据唐网说，方舟子有一种使命感，正是在这种使命感而不是利益的驱动下，方才不遗余力地在大陆叫卖转基因食物。唐网友不知道，若方舟子真是如某网人指控的那样，是在代表美国某家生物产品公司叫卖，那还不是那么可怕。若真是出于某种使命感，那可真是令人肝颤了，盖中国从来不缺乏各种各样祸国殃民的使命感，缺的就是“唱衰”。

当年我曾和唐网争论过中医是否有效，他彻底否定了中医，认为那是迷信，而这是我党搞迷信的结果。我当即告诉他，他完全弄错了。世上再没有哪个政党比我党更讲究“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了。无论是马克思，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无比坚定地认为他们代表了“历史潮流”与“客观规

律”，而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胜的基本原因。无论是方舟子还是唐网，都深得此中三味，至今仍在不屈不挠地发扬19世纪的科学教传统。

已经在旧作中反复解剖过了，马列主义乃是19世纪的科学教的结晶，最充分最彻底地反映了幼稚人类无知无畏的宏大气魄，其基本信条就是“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可以把握的，而掌握了客观世界后便能从必然走向自由，任意改造大自然，‘驯服山河建天堂’”。这其实不独马列主义为然，19世纪的欧洲知识份子或多或少都有这毛病，尤以德国人最甚，他们秉承了黑格尔的传统，最擅长的便是top down的“青城剑法”，动辄归纳出个囊括一切的“客观规律”来，而科学便是他们的新上帝。

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科学一直都是西方的新上帝，就连教会也同样崇拜科学家们揭示的“客观规律”，其与无神论者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把那看成是上帝的旨意。这种崇拜甚至荒唐到这地步：当年美国人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小岛上试验氢弹，不但大批参与其事的官兵暴露在射线之下与蘑菇云合照，引为平生至荣至幸，而且某奸商竟然将新推出的三点式游泳衣命名为“比基尼”，使得商品风靡全球，捞得个盘满钵满。

但此后人们便开始知道科学是把两面刃了，并开始认识到人类未必能及时发现那另一面刃的存在。首先是大批放射病患者的出现，包括那些与“比基尼蘑菇云”合照的原子勇士们，其次是大批公害病患者的出现，以日本的水俣病最为触目惊心。西方人从此开始意识到，大自然是非常复杂的，“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并不是如19世纪知识份子们的直线头壳想像的那么简单明快。因此，在一种新技术发明出来后，必须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从各方面审视观察它可能有的不良效应。若是像过去那样一头扎进去，等发生了预想不到的严重副反应时才知道后悔，那就太迟太迟了。

这就是为唐网抨击的“集体恐惧”的由来，是西方人热衷于“唱衰”的基本原因。它其实是最简单的人类常识，但同时也是大智慧，老话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亡羊补牢”就是这个意思。它当然与为唐网和我党官员乃至御用知青们激赏的“举国体制”的“高效率”相冲突，然而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为灾难。

这简单道理，只怕连小白都能明白吧？小胡已经在跟帖中举了澳大利亚的兔和猪作为雄辩的反例。澳大利亚土生动物里没有兔和猪，欧洲殖民者便把这

两种物种带去。因为缺乏天敌与拥有胜过中国人的繁殖能力，兔子在澳洲疯狂繁殖，从原来的5只繁殖到5亿，给农田带来了巨大损失。国民花费了巨量的人力物力去猎杀野兔，仍然收效甚微。最后是老天爷帮忙，让兔子害了某种传染病大量死亡，兔灾才得到控制。猪的情况也类此：家猪变为野猪，在缺乏天敌的情况下大量繁殖，而且变得相当凶狠，同样给庄稼造成极大损失，只是为害不如兔灾那样激烈罢了。

这些教训，使得人类开始有了“外来入侵物种”的概念。这就是吃了一“堑”长出来的“智”。如果不吃那堑，则谁也不知道引入某种新物种会引出这种完全意想不到的灾难。美洲过去没有马，是西班牙殖民者引入的，那也是外来入侵物种，但它也不曾造成什么灾难性后果不是？所以，若是唐网生于当年，假定有人反对在澳洲引入兔子，他肯定要认为那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唱衰”，是“集体恐惧”，用我党的话来说便是“封建迷信”，还一定会引用在美洲引入马并无灾难性后果来反驳。

科学教徒们不知道：客观世界实在太复杂，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的预见能力也非常有限，一种新技术会具有什么副反应，并不总能在事前通过学术论证发现，无论那分析是如何周密都如此，许多事要到发生后才知道。

这方面的最近例子，是科学家们一度非常热衷的“基因疗法”。人类基因组现已基本测定，每个基因是什么功能都查得清清楚楚。于是科学家们便设想可以用基因手术治疗遗传病（例如在血友病患者的胎儿中引入所缺的编码血凝因子的健康基因），甚至可以设计出既聪明又健壮又漂亮的“完美”胎儿来。这从理论上来说完全是可能的，根本没有什么“唱衰”的余地。然而科学家们在把某些基因引入动物后，却发现新物种出现了与该基因无关的性状，而这用现有的分子生物学理论根本就无法解释，说明人类对基因的互动作用的认识还非常肤浅。任何小白都该想得过来，在弄清所有的潜在恶果前便大规模采用“基因手术”，将会给人类造成何等可怕的灾难。

又如为唐网友讴歌的三峡大坝吧。只有隧道眼才会看到它的发电功能而忽略它必然给生态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尽管国际上早对此问题有了定论，先进国家早就停止此类大工程了。但这问题之复杂，还远不是科学家们已经全部认识了的。

例如我早在70年代便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科学家们对大坝引发地震等副反应的介绍（记得我党曾将埃及阿斯旺大坝引发地震作为反修宣传材料，盖那工程是苏联援建的），对大坝的副作用早就耳熟能详。然而我还是没想到，长江水变清后会冲蚀河床，致使下游水位降低，导致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缺水；也没想到无比狭长的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其实并非常数，而是个随流量而增加的变量（这个事实乃是长江各水文站的实测数据揭示的，WM曾在本区转贴过有关数据）。因此，若在汛期蓄洪，水力坡度就会增加。于是为了防止重庆被淹，这烂污水库便只能搞“排洪蓄枯”的“反调节”，在汛期放水，在枯水期蓄水，成了不折不扣的“水害工程”。饶是如此，去年重庆朝天门码头仍然被淹了，可见连反调节都不足以解决汛期水力坡度陡增、威胁上游城市的难题。不考虑这些严重问题便贸然动工，完全是以国事为儿戏，以万民为刍狗。

因此，对某种新技术、某个大工程的必须持明智的谨慎态度，起码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否则万一出现了某种无法预见、或延时发作的副反应时就悔之晚矣。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种补偏救弊的制衡机制，持反对态度的“唱衰”者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只有方舟子那种一知半解的民科，才敢不但不遗余力地叫卖转基因食物，而且把所有的反对者都打成必须动用政府暴力镇压的阶级敌人，其气吞万里如虎的霸王气度恰与其惊人的肤浅相辉映，充分印证了“唯无知者始能无畏”的格言。如果他稍微懂点科学就该看到，从理论上来说，转基因食物确实不该影响人类健康，但这只是从现有的知识水平来讲，何况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打破既有生态平衡而引出大灾难，乃是谁也不知道的事。因此对这种潜在后果严重的事，必须采用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在中国那种动不动全国一哄而上的幼稚国家就更该如此。

这不是说“唱衰”都一定合理，但作为一种制衡措施，它必不可少。例如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是在生物学中作出的，从DNA双螺旋模型的建立到遗传密码的破译，直到人类基因组的测定，都是无与伦比的伟大突破。而作出这些伟大发现使用的基本技术便是基因工程。然而在此新技术大规模投入使用前，科学界内外曾有过大量的“唱衰”者。他们生怕制造出一种携带着各种抗药基因的“超级细菌”，不受人类已有的一切抗菌素的制约，因而为人类的健康带来巨大的灾难。事实证明这是过虑了，然而人们却决不能说它是无必要的。相

反，正因为有着庞大的“唱衰”大军，科学家们才慎之又慎，设计出了理想的安全的“细菌工具”，避免了轻率行事可能引出的灾难。

不幸的是，为我党及其御用文人大赞大颂、为某些海外华人羡慕不已的“举国体制”却容不得“唱衰”，只许舆论一律，于是中国便永远只能是灾难接着灾难。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豪情满怀地对梁漱溟说：再过几年，从城楼上望出去，目之所及都是一片烟囱。在内部讲话中，他更是发扬“厚今薄古”的革命精神，得意洋洋地说，当初要拆北京城墙，有的人如丧考妣，现在拆了他们也没能怎么样，仿佛那是淮海战役一类伟大胜利。

就是在这种“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向大自然宣战”的豪情胜概的鼓舞下，咱们举国一致“大战钢铁”，砍光了前人栽下的树林；举国一致“以粮为纲”，毁掉果林、填了鱼塘去种稻麦；举国一致“征服大自然”围湖造田直到完美实现了梁任公的英明预言，把中国变成了沙漠。90年代我从欧洲回国，在飞机上所见实在是伤心惨目——凡是下面是一片绿色，那就还在欧洲，什么时候下面变成了茫茫黄土或白沙，那就是到家了。飞机飞上个把小时都看不见星点绿色，连条河流都没有，唯一能打破那黄白之物的便是黑色的云影。所有这些蠢事烂事，都是以“科学”的名义干出来的。此所以我一听到“科学执政”的豪言壮语便两股战战。

最近西南大旱，我虽然亟感痛心，却并不意外。70年代后期，国家大报上登出了《“围湖造田”始末记》（似乎是徐迟写的，但不敢肯定）。那上面说，云南与其他高原不同，有许多天然的高原湖泊，被人称为“高原上的明珠”。但在60年代末期，云南省革委（据说是某个类似江西程世清的丘八干的烂事）发起“围湖造田”的人民战争，“向滇池要粮”，把滇池填了一半。此风流毒全省，致使云南原有的二十多个高原湖泊不是被填就是淤塞干涸了，于今只剩下五六个，云云。

此前我曾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艾尔索普的文章。此公在抗战期间到过云南，说什么“云南的县城如梦一般的美”，其重点歌颂对象便是云南的高原湖泊。可惜他不知道，他梦中的仙境在我党领导下成了历史，而这“改天换地”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还在继续。楼下小胡网友转贴的时寒冰先生的调查报告便指出，云南至今还在干 “围湖造田”的烂事。最丧天

良的还是，地方政府为了迫使人民买水，竟然把石林县的龙潭用水泥、玻璃渣与棉絮堵死了！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还是时寒冰先生披露的云南省领导说的什么“先污染，后治理”。如果这是我党的既定国策，那完全是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祸延子孙的丧尽天良的滔天大罪。咱们别的也不用说，这就请那位省领导去恢复云南消失了的20多个湖泊，恢复被砍光的一山山森林。比起中国来，东德的环境保护可算天堂了。然而东西德合并后，西德把东德的工厂全部关了，斥重金恢复生态环境，其财政负担几乎压断了联邦政府的脊梁。饶是如此，专家们还估计要完全恢复原状，大概得需要起码半个世纪的时间。

伟大领袖当然是无知痞子，失学老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宏伟气魄反映了许多中国人的愚昧、虚骄、自卑、奴性与急功近利，而这似乎就是从未蒙受过我党教诲的唐网友竟然与我党颇有默契之处的原因。他们的基本想法便是“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因此，西方资产阶级有大坝，咱们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这就是唐网论证大坝的“科学性”的证据）。西方有高楼大厦，则咱们也决不能住低楼；西方吃过的“堑”咱们要加倍地吃；西方走过的弯路咱们要导波（double）or 吹破（triple）地走。谁要是敢持异议，就是“唱衰”的阶级敌人。

这结果，便是把中国完全彻底地改造成了美国的文化殖民地（准确来说是曼哈顿的文化殖民地，因为美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完美保留了令人心醉神迷的自然风光）。每个城市都是曼哈顿的翻版，充塞了恶俗不堪的摩天大厦，毫无起码的中国特色，沦为西方落魄建筑家的乐园——越是因破坏市容和谐而找不到买主的光怪陆离的设计（如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便越是能在中国变成雅典神庙。

令我震惊的是，2000年我回国，乡亲们非但对那令人窒息的高楼污染毫无反感，反倒还非常得意，认为故乡总算有点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了。就连若干海外华人似乎也这么看。前些天我在《猫眼看人》上看见一位加拿大移民的文章。她到加拿大也大概十多年了吧，按理说应该有了点鬼子的审美观。不料她却说，她初到加拿大时非常失望，该当地没有什么现代化气息，房屋都很低矮，云云。到最后她似乎还是那个印象。

不仅如此，根据龙应台女士的文字，似乎这种断子绝孙的烂事还颇为台湾人羡慕，似乎他们巴不得台北也变成北京那种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水泥森林，也栽上一个奇丑无比的大裤衩！21世纪的中国人，为何还不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传教士爱护中国？请去看看传教士盖的北京协和医院吧（如果它还没被拆迁的话），那就是鬼子的中国心。人家可没把曼哈顿的高楼大厦搬到中国的古都去，彻底破坏它的和谐。

因此，中国的生态自杀人民战争，和其他中国灾难一样，也是全民愚蠢使然。在毛时代是纯洁的不掺杂的愚蠢，而如今更多了熏心的利欲，完全符合国人愚蠢而贪婪的特点。举国昏昏，哪怕清醒者再起劲地“唱衰”，中国也绝无“衰亡”之虞，唐网友之类的科学卫士们其实可以高枕无忧。

2010年4月12日

“洋共”与开明专制

我在《中国缺的正是“唱衰”》中驳斥了唐好色网友的主张，他不以为然，那意思似乎是，我说的那些断子绝孙的烂事都是无知的土共干的，如今当国的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洋共，搞的是开明专制，不但再不会干出过去那种蠢事来，而且只会为国民福祉操心，乃是贤明的统治者，比愚民尤其是唱衰者们更加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因此只该拥护，不该“唱衰”。

在我看来，这些话强烈提示唐网还有待加深对我党的认识和了解。诚然，毛泽东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治国白痴，然而并不是他的一切大错都是无知的结果。举全民炼钢为例，连白痴都知道把成品砸了拿去回炉是蠢事，何以毛泽东竟然不知？难道他的智力真的低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地步？然而他确实干过这种事。据国内辛子陵先生的毛传，因为1958年的钢产量无法达到他规定的1070万吨，他便下令将某段未在营运的铁路的钢轨拆了，拿去当炼钢原料。这涉及的当然不是智力问题而是面子问题——我党不是由“天命论”提供统治合法性的旧式君主，因此万万不能在民众面前丢脸。忽略这些影响大独裁者作出悖谬决策的因素，将毛共的倒行逆施全部归结于缺乏教育，因而看不到这些因素至今仍然在影响当代“洋共”，驱使他们干出“以一百个错误掩盖第一个错误”的烂事来，我认为是隧道眼思维方式。

当然，不能说唐网的主张一点道理都没有。我反复说过，为“民主斗士”们深恶痛绝的“开明专制”并不是一句骂人话。相反，从历史上来看，它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似乎高于不成熟的民主政体，对比英法两国的发展史便不难得出这结论。在人民智力低于统治者时，实行开明专制似乎强过勉强实行民主制度。

这教训早为晚清的“保路运动”深刻揭示，我已经在《愚民的舆论不讲理》一文中说过了。我认为，从晚清到民国，都是统治者的智力高于人民智力，可惜统治者没有我党的足够权威，无法压下人民的昏庸反抗，于是不是被愚民推翻，便是为愚民绑架，以致一错再错，以蒋介石屈从昏聩的民意与日本

开战为高峰，最终导致中共上台，酿成了无可挽救的千古大错。若是从清廷到老袁直到老蒋都能如我党那样如意操控舆论，则这些大错也未必会发生。

但在那篇文章里我也指出，今非昔比，今日中国的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力，根本不存在被迫向愚民屈服或是被愚民绑架的可能，相反，现今中国缺乏的恰是制衡“举国体制”的力量，以致政府一旦决策错误，便一定会造出难以弥补的结果。因此，今日中国必须开放舆论，这是一个13亿人民的大国最低限度的安全阀。更何况今日民智也比过去成熟多了，网上多元舆论（包括唱衰与唱旺）的出现便是其指征，那就更没有理由管制舆论了。

因此，唐网的主张其实也不算错，只是不幸晚提了60-110年。若在中共当政前这么提，我绝对只会拥护。这道理恐怕连小白都想得过来：旧式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与现代极权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不可比，两者犯错的概率和规模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因此缺乏舆论监督的恶果也就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如所周知，无论是大清、是老袁还是老蒋，统治的都是私有制社会，垄断的只是政治权力，其权力基础还非常薄弱，根本也就控制不了国民经济，遑论实行计划管理。即使他们想发动大跃进（无论是洋还是土），也绝对没那本事。而我党则垄断了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资源，成了中国从未有过的一身数任的统治者：既是政治上的君主，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公司”的CEO。前段咱们早就讨论过了，系统大到一定程度，便不可能实行计划管理，只能将系统化整为零，拆到manageable的水平，否则必然是灾难。这就是私有制相对于公有制的固有优势，早为苏联的“理性社会主义”的背时实践证明过了。论“洋”的程度，无论是统治者个人智力水平，是教育程度，是廉洁奉公，前苏联统治者都要远远超过为唐网无限激赏的中国“洋共”，其结果又怎么样了涅？在毫无政治势力与司法机构制衡的情况下还要去除舆论制约，欲求不犯错，其可得乎？

具体来说，老唐的高论似乎是这么几条：

第一，现代中共魁首受过良好教育，实行的是“科学执政”与开明专制。

第二，因此，中共是绝不会犯错的，不需要批评乃至提醒。凡是批评和提醒都是反科学。

第三，开明专制与“唱衰”不相容，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互斥关系。

第四，因此，必须反对“唱衰”，以免唱得开明专制真的衰亡了。

如此一拆开，便是小白也能轻易看出老唐每条都错了。他甚至连什么是“开明专制”都不曾拎清。所谓开明专制我已经在旧作介绍过了，最主要的特点就是：1）实行法治，以法律而不是以君主的个人意愿作为治国的指针；2）实行言论自由；3）由君王出面大力提倡、奖掖、扶持科学、文艺与教育的发展。请问现今的共党统治占了哪一条啊？

关于第二条，似乎不必说了吧？这好像是隔壁党朋的绝活啊？就连我党自己，如今恐怕也不敢这么说了吧？唐网何以比我党还更有信心？

唐网其实在此作了以下假定：

1）我党无比廉洁奉公，绝不会明知某国策只会祸国殃民，但因能获得巨额私利而照干不误。2）我党领导人都是如方舟子一般万能的大科学家，不需要专家如黄万里等人的提醒劝诫，便能在事前及时洞察一切流弊，避开一切陷阱，在一切领域里都能做出完美决策。3）我党具有上帝的全知全能，因而可以对幅员广达900万方公里、人口多达13亿、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实行 “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就是所谓“举国体制”的意思）而绝不会引出灾难来。

这三点是所谓“逻辑和”关系，亦即必须全都满足，我党才可能不犯错误，不需要局外人去唱衰。请唐网自己说说，我党能否达标吧。

第三条直接是对开明专制的否定。不许唱衰，还有什么开明可言？

第四条则是我党的病态恐惧，为老唐真诚地分担，只是我早反复告诉我党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屁话。国民党是被我党的武力打垮的，不是被民盟那干烂人“唱衰”的。拜托我党长点智力，走出毛泽东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噩梦。那是被迫害妄想的病态胡话，并非大智慧。如果老袁和老蒋对人民乃至部下有我党那样的控制力，则即使不控制舆论也不会被推翻或打败。老蒋之所以为民意劫持而放弃了“安内攘外”的英明国策，主要原因还是他控制不了窥伺在侧的军阀野心家们。

其实我历来认为，现阶段中国并不适宜实行民主，否则只会引出大祸。最适合的政体，还是类似前英国殖民者在香港实行的开明专制。但要实现这个社会转型，首先必须允许各种人唱衰的最起码的言论自由，其次是实行私有化，

逐步拆散高效致祸的“举国体制”，使得国家回落到manageable的管理水平。中共把持政治权力不妨，但必须从政治以外的一切领域包括司法、警特情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等中逐步退出。做不到这些而奢谈“开明专制”，无异于缘木求鱼。

至于唐网的其他谬论诸如“穷国必须以牺牲生态环境脱贫”则不想说了，留给有兴趣的网友去批吧，尤其是居留于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日本的网友们可以介绍一下，人家是否也在各地大盖豪华衙门，以此“解决人民住房问题”。

2010年4月22日

中央必须对学阀们实行问责制

如所周知，毛时代实行“外行领导内行”的大老粗治国，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热衷于“大干快上”，对重大工程丝毫不作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不作统筹规划，便匆忙上马，最后弄出无穷后患来，给国计民生造成巨大损失。此时当局便美其名曰“交学费”，似乎那是合理支出。只有在我党领导下，“用缎子学裁剪”才不但不再是一种蠢事，反而成了一种英雄壮举。这也是只有痞子治国才能造出来的空前奇迹，“大跃进”就是纪念这种史无前例的大老粗治国的不朽丰碑。

改革开放后，我党从各方面都开始呈现从痞子党向传统士绅党的回归，大老粗治国开始转变为学者治国。这进步应予充分肯定。然而随着“受控暴民统治”让位于官僚统治，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权力与知识相结合后造出了一批学阀。

芦某无知，不知道“学阀”这个词汇是哪儿来的，只知道“军阀”一词似乎是日本人发明的。中国人最先使用此语，似乎是国民党的报纸攻击鲁迅是“学阀”。文革期间这词汇又大规模复活，当时敬爱的江青同志指使戚本禹等同志写文章，指许多老一辈无耻阶级革命家为“大党阀、大军阀、大学阀”。如同毛共整人的罪名一般，这些词汇从未得到过界定。

我这儿用的“学阀”，定义是：“出于一己私欲，利用自己把持的政治权力，剥夺反对者的平等发言地位与同等发言机会，靠压制不同意见来解决学术争论，使自己的主张得以通过的占据领导地位的学者和专家们。”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虽然挂着“科学家”的招牌，却构成了我党现下提倡的所谓“科学执政”的最大障碍。所谓“科学执政”，那意思是按科学的原理去统治国家。这话表面上看来一点都不错，但问题是：什么是科学的原理？从同一门科学出发，会不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来？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到底是该听谁的？谁才代表了科学？

任何一个有点起码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要解决这问题，唯一的手段是让持有不同主张的各方具有同等的发言权，各自将自己认定的“科学的原理”讲出来，批驳对方的“科学的原理”，指出对方的方案中忽略的因素与隐患，经过充分辩论后达到去伪存真。这就是科学决策的机制。在这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政治权力的介入。若不能彻底排除政治权力的干扰，辩论各方不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则也就没有了自由辩论，而离开自由辩论谈“科学决策”，就一定只能制造出灾难。三峡工程就是学阀们制造出来的大灾难。

三峡工程上马时，国内的政治空气已经松动了许多，毛时代的恐怖局面已基本结束，因此与政治无关的纯粹的学术上的反对意见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已有可能听到，在海外尤其如此。据我这个外行漫不经心的阅读，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似乎主要是这些：

1）三峡工程是静态设计，设计者们把水库当成了斜率（亦即“专家”们所谓“水力坡度”）为零的“高峡平湖”。实际上，水库湖面并不是波平如镜，从库尾到坝址的水面有个水位落差。因此，在汛期达到最高水位时，上游的重庆市就会被淹没。即使这情况不发生，根据静态设计推算出来的移民线也太低，将来必然要后移。

2）三峡水库没有防洪功能。泥沙沉降会导致有效库容减少，进一步降低滞洪功能。

3）三峡水库没有经济价值，其发电能力完全可以用修若干小型发电站来代替。

4）工程会造成严重的移民问题，水库的静态设计有可能导致移民线后移，加重这社会问题。

5）工程必将引起生态灾难：引起气候反常；阻断鱼类洄游，导致长江中的淡水豚扬子豚与其他珍稀鱼类绝种；毁掉古巴国文化遗址，淹没无数珍贵文物，使得那些地下国宝再无出头之日；湖里淤积的腐败动植物会造成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是，它还可能引发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这些反驳非常有力，连我这个完全彻底的门外汉都能理解。例如那“静态估算”的指控吧。只要不是白吃都能理解：三峡水库虽然像湖，但它并不真是一个湖，仍然是一条河道，其与一般河道的区别，只在于横截面大得多而已，所谓“一条大河波浪宽”。而只要不是白吃就该知道，河道上的水面绝对不会

是水平的，必然要有水位落差。若假定库尾与大坝的水位等高，则水库里的水也就不会流动了。

然而如此简单的科学常识，学阀们就是要坚决拒绝。据赵世龙说：

“关于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目前有五种说法：(1)水力坡度为零（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2)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3)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六到万分之零点七（长江水利委员会汪总工）(4)水力坡度为千分之一点九到千分之三点（长江水利委员会高级工程师寥志丹）。(5)三峡论证泥沙组负责人林炳南在‘工程泥沙’篇中详细论述了三峡建库前后的坡度问题。‘川江是山区河流，坡陡流急，平均坡降约为万分之二，是下游平原河道上荆江坡降的 3 倍。’”

您说，这些专家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凭什么坐在三峡工程论证组中？居然连水力坡度为零的胡话都能说出来！承认水力坡度确实存在的专家给出来的数字又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会相差几达二十倍？三峡水库的特点，是它非常狭长，长度竟达 662.9 千米。若坡度为千分之一，则水位落差就是 662.9 米，那还得了？这意味着大坝在达到新华社宣布的正常蓄水位 175 米时，库尾的水位将达到 837.9 米！若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则水位落差就是 46.4，那也够吓人的。

在数据出入如此之大，而最高估算值又如此恐怖的情况下，还要贸然开工，这到底是什么蠢人才会干出来的事？

不仅如此，这水力坡度还不是个常量而是变量，随着流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汛期的水位落差就要高于枯水季节的落差。而上引专家们的估算似乎都是静态估算，似乎未将流量参数考虑在内，这又是怎么回事？修建那么大的一个水库，却不考虑洪水问题，那么如果遇上大洪水，库尾的水位急剧升高，威胁重庆时又该怎么办？若重庆被淹没，造成的经济损失，只怕是水库发电十年取得的利润也无法弥补。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系列昭如日月的严重问题，负责拍板的领导同志也就居然视若无睹，悍然挥巨手，指航向，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害”之误？）工程上马了。而面对学者们冷静的质疑，学阀们做的，不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仔细审核自己的计算，却是苦心孤诣地文过饰非。他们趁去年枯水季节水力坡度最小时（11 月 5 日），极度缓慢小心地将水库蓄

水位增加到 172.4 米。尽管这个数据还没达到新华社宣布的正常蓄水位 175 米，他们却有那本事将 175 米改为“最高蓄水位”，用库尾水位只上升了约两米的事实，极其“雄辩地证明”王维洛等人是“骗子”，其“静态估算”的指控不能成立，三峡水库就是个“平湖”而不是“斜湖”！

然而事实如何呢？

据官方网站《长江水文网》报道，2009 年 8 月 6 日，长江三峡大坝坝址的三斗坪水位才达 147.90 米，重庆市区寸滩站的洪峰水位就已高达 182.49 米，其水位落差为 34.59 米。

另据《重庆晚报》报道，本轮降雨形成的最大一次洪峰经过主城时，长江水位将达到 183.11 米，直逼 183.50 米的保证水位。所谓“保证水位”，是指最高防洪水位或危害水位，也是指堤防设计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水位。一旦最高水位超过保证水位，就有可能出现决堤危险。8 月 5 日晨，重庆朝天门码头供游客停车的平台全部淹入水底。朝天门广场平台全部台阶被淹没。中午 12 时，江水已到达朝天门广场门洞，原有的码头消失。

请注意，根据新华社在水库修成前的预告，大坝的正常蓄水位是 175 米。水库修成后，学阀们发现修出来的果然是斜湖而非平湖，为怕王维洛博士不幸而言中，水库达到正常蓄水位时引出大灾难来，便不惜欺骗公众，把原定的正常蓄水位改为“最高蓄水位”，以降低有效库容来弥补设计失误，避免重大灾难发生。但即使如此，如今只不过天降暴雨，大坝水位才到了 148 米左右，重庆朝天门广场便已成了泽国。而按学阀们的“计算”，只有遇上千年一遇的大洪灾，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问下一步学阀们该怎么文过饰非，巧言脱罪？说重庆这次遇上了千年一遇的大水灾？

还不止此，学者们当初的警告已经开始兑现：水库引发了地震、天然气井喷、气候反常，等等[1]。迹象在在表明，三峡水库如同大跃进期间上马的许多重大工程一般，乃是权力压倒科学、以长官意志代替科学论证的又一大规模蠢动。它耗费了无量民脂民膏，却只能给国计民生造成巨大损失。

我想知道的是，中共中央准备怎么处理这人造的巨大经济与生态灾难？现在的问题还不光是善后问题，更是如何吸取教训、杜绝类似悲剧在未来再度发生的问题。

---

[1] 请参考赵世龙先生的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24c5601000am8.html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学阀们花费了纳税人无量金钱，制造出巨大的人为灾难，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无从计算的巨大损失。似这种祸国殃民的罪人，不惩罚何以肃纲纪，正党风？难道中央就这么算了不成？不像严惩贪污犯一般严惩这些玩忽职守、以万民为刍狗的渎职犯罪分子们，如何对得起受灾的黎民百姓？如何对得起亿万胼手胝足流血流汗的纳税人？又如何儆戒效尤，防患于未然，避免未来再度发生此类灾难？

有鉴于此，我向党中央建议，立法明确规定重大工程的决策程序，首先是必须进行严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然后再进行流弊预估，最后再进行预算估算。在论证过程中，必须严格杜绝政治权力干扰，严禁领导干部使用权力垄断话语霸权，压制不同意见，以制度确保各方畅所欲言的同等权利，使得各方得以进行充分的自由辩论。类似三峡工程这种关系重大、后果深远的全国性工程，必须允许各方在国内大报刊上自由辩论。在这个过程结束前，领导无权过问。只有当辩论结束，一切潜在重大流弊都已经充分阐明或予以排除之后，领导才能根据辩论结果作出否决或批准的决定。与此同时，还应实行问责制，在重大工程出了问题、发生重大流弊、引起民间普遍非议、或遇到严重质疑时，都必须成立调查组，首先追究主事者是否严格执行了上述决策程序。凡有动用权力压制不同意见者，一律按渎职罪绳之以法。

在我看来，这是所谓“科学执政”的最起码要求。如果我党连这最起码的改革措施都不愿或不敢采取，则我看还是趁早把那“科学”二字收起来为好。

2009 年 8 月 7 日

方舟子打假与王维洛打假

方舟子乃是有名的“学术打假斗士”，而王维洛却从来无人认为他与“打假”有何相干。实际上，方舟子打假不假（成了拗口令了），但不幸多与“学术”没什么相干，主要还是“人事打假”。

举最近轰动海内外的唐骏假博士案为例，这事是方舟子揭发出来的，但丝毫不需要任何智力投入，只需查看一下唐骏的CV，再查一下“西太平洋大学”是什么学校就足矣。这种事，任何一个毫无科学文化知识、遑论专业知识的人事干部都能干，与学术实无相干，只能称为“人事打假”。方以一个保鲜博士后去干这种体力活，还为此暴得大名，只能证明刻下的中国完全是欺诈公行，而人事官员和雇主们又是何等尸位素餐，形同虚设，以致需要一个远居海外的化石博士后来替他们尽职。

当然，除了充当义勇人事干部外，方舟子也曾偶涉学术领域，在其中打过假，其最为人知者，就是对鲁迅那不学无术（这儿的“学”，指的是科学）之徒的“所谓中医，大抵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作“学术证明”。可惜起到的作用与那老匹夫一般，只证明了自己的不学无术（这儿的“学”，指的是医学）。

正因为他对医学一窍不通，才会说出“废医验药”的昏话来，完全不知道中医用药是所谓“辨证论治”，而所谓“辨证论治”确有道理，乃是把病人的一系列症状，归结为所谓“证”的症候群，再用“活人蹚地雷”的原始人试错法，摸索出一堆汤头来。如所周知，中药多是植物，即使是单一药物，也很难分离提纯，查出其有效成分，遑论查明各组分彼此之间有无协同作用、拮抗作用或是叠加作用，等等。若是再考虑整个汤头那更复杂的混合物，这“验药”就更是昏话一句了。尤可笑者，他在其论坛中危言耸听地列举了一大堆中成药的毒性，却连“半数致死量”的起码药理学概念都不懂，连一切药物都是潜在的毒药、关键在于剂量的常识都没得。大概他活了几十年，到现在没听说过“水中毒”，更不知道若将钾盐静脉推注入人体，则受者心搏立停。那是不是钾这种人体必需电解质也成了必须禁用的剧毒药物？更何况中医中药的主要潜

在危险，不是药物可能具有的毒性，而是因辨证错误而用错了药。因为辨证完全靠大夫主观感觉，没有客观诊察手段，所以出错的可能性颇大，即使是多年名医也难免。若辨证错误，把虚证弄成了实证，寒证弄成了热证，or vice versa，则本来没有毒性的药物也能毒杀病人。所以，即使“验药”可行，验出来的“安全中药”也未必安全，遑论有效。

我这不是鼓吹“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其思路可以引入西医，引起后者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我对中医的态度早就说得明明白白了：作为一种调理医学，它确有疗效，能覆盖为西医目前忽略的某些领域，应该作为一种替代疗法存在下去。但它因为不使用逻辑思维与实证手段，基本概念无法落实，其理论也无法整理，因此毫无发展余地，是一种注定要萎谢的低阶技术，或曰“夕阳技术”。方舟子全面否定中医，与某些无知之徒出来乱吹中医、打西医的“假”，外表相反，实质同一，都是外行鼓倒内行。这若能称为“学术打假”，那“打假”者本人的“学术”大概只能算成是招摇撞骗、大言欺世的国术。

当然，方舟子的“学术打假”也不完全是这种货色，我记得还有揭穿什么核酸食品的骗局。那倒确实是根据粗浅的科学知识（中学生理卫生水平）的打假，并非人事打假。勿过，一个标本博士后去干那种粗活，似乎也只证明了中国那种欺诈社会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而且，方氏轰动媒体的，似乎还是人事打假与“中医打假”这两大类。而本坛网友唐好色先生出来讴歌方舟子神圣的“使命感”，似乎也就是基于这些理由。这种现象似乎反映了许多蠢人对什么是“学术”，大数学家included，连基本概念都没有。

或许就是因为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学术打假”，大概更因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优良民族传统，国人（以及劣质汉学家）见到小偷被逮，便欢呼雀跃，而见到敢去揭穿大盗的学术欺诈如王维洛者，便要因为这些人动摇了愚民对专制制度的优越性的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热爱，违反了一言堂的科学精神，要大义凛然挺身出来斥之为“唱衰”，诬之为“集体无根据恐惧”，目的是破坏中国的水电事业，使中国沦入美国那种default的惨境，必须使用“人事批判”的利器将其批倒批臭，证明他是文科出身，而对手是院士专家，而且，他的声音在国内根本就听不见，因此必然是外行鼓倒内行。至于人

家外行在何处，论点论据有何软硬伤，则对不起，那不在数学家兼劣质汉学家的学术范围内。

不幸的是，我昨天转来的文章[1]，证明了王维洛那民科兼学科兼傻逼的学术打假确有道理，而那些负责设计大坝的院士专家们要么是白痴，要么是骗子，两者必居其一。

在那篇文章中，为唐好色先生无限景仰的洋共当局明确承认：“**过去三峡工程调度规程为反季节调节，汛期泄水，枯水期蓄水。**”具体来说，就是在汛期把大坝水位降到145米的所谓“汛限水位”，而在枯水期将大坝水位提升到175米的“正常水位”。这就是水库管理人员两年来一直在奋斗不息的伟大目标。它之所以伟大，倒不能说那是专家们故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坑害下游，而是因为它能“安全挣钱”——汛期泄水就避免了上游洪灾的风险，而枯水期蓄水，则能达到大坝的“正常水位”，实现水库发电与航运的经济指标，悠悠万事，唯钱为大。

可怜的是，两年的奋斗，证明了就连这伟大的挣钱目标也未必是安全的。那文章已经说了，在2008年与2009年两年的枯水期，管理人员都试图将大坝水位升高到175的“正常水位”，但两次都因同一原因不得不半道停了下来：上游出现地质灾情险情，下游出现水荒，因此两次都只能把水位升到171-172米，就再也不敢往上涨，实现发电挣钱的战略目标了。经过这猿猴试错法，英明的洋共院士专家们发现此路不通，于是决定大胆“利用洪水资源”，在9月份开始蓄水，截“洪水尾巴”，然而这“大胆决策”是否可行，尚在未定之天。

这就是唐好色先生歌颂的大坝的伟大的蓄洪功能——连“截洪水尾巴”都成了一种感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我到这会儿还禁不住纳闷，那么多院士专家，为何竟然连反调节必然在汛期加重下游洪灾、在旱季加重下游旱灾的常识都不知道，还要“先筑坝，后测量”，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你要知道大粪的滋味，就得去变革大粪，亲口吃一吃”，效越王勾践去亲口尝过，才知道那并非大快朵颐的美味？

据洋共官方媒体报导，2008年1月8日，长江水利网汉口水文站监测，当日该站水位为13.98米，是有水文记录142年以来，长江出现的罕见低水位，沿岸城市出现饮水困难，“黄金水道”告急，据长江航道局统计，去年10月以来，

---

[1] 请访问：http://big5.cctv.com/gate/big5/hb.cctv.com/20091111/102602.shtml

长江主干线已经发生40余起船舶搁浅事故，航道拥挤阻塞，使长江航运企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仅枯水期增加运力所增加的油耗便达2000万元；洞庭湖、鄱阳湖面积剧减；各种珍稀水生动物死亡的消息频现，鱼类的采食场遭到破坏，鱼类产量锐减；旱灾还可能引发大规模鼠患。综合经济损失与生态环境破坏，根本就是难以估量的，纵是开明的洋共，也从来不兴公布此类损失数字（唐先生要说了，“阴谋论是无法反驳的！”未必吧？亮出损失数字来，不就能粉碎这阴谋论了么？唐先生不知道，所谓“阴谋论”的指控，只适用于透明施政的国家，而不透明乃是为他激赏的威权政体的优越性。这就请这位不相信阴谋论的老T，前去跪求英明的洋共中央变得透明一些，公布大饥荒的死亡数字与六四死亡数字〔掌声雷动ing〕）。



出了这种烂事，烂仔们还有本事抵赖，“长江水利委员会表示，长江水情历来与降水有直接关系，与三峡工程无关。”可惜直接受害的航道部门未必同意，他们认为，“首先是降水量少于往年，上游来水少，形成了50年来最严重的秋旱。其次，三峡汛后进行了一次蓄水，2007年12月初下泄流量在5000立方米/秒，只有以前流量的一半。12月4日，中游船舶搁浅严重。经过双方的协

商，三峡增加下泄流量约 200立方米/秒，但对改变中游枯水现状的作用有限。”[1]

2008年枯水期三峡蓄水，下游出现旱灾，据说是天不下雨，娘不嫁人，没有办法，与三峡水库蓄水无关。2009年枯水期三峡再度蓄水，下游再度出现旱灾，据郑守仁院士说，那还是天不下雨，娘不嫁人，没有办法，与三峡水库蓄水还是无关！这些人轻侮天下人的智力，居然也就到了这种肆无忌惮的地步：谁也没办法让老天下雨，但修水库，不就是为了解决或至少缓解天不下雨造成的问题么？如今下游缺水，你还要雪上加霜，人为降低长江上游对下游的供水量，这就如同人家资金周转不过来，你这“银行”非但不把存款还出来，还去效法城管把人家的钱盒子抢走了，该负什么责任，就连文盲大老粗也能看出来吧？院士专家们到底是哪儿来的这底气，竟然认为大众就那么弱智，所以连这毫无抵赖可能的责任，都有本事出来赖？

令人绝望的是，这种只顾自己发电赚大钱，不顾下游死活，以邻为壑的下流做法似乎并非绝无仅有。湖南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聂芳容说，湘江上游最大的水库 ——东江水库也是只顾发电，“未承担补水任务”，9月前就将积蓄的25亿立方米水下泄用于发电，到了旱季湘江出现低水位，水库便无法有效补水了[1]。

所以，咱们的水库是“水电”工程没错，与“水利”却无相干，称为水害工程倒实至名归。这就是咱们“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的优越性。世上竟有只顾发电不顾下游水情的“单功能”水库，当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

旱季如此，雨季又如何？在旧作中，我这个完全彻底的外行已经向某个冒充水利专家在网上招摇撞骗者解释过水库对下游供水的调节方式了。把有关段落拷贝在此：

“如果年降雨量在水库调节范围内，则水库水位变化如下：

平水季节（秋）：流入等于流出——下游流量等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不变

枯水季节（冬）：流入小于流出——下游流量大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下降

---

[1] 请访问：http://society.people.com.cn/GB/6782620.html

平水季节（春）：流入等于流出——下游流量等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不变

洪水季节（夏）：流入大于流出——下游流量小于上游流量——库内水位上升

这‘平水季节’是我捏造的术语，是指汛期与枯水之间的过渡时期，此期河道的自然供水量不多不少，恰适合下游需要，因此水库不作调节，来多少放多少。其调节作用只在枯水与汛期发挥，枯水时放水，汛期蓄水。

由此可见，库内水位一年涨落不定，最低点乃是枯水季节末尾，在此后的平水季节一直保持不变（因为出入相等），直到汛期来临，此乃自然出现的变化。坝前水位在汛期中涨到最高点，并在随之而来的平水季节保持不变（因为出入相等），直到枯水季节开始，才因放水量逐渐高于来水量而造成库内水位下降。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总而言之，若年降雨量不超过水库调节范围，水库的理想工作状况是排水量不因上游来水量而变化，一年四季都保持在一个恒定水平，使得下游的供水量基本是个常数，不受季节影响。除非遇到大涝大旱，一般的水库都应该处于这种状况。”

而三峡水库（以及其他只管发电的单功能水库如上述东江水库）的工作机制却与上述正常原理反着来，上面已经说过了，那是在枯水期蓄水，力争达到175米的“正常水位”，以实现原设计的发电量，获得足够经济效益，待到汛期来了，就赶快放水，把大坝水位控制在145米所谓的“汛限水位”上。这是为什么呢？那是要留足库容，苦苦等待千年一遇的洪水。根据院士专家们的计算，只有保持这个水位，则千年一遇的洪水万一来了，也只能涨到175米的水位：

“三峡水库调蓄不同频率洪水时，相对应的水库最高水位列于下表：

洪水频率	枝城控制泄量（立方米/秒）	水库蓄洪量(亿立方米)	水库蓄水位（米）
5%（二十年一遇）	56700	73.3	157.5
1%（百年一遇）	56700	143.3	166.7
0.1%（千年一遇）	71500	221.2	175.0”[1]

[1]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http://www.3g.gov.cn/xxxq.ycs?GUID=1891

水库管理人员的尴尬，是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次来的是不是千年一遇的洪水，所以汛前的常规操作，必然是把水位放到145米（据张光斗的披露，好像这还不够安全，必须降到135米，这里假设正式资料的计算可靠）。在第一次洪峰到来后，如果大坝水位超过了145米，那在洪峰过去后就得赶快放水，让水位回落到145米，以防下一次洪峰是千年一遇的。于是在整个汛期中，三峡水库都毫无蓄洪功能，而是不断大量放水，其平均值相当于来多少放多少。这么做虽然起到了所谓"削峰"作用，却使得下游长期处于危险的高水位状态。这一点也为洋共当局一不小心披露了，据中评社北京7月17日电：

"截至17日8时，长江干流九江站水位涨至20.59米，超警戒水位0.59米，创下11年来最高水位。与此同时，江西鄱阳湖水位也已经持续超过警戒线，目前，两者水位还在呈上涨趋势。这次九江段水位再超警戒线主要是由于长江中下游有集中强降雨过程，来水明显增多，**加上三峡水库加大泄洪，**导致长江九江站水位明显偏高并将维持一段时间高水位。 此外，江西鄱阳湖水位超警戒水位时间累积已达25天，受高水位长时间浸泡，各地圩堤已经发生渗漏、泡泉、崩塌、滑坡等各类险情，一旦再有大规 模降雨，将对圩堤安全造成威胁。 "[1]

这就是为唐好色先生大赞大颂的三峡水库的伟大的蓄洪功能，而且他还以无比严谨的科学态度斩钉截铁地作出预言（prophecy）："不造（三峡水库）的话，过几年下游就一片泽国"！

按过去两年的操作规程，这种汛前大量放水降低水位（也就是来少放多，使得下游提前进入汛期），汛期中来多少放多少的背时作法，要维持到11月间，水库才开始蓄水（也就是来多放少）。但如上所述，这种背时作法连续两年引出了严重恶果，因此院士专家们现在考虑决定英勇地"开发洪水资源"，拦洪水尾巴，从9月中开始来多放少，提高水位。这么做，当然无法缓解雨季下游的水患——连三峡集团三峡枢纽梯级调度中心主任袁杰都承认："进入9月后，中下游的水位已比汛期低很多，行洪能力较大，大洪水完全可以泄走。"水库到那阵子才开始"蓄洪"，完全是雨后送伞，但好歹能减轻因水库在枯水期蓄水而加重下游旱情的灾难。

[1]http://chinareviewagency.net/doc/1013/8/4/6/10138465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384655

可惜就连雨后送伞，都还危机重重。本文注解1给出的那文章已经说过了，那风险就是有可能引起上游洪灾。何以故？专家们没敢说，那就是学术打假英雄王维洛早就指出的水力坡度问题，虽然9月份流量已经大大降低，但与枯水季节相比还是很高，因此水力坡度必然较枯水期大得多。大坝水位增加，叠加到上游去，就有可能引起上游洪灾，淹没重庆。专家们不是不懂国情的汉学家，知道重庆万万淹不得。哪怕淹没下游万里农田，也决不能淹了在GDP中占有相当份额、更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直辖市。

从三峡水库这档子烂事上，足可洞见咱们实行唐好色先生提倡的科学一言堂精神、绝不许屁民对关系到子孙万代的重大工程提出质疑的威权政体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但决定了打假英雄只能拍苍蝇，决不能打老虎，更保障了洋共当局可以用一万个错误去掩盖第一个错误，把学术欺诈做大做强，做到院级水平（国务院，工程院，等等）。这优越性之所以丝毫不受窒碍地发挥出来，政府的枪杆子与笔杆子当然居功厥伟，不过也得靠国人以及某些劣质外国人对舆论一律的酷爱。